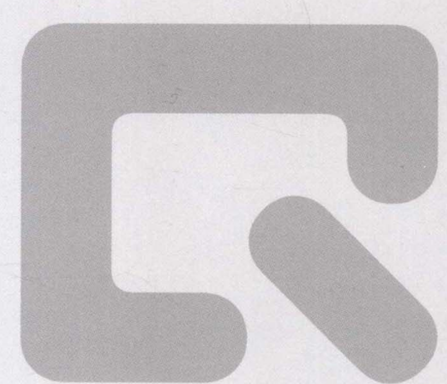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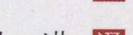


Qualitative Sozial
forschung



质性研究导引

[德] 伍威·弗里克 (Uwe Flick)


孙 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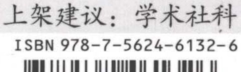
ZHIYING YANJIU DAOYIN

本书最先以德语出版，后被翻译为英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次中文版的出版直接译自德文原版，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本人的亲自关心和指导，因此可以说是对欧洲大陆质性研究方法最原汁原味地介绍。

本书经过教学法方面的精心设计，包括7大部分共31章，内容按照读者认识质性研究、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过程、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质性资料、撰写质性研究报告、评价质性研究质量以及展望质性研究未来发展的认知逻辑顺序排列。每一章都有具体的学习目标、重点提示、案例分析、要点总结、思考练习题以及拓展阅读文献。此外，本书还配有许多形象的插图和概括总结性的表格。教学法方面的这些精心设计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易读性，令它既适合读者自学使用，也适合用作质性研究课程的教材，能够满足学生、教师和质性研究者各种层次的使用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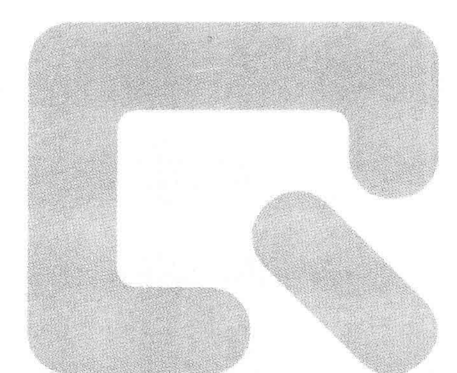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学术社科


ISBN 978-7-5624-6132-6


9 787562 461326 >

定价: 59.80元

Qualitative Sozial forschung



质性研究导引

[德] 伍威·弗里克 (Uwe Flick) 著

孙 进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导引/(德)弗里克(Flick, U.)著;孙进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6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itve Research
ISBN 978-7-5624-6132-6

Ⅰ.①质… Ⅱ.①弗…②孙… Ⅲ.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Ⅳ.①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4929 号

版贸渝核字(2007)第 35 号

质性研究导引
[德]伍威·弗里克(Uwe Flick) 著
孙 进 译
策划编辑 雷少波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刘雯娜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75 字数:512千 插页:16 开 2 页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6132-6 定价:59.80 元

作译者简介

伍威·弗里克(Uwe Flick),博士,教授,1956 年生于德国海德堡,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85—1989 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任讲师。1989—1996 年,任教于柏林科技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并于 1994 年在此获得教授资格。1996—1997 年,在汉诺威医学院担任医学社会学系的主任。自 1997 年以来,在柏林艾丽斯·萨鲁蒙应用科学大学(Alice Salomo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担任质性研究专业的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柏林科技大学兼任健康科学研究所的私立讲师。他曾在多所国外的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如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城市大学、新西兰奥克兰梅西大学,以及智利的圣地亚哥、瑞典的卡尔斯塔德、意大利的帕多瓦、葡萄牙的里斯本。他的教学与科研重点为:质性研究方法、日常知识、个体及公共卫生、质性评估、青少年无家可归等。

孙进,博士、副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先后在德国波鸿大学获得欧洲文化与经济学硕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译者前言

Uwe Flick 是德国柏林艾丽斯·萨鲁蒙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是德国质性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和重要代表人物。他长期从事质性研究的教学与科研,撰写和主持出版了一系列质性研究的重要作品,其中多部作品已经被翻译为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德语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是 Flick 先生介绍质性研究的代表作,自 1995 年首次出版以来,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至今已经出版至第 7 版(全新修订版),内容也不断得到扩充和更新,从最初的 317 页扩展至现在的 618 页(原版页数)。在此期间,该书的英文版也已连续出版至第 4 版,并被美国著名的质性研究学者 Norman K. Denzin 赞誉为"质性研究领域最全面和最深入细致的作品"①。近年来,该书陆续在日本、韩国和巴西被翻译出版,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译者在德国留学时,此书已经成为德国质性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和大学质性研究课程的推荐教材。译者最初也正是通过这本书以及他主编的另一本《质性研究手册》系统了解了质性研究领域。译者在完成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时都用到了质性研究方法,每隔一段时间去查阅该书时,总是意外地发现该书又有了新的版本,因此也先后阅读了 Flick 先生这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亲自见证了这部著作的成长历程,自己对质性研究的了解也随之不断地深入。

因为这一缘故,当重庆大学出版社的雷少波先生通过林小英女士请译者翻译此书时,笔者虽然有些顾虑,担心翻译这一大部头的德语著作会消耗自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最终还是在一种近乎是使命感的驱动下,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这一使命感一方面源自于译者觉得这部著作非常值得推荐给我国的读者,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从德语水平、对质性研究的理解以及与此书的缘分等方面来看似乎也是完成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

Flick 先生的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在德国获得读者的青睐,一方面是因为自 1990 年代以来质性研究在德国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此书正好满足了人们全面了解当时正处在上升趋势之中的质性研究的需要。而随着质性研究的影响与日俱增,并逐渐被列入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人们认识、了解和使用质性研究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因此,该书既因应了时代的需求,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这

---

① 参见该书英文版第 4 版封面题词:Uwe Flick.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Fourth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一需求。另一方面,此书之所以能够在德国众多介绍质性研究的书籍当中脱颖而出,最终自然还是要归功于该书的质量,即其在内容方面的全面系统性、在分析方面的深入细致性以及在教学法设计方面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等优点。

质性研究目前在我国也正处在上升的发展趋势之中。除了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之外,现在已有多本介绍质性研究的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向明教授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现有的各种质性研究读物,有些读者难免会产生以下的疑惑,即是否还有必要阅读这本《质性研究导引》?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需求形成自己的判断。译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十分肯定的。原因在于本书具有以下四个突出的优势和特点,而这些优势和特点在国内外同类的质性研究读物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第一,本书的内容既包括我国读者已经熟悉的、来自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包括许多我国读者可能尚不熟悉的、在德国本土发展起来并正在产生广泛影响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如客观注释学(Oevermann)、叙事访谈(Schütze)、事件访谈(Flick)、主题编码(Flick)、质性内容分析法(Mayring)、总体分析法(Legewie)以及专门用于分析质性资料的电脑软件,如 ATLAS/ti 和 MAXQDA。因此,此书有助于扩展和丰富我国读者对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整体认识和了解。

第二,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质性研究的发展历史、理论流派、研究问题、研究过程、研究设计、抽样策略、进入实地的策略、收集资料的方法(如焦点访谈、半标准化访谈、问题中心访谈、专家访谈、民族志访谈、叙事访谈、事件访谈、小组讨论、焦点小组、共同叙事、观察法和民族志以及收集图片、录像和电影资料的方法等)、记录和转录资料的方法、分析和诠释资料的方法(如扎根理论的理论编码、主题编码、质性内容分析、总体分析、会话分析、话语分析、体裁分析、叙事分析、客观注释学分析以及相关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件等)、质性研究写作,以及质性研究的质量评价。此外,本书还讨论和分析了质性研究对文献的使用、对文档的使用、质性网络研究、质性研究的伦理问题以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并在最后指出了质性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书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质性研究过程以及其中需要考虑到的方方面面的重要问题。

第三,本书经过教学法方面的精心设计,包括七大部分共 31 章,内容按照读者认识质性研究、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过程、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质性资料、撰写质性研究报告、评价质性研究质量以及展望质性研究未来发展的认知逻辑顺序排列。每一章都有具体的学习目标、重点提示、案例分析、要点总结,思考练习题以及拓展阅读文献。此外,本书还配有许多形象的插图和概括总结性的表格。教学法方面的这些精心设计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易读性,令它既适合读者自学使用,也适合用作质性研究课程的教材,能够满足学生、教师和质性研究者各种层次的使用需求。

第四，本书既有对每一种方法及其应用的全面分析，也有对不同方法的横向比较，并且提出了选择和评价某一方法需要参考的主要依据。因此，本书有助于读者作出选择和放弃某一方法的决定。另外，本书不仅从实用的角度来分析和介绍每一种方法，而且也对每一种方法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和定位。这有助于读者批判性地反思和评价自己所选用的方法，认识到各种方法的理论背景、认知优势、与研究过程中其他工作步骤的匹配性以及该方法固有的局限性。因此，本书既适合质性研究的初学者用来了解质性研究方法，也适合质性研究的学者从方法论的层面来分析和评价各种方法。

概括来说，本书内容涵盖了质性研究的整个过程和领域，汇集了来自英美国家和德语国家的重要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学者 Denzin 称此书为"质性研究领域最全面"的著作绝非过誉之词。此外，本书在教学法方面的精心设计令它适合满足不同读者、不同层次的使用需求。因此，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质性研究著作。

学术著作翻译总地来说是一项高付出、低报酬、相当枯燥却又容易招致批评的工作。本书的翻译前后历时三年，被证明是一个十分辛苦的过程。支撑译者完成这一翻译的最大动力便是希望这部来自德国的学术著作能够丰富我国当前有关质性研究的知识，拓展我国质性研究的国际视野，并最终能够对我国读者学习和使用质性研究有所助益。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 Flick 先生的大力支持。翻译期间，译者多次到柏林访问，每次都会和 Flick 先生就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他先后将该书的两个英文版本赠给译者。因为该书的英文版也是由他自己撰写的，所以参考该书的英文版对本书的翻译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①。通过对比英文和德文对同一内容的表述，译者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当然，虽然译者力求提供正确的翻译，但是限于两国语言的语法结构、论证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以及两国社会科学知识传统差异所造成的许多对应概念的缺失，所以，翻译中可能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恳请读者朋友多多批评指正。

孙　进

2011 年 2 月于德国柏林

①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该书的英文版并非是对德文版一对一的翻译。作者在英文版的许多地方进行了内容上的增删，此外，两书章节的数目也不相同。

中文版前言

质性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使用,成为历来注重量化和标准化方法的定量研究之外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策略,并被视为是定量研究的有益补充或替代方案。在此期间,质性研究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如今,质性研究包括多种不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质性研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也加强了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例如,德国学者发展出一些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质性研究程序,在方法讨论中也有着自己的侧重点,如叙事访谈、事件访谈、客观注释学和主题编码。相比而言,在美国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扎根理论和民族志方法。

本书介绍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的主要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既包括来自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包括来自德国和欧洲的质性研究方法和策略。作为一部全面介绍质性研究的专著,本书既适合人们概括性地了解质性研究这一广泛的领域,也有助于读者根据具体的研究课题选出适合自己需要的、特定的质性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因为重视开放性的原则,所以历来对于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其特有的敏觉性。本书迄今为止已经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包括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巴西。如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本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这表明质性研究在中国也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我很欣然地看到这一发展。

时值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想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将本书选入其“万卷方法”系列。我也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的孙进博士为本书所做的认真、耐心和细致的翻译工作。在本书翻译期间,我们两人多次在柏林见面,就翻译中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保证那些复杂的内容和棘手的概念得到正确的理解,对我也很有启发意义。最后,我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的学生、教师和学者开展质性研究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有所助益。

伍威·弗里克(Uwe Flick)

2011 年 1 月,德国柏林

修订版前言

质性研究在德语国家中(在英语国家中更是如此)正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质性研究正被越来越多的学科所采用,并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中渐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的趋势、方法、问题和发展不断涌现。

本书首次出版时的书名是《质性研究——理论,方法及其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在2002年本书第6次修订出版时,书名改为现在的《质性社会研究导引》(*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eine Einführung*)[①]。书名的这一改变,主要是为了避免与另一本在此期间已在同一系列中出版的图书《质性研究手册》(*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Flick, Kardorff/Steinke, 2000)产生混淆。

如果说《质性研究手册》这本书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介绍了质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且主要是由其原创者、代表者或核心人物从他们的角度来进行介绍的话,那么,本书的目的则是想要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一种导引,以便读者可以在已经难以一目了然的质性研究领域找到方向。新的书名既能够更加突出地表明本书的导引性特点,而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本书的读者群体是各学科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包括社会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护理科学、健康科学以及目前正从事和讲授质性研究的其他学科和专业。

作为新版,本书再次经过了全面的修改,在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扩充。期刊杂志中那些新发表的数不胜数的文献、最重要的那些教材和手册的再版,以及新丛书的问世,都要求对本书所用的那些文献进行全面的更新。尽管本书的结构有些变动,不过,本书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即以质性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展示主线以及对每个阶段中的方法和理论都进行对比分析。

为了顾及当前的发展和要求,本书增添了几章新的内容。新的内容包括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道德(第4章),质性研究中文献的使用(第5章)以及质性研究设计(第12章)。新的研究领域也被纳入了本书,如文档分析(第19章)和质性网络研究(第20章)。本书以新增的一章(第1章)作为导引开始,并以新增的对质性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概述(第31章)结束。对部分章节在本书中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比如有关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关系的那一章(现为第3章)以及

① 经过和原作者沟通,本书中译版的书名参考该书英译版的书名(*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被定为《质性研究导引》。——译者注

有关质性研究中电脑的使用那一章(现为第 26 章)。另外一些章节被分解成若干章节,这些章节主要是在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在第五部分,观察法(第 17 章)和视觉资料(第 18 章)被分成两章分别进行阐述。在第六部分,会话分析、话语分析和体裁分析(第 24 章)以及叙事分析和注释学分析(第 25 章)被分成独立的两章。

此外,本书在编排设计和教学法方面也再度得到了改善。现在每章之前都有一个本章的主题概览和学习目标。范例以及对各个理论和方法的概括、展示被放入提示框中以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每章的结尾,都给出了要点、拓展阅读文献和练习题。

为了便于阅读,本书没有同时使用男性和女性的人称形式。请女性读者和男性读者在读到譬如研究者和访谈伙伴等概念时,分别自己去想象他们的女性人称形式和男性人称形式。

最后,我想向“侯沃尔特百科全书”系列的主编 Burghard König 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多年以来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伍威 · 弗里克(Uwe Flick)

目 录

第一部分 本书框架

第二部分　从理论到文本

第三部分　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　口述资料

第五部分 观察法和媒介资料

第六部分　从文本到理论

第七部分　有效性论证、写作和发展前景

第一部分　本书框架

本书的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开展质性研究的框架。这一部分的阅读有助于理解本书后面各章的内容及其结构关系。作为本书的指南，第1章介绍了本书的结构。第2章首先概括回答了下述问题，即为什么质性研究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以及在21世纪初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概括介绍了质性研究的背景之后，第2章还指出了质性研究的本质特征。第3章分析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和问题。第4章简单阐述了质性研究中特定的伦理问题。总地来说，本书的这一部分应该为读者使用本书在后面各章中详细介绍的质性研究方法打下一个基础。

本书指南 1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本书的结构。
- 知道本书分别在哪些章节介绍了质性研究的哪些内容。
- 明白您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使用本书各章节中的知识。

本书的定位

本书的读者群体既包括初次接触质性研究的读者，也包括已具有一定质性研究经验的研究者。初次接触质性研究的读者，或者说初次接触社会研究的读者，通常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对他们而言，本书可被当作一个基础性的导引，导引着他们认识质性研究的原则和操作、质性研究的理论和认知论背景以及质性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本书也可以在质性研究的日常工作中被用作一个工具箱，帮助使用者应对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质性研究已经在很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如心理学、护理学等）确立下来。到目前为止，质性研究已经发展出大量的研究方法，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追寻着不同的目标。每一种质性研究方法都对研究对象有其特殊的理解和定义。分析质性研究方法不能脱离具体的研究过程和研究对象。它们总是以特定的方式被嵌入在研究过程之中，因此，对它们的描述和理解最好是采用一种过程性的视角。基于这些考虑，本书主要的目标便是介绍质性研究过程的各个步骤，通过把最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到研究发现的评价和表述，置入一个过程的框架来介绍它们。通过这一方式，本书希望对质性研究的领域、此领域中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上的要求、应用和局限性做出一种概括性的介绍，让读者能够根据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选择最合适的方法策略。

展示内容的顺序

本书在这里的一个出发点是:质性研究是以文本为基础来开展工作的。资料收集方法(如访谈或者观察)最终都会生成资料,这些资料经过记录或录音整理而被转换成文本,而文本又构成阐释工作的起点。人们在此可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生成居于研究中心位置的文本,并从本文出发开展下一步的工作。简单地说,质性研究的过程可以被概括为**从理论到文本**再**从文本到理论**的过程。而口述性资料或视听资料的收集与阐释则构成了两者在一项具体的研究设计中的连接点。

本书的结构

本书由七个主要部分组成,它们展示了质性研究的过程及其中重要的步骤。

第一部分介绍了开展质性研究的**框架**。

- 第 2 章分析了质性研究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笔者在此首先简要介绍了一下质性研究在当前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背景下所获得的重要性。之后,介绍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欧洲和美国的发展。最后总结指出了质性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所共有的一些特点。
- 第 3 章分析的是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这里列出了一些主要的参考问题,可被用来衡量和判断采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适合性。这些参考问题可以帮助读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有针对性地选择质性研究、定量研究或者是选择二者的结合。
- 第 4 章阐述的是质性研究中的伦理。这里之所以要专门探讨伦理问题,是因为质性研究者要比其他的研究者更加深入地走近被研究者的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在研究的准备阶段进行伦理上的反思以及提高研究伦理上的敏感性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关研究伦理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常常忽视质性研究的特殊性。通过本章的阅读,读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伦理规范以及伦理委员会的重要性。不过,一项研究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经常在同样的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在研究现场所作出的具体决定。

第二部分阐述的是质性研究过程中**从理论到文本**这一部分的工作步骤。

- 第 5 章分析的是质性研究中文献的使用,包括理论性、方法性和实证性文献的使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研究文献在研究进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有关文献的写作。在第 5 章的结尾,笔者给出了文献查询的一些提示。
- 第 6 章介绍了作为质性研究理论基础的各种理论流派。这里讨论了符号互动主义、常人方法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模型这三个主要的理论流派及其基本观点和新近的发展。这里补充介绍和完善了本书第 2 章中提到的那些质性研究的

根本性特点。此外,第6章还补充介绍了两个重要的论争。尤其是对于国际讨论而言,这两个论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女权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以及实证主义 *vs.* 建构主义在质性研究的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对研究对象和过程的设计以及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

- 第7章的内容是文本的建构与理解,此章介绍了建构主义质性研究的认知理论背景,这种质性研究以文本作为实证资料。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讨论的是如何规划和设计质性研究的实用问题。

- 第8章简要勾勒出了质性研究的过程。这里的分析表明,定量研究的过程可以分为明确区分开来的步骤,与此相比,质性研究的各个步骤更多的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 第9章关注的是一个得到清楚界定的研究问题对于开展质性研究所具有的意义。这里指出了如何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研究问题。
- 第10章探讨的是如何进入研究实地以及如何接近研究的参加者。
- 第11章讨论的是抽样,即:如何选择单个的或者集体的案例,如何选择访谈对象或者观察情境。
- 第12章概括介绍了质性研究设计的实用问题以及质性研究的基础设计。

第四部分向读者介绍了收集资料的主要策略之一:通过访谈、叙事或者焦点小组获得**口述资料**。

- 第13章介绍了访谈的不同形式,他们共同的标志性特征是使用访谈提纲。访谈提纲由或多或少的开放性问题组成,用来刺激受访者做出回答。有几种访谈方法——比如焦点访谈——可用于不同的目的,而其他一些方法——如专家访谈——则只被用于特定的应用领域。
- 第14章介绍了收集口述性资料的第二种途径。这里最重要的步骤是刺激受访者开始叙事(讲述其生活史或者更加聚焦地就特定的情况展开叙事)。叙事使用的是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访谈形式,第一类是叙事访谈,第二类是事件访谈。
- 第15章介绍的是以小组/团体为单位收集口述资料的方法。焦点小组和小组讨论在很多领域里都是流行的。焦点小组和小组讨论这两种方法都以激发小组讨论为基础,而小组访谈与它们有所不同,它更多地是以回答问题为目的。共同叙事是让一个小组中的成员讲述他们共同经历的事件或过程。
- 第16章是对口述资料的各种收集方法的一个总结分析。总结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作出选用第四部分中介绍的各种备择性方法的决定。为此目的,此章对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供了一个作出此类决定的核查单。

第五部分分析的是观察和媒介资料,它们覆盖了不同的交流方式,也包括电子资料。

- 第17章介绍的是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以及民族志方法。在使用这些方法的同时,研究者往往也会分别采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补充自己的观察,

如采用访谈或文档分析等方法。
- 第 18 章介绍的是视觉资料以及对图片、电影和录像的分析。
- 第 19 章描述的是质性研究中文档的生成和处理。
- 第 20 章讨论了因特网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工具的问题以及它们在采用以上各章中所介绍的方法——访谈、焦点小组或民族志——而开展的研究中的应用。
- 第 21 章从比较的视角考察了第五部分讲述的观察和媒介资料，其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各种方法的优点及问题，帮助读者作出选择或者拒绝特定研究方法的决定。

在介绍了资料的收集和生成之后，本书的第六部分介绍了**从文本到理论**的方法，即如何从所收集到的资料和由此生成的文本出发，经过质性分析程序得出理论上重要的认识。

- 第 22 章的内容是质性研究中对资料的记录。这里详细地讨论了实地记录以及转录的操作技术，并结合具体的例子进行了说明。
- 第 23 章介绍了文本分析中编码和归类的方法。
- 第 24 章所介绍的方法不只是关注讲述的是什么，而且可能更加关注讲述的方式。会话分析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以及机构中的交流是如何正常进行的，参与者为了在不同的情境下交流采用了哪些方法。话语分析和体裁分析是会话分析在不同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
- 第 25 章阐明了叙事性和注释学的方法。与第 24 章的方法一样，在这里，对文本的解释也是既关注其内容也关注其形式。比如说，对一个叙事的分析，不只是分析它所说的内容是什么，而且同时也分析故事在讲述中是如何被展开的，这种叙事方式相对于讲述的内容而言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 第 26 章讨论的是如何使用电脑以及特定的软件分析质性资料。这里介绍了最主要的一些程序及其工作原则和例子。本章的内容可以帮助读者做出以下的决定：是否以及采用哪一种电脑程序来分析自己收集的资料。
- 第 27 章概括总结了质性资料分析。与前面一样，这里也对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供了一个核查单。本章的分析有助于读者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和问题选出合适的方法。

第七部分回溯至质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了**有效性论证和写作**的问题。

- 在第 28 章里，本书讨论了传统的质量标准在质性研究中的应用，它的局限性以及一些专门针对质性研究或其中一些特定的方法而发展出来的备择性的质量标准。在读完此章之后，读者就会明白，为什么对有关质性研究质量问题的回答既是来自于研究实践之外的一个重要期待，也是改善质性研究实践的一种必要性。
- 第 29 章探讨的是在提出质量标准之外寻找对质性研究质量问题的解答。作为备择性的解决办法，此章讨论了以下三种办法：质量管理的策略、回答（有关方法和理论的）指示问题和多元方法结合。
- 第 30 章讲的是质性研究写作的问题，即如何让特定的读者群体理解研究的结果，呈现结果的方式对所呈现的结果有哪些影响？

- 在第 31 章(最后一章)中,本书首先再次概括总结了质性研究的发展现状,接着先后探讨了质性研究的未来发展和质性研究的教学与学习的问题。最后,此章展望了质性研究的未来,并指出质性研究的定位将会继续在艺术(学)和方法之间摆动。

展示的目的

在质性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涌现出许多方法。这些方法的出发点和目标都不尽相同,对所要研究的对象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它们分别以其特有的方式为质性研究的一般讨论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根据自己从事质性研究的实际经验、教授质性研究的教学经验和对正处在科研项目中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经验,笔者认为本书不应孤立地介绍质性研究方法,而有必要将其置于整个研究过程当中来介绍。本书想要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过程性的展示。通过这种基于过程的展示,本书一方面概括介绍特定的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以便于应用者做出选择;另一方面,这种展示方式也可以让研究者检验各个方法与整个研究过程中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协调性:从各种备择方案中选择出来的那些解释程序(第 27 章)在多大程度上与收集资料的方法(第 16 或 21 章)以及整个研究过程的设计(第 8 章)或者是与所使用的样本选择程序(第 11 章)相符合呢?

为了深入地理解和应用各个方法,读者有必要阅读与所介绍方法有关的拓展文献。为此目的,本书在每章的结尾都给出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

本书的特殊组成要素

为了提高本书在学习和开展质性研究中的实用性,本书各章都包含着一些特殊的组成要素:

- 目标——在每章的开头,都有一个导引。这个导引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个是本章要讨论的主题的一览表,另一个是本章学习的目标,即读者在阅读完本章后应该掌握的内容。
- 提示框(Kasten)——提示框总结了特定方法(比如访谈)的核心步骤,包括实用性提示或者问题。
- 案例——案例用来说明研究方法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应用。它指出质性研究在实践中是如何得到贯彻实施的,在实施的过程中分别出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除了引用相关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之外,这里也用到了笔者自己的研究。有几个研究被多次用作案例,不过每次用它们来说明的主题是不同的。
- 核查单——许多章节(第 12,16,21 和 27 章)都包括核查单,核查单可以帮助读者作出选用某一方法的决定以及对方法的合适性进行评价。
- 表格——在对之前详细介绍的各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的各章中,都使用了表格。通过与相应的备择方法的比较,各个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使用表格进行对比分析也是为了帮助读者选择出适合自己研究对象的“正确”方法。

- 用来对方法进行定位的标准——本书在介绍完各个方法之后总是会按照一系列的标准对各个方法进行比较性的定位(比如:方法的局限性)。这些标准不断得到重复使用,以便于读者对各个方法进行定位和评价。
- 横向索引——横向索引旨在指出特定的方法或问题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将对单个问题的叙述置于情境脉络之中。
- 要点——在每章的结尾部分,本书都强调指出了本章中的要点。
- 练习——练习的目的旨在令读者通过分析其他研究者的作品以及对自己研究课题的规划来扼要地复习一下各章学习到的内容。
- 拓展阅读文献——在每章的最后都给出了便于读者进行拓展阅读的参考文献。

如何使用本书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在质性研究方面已掌握的知识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本书。读者既可以从头到尾通读本书,因为本书的结构遵循的正是设计和实施质性研究的步骤。这些步骤从收集必要的背景知识开始,经过研究设计及其在某个研究项目中的实施,最后以对自己研究的评价和写作而结束。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本书:

- 本书从第 2 章到第 7 章提供了质性研究的背景知识。这里概括介绍了质性研究的认知理论基础。
- 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设计质性研究的方法问题,它关注的是研究设计。第七部分讨论的则是质性研究的有效性论证。
- 有关质性研究设计的一些实际问题可以从第三部分找到解答,这里对质性研究的抽样、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进入实地的方法都提出了一些建议。
- 本书在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介绍的是质性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及应用中的实际问题。这里讲到了很多具体的方法。

质性研究——现实性、历史和特点 2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能够理解质性研究的历史和背景。
- 熟悉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共同特点。
- 明白质性研究为何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是符合时代精神并且是不可或缺的。

质性研究的现实性

随着现代社会里生活世界变得多元化——正如 Habermas 所说的“新的非一目了然性”（Habermas 1985），Beck 所说的日益增加的“生活环境和传记模式的个性化”（Beck 1986），或者如 Hradil 所说的旧式社会不平等的消弥与取而代之的新的生活圈、亚文化、生活风格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Hradil 1992）——，使用质性方法来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具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多元化的生活世界要求人们以全新的敏觉性（Sensibilität）对待实证研究的对象。在后现代的代表者宣称了宏大叙事和宏大理论的时代已经终结之后，更为符合时代精神的便成为限定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之上的叙事（Erzählungen）。鉴于生活环境和诠释模式在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Herbert Blumer（1969/1973，第 118 页）的下述论断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者的工作出发点实际上总是因为自己并不熟悉所要研究的生活领域里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社会的迅速转型和由此而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多样化，越来越多地使社会研究者面临着对他们而言全新的社会情境和视角。这一发展的结果是，传统的演绎式研究方法——即先从理论模型中推导出研究问题和假设，然后再通过实证去检验——不再能够把握住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归纳性的研究方法：在这里，研究者不再是以理论及其验证为

出发点，而是借助于“敏觉化方案”（sensibilisierende Konzepte）贴近所要研究的客体。与人们通常所误解的那样不同，研究者在此完全可以将其理论性的先期知识纳入这些“敏觉化方案”之中。这样一来，理论就是经由实证研究而被发展出来的，知识和行为也是作为**本土性**的知识和行为而得到研究的（Geertz 1983a）。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心理学的研究至今仍然缺少一种日常重要性（Alltagsrelevanz），因为心理学研究者太少致力于准确地描述处于具体情境之中的事物（Dörner 1983）。有鉴于此，有些学者要求心理学者应关注和研究主观意义以及日常体验和行为（Bruner 1990），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叙事（Bruner 1991；Sarbin 1986）和讨论（Diskursen）（Harré 1995）。

以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为发展起点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在其发展历史上都曾十分重视发展量化的、标准化的方法。它们在此以自然科学及其精确性为榜样，清楚地分离原因和结果，准确地对理论性相关关系进行操作化处理，研究现象的可测量性和可量化性，制订可以允许研究者获得普遍化的研究结果和提出普适性法则的研究程序，这些都是其研究（研究设计）的指导思想。为此目的，研究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如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研究的结论应该尽可能地具有普遍性意义，而不是局限于具体研究到的一些个案。所观察现象的频率和分布情况应该可以得到准确的测定。为了能够尽可能明确地确定因果性关系及其有效性，研究者需要尽可能地控制所研究的现象或关系出现的条件。调查研究的设计应该能够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采访者、观察者等）产生的影响。这种做法有助于保证调查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地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主观性排除在外。为此目的，人们还就如何开展和评价实证性社会科学研究制订了普遍适用的质量标准。具体的工作步骤——如问卷设计、调查计划和统计分析——也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细化。

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几乎仅仅采用实验性的研究设计。通过这类研究，人们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结果。在这些数据和结果当中，不同变量之间在心理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以及这些相关关系适用的条件均被揭示出来并得到了验证。基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一直主要依赖标准化的调查。通过这种调查，人们可以记录并分析社会现象——比如特定的态度——在人群中的频率与分布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少地从根本上反思定量研究的标准和操作过程，也没有深入地去追问：哪些研究对象和问题适合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而哪些研究对象和问题不适合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在以反思定量研究的标准和操作过程为目标所进行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总体上来看主要是消极的。上面提到的客观性的理想目标在此期间已经基本上被“除魅了”（entzaubert）：在马克斯·韦伯将“把世界除魅”（Entzaube-

rung der Welt）宣布为科学的任务之后，Bonß/Hartmann（1985）发现，科学、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知识也越来越多地遭到了除魅。就社会科学而言，这一点反映在其研究成果缺乏应用性和关联性之上。比如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更主要的是，往往并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被应用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应用研究（Beck/Bonß 1989）表明，科学性知识并没有以人们希望的那种方式和程度被纳入政治性或机构性的行为方式之中。即便是这些知识得到了应用，应用者往往也会明显地对它们作出重新解释和批驳（zerpflückt）："科学（……）所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可被人们毫无疑问地接受的'无限真理'。科学所提供的，只是有限的解释方式（Deutungsangebote），这些解释方式虽然超越了日常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同样可以像日常理论那样被人们灵活地加以使用（……）"（Beck/Bonß 1989，第3页）。

人们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接受和使用。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结果常常为了保证方法上的标准而远离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对研究实践的分析表明，大部分前面提到的客观性的理想目标在研究实践中都没能得到实现。尽管有各种方法上的控制措施，但还是不能避免研究及其结论受到参与研究者的利益及其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提出，而且也影响到对研究数据和相关关系的诠释。

对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所追求的，特别是其尚有待去实现的认知形式而言，Bonß/Hartmann 所讨论的"除魅"最终不会是毫无影响的：

> 在客观主义的理想目标被除魅的情况下，人们已不能再轻易地从客观真实的定理出发。任何叙述可能只是关乎特定主体和情境的叙述。而社会学所理解的认知活动的任务便是去为这一可能性找到根据。（Bonß/Hartmann 1985，第21页）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这类关乎特定主体和情境的论述，正是一个可以通过质性研究来实现的目的。

质性研究的特点

质性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定量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不同的。质性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相对于其研究对象的适合性，重视和分析不同的视角以及把研究者对研究的反思作为认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方法和理论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不同学科都发展了各自的标准方法，这也是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作为心理学核心研究方法的实验或者社会学中的问卷调查。在这两个学科向科学性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方法有时成为评价一些想法和主题是否适合于实证研究的参照点。这种做法有时导致人们提出了如下的建议，即

不要把那些不能通过实验或者问卷调查来研究的对象作为自己实证研究的对象。对有些研究主题和对象来说,人们因为难以清晰地确定和隔离变量,所以就无法作出实验性的研究设计。有些研究主题只适合于进行少数案例研究,因此,在这里便出现了代表性研究所需要的大规模样本的问题以及研究结果推广性的问题。人们当然应该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是否适合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参见第 9 章)。不过,在现实中,很少有现象能够像心理学实验设计所要求的那样,通过孤立的一些特征而在因果关系层面上得到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现实和现象的复杂性。假如实证研究完全按照明确分离的因果关系的模型来设计的话,那么,所有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都将会被放弃。当面对这样一些具有"抵抗性"的研究对象时,将这些研究对象完全排除在实证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是解决研究对象和方法之间矛盾的第一种途径。

第二种解决研究对象和方法之间矛盾的途径是,通过复杂的定量研究设计(如多层分析)将情境条件也考虑进来,并以实证的、统计的方法验证复杂的模型。在这里,难以避免的方法上的抽象化处理额外地增加了将研究回溯到所研究的日常现实的难度。另外,这第二种解决途径同样无法解决那个根本性困难,即分析在这里只能展示那些此前已被纳入到作为研究之基础的现实模型中的内容。

质性研究采用的是第三种解决途径,即在研究设计上保持方法的开放性,以便让方法能够切合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这里,研究对象是选择研究方法的参照点,而不是相反。研究对象没有被分解为若干个变量,而是保持着其复杂性和整体性,并在其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得到研究。因此,质性研究的研究域并不是实验室里的人工设置的情境,而是行为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互动。为了把握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质性研究在方法上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开放性。这一方法上的开放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保证(参见第 13—21 章)。质性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验证已知(比如验证之前已经提出的理论),而在于探索新知和发展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理论。质性研究的有效性也是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的,而不是——像定量研究那样——仅仅遵守科学性的抽象标准。衡量质性研究有效性的核心标准包括:通过研究所取得的认知是否建立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之上,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是否适合研究对象。其他的衡量标准还有:研究发现的重要性(Relevanz)以及研究过程的反思性(Reflexivität)(参见第 28 章和第 29 章)。

参与者的视角及其多维性

质性研究的下一个特点可以通过一项研究精神疾病的例子来说明。流行病学的研究可以指出,精神分裂症在人口中出现的频率是多少。此外,流行病学的研究还可以证明,精神分裂症在人口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在下层社会中出现的频率要远高于在上层社会中出现的频率。Hollingshead/Redlich(1958)在 1950 年代便发现了这一相关关系,此后这一相关

关系不断得到新的研究的证实。不过,通过这些研究,人们一方面无法解释这一相关关系的方向,即是下层社会的生活条件催发了精神疾病的出现呢,还是人们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而沦落入下层社会呢?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不能告诉我们,对于患者来说,带着精神疾病去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既不了解这类疾病(或者健康)对患者及其家人的主观意义(subjektive Bedeutung),也不清楚他们在其所处的环境之中对于这类疾病在看法上的不同。精神分裂症对病人及其家人的主观意义是什么?不同的参与者目前是如何对待这种疾病的?从患者的生涯发展历程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类疾病的突然发作,又是什么原因令这种疾病发展成一种慢性疾病?对于这一发展来说,接待过患者的不同机构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哪些观念、目的和惯例具体决定了他们对待这类情况的方式?

如果采用质性研究来研究类似精神障碍这类主题的话,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上面的这些问题。它能揭示出参与者——患者、家人以及专业人员——看待特定研究问题的不同视角,质性研究所关注的是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主观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所研究的是参与者的知识和行为。它所分析的是参与者在各自所处的场域中应对这类精神疾病的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相关关系是在事件所处的具体情境之中得到描述并从中得到解释的。质性研究顾及了这一情况,即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参与者因其主观视角及社会背景不同,所以他们的看法及其在各自所处社会场域中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

研究者及研究的反思性

与定量研究不同的是,质性研究将研究者与各个场域以及被研究者的交流明确地视为是认知活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是需要尽可能排除的干扰因素。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主观性是质性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者自己在场域中的行为和观察,他的印象、困惑、影响和感觉等,以及研究者对此的反思都是研究者在进行诠释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并应将其记录在研究日志或者情境记录当中(参见第22章)。

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丰富多样性

质性研究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指导着学界讨论和研究实践的是各种不同的理论以及与这些理论分别相应的方法。质性研究的第一个分支关注的是主观见解。质性研究的第二个分支关注的是互动的发生及其发展。质性研究的第三个分支旨在对社会场域中的结构以及对行为之潜在意义的再现和重构(详见第6章)。质性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这种丰富多样性是因为质性研究的不同分支在历史上部分是并行发展的,部分则是阶段性地前后相继发展的。

提示框 2.1　质性研究的特点——第 1 部分

- 研究方法和理论相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 参与者的视角及其多维性
- 研究者和研究的反思性
- 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丰富多样性

质性研究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扼要地回顾一下质性研究的发展历史。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无论是在心理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有长久的传统。在心理学领域，Wilhelm Wundt 在其民族心理学（1900—1920）研究中，除了使用普通心理学研究所用的实验性方法之外，还同等地使用了理解性和描述性的方法。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德国的社会学领域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基于专题性的（monographisch）科学理解，比较注重归纳和个案研究的方法，而争论的另一方则主张运用实证性和统计的研究方法（Bonß 1982，第 106 页）。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传记研究法、个案分析和描述法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直到 1940 年代为止）处于核心的地位。这一点，人们可以代表性地从 Thomas/Znaniecki 所做的《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18—1920）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更普遍地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重要意义看明（参见 Fischer-Rosenthal 1995，第 115-116 页）。

不过，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形成过程中，“硬性的”、实验性的、标准化的和量化的研究设计逐渐取代了“软性的”、理解性的、开放性的和质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而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 1960 年代以后，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对标准化的、量化的社会研究，特别是对其理论基础的批评（Cicourel 1964；Glaser/Strauss 1967/1998）才再次得到重视。这种批评 1970 年代在德语国家中得到了广泛延续。随之而来的便是质性研究方法的复兴，先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后也扩展到了心理学领域（参见 Bergold/Flick 1987；Jüttemann 1985）。这一发展和讨论在美国和德国不只是在时间上先后错开进行，而且它们也经历了不一样的发展阶段。

在德语国家中的发展

在德国，Habermas（1967）最早指出了美国社会学领域存在的“另一类”研究传统和讨论。这类研究传统和讨论与 Goffman，Garfinkel 以及 Cicourel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 Cicourel 的方法批判性著作（1964）于 1970 年被翻译成德语之后，来自美国的相关讨论的各类文章于 1970 年代初相继以合集作品的形式被引入

德国(如 Bühl 1972; Steinert 1973;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 1973; Weingarten/Sack/Schenkein 1976; Gerdes 1979; Hopf/Weingarten 1979)。通过这一方式,有关常人方法论或者符号互动主义等方面的基础性文献就被引入德国学界的讨论。在这一阶段,由 Glaser/Strauss(1967/1998)提出的研究过程模型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例如 Hopf & Weingarten 1979; Hoffmann-Riem 1980; Kleining 1982)。这里的讨论主要遵循的目的是,如何使质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好地适合研究对象。这一点在 Hoffmann-Riem(1980)所提倡的"开放性原则"那里体现得十分清楚。与此相应,Kleining(1982,第 233 页)要求,在研究结束之前,研究者要把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视为是暂时性的,因为研究对象"只有在最后才会显示出其真正的面目"。有关"自然主义社会学"(Schatzman/Strauss 1973)和适合研究对象的方法的讨论也同样受到了一种类似的(首先是隐含性的,之后变为是明确性的)观点的决定性影响。这个观点认为:只要人们足够认真地遵循开放性原则或者解释性研究的准则——如 Keining 及同事所建议的搁置对研究对象的理论性表述——,就可以避免让研究对象受到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塑造性影响。只有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首先是并且总是像日常生活自身所展示的那样来把握它"(Grathoff 1978;这里转引自 Hoffmann-Riem 1980, 第 362 页,她用这个引言结束了她的这篇论文)。

到了 1970 年代末,德国开始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独立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主要是以翻译—理解的方式)展开有关质性方法的讨论,比如访谈的运用(如 Kohli 1978 或 Hopf 1978),对访谈的分析(Mühlefeld et al. 1981),方法论的问题(Kleining 1982),以及全面性的研究(对研究现状的分析请参见 Flick et al. 1995)。这一阶段的标志性问题正如 Küchler(1980)所说那样,即是否应把这一发展称为"是潮流,还是新开端"。

在 1980 年代初,以下两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以及对它们的接受,对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即 Schütze(1977)提出的叙事访谈和 Oevermann 等人(1979)提出的客观注释学。这两种方法已经不再——像使用以焦点访谈为导向的参与式观察或者是提纲访谈那样(参见 Hopf 1978)——只是对美国的发展的理解。这两种方法都对研究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传记研究领域;相关概括性介绍请参见 Kohli/Robert 1984; Krüger/Marotzki 1994)。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产生了至少是同样重要影响的是从这两种方法的方法论中生发出来的推动力。

在 1980 年代中期,有关通过质性方法所获得的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问题、推广性问题以及适合质性研究的质量标准的问题(如 Gerhardt 1985; Flick 1987; Legewie 1987)终于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与此相应地,有关研究成果的写作及其可理解性的问题也受到更大的重视。目前,大规模的、无结构性的数据也要求在质性研究领域采用电脑(Gibbs 2007)。在 1980 年代末期,在上述讨论的背景下,第一批教科书和概论性著作在德语国家获得出版(如 Lamnek 1988,1989; Spöhring 1989; Bohnsack 1999)。在此期间,大量的质性研究流派和研究方法确

立了自己的地位(参见第31章)。在不同的专业学会中,也有了专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或质性研究的某些特定方法(如传记研究)的分会或工作小组。自1990年代以来,德国已出版了各种不同的专门针对质性研究的期刊和书籍(概括性介绍请参见 Ohlbrecht 2000)。

美国学界的讨论进展

Denzin/Lincoln(2005a,第14-20页)提到的阶段不同于刚才所描述的德语国家中的发展阶段。他们列出了下述"八个质性研究的时刻":

传统研究时期是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标志是 Malinowski(1916/1948)的民族志研究和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在这一时期,质性研究关注的是陌生他者以及对其或多或少客观的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在民族志研究领域主要是陌生文化,在社会学领域是本社会中的边缘者。

现代主义时期是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人们尝试着将质性研究规范化。为此,美国出版了第一批教科书。这一时期研究的观点至今在下述研究传统中依然显出其感染力:Glaser/Strauss(1967/1998),Strauss(1991),Strauss/Corbin(1990/1996)及 Miles/Huberman(1994)。

模糊的体裁(Geertz 1983a)影响着质性研究的发展直到1980年代。在这一时期,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对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理解方式并存,研究者可以从中做出选择,可以比较衡量,也可以结合使用它们:符号互动主义、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符号学或女性主义算是这些"备择性范式"中的几个(参见 Guba 1990; Jacob 1987)。

在1980年代中期,在人工智能研究(Winograd/Flores 1986)以及民族志(Clifford/Marcus 1986)研究领域中所讨论的**展示危机**(Krise der Repräsentation)也波及到了整个的质性研究领域。经过这一讨论,对认识和结果的展示/写作过程作为研究过程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以及作为研究结果本身的一部分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质性研究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对不同版本的现实进行建构的过程:一个人在访谈中讲述的版本,不一定符合他在事发当时所讲述的那个版本;而且也不一定与他对另外一个提出了不同问题的研究者所讲述的那个版本相一致。分析访谈并将之作为是其研究结果一部分的那个研究者本人,也会对这一切提供一个新的版本。当读者读到研究者所撰写的报告、文章或书籍时,他们对此也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这里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关于所叙述事件的不同版本。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展示/写作相关的那些特定的利益和兴趣。在这种情境下,对研究及其结果的评价便成为方法讨论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传统的质量标准是否还有效?应该针对质性研究提出哪些其他的评价标准?

1990年代的情况被 Denzin/Lincoln 称为是**第五时刻**。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叙事(Erzählungen)代替了理论的位置,理论被当作叙事来阅读。然而,人们在这里也谈到了宏大叙事的终结,就像在整个后现代领域一样。质性研究的重点转向

了那些限于特定范围的、本土性和历史性的情况和问题的理论和叙事。

后实验性写作的阶段被 Denzin/Lincoln 称为质性研究的**第六时刻**。**第七时刻**的标志是质性研究以各种期刊的形式得以确立。鉴于“以证据为基础”(Evidenzbasierung)成为衡量科学之重要性的标准和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倒退和反弹，未来的这段时期被这两个研究者视为是质性研究发展的**第八时刻**。

表 2.1　质性研究历史中的阶段

德　国	美　国
• 早期阶段(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 进口阶段(1970 年代初期) • 独立讨论的开始(1970 年代后期) • 独立方法的发展(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 • 巩固和方法问题(1980 年代后期和 1990 年代) • 研究实践(自 1980 年以来) • 质性研究地位的确立(1990 年代以来的期刊、丛书和专业研究机构)	• 传统研究(1900—1945) • 现代主义阶段(1945 到 1970 年代) • 模糊的体裁(至 1980 年代中期) • 展示危机(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 • 第五时刻(1990 年代) • 第六时刻(后实验写作—1990 年代后期，21 世纪初期) • 第七时刻(通过成功出版杂志确立质性研究地位—2000—2004) • 第八时刻(未来以及新的挑战—自 2005 年起)

对比一下质性研究在德国和美国的发展路线(参见表 2.1)，人们就会发现，质性研究的地位在德语国家中日渐得到巩固，采用质性方法的研究不断增加，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方法的操作程序之上。而在美国，新近的发展趋势则是人们开始再次质疑通过方法所达到的明显的确定性：人们更多地强调展示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展示的危机以及所展示内容的相对性。与此相比，提出研究方法并将其规范化的努力反而变得次要了。也就是说，美国这里的重点目前并不是对访谈方法或诠释方法的“正确”使用，而是有关“诠释的实践和政策”(Denzin 2005a)。由此来看，质性研究——仍然并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居于研究者开放性和反思性之间的特殊的态度。

处在现代末期的质性研究

为了表明质性研究的现实性，本章在开头部分论述了质性研究的潜在研究对象的变化。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当前对科学整体的诊断中推导出人们有必要更加广泛地采用质性研究的结论。Toulmin(1994)在他对“现代性的潜在任务”的研究中，详细论证了他有关现代科学功能失调的评价。在他看来，哲学乃至整个科学——因此也包括了实证社会研究——的出路在于以下四个趋势：

- 回归口述性，这一点表现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和社会科学对叙事、语言和沟通的兴趣之上。
- 回归特殊性，这一点表现在以下的趋势之上，即在提出理论和开展实证调查时“并不是仅仅关注抽象的和普遍性的问题，而是重新关注特殊的、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普遍性的，而只是出现在特定的情境之下”（Toulmin 1994，第 301 页）。
- 回归本土性，这一点表现在以下方面，即对科学体系、行为方式和体验方式的研究应该嵌入（当地的）传统和生活形式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去设想并企图验证他们具有普遍有效性。
- 回归时限性，这一点表现在以下方面，即所要研究的问题和所要提出的解决办法都需要被置于其各自的时间和历史的情境之中，并在此情境之中得到描述以及从中得到解释。

质性社会研究以分析具体的案例及其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特殊性为取向，并在分析中着眼于人们在其日常情境中的言论和行为。质性社会研究可以藉此找到将 Toulmin 所说的趋势加以具体化并将之转化为可实施的研究方案的途径，同时还能在此保持其相对于其研究对象和任务的必要的灵活性。

> 正如建筑物应该按照人类的需要那样被建造一样，我们科学的和社会的方法在未来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其必要的任务，即当我们避免多余的或者过度的稳定性，并通过一种方式将这些方法保持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以便于其对于未预见到的——甚至无法预见到的——情况和功能具备调节适应的能力。（Toulmin 1994，第 297 页）

本书下面的各章将会介绍一些实现这类研究方案所需要的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要 点

- 考虑到不同的因素，质性研究对于许多领域中的符合时宜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现实性和重要性。
-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其可适用的研究领域中各有局限性。
- 质性研究包括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 不过，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当中也可找到质性研究的共同特征。

练习 2.1

请您找出一项质性研究并回答下面的问题：

1. 本章在开始部分所列举的质性研究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您找到的范例？
2. 该项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适合所研究的问题吗？

练习 2.2

1. 如果您计划进行一项自己的研究，请您想想，为什么这项研究适于采用质性研究？
2. 请您考虑一下，是否有理由证明，您的研究更适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拓展阅读

Denzin, N./Lincoln, Y.S. (Hrsg.)(2005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lick, U., Kardorff, E. v./Steinke, I. (Hrsg.)(2000).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Flick, U. (Hrsg.)(2007a).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8 Bänd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hli: Sage.

Strauss, A. L. (1991).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Datenanalyse und Theoriebildung in der empirischen soziologischen Forschung. München: Fink.

3 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更好地理解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区别。
- 在结合使用这两种研究时，能够区分现有的各种结合可能。
- 知道在结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

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最初常常是始于对定量研究方法及研究策略的批判（有关调查方法的例子请参见 Kohli 1978；一般性的评述请参见 Cicourel 1964）。虽然有关这两类研究对科学的理解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参见 Becker 1996），不过，在这两个领域，都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研究实践，分别证明着各自的合理性。当然，在这两个领域之内，也是既有好的研究也有差的研究。在此期间，质性研究已经获得了相对独立于定量研究的地位，不再针对定量研究展开阵地战。这一发展的标志可以从 Denzin/Lincoln（2005a）所出版的手册看出。该手册没有辟出专章论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而且在其关键词索引中也几乎没有相关的索引。尽管如此，结合使用两种研究策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可能，而且这一可能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使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以下所列的不同层面上得到分析并被建立起来：

- 认识论（在认识论上的不相容性）以及方法论。
- 研究设计，指将质性数据/方法与定量数据/方法相结合和融合的研究设计。
- 研究方法，既指质性的、也指定量的研究方法。
- 质性研究结果和定量研究结果的结合。
- 研究结果的推广。
- 研究质量的评价：将定量研究领域的质量标准用于质性研究，或者反过来。

强调不相容性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建立起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二者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强调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上（比如 Becker 1996）以及在具体的或者一般的研究目的上具有不相容性。这一点往往和不同的理论观点联系在一起，比如实证主义 *vs.* 建构主义或者（在英语世界中的）后实证主义（参见第 6 章）。这种不相容性有时被看作是不同范式的不兼容，而各执己见的双方则被认为是陷入了“范式战争”（比如 Lincoln/Guba 1985）。

明确应用领域

在这一讨论中，有一种解决办法是，两种研究策略并存，人们根据其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来选择研究策略。如果人们想要知道慢性心理疾病患者的主观体验，就应该与一些患者进行传记访谈，然后再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如果人们想要知道这类疾病在人口中出现的频率和分布情况，就应该就此做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对有些研究问题应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而对另外一些研究问题却更适合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两者在此互不干扰。

将定量研究置于质性研究之上

定量研究的这一主导地位至今仍然经常可以在定量的实证社会研究的教材以及研究实践中看到。比如，在利用问卷进行真正的数据收集之前，先用开放式访谈进行一个探索性的预研究，但预研究的结论仅被视为是暂时性的。在这里，人们可看出定量研究的主导地位。类似抽样代表性这样的一些论据常常被用来论证，只有通过定量数据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结论，而质性数据更多地是起到一种解释和说明的作用。开放式访谈的内容要通过问卷数据的证明和问卷数据中的频率来得到检验和“解释”。

将质性研究置于定量研究之上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越来越少，但是他们的观点却表现得更加极端。Oevermann 等人（Oevermann 1979，第 16 页）认为，定量研究方法只是“从研究经济意义上对数据收集过程的简化”，只有质性研究方法，特别是他自己发展出来的客观注释学（参见第 16 章）才能提供有关所研究问题的真正的科学解释。Kleining（1982）强调，质性研究方法完全可以不需要借助于定量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方法却需要借助质性研究方法来解释其发现的相关关系。Cicourel（1981）认为，质性研究方法适合用来分析微观社会学的问题，而研究宏观社会学的问题则应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McKinlay（1995）则明确表示，在健康科学领域，因为社会政治问题及关系具有更高的复杂性，所以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更有可能获得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由此来看，质性研究优于定量研究的理由既可以在研究目标的

层面上，也可以在研究对象适合性的层面上找到。

在同一项研究中结合使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同一项研究中结合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融合

Miles/Huberman（1994，第 41 页）给出了能够实现这种结合形式的四类研究设计（参见图 3.1，也可参见第 12 章）。在第一种研究设计中，两种研究策略被平行地使用；在第二种研究设计中，持续性的田野观察是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展开一项调查的数轮数据收集工作，或者是根据田野观察的结果来确定和设计这些不同轮次的数据收集工作；第三种研究设计是，首先进行质性调查（例如提纲访谈），随后进行问卷调查，最后再通过质性研究来深化和检验前两个阶段得到的结果；在第四种研究设计中，首先是进行问卷调查，接着是通过一项实地研究来补充和深化问卷调查得出的结果，最后是进入研究实地，以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前两个研究阶段得到的结果（有关类似的混合型研究设计的建议请参见 Creswell 2003 或者 Patton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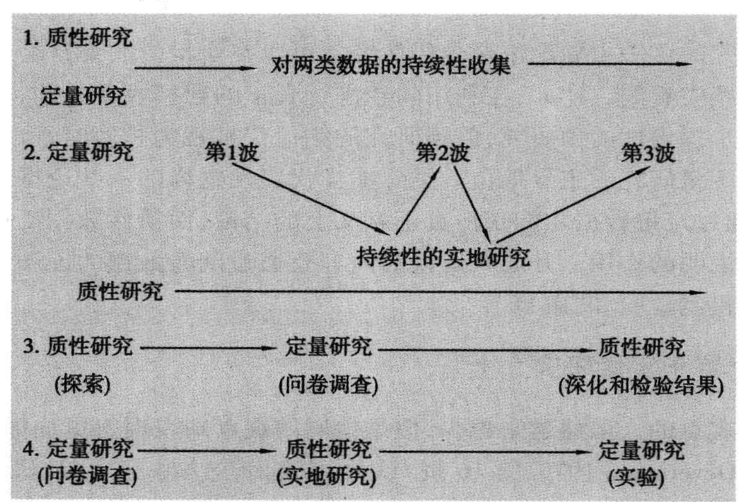


图 3.1　融合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研究设计（引自 Miles/Huberman 1994，第 41 页）

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顺序性结合

一项研究可以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采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而不必将这两者中的其中之一置于从属地位，而把另一个当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例如 Barton/Lazarsfeld（1979）就建议利用质性研究来发展研究假设，然后用定量研究方法来检验这些假设。他们在阐述理由时，不是去强调质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的弱点或局限，而是明确地指出了质性研究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探索

性研究方面的长处。按照他们的解释,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分别适用于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多元结合

多元结合(Triangulation①)(参见第29章)可以是指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参见 Flick 2000c,2007d),也可以是指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多元结合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对于研究对象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在于各个单一的研究方法可以弥补对方的缺陷和盲点。多元结合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认识,即"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应该被视为是互补性的,而不应被视为是两个相互竞争和对立的阵营"(Jick 1983,第135页)。尽管如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是独立并存的,它们的交叉点只是研究对象。这样一来,被结合使用的方法中就没有任何一个被视为是主导性的或者是暂时性的。不同的方法是同时被使用还是先后相继被使用,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同一项研究设计中结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实际问题,例如:具体是在哪个层面上使用多元结合?这里可以区分两种可能性: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多元结合可以在个案的层面进行。被访谈的那些人同时也接受了问卷调查。他们对这两种调查方法中所提问题的回答被用来相互进行比较、整合,并在分析时互相作为参考。抽样的决定是经过两个步骤做出的(参见第11章)。同样的对象被选出来参加了该项调查的两个部分。不过,等到进行第二步时才决定,哪些参加了问卷调查的人应该被选出来接受访谈。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也可以在数据的层面上进行。对问卷的回答就其频率和分布在整个样本范围内得到分析。在访谈中的回答也得到诠释和比较,比如说从中总结出了一种类型。然后,问卷回答的分布情况和从访谈中得出的类型被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参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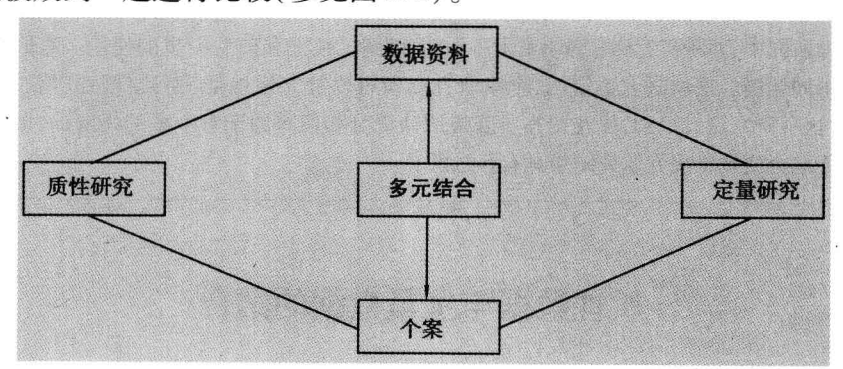


图3.2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多元结合的层面

① "Triangulation"这一概念的汉语直译是"三角测量法"。考虑到这个词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特定含义,译者在这里将此概念译为"多元结合(法)"。有关这一概念及其译法的详细讨论也可参见:孙进. 作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的"三角测量法".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第122-128页。——译者注

案例　癌症病人家属的负担和表现

Schönberger/Kardorff(2004)在研究"癌症病人家属的要求、负担和表现"时，结合使用了一项问卷调查和一系列个案研究。问卷调查进行了两轮(家属的人数分别为189和148，病人的人数均为192)。个案研究共包括17个个案，其中的7个个案得到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们对这两个调查部分的研究问题作了如下描述：

"根据现有的研究现状，我们在问卷调查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对负担的体验、个体式和伙伴式的应对行为，关系网络的加入，以及对康复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评价。社会科学—注释性的质性研究部分则旨在揭示结构理论上的一般化(……)"(第25页)。

作为补充，他们又在参加此项研究的医院中进行了25次专家访谈(参见第13章)，在门诊式愈后护理机构中进行了8次专家访谈(第33页)。个案研究中的受访者是从参加了问卷调查的人员中挑选出来的。挑选个案的原则是：

"配偶应该是在同一套房子里共同生活，男性或女性配偶自己不患有任何严重的疾病，患病的配偶应该尽可能在第一次调查时正在接受住院康复治疗或者是门诊式愈后护理服务。"(第95页)

接下来，他们又引入了现有样本的对比案例(单独生活者，配偶双方都身患疾病，分居或者配偶已去世一年以上。Schönberger/Kardorff 2004，第95页)。他们对定量数据进行了多个因素分析，并结合研究问题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在表述问卷分析的结果时，他们会援引"个案研究的结果，如果这一结果的结构特征与问卷调查的发现相一致的话"(第87页)。当个案研究的结果出现例外或偏差时，他们也一样会援引个案研究的结果(第93页)。总地来看，两位研究者十分重视"通过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提高研究的细致度"(第201页)：

"个案研究不仅指明了家属在问卷中回答模式之不同，令我们对其有了深入的理解。它的独特意义也在于，我们通过对个案的分析能够发现(在'疾病叙事'中的)主观意义解释和其所讲述的决定、应对策略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潜在的意义结构。作为对心理学适应理论的扩展，我们发现，令危机性生活状况变稳定的促进或妨碍因素，主要不是个性特征或者单个的因素，而是结构因素和所习得的下述能力，即一种可以将生活要素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融入到自己的生涯以及与配偶一起度过的生涯之中的能力。"(第202页)

作为总结，这里可以肯定的是，这项研究是质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和数据)多元结合的一个范例。在这项研究中，两种研究路径就其作用而言均得到了独立和前后一贯的使用。它们指明了研究结果的不同侧面。这项研究也说明，个案研究如何可以补充性地证实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认识。遗憾的是，这项研究没有提到，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认识是如何有助于对个案的理解的，以及定量研究结果对于取得或评价质性研究结果具有什么意义。

质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结合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在数据的层面上进行两类数据之间的相互转换，即把质性数据转换成定量数据，或者是反过来。

将质性数据转换成定量数据

人们一直在尝试着将开放式访谈或叙事访谈的内容加以量化(例如

Mühlefeld et al. 1981)。人们也可以就所观察内容出现的频率来分析观察。特定范畴出现的频率可以得到确定,不同范畴出现的频率也可以相互进行比较。Engel/Wuggenig(1995)提出了能够对这类数据进行计算的统计学方法。但是 Hopf(1982)批评了质性研究中的下述倾向,即在质性研究中采用基于量化逻辑的论证来说服读者(例如,七位被访者中有五位说过……;多数的回答都涉及……),而不是去寻求对调查结果进行理论上有理有据的阐释和说明。Hopf 批评的这种论证模式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将质性数据转化为准定量数据的含蓄形式。

将定量数据转换成质性数据

一般来说,将定量数据转换成质性数据要更加困难一些。如果不明确地额外采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对部分样本进行补充性访谈,那么就很难从问卷数据中推测出各个回答的情境。对访谈中某些回答出现频率的分析能够为我们解释访谈内容提供额外的启示,而要解释某些回答模式在问卷中反复出现的原因,就必须再去收集或者援引新的数据(访谈、田野观察)。

质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

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能够真正地做到在一种方法中融合质性研究策略和定量研究策略。许多问卷包括了开放式问题或自由回答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几乎没有顾及到质性研究的任何一个方法原则,但在某些情境下,这种做法就已经被人们理解为是质性研究了。这种做法并不是两种研究形式的明确结合,而只是一种赶时髦的尝试。

在质性数据分析方面,Kuckartz(1995)描述了一套一级编码和二级编码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通过维度分析可以定义变量和数值,而这些变量和数值又可以被用来进行分类和量化。Roller 等人(1995)介绍了一种被他们称为是"解释性—分类性的内容分析"方法,该方法将 Oevermann 等人(1979,参见本书第 25 章)的客观注释学的理念和方法纳入了一种从本质上来说是定量的内容分析之中。与此类似的做法是,将经过 ATLAS/ti 等程序(参见第 26 章)所分析的数据,转入 SPSS 或其他统计分析。

不过,在上述这些做法中,分类和解释之间的关系始终并不明晰。如何发展真正融合的质性—定量方法,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质性研究结果与定量研究结果的结合

把从一个研究课题或者从同时或先后进行的多个不同的研究课题中得出的质性和定量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是实现两种研究相结合的较为常见的形式。将一项问卷调查和一项访谈研究相结合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种结合可以出于

不同的目的：

- 由此获得的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要比通过任何单一研究方法可能会获得的认识都更加全面。
- 或者两种研究的结果可以相互验证。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结合可以有以下三种收获（也可参见 Kelle/Erzberger 2000，第 304 页）：

1. 质性研究结果和定量研究结果趋同，也就是说，二者趋于一致，可以从中得出相同的结论。
2. 两种研究的结果分别关注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例如一种疾病的主观意义及其在人口中的社会分布）。因此，二者具有互补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互相补充。
3. 质性研究结果和定量研究结果趋异，也就是说，它们相互矛盾。

如果说结合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更多（更宽泛、更好、更全面……）的了解，那么，以上的三种收获都是有益的。在第三种情况（可能也包括在第二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二者的分歧和矛盾作出理论上扎实的解释。如果结合两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那么第三种情况（可能也包括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就表明了，该有效性是有局限的。通过采用不同研究方法来验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这种做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一点在有关多元结合的文献中已有详尽的探讨（参见本书第 29 章，以及 Flick 2007d）。

研究的评价与推广化

一种隐性地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普遍形式是，将定量研究的研究模型（参见第 8 章）应用于质性研究，比如将样本的选择（参见第 11 章）首先视为是一个数字上的问题，正如学生们经常提的问题那样："我的研究需要多少个案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呢?"这里就是将定量研究的逻辑用于了质性研究。

另一种隐性地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形式是，将其中一个领域的质量标准应用于另外一个领域：人们经常批评质性研究，说它不符合定量研究的质量标准（参见第 28 章）。在这里，人们很少考虑到，这些标准并不适合质性研究和它的原则与研究实践。问题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不过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在质性研究的推广性问题上，人们经常会遇到第三种隐性地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形式，尤其是当人们没有考虑到以下情况时，即通过一项代表性问卷调查来对通过少数几个访谈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加以推广化，只是研究结果推广化的形式之一。这种数字性的推广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合适的途径，因为许多质性研究主要以发展新的认识和理论为目的。因此，这里更为合适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来对质性研究的结果进行推广。这样一来，决

定可推广性的因素便不是所调查案例的数量，而是所选择样本的质量。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哪些案例”，而不是“多少案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例证明了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选择了它们？”因此，质性研究中的推广化问题与（研究结果的）量化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密切。

有关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最新讨论

近几年来，有关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关系或者有关二者结合可能的出版物数量明显增加。为了更好地把质性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研究领域中，下面简要概述一下与此相关的讨论。

Bryman（1992）总结了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 11 种类型：①多元结合的逻辑在他看来在于通过定量的研究结果来检验质性研究结果；②质性研究可用来佐证定量研究；③定量研究可用来佐证质性研究；④结合使用二者，以获得对研究对象更广泛的认识；⑤定量研究被用来研究结构性问题，而质性研究被用来研究过程性问题；⑥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和观点是主要推动力，而质性研究强调的则是主体的视角和观点；⑦在 Bryman 看来，质性研究的可推广性问题可以通过引入量化认识而得到解决；⑧而质性知识则有助于解释定量数据中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⑨研究对象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得到解释；⑩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可被用于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⑪最后一种结合类型是混合形式，比如在准实验性研究设计中采用质性研究（参见 Bryman 1992，第 59-61 页）。

除此之外，人们还常常谈到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Kluge/Kelle 2001）或混合方法（Tashakkori/Teddlie 2003a），也常谈到质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多元结合（Kelle/Erzberger 2000；Flick 2007d）。用词的选择已经清楚地表明，不同的方法是与不同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在混合方法这里，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实用性结合，并希望以此结束两个研究阵营之间的**“范式之战”**。混合方法被认为是“第三次方法论运动”，而定量方法和质性方法分别被视为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方法论运动。就混合方法展开方法论上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澄清概念（“术语”）、澄清混合方法研究的设计问题和应用问题以及在混合方法研究中做出结论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里涉及的是混合方法研究“在范式上的论证”。通过在这里使用范式这一概念，人们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两个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它们可以被相互区分、结合或者分别被拒绝，而不必因此去探讨有关结合的具体的方法问题。人们对混合方法研究的要求被概括如下：

> 我们已建议，一个真正以混合方法为基础的方法论，（a）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问题的确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最终结论的做出）都包含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b）包含数据的转换以及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分析数据。（Tashakkori/Teddlie 2003b，第Ⅺ页）

这些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就数据和分析的转换（质性向定量的转换以及反过来）而言。

与混合方法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融合（Integration）这一结合方式所提的要求还要更高一些。这里首先是以融合性研究设计的发展（Kluge 2001）和质性研究结果与定量研究结果的融合（Kelle/Erzberger 2000，2003）为起点。不过，“融合”这一概念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表述。Seipel/Rieker（200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融合性社会研究的方法，其目的主要是针对融合性方法课程的教学。

以方法的适合性作为参照点

最初的那场有关质性研究 *vs.* 定量研究的争论（概括性介绍请参见 Becker 1996 或 Bryman 1998）主要是以认知理论和哲学立场为导向。这场争论现在已经更多地转变为有关各种研究方法适用性的研究操作性问题的讨论。Wilson（1982，第 501 页）就这两种方法传统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如下判断：

> 因此，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每一种研究所获得的信息，不仅区别于另一种研究所获得的信息，而且在理解另一种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方面也是重要的。（……）因此，人们不能用他自己的“范式”或偏好来论证对特定方法的使用，而必须从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出发。

在健康科学领域，McKinlay（1993，1995）和 Baum（1995）也做了类似的论述。这就是说，人们在决定使用或者不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或定量研究方法时，不应该是作出原则上的选择，而应该具体考虑研究对象和针对研究对象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例如 Bauer/Gaskell（2000）就明确指出，将两种研究方法区别开来的，更多是其形式化和标准化的程度，而不是语句和数字之间的对立。

到目前为止，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融合两类研究之尝试的最后结果常常是两种研究的一种前后相继（每种研究既可居前，也可居后）、并列（两种策略之独立性的程度可以不同）或者是一种主导或附属的关系（同样也是每种研究皆可能处于主导或附属地位）。融合常常仅仅停留在研究设计的层面之上——结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方法之间相互指涉的程度可不同。在另一方面，在合适的研究设计（参见第 8 章）和对过程、数据和结果的评价形式（参见第 28 章）方面，两种研究策略之间的区别仍然继续存在。如何在结合两种研究策略时能顾及到这些区别，是一个有待于继续讨论的问题。

尽管如此，最后可以在这里提出几个指导性的问题用于评价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案例：

- 研究者赋予了两类研究同样的重要性吗（比如在课题的规划，在所获得结果的重要性和在研究的评价方面）？
- 两种研究只是被分开使用呢，还是真正做到了彼此相结合？例如，在许多研究

中，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更多只是被孤立地使用，二者的融合仅限于研究结果的比较。

- 二者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研究方法只是前后相继地得到使用吗？是什么样的前后顺序呢？还是说，二者真正被融合到了一种多元方法设计之中？
- 哪些标准被用来评价一项研究？传统的对效度的理解居于主导地位吗？还是说两类研究分别采用了适于自己的评价标准？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和对其意涵的考虑，有助于我们提出敏觉性的研究设计，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反思性的方式来开展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要　点

- 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 两种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得到结合。
-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两种研究的结合不能仅限于对研究方法的一种实用主义式的结合，而且也需要反思理论上的差异。
- 方法或者方法的结合相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应该是方法选择的核心参照点。

练习 3.1

1. 请您回顾一下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各种不同方式。
2. 请您找一个将两种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实例，并且运用您在本章学到的知识来分析这个实例。
3. 为什么说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在这个研究实例中是合适的？

练习 3.2

1. 请您根据您自己的研究兴趣想出一个研究对象，对它的研究需要结合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
2. 当您在您的研究中结合使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时，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

Flick, U. (2007d). Triangulation-Eine Einführung (2. Aufl.). Wiesbaden: VS-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Kelle, U./Erzberger, C. (2000). 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Methoden-kein Gegensatz.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99-309.

Kluge, S./Kelle, U. (Hrsg.) (2001). Methodeninnovation in der Lebenslaufforschung-Integration qualitativer und quantitativer Verfahren in der Lebenslaufund Biographieforschung. München, Weinheim: Juventa.

Tashakkori, A./Teddlie, Ch. (Hrsg.) (2003a).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4 质性研究伦理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认识到与质性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
- 提高自己对质性研究伦理问题的敏感性。
- 认识到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 能够按照伦理规范的要求规划和实施质性研究。

在许多领域中，人们都在谈论研究伦理问题。如何保护那些自愿参加一项研究的参与者利益的问题，当然也包括那些有关数据资料造假的丑闻，把研究伦理问题一次次地推向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科中，人们已经制订了伦理规则。在有些领域，特别是在医学研究领域，人们还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让所有的参加者都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保护，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对弱势群体或种族多样性的敏感性。本章将讨论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质性研究伦理的必要性

因为有丑闻的出现，所以公共舆论对学术研究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在提高。在纳粹德国时期，医生曾强制性地利用集中营中的人进行研究和实验。这种令人震惊的例子在早期推动了研究伦理准则的制订。对研究成果的造假事件促使“德国科研委员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制订了“良好行为准则”。所有向德国科研委员会提交申请的高校和研究所都必须接受和实施这些良好行为准则（参见 http://www. dfg. de/antragstellung/gwp/index. html）。人们多年以来对伦理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推动了许多领域中伦理准则的制订以及伦理委员会的成立。不过，在下述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边是普遍性规则

(比如伦理准则)的提出以及监督机构(比如伦理委员会)的设立,而另一边是研究者在日常工作中(在现场及研究过程中)对这些规则的遵守。正如以下分析将会表明的那样:与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在这里,要把伦理原则转换为明确的解决办法和解释也不是那么容易。准确地说,研究者在其研究的各个阶段都要面对和解决伦理问题。

伦理准则——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为了规范研究者与他们所研究的人和场域的关系,人们制订了伦理准则。有些科学学会或职业联合会的伦理准则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 德国社会学学会(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DGS)和德国社会学者职业联合会(Der Berufsverband Deutscher Soziologen)制订了一份共同的伦理准则,而且这一伦理准则并不仅限于科研方面。要查看这一伦理准则,读者可以登录 DGS 的网页(http://www. soziologie. de/),然后点击"关于 DGS"栏目下的关键词"伦理规则"(Ethik-Kodex)。
- 德国教育学学会(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的伦理准则可从通过以下的网址获得:http://dgfe. pleurone. de/ueber/Ethikkodex_DGfE. pdf。
- 德国心理学学会(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logie)更新了其在科研方面的伦理准则。其网址为:http://www. dgps. de/dgps/satzung/ethikrl2004. pdf。

作为比较,下面再给出几个英语国家中的伦理准则:

- 英国社会学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BSA)将其伦理准则发表在以下网址: http://www. britsoc. co. uk。
- 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SA)的伦理准则可在下述网站找到:http://www. asanet. org/members/ecoderev. html。
- 社会研究联合会(Soci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RA)的伦理规则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得:http://www. the-sra. org. uk/Ethicals. htm。

这些伦理准则规定,研究的开展需要以参加者的"知情同意"为前提条件。知情同意是指,参加研究者是在研究者向其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之后做出同意参加该项研究的决定。这些伦理准则还规定,研究不许伤害参加者,比如研究者不许没有根据地侵入被研究者的私人领域,也不许在研究目的上欺骗被研究者。

在这里,Murphy/Dingwall 提出了一个"伦理理论",包括以下四个主题:

1. **无伤害性**——研究者应该避免对被研究者造成伤害。
2. **有益性**——以人为对象的研究应该有积极性的、能鉴别出来的益处,而不只是为了研究的研究。

3. **自主与自决**——被研究者的价值观和决定应得到尊重。
4. **公正性**——所有的人都应得到同等的对待。(Murphy/Dingwall 2001，第 339 页)

对于无伤害性原则(Prinzip der Nicht-Schädigung)，德国社会学学会和德国社会学者职业联合会的伦理准则做出了以下规定：

> 被研究者——被观察者、受访者，或者以其他方式参加的研究者，比如提供个人档案供研究使用者——不能因为参加研究而被置于不利的境地或者遭遇危险。研究者必须向被研究者解释清楚所有那些超出日常水平的风险，必须保证受访者或被调查者的匿名性。(Ethik-Kodex 1993，IB 5)

对于知情同意原则和自愿参加原则，德国社会学学会和德国社会学者职业联合会的伦理规则做出了如下规定：

> 一般来说，参加者必须是出于自愿来参加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而且是在他们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了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和方法之后才同意参加该研究的。不过，在实践当中，知情同意原则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比如说，当对研究课题事前的全面介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扭曲研究结果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尝试采用知情同意的其他可能。(Ethik-Kodex 1993，IB 2)

Murphy/Dingwall 发现，在抽象的层面上，人们对于伦理原则在质性研究中的使用存在着广泛的共识。问题主要是在研究实践中对这些伦理原则的遵守。以他们所从事的民族志研究为例(见第 17 章)，Murphy/Dingwall 分析了那些有关在实践中运用这些伦理规则和原则的经验的文献，并发现了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 第一，那些没能顾及到特定研究方法之特殊性的伦理规则可能会以不必要和不恰当的方式限制研究。第二，这一点同样重要，对这些伦理规则的礼仪性地遵守不但没有真正起到保护被研究者的作用，而且甚至还会增加伤害被研究者的风险，因为这样做会降低民族志研究者对因使用某种研究方法而产生的问题的敏感性。(Murphy/Dingwall 2001，第 304 页)

正如 Murphy/Dingwall 通过多个例子说明的那样，在民族志研究领域，严格地遵守研究伦理中的普适性规则是困难的。比如说，如果人们要观察几个无家可归的青年人在公共场所的日常生活中的卫生行为表现(参见 Flick/Röhnsch 2006a)，人们常常会遇到下述的情况：这些青年会偶然地与其他青年人短暂相遇并与他们进行交谈。在作为研究对象的这几个无家可归的青年这里，研究者可以做到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但是，在这些青年偶然而短暂遇到的那些人那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大可能了。如果研究者在这里征求被观察者的同意，就会“破坏”原本自然的观察情境。在这个例子里，伦理规则中规定的“知情同意原则”只能得到局部的遵守。这个例子指明了伦理规则作为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民族志研究“实地”中的局限性。其他一些研究者也详细地阐述了其他研究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如行动研究(Williamson/Prosser 2002)、质性网络研究(参见本书第 20 章以及 Mann/Stewart 2000，第 3 章)或女性主义研究(Mauthner et al. 2002)。

案例　对同性恋的隐蔽观察

Humphreys(1973)在1960年代做了一项有关同性恋性行为的研究。因为这项研究揭示了非参与式观察的困境(参见第17章),所以它引起了一场持续长久的对在这一领域或类似领域进行观察的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Humphreys在同性恋的会面地点——公共厕所里对同性恋的亚文化进行了观察。因为同性恋在当时尚属于受制裁的行为,所以,公共厕所是他们偷偷会面的少数几个可选地点之一。Adler/Adler(1998)曾将这项研究称为是非参与式观察的一个例子,因为,Humphreys明确地是从一个社会学者的角度出发作为窥淫癖患者(Voyeur)来展开其观察的。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不必成为被观察事件的参与者,二是同时还可作为观察者而被接受。Humphreys在这里的角色是一个放风者,他的任务是注意不要让陌生人接近这里。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观察到所有的活动,而且既没有被视为是一种干扰,也不必亲自参与这个事件:"我对外扮演的是一个窥淫癖患者的角色,这是一个对社会学者来说极为合适的角色,同时我也是唯一的一个不参与性行为的看守者/放风人。在这个放风人——窥淫癖患者的角色里,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的活动,可以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可以观察一切,而不会引起被观察者的怀疑,也不会以其他的方式干扰到他们的活动。"(Humphreys 1973,第258页)

在他偷偷地观察了这个场地里的性行为之后,Humphreys还记下了被观察者的车牌号码,以便据此找出那些人的姓名和住址。他利用这些信息来为他的调查挑选调查对象。Humphreys在此采用了一些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策略来获得这些人的有关信息,因为在这里的情境下,参与者本来是匿名的。同时,他还尽力地隐瞒了他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角色,所用的办法是在一个放风者的位置上偷偷地进行观察。每一个行动就其自身而言都违背了研究的伦理准则——没有告诉被观察者他们已成为被观察的对象,破坏了参与者的匿名性,侵入了他们的私人领域。我们在这里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看出观察所遇到的伦理界限:研究者必须找到一个途径,进入他感兴趣的场地。他们希望他们的观察尽可能少地影响到被观察事件的进展。尤其是当所观察的内容是被禁止的、受制裁的、违法犯罪性或者是危险性的行为时,就出现了以下问题,即如何能够完成观察,而又不至于使研究者成为"共犯"。正如这里的这个例子一样,如果是通过欺骗和不经别人同意就侵犯别人的私人领域来获得资料,那么,这一行为就逾越了伦理的界限。正因为如此,这里的这个例子至今仍然在有关(质性)研究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受到特别的关注。

伦理委员会是解决办法吗?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在很多领域成立了伦理委员会,甚至还成立了国家伦理委员会。为了保证伦理标准,伦理委员会负责在研究设计和方法被应用于"人身"之前对其进行检查。特别是在医学研究领域,但是也包括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伦理上"好的实践"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即研究者按照伦理准则的要求开展研究,他们的研究申请通过了伦理委员会的检查。通常来说,这样的检查会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内容(参见 Allmark 2002, 第9页):学术质量、被研究者的安康以及对其尊严和权利的尊重。

学术质量

任何一项研究,如果只是重复已有的研究(或研究结果),而不能带来新的知识,可被视为是不符合伦理的研究(参见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1)。这一看法本身就已埋下了争执的根源:为了能评价一项研究的质量,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应该具有从方法上评价一项课题申请所必备的知识。在多数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伦理委员会的委员——至少是其中几个委员——应该自己就是研究者。如果有人向研究者问起他们和伦理委员会打交道的经验以及他们提交申请的经验,人们常常会听到研究者们抱怨说,他们的研究之所以遭到否决,是因为伦理委员会的委员们没能理解他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或者是因为委员们有着与申请者不同的方法取向,再或者是因为委员们从整体上就不喜欢申请者的研究课题,因此他们对申请的拒绝并不是出于伦理上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在学术上的偏见。所有这些都指向伦理委员会的一个问题:伦理委员会做出拒绝或阻止一项课题申请的决定,可能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不过,这些原因并不总是出于伦理上的考虑。这样的偏见可能在质性研究遇到完全按照自然科学工作方式思维的委员会及委员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被研究者的安康

在这里,被研究者的安康常常是与对风险(对于被研究者而言)和获益(对于某个课题的新知识或者对某个老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这两者的权衡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这里一样存有潜在的争议,因为这样的权衡更多的是相对的,而不是可明确定义的。

被研究者的尊严和权利

对被研究者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表现在他们是自愿答应参加研究的,而且他是在获得了充分而恰当的相关信息之后才做出参加研究之决定的(Allmark 2002,第 13 页)。除此之外,研究者必须对被研究者承诺会对他们的信息保密:对被研究者的信息的使用必须能够保证其他人不可能根据这些信息辨认出被研究者。此外,对于机构(如国家机关)而言,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不许用来做损害被研究者利益的事情。

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些一般的研究伦理原则并将其规范化(更加详尽的讨论请参见 Hopf 2000b 和 Murphy/Dingwall 2001)。下面需要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些原则并不一定能够明确地解决伦理问题。它们更多的只是给出一种行动上的导向,即人们如何在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合乎伦理地行动。

如何让自己在研究中的行动符合伦理?

Northway(2002,第 3 页)在下面指出了伦理问题对于研究各方面的重要性:

> 但是，研究过程的所有方面，从题目的选择到样本的确定，从研究的实施最后再到研究结果的传播，都隐含着伦理问题。

人们在研究过程的每个步骤都会遇到伦理问题。在进入研究实地和选择被研究者方面遇到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向被研究者介绍该项研究。除此之外，还有谁也应该了解此项研究、研究目的和研究者本人的期望等相关信息。

知情同意

如果说人们一般均认为知情同意(Informierte Einwilligung)是参加研究的前提条件，那么，对于这一原则的具体实施，人们还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以下几个标准：

- 同意参加研究的决定应该由有能力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做出。
- 做出同意决定的人应该在此前得到了合适的信息咨询。
- 同意的决定是自愿做出的。(Allmark 2002，第 13 页)

如果人们要访谈的人来自中产阶层、年届中年并且有着与研究者相似的教育背景，那么，要满足这些标准应该不成问题。他们可以获取相关信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他们是否同意参加该项研究。但是，如果人们要调查的人没有能力(或者被视为是没有能力)理解这一工作程序，而且也没有能力独立做决定的话，比如说幼童(Allmark 2002)或者是患有痴呆或精神疾病的老年人，人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些人被称为是“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请其他人代替这些人给予同意，比如儿童的父母，老年人或病人的家属或是对他们负责的医疗人员。但是，这样做还算是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吗？人们能肯定地说，这些代替决定者与研究所要调查的人有着同样的看法吗？如果人们严格地理解知情同意原则的话，人们就会被禁止研究者从事对这类弱势群体的研究，以及那些从当事人的角度来分析与此相关的专题的研究。如果不管这些而去开展研究的话，其结果就是对这一原则的忽视。当然，这些考虑和决定都不能笼统地做出，而必须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难找到其他的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研究者必须决定，他可以在多大地程度上偏离上面所说的原则，但是又不至于说完全忽视它。

避免在收集数据时伤害被研究者

在收集数据方面，也可能出现伦理上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提出以下问题，即他们如何带着一种慢性疾病生活以及如何克服它，那么，受访者就会再一次面对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负担以及他们有限的或者短少的预期寿命。这会引发心理危机或者给受访者造成额外的精神负担。为了开展研究而让被研究者承受这样的风险，这么做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吗？

在分析资料时做到对被研究者公正

在分析资料(如采访数据)以及在展示资料和结果时，人们会作出一定的评

价,并将这些评价表述出来。比如一个被研究者被列入了某种疾病克服行为的类型,而其他被研究者则被归入了其他的类型。如果被研究者读到这样的研究结果,他们可能会感到不愉快,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被用来和别人做比较(并且被视同为其他人),或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与研究者的结论完全不同。除了在对自己这一"案例"的归类上存在分歧之外,分析资料时要做到对被研究者公正还意味着,研究者在做出解释时必须切实以资料(如陈述等)为基础,不能带有个人层面上的评价,而且对资料的解释不能将被研究者变成是心理诊断(如性格诊断)的对象。

研究报告中的保密性和匿名性

当研究的某个特定情景包括了多个参加者时,保密性和匿名性就变得愈加重要。比如说,如果要对同一个企业的员工或者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进行单个访谈,保密性指的不仅是要对这一研究情景之外的公众保密,而且也要对参加这一情景的其他人保密。不应该让读研究报告的人可以从中辨认出那些参加研究的人(如受访者)。为此目的,研究者应该改变被研究者的一些个人细节(如名字、地址、工作单位等),以排除或者至少是降低被别人猜出来的可能。与此相应地,研究者必须保证,不让参加同一研究的其他被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者对其共同的工作环境的描述或者是根据研究者对其研究的介绍辨认出他们的同事。为了这个目的,研究者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到对资料的匿名,以及简约地处理背景信息。在对儿童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想知道他们的孩子在访谈中都说了些什么。当访谈的主题是关于父母与其孩子的交往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冲突时,情况会比较棘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研究者有必要在事前告诉儿童的父母,这些信息是不能提供给他们的(参见 Allmark 2002,第 17 页)。最后,这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安全而严密地(档案保险柜、可锁住的柜子)存放研究资料(录音、转录稿、现场记录、评价等),以便让那些不该看到这些资料的人找不到它们(参见 Lüders 2000b)。

质性研究及其资料的情境问题

在质性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这里所获得和使用的资料,与定量研究相比,包含着更多的有关被调查者的情境信息。对定量研究来说,要根据数字化的统计数据来确认一个参加调查的人,通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开的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被调查者。但是对于个案研究或者在某个清楚界定的领域中进行的、仅包括少数几个案例的研究课题来说,如果在发表物中引用了一段个案史,那么,要根据这里的情境信息找到这段引言背后所藏的那个现实中的人,从本质上来说要简单得多。

案例　互动作为一个在伦理方面棘手的研究对象

以下这个案例可以说明,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如何要求人们具有特定的伦理上的敏感性。Maijalla/Astedt-Kurki/Paavilainen(2002)运用扎根理论(参见第 8 和 23 章)做了一项有关家庭的研究。

他们调查的内容是护理人员和那些正等待着一个残疾儿童出生的家庭之间的互动。这些被调查的家庭在获知他们的孩子可能生来就带有残疾或者不能活着来到人世之后，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对处在这种情况下的家庭进行研究首先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伦理问题，即通过采访令这些家庭额外地再次面对他们的这种处境是否合适。因为参加这样一项研究可能会因为承受额外的精神负担而对家庭或家庭的成员造成伤害。研究者采访了处在上述情况中的 18 个家庭的父母以及 22 名与这些家庭互动的护理人员。采访都被录了音。基于伦理上的顾虑，这里放弃了采用录像来记录资料的方法。研究者以书面的形式征求被调查者对参加调查的意见。被选中的参加者收到一封信，信里面有关于研究的目的以及保密措施的信息。因为这项研究课题属于是护理研究，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以下的伦理问题，即如何将护理人员的角色和研究者的角色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者应该清楚地告知参加研究的家庭，访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收集资料，而不是为了与被研究者共同处理和克服他们面临的情境。当然，研究者有必要关注被研究者在采访中以及采访后的安康状态，因为采访的问题会引发一种紧张状态。与此相应地，在有些时候扮演护理人员的角色倒也是研究者工作的一部分。在资料分析中，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是，人们如何做到让资料分析符合被研究者的视角。为了便于做到这一点，每个研究者都写了研究日志，并得到了研究上的辅导。对访谈录音的转录由专业的办公室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人员都"签署了一份书面的保密义务，并富有处理保密性资料的经验"（第 30 页）。在撰写研究结果时，研究者注意做到了采用比较一般化的表述，以此来保证被研究者的匿名性（第 31 页）。

这个案例说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会遇到什么样的伦理问题，而研究者又是如何应对的。这里提到的伦理问题可能有些夸张，因为这些被访家庭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因为这一危机而成为了研究的对象。尽管如此，这里谈到的多数问题都可以应用于质性研究的其他领域。

质性研究伦理——更好的研究所必需的

质性研究的设计通常更具有开放性，并且会根据实地中的情况进行调整。质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也少于定量研究方法。这就令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变得困难，因为事先往往并不能清楚地确定下来，在一项民族志研究中要收集的是哪类资料。对于有些研究来说，要获得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并不太容易，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市场、火车站等场所进行的参与式观察。研究的开放性常常导致资料的收集更多地是采用一种泛化的方法，比如："能不能请您讲述一下您的生活经历。这里可能所有的一切对我的研究来说都是重要的……"，而不是说研究已经有一些明确聚焦的（因而也是限定好的）问题或有待观察的事件。出于这个原因，在进入研究领域方面有必要遵守简约的原则，即只收集那些对于回答研究问题所必需的资料。有关研究伦理的思考在规划和实施研究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要为与此相关的问题和困境找到简单的和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却不是总能做到的。研究伦理常常更多地是一种对于行为边界和私人领域的反思和敏感性。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的伦理问题的思考不应当阻止他开展其研究课题，而是应当帮助研究者以更加敏感的方式来开展研究，并在另一个层面上考虑到潜在的被研究者的视角。为此，研究者应该让自己进入被研究者的角色，设身处地地

思考一下:被研究者要去做研究者要求他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思考可以作为探讨自己研究所牵涉到的伦理问题的合适的出发点。

要 点

- 对伦理问题进行反思以及寻找在研究实地中遇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研究者从事研究并使其合法化的前提条件。
- 伦理问题的处理在质性研究领域要比在定量研究领域更为棘手。
- 伦理准则是在一般的规则层面上确定如何处理伦理问题。在权衡研究课题对被研究者的权利和利益方面,伦理委员会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
- 不过,伦理问题只有在实地中以及在与被调查者和机构的互动中才会全面展现出来。
- 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源自权衡以下两者的必要性:对研究的兴趣(更广泛的知识、对既有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等)和被研究者的兴趣(保密性、避免可能的伤害等)。

练习 4.1

请您从文献中找出一项质性研究并尝试着从中找出它的作者是如何处理伦理问题的。请您思考一下,在这样一项研究中,您可能还会遇到哪些伦理问题和困难?

练习 4.2

如果您要设计一项自己的研究,请您思考一下,您将会在研究以及实地中遇到哪些伦理问题,以及您应该如何规划这项研究,才能够避免忽视或者伤害被研究者的利益?

拓展阅读

Hopf, C. (2000b). Forschungsethik und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89-600.

Murphy, E./Dingwall, R. (2001). The Ethics of Ethnography.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L. Lofland (Hrsg.):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S. 339-351.

第二部分　从理论到文本

本书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开展质性研究的框架。第 2 章的分析表明,质性研究多与文本(比如对访谈录音的转录稿、实地记录和其他有待诠释的资料)的生成与分析有关。本书在这一部分开始介绍质性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即从理论到文本的工作。之后,本书将在第四部分介绍从文本到理论的工作。在第二部分,本书首先会阐述一下人们在质性研究中对学术文献的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同时也是为了澄清一种老式的偏见,即质性研究者最好不要去阅读和了解现有的研究结果、研究方法文献和有关其研究问题的各种理论(第 5 章)。随后,本书将会介绍作为质性研究基础的最重要的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可以被视为是质性研究的理论背景,每一个理论流派都对现实有其特定的理解,也就是对以下问题有其特殊的理解,即如何从理论和方法上来分析研究问题以及如何设计和规划研究课题(第 6 章)。在这里,本书还提到了几个在质性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讨论——有关根本的认知理论观点如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讨论和有关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的讨论及其对质性研究的影响。其中,有关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讨论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 7 章)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这里分析了在质性研究中使用文本的认知理论基础以及生成和理解文本的一些基础过程。

质性研究中的文献使用 5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认识到现有文献对于规划和设计质性研究的重要性。
- 明白如果您想在某个领域进行质性研究的话，为何有必要了解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献以及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
- 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研究所需要的相关文献。

许多质性社会研究的教科书没有单设专章来探讨使用所研究领域中的现有文献的问题。人们（至今仍然）有时还会看到这样的建议，即质性研究不应以对研究现状的综述或概览开始，或者不应在开始时就做这一工作。在这里，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受到下述观点的影响，即质性研究所要探索和发现的领域对科学研究而言是全新的。

不过，如果人们认为现在还有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领域的话，未免有些天真。这在以前可能是对的，即当人类学家在质性研究的发展初期开始探索社会研究者尚没有涉足的领域时，或者当社会研究作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始被用于对移民群体亚文化的研究时。但是到了 21 世纪初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证社会研究以及自质性研究再次被发现以来的几十年的质性社会研究，要找出一个（完全）未被研究过的领域，变得越来越难了。人们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一切都已得到了研究。不过，人们在社会研究或质性研究中想要研究的一切，至少与相关领域的研究存在着某种联系。

有关质性研究的介绍之所以不重视对文献的使用，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一部在质性研究复兴中曾起到关键作用的早期著作的影响。这部著作的内容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扎根于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参见第 8 章和第 23 章）。在《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一书中，Glaser/Strauss（1967/1998）提出质性研究应从收集和分析数据开始，而不是去在相应的研究领域中寻找现有文献，或者说忽略现有文献（1967，第 37 页）。这一说法在此之后

常常被当作论据来驳斥质性研究的科学性要求。虽然 Strauss 在很早以前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修订,但是这一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质性研究的许多理解(参见 Seipel/Rieker 2003)。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质性研究中,使用以下各种形式的学术文献也是很重要的:

- 有关研究对象的理论性文献。
- 有关研究现状的发表物。
- 有关实施质性研究的方法文献,尤其是有关所选用方法的方法类文献。
- 理论性文献和实证性研究结果,可以依此将自己的研究结论加以情境化、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并推广自己的研究结果。

有关研究对象的理论性文献

当人们策划一项质性研究时,比如说要在某一领域进行访谈或观察时,有必要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已有发表物。对于要访谈的目标群体已有哪些研究?在进行一项对癌症患者的研究时,与有关特定访谈对象的知识相比,更重要的是了解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人们的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病史通常都有哪些特征,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是多少,等等。是否存在着能够对这种特殊疾病的病因和后果作出解释的模型?

与定量研究不同,质性研究不是要从文献中推导出研究假设,然后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它(参见第 8 章)。理论性文献在这里负责提供情境知识,以便研究者能更好地对他在研究实地中获得的陈述和观察进行分类。或者是通过与研究现状的对比,判断出当前的这项研究有何新颖之处。

对研究领域进行文献综述的目的,是要回答以下问题:

- 人们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已有哪些一般的认识?
- 该领域内有哪些理论和概念曾被用过或讨论过?
- 人们在理论或者方法上有哪些争论?
- 哪些问题还有待解决,或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研究过?

Glaser/Strauss 在 1960 年代完成其著作时的社会背景是,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的发展普遍感到不满。当时的趋势是发展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比如 Parsons 的系统理论,其原本的目的是或多或少地解释一切,但是最后发现它在日常现象层面上几乎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由此产生了对贴近日常生活和实际问题的理论的需要。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所发展出来的、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正是要满足这一需要。在此期间,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那些或多或少地居于细节层面的各种问题,人们都可找到许多个模型和解释理论。现在的发展趋势更多地是朝向多样化发展,

而不是向着统一的、普遍的理论模型发展。在这些有着有限适用性的理论和模型当中，有许多都对分析相关领域中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理论

这一点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如果要研究德国某一特定地区中产阶级妇女患皮肤癌的社会表征（soziale Repräsentation）问题，就要用到多种不同的理论。首先是解释被研究现象的理论——在这个案例中是关于皮肤癌的医学或心理学理论。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了解有关以下问题的研究现状：皮肤癌的形式、患病机率、患病原因、治疗手段和人们对疾病的应对（如治疗、克服，治疗成功的可能等）。

如果该研究关注的是德国患者的特定情况，那么有关这种疾病在德国的重要性的信息——媒体报道、发病几率、分布情况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情况等——也是必要的背景知识，因此必须要利用与此相关的理论性文献。这里所谈到的都可归入**内容性理论**（inhaltliche Theorien）的范畴。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有关社会表征的理论（参见 Flick 1995a 和本书第 6 章）属于是理论性文献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一理论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那些外行人也掌握着不同形式的知识。这种理论包含着可以阐释这些知识形成、变化和传递过程的模型。总地来说，这一理论可以为这项研究的设计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鉴于该研究聚焦于社会中产阶级，因此有关社会阶层、社会不平等、社会特权分布以及不平等待遇的理论至少在隐含的层面上是重要的。如果妇女明确成为被研究的目标群体，那么这里还涉及性别视角——即不同性别的体验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导致这里所研究的知识的区别。这些理论（关于社会不平等和性别差异）作为**情境理论**（*Kontext-Theorien*），对于计划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该研究案例还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方法——如事件访谈（参见第 14 章）——来分析受访者的观念（或社会表征）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对所研究问题的一种特定的理论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关注的是生涯发展：什么是常规生涯（Normalbiographie），是什么让自己的生涯有别于常规生涯，或者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例？除此之外，还要思考的问题还有：记忆和知识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在这里，人们需要区分四种知识（和记忆），即概念及语义知识（和记忆）和生涯及事件知识（和记忆）（参见第 14 章）。此外，这种方法还以一系列理论假定为基础，如应该如何设计收集资料的情境，以便能够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资料等。

有关前人研究的实证性文献

在开始自己的实证研究之前，人们应该把这个领域或相似领域的相关研究整合在一起。已有研究可以为自己研究的设计、访谈问题的设计以及可以避免哪些失误提供灵感。除了了解研究现状之外，人们还应该知道目前存在哪些研究空白。对这些实证性文献的概述旨在回答下面的问题：

- 在这个领域里有哪些方法上的传统或者争论？
- 是否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以便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

Strauss/Corbin（1990，第 33-36 页）列举了实证性文献的一些不同的使用方式：①文献中的概念和理论可以成为自己所搜集资料的比较点；②通过熟悉相关文献，可以提高对自己所搜集的资料中细微差别的敏感性；③公开发表的文献可以提供对事实的准确描述，这对理解自己的材料大有裨益；④现有的哲学知识和理论知识可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材料提供灵感和导向；⑤文献可以作为二手资料的来源，比如可用文章中引用的访谈补充自己的资料；⑥在研究的准备阶段使用文献，从中提出问题作为自己首次访谈和观察的出发点；⑦在分析自己的研究材料时，可以从文献中提出问题；⑧可以从文献中推导出理论抽样（参见第 11 章）的范围；⑨文献可以证实自己的研究结果，或者被自己的研究证明为已经过时。以上九点涉及的是科学领域的发表物（研究、方法和成果），Strauss/Corbin 将其称为技术性文献。非技术文献——例如信函、传记或者档案（参见第 20 章）——可以作为一手资料补充其他资料类型（例如访谈）。

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方法文献

研究者在决定自己采用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先去了解一下有关这种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比如说，如果要采用焦点小组（参见第 15 章）方法，那么研究者除了（通过该领域的教科书和期刊杂志）了解质性研究的现状外，还要阅读有关这种特定研究方法的重要出版物（有关的概论和章节）以及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出版物。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不仅可以更好地论证自己选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决定，而且可以更加缜密地规划这一方法在自己研究中的使用，并且更有可能避免文献中已经提到的问题领域和可能发生的错误。研究者要阐述自己对研究方法的使用，以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关方法文献的综述应回答下面的问题：

- 有哪些方法传统、备选方案或争论在这一领域是比较重要的？
- 是否存在使用这一方法的不同方式，可将其用作自己研究的出发点？

假如研究者要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参见第 8 章和第 23 章）的话，就应该分析 Strauss/Corbin（1990）以及 Glaser（1992）从他们最初共同提出的理论设计中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的版本。如果要使用话语分析方法的话，就有必要了解 Parker（2000）或 Potter/Wetherell（1995）所采用的各种不同形式，以辨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及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等。对相关方法文献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和读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通过采用该方法而得到的研究结论置于更广的情境之中来理解。

撰写研究报告时对文献的使用

在撰写研究报告时（参见第 30 章），文献的使用对于说服论证和对自己研究结果的语境化处理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研究者可以指出，自己的研究结果与现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或者更有意思的是，自己的研究结果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互相矛盾，或者说自己的研究结果超出了现有的研究结果。任何一篇稍微详细的论文都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文献综述。Hart（1998，第 13 页）指出了文献综述应该包含的内容：

> 选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现有文献（包括公开发表的和未公开发表的），并针对自己的研究做出效用评价。这些文献都包含着一些信息、思想、资料和证据，文献的作者在写作时都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出发，以实现特定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表明有关所研究问题本质的某些特定观点，以及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对所用文献的综述应该清楚地表明，研究者对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由此概括了解了相关研究领域、特定的主题、所用方法以及研究现状。

文献查询

除了传统的图书馆之外，互联网也越来越成为查询文献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许多领域的相关出版物都在互联网上发布，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可以进入德语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馆藏，例如可以通过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 ubka. Uni-karlsruhe. de/kvk. Html 使用“卡尔斯鲁厄网络目录”（Karlsruher Virtuelle Katalog）进行文献查询。

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存在着大量可以在线访问的期刊杂志和期刊杂志数据库，使用者可以进行文献查询，免费获得文章的摘要。文章全文常常是需要付费的，或者是需要通过已经订阅了相关杂志的图书馆才能获得。

要 点

- 质性研究同样离不开对现有文献的使用。
- 在设计研究、分析资料和撰写研究报告时，分析现有的有关其他研究项目、理论和方法的文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练习 5.1

请您选出一项质性研究，并在阅读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1. 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该研究领域现有的研究文献？
2. 在研究中的哪些地方，研究者参考了与其研究相关的现有研究文献？

练习 5.2

1. 在您设计自己的研究时，请使用任意一种前面所说的获得现有文献的方法，找到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方法文献。

拓展阅读

Hart, C. (1998). Doing a Literature Review. London: Sage.

Hart, C. (2001). Doing a Literature Search. London: Sage.

理论流派 6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质性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背景。
- 认识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 理解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区别。
- 知道女权主义理论对质性研究的贡献。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视角

正如本书在第 2 章所说的那样，在"质性研究"这一概念之下，综合了不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它们在理论观点、在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在方法方面均有所不同。如果回顾一下历年来在德语国家中所展开的讨论，人们就会发现，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主要的理论流派进行：第一，**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scher Interaktionismus），它所关注的是主观意义和个体的意义生成；第二，**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ie），它所关注的是日常惯习及其形成；第三，**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流派**（strukturalistische oder psychoanalytische Positionen），它们分析的是心理上的无意识过程或社会性无意识过程。这些不同的理论立场直接影响到一项研究所要实现的目的和该研究所选取的出发点。人们在这里可以区分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主体的观点"（Bergold/Flick 1987），另一些研究则主要是对现有的（日常的、制度的或者社会的）环境进行描述（Hildenbrand 1983）。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旨在分析社会秩序的确立（比如常人方法论的语言分析）或者重构"生成行动和意义的深层结构"，比如精神分析或客观注释学理论（Lüders/Reichertz 1986）。

每一种研究取向对于被研究的主体（包括他们的经验、行为和互动）与其研究时所处的情境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主观意义:符号互动主义

在这第一种研究视角中,个体赋予其行动和环境的主观意义成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这些研究方向基本上都与符号互动主义的传统有关。"符号互动主义"的概念是由 Herbert Blumer(1938)提出的。

> 这一概念表明,这一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将互动过程——即直接的、交互性的社会行为过程——作为其研究的重点。对于作为这一研究方向之基础的互动概念,人们在此有着特定的理解,它突出强调了社会行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特征。(Joas 1988,第 419 页)

正如 Joas 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研究方向是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之中发展起来的。通常来说,它指的就是美国社会学领域中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W. I. Thomas, Robert Park, Charles Horton Cooley, George Herbert Mead)。符号互动主义对于整个质性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第一,许多社会学家如 Anselm Strauss, Barney Glaser, Norman K. Denzin, Howard Becker 等均曾直接引证符号互动主义;第二,Blumer(1969/1973)有关"符号互动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的著作曾对 1970 年代的社会科学方法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主要观点

符号互动主义的出发点被 Blumer(1973, S. 81)概括为以下"三个简单的前提":

> 第一个前提是,人对"事物"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为基础的。(……)第二个前提是,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或产生于人与其同伴的互动。第三个前提是,这些意义通过人在应对他所遇到的事物时所进行的解释性过程而得到使用和改变。

从这三个基本前提可以看出,这类研究的核心切入点是,主体以不同的方式赋予物体、事件和经验以意义。因此,再现这些主观观点便成为分析社会世界的一种工具。另外一个核心的观点是在托马斯定理(Thomas-Theorem)中提出的。该定理进一步论证了刚才提到的方法原则——托马斯宣称:

> 如果一个人将某种情况理解为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其影响而言就是真实的。这一论点直接导向符号互动主义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研究者必须通过他所研究的主体的视角来观察世界。(Stryker 1976,第 259 页)

这一基本观点决定了,符号互动主义在方法上就是要以下述不同的形式来重构主体的观点(Bergold/Flick 1987):

- 以主观理论的形式:人们用主观理论来解释世界(或者至少是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某个特定领域)。比如,人们对于主观的健康理论和患病理论(概括性介绍请参见 Flick 1998; Faltermaier 1994)以及教育行为(Groeben et al.

1988)或咨询行为(如 Flick 1989)中的主观理论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

- 以自传式叙事的形式:在自传式叙事中,主体的生涯历程从主体的视角被展示出来。不过,重要的是,这些叙事应该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到当时的时代或者当地的情境,即从叙事者的角度所重构的那一时代和情境(概括介绍请参见 Kohli/Robert 1984)。

社会学领域的新发展:诠释性互动主义

近年来,Denzin 在阐述其观点时,不仅是以符号互动主义为出发点,而且还结合了许多不同的、更加新近的思潮。它们是现象学思想(Heidegger)、结构主义思维方式(Foucault)、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学术批判、Geertz(1973)所主张的"深度描述"方法以及源自文学领域的一些观念[2]。这一研究方向的目的是:"诠释性互动主义(Interpretativer Interaktionismus)致力于将所经历和体验的世界直接呈现给读者。"(Denzin 1989a,第 10 页)Denzin 从两个方面对这一研究方向进行了说明或者说限定:一方面是从研究对象方面的说明或限定:"这里所提出的研究方向只应在以下情况时方可采用,即当研究者想要研究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即个人问题(如婚姻中的虐待或者是酗酒)和公共机构提出的以解决这些个人问题为目的的方案之间的关系。"(同上)另一方面,Denzin 对研究所采取的视角进行了限定。他一再强调,必须从生涯的意义上来理解所研究的过程,并且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诠释(如 Denzin 1989a,第 19-24 页;参见 Denzin 2000c)。

心理学领域的新发展:主观理论作为研究项目

在主观理论研究(Forschung über subjektive Theorien)框架下,研究者对主观见解进行了持续性的分析(参见 Groeben et al. 1988; Flick 1998)。研究者在这里的出发点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像研究者一样——会形成有关世界和自己行为的理论,并且会在他们的行动中运用、检验并在必要时修正这些理论。这些理论中的那些假定相互关联,并且按照一定的论证结构被组织在一起。该论证结构符合科学理论的陈述结构(参见 Stegmüller 1973)。这类研究的目的是重构主观理论,并且为此发展出了专门的访谈方法(参见本书第 13 章对半标准式访谈的介绍)。为了尽可能达到以贴近主体的方式进行重构的目标,主观理论研究还发展出自己的(沟通式)效度检验方法来检验所再现的主观理论(参见第 28 章)。

关注主体的看法以及主体所赋予经验和事件的意义,以物体、行为和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为取向,是大部分质性研究的特征。不过,本文在这里将以主体为导向的研究和符号互动主义结合在一起肯定不是完全合适的。比如,当前的主观

---

① 人们在这里是以符号互动主义的假定为出发点的:"人们要想理解行为者的行为,就必须理解他的定义过程。"(Blumer 1973, 第 96 页)

② 比如 James Joyce 提出的"顿悟"(Epiphany)是一种"问题性的经验时刻,它可以说明一个人的性格,常常构成了一个人生活中的转折点"(Denzin 1989a, 第 141 页)。

理论研究与符号互动主义的关联往往只是隐含性的。同样地，有些源自 Blumer 和 Denzin 之研究传统的研究视角关注更多的是互动，而非主观意义（参见 Denzin 1993）。不过，在这些更加强调互动的研究中，作为互动对象的物体对于参与互动者所具有的主观意义同样也是分析的焦点。在方法上，这类研究采用的主要是各种形式的访谈（参见第 13、14 章）以及参与式观察（参见第 17 章）。

这里的两种理论立场——对主观见解的研究和符号互动主义的理论背景——构成了质性研究领域中的一极。

社会现实的生成：常人方法论

在 Harold Garfinkel（1967）提出的常人方法论研究框架中，研究者关注的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生成社会现实的方式。这类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再是仅仅关注主体的看法，而是要查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生成社会现实的方法[①]。Garfinkel 对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兴趣定义如下（1967，第 vii 页）：

> 常人方法论研究所要分析的是日常活动以及成员们用来将这些活动变成可视的、理性的、对于所有的实际目的来说都具有可汇报性的活动的方法，即将这些活动变成“具有可解释性的”、组织普通日常活动的方法。这种现象的反思性是实际行动、实践环境、有关社会结构的日常知识和实践社会学论证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整个常人方法论研究计划的特征是研究者对于下述研究内容的兴趣，即日常行为、日常行为的实施，还有对这些行为赖以发生于其间的情境的生成。在方法上，常人方法论主要是采用会话分析（参见第 24 章）的方法。

基本观点

Heritage（1985，第 1 页）将作为常人方法论和会话分析基础的三个基本观点概括如下：

> （1）互动在结构上是有组织的；（2）互动参与既受到情境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也会更新这一情境；（3）这两个特征内在于互动的**细节**之中，因此，在会话式互动中，没有任何细节的秩序可以被先验地当作是无秩序的、偶然的或者无关紧要的而被忽略。

这些“基本观点”的核心意思是：第一，互动的进程是有秩序的；第二，情境既设定互动的框架，同时也是在互动之中得到确立；第三，有关在社会互动中什么

---

① 对于常人方法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Bergmann（1980，第 39 页）做出了如下概括性介绍：“常人方法论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完成其行动时所用的方法。正是该方法生成了被行为者视为是既定的、自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在 Garfinkel 那里，社会现实被理解为一种操作现实，也就是说一种在参与者的互动中生成的现实，这种现实的生成具有本地性（在某地，在行为的过程中）、内生性（从情境的内部发生）和视听性（通过听、说、感知和行动）的特征。常人方法论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详细地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生产的这种‘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常人方法论会研究以下问题，即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从而让人们会认为他们是一家人。”

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决定需要在分析的过程中做出，而不可以先验地做出。在这里，分析的焦点并不是互动内容对于参与者的主观意义，而是互动本身是如何得到组织的。这里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日常行为中的惯习/常规(Routinen)，而不是突出的、被有意识地感知到并被赋予特定意义的事件。

为了揭示这样的惯习常规，研究者努力持有一种"常人方法论的漠然"(ethnomethodologische Indifferenz)的态度(Garfinkel/Sacks 1970)，既不对事件进行预先的解释，也不会去采纳某个参与者的视角。情境的作用，即发生互动的那个情境的作用，以及这一情境是如何被纳入到研究之中的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常人方法论的视角具有启发意义(参见 Sacks 1992)。Wolff et al. (1988，第 10 页)对此做了如下说明：

> 常人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将每一个事件都视为是由参与者在当场生成的结果。这不仅适用于直接的互动事实，比如一问一答的顺序进展，而且也适用于生成那些所谓的宏观事实，比如一次谈话的制度性情境。

按照这一理解，咨询谈话只是通过参加谈话者的特定的行为才成为一个咨询谈话(而不是成为其他的谈话类型)。正是谈话者的发言将他们之间的谈话"一步步"变成了咨询谈话，而不是一种事先的定义。在另一方面，制度性情境也是通过谈话者的发言而被转移进了谈话并通过谈话被生成。正是咨询师和其当事人特定的行为方式才将他们之间的谈话变成了咨询谈话，将咨询谈话变成一种特定情境之下的咨询谈话，比如说社会精神病学服务情境下的咨询谈话(参见 Flick 1989)。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工作研究

常人方法论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对谈话进行越来越正式的分析，并因此将自己局限于此。自 1980 年代以来，在"工作研究"(Studies of Work)中，工作过程分析作为第二个研究重点被广泛地发展起来(参见 Bergmann 2000a；Garfinkel 1986)。在这里，最宽泛意义上的工作过程，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工作领域中(如在科研实验室里)的工作过程，或者是数学家进行举证的方式，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Livingston 1986)。在这些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工作进程，研究者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谈话分析(Gesprächsanalyse)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研究的焦点从分析互动行为扩展到了分析在这些行为及其结果中得到具体化的"体现的知识"(das verkörperte Wissen)(Bergmann 2000a，第 131 页)。这样一来，这些研究便进入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更为广泛的领域(参见 Knorr-Cetina/Mulkay 1983；Knorr-Cetina 1984)。而科学社会学研究总地来说遵循的也是常人方法论的研究传统。

在心理学领域的新发展：论述心理学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在英国的社会心理学领域，一种被称作"论述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的研究方向以会话分析和实验室研究分析为出发点慢

慢发展了起来(参见 Edwards/Potter 1992;Harré 1995;Potter/Wetherell 1995)。在这里,研究者通过分析与认知和记忆等心理学现象相关的话语论述来研究它们。这些论述从日常会话到大众媒体中的文本变化不等。分析的重点是互动中的沟通性和建构性过程。在方法上,研究者选择的分析对象是"诠释性曲目"(interpretive repertoires),特定论述的参加者会运用这些诠释性曲目来生成一种有关特定现实的版本并且使其获得承认:

> 诠释性曲目是内容广泛且可以明确分开的概念、描述及成语的集群,它们常常通过比喻或者生动的图像被汇集联系在一起。人们也可以将它们理解成人们在谈话中用来解释行为、自身和社会结构的积木。(Potter/Wetherell 1995,第 188-189 页)

从这些论述之中,人们不仅重构了认知过程的内容和进展,而且还有有关特定事件的社会性或者集体性记忆得以建构和传播的方式(参见 Middleton/Edwards 1990)。

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被限定于社会现实生成的方式。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常常能够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社会活动组织方式的准确描述。除此之外,常人方法论研究也能够发展出谈话形式的类型学。不过,这类研究基本上忽视了主观的意义赋予。同时,它们也不能回答以下问题,即那些(在互动之前)早已存在的情境——如特定的文化——在社会行动的建构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现实与主观现实的文化框定:结构主义模型

尽管各个理论方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不过,作为质性研究理论基础的第三类理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认为主观现实以及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生成都同样受到文化意义系统的框定(有关文化意义系统的概述请参见 Bude 1995a,Streeck 1995)。

基本观点

在这类理论中,人们区分了经验和行动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经验和行动的表层可以被行动的主体所感知或意识到,而深层结构对于日常的、个体的反思而言则不再是可以(直接)企及的了。表层指的是行动者的意图以及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主观意义,而深层结构则具有生成行动的功能。这些深层结构一方面包含在文化模型(D'Andrade 1987)之中,另一方面包含于解释模式或隐含的意义结构(Oevermann et al. 1979)之中。最后,这些深层结构还包含于潜在的结构之中,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看,这些潜在的结构是没有被人意识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精神分析研究的目的正是要揭示社会之中以及研究过程之中的无意识。对研究过程的分析以及对研究者与他的访谈或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可以让人们发现,"无意识的社会生成"(Erdheim 1984)是如何进行的。按照这种理

解方式，从这种结构中得出的隐含的和明确的行动规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之前提到的各种理论方向的一个代表，人们对客观注释学（Objektive Hermeneutik）做出如下的阐述：

> 互动文本（Interaktionstexte）可以在能够得到重构的规则的基础之上生成**客观的意义结构**。这种客观的意义结构是互动本身所隐含的意义结构。互动文本的这种客观的意义结构，如通常所说的客观的社会结构典型，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从分析的层面（即使不是从实证的层面）来看是独立于参与互动的主体对其互动意义的有意图的、具体的展示。”（Oevermann et al. 1979，第 397 页）

为了重构这些规则和结构，人们运用了不同的方法程序来分析“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意义：如用以揭示文化模型的语言分析；对陈述和行为进行严格的顺序分析，以发掘其客观意义结构；在精神分析解释过程之中研究者所采取的均衡悬浮的关注（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以及对翻译与回译（übertragung und Gegenübertragung）的分析（Devereux 1967；Erdheim 1984）。

Oevermann 等（1979）所发展的客观注释学得到了尤为广泛的关注并且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参见第 25 章）。这一研究方向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存在于其理论基础之中的行动主体与（所要揭示的）结构之间的关系。Lüders/Reichertz（1986，第 95 页）将此称为是“结构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这些结构几乎是作为“独立行动的”结构而得到研究的。这一研究方向的另外的问题是天真地把文本和世界等同起来（“作为文本的世界”；参见 Garz 1994），并且认为，如果分析进行得足够深入，就会发现所研究的案例中生成行动的结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 Oevermann 理论的结构主义背景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后结构主义

在 Derrida（1976）之后，以上所述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在质性研究领域也受到了质疑。例如，人们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一个被诠释的文本以及作为诠释结果而形成的文本是否不仅符合诠释者的研究兴趣或其他需要，而且也符合被研究者的兴趣和需求（Lincoln/Denzin 2000，第 1051 页）。按照这种观点，文本既不是世界本身，也不是这个世界之某些部分的客观的、不失真的映像，而是生成文本者和阅读文本者的兴趣和需求相结合的结果。不同的读者在面对每个文本中所含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问题时都会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不同视角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Agger 1991，第 112 页）。在这一背景之下，以下针对客观注释学所提出的保留意见就更加重要了：“在客观注释学内部，在语言使用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个方法论上的‘裂缝’，这一裂缝最多只能通过将方法当成‘艺术’才能弥合。”（Bonß 1995，第 38 页）（也请参见 Reichertz 1988，2000）

心理学领域的新发展：社会表征

在结构主义理论中，隐含的社会知识与个体的知识和行为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不明朗。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可以联系一下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研究课

题,该课题研究的是“物体的社会表征”(例如有关文化物体及变迁过程的科学理论,相关概述请参见 Flick 1995a)。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社会层次及文化层次上共享的知识是如何影响个体的感知方式、体验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在这里,社会表征(soziale Repräsentationn)被理解为:

> 一种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体系,它具有双重功能:第一,它创设规则和秩序,令个体可以在他们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世界中获得导向并且能够熟练地应对这个世界;第二,它使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因为它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社会交往的准则和一套命名并清晰地归类他们的世界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个体历史和群体历史的准则。(Moscovici 1973,第XIII页)

这一理论越来越多地被一些质性分析用作理论框架,这类质性分析的内容是特定现象的社会建构,如健康和疾病(Herzlich 1998)、精神失常(Jodelet 1998)或日常的技术变迁的社会建构(Flick 1996)。在这里,从有关特定主题的社会知识中推导出来的社会规则得到了研究,同时,这些社会规则并没有被认为是独特的现实。此类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不同形式的访谈(参见第13、14章)和参与式观察(参见第17章)(例如 Jodelet 1998)。

范式的竞争或视角的多元结合

质性研究的不同的视角以及它们各自的关注点参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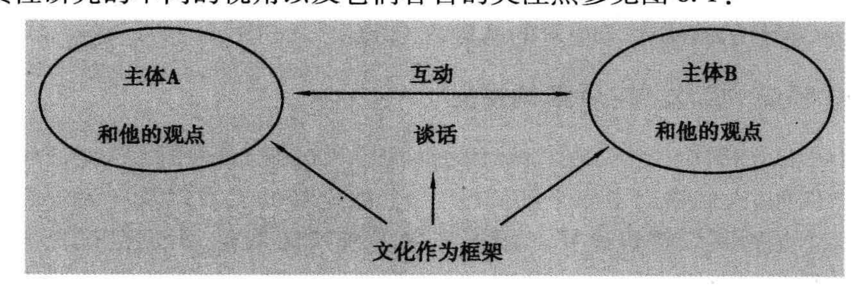


图6.1 质性研究的视角及其关注点

第一种视角的关注点是参与到所研究情境中的个体以及这一情境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从这些主观的意义当中可以(一步一步地)将情境性的上下文联系、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该事件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再现出来。正如咨询情况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参见 Flick 1989),从这个视角出发,“咨询”这一事件的意义和进程从主观的见解(例如有关咨询的主观理论)中被揭示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咨询情况的文化意义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得到分析。第二种视角的关注点是咨询中的互动,它所要分析的是谈话(如有关帮助的谈话,有关特定问题的谈话等)。在这一视角下,所叙述内容对于个体参与者的主观意义便退居次要的地位,而更为重要的是谈话的方式,即一个谈话如何在形式上被组织成为一个咨询性谈话以及参于谈话者在谈话中如何相互分配各自

扮演的角色(咨询师的角色或当事人的角色)。文化情境及社会情境只是在以下情况下才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即当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在谈话中被重新生成或者得以延续的。第三种视角所关注的问题是,哪些隐含的或者无意识的规则决定着一种情境中的可视的显性行为,哪些潜在的或无意识的结构在这里起到了生成行动的作用。在第三种视角之下,特定的文化以及该文化在特定情境之下针对这种特定情境“提供”给个体的结构和规则是核心的关注点。主观见解以及互动只是在以下的观察角度之下才能引起研究的兴趣,即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或重构结构。

除了以上的对比之外,人们在对待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时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将某一种理论观点及其分析研究现象的视角视为“唯一正确的”,并且批判地拒绝其他的理论和视角。这种划分正误界限的做法曾长期支配德语国家中的方法论讨论。在美国的讨论中,不同的理论观点也被视为是范式并因此被当作是相互竞争或“相互斗争”的范式(Guba /Lincoln 1998,第218页)而对立起来。

不过,不同的理论观点也可以被视为是用来分析研究现象的不同切入点。人们可以具体考察,这些理论视角可以分别解释所研究现象的哪些方面,而哪些方面从特定的研究视角出发则会被忽视。基于这种理解,不同的研究视角被相互结合起来,互相补充。这种对视角的多元结合(Flick 1992,2000c)可以扩展人们对所研究现象的观察视野,例如再现参与主体的见解,随后分析共同的互动情况之进展。

不同理论的共同点

尽管理论视角不同,以上介绍的不同的理论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可以被视为是它们之间的一种交集:

- **以理解作为认知原则**:质性研究的目的旨在从内部获得对所研究现象或事件的理解(参见 Hopf 1985)。所要理解的内容为行为主体的见解、社会情境(如谈话、会话、工作过程)的经过或者适用于某一情境的文化规则或社会规则。如何从方法上实现这种理解,取决于所选择的理论基础。
- **以重构案例作为切入点**:这些理论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它们在做出比较论述或普遍性陈述之前,或多或少地都是从具体的案例出发。首先,个体的主观理论、单个的谈话经过、单个的案例被重构出来,之后,其他的案例分析及分析的结果被引入分析进行对比(参见 Hildenbrand 1995, 1999; Kraimer 2000),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有关不同主观理论、不同谈话经过、不同案例结构的)类型学。至于什么被理解为“案例”——例如行为主体和他的看法,一个发生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互动或者一个事件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情境——取决于案例研究中所选择的不同理论立场。

- **以现实的建构作为基础**：重构的案例（或类型学）包含着不同层面的对现实的建构：主体通过其对于特定现象的看法建构他们的那一部分现实；在谈话和会话中，现象以互动的方式被生成，有关现象的现实也由此而得到建构。潜在的意义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通过它们所生成的行动促成社会情境的建构。质性研究所研究的现实，并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由不同的参与者所建构的现实。哪些参与者被视为是对这一现实的建构至关重要，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这一建构过程时所选择的理论立场。
- **以文本作为实证资料**：在重构案例的过程中，研究者会生成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进行实证分析：主体的看法作为他的主观理论被再现出来或表述出来，互动的过程被摄录下来并被转写为文字。对潜在的意义结构的重构也离不开分析所需要的具有一定详细度的文本。在所有的情况下，文本都是重构和注释的基础。文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取决于各自的理论立场。

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和他们共同的特征被概括在表 6.1 里。第 2 章中我们曾讨论过质性研究的几个特征，提示框 6.1 提供了一份合并后完整的质性研究的特征清单。

表 6.1　质性研究的理论流派

	主体的看法	社会现实的生成	社会现实的文化框定
传统的理论背景	符号互动主义	常人方法论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发展	诠释互动主义	工作研究	后结构主义
在心理学领域的新发展	主观理论的研究项目	论述心理学	社会表征
共同点	• 以理解作为认知原则 • 以重构案例作为切入点 • 以现实的建构作为基础 • 以文本作为实证资料		

提示框 6.1　质性研究的特征——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 研究方法和理论相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 参与者的视角及其多维性
- 研究者和研究的反思性
- 质性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丰富多样性
- 以理解作为认知原则
- 以重构案例作为切入点
- 以现实的建构作为基础
- 以文本作为实证资料

以上介绍了当前质性研究中的核心的研究视角及其理论背景。本章接下来所要分析的是质性研究中理论讨论的两个核心的基点。

女性研究与性别研究

在方法讨论中，女性研究最初与其说是一种研究视角，倒不如说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批判。女性研究的着眼点首先是社会研究（及社会）中对女性特定的生活境遇的忽视和男性的支配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主义研究和质性研究常常被等同起来，因为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于“女性的现实”和需求更加开放（Becker-Schmidt/Bilden 1995）。Mies（1983）列举了一系列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与定量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研究更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他看来，定量研究会忽视女性的视角，将女性降格为研究的客体，以一种价值无涉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研究女性。与此相对，质性研究可以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更易于实现女性的目的。在 Ussher（1999，第 99 页）看来，女性研究所关注的是“一种对科研和理论中性别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对科研所具有的道德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认可以及以下认识，即要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离不开社会的变迁”。女性研究不仅仅定义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男女性别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在多个层面上对于研究的开展提出了质疑。Skeggs（2001）和 Smith（2002）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对研究结构（及参与研究者的视角）的展示等层面描述了女性主义对于民族志的理解。Ussher（1999）以健康心理学为例讨论了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特殊问题的主题。Kityinger（2004）介绍了一种女性主义会话分析的方法，在这里，谈话发言被置于其互动的语境当中得以分析。Wilkinson（1999）讨论了焦点小组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问题。与此相对的是，Maynard（1998）对于女性主义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紧密联系提出了质疑，她怀疑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不符合女性主义研究的框架。Gildemeister 认为，“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是一种超越了女性主义研究的研究程序。在这里，“人们通常会强调指出，性别是一种**社会性**范畴，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里所关涉的始终是社会**关系**。因此，人们在这里不再是尝试着去从本质的和实体的层面去发现差异，而是从等级化和社会不平等的角度去分析性别关系”（2000，第 214 页）。在这里的语境下，这种意义上的性别（gender）或者被视为是一种结构性范畴，或者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建构。按照第一种理解方式，分析的焦点更多地是集中于由性别不平等或性别差异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之上。按照第二种理解方式，分析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性别在实践和活动之中的生成（即“doing gender”，参见 West/Zimmerman 1991）以及性别的区分是如何在日常的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之中得到确立的。这样，对变性（Transsexualität）的分析被作为一种特定的方式，用以阐明正常状态是如何在互动之中被生成的，以及这一正常状态如何可以通过对断裂的分析而得到解构：

> 有关变性的研究特别适合表明处在性别的社会建构之中的**互动性**深层结构(……)。此类研究在正常性的断裂之处研究以下问题,即双性现象是如何在日常实践中以及如何在方法的层面之上得到建构的,因为在一种性别向另一种性别的转变之中,性别建构的过程可以以类似于电影技术中的慢动作的方式得到分析。

女性主义研究推动了对质性研究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因为它发展出来一种用来分析性别、性别关系、性别关系之中的不平等以及对性别差异之忽视现象的研究程序。这一研究程序在认知理论、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层面上都得到了发展,并在性别研究当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对整个质性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us)和建构主义(Konstruktivismus)的对立深刻地影响着质性研究领域中认知理论层面的讨论,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更是如此。正如Oakley(1999)所指明的那样,这种对立也与质性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密切相关。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认知理论程序最初源自自然科学领域,因此,它常常被研究者用作一种反衬来界定自己的研究。不过,在社会科学讨论中,这一点很少被明确说出。Bryman(2004,第 11 页)将实证主义的不同假定概括总结如下:

> ①只有当现象和知识能被感官所证实时,它们才能被确认为是知识(现象论);②理论被用来提出可被验证的假设并可允许验证法则性解释(演绎主义);③通过收集可作为法则之基础的事实可以获得知识(归纳主义);④科学研究必须而且也能够以价值中立和客观的方式进行;⑤科学性陈述和规范性陈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其中前者才是科学研究者的真正的领地。最后的这个原则其实已隐含在第一个原则之中,因为真理或者其他规范性陈述不能够通过感官得到证实。

实证主义常常被人与现实主义(Realismus)联系在一起。这两者的出发点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中应该而且也能够应用同样的原则,此外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描述之外的外部世界(一种外在的现实)。不过,对实证主义这一单词的使用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Hammersley(1995,第 2 页)写到:"人们可以理性地从那种在社会研究文献中对'实证主义'这一概念的不明确的使用中推导出来的仅仅是,不管他或她指的是什么,作者都不赞同。"

人们将实证主义这种理论观点与社会建构主义(或建构主义)对立起来(参见 Flick 2000e)。一系列有着不同出发点的认知理论方向都被概括在这一标签之下。所有建构主义理论分支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通过探讨接近现实的建构性过程来确定与现实的关系。这样的建构可以被置于不同的层面:

1. 在 Jean Piaget(1937)的理论传统中,对世界的认知和感知有关世界的知识都被视为建构。激进建构主义(Glasersfeld 1995)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任何形式的认识——因为牵涉在认知行为之中的神经生物学过程的原因——都只是有关

世界和现实的图像，而不是世界和现实本身。

2. 受到 Schütz（1971），Berger/Luckmann（1969）和 Gergen（1985，1999）理论传统影响的社会建构主义关注的是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知识的社会习俗（如文化或历史的习俗）。
3. 受到 Fleck（1935）研究传统影响的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实验建构主义”（Knorr-Cetina 1984；Latour/Woolgar 1979）所关注的是，社会性、历史性、本地性、实用性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认识的，以至于科学事实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建构（“本地性生成物”）。

建构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研究计划，而是在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得到了平行的发展，如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神经生物学、精神病学和信息学。建构主义的观点，即我们所研究的现实是行为者、互动和制度的社会生成物，对于质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知识的建构

我们可以借助三个核心的学者来说明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功能是如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得到描述的：

1. Schütz（1971，第 5 页）的理论基于以下的假定：“我们全部有关世界的知识，不论是科学思考，还是日常思考，都包含着建构，即一种由抽象化、概括化、形式化和理想化内容组成的结合体，它们分别适合思维组织的各个不同的阶段。”Schütz 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知识都是通过选择和结构化得到建构的。各种知识形式的区别在于其结构化和理想化的程度，而这一程度又取决于其功能。如果是作为日常行动的基础，那么知识的建构将会更加具体，如果是作为科学理论构建中的模型，那么，知识的建构将会更加抽象。Schütz 指出了不同的过程，其共同之处在于有关世界的知识的形成并不能理解为是对既有事实的简单描摹，知识的内容是在一个活跃的生产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

2. 以下认识在激进建构主义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Glasersfeld（1992，第 30 页）将其“核心论点”总结如下：

> 1）我们所称之为“知识”者，并非描绘了一个我们与之没有接触的世界。（……）建构主义，与实用主义一样，带来的是被改变之后的知识的概念。因此，知识与我们组织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有关。
>
> 2）激进建构主义**决不**否认外在现实。（……）
>
> 3）与 Berkeley 一样，激进建构主义认为，确信某种不可被感知或不能在某个时刻被感知到的事物的存在，是不理性的。（……）
>
> 4）激进建构主义从 Vico 那里借鉴了以下的基本思想，即人类的知识是人类的一种建构。（……）
>
> 5）激进建构主义放弃提出以下的要求，即认识必须是“真实的”，它所反映的须是客观现实。激进建构主义只是要求，知识必须是**可行的**，它应该符合知识持有者的经验世界（……）。

由此看来，知识组织经验，而正是经验才令对存在于认知主体或认知生命体之外的世界的认知成为可能。经验是通过认知主体所建构的概念和关联得到结构化和理解的。至于这样得出的描述是否真实或者正确，这个问题难以得到回答。不过，该描述的质量却是可以通过其**可行性**得到确定的，也就是说，该描述

或模型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令主体可以在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在其中采取行动。在这里,以下问题可以作为出发点,即"概念的建构"(Glasersfeld 1996,第132-134页)是如何运行的。

3. 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而言,社会交换过程在知识的生成,特别是在所运用的概念的生成中起着独特的作用。Gergen(1994,第49-51页)就此提出了以下"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的假定":

> 我们用来解释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概念,并不受这些被解释对象的支配。(……)我们用来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概念和形式,都是社会性的人造物,是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之下所发生的交换过程的产品。(……)一种有关世界或者我们自身的特定的解释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不取决于该解释的客观的效度,而是取决于社会进程的变化**可能性**。(……)语言是从它在关系模式之中起作用的方式来推导其在人类事务之中的意义的。对现有话语形式的评价意味着对文化生活模式的评价,这种评价使其他的文化飞地(Enklaven)①可以得到人们的倾听。

知识是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得到建构的,知识是建立在语言在社会关系之中所起作用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具有社会功能。上面提到的社会进程的变化可能性影响着什么可以作为有效的或可用的解释得以持久。研究活动本身也是我们在社会研究中所要研究和发现的内容的社会建构的一部分。文本的生成有助于促进对我们所研究世界的社会建构。这一内容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加详细的分析。

要 点

- 作为质性研究基础的各种理论可以被归入三类研究视角,它们分别决定着按照这些研究视角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所选用的研究方法。
- 这些研究视角可以从基本观点和近期发展两个方面得到介绍。
- 从这些研究视角之中可以推导出质性研究的共同特征。
- 在这三个研究视角之外,一种由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所构成的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实践提出了两重挑战:第一,它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惯例和正常性假定提出了质疑,第二,它们对研究实践中的惯例和正常性假定提出了质疑。
- 此外,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区分再一次表明了质性研究和那些以自然科学研究理念为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区别。

练习 6.1

1. 请您找出一项已经发表的研究并将它归入本章讨论的某个研究视角之下。
2. 针对您自己的研究,请您思考一下,在本章谈到的各个专题中,哪一个专题对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① 飞地,指位于某地域内,但却居住着与其不同文化或种族居民的小块地区。——译者注

拓展阅读

Blumer, H. (1969/1973). Der methodologische Standort des Symbolischen Interaktionismus. In: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 (Hrsg.). Alltagswissen, Interakt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Bd. 1-2). Reinbek: Rowohlt, S. 80-146.

Denzin, N. K. (2000c). Symbolischer Interaktionismu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36-150.

Devereux, G. (1967). Angst und Methode in den Verhaltenswissenschaften. München: Hanser.

Flick, U. (Hrsg.)(1995a). Psychologie des Sozialen. Repräsentationen in Wissen und Sprache. Reinbek: Rowohlt.

Flick, U. (2000e): Konstruktivismu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50-164.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N. J.: Prentice-Hall.

Gildemeister, R. (2000). Geschlechterforschung (Gender studie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13-224.

Oevermann, U., Allert, T., Konau, E./Krambeck, J. (1979). Die Methodologie ein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H. G. Soeffner (Hrsg.). 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Metzler, S. 352-433.

7 文本的建构与理解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明白在被研究的社会现实和它在文本之中的展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
- 理解不同的社会建构过程在此发挥作用。
- 认识到拟态在描述这些过程方面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方案。
- 理解借助质性研究一个重要案例所做的说明。

本书在上一章指出，以理解作为认知原则，以重构案例作为切入点，以现实的建构作为基础以及以文本作为实证资料是跨越了不同理论流派的质性研究的共同特征。人们在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如何理解发生在被研究的现象之中及对其研究过程之中的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在根据研究目的而重构的案例中，现实是如何描绘或生成的？文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

文本与现实

文本在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具有三种功能：它们不只是作为认知基础的基本资料，也是解释的基础和用来展示及传播这些认知的重要媒介。这不仅适用于将世界文本化作为自己研究纲领的客观注释学（如 Garz 1994），而且也普遍适用于质性研究的常见方法：在访谈被用作资料基础的情况下，需要对访谈进行书面整理（也即文本），然后再对其进行解释。在观察的情况下，实地记录往往是（文本形式的）资料基础。再或者，研究以对自然谈话和情境的记录开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书面化转录和解释。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文本既是收集资料的结果，也是解释资料所用的工具。如果质性研究要依靠文本来理解社会现实，那么，以下两个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在将现实翻译成文本时，到底会发生什么？第二，在将文本再度翻译回现实时，或者在从文本中推导现实时，到底会

发生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便取代了被研究对象的位置。只要是研究者收集好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一个文本,那么,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文本便取代了被研究的社会现实:如果说之前原本想要研究的是生涯经历(Biographie),那么,现在供研究者分析的便是通过采访所获得的陈述。而且,从陈述当中留下来的也只是被记录下来的那一部分内容。因为被记录的部分还要经过转录而被转化成文本,并且研究者所选择的转录形式决定了哪些被记录的内容会得到转录,所以,最后供研究者分析所用的就是最终被转录的那部分内容。这样所生成的文本便成为在接下来进行的解释以及推导认知的基础:研究者很少会在分析之后再度回到原始的录音记录进行验证,也很少会再回到被访谈或被观察对象那里去验证自己的分析。至于最后生成的文本中,原初想要了解的研究内容(如生涯经历)最终会被保留下来什么以及保留下来多少,人们对此难以控制。而这些问题应该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社会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文本科学(Gross 1981),文本作为一种固化和实体化的形式对于这门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讨论这个至今很少得到关注的问题,即在资料的收集以及解释的过程生成**新的**现实(如作为故事的生活)的问题。

文本作为世界的生成:一级建构与二级建构

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实际存在的既定事实的简单描绘。有关这一问题,人们很久以来就围绕着"展示危机"这一主题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讨论:世界在多大程度可以被展示于电脑或认知系统中呢?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Winograd/Flores(1986)对简单的、认为是一对一展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Ricœur(1981)则将这一讨论视为是哲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从民族志研究领域的相关讨论出发(如 Berg/Fuchs 1993; Clifford/Marcus 1986),人们在质性研究领域的讨论中将这一危机视为是质性研究的双重危机,即展示的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就展示的危机而言,作为社会科学中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后果,人们开始怀疑社会研究者。

> 能够直接捕捉到生活过的经历。人们的论据是,这些经验是在研究者所写的社会文本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展示的危机。它指的是经验和文本之间的直接关联性的问题。(Denzin/Lincoln 2000b,第 17 页)

第二个危机是合法化危机。在这一危机中,传统的质量评价标准遭到质性研究的拒绝,或者说作为后现代的后果,将科学知识合法化的可能性普遍地遭到了拒绝(参见第 28 章)。

在这些讨论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人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可以认为,在主观层面的或社会共享的见解之外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现实,人们可以依据该现实来验证它在文本中(或其他研究产品)中的"展

现”。社会建构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相关概览请参见 Knorr-Cetina 1989）都拒绝相信这种现实的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均认为，现实是由参与者通过他们赋予特定事件和物体的意义而主动生成的；社会研究者在研究社会现实时，不可能“绕过”这些意义。Matthes（1985，第 59 页）将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概括如下：

> 对于社会主体自身而言，他们视什么为真实的？何以如此？从对这些社会主体进行观察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视其为真的情况？在什么情况下，观察者自己会认为他们所观察的内容是真实的？

因此，研究的出发点是有关我们在被研究的社会领域中遇到的那些社会事件、事物或事实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与想法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如相互竞争、冲突、贯彻、取得共识和被信以为真。

以社会建构为出发点

Alfred Schütz 早就指出，事实只有通过它们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其意义的解释才会变得重要：

> 严格地说，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简单的事实。所有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意识从一个普遍的环境中选择出来的事实。因此，这些事实都是被解释过的事实：它们要么被人为地从其上下文情境之中抽象出来，要么只是在局部的情境之中得到考虑。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事实都携带着解释层面上的内外在视界。（Schütz 1975，第 5 页）

这一见解与 Goodman（1984）类似。在他看来，世界是通过不同的知识形态——从日常知识到科学再到艺术作为不同的“世界生成的方式”（Weisen der Welterzeugung）——被社会建构的。按照 Goodman（还有 Schütz）的分析，社会研究就是分析这些世界生成的方式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建构。在这里，Schütz（1971，第 68 页）所做的一级建构和二级建构的区分是一个重要思想。在 Schütz 看来，“社会科学的建构就是二级建构，即对社会领域中行为主体的建构之建构”。Schütz（1971，第 68 页）就此提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按照一些普遍的原则整理和组织其经验，特别是那些有关社会世界的经验，社会科学方法的第一任务就是研究这些普遍的原则。”

照此看来，日常认知和日常知识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赖以提出更加正式和更具普遍性的“世界版本”（Goodman 1984）的基础。与此相应，Schütz（1971，第 267-268）提出了“多样现实”（mannigfaltige Wirklichkeiten）的观点。科学世界只是这多样现实中的一种。科学世界的组织原则只是部分地不同于日常世界的组织原则。

这样一来，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就遇到了以下的问题，即它总是通过存在于特定领域的、由该领域的互动主体（共同或在竞争中）建构的有关该世界的各种版本来接触它所要研究的世界。社会科学会生成另外一个有关该世界的版本。科学性认知以及对相互关系的展示总是包含着不同的建构现实的过程：在被调

查者那里是日常的、主观的建构，在那些收集、整理、解释数据以及呈现研究结果的研究者那里，则是科学的（即或多或少规范性的）建构（参见图 7.1）。

在这些建构中，被信以为真的相互关系得到了翻译：在被调查者那里，日常经验被翻译成知识，在研究者那里，有关这些经验方式或者事件和行为方式的报告被翻译成文本。如何更具体地表达这些翻译过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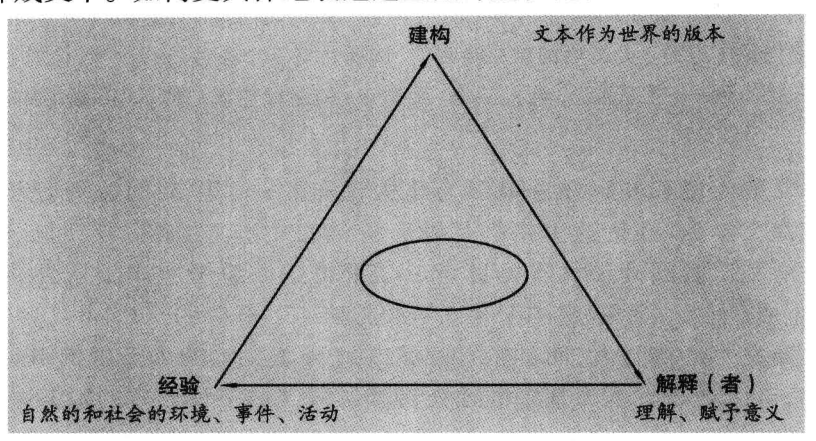


图 7.1　在建构和解释之间的理解

文本之中的世界生成：拟态（Mimesis）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在此借用来自艺术学和文学领域的拟态理论（参见 Iser 1991；Kunstforum 114）。该理论对于以文本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拟态指的是将（原始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的）世界转化为符号世界。拟态最初曾被理解为"对自然的模仿"。在此期间，该概念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Gebauer/Wulf 1992）。一个经常被用来说明拟态的简明的例子是在文学或戏剧作品中或者在戏剧舞台上展现自然或社会关系：按照这里的解释，"拟态指的是生成符号世界的行为，它既包括实践的也包括理论的组成要素"（Gebauer/Wulf 1992，第 11 页）。在此期间，人们对于这一理论的兴趣已经超出了在文学文本或戏剧中的展现。在当前的讨论中，人们将拟态当作一种普遍的原则，用它可以勾勒出对世界（和文本）的理解：

> 在拟态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接近世界。拟态可以令一个人走出自我的世界，将外部世界纳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拟态可以让人获得一种以其他方式不能达到的与客体的接近性，因此它是理解的一个必要条件。（Gebauer/Wulf 1992，第 11 页）

当我们将这些思考应用于质性研究以及其中所用的文本时，可以在下述方面找到拟态的成分：

- 在被调查者方面，当他们将经验转化为叙事，报告等时。
- 在研究者方面，当他们在此基础上建构文本以及解释这些建构时。

- 最后，当这些解释再度回归日常情境时，例如当读者阅读相关的描写时。

Ricœur(1981,1988)的思想有助于分析发生在社会科学文本建构和解释过程中的拟态过程。就文学文本而言，Ricœur“以戏谑但又严肃的方式”将拟态的过程划分为三个步骤：拟态$_1$，拟态$_2$ 和拟态$_3$：

> 然而，注释学致力于再现以下运作过程的整个弧线，即从实际的经验中产生出作品、作者和读者的运作过程。分析后的结果会表明，读者乃是一个独特的行为者，他通过自己的活动——即阅读——把从拟态$_1$ 经过拟态$_2$ 到拟态$_3$ 的路径连成一体。(Ricœur 1988，第88-89页)

对本文的阅读和理解在这里成为建构现实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不仅是文本(在我们这里指的是社会科学的文本)的撰写者，而且还有该文本的写作对象以及阅读该文本的读者。如果将这一思考应用于质性研究，就意味着，在生成(有关某个特定的个体、互动或者某一事件的)文本时，参与现实建构的不只是文本的撰写者，而且还有阅读或解释该文本的人。根据 Ricœur 对拟态的理解，可以在以文本为基础的社会科学领域区分三种形式的拟态：

- 日常的诠释以及科学的诠释总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和社会事件或自然事件的事先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拟态$_1$：

> 不管这些故事的状况如何(其存在总是先于我们可能对它们的讲述)，我们使用故事①这个词(从这种先于叙述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我们有以下的预先理解：一个行动只有在以下程度上才是富有人性的(menschlich)，即当它描绘的是一个值得被讲述的生活故事时。拟态$_1$ 指的就是对富有人性的行动(menschliches Handeln)的预先理解，即对其语义、符号以及时间性的预先理解。从这种预先理解中就会产生虚构(Fiktion)，而随着虚构就会出现拟态的第二种形式，即文本化和文学性的拟态。(Ricœur 1981，第20页)

- 将有关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的体验加工转化成文本(不管是转化为对他人的日常叙述、特定的档案等或者是在生成用于科学研究目的的文本)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建构过程，即拟态$_2$：“拟态$_2$ 的领域存在于文本生成前和文本生成后的中间。在这个阶段，拟态可以被定义为行动的构型(Konfiguration von Handlung)。”(Ricœur 1981，第25页)
- 将文本转化为理解的拟态性转变是通过解释来完成的——不论是对叙述、档案、图书、报纸等的日常理解，还是对这些叙述、研究档案(记录、转录稿等)或者科学文本的科学诠释：“拟态$_3$ 指的便是文本世界和听者或读者世界之间的交汇点。”(Ricœur 1981，第26页)

这一观点是 Ricœur 针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所提出来的。与这一观点相应，社会科学中的拟态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经验建构和经验解释之间的交互影响：

- 拟态包含着从预先理解经过文本再到解释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建构行为、

---

① “Geschichte”一词同样也可以被翻译为历史，这里选择了故事的译法。——译者注

解释行为以及理解行为之中完成的(参见图7.2)。

图7.2　拟态的过程

根据以上这种对拟态的认识,理解是一个积极性的生成过程,而且理解者也参与这一生成过程。这种理解并不只是仅仅局限于对文学性文本的理解,而且也普遍适用于全部的理解活动。正因为如此,该理解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解,理解在此领域是一种认知手段。Gebauer/Wulf (1992)在他们对拟态的概化分析中对上述见解进行了说明。他们的分析依据的是Goodman的理论,即有关世界生成的不同方式的理论以及——作为认知结果——由此生发出的有关不同世界版本的理论:

> 对相同模式的认识乃是一种创造活动:组织方式"并不是在世界之中被发现的,而是被植入这个世界的"。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藉由Goodman有关世界生成之理论的帮助,人们可以将拟态从传统定位中解放出来,因为传统上人们固执地否认拟态内在的创造性。这种传统见解本身是建立在错误的认知前提基础之上的,如:人们认为认知的客体是孤立的;认为存在着一个外在于编码系统的世界;认为真理指的就是语言陈述与语言之外的世界一致;假定存在着一种知识的源头。在Goodman的批判之后,这些理论观点均站不住脚了:世界是"从其他世界中被制造出来的"。(Gebauer/Wulf 1992,第28页)

由此可见,Gebauer/Wulf是从普遍认知的角度来讨论拟态的。而Ricœur则是针对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过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拟态的,他在此既没有援引狭义和严格的有关在文本中再现既有世界的观念,也没有援引有关现实和真理的狭义的概念。①

处在传记和叙事关系之中的拟态

为了进一步进行说明,可以将这一对拟态过程的理解应用于质性研究的一

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拟态先于我们有关参照、现实和真理的概念。它唤起了一种至今为止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即超越既有,思考更多。"(Ricœur 1981,第31页)

个普遍性的活动。绝大多数质性研究都是致力于通过访谈再现生活故事或传记（Biographie）。人们认为，叙事是一种合适的展示传记经历的形式（详细的讨论请参考第14、15、25章）。在这一方面，Ricœur提出了“有关经历的叙事质量或前叙事质量的论题”（Ricœur 1981，第20页）。对于生活故事与叙事之间的拟态性关系，Bruner（1987，第12-13页）指出：

> 介于所谓的生活和叙事之间的拟态乃是一种双向的事情：（……）叙事模拟生活，生活模拟叙事。这种意义上的“生活”与叙事一样，都是人类想象的一种建构。生活是由人类通过主动的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而建构的，我们也是通过同样的合理化来建构叙事的。当一个人讲述他的生活时（……），他所讲述的内容在每种情况下都更可能是一种认知活动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一种对明确的既定事物的清楚描述。最后，讲述的生活也就成为叙事的劳动成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一种“独在的生活”（Leben an sich）。至少来说，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记忆的筛选性的工作结果；此外，讲述自己的生活乃是一种解释性的活动。

因此，有关自己生活的传记叙事并不是一种对事实进展的描画，而是一种对过往经历的拟态性描述。为此，这些经历以叙事的形式——在访谈中——得到了建构。在另一方面，叙事也提供了一个普通的框架，可用来归类、展示和评价经历等。简言之，叙事提供了一个可用来体验经历的普通框架。质性研究（在此）所研究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便已经在研究它的方法形式方面受到了建构和诠释。就访谈而言，这些日常的建构和诠释方式被用来将这些经历导入一种符号性世界——科学和其文本。此后，这些经历将从该世界的角度得到注释：“在拟态性参照中，人们从符号建构的世界出发来诠释一个以前的（并不一定是现存的）世界，而该世界本身已经是一个被诠释过的世界。拟态赋予已经被诠释过的世界以新的意义。”（Gebauer/Wulf 1992，第433页）

通过从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出发来重构生活，人们便建构和诠释了一个有关生活经历的版本。至于该生活和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像人们叙述的那样真的发生过，在此是不能验证的。不过，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讲述主体在两者中展示的是哪一种建构，以及在研究情境下出现的是哪一种版本。最晚，等到人们最后呈现这一重构（Rekonstruktion）的结果时，这些经历以及获得该经历所处的世界将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得到呈现和观看——比如以一种有效的（新）理论的形式：“在拟态行动中包含着一种意图，即将符号生成的世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展示，从而让人们将它视为是一种特殊的世界。”（Gebauer/Wulf 1992，第433页）拟态正是在科学研究中以符号形式生成的世界和研究者以实证的方法想要研究的日常生活或情境这二者之间的连接之处发挥作用的：“拟态是一种中间物，被一个符号生成的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撑开。”（同上）

在以上引用的各位学者看来，拟态避免了那些令展示理论陷入危机从而变成空想的问题。[1] 人们可以把拟态从原先的文学表现与理解的语境中脱离出来，

---

① “拟态在我看来似乎更少排他性、更少结局性，更富有多义性，因此也就更加灵活和机动，更容易走出展示空想的困境。”（Ricœur 1981，第15页）

将其用作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可以顾及到，被理解的对象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为某种被展示物：拟态的过程既可以出现在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对经验的加工、采访以及对已经文本化或可以文本化并因此可被社会科学所用的世界版本的建构中，也可以出现在基于科研目的的文本生成中。在拟态的过程中，世界的不同版本得到生成，这些版本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理解和诠释（应用实例请参见 Flick 1996）。

Ricœur 所区分的拟态的不同形式以及 Schütz 所区分的日常建构与科学建构，可以进一步完善 Goodman 所提出的关于世界的不同版本的理论框架，这些不同版本是通过日常的、艺术的和科学的建构形式而生成的。这样，人们就可以避免有关展示的空想和危机，即在思考展示时没有考虑到展示（更准确地说是叙述）过程中以及理解过程中存在的建构性的成分。

案例 科技和自我之社会建构中的拟态

以下研究的内容关涉到科技转变的社会展示，科技是如何变成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以及科技是如何改变日常生活的（参见 Flick 1996）。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不同的职业群体（信息工程师、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教师），他们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法国、东德、西德）。研究者请被调查者根据回忆讲述他们第一次接触科技的情形。这些生活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对事件的描述，而且也同时表明了，讲述者如何从科技的角度看待他们自己。从这些讲述的故事中，人们可以鉴别出对现实、自我和科技建构的拟态过程。比如说，信息工程师讲述的故事内容表明他们在使用科技器物时**成功地行动**（例如修理好了一个坏掉的音响设备）或者是他们**积极地应用**科技机器（比如在小时候操控机动的游戏车）。与此相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故事内容是**使用设备方面的失败经验**，玩玩具或者或多或少的**消极的经历**。最后，教师讲述的内容是，他们是如何**观察**到了其**亲戚朋友**对科技设备的使用（例如祖父在砍木头，或者叔叔在使用圆锯劳作）。在所有的被调查群体中，人们都可以发现他们对有关科技在其家庭中之角色的叙述。信息工程师在讲述时会和他们对某一技术性职业的选择联系起来，而在其他两个群体中，后果则是恰恰相反。比如，一个女信息科学工作者讲述的内容是，她是如何选择了她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她是如何在此违抗了她父亲的意愿，如何克服了家庭中存在的对于科技相当敌对的态度。一个教师讲述的内容是，他父亲期望他从事科技性职业，而他则不得不令其父亲失望。

来自西德的被调查者有一些共同的讲述主题，这些主题可以按照**使用科技的行为** *vs.* **对使用科技行为的观察**这一维度排列。而来自东德的被调查者的讲述主题则是在掌握科技和失败这一维度上移动，并且围绕着**技术和家庭**这一背景。与他们相似，来自法国的被调查者讲述的故事也可以被归入**成功** *vs.* **失败**这一维度。

如果要在描述有关物体、社会进程和经历的社会建构时使用拟态的方法，研究者可以观察一下，当被调查者被要求讲述时，他们讲述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要他们讲述他们与科技的第一次接触时。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讲述中，被建构出来的是有关接触的哪一个版本？这一经历被置于了何种情境之中？在这里被调查者提到了哪些类型的社会进程，或者说他们要通过这一人与科技的接触向研究者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解释清楚哪些社会进程？

联系到上面谈到的叙事，拟态的内容一方面表现在受访者对自己与科技之关系的回顾诠释方面，他们将自己与科技的关系诠释为积极改造性的、成功行动性的或者是失败性的。另一方面，受

访者与自己家庭的关系也得到了诠释并被用来重构自己与科技的接触及当时的情境。科技在这里成为一种诠释性工具，被用来理解自己的自我形象（赞成或反对科技）以及特定的社会关系（自己的家庭背景）并就此进行沟通。乍看起来，这似乎显得有些来回绕圈子。不过，正确的做法是将其看成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情境被用来将物体或经历置于其间，而物体或经历则被用来（更好地）理解这些情境。两者，即自我形象和社会关系，成为理解自己与科技之关系的工具——至少在第一次与科技的接触情境中是这样的。科技被用作一种工具来理解自己经历和社会联系某个部分，而自己的经历和社会联系则被用来诠释自己与科技的接触。

拟态性诠释是交互的：一方面，将与科技相关的经历置入社会情境和与自我有关的情境阐明了有关科技作为社会现象的主观建构；另一方面，科技被用来对社会经历和传记经历作出诠释和定位（按照 Ricœur 的分类属于是拟态$_1$）。科技在这里是一个主题或者媒介，通过它社会情境得以在回忆中被再现出来。情境是出发点，由此出发通过回忆将科技现象的一些新的角度固定下来。在这种回忆性固定中，以及在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背景之间的社会分布和区分中，有关科技的社会展示清楚地显露出来。

作为一个认知原则，质性研究的不同方法都是以对主观见解或社会情境的理解作为切入点。因此，质性研究在它的"研究对象"这里便已遇到建构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在叙事中，还是在由此生成的社会科学文本中，经验都并非简单如照相一般地被描画出来。有关在叙事、研究和文本中准确描画现实的观念，仍然深处危机之中。人们可以用 Ricœur 提出的拟态的多级循环来取代这一陷入危机的观念，从而可以顾及到参与到学术理解活动中的人们的建构，包括被调查者、以他们为内容的文本的撰写者以及文本的阅读者的建构。在质性研究中，日常理解和学术理解的区别在于研究过程之中的方法操作。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本书将会更加详尽地分析这一问题。

要　点

- 多数质性研究都是以文本作为分析的基本资料。
- 在研究过程中生成文本是有关现实的社会建构的一个特例。
- 世界生成和拟态是用来描述有关文本和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两种方案。
- Ricœur 提出的、有关三种拟态形式的模型描绘了社会建构过程的步骤。
- 传记叙事是这类建构的一个例子，拟态在此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练习 7.1

1. 请您以传记访谈为例解释一级建构和二级建构之间的区别。
2. 请您就同一个例子描述一下拟态的三种形式。

拓展阅读

Flick, U. (1996). Psychologie des technisierten Alltag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Gebauer, G./Wulf, C. (1992). Minesis: Kultur, Kunst, Gesellschaft. Reinbek: Rowohlt.
Goodman, N. (1984). Weisen der Welterzeugung. Frankfurt: Suhrkamp.
Ricœur, P. (1988). Zeit und Erzählung (Bd. I). München: Fink.
Schütz, A. (1971).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Den Haag: Nijhoff.

第三部分　研究设计

第三部分介绍的是研究过程的不同步骤,这些不同步骤可被概括在“研究设计的规划和构思”这一关键词之下。在这里,本书首先分析的是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在此之后的部分,本书才会去阐述严格意义上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在这一部分中,本书首先对比分析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研究过程的不同模型(第8章)。之后,本书阐明了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在实践中的问题(第9章)。正如人们接下来应该明白的那样,进入研究实地并不是一个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本书第10章概述了这一步骤中的问题和策略。质性研究中的抽样不同于定量研究中常用的抽样方法。本书第11章讨论了质性研究抽样的各种模型和问题。第12章总结了有关研究设计的讨论,为研究过程中接下来的那些步骤做好了准备,即接近被研究者、进入研究实地、收集资料。

质性研究过程 8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知道质性研究的研究过程往往并不像定量研究的研究过程那样有着明确隔开的步骤。
- 更好地了解理论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 结合案例理解质性研究中理论的运用和研究过程本身这两者是如何运作的。

对质性研究的理解不能化约为它采用某些特定的方法而不采用其他的方法。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不是一对不可协调的、不能被相互结合使用的矛盾和对立（见第3章）。本书在这里无意再度展开有关原则问题的那些旧有的、无益的方法论争。不过，质性研究对于研究确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对研究方法的选择，比如说在叙事访谈和问卷调查这两种方法之间做出选择。质性研究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有其特定的理解（参见Becker 1996）。此外，质性研究与我们所熟悉的源自定量研究或实验研究的研究逻辑的兼容性是非常有限的。在后一种类型的研究中，研究过程能够按照概念的、方法的和经验的步骤以线性的次序依次展开。各个步骤可以相互独立地先后得以开展。而在质性研究领域，研究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相互依附的，研究者应该考虑到它们之间的这种互依性。这一理解在扎根理论那里得到了最清晰的发展，有关该理论的重要文献有：Glaser/Strauss（1967/1998），Strauss/Corbin（1990/1996）和Strauss（1991）。

线形研究过程

与质性研究不同的是，传统的定量社会科学以构建模型为研究的起点：研究者在进入所要研究的领域之前，便已“在书桌前”构建出一个有关假想条件与关系的模型。研究者的出发点是从文献或先前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理论知识。研

究者从这些理论知识中推导出研究假设,然后对研究假设进行可操作化处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的或实证的研究"对象"——如研究者访谈或观察的某个领域或者某些具体的人——在研究中具有一种样本的地位,研究者会在这些样本的身上检验他所猜测的普遍关系(以研究假设的形式)。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是研究者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应该通过对调查对象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得到保证。在研究中,重要的是要将复杂的关系分解为可相互区分开的变量,以便研究者可以单独地检验它们的影响。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理论和方法在这里具有优先性。通过这种方式,理论得到检验,有时也会被证伪。对现有理论的补充和扩展,需要通过补充额外的假设,而且这些假设还需要得到实证的检验。

扎根理论对过程的理解

与以上这种线形研究过程不同,扎根理论优先考虑的是数据资料和研究实地,而非理论假设。理论假设不应该被运用于所研究的对象,而是应该通过对研究实地以及所收集的实证资料的分析而被"发现"并作为研究结果提出。选择被调查对象的标准是他们对于研究主题的重要意义,而非代表性。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将问题分解成变量从而降低其复杂性,而是为了通过引入情境背景来提高其复杂性。研究方法必须要适合研究对象,并且根据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方法。作为这一观点之基础的理论与实证的关系可以被概述如下:"开放性原则意味着,在研究对象的结构显现出来之前,研究者不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结构化处理。"(Hoffmann-Riem 1980,第 343 页)。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至少要悬置其带入研究实地的先验的理论知识。不过,与广泛存在的误解所不同的是,这一要求主要适用于研究假设的提出,而对研究问题的决定则较少受此要求的限定(参见下章):"推迟结构化意味着放弃预先提出研究假设的做法。虽然说要从理论方面对研究问题进行阐述(……),不过,对研究问题的阐述并非要以(……)最终提出研究假设作为其最高目的。"(Hoffmann-Riem 1980,第 345 页)

这种对质性社会研究的理解意味着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特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其他的语境下也被称作"均衡悬浮的关注"。在 Freud(1912,第 377 页)看来,这样做可以避免以下提到的问题:

> 一旦人们有意识地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开始对眼前的材料进行选择。他会清晰地聚焦于其中的某一部分,并排除掉其他的部分,在这一选择中,他所听从的是他的期待或者他的倾向。而这正是人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人们在选择中听从自己的期待,就会面临以下的危险,即他有可能会除了发现自己的已知之外,发现不了其他别的知识;如果人们遵循自己的倾向,那么,他肯定会去伪饰可能感知的内容。

将以上考虑应用于质性研究,就意味着,研究者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结构会将他的注意力引向某些具体的问题,同时研究者会因为自身的恐惧而看不到研究实地中或研究者的问题。这会使研究者及其研究丧失获得真正"全新"发现的机会。

扎根理论的过程模型主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理论抽样（参见第 11 章）、理论编码（参见第 23 章）和理论的撰写（参见第 30 章）。不管研究资料是如何收集而来的，扎根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对研究资料的解释。资料收集在这里是次要的，至少就什么是合适的资料收集方法这一问题而言，是这样的。哪些资料需要得到分析，应该采用何种方法来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要作出有关这些问题的决定，需要看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对理论的发展已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Glaser 和 Strauss 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多个组成部分在质性研究的方法讨论和实际运用中得到了独立的应用。理论抽样被当作一种逐步抽样策略得到了应用，不过，研究者所用的资料分析的方法却不同于 Glaser 和 Strauss 所建议的方法，而且研究的目的可能也并不是要发展理论。理论编码作为一种文本分析方法也得到了独立的使用。此外，通过分析实证材料来发展理论的思想也成为质性研究讨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对理论的发展却也并不一定非要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人们在独立使用扎根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时常常忽视将这些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逻辑。在扎根理论中，抽样的选择是和资料收集以及对所收集资料的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理论抽样作为一种抽样策略只有在符合以下情况时才是合适的，即并非是在所有的访谈都结束之后才开始对资料进行诠释。确切地说，对所收集的资料马上进行分析是作出下一步样本选择的基础。样本选择并不局限于案例的选择，它还包括对下一步所要分析的资料类型的选择，在极端的情况下，它还包括研究方法的改变。

研究过程的线形与环形

以上谈到的扎根理论中部分研究过程的这种环形性（Zirkularität）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环形性推动了许多以案例分析作为研究起点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例如 Hildenbrand 1995，1999；Kraimer 2000；Ragin/Becker 1992）。不过，如果人们将通用的线形研究模型（理论——假设——操作化——抽样——收集资料——分析资料——验证假设）当作科研评价的标准时，这种环形研究过程就会出现问题。通常来说，它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问题：在申请科研课题时以及运用传统的质量指标来评价其研究结果时（参见第 28 章）。

不过，扎根理论的优点也正是在于这一研究过程的环形性。这是因为这种环形性——至少是在它得到正确使用的情况下——迫使研究者不断反思整个研究活动，并且在考虑特定研究步骤时能兼顾到其他的研究步骤。通过将资料收集、资料分析与实证资料选择啮合起来，研究者不仅会不断地提出以下的问题，而且与传统的线形研究模式相比，也更容易对以下的问题做出回答，即研究使用的方法、范畴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适合研究对象和资料？

研究过程中的理论作为世界的版本

那么,在以 Glaser 和 Strauss 所提出的扎根理论为取向的研究过程中,理论[①]的功能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做出回答。第一个出发点是 Goodman(1984)对理论的理解,即理论——与其他对实证关系的表述形态一样——乃是世界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会不断地得到修订、验证、建构和再建构。根据这种理解,理论并不是对既有事实的(或正确或错误的)描绘,而是洞察世界的各种版本或者视角。藉由某一版本的表述以及那潜藏于其中的观察世界的视角,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受到了影响。而这种感知世界的特定方式又进而影响到对这种视角以及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社会建构(参见第 7 章)。这样一来,理论作为世界的版本便具有了相对性和暂时性的特点。通过版本的更新和发展(例如通过对新材料的补充解释),理论将会更好地扎根于所研究的对象。因此,Glaser 和 Strauss 所提出的扎根理论成为一种工具,用来提出和修改扎根于实证资料的有关世界的版本。在这里,研究过程并非是作为一张白板而开始的。确切地说,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研究对象或领域的一种预先理解(Vor-Verständnis)。

与此相应,用来确定理论在扎根理论模型中作用的第二个出发点是 Kleining(1982,第 231 页)针对质性研究所提出的"第一规则":"有关所研究对象的预先理解应该被视为是暂时的,并且应该通过新的、与其不一致的信息得到摒弃和超越。"

理论性预先假设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作为有关研究对象的暂时的理解版本和视角发挥作用的。这种暂时的版本将会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修改,并且——最重要的是——得到更加详细的阐述。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对版本进行修改推进了对研究对象的建构。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决定,正如 Glaser 和 Strauss 在其理论模型中所设计的那样,有助于促进这一建构。

案例 与垂死之人的交往

下面的例子是质性研究领域中按照上述对研究过程的理解所做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理论。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auss(1965a/1974)是这项研究的作者,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周围的几家医院进行了他们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影响着人们与垂死之人的互动以及知道一个人很快将要死去的信息是如何影响到人们与垂死之人的互动的。具体地说,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在垂死之人与医院里医护人员之间、医护人员与病人亲属之间以及亲属们和垂死病人之间,存在着哪些互动形式。

---

① 在这里,理论(Theorien)指的是有关研究对象的假设。不过,在第 6 章中所提到的"理论流派"(Theoretische Positionen)指的则是有关研究形式和目的的各种不同的观点。

在开始时,当研究者的亲属住院时,研究者观察到,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在面对身患绝症的病人时并没有将他们的病情和预期寿命告诉患者和他的亲属。确切地说,这个病人可能将要死去的消息是被当作一种禁忌来处理的。这个一般性的观察以及它所引发的问题成为了首先在一个医院中进行一项系统性观察和访谈的起点。在这里收集的资料得到了分析并被用来提出范畴(参见第23章的介绍)。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决定在另一所医院继续开展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研究者随即对作为案例的这两所医院的共性和区别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的结果被用来决定下一个调查的该是哪家医院。最终这项研究共调查了六家医院。这六家医院包括一家教学型医院,一家退伍军人医院,两个地区医院,一家私立的天主教医院和一家国立医院。病房包括老年病房、肿瘤病房、特护病房、儿科病房和神经外科病房等。研究者在每个病房都待了四周①。研究者对照和比较了来自每个单元的资料(同一医院的不同病房,不同医院里的类似病房,不同医院之间),以查明其相同之处和区别。在研究的最后,存在于医院和医疗系统之外的可供比较的情况和情境作为另外一个比较维度被纳入了分析。

研究者根据对资料的分析和比较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之后被用于其他的领域,以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提出了一个有关情境意识的理论,其内容是人们对待有关死亡和疾病的信息的方式以及对待患者想要更多地了解其状况的需求的方式。第23章将会介绍有关该研究结果的细节和分析资料的方法。

这一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表明,本章所讨论的研究过程是如何得到展开的,以从一系列案例研究和对案例的比较之中发展出具有理论意义的认知(相关细节请参见Glaser/Strauss 1965a/1974)。理论在这里自然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那时尚没有相关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研究者在开始时与其亲戚在医院里的经历。理论是从实证数据以及从对实证数据的分析之中发展来的,它是研究的最终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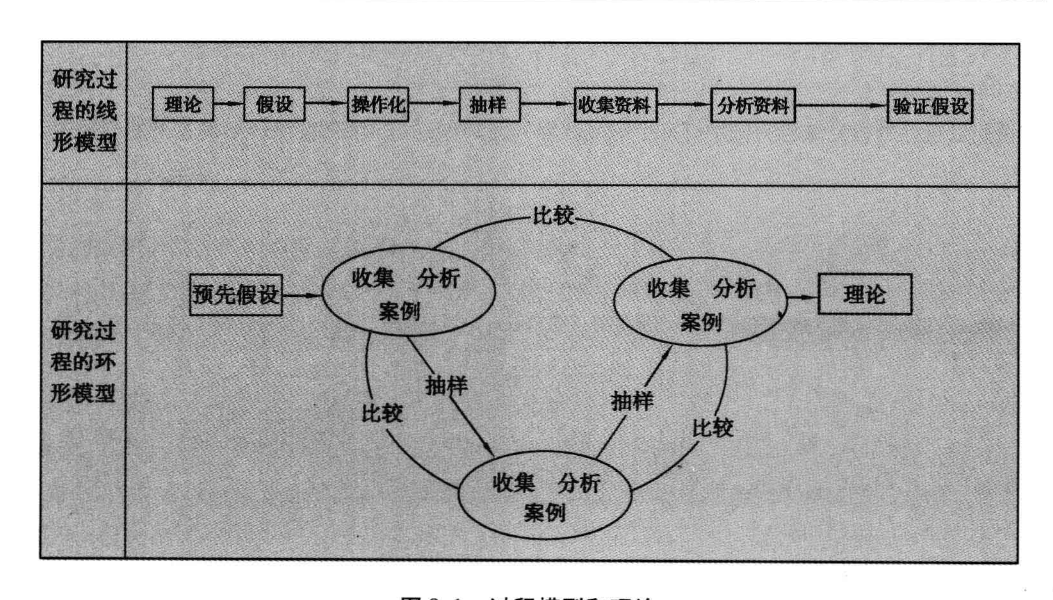


图8.1 过程模型和理论

---

① 在本书的英文版中,使用了2到4周的表述。——译者注

质性研究只是在有限的方面合乎传统的线性研究逻辑。循环性地连接实证研究的各个步骤，正如 Glaser 和 Strauss 在其模型中所建议的那样（见图 8.1），实际上更适合质性研究的探索性本质。当这一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理论抽样——被从整体中拿出单独使用时，研究者应当考虑到这一过程模型的前后联系。通过这种对过程的理解，"理解"（Verstehen）这一认知原则可以以更大的敏觉力被应用于研究者想要理解的主体或领域。通过结合资料的收集和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做出的选择其他案例的决定，研究者可以比在线形研究设计之下更好地保证作为质性研究基础的案例相关性（Fallbezug）。通过将理论的作用定位于有待修改的有关研究对象的版本，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建构现实的特征。通过赋予资料解释（相对于资料收集或者预先提出一个详尽的研究设计而言）以重要角色，研究者可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原始的实证资料是理论最终赖以发展的文本。

要 点

- 质性研究的研究过程往往很难被划分为明确区分开的阶段。确切地说，也只有当研究过程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实施中在时间上被啮合在一起时，质性研究才会发挥出它的优势。
- 这种理解最初源自于扎根理论研究，不过，对于其他方法而言，这一理解也是有益的。
- 在这里，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世界的版本，它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变和进一步的发展。

练习 8.1

1. 请您选择一项质性研究并指出这项研究中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
2. 看看这项研究规划是更加符合研究的线性模型呢，还是更加符合研究的环形模型？

练习 8.2

1. 请您以自己的研究课题为例制订一个研究计划；请您考虑一下，如何按照环形模式来进行规划。

拓展阅读

Becker, H. S. (1996). The Epistem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R. Jessor, A. Colby/R. A. Shweder (Eds.).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53-72.

Glaser, B. G./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t.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Bern: Huber 1998).

Strauss, A. L. (1987).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 München: Fink.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问题 9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理解为何提出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对于一项研究的成功开展十分重要。
- 知道为何悉心提出研究问题并确定问题的焦点是至关重要的。
- 明白研究问题具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您应该从中为您自己的研究选择一种合适的类型。

质性研究的成功在本质上取决于一个核心的关键步骤，那就是研究问题的提出。这一点在当前有关研究方法的论述中常常被人忽略。[①] 研究问题的提出并非只是出现在研究过程之初，即当你设计你的研究项目时，而是存在于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当你构思研究设计时，当你进入研究实地时，当你选择案例和收集资料时。特别是当你在决定收集资料的方法时，当你在制订访谈提纲时，以及当你就所采用的方法和所选择的资料来设计你的解释时，反思并且重新提出研究问题是判断你在各个环节中所作决定之适合性的核心参照点。研究问题应该力求具体化，以明确与研究实地的接触想要探明的究竟是什么。你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越不明确，你就越有可能在最后面对如山的资料却彷徨无助地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它们（参见 Südmersen 1983）。虽然说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质性研究的“开放性原则”指出了先验地提出研究假设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人们应该放弃研究问题的确定与提出。重要的是，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自己的研究问题形成清晰的想法，另一方面也要对新颖的和可能会让人吃惊的研究发现保持开放性。有关研究问题的清晰构想对于从以下方面来判断方法之适合性也是必要的：何种方法对于研究问题的回答是必需的？所选用的方法适合用来研究这一问题吗？质性研究是解答研究问题的恰当策略吗？[②] 通常来说，研究问题在研究

---

① 几乎没有一本参考书为这一专题独辟一章。在多数文章索引中，想要找到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是徒劳的。例外的情况见诸 Strauss（1987，第 50 页）以及 Strauss/Corbin（1990/1996，第 21-24 页）。

② 如果一项研究的研究问题隐含或者明确地以确定某种现象出现的频率为目的，那么定量研究方法不仅更加适宜，而且通常来说，运用起来也更为简便。

过程中的位置可以通过下图来说明(参见图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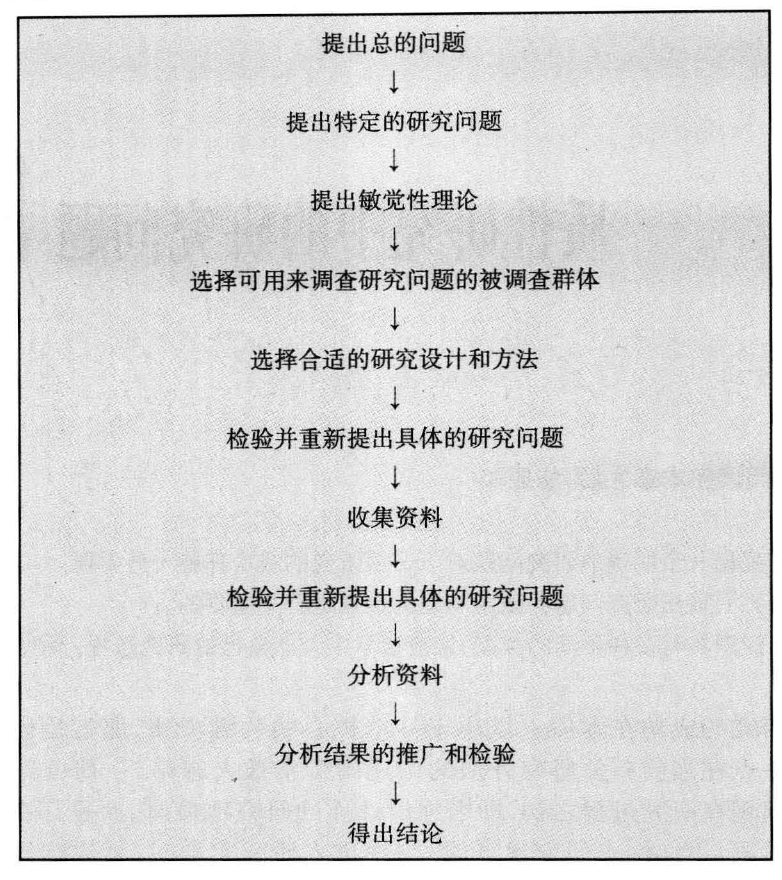


图9.1 研究过程中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的裁定

研究问题并非从天而降。在很多情况下,研究问题源自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及其社会背景。对于特定问题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实际兴趣及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日常的和科学的情境均会在此发挥作用。近年来有关科研进程的研究已经表明,无论是在自然科学实验室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工作团队中,思维传统和思维风格(Fleck 1935)对于研究问题的提出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的概览请参见 Knorr-Cetina 1984, Knorr-Cetina/Mulkay 1983)。

与对某个具体问题的选择相关的是对多样性的**消减**和对所研究领域的结构化:特定的方面被视为是重要的,其他的方面则被视为不那么重要而(至少在当前)被放在后面或者被排除掉。例如,在资料收集方面,当你选择使用单次访谈设计时,以上选择就尤为重要了(参见第13、14、15章)。不过,如果你是在持续性过程之中来收集资料,例如通过参与式观察(参见第17章)或者多次性访谈,

你可以更为容易地修正选择的后果。

确定问题领域与界定研究主题

从一个或多或少复杂的研究领域中可以界定出许多问题领域,而提出研究问题的效果则是:它可以帮助你从中界定出一个特定的、你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问题领域。例如,研究"咨询"时,有如下的问题领域可供选择:

- 咨询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互动过程。
- 以对当事人管理的组织作为"案例"。
- 对一种特定的专业身份的组织与维持(例如在不利的情形下充当援助者)。
- 当事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表现形式。

所有这些都是构成某一个机构(如咨询服务、社会精神治疗服务)中日常生活复杂性的各个重要方面。就其中的每一个领域而言,研究者都可以开展一项研究,提出一个研究问题。首先,研究者可以走进一个复杂的(如制度化的)实地,以理解实地中的(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的观点(Bergold/Flick 1987)。其次,他可以将重点放在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描述之上(如 Hitzler/Eberle 2000)。再次,他可以致力于重构和再现主观的(Holzkamp 1986)或客观的(如 Oevermann 1983)行为动机并由此解释人们的行为。最后,他也可以关注对于行为环境的主观解释及其可被客观描述的结构特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质性研究的框架内,要将这许多不同的方面全都纳入研究,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意义和可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所选定的问题领域和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要可以在既有的资源条件下得以实现,而且它们要构成一个内在协调的研究设计。这也意味着,在提出研究问题时,要避免隐含地连带提出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研究问题就不能够针对实证行动提供它应当提供的导向,反而造成混乱。

关键概念和视角的多元结合

研究者在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哪些方面应该被纳入分析(如那些本质性的方面、可分析的方面、重要的视角等),而哪些方面则需要被排除在外(那些次要的、不那么重要的方面等)。研究者应该如何进行抉择才能尽可能地减少"磨损"(Reibungsverlust),令对某些方面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可靠性的损失保持在一个有限的和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呢?

一方面,关键概念(Schlüsselkonzept)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因为它们可以让研究者尽可能广泛地获得有关研究实地中的许多相关进程的了解。Glaser/Strauss 将这些关键概念称为"分析性和敏觉性的概念"(1967/1998,第 38 页)。例如,在研究日常的制度化咨询时,"信任"这一概念被证明是有益的。比如说,

这一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咨询师和当事人互动的各个方面,也可以将其用于研究咨询师的任务,当事人对咨询机构的印象及其对咨询师能力的感知,以及如何将一个对话变成咨询的问题等(Flick 1989)。

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通过系统的视角多元结合的方法来减少在选择研究视角时出现的损失(参见 Flick 2007b)。这里的意思是说,研究者应将那些适合用来分析某一个问题的尽可能多的不同方面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目的地结合起来:例如将对某个行为主体之观点的理解与对他所处的生活世界的描述结合起来。根据 Fielding/Fielding(1986, 第 34 页)的观点,研究者应该将一个问题的结构性方面与该问题对于参与者之意义的重构结合起来(参见第 29 章多元结合法)。在刚才提到的例子中,我通过结合以下两者做到了这一点:对咨询师关于信任的主观理论的重构和对在特定的"咨询"谈话中建立信任关系过程的描述。

如果所使用的关键概念能够让研究者获得对相关进程的了解,而且对所选出的视角的多元结合也确实能够让研究者发现研究问题的尽可能多的不同方面,那么,在接触案例和实地时,研究者贴近研究对象的程度就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这样做也确实有可能会开启新的认知空间。

总地来说,研究问题是构思研究设计的一个核心步骤。研究者要批判地审视研究问题的缘起(是什么引发了当前的这一研究问题?)。研究问题是检验研究设计之协调性和所使用的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之适合性的参照点。这也适用于对研究结果推广性的评价:何种程度的推广性是适当的和可实现的,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研究所遵循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的类型

研究问题有着不同的类型,它们可以在以下表格中找到各自的位置,该表格包括表 9.1 中所列出的组成部分(Lofland/Lofland 1984,第 94 页)。在这里,研究问题的类型也与 Strauss(1991,第 57 页)所提出的"编码范式"(Kodierparadigma)有关,该编码范式可以建议研究者应该针对所要解释的文本(详见第 23 章)提出何种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研究问题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描述状态为目标,另一类则以描述过程为目标(参见 Bude 1995b)。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者描述的是一种既定的状态(哪种类型、什么频率)是如何形成的(原因、策略),以及这一状态如何得以维持(结构)。在第二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描述某物是如何发展或变化的(原因、过程、后果、策略)。作为研究问题的两种主要类型,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也可以被应用于表 9.1 左栏所列举的复杂度逐渐增加的各个分析"单位"(Lofland/Lofland 1984)。这一格式既可以被用来将研究问题定位于这一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空间,也可以被用来检查所选定的研究问题所包含的额外的问题。

表 9.1 研究问题的类型

问 题	1. 哪种类型?	2. 哪种结构?	3. 什么频率?	4. 哪些原因?	5. 哪些过程?	6. 什么后果?	7. 当事人的策略?
分析单位							
意 义							
行 动							
事 件							
接 触							
角 色							
关 系							
群 体							
组 织							
住宅区							
社会世界							
生活风格							

最后,人们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审视研究问题或者对其进行分类,即研究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适于用来证实现有的猜想(假设),或者研究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旨在发现新知,或者至少允许新知的发现。Strauss 将后者称为"生成性问题",并对其做出如下界定:"可将研究路线引向有益方向的那些问题;它们导向假设、有益的比较和对特定类型资料的收集,甚至能引起人们对于潜在的重要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探究。"(1991, 第 50 页)

案例 医生和护理人员对公共健康取向的接受

在这一项目中(Flick et al. 2004),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几个提供家庭健康服务的重点机构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一种公共健康取向(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不过,这个问题尚不是开始实证研究所需要的真正的研究问题。这一相对宽泛的研究兴趣必须被引向一个角度更加集中的焦点。与此相应地,我们首先提出的研究问题是:门诊服务中的家庭医生和护理人员所持有的健康观念是什么。第二个研究问题关注的是他们对于作为其工作一部分的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的态度,

具体地说,是他们在和老年人工作中所持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用于访谈的问题:

- 医生和护理人员所持的健康概念是什么?
- 哪些健康观念维度对于专业性服务工作是重要的?
- 这些专业人员在工作中对于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的态度是什么?
- 在门诊服务中,医生和护理人员所持的有关“变老”和高龄的健康概念是什么?这些概念与那些一般的健康概念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 医生和护理人员如何看待自己主观的健康概念对于专业性行动的意义?
- 医疗卫生事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会针对特定的患者群体(如老年人)形成适合他们的、特定的健康观念,例如有关相对健康的观念?

以上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发展对医生和护理人员进行事件访谈(参见第 14 章)所用的访谈提纲的出发点。

研究问题就像是通往研究实地的那扇门。研究问题的提出决定着实证研究能否提供研究问题的答案。同样,哪些方法是合适的以及谁(哪些人、群体或机构)或者什么(哪种过程、行动方式、生活方式)应该被纳入研究,也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提出。评价研究问题的基本标准是其协调性和清晰性,也包括它们在既定的框架及有限的资源条件(时间、金钱等)下是否可被解答。

要　点

- 提出一个清晰的研究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 多数研究主题可以被分解为若干个不同的研究问题。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决定,哪个或哪些问题应当首先得到研究。
- 研究问题会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得到细化,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被重新表述。

练习 9.1

1. 请您找出一项已发表的质性研究,并试着找出指导该研究的研究问题。
2. 请您评价一下这一研究问题:问题的表述是清晰而明确的吗?
3. 如有可能,请您为该项研究提出一个更加合适的研究问题。

练习 9.2

1. 请您决定您想要研究的主题,然后就此提出不同的研究问题。
2. 请您决定您想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其中的哪个问题。
3. 请您不断精炼这一研究问题,直到它成为一个您可以通过研究解答的问题。

拓展阅读

Fielding, N. G. /Fielding, J. L. (1986). Linking Data. Beverly Hills: SAGE.

Flick, U. (2007d). Triangulation—eine Einführung (2. Auflage). Wiesbaden: VS-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Lofland, J.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2 nd edn). Belmont: Wadsworth.

Strauss, A. L. (1991).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 München: Fink.

10 进入实地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对研究过程中这一关键步骤有了更高的敏感性。
- 理解您作为一名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在研究实地中进行自我定位。
- 了解被调查机构与研究者打交道的几个策略，以便在必要时"绕过"它们。
- 认清陌生与熟悉在这里的辩证关系。

质性研究的期待与进入问题

与定量研究相比，如何进入研究实地的问题在质性研究中显得更为重要。在这里，研究者所寻求的接触更加紧密和深入，这一点可以从对现有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分析中看明：例如，开放性访谈要求被研究者和研究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而这在回答问卷时则不是必需的。对日常谈话的记录要求被调查者在一种事先难以一眼看明的程度上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展示出来。从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者通常来说要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呆在研究实地。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样做能使研究更加切合它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从生活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也对被调查者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以下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即如何找到进入研究实地，特别是接近研究实地中的被调查者及活动进程的通道。"实地"(Feld)这个普通用语在这里表示的可以是某个特定的机构、某种亚文化、某个家庭、具有某种"生涯经历"(Schütze 1983)的特殊群体或者某个特定的行政部门或企业的决策者群体，等等。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中，研究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赢得潜在的被研究者的合作？如何既获得人们愿意参加研究的口头表示，又能将这一意愿导向具体的访谈或其他资料？

进入开放性研究实地时的角色定位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作为个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研究者以其沟通能力成为调查和认知的主要工具。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在实地研究、在与被调查者或被观察者交往的过程中,不能扮演一个"中性"的角色。相反,研究者应当在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占据特定的位置,或者研究者将会被赋予某种角色或位置(有时是受人指定,且可能并非自愿)。这一角色和位置的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研究者可以获得哪些信息,而哪些信息则是研究者所不能得到的。主动扮演一个角色或被人分配一种角色可以被视为是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一种协商过程,这一过程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在这里,"参与者"是指那些最终应该被访问或观察的人。在针对机构的研究中,它也包括那些批准及促成进入研究实地的人。人们对于协商和分配研究者角色的互动性过程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增加,这一点可以从人们用来描述研究者的隐喻中看出。

Adler/Adler(1987,第 33 页)以实地研究中的参与式观察为例(参见第 17 章),提出了一个有关研究实地中成员身份角色的体系(见图 10.1)。在这一体系中,他们分析了在质性研究历史上不同学派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在体系的一极,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参见第 2 章)。他们的处理方法是:研究者对实地成员进行纯粹观察,与实地成员公开地、有目的地互动以及积极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以保持必要距离为题讨论了参与和观察之间的困境(对于好的观察而言,什么程度的参与是必要的;在保持科学距离的情况下,何种程度的参与是允许的?)。在这个体系的中间位置,是 Douglas(1976)的"存在主义社会学"。这里的处理方式是:研究者倾向于采取参加者的角色,以揭露实地中的秘密。在体系的另一极,是新近的常人方法论(参见第 6 章)。这里的处理方式是:研究者完全浸入所要观察的活动进程之中,获得实地成员的身份,以便从参与者的视角来描述所研究的进程。

在 Adler/Adler 看来,芝加哥学派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太过专注于与研究"对象"保持科学的距离。而对于常人方法论和存在主义社会学这两个学派的处理方式,Adler/Adler 提出的批评是:他们都是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完全融合实现"进入"的。他们认为自己提出的有关成员身份角色的方案是对上述两极对立的处理方式的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他们在其方案中提出了"边缘成员、活跃成员、完全成员"的类型。在调查棘手的实地时(例如在他们自己对毒品交易的研究中),他们建议结合使用公开的与隐藏的角色。这意味着,在实地中,他们并不向所有的成员表明自己真正的角色(即,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以便获得尽可能开放的洞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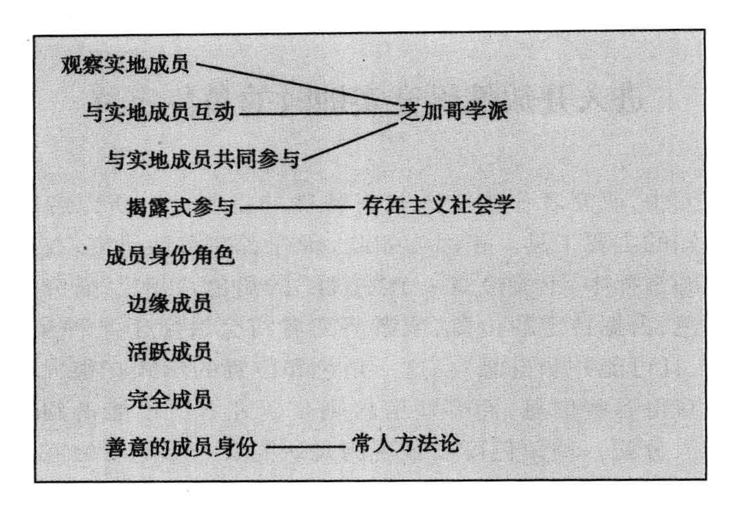


图 10.1　实地中的成员身份(Adler/Adler 1987,第 33 页)

进入机构

当你要在机构(如咨询机构)中开展研究时,进入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多个不同的层面参与到对"进入"的协调之中:一方面是决策者层面,他们负责批准研究,并且在出现问题时,要对外承担批准此项研究的后果;另一方面是被访谈或被观察者的层面,他们要愿意参加研究并为此挤出时间。在一项对行政部门的研究中,Lau/Wolff(1983,第 419 页)介绍了带着特定研究兴趣的研究者是如何被一个类似社会行政部门的机构定义为当事人的。研究者要像当事人一样正式提出他的请求。这一请求及与此相关的事项(研究问题、方法、所需时间)将和研究者本人一起"接受官方检查"。在研究者是被其他部门派遣而来的情况下,对他这一申请的处理也就被"事先规定"了。这一方面意味着,上级部门对研究申请的批准或支持可能会在被调查者这里首先招致怀疑(为什么上级部门想要这项研究?)。另一方面,被其他人(如其他机构的同事)介绍而来的事实也可能会为进入研究实地带来便利。无论如何,研究者的申请可以让他被纳入行政管理的惯常程序,让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惯常程序来和研究者打交道。这一过程被 Lau/Wolff 称作"沟通工作",它是一种"合作产品,在有些情况下对双方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的工作问题"。在这里,一个重要的步骤首先是在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协商共同的语言规则**。对这一进入过程及其失败的分析(参见 Kroner/Wolff 1986)可以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即通过"真正的"当事人)揭示出研究实地中的重要的协商过程和惯例化过程。

Wolff(1993,2000b)对进入机构式研究实地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总结:

1. 研究总是对某种社会系统的干预。
2. 研究是对被研究系统的一种干扰因素,因而常导致防御性反应。

3. 研究项目和被研究的社会系统之间互不透明。
4. 在进入研究实地时交换大量信息并不能减少这种不透明。相反,它会导致沟通过程中复杂性的提高,还可能引发更多的“防疫性反应”。双方都会形成错误的想象,更多的信息交流还会“滋养”这些错误的想象。
5. 研究者须将理解当作一个进程去追求,而不要期待在进入的那一刻就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
6. 数据保密是必要的,但也可能增加沟通理解过程的复杂性。
7. 在研究者带着研究课题进入研究实地时,研究实地会重新发现自己,比如,一个社会系统的局限性就会被发现。
8. 研究课题并不能给社会系统提供什么,它最多只是实用性的。研究者应当注意不要向被调查的社会系统承诺研究对它的益处。
9. 社会系统没有真正的理由拒绝研究。

以上九点内容已经包含了有关研究意义和必要性的沟通可能会失败的不同原因。一方面,研究申请对于被研究的机构来说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研究作为一种干扰因素会打乱机构的日常运行,却不能够给该机构及其成员带来任何显而易见的短期或者长期回报。另一方面,研究对于被研究机构而言是一种不安因素,因为机构本身活动的局限性可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研究的最终动机对于该机构而言始终都是不完全明了的,也因为机构没有合适的理由拒绝研究请求。因此,如果要阻止这项研究,机构就必须发明一些理由或找到一些借口。这也正是沟通进程中所出现的非理性现象的原因。说到底,提供更多的有关研究的背景和目的、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带来更高的清晰度,恰恰相反,这样做不但不能促进理解,反而有时会令对方更加困惑。这说明针对进入机构而进行的协商,与其说是一个信息问题,倒不如说是一种建立信任关系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研究者要尽可能多地赢得被研究机构对研究者本人及其研究的信任,以便让该机构可以抛开那些保留意见来参与这项研究。这里可以肯定的是,研究者和被研究机构之间在兴趣和观察角度上的分歧是难以消除的。不过,如果研究者能赢得参与者与机构的足够信任,就能将这一分歧减小到最低的程度,构建一个能够使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工作同盟。

接近个人

通常来说,研究者一旦进入了研究实地或者一个机构,他就会面临以下的问题,即他如何接近那些他特别感兴趣的、想要研究的人(参见第 11 章)。例如,当研究者想要研究咨询过程时,他如何让那些有相关咨询经验和能力的人来参加研究,而不只是让那些尚没有被允许参加相关咨询事务的、因此也有空闲时间的实习生来参加研究?研究者如何走近某一事件的中心人物,而非仅仅接触次要人物?在这里,协商的过程、滚雪球的策略,特别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都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地中,特定的方法所引起的保留态度往往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所不同。

案例　对特定研究方法的保留态度

对于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保留态度可以从一项笔者对咨询中的信任问题(Flick 1989)的研究看出。这项研究采用了访谈法和谈话分析法。笔者向每个咨询师提出了两项请求:接受一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访谈,以及记录他们和当事人的一次或多次谈话(为此也征求了当事人的同意)。虽然咨询师总地来说同意参与研究,不过,事实表明,有几个咨询师对于访谈持有保留态度(时间耗费、对冒失问题的担心等),但是将对他们咨询谈话的记录视为是例行公事。其他的咨询师对接受采访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记录咨询谈话却表现出很强的保留态度,他们不愿意让研究者看到他们与其当事人的具体的工作。匿名性承诺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减少他们的这些保留态度。这个例子表明,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人那里分别会引起不同的问题、幻想和担心。

如果研究者想要接触的是处于某个机构或特定情境之中的人,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其参与意愿的问题。如果研究者想要接触的是单个的个体,那么,如何找到他们被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在研究中,当被调查者既非特定机构的员工或当事人,也不能在一个特定的居留场地被找到时,如何找到他们就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例如,如果要在一项生涯经历研究中就被调查者的职业生涯的经历和评价来采访退休后单身生活的男人,那么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以及在哪里找到这些访谈对象。在这里可以采用的策略有:利用媒体(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广播节目中播放启事),或在这类人群可能会出入的机构张贴通告(如国民高校、聚会点)。研究者找到访谈对象的另外一个途径是,按照滚雪球原则一个接一个地找。在开始时,研究者往往会选择熟人的熟人,通过这种办法研究者就可以找到来自更加广阔的生活圈的人。Hildenbrand(1995,第258页)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方法的以下问题:

>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如果研究者尽可能地去研究熟悉的内容(并相应地从自己的熟人圈子里面寻找案例),那么研究者会更容易进入研究实地。不过,与此相反的做法恰恰才是正确的:实地越陌生,研究者就越容易以陌生人的面貌出现,被研究者就可以向研究者讲述对他而言全新的东西。

陌生与熟悉

与寻求进入(人、机构或场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定的问题可以用研究者作为“专业陌生人”(Agar 1980)这一隐喻来说明。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在实地中找到导向和路径,这一必要性让他可以洞悉那些日常惯例和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日常惯例和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成员而言已经非常熟悉并且被他们

“毫无疑问地和肯定地”(Schütz 1971)惯例化了。行为主体已经不会再对这些日常惯例进行反思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明确地意识到它们了。在这里,认知潜力在于采取或维持(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一种外部视角——一种“对社会上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原则性怀疑的态度”(Hitzler 1988,第 19 页)。这种陌生人的身份可以——视研究策略的不同——进一步分为“访问者”(Besucher)和“倡议者”(Initiant)两种角色(见提示框 10.1)。在极端的情况下,“访问者”只是短暂地进入实地进行一次性采访,他在这里可以通过对上述日常惯例的询问获得认知。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逐步地放弃外部视角的过程以及从研究者主观的视角对这一过程的详尽的描述成为丰富的认知来源。因此,Lau/Wolff(1983)将进入研究实地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学习过程。

另一方面,对于作为陌生人的研究者而言,某些东西是不会让他知道的。在谈及社会团体时,Adler/Adler(1987,第 21 页)提到了“关于他们活动的两类现实:一种是展现给局外人的现实,另一种是保留给局内人的现实。”通常来说,质性研究不仅仅关注社会群体的外显现实。相反,人们“希望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或亚文化,并且尽可能地从他们自己的(支配其行为的)观念出发来理解它们”(Ward et al. 1982, 第 77 页)。在这种情境之下,研究者逐步采用内部视角去理解主体的观点或者透过成员的视角去理解社会团体的组织原则,便成为认知的源泉。这种策略的局限性在刚才提到的 Adler/Adler(1987)的研究实例(毒品交易)中变得重要:在这里,即便是研究者作为一个人已经融入了实地和群体,但仍有一部分现实会被隐瞒起来不让研究者知道。只有在研究者向群体中的特定成员隐藏其研究者身份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会接触到这部分现实。虽然说,担心泄露信息、担心被研究者受到第三方的恶性惩罚、与研究对象接触中的伦理问题在这里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不过,这些问题在任何研究中都是会出现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被研究者的信任和利益,如何保护资料,以及研究者如何对待他们自己的目的的问题。

提示框 10.1 实地中的角色

陌生人
访问者
倡议者
圈内人

案例 街角社会

以下例子出自质性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研究。该研究在一个特殊的研究实地中运用了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的方法(参见 17 章)。William F. Whyte 是质性研究的先驱之一。为了他那个经典的民族志研究,他在所研究的社会群体中生活了三年半。他研究的是 1940 年代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城市中的一个街头帮会。在自己观察和私人记录以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他勾勒出一幅广阔的、富有活力的当

地文化图景。通过一个重要人物的介绍,Whyte 进入了由意大利裔移民的第二代青年组成的团体。经过两年的参与式观察,他收集的信息涵盖了这个本地文化中的人们的动机、价值观、生活感受以及社会组织、朋友关系和忠诚度等问题。这些信息被浓缩为如下富含理论启示意义的陈述:

> 怀特研究的帮会完全可以被视为是青年人暂时不适应的一个例子。他们逃离了家庭的价值规范,同时又发现自己被主流的美国社会的价值规范排除在外。人们可以观察到他们的行为既偏离了家庭的主流价值,同时也偏离了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异常行为甚至于犯罪行为可被视为是一种失败的适应,其后果既可能是适应也可能是永远的不适应。(Atteslander 1996,第XIII页)

这个例子表明,研究者是如何找到进入一个群体的渠道的以及如何研究该群体的仪式以及日常惯例的,这些仪式和日常惯例构成一种特定的亚文化。

总地来说,研究者在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协调与被调查者关系的亲近与疏远,说明、展示和协调相互之间的期待、目的和利益,以及决定在接近研究对象时是采用内部视角还是外部视角。在面对研究实地时,研究者是做局内人还是做局外人,可以通过研究者的陌生与熟悉加以分析。研究者在陌生和熟悉之间的定位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而且也决定着他能够进入研究实地的哪些方面,以及哪些方面是他接触不到的。在这里[按照 Devereux'(1967)的分析],研究者部分的、无意识的担心也会产生特定的影响,它会阻碍研究者真正的进入特定的研究实地。对研究者而言,由研究实地和研究者本人个性所决定的进入形式,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案例的描述在多大的程度上富有启发性,以及所获得的知识在多大的程度上仅仅局限于对之前已知内容的证实。

要 点

- 进入实地指的并不仅仅是"身处实地"。这里涉及一个复杂的在实地中进行自我定位和被他人定位的过程。
- 这里涉及的问题常常是研究者在实地中选取某种角色或者是被人赋予某种角色。
- 通常来说,机构没有"好"的理由拒绝接受研究。因此,当机构代表人想要拒绝一项研究时,他们常常编造出一些其他的理由并以此作为拒绝的借口。这使研究者进行协商变得更加困难。
- 走近机构内部或机构之外的个体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步骤。在这里,研究者要让他自己并不认识的人来参加研究,以获得丰富的、富有启发性的认知。

练习 10.1

1. 请您从文献中选出一项研究,并根据原文指出原作者提到了哪些进入实地方面的问题。请您试着想象一下研究者在进入实地时遇到了哪些问题。
2. 请您思考一下您自己的研究,您想要怎样进入您的研究实地?您需要向谁提出申请,或得到谁的许可?您想怎样接近应该参加您研究的个人?

拓展阅读

Adler, P. A. /Adler, P.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Schütz, A. (1972). Der Fremde. In: A. Schütz,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2). Den Haag: Nijhoff, S. 53-69.

Wolff, S. (2000b). Wege ins Feld und ihre Varian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34-349.

11 抽样策略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理解质性研究中抽样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 认识到理论抽样与统计抽样的不同。
- 了解质性研究中抽样的不同形式。
- 明白质性研究中案例是如何被选定的。

研究过程中的抽样决定

抽样的问题会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出现（见表 11.1）。例如，在一项访谈研究中，您需要决定对哪些人进行访谈（案例选择）以及这些人应该来自哪些群体（案例群选择）。接下来，您要决定哪些访谈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处理，也就是说哪些访谈应该被转录和得到解释（素材的选择[Auswanl des Materials]）。在解释资料的阶段，您需要决定，一个文本的哪些部分应该得到一般的解释或特别详尽的解释（素材之内的选择[Auswanl im Material][①]）。最后，在撰写研究结果时，该问题还会出现：哪些案例或哪些文本部分最适合表明您的研究发现（展示内容选择[Präsentationsauswanl]）？

表 11.1　研究过程中的抽样决定

收集数据时	• 案例选择 • 案例群选择
解释数据时	• 素材的选择 • 素材之内的选择
撰写结果时	• 展示内容选择

① 这里指的是在上一步选择出来的素材之中进一步进行选择。——译者注

在现有文献中，人们对于抽样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十分明确地倾向于两个极端：一极是以或多或少抽象的标准为基础，而另一极是以或多或少具体的标准为基础。

预先确定样本结构

在第一种情况下，抽样的标准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是以对研究对象特征的类型和分布的设想为出发点的。在选择最终要研究的（即收集和分析的）素材时，要保证可以通过从素材中得到的结果推断研究对象中的情况。统计抽样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逻辑，在统计抽样中，素材是根据特定的（比如人口统计的）标准被集合起来的，比如说一个按照年龄或社会状况选择出来的均质性样本（如有着特定的职业、处在特定的生活阶段的女性）或者一个能够反映出这些标准在总体中有一种特定分布的样本。由于这些标准独立于所要具体分析的素材之外，并且是在素材收集与分析之前就已存在了，所以说，这些标准是抽象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例子来说明。

案例　针对预先确定的社会群体的抽样

在一项有关科技变迁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表征的研究中（Flick 1996），研究者的出发点是：对日常生活中科技变迁的感知和评价受被研究者职业和性别的影响，也最终受到被研究者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左右。为了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研究者确定了样本的不同维度：信息工程师（作为科技开发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科技的专业应用者）和人文学科的教师（作为科技的日常使用者）这三种职业群体分别应在样本中通过相应的案例（人）来代表，这些人需要至少具有一定的相关职业的工作经历。此外，还应当考虑到男性代表和女性代表的比例协调。为了照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研究选取了来自西德、东德与法国的案例。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含有 9 个领域的样本结构（见表 11.2），作为每个群体代表的案例应该在此得到尽可能均衡的分配：每个领域中最终的案例数有多少（即每个领域有多少个案例？），一方面取决于资源（在限定好的时间里能够开展、转录及解释多少个访谈？），另一方面取决于研究的目标（各个案例或所有案例说明的是什么？）。

表 11.2　预先确定好维度的样本结构的例子

	环境与性别						
	西　德		东　德		法　国		总　计
职　业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信息工程师							
社会科学工作者							
教　师							
总　计							

针对资料收集进行案例选择时应该遵循的标准是：尽量均衡地填充样本结构的各个单元，或者让所有的单元都得到足够的案例。在决定哪个案例要在下一步得到分析时，也可以在群体或领域内部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见以下）。

质性研究中的完全取样

Gerhardt 所采用的完全取样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例子（1986a，第 67 页）：

> 为了更多地了解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病情发生与发展历程，我们决定对英国东南部五家主要医院（肾功能部）的所有病人（男性，已婚，开始治疗时年龄在 30 至 50 岁）进行完全取样。

在这里，取样的选择受到了事先确定好的标准的限定：特定的疾病、特定的年龄、特定的地区、特定的阶段以及特定的婚姻状况是所要选取的案例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些标准限定了可以被纳入研究的案例的总体数量，从而可以将它们全部纳入调查范围。因为在这里要将那些不符合一项或多项标准（如年龄、性别或地区）的案例事先筛选出去，因此，这里也涉及取样的问题。这种取样的方式主要适合用于区域性研究。

在预先确定了样本结构的研究设计中，抽样决定指的主要是选取案例或案例群。在完全取样的研究设计中，因为调查和分析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将所有合乎标准的案例都纳入样本并将其保留在样本中，因此，将已经做完的访谈再排除出去的情况比较少见。虽然对素材的选择在这里相应地不是那么重要，不过，在素材中选择的问题（访谈中的哪些部分得到了更加深入解释，对哪些案例进行了对比？）及呈现选择的问题（在呈现研究结构时选用了哪些段落或案例？）在这里也同样会出现，就像在逐步确定样本结构的研究设计那里一样。

方法的局限性

在这一策略下，被调查群体的结构在数据收集前就已被确定好了，比较可能的变化范围也被事先确定好了。这样一来，至少在这一水平上，将不会产生真正新的发现。如果一项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那么这种抽样形式就在一个基本维度上限制了理论的发展空间。因此，这一方法主要适合用来进一步分析、区分以及检验有关特定群体之间共性和区别的假设。

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确定样本结构：理论抽样

逐步抽样策略依据的主要是 Glaser/Strauss（1967/1998）所发展的理论抽样。有关实证资料（案例、被调查群体、机构等）选择和构成的决定是在收集和解释资料的过程之中做出的。Glaser/Strauss（1967/1998，第 53 页）是这样描述这一策略的：

> 理论抽样是一种资料收集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发展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将资料的收集、编码和分析结合起来，并决定下一步该收集什么资料及到哪里去收集这些资料，从而

在理论浮现的过程中发展理论。这一资料收集过程受到正在形成中的理论的支配。

理论抽样中的抽样决定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做出：第一，抽样决定可以在要被比较的群体这一层面上做出；第二，抽样决定也可以直接在具体的人的层面上做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具体个人、群体或领域（它们是理论得以发现或发展的基础）的选择所遵循的都不是常见的统计抽样的标准和技术。理论抽样既不是要通过随机抽样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也不是要分层抽样。相反，选择个体和群体等样本所依据的标准是它们是否能为理论的发展提供（所期待的）新的内涵，而对此的判断要根据理论发展的现有状况来做出。

在这里，抽样决定指向的是一种特定的资料，即那种根据现已采用的资料和从中获得的认识来看有可能带来最大启示的资料。在**资料抽样**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接下来的数据收集中人们应该转向**哪些**群体或次级群体？要实现什么目的？（……）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从原则上来说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根据一定的理论标准对群体进行选择。"（Glaser/Strauss 1967/1998，第 55 页）

就下一步应该将哪些人、群体和案例等纳入分析而言，原则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确立一定的标准并通过这一标准来限定选择上的这种无限可能。这一标准的确定是以理论为基础的，而从实证分析中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是这里的参照点。这类标准的例子有：下一个案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给人带来令人期待的结果？它对于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有多重要，等等。

在第 8 章提到的、由 Glaser/Strauss（1965a/1974）所做的有关与垂死之人互动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就是这种抽样策略。他们在不同的医院和机构中运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目的在于发展出一个理论，用于解释死亡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是如何在医院之中得到组织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 8 章和第 23 章）。以下案例描述了该研究中的决定过程和抽样过程。

案例　理论抽样的例子

对不同医疗部门的访问是如下安排的：我想要首先参观那些病人意识降低至最低的部门（因此我首先参观了一个早产病房，接着访问了一个神经外科部门，那里的病人常常处于昏迷状态）。接下来，我想要在以下情况下观察死亡，即不仅医护人员而且病人自己常常也知道死亡将至而且死亡来临的也非常快。因此，我选择了在重症看护病房进行观察。然后，我想要观察这样一个部门，在该部门中医护人员知道死亡将至，而病人自己却不一定知道，并且死亡在这里通常来得比较缓慢。因此，我接下来参观了癌症病房。接下来，我想要观察一下死亡没有被期待到来却又来得很快的情形，因此我参观了急救病房。我们在观察其他类型的机构时，我们也观察了其他类型机构的上述病房。因此，我们对不同类型部门的观察一方面受到一个总的理论框架的引导，该理论框架包括了对死亡意识、死亡预期和死亡率的假设，另一方面也受到一个正处在发展之中的理论结构的指引，该理论结构可以允许我们分析之前未被预见的问题。有时，我们会在对一个机构或情况进行了两周、三周或四周的连续观察之后又回到之前已经观察过的部门，去考察我们之前忽略的问题。（Glaser/Strauss 1967/1998，第 66-67 页）

在这里，第二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在做出如下决定时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即他何时可以停止取样。为此，Glaser/Strauss（1967/1998，第 69 页）提出了“理论饱和”的标准（例如某一范畴在理论上的饱和）：

> 用来判断何时可以终止针对某一范畴取样的标准是该范畴的理论饱和。饱和的意思是指，已经不能再找到额外的资料让社会学者可以据此发展出更多的该范畴的特征。（1967，第 61 页）

当某一范畴或被调查全体达到了“理论饱和”时，即不再有新的内容出现时，对资料的进一步取样和分析就可以结束了。从以下与统计抽样策略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抽样的本质性特征（参见表 11.3）。

表 11.3　理论抽样与统计抽样（Wiedemann 1955，第 441 页）

理论抽样	统计抽样
总体的范围事先未知	总体的范围事先已知
总体的特性事先未知	总体中的特性分布可以被估计到
每次按照新的标准多次抽样	按照事先确定的方案进行一次性抽样
样本大小事先未界定	样本大小事先已经界定
抽样在达到理论饱和时结束	抽样在全部样本被调查之后结束

案例　逐步纳入群体和个案

在一项有关信任在治疗与咨询中的重要性的研究中（Flick 1989），来自特定职业群体、机构及工作领域的案例被**逐步地**选择出来，以补充现有资料中的空缺。这些空缺是在对现有资料进行逐步解释之后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收集并比较了两个来自不同工作领域的案例（监狱与私人诊所中的治疗）。之后，研究者又将第三个工作领域（社会精神病学服务）纳入分析，以在这个层面上增加比较的说服力。在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补充完善样本可以带来新的启示：在现有已经纳入分析的职业群体（心理学者和社会工作者）之外，研究者又加入了第三个职业群体（医生），目的是找出在同一个工作领域（社会精神病学服务）之内不同的职业群体成员在观点上的不同。分析最终表明，这里所含有的认知潜力很大，系统地比较这个领域中的不同机构，要比将这个领域与其他领域进行比较，能够带来更多的启示。因此，研究者纳入了更多的来自社会精神病服务领域的其他案例（参见表 11.4，在该表中，选择决定之经过及顺序通过字母 A 到 C 来标明）。

表 11.4　产生于过程之中的样本结构的例子

	监　狱	私人诊所	社会精神病学服务
心理学者	A	A	B
社会工作者	A	A	B
医生			C

与使用统计抽样的方法一样，通过这种方法最终同样也获得了一个结构化的样本，它含有特定的维度和领域。只不过，样本结构在这里并不是在资料收集

和分析之前确定的,而是在收集资料和解释资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维度得以补充进来或者样本结构被限定在特定的维度和领域之内。

逐步抽样作为质性研究的一般原则

如果我们就这一点比较一下质性研究的不同方案,就可以发现,这一逐步选取案例及资料的原则在 Glaser 和 Strauss 之外也被其他人所应用。理论抽样的基本原则,即根据具体的内容标准,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方法论标准选择案例或案例组,按照案例或案例组的重要性而不是按照其代表性来选择它们,也同样是质性研究领域中一些相近的资料收集策略的特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 Denzin(1978,1989b)提出的"资料的多元结合"方案中找到类似的做法——综合分析不同的资料来源,按照时间、空间和人进行区分(参见第 29 章)。Denzin 建议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人身上研究"同一现象"。按照他自己的看法(1978,第 295 页),Denzin 以自己的方式运用了理论抽样的策略,把它作为一种有目的地、系统地选择和分析个人与群体、时间和地点的策略。与 Glaser 和 Strauss 的抽样方法相比,Denzin 的抽样方法增加了时间和地点的维度,因此在进入的系统性上也有所提高。在刚刚提到的例子中,研究者在取样时通过有目的地纳入不同的机构(作为地点设置)与职业群体以及通过采用以上提到的不同种类的资料,也做到了这一点。

由 Znaniecki(1934)首创的"分析式归纳"(Analytische Induktion)(参见 Bühler-Niederberger 1985 以及第 29 章),也可以被视为是对理论抽样的一般原则的一种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不过,在这里,研究者很少会关注以下问题,即哪些案例应该被纳入分析。相反,除了发展一种暂时理论(或模式和模型等)之外,这一分析策略的重点在于寻找和分析特定的异常案例(甚或是群体)。如果说理论抽样的目的主要在于丰富正在发展中的理论,那么,分析式归纳法的目的则是通过分析或融合异常案例来加固发展中的理论。如果说理论抽样希望通过正在形成中的理论来控制选取资料的进程,那么,分析式归纳法则是利用异常案例来控制这一正在发展中的理论。在此,异常案例是理论饱和这一不甚明确的标准的一个补充,该标准适用于决定资料收集的继续进行和评估。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为了加固和提高对案例解释的推广度,所采用的策略是有目的地对案例进行最小化和最大化的对比,而没有应用那些以异常案例为切入点的策略(参见第 29 章)。

这一对质性研究不同方案的简短比较可以说明,理论抽样的基本原则是质性研究中选取素材的真正的和典型的形式。Kleining 对社会科学方法类型分类的思想可以支持这一论断。根据其思想,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可在日常方法中找到相同的源头;质性研究方法是对这些日常方法的第一层次的抽象化;而定量研究方法是则是对日常方法的第二层次的抽象化。如果将这一思想以类似的形式

移植到实证性素材的选择策略上,那么理论抽样(以及前面阐述的基本上相近的策略)就是那种更具体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策略。而类似代表性等抽样标准则代表着第二层次的抽象化。从这一抽象化层次的类比出发,人们可以支持以下的观点,即理论抽样是一种适合质性研究的抽样策略,而传统的抽样策略则更符合定量研究的逻辑。传统的抽样策略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合用于质性研究,需要视具体的研究具体考察。这里的讨论类似于有关质性研究质量标准合适性的讨论(参见第 28 章)。

其他逐步抽样的方案

逐步抽样并不仅仅是质性研究各种传统方法的真正的抽样原则。在近期的讨论中,逐步抽样的方法也一再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在近期的讨论中,人们关心更多的是阐述有关如何实施抽样步骤的策略。在评估研究的框架下,Patton(2002,第 230-247 页)提出了目的性抽样的策略,以区别于随机抽样策略,并对此提出了以下一些具体建议:

- 有目的地纳入极端案例或异常案例:为了考察一项改革项目的功效,研究者选取在改革实施方面特别成功的案例进行分析,或者选取这些改革项目失败的案例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在这里,研究者更多地是从边缘来探索所研究的领域,以便从整体上获得对该领域的理解。
- 有目的地选择特别典型的案例:特别典型的案例指的是那样一些案例,在它们那里,成功和失败的关系或者进展过程对于平均水平或绝大多数案例而言具有典型的意义。在这里,研究者更多地是从内部和中心来探索所研究领域的。
- 还有的建议指向样本中的最大变异性:所纳入分析的案例可以比较少,不过,它们一定要尽可能地不同,以便揭示出所研究问题领域的变化范围和差异性(参见 Kleining 1982)。
- 作为补充,也可以依据强度来选择案例,即根据想要研究的案例中真实的或猜测的特点、过程、经验的强度来选择案例。在这里可以选择具有最强强度的案例或者系统地比较具有不同强度的案例。
- 对关键案例的选取:关键案例指的是这样的案例,在它们那里,所研究的关联性——根据该领域专家的看法——表现得十分清楚或者说它们对于一项待评估的项目的正常运行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
- 选择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案例或者敏感案例:一方面,这样做适合用来让评估结果产生十分有效的影响,这也是选择此类案例的理由。另一方面,因为这类案例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很可能会危及整个项目,这也正是尽量避免选择此类案例的原因。
- 最后,Patton 还提出了一个"方便性"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的标准:指的是选择那些在现有条件下最容易获取的案例。这样做一来可以将麻烦最小

化,二来也是目前为止唯一可以让研究者在有限的时间和人力条件下完成评估的办法。

抽样的策略最终决定着由此所获得的研究结果的推广度:在随机抽样中,可推广性(Verallgemeinerbarkeit)无疑是最高的,而在最后提到的这种最省力的抽样策略中,可推广性受到最大的限制。当然,并非所有质性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研究结论的普遍推广性,而进入问题(Frage des Zugangs)在这里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障碍之一。

与此相应,Morse(1998,第73页)提出了判断什么是"好的被调查者"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可以被用来作为选择有意义案例(特别是对被采访者而言)的标准:他们应该具备必要的、与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有关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在访谈中回答提问或在观察研究中完成研究者想要观察的行为。他们还应具有反思能力和表达能力,有时间接受采访(或观察),并且愿意参加研究。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该案例就应该被纳入研究。对这类案例的选择被 Morse 称作"首要选择"(Primärauswahl)。首要选择与"次要选择"(Sekundärauswahl)相对,后者指的是那些不能满足前述所有标准的案例(特别是不能满足知识和经验这条标准),但却愿意并有时间接受访谈。Morse 建议研究者不要为这类案例投入太多资源(例如在转录或解释时),只是在首要选择实在找不到足够案例的情况下才去进一步分析它们。

提示框 11.1 总结了这里提到的各种抽样策略。

提示框 11.1 质性研究中的抽样策略

- 预先确定
- 完全取样
- 理论抽样
- 极端案例抽样
- 典型案例抽样
- 最大变异性抽样
- 强度抽样
- 关键案例抽样
- 敏感案例抽样
- 方便性抽样
- 首要选择
- 次要选择

抽样目标:广度还是深度

当研究者要从上述某个抽样策略做出选择时,以及在判断总的样本构成是

否成功时，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是样本所含有相关重要信息的丰富性(Patton 2002)。在这里，选择的决定总是在以下两个目标之间摇摆，即尽可能广泛地了解一个领域或尽可能深入地进行分析。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尽可能多、尽可能不同的案例从多个不同的方面来展现所研究的领域，以便能够做出有关特定观点或经验之分布情况的论述。在第二种情况下，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聚焦于单个的案例或者研究领域的某些方面，深入地分析其结构。考虑到有限的资源(人力、资金、时间等)，这两个目标往往更多地是一种二择其一的选择，而不是可以相融合的两种做法。在前述的例子中，研究者所做的决定，即更深入地对一种机构(精神病社会服务机构)进行分析，并且为此——鉴于有限的资源——不再在其他的机构收集和分析进一步的资料，就是这种在广度(在尽可能多种不同类型的机构中研究咨询中的信任)与深度(在某一种类型的机构中尽可能深入地进行这种分析)之间做出权衡的结果。

样本中的案例建构

在这里的情境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样本中所考虑的案例(Fall)是什么，更具体地说，该案例代表着什么？在已经多次作为范例提到的有关咨询机构中信任问题的和科技变迁的研究中，研究者将**案例作为案例**来处理：抽样以及对资料的收集和解释被当作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得以实施。对于最终被纳入研究的样本的构成而言，每个案例都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代表意义：

- 案例代表其自身。根据 Hildenbrand(1987，第 161 页)的观点，“案例从辩证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个性化了的共性”。因此，单个的案例首先被看作是在一般背景之下的特定个体社会化的结果，例如，作为一个拥有特定个人经历的医生或心理学者处在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精神病学及对精神病障碍理解变迁的背景之下。这同样也适用于信息工程师的社会化，他们所处的环境为信息技术以及各自文化环境的变迁。这种社会化导致了各不相同的主观的看法、态度及观点，这一点可以在当下的访谈中发现。
- 为了弄清楚“个性化了的共性”在这里具体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对案例进行如下的概念界定，即案例作为一种特定的机构情境的代表。被研究者在该机构情境之中行动，并且要在面对他人时在其行动中展现该机构情境。因此，有关咨询服务中信任的主观理论所体现出来的观点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即案例(如作为医生或者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和体验都在遵循着从事社会精神病学服务的机构的目标，或者他或她会将这些观点融入为与当事人的行动或者是在访谈中的叙述，这当中也包括对这些机构目标的批判性分析。
- 案例代表着一种他所接受的特定的专业化(如作为医生、心理学者、社会工作者、信息工程师等职业的专业化)。该专业化会在他的观念和行为之上体现出来。因此，尽管在特定机构中存在合作和团队协作，不过，在对当事人、障碍

和治疗的切入点的表述上，来自社会精神病服务领域的不同的职业群体的被调查案例却有着不同的着重点。

- 案例代表着培养出来的主观性，该主观性是获得了特定的知识储备以及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方式和感知方式的结果。
- 案例代表着一个在互动中生成的，或者可在互动中生成的行动空间（例如，咨询、科技发展）。

抽样决定不能孤立地做出。绝对正确的决定或策略是不存在的。要判断样本结构与内容的合适性以及所选定的、用来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抽样策略的合适性，一方面要视研究问题而定：要回答研究中的问题需要哪些案例以及多少案例？另一方面，要判断所选出的样本的合适性，还要看研究所追求的推广度：从一项案例研究中推导出普遍适用的结论是困难的。同样，在选择随机抽样策略的情况下，要对案例（例如一个机构、一个地区）进行深度描述和分析也是困难的。抽样策略描述了探索一个领域的途径。对该领域的探索可以从其边缘——通过选择极端案例、反面案例、关键案例或异常案例——开始，也可以从其内部——通过特别典型或特别成熟的案例——出发。此外，对该领域的探索还可以从对其结构的假定出发，方式是尽可能地选择不同的案例，扩大其变异范围。在这里，样本的结构可以事先确定好，再通过收集数据予以实现，或者该结构可以在选取、收集和解释资料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发展并进一步得以分化。在这里，要在事先确定样本结构和逐步发展样本结构这两种策略之间做出选择，同样也是视研究问题及研究所追求的推广度而定。

在本书第 6 章中总结的质性研究的特征同样也适用于抽样策略。通过在抽样决定中所做出的选择，研究者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特定的理解研究领域和所选出案例的方式。如果研究者所做出选择有所不同，那么，他所获得的理解同样也会有所不同。由于抽样决定是以将具体案例纳入研究作为切入点，所以，案例重构的起点在这里得到具体的实现。通过抽样决定，所研究的现实以特定的方式得到了建构——某些特定的部分和方面得到了强调，而其他部分和方面则被忽略。抽样决定从根本上决定着，哪些内容会以文本的形式变成实证资料，什么内容会从现有文本中被选出得到具体的运用，以及以何种比重得到运用。

要 点

- 在质性研究中，抽样是十分重要的步骤。
- 抽样决定（下一步要调查的是谁或哪一群体?）常常是在现有的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
- 在质性研究中，抽样决定考虑更多地是具体的、内容上的因素，而非抽象的、形式上的因素。抽样更多地是有目的地选择特定的案例，而非随机抽样。
- 通过抽样，所研究的案例会得到建构。

练习 11.1

1. 请您选取一个质性研究文献,描述一下作者是如何进行抽样的。您可以从研究的论述中找到哪些抽样的理由以及方案?
2. 请您思考一下自己的研究,您如何规划抽样?您会怎样做?
3. 本章中所探讨的各种抽样策略的局限性是什么?

拓展阅读

Glaser, B. G./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t. 1998: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Bern: Huber).

Morse, J. M. (1998). Design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Y. S. Lincoln (Hrsg.).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p. 56-85.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3. Aufl.). London: Sage.

质性研究设计概览 12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构思质性研究设计的基本组成要素。
- 熟悉质性研究的最重要的基本设计。
- 理解研究者可以在一项具体的研究中结合使用这些基本设计。
- 通过比较获得对质性研究基本设计的了解。
- 认清这些基本设计的优缺点。
- 可以结合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活动的其他阶段对自己选定的研究设计进行定位。

通常来说，“研究设计”(Forschungsdesign)这一关键词涉及对调查研究的规划问题，如：为了在既定的时间和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对研究问题作出回答，应该如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如何选择实证“材料”(情境、案例、人物等)？与此相应，Ragin(1994，第191页)对研究设计做了如下定义：

> 研究设计是对基本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的一种规划，它使研究者可以对他的研究问题作出回答，不管他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研究设计涉及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资料收集的微小细节到资料分析技术的选择。

对质性研究设计的规划与构思

在质性研究中，人们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有关“研究设计”的问题：一种方式是，人们列出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供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时采用或者是参考借鉴(参见 Cresswell 2003)。另一种做法是，人们列出了构思质性研究设计所需要注意的要素。当研究者为一项质性研究提出一个具体设计时，应当考虑以下介绍的几方面要素(参见 Flick 2000d，2007b)。

研究目标

这里可以区分两类目标:学术性目标和个人目标。发展一个理论模型或者是对一项实践性干预措施的评估(有关例子请参见 Flick 2006)以及对某一领域的细致描述都属于是学术性目标。个人目标比如说是通过完成该调查研究来结束自己的学业(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或者希望通过相应的研究课题获得一个职位。

研究问题的提出

质性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着质性研究的成功或失败。研究问题的提出对研究设计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研究问题应当尽可能地清楚和明确,并且尽可能尽早地在研究进展中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问题会不断地得以具体化,更加聚焦,并被进一步限定和修改(参见第 19 章)。

推广度目标和写作目标

在选择或构思质性研究设计时,研究者需要考虑他所追求的是何种形式的推广度(参见第 29 章)。所追求的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案例的细致分析呢,还是对不同案例、情境和个人的比较或者类型学构建? 在比较研究中,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从哪些主要维度来比较特定的现象? 此外,与研究相联系在一起的撰写目标(参见第 30 章)也很重要:实证材料是撰写论文的基础吗(Bude 1989)? 或者说,实证材料只是叙事性报告的基础,仅仅起到说明的作用? 亦或者说,实证材料仅被用来系统处理所研究案例中的差异?

标准化与控制程度

在质性研究中,人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对各个条件加以标准化处理和控制。比如说,在许多研究中,人们都会注意做到向被调查者提出同样的问题,以保证或者至少是提高被调查者回答的可比性。尽管质性研究者知道自己有义务遵循开放性原则(Hoffmann-Riem 1980),不过,对必要的控制程度的思考仍是有意义的:在比较两个供比较群体之间的区别时,该区别出现的环境条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不变? 当一项研究要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多个不同的访谈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控制该环境条件并保证其具有可比性呢?

取样:抽样和比较组群的构成

质性研究中的选样以人或情境为焦点,针对他们/它们收集资料。同时,质性研究中的选样也包括选择出已收集资料的片段,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诠释或者借助于它们对研究结果进行典型性的展示(参见第 11 章)。在这里,理论性抽样被认为是对质性研究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抽样策略。不过,如果研究的目标不是发展一种理论,而是对机构的实践进行评估,那么其他的选样策略往往更为合适(参见 Patton 2002 提出的建议)。(在比较研究中)选样决定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便是比较组群的构建。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比较要在哪一个层面上做出?

是在个人之间，情境之间，机构之间，还是在现象之间？与此相应地，在选样时应该保证让每一个比较组群单元中都包括多个案例。

资　源

在研究设计的构思中，有一个因素经常被忽视，即可供支配的资源（时间、人力、技术支持、能力、经验）。在研究申请中，在所计划的工作任务和所申请（以及实际可能会申请到）的人力资源之间常常有着一种不现实的关系。为了做出一个现实的项目规划，笔者在这里建议对可能出现的工作活动做出一个测算，例如，对于一个90分钟左右的访谈，人们大概需要花同样多的时间来寻找访谈对象，约定访谈日期、交通时间等，这些都需要计算在内。对于访谈的转录时间（参见第22章）的计算，人们得出的结果不尽一致，这是因为所选择的转录体系的精确度不同所致。Morse（1998，第81-82页）建议：对于书写速度快的转录者而言，转录所需时间等于是访谈录音时间乘以4。如果人们将对照着录音核对已完成的转录稿的时间也计算在内的话，转录时间就相当于录音时间乘以6。对于整个研究项目的总体计算，她建议，将已算出的时间再乘以2，以便为未能预见的困难和"灾难"留足余地。如果您的研究课题需要转录访谈录音，那么在做规划时，您无论如何要选用一个高质量的录音装置，并且选用一个可以在转录时用脚踏式开关来播放录音的特殊装置。对于实证性研究课题的时间规划的计算，Marshall/Rossman（2006，第177-198页）提供了一些范例。诠释资料所需时间是难以估算的。在研究课题的审批中，有时会对所申请的资金进行缩减，而且还有可能会要求申请者补充一些方法步骤，例如增加一个比较组群或者增加一个数据收集阶段。最晚在这个时候，有必要对工作任务和资源的关系进行检查。

研究设计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有效地规划研究并实现研究目的的手段。在研究设计当中，仅仅围绕着实现研究目标这个焦点，理论框架、研究问题、研究目标、推广度目标和写作目标与所使用的方法和可供支配的资源被联系在一起。研究项目的完成是在研究过程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的结果。图12.1再次概括总结了在确定一项具体的研究设计时需要考虑或做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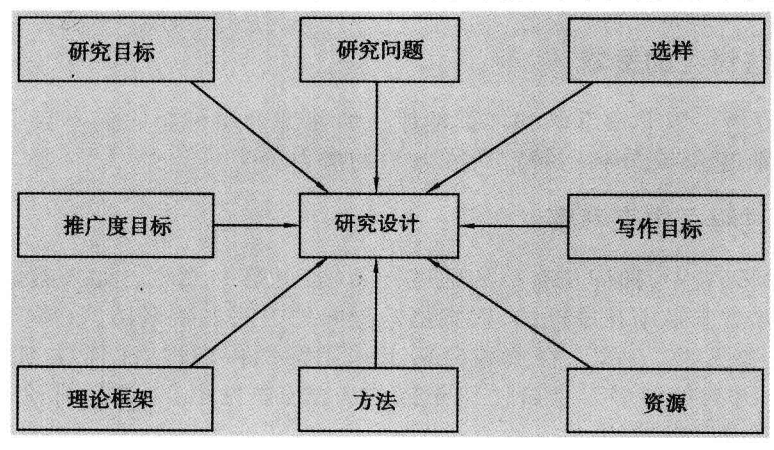


图12.1　质性研究设计的组成要素

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

针对质性研究的规划，现有许多基本设计可以供研究者参考、选用或者部分地结合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实现或确定研究的焦点，即研究分别采取的时间角度和比较角度。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精确描述或再现一个个案（参见 Ragin/Becker 1992）。案例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或机构。在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鉴别一个对于研究目的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该案例还包括哪些内容以及需要哪些方法来实现对该案例的重构（参见 Hildenbrand 1999）。例如，当一项案例分析的目的是研究护养院某个居住者的问题（如社会孤立）时，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仅仅在护养院的日常情境中观察该居住者，是否就够了？是否还需要额外地访谈护理人员和/或其他居住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通过观察将其家属及他们的日常生活纳入分析？等等。

实施的问题

案例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要对所研究的具体案例做出结论。相反，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该案例，是因为它对于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而言是一个典型的或者说特别富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反过来看，案例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以及按照何种标准来选择所研究的案例，从而可以从中得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此外还有一个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案例——哪些方面必须被纳入案例分析？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案例分析可以非常准确和详细地抓住所研究的事件。它们不会受到可比性要求的限制，能够充分利用特定研究方法的潜力。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在案例研究中，抽样是有目的地进行的（参见第 11 章）。如果案例研究在资料收集的方法上采用开放性的、以案例为导向的方法如叙事访谈（参见第 14 章）和民族志（参见第 17 章），在资料分析上采用案例再现性、注释性方法（参见第 24、25 章），并且能够多元结合使用不同的方法（参见第 29 章），那么，案例研究就会是最具有启发性的。

方法的局限性

因为案例研究集中于对一个案例进行分析，因此常常出现推广度的问题——这并不是从统计意义上，而是从理论意义上来说的。在有些时候，可以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来缓解这一问题。

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不会将某个案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去考察其复杂性，而是就特定的方面对许多案例进行分析。例如，研究者比较许多人的专家知识的特定内容，或者就某一具体的患病经历及其之后的生活历程来对比分析不同人的生涯经历。这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选择被比较群体中的案例的问题。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不作为比较对象的其他条件，研究者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其不变或者将其标准化：为了能够揭示葡萄牙女性与德国女性在健康观念上的文化差异，研究者分别从两种文化中选取了访谈对象。对于访谈对象的要求是，他们应该在尽可能多的方面（在大城市生活，具有类似的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都至少是在类似的条件下生活。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将她们之间的区别归因于“文化”这一比较维度（参见 Flick et al. 1998; Flick 2000b）。

实施的问题

在这里您将面临如何选择“正确”的比较维度的问题。此外，您还应当考虑到，哪些条件应该保持不变，从而可以就所选取的维度进行有说服力的比较。最后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可以照顾到那些被纳入比较的案例的复杂性和结构。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如果能够前后一致地应用比较研究，这种研究设计便是一种对特定主题或经验方式进行聚焦性及可限定性比较分析的有效途径。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在抽样方面，比较研究有必要按照重要的比较维度进行目的性抽样（参见第11章）。在资料收集方面，可以进行有针对性地提问（参见第13、14章）的访谈更为合适。在资料分析方面，合适的方法是使用范畴进行编码的程序，有时候也可能会借助电脑（参见第23、26章）。

方法的局限性

因为比较研究集中于对被比较维度的分析，因此存在着忽视其他角度的危险。对材料的分析也过少地顾及其情境和内在的结构。

由案例研究—比较研究所构成的维度形成一个轴，借助于该轴，我们可以对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进行分类。这其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是对多个案例分析的结

合,这些案例分析分别作为案例研究被单独完成,之后研究者再对他们进行比较和对照。第二个可以用来对质性研究设计进行分类的轴,是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来看,质性研究设计有回顾研究、现时研究和长期研究。

回顾性研究

对案例的重构和再现是大部分传记研究的特征。这类研究以比较的、类型化的或对照的方式对一系列案例进行分析。传记研究是回顾性研究设计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种研究设计中,从研究的时刻起,回顾以往的特定的事件和历程,并分析它们对于个体或集体的生平的影响。与设计回顾性研究相关的问题有:选择那些对所研究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者("传记的承载者"— Schüze 1983),确定合适的对比群体,有根据地限定所调查的时间跨度,检查以下问题,即哪些(如历史性)原始资料和文档应该在对传记的承载者的访谈之外被采纳,以及如何可以考虑到当前的观点对感知和评估早期经验的影响(参见 Bruner 1987)。

实施的问题

任何一项回顾性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危险是当前的情境(叙述时所处的情境)会覆盖早期的(被叙述的)情境,影响到对其的评价。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回顾性研究让研究者可以前后一致地贯彻一种传记性视角(参见第7、14、25章),并且在分析已经开始或者是甚至已经结束的过程时采取一种过程性视角。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通常来说,回顾性研究采用的是建构主义的视角(参见第6、7章)。资料收集通常(但并不是必须的)是采取叙事的方法(参见第14章);资料分析采用的是叙事性或注释性方法(参见第25章);研究目标通常是想从所分析的资料中发展理论(参见第8、31章)。

方法的局限性

与纵向研究(参见下文)不同的是,回顾性研究很难将那些未被实现的行动选择(即事情发展的其他可能性)纳入分析。对所分析的过程的观察是通过被调查者的视角(参见第14章)或者是从对已建档的资料(第19章)的分析中获得的。

现时研究

大部分质性研究都建立在现时研究（Momentaufnahme）的基础之上，例如，研究者通过访谈（参见第 13 章）获取在开展研究时存在于某一个领域中的专家知识的不同表现，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在访谈中也会提到以前的一些相关的例子，不过，研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要通过回顾来重构某一过程。相反，它提供的是一种对研究所在时刻的现状描述。当研究者从现时视角（Momentperspektive）出发来对某个过程进行观察或者根据对首次谈话内容的分析来对其进行研究时，以上说法也适用于民族志（参见第 17 章）或者会话分析（参见第 24 章），例如，当研究者观察医院在接收患者时如何制作病例（Fall），以便对其进行机构性的“处理”时。在此类研究中，从设计的角度来看，研究者面临着的问题是如何限定经验性资料范围的问题：如何才能通过选择保证那个对于研究问题而言重要的现象真的就包含在那些通过实证手段记录下来的谈话和过程的片段当中呢？应该将某个（观察或谈话）序列的开始和结束分别置于何处呢？应该按照何种标准来选择比较性材料并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呢？哪些谈话或谈话片段，哪些观察记录应该具体得到比较呢？

实施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此类研究缺少直接的过程维度或发展维度，而只能通过回顾性问题间接地生成这种过程维度或发展维度。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恰当而有意义地限定被纳入分析的材料的范围。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采用这种设计，便于研究者开展实用的、聚焦性的研究。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获得对主观见解的现状分析以及对日常惯例（参见第 6 章）的描述。为此，可以使用访谈（参见第 13、14 章）、观察（参见第 17 章）与编码分析（参见第 23 章）等方法。

方法的局限性

采用这种研究设计难以实现过程性或变化性视角的分析。

纵向研究

最后要在这里介绍的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是纵向研究（Längsschnittstudien）。纵向研究在多个不同的时间对研究者关注过程或状态进

行分析。这种研究策略在质性研究领域很少被使用,至少是很少明确地被使用。Gerhardt(1986)有关患者生涯发展的研究在此是一个例外,她在一年之后再度访谈了她的被访者。对于多数质性研究方法而言,你很少发现有关它们如何在包含多个资料搜集时刻的纵向研究中得以应用的指南。在民族志研究(参见第17章)中,研究者在特定的时间内较长时间地呆在研究实地,他在此以隐含的、不言明的方式采用了一种纵向视角。同样,在带有回顾性焦点的传记研究中,研究者对一个人生平经历中的一个较长的阶段进行了研究。他在此也是以隐含的方式采用了一种纵向视角。不过,纵向研究的强项——通过多次的调查记录看法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并且对变化过程的初始状况的记录不受其最终状况的影响——并不能通过这种研究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

实施的问题

要想充分发挥纵向研究的潜力,研究者必须在开始时就能够辨别出对于研究重要的过程。如果在不同的调查时间重复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如叙事访谈,可能会形成一种人为制造的情境。通常来说,纵向研究需要很高的组织上的投入,并且需要大量的资源(如时间等)。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纵向研究是研究发展过程的最合适的形式。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纵向研究的出发点是对发展变化的研究。在取样上,应该是选择目的性抽样,并且在选样后保持样本不变(参见第11章)。观察和民族志(参见第17章)研究都是以隐含的方式采取一种纵向的视角,但也可以明确地多次重复使用。与小组讨论(参见第15章)或叙事访谈(参见第14章)相比,提纲访谈(参见第13章)更容易被多次重复实施。

方法的局限性

在以撰写毕业论文为目的或者仅获得有限资金资助的研究课题中,研究者只能局部地实施纵向研究。这是因为,纵向研究要求在不同的资料收集时刻之间应该留有足够多的时间,以便可以观察到事实上的发展和变化。

选择研究设计参照点

图12.2按照时间和比较这两个维度对以上介绍的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进行了排列。

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部分地结合使用这里所介绍的研究设计,比如开展一项回顾性的比较研究或者进行一项带有纵向研究性质的案例分析。接下来本书将会提供几个参考依据,帮助研究者在以上介绍的研究设计之间以及在基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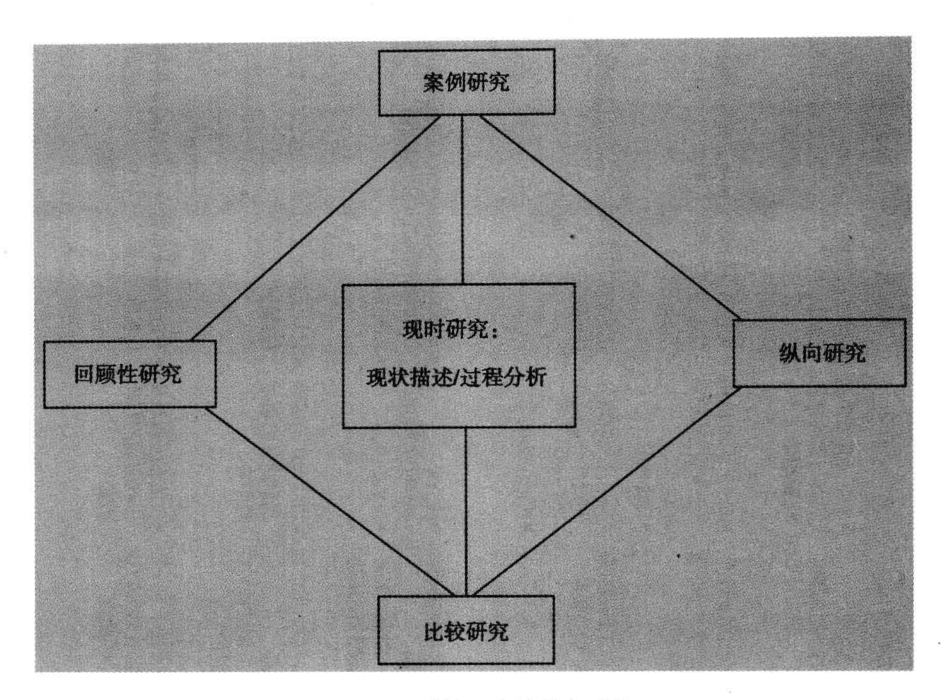


图 12.2 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

备择性研究规划方案之间作出抉择。在这里，研究过程设计也被包括进来，它有两种不同的模型，即线形模型和环形模型（参见第 8 章）。抽样的两种基本的备择性方案也被包括进来，即事先确定样本和目的性抽样（参见第 11 章）。本章介绍的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也在这里得到了对比。本书提供了四个参照点，供研究者在各个备择性选项之间作出选择。

第一参照点：基于标准的方法比较

对比分析过程设计、抽样和基本设计的不同备择选项是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的第一参照点。作为这类比较的标准，表 12.1 一方面列出了各个方案为了确保对于研究对象或被调查者的主观见解保有充分的开放性而具有的选项。另一方面，表 12.1 对比了各个方案用来保证使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具有充分的结构和深度的那些规定。另外的两个标准是：各个方案对于整个质性方法发展的贡献，以及各个方案主要得到应用的领域。最后，各个方案在实施中的问题以及已经提到过的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也是比较的标准。这样一来，在质性研究设计方面的各种备择性方法都被包括在内了。表 12.1 对各个方案都进行了定位。

表 12.1　有关质性研究设计的各种方案的比较

	过程		抽样		基本设计				
方法标准	线形模型	环形模型	预先确定	目的抽样	案例研究	比较研究	回顾性研究	现时研究	纵向研究
对于研究主题（领域）的开放性，通过：	• 资料搜集和分析的分离便于将注意力集中于实地	• 灵活地收集和使用实证资料	• 系统化比较	• 样本结构在分析的过程中从材料中发展得出	• 聚焦于所研究的案例(人、机构、实地等)	• 包含访谈 • 通过参与来理解	• 发展进程常常透过参与者的视角得到重构	• 对状态进行描述，不关注过程	• 追踪一个过程及其可供选择的发展可能
对研究主题（领域）的结构化，通过：	• 预先确定研究步骤	• 在过程中发展知识	• 不考虑具体材料地定义抽样的标准和维度	• 聚焦于有启发性的案例或材料	• 选取一个案例	• 确定比较的维度 • 确定哪些条件要保持不变	• 对(个人或机构的)发展进程的回顾 • 过程视角	• 关注事件的现有状态(例如所研究知识的状态)	• 确定资料收集的时刻
对质性方法一般发展的贡献，通过：	• 清楚地安排研究步骤	• 严格地贯彻质性研究的原则 • 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相交叉	• 对程序的结构化 • 为研究规划提供导向	• 对案例和资料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选择，而非形式上的、抽象的选择	• 获得对特殊性案例(案例本身)的最大化了解	• 聚焦于所研究案例中的关联点	• 采用过程视角分析已经开始或完成的发展 • 传记性视角	• 适合于实用性、聚焦性研究	• 真正的过程视角
应用领域	• 与定量研究相关	• 以发展理论为目标的研究	• 比较研究	• 以发展理论为目标的研究 • 质性评估	• 机构分析 • 生活史	• 有针对性的研究问题 • 更大数量的案例 • 比较性研究问题	• 生活史 • 机构性发展过程 • 传记经历	• 专家知识、外行知识和机构性知识 • 实践和惯例	• 个人的或机构的发展历程
实施的问题	• 面对资料和实地时缺少灵活性	• 可规划性有限 • 当缺少研究经验时可能难以实现	• 在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方面缺少灵活性	• 可规划性与可计算性有限 • 有关何时结束抽样的标准模糊	• 采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案例	• 对比较之维度的选择 • 对案例结构和特殊性的考虑	• 以往经历会受到当前状况的覆盖性影响	• 对与案例相关的材料的界定	• 预先确定重要的过程 • 重复使用质性方法可能会造成人为性的效果
方法的局限性	• 以定量研究的逻辑为导向	• 以理论发展为导向	• 只能有限地适用于民族志等方法	• 归纳性系统化 • 有限的推广度	• 较难推广化	• 为了便于某一维度的比较而忽视了其他维度	• 仅能有限地触及未被实现的行动方案	• 对过程视角和变化视角的放弃	• 工作消耗常常超过了可支配的资源
参考文献	Lamnek 1989，Mayring 1983	Strauss 1991	Merkens 2000	Merkens 2000，Patton 2002	Hildenbrand 1999	Glaser 1969	Bude 2000	Flick 2006，Lüders 2000a	Thomson et al. 2003

第二参照点:选择与检验研究设计

在选择一种研究设计或其组成部分时,研究者应该以不同方面的标准为导向并且按照这些方面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选择。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选择的研究设计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合用来抓住研究问题主要的方面。对于参与研究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一方的条件而言,该研究设计是否合适?有没有给研究参与者提供充分的余地?在既定的研究条件之下,该设计是否能在与实地和参与者的接触下得到实现?研究设计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通过所获得的资料或知识想要达到的目的?表12.2提供了一份回答以下这些与研究设计选择及其检验相关的问题的核查单。如果人们用"抽样"等概念替换该表中的"设计"概念,那么,该表也可以被用来选择和检验这些领域中的各种备选程序。

表12.2　研究设计核查单

什么是好的研究设计?——好的研究设计取决于哪些因素? 用来选择研究设计及评估其应用的核查单	
1. 研究问题	• 研究设计及其应用能否抓住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
2. 研究设计	• 研究设计的应用必须符合方法上的要求和研究目的:不能在研究设计之间进行跳跃,除非是可以为此找到研究问题和/或理论方面的依据。
3. 研究者	• 研究者是否有能力应用这一研究设计? • 在研究的实施中,研究者自己的经历、局限以及资源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被研究者	• 所选择的研究设计对于被研究的目标群体而言是否合适? • 如何能够顾及到(潜在的)被研究者的期待和情境条件?
5. 给被研究者的空间	• 被研究者能否在研究的框架下表达其观点和经验? • 对于全新的、未能预见的内容,是否留足了空间?
6. 实地接触	• 研究者有没有实现该研究设计? • 研究者有没有给被研究者留足空间? • 研究者能够驾驭自己的角色吗?(为何不能?) • 对于被研究者而言,他们的角色、研究者的角色以及情境有没有得到清楚的定义? • 被研究者是否符合其角色(为何不符合?)
→	最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实地接触之间对违背之处进行分析,以验证研究设计的正确性
7. 分析目标	• 清楚界定和明确的回答,还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式与情境等?
8. 推广度要求	• 结论应该在哪一层面上做出? —个案(比如被调查的主体和他的传记、机构及其运作方式,等等) —群体(某个职业群体、某种类型的机构,等等) —普遍性的结论

第三参照点: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在构思研究设计以及规划质性研究方面,下面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即,没有普遍适用的“王者之道”(Königsweg)。研究问题和被研究的对象决定着应该如何进行抽样以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基本设计。理论抽样虽然是质性研究中要求最高的抽样方式。不过,它也不是说对于每个研究而言都是最好的、最合适的选择。对于自己的研究问题而言,并不是所有的基本设计都同样合适并且总是可以得到实现。当研究者要在这里所介绍的各种方法之间做出选择时,应该首先考虑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所处的具体条件。

第四参照点: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匹配性

在选择抽样方式或研究设计时要考虑的第四个参照点是其对于研究过程的适合性。在设计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时,研究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应该得到保证:在收集资料方面的灵活性或者在分析资料方面的案例导向是否和严格比较的目标相一致?收集资料的方法是否足够开放和全面,从而可以真正地进行一项复杂的案例研究?

有关方法对于研究过程适合性的考虑可以为此类决定的做出提供依据。在本章以及之前的各章中,在对方法进行介绍中,都包含着有关方法对于研究过程适合性的考虑。在这些地方介绍的对研究过程及其组成部分的设计,分别体现着所介绍的各个方法的特点,研究者应该将它们和自己的研究设计相比较。

这样一来,研究者在对具体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进行选择及检验时,就可以既考虑到其对于研究对象的合适性,又考虑到其在研究过程中的适合性。

以上简单介绍了研究者在选择某一具体的研究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四个参照点。这四个参照点在之后的分析中也被应用于对方法程序的选择,主要是那些与口述资料(参见第16章)或媒介资料(参见第21章)以及资料诠释(参见第27章)相关的方法程序。在评价方法选择决策时,除了所使用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参见第2章)这一标准之外,以研究过程为导向(参见第28、29章)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标准。

要 点

- 质性研究设计是在不同备择选项之间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
- 决定选择的因素,除了与研究相关的认知兴趣之外,还有研究实施的条件。
- 现有一系列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可供研究者选择以及部分地结合使用。
- 总地来说,质性研究设计主要是做计划,而不是做控制,尽管控制在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练习 12.1

1. 请您从文献中选择一项质性研究,并指出该研究是建立在何种设计的基础之上。
2. 在您规划自己的研究时,请您思考一下,您的研究设计包括哪些构成要素。

拓展阅读

Flick, U. (2007b).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Book 1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London: SAGE.

Marshall, C./Rossman, G. B. (2006).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4. Aufl.).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Maxwell, J. A.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An Interactive Approach (2. Aufl.).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hli: Sage.

第四部分　口述资料

第四部分介绍的是用于收集口述资料的质性方法。您可以在此发现三种基本的策略。第一,您可以使用访谈法,它建立在提问以及由此引出的回答的基础之上。第13章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作为另外一种可能,您可以利用被调查者的能力,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并由此获得与某一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叙事方法的运用也需要借助于特殊形式的访谈。例如通过叙事访谈,让被访谈者讲述他的生活史,或者通过事件访谈,让被访谈者讲述与调查主题相关的特定情况。第14章介绍了这些方法。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策略,并不是想要对个人进行个别访谈,而是旨在以团体的形式来收集资料。在这里,某一团体就研究的主题展开讨论,如以小组讨论的形式或者是以当前流行的焦点小组的形式。同样地,您也可以使用小组访谈或者共同叙事(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内部)。第15章概述了这种以团体为单位的资料收集方法。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16章)总结并比较了这三类收集口述资料的方法。

提纲访谈法 13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更细致地了解访谈的不同形式。
- 知道访谈的原则和问题所在。
- 获得有关如何设计访谈提纲的建议。
- 能够在不同形式的访谈法之间做出选择。

在美国，质性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讨论和研究实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将观察法作为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开放式访谈法则是在德语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如 Hoffmann-Riem 1980；Kohli 1978；Hopf 1978，2000a）。不过，在此期间，开放式访谈法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也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参见 Kvale 1996，2007；Gubrium/Holstein 2001）。特别是其中的提纲访谈法（Leitfaden-Interview）赢得了较多的关注，并被广泛地使用。这种对提纲访谈法的关注与人们的下述期待有关，即，与标准化访谈或问卷相比，受访者的观点更有可能在这种相对开放的访谈情境中被表达出来（比如 Kohli 1978）。人们可以区分多种不同类型的提纲访谈。以下就从两个方面——方法自身的逻辑以及它们对整个访谈法进一步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其中的几个访谈类型进行介绍。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das fokussierte Interview）是 Merton/Kendall（1979）为传媒研究而发展出来的。其做法是：在向被调查者呈现了同一刺激（电影、广播等）之后，借助一份问题提纲来调查该刺激对受访者的影响。访谈的最初目的是为解释定量研究所得出的统计上显著的结果（有关媒体在大众传媒中的影响）提供依据。定量研究与访谈平行开展或者是在访谈之后开展。研究者要事先对所提供的刺激

进行内容分析(第23章)。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确定哪些是情境的"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哪些是受访者主观的解释,以便对两者进行比较。

访谈提纲的设计和访谈的实施应该符合访谈实施的四项标准:不影响访谈对象,受访者观点及其对情境定义的特定性,把握住刺激之含义的广泛范围,以及受访者方面的深度和个人背景(参见 Merton/Kendall 1979,第178页)。以下介绍的访谈法的各个组成要素有助于使此方法达到这四个标准。

焦点访谈的组成要素

要符合**不影响受访者**这一标准可以通过不同的问题形式[①]来实现:第一种问题形式是非结构化的问题("在这部电影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第二种问题形式是半结构化的问题。此类问题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具体的内容(例如电影中的某一幕特定的场景)已经明确给出,所询问的反应方式则保持开放性(例如,"在影片中,Jo 因为神经官能症而退伍,您在看到这一部分时有何感受?")。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反应已经给定,具体的内容则保持开放性("从这个传单中,您了解到哪些新的、您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第三种问题形式是结构化问题。在这里,具体的内容和反应都已经给定("在您听了 Chamberlain 的演讲后,您觉得这是空洞的宣传呢,还是觉得它信息丰富?")。在访谈中,研究者应该首先提出非结构化的问题,之后在访谈的过程中逐渐地提高问题的结构化程度,以避免访谈者将自己的思维框架强加于受访者的观点之上(提示框13.1)。

提示框 13.1　焦点访谈的问题范例

- 在这部电影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 在影片中,Jo 因为神经官能症而退伍,您在看到这一部分时有何感受?
- 从这个传单中,您了解到哪些新的、您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 在您听了 Chamberlain 的演讲后,您觉得这是空洞的宣传呢,还是觉得它信息丰富?
- 请您回顾一下,您在看到这段电影时有何反应?
- 准确地说,是什么内容让您在看到这些电影情景时获得了这一印象?

出处:Merton/Kendall 1979

Merton/Kendall 要求人们要灵活地使用访谈提纲。访谈者应该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评价,而去进行一种 Rogers(1944)所倡导的非指示性的谈话(non-direktive Gesprächsführung)。在下述情况下,访谈会出现问题:当访谈者在错误的时刻提问,或者当所提出问题不但不能帮助受访者阐述自己的观点,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时,或者是访谈者在错误的时刻使用了错误的问题类型。

"**受访者观点及其对情境定义的特定性**"这一标准意味着访谈者应该找出那

---

① 以下引用的问题范例出自 Merton/Kendall (1979,第180-182页)。

些决定着一个事件对受访者所具有的影响的具体要素，以避免访谈停留在一般性陈述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最合适的问题形式便是那些尽可能少地对受访者进行限定的问题。为了提高特定性，研究者一方面应该促进受访者进行"回顾性反省"。研究者可在此通过提供材料（如一段课文、一张图片等）和相应的问题（如"请您回顾一下，您在看到这段电影时有何反应？"）来帮助受访者回忆起某一特定的情境。另一方面，研究者应该通过"明确地指明刺激情境"来达到这一标准（"准确地说，是什么内容让您在看到这些电影情景时获得了这一印象？"）。作为一项普遍的规则，Merton/Kendall（1979，第 191 页）指出："以具体化为目的的问题应该足够明确，以便让受访者不可避免地直接针对刺激情境的特定方面做出回答。不过，它们同时也要足够的一般化，以避免访谈者将情境加以结构化。"

"把握住刺激之含义的广泛范围"这一标准旨在确保对研究问题重要的所有方面和专题都会在访谈中被谈到。一方面，受访者在访谈中应该有可能自己引入一些新的主题。另一方面，这里也同样涉及了访谈者的双重任务：访谈者应该逐步地问及（包含在访谈提纲中的）所有的主题。在此，他可以自己引入新的话题或者推动话题的转变。这同时也意味着，访谈者应该将访谈引回到那些仅仅被提及，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话题。特别是当访谈者感到，受访者之所以改变话题，是有意要让谈话离开正在谈论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应该通过"回归性过渡"重新回到之前的话题。在达到这一标准方面，Merton/Kendall（1979，第 197 页）意识到存在着以下危险，即："所讨论的问题的广度会被表面性所替代"。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访谈者如何引入访谈提纲中的各个问题，以及他是否过分地依赖访谈提纲。因此，只有当访谈者真的想要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时，他才应该展开这些问题。

"受访者方面的深度和个人背景"这一标准意味着访谈者应该确保受访者在访谈中对自己情绪反应的描述超越类似于"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简单评价。更确切地说，这里的目标是"获得受访者有关他对刺激材料之感受的最大程度的自我暴露式的评论"（Merton/Kendall 1979，第 197 页）。对于访谈者而言，从这一目标引导出来的一项具体的任务就是，要经常检验现有的深度水平，以便于"根据所谈论的内容在访谈者认为合适的时候提高或者降低这一水平"（第 198 页）。用来提高深度水平的策略有："感情聚焦""重复隐含的或已表达出的感情"以及"指出类似的情境"。在此，我们也可以再度看到与 Rogers 所提倡的非指导性谈话的关联性。

在其他的研究领域应用焦点访谈也需要重点遵循这些普遍性的原则。在这里，访谈之中的聚焦主要是就研究主题而言的，不需要将电影等用作刺激标的。

案例　有关人性的主观观念

Oerter（1995；亦可参见 Oerter et al. 1996，第 43-47 页）以 Merton/Kendall 的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成年人访谈"（Erwachsenen-Interview），并用它来研究不同文化（美国、西德、印度尼西亚、日

本和韩国）中人们有关人性和成年的观念（参见提示框 13.2）：

> 半结构化访谈分为四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所提的问题是有关成年的一般问题，例如，一个成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对于成年而言是恰当的？第二部分分析的是成年人的三种主要角色：家庭、职业和政治。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受访者的过去，询问其在过去的两年或三年里的发展变化。访谈的最后一部分探讨的是受访者不久的将来，询问他的目标及其进一步的发展。（Oerter 1995，第 213 页）

在此之后，受访者会拿到一些两难选择性的故事，随后紧接着再接受一次焦点访谈：

> 访谈者会请受访者描述一下故事中的情境并找出解决办法。访谈者会提出问题并试着达到受访者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为此，访谈者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学会理解和评估个体当前的水平，以便能够提出最接近个体见解水平的问题。（Oerter 1995，第 213 页）

为了让访谈更多地聚焦于受访者的观点，访谈提纲还包含着一些“一般性建议”，如“请您尽可能经常地鼓励受访者：您能更详细地说明一下这个吗？对于……您的意思是什么呢？”（Oerter et al. 1996，第 43-47 页）。

提示框 13.2　成年人访谈的问题范例

1. 有关成年人的一般性问题
   (a) 成年人应该如何表现？他或她应具有哪些能力？您对一个成年人的想象是什么？
   (b) 您如何定义现实中的成年人？如何区分现实中的成年人与理想中的成年人？
   (c) 理想的成年人与现实的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成年人应该如何表现，成年人事实上是如何表现的）可以被限定吗？如何限定？（如果答案是“不可以”，请说明为什么不可以。）
   (d) 许多人认为“责任”是衡量是否成年的一个重要标准。“责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e) 追求幸福（或享有幸福）常常被视为是人们最重要的目标。您同意这一观点吗？在您看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享有幸福？
   (f) 您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生活？
2. 有关成年人三种重要角色的进一步解释
   (a) 关于自己职业角色的观念
   问题：
   要获取一份工作，您需要有什么？
   职业和工作真的是必需的吗？它们是否是成为成人的必要部分？
   (b) 有关自己未来家庭的观念
   问题：
   一个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吗？
   他在家庭中应该如何表现？他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投入其中？
   (c) 政治角色（……）
   问题：
   成年人的政治角色是什么？他有政治上的义务吗？他应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吗？
   他应该关心政治事务吗？他应该为社群负责吗？

出处：Oerter et al.（1996，第 43-47 页）

实施访谈的问题

在 Merton/Kendall(1946)提出的访谈标准中,有些目标并不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相互匹配(例如,特定性、深度与广度相对)。而且,对这些标准的遵守并不能事先(例如在设计访谈提纲时)就做到。在一个具体的访谈中,这些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的访谈情况及访谈的进展。这些标准只是强调了访谈者在访谈情境中临时要做的决定以及必不可少的对工作的优先排序。它们表明,在焦点访谈(以及其他的提纲访谈)中,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访谈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访谈的成功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在情境之中的应对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预备访谈和访谈培训得到提高,因为这样会让访问者获得在具体访谈情境中做出必要决定的经验。在访谈训练中,访谈情境被模拟出来并随后得到分析,目的是向受培训者提供一些相关的实例与经验,比如在更多的深度(通过更进一步的询问)和广度(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或者引入访谈提纲中的下一个问题)之间做出必要选择的典型实例以及在每一问题上应对不同解决办法的经验。通过这种训练,访谈者可以更好地应对上面提到的目标相互冲突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能由此得到彻底的解决。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上述四项标准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提纲访谈,即那些不使用刺激物以及研究其他问题的访谈。这四项标准已经成为设计和实施访谈的一般标准,而与此相关的问题也恰当地描述了提纲访谈所面临的困境(参见 Hopf 1978)。Merton/Kendall 针对上述标准的实现及访谈问题的设计所提出的具体建议,可以供整个提纲访谈的设计和实施用作参考。尽可能地聚焦于一个具体的问题及其意义已经成为提纲访谈的一个普遍性的目标。同样地,Merton/Kendall 所建议的用于实现这些标准的策略也成为提纲访谈所用的普遍性策略,如:给受访者尽可能充分的空间,以便他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人们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观见解。采用此方法的研究目标可以是为之后的定量研究发展假设,也可以是为了对实验性研究发现做出更深入的解释(参见 Merton/Kendall 1979,第 202 页)。在这里,被调查的群体通常来说事先就已经被确定好了,而且研究过程(参见第 8 章)采用的是线形设计。研究问题关注的是具体事件的影响或者是对自我行动条件的主观加工(参见第 9 章)。对资料的分析和诠释虽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法程序,不过,编码性程序(参见第 23 章)在此显得尤为合适。

方法的局限性

在访谈中使用刺激物(比如一部电影)是焦点访谈的特征。这一做法对于提

纲访谈的标准情境而言是一个至今很少得到运用的进一步发展。不过,这一做法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基本的问题。Merton/Kendall 所研究的主要并非是受访者对具体的刺激材料的感知和评估,而是对电影刺激材料感知方面的一般性相互关联。他们是在这一关联性中来关心受访者有关具体材料的主观见解的。他们想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来获得可与"对情境的主观定义"相区分的"事件的客观事实"(1979,第 172 页)。这一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不过,通过这种分析,他们也的确获得了有关所研究对象的另一种版本的认识。他们可以将这一认识与单个受访者的主观见解以及不同受访者的多种多样的见解进行比较。此外,他们为回答以下问题提供了依据:受访者描述的哪些内容与对电影所做的内容分析结果相符合?受访者遗漏了哪些内容,尽管这些内容按照研究者的分析确实是存在于电影之中的?哪些主题是受访者引入或添加的?

焦点访谈法的另一问题在于,它很少以完全的和纯粹的形式得到使用。这一方法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对设计和实施其他提纲访谈起到的启发和促进作用。其他的提纲访谈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被人们经常使用。此外,针对研究对象结合使用开放式访谈与其他方法途径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在诠释通过访谈所获得的主观见解时,通过这些其他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可以用作参考。对于这一思想,研究界以"多元结合法"为关键词进行了更广泛地讨论(参见第 29 章;也可参见 Flick 2007d)。

半标准化访谈

Scheele/Groeben(1988)为**重构主观理论**(Rekonstruktion subjektiver Theorien)所提出的方法是对提纲访谈的一种进一步发展。[①] 主观理论在这里指的是以下事实,即受访者有关于研究主题的复杂的知识储备。这一知识储备一方面包括明确的、可供支配的观念,受访者可以自发地针对开放性问题表达出这些观念;另一方面,这一知识储备也包含着隐含性观念(implizite Annahmen)。要想让受访者明确表达出这些隐含性观念,访谈者须对其提供方法上的帮助。因此,研究者会在此使用不同类型的问题(见下面)。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重构受访者有关研究对象的主观理论,例如咨询师在向当事人提供咨询的活动中所使用的有关信任的主观理论(参见 Flick 1989)。作为对访谈的补充,访谈者会在第二次和受访者会面时应用"结构置放技术"(Struktur-Lege-Technik)。在这里,访谈者会和受访者一起将其在第一次访谈中所做的陈述置入一种结构之中,并通过相互沟通来确定该结构的正确性,换句话说,访谈者要在此获得受访者对这些陈述内容的赞同。

---

① Brigitte Scheele 和 Norbert Groeben 是德国心理学家,他们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发展出了用来研究主观理论的方法,作为一种研究人们所持有的日常知识的特定的模型。他们用此方法来研究人们在学校和其他职业领域的主观理论。——译者注

半标准化访谈的组成要素

通过访谈,主观理论的内容得以重构。访谈提纲包括不同的主题领域。每一个主题领域均由一个开放性问题引出并由一个对立性问题结束。对于**开放性问题**[①](“您认为人们为什么要彼此信任?”),受访问者可以用他可直接支配的知识作出回答。

作为补充,研究者也会提出一些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以假设为导向的问题。它们或出自相关的学术性文献,或是建立在研究者理论性预先假设的基础之上(“陌生人之间有可能彼此信任吗,还是说参与者必须彼此相识?”)。在访谈中,这些问题所问到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受访者将那些不直接供支配的、隐含性知识明确表达出来。在这些问题之中所表达的观点对于受访者而言仅仅是建议,受访者可以“根据其是否与他的主观理论相一致”来采纳或者拒绝这些观点(Scheele/Groeben 1988,第35-36页)。

第三类问题是对立性问题。通过这类问题,研究者旨在再度批判性地审视受访者在之前谈过的每个问题领域中所提出的那些理论和相互关系。为此,访谈者会提出一些与之相矛盾的备择性的理论和相互关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访谈者所提出的这些备择性的理论和相互关系必须与受访者的陈述“真正地在主题上相对立”,以避免受访者可以将其轻而易举地融入他的主观理论。因此,访谈提纲在相应的地方会列出一些这样的问题供访谈者选择。至于哪个问题会被提出,要视受访者在访谈中所表达的有关对研究对象的看法而定。

在这里,访谈实施的特点是:根据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科学理论在内容上确定问题领域以及有针对性地设计访谈问题(以研究假设为导向的问题)(提示框13.3)。

提示框13.3 半标准化访谈的问题范例

- 请您想一下您的职业活动,并简单地谈一谈,您在看到“信任”这一概念时会想到些什么?
- 请您告诉我,当事人和咨询师之间的信任有哪些根本性和决定性的特征?
- 您认为人们为什么要彼此信任?
- 陌生人之间有可能彼此信任吗,还是说参与者必须彼此相识?
- 有句谚语说:“信任好,监督更佳。”请您想一下您的职业行为以及您与当事人的关系,您是否认为,参与者应该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事情呢?
- 当事人和咨询师可以在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吗?
- 在最低程度的控制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彼此信任吗?
- 那些愿意信任的人和那些不愿意信任的人有什么不同?
- 是否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这些值得信任者与其他人的区别何在?
- 在您的工作中,是否有一些活动在您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信任的情况下也能开展?

---

① 以下的问题范例引自 Flick (1989)。

- 请您想一下您所工作的机构,哪些因素有助于您和您的当事人建立信任?哪些因素使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变得更为困难?
- 人们来您所在机构的方式会影响到信任关系的建立吗?
- 当您意识到当事人信任您时,您会在更高的程度上感到要对他负责吗?

出处: Flick 1989

结构置放技术

最多在第一次访谈后的一周或两周之内,访谈者应与受访者第二次会面,以实施结构置放技术(Struktur-Lege-Technik, SLT)。在完成对第一次访谈的转录以及对其进行了粗略的内容分析之后,访谈者将受访者的主要观点写在小卡片之上并将其交给受访者检查。这么做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检查内容。受访者应该回想一下上一次的访谈并检查其内容是否被正确地呈现在小卡片上。如果不正确的话,受访者可以重新表述、取消既有陈述以及/或者以其他更为贴切的陈述来取代。这样,内容检查——通过沟通让受访者检验陈述的正确性——的工作就暂时完成了。在此之后要完成的第二个目标是借助结构置放技术将余下的概念以类似于科学理论的形式加以结构化。为此,受访者在第二次访谈开始之前会拿到一个有关结构置放技术的简短的介绍文稿。该文稿通过一些直观的例子让受访者熟悉结构置放技术的应用规则以及——如果必要和可能的话——作为其基础的思维方式。[①] 图 13.1 除了包括一个应用实例的摘录之外,还介绍了几个可能的规则用来表达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A”是“B”的前提或者“C”对“D”具有促进作用等。

应用结构置放技术所完成的这一结构化过程的结果是一种对主观理论的图示。在结束时,受访者可以将他的结构化方案与访谈者在两次会谈之间所做的结构化方案进行对比。与访谈中所使用的对立性问题类似,这种对比有助于受访者透过相互竞争的备择性方案再次反思自己的看法。

案例 有关咨询中信任的主观理论

在有关咨询中的“信任”的研究中,我运用这一方法访谈了 15 位来自不同职业群体的咨询者(Flick 1989)[②]。访谈提纲包括以下的内容领域:对信任的定义、风险与监控之间的关系、策略、信息与先期知识、信任的原因、对社会心理工作的意义,以及机构环境和信任。访谈表明,主观理论是如何为以下内容提供知识储备的:确认开始咨询时不同类型的初始情况,有关咨询情况之理想类型及其实现条件的目标设想,以及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下哪怕只是近似的创设这种条件的想法。对相关的行动情境的分析表明,咨询师是如何按照这些知识储备来行动的,以及如何用这些知识来应对当前的、新的情况的。

---

① Scheele/Groeben(1988,第 53-58 页)在其书中提供了一份完成的规范文稿。按照经验,研究者应该按照自己的研究问题对这一文稿进行适应性调整,并使其适合受访者。特别是其中用来说明的例子需要加以调整。

② 这里谈到的职业群体有心理学者、社会工作者和医生。——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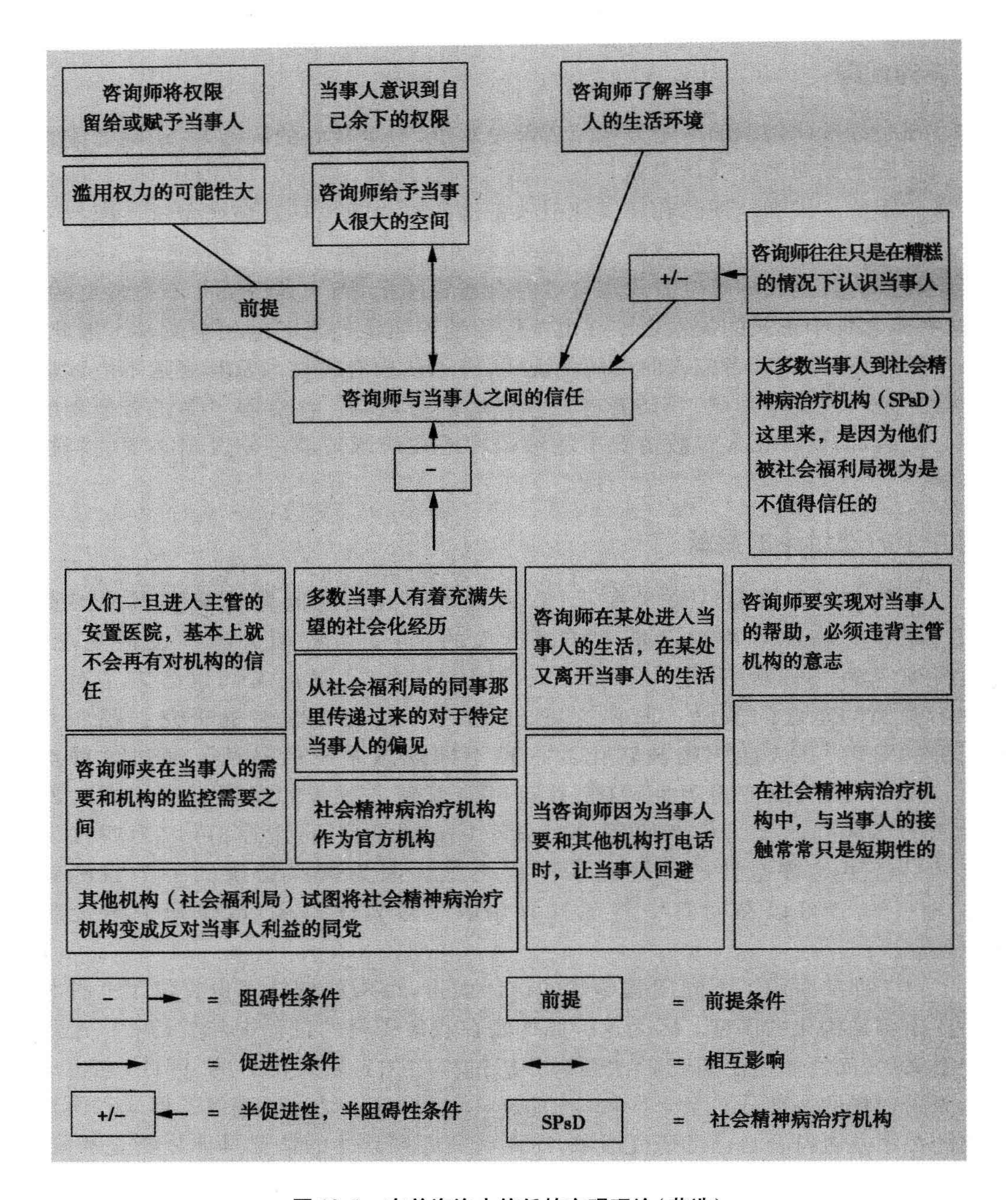


图 13.1 有关咨询中信任的主观理论(节选)

对于以下问题"请您想一下您的职业活动,并简单地谈一谈,您在看到'信任'这一概念时会想到些什么?"一个受访者给出了如下的回答:"当我想到我的职业活动时——嗯(……)很多人会在开始时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在这一关系中信任我,因为我代表的是公共机构(……),我是否真的会将他们告诉我的信息保密。(……)信任对我而言就是,在这里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会如何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我自然可以做到保密,不过,如果他们向我讲述一些具有危险性的事实,而让我感到难以保密时,我也会当场告诉他们。嗯,对我而言,这就是信任,坦白地对待保密义务,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主要内容。"

实施的问题

在半标准化访谈的两个方法组成部分这里,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访问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让受访者认识到其做法的合理性,并避免对立性问题可能会带来的困扰。详细地说明和谨慎地引入备选的对立观点是避免产生这些困扰一种方法(例如:人们也可以这样来看您刚才谈到的问题……)。结构置放技术的规则和作为其基础的思维方式也有可能会造成困扰,因为其做法并不是常见的,即,将概念置于正式的关系之中并由此形象地说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里的建议是,访谈者应该向受访者说明,应用结构置放技术及其规则不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成绩测试,受访者应该轻松地加以对待。在克服了受访者最初的担心之后,访谈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成功地在访谈情境中创设出必要的轻松氛围。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此种方法的普遍性意义在于,它通过不同类型的问题让研究者能够更加清晰和明确地对待自己带入访谈情境的、与受访者相关的预设性观念。质性研究的"开放性原则"(Hoffmann-Riem 1980)常常被人们误解为是对一种不明确的态度的鼓励。而在这里,通过在不同的程度上就研究主题展开明确的对峙,开放性原则被转化为一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受访者的观点变得更加明确,并且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方法所使用的不同问题类型作为将隐含性知识明确化的不同途径,可以为质性访谈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指明解决之道。因为这些访谈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受访者可以在回答中将现有的知识尽数表述出来,以供研究者诠释之用。

对于那些采用了不同问题形式的访谈而言,结构置放技术也提供了一种将访谈内容**结构化**的模型。因为这一结构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与受访者一起发展出来的,而并非是由研究者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独自发展出来的,因此,它也成为原始资料的一部分。至于 Scheele/Groeben 针对这一结构所建议的形式和所建议的关系是否符合自己的研究对象,需要研究者视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总地来说,半标准化访谈建议了一种明确地考虑到在访谈情境之中重构研究对象(这里指的是主观理论)的方法,而不是宣扬一种或多或少无前提条件地对研究对象的接近。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此种方法的理论背景是对主观见解的重构(参见第 6 章)。作为研究的基础,研究者会就这些主观见解的结构和可能性内容提出预先假设。尽管如此,此方法还是为主观理论在内容上的组织留足了空间,因此,无论是发展扎根理论的一般性目标,还是以案例为导向的抽样策略的应用(参见第 11 章)都可以在此得

以实现。使用此方法所研究的问题一部分关注的是主观理论的内容(例如精神病患者有关疾病的主观理论),另一部分关注的是这些主观理论在活动(如职业活动)中是如何被运用的。

方法的局限性

因为此种方法的要求很高(如问题类型、结构置放技术规则),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针对研究问题和潜在的受访者对其进行调整。调整的办法是减少 Scheele/Groeben 所建议的规则,有些时候则是放弃提出对立性问题(例如,在就有关"疾病"的主观理论访谈患者时)。因此,大部分对主观理论的研究只是运用了该方法的一种缩减版本。该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所收集资料的分析,因为它并没有针对如何分析资料提出明确的建议。经验表明,编码性分析程序(参见第 23 章)在此是最合适的分析方法。因为个案的结构复杂,研究者在推广其结论时会遇到如何将不同的主观理论归入群体的难题。如果研究问题是与(如传记性)发展历程或行动的无意识部分有关,那么这种方法便不适用了。

问题中心访谈

由 Witzel(1985)提出的"问题中心访谈"(das problemzentrierte Interview)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关注,并得到人们的使用。在这种访谈中,访谈提纲包括问题和叙述刺激(Erzählanreiz)。研究者主要是将其用于收集与某一特定问题相关的传记性资料。问题中心访谈具有三项核心的标准:**以问题为中心**,即"研究者以某一重要的社会问题为取向"(Witzel 1985,第 230 页);**以对象为导向**,即所用方法应该针对研究对象得到发展和调整;最后一项标准是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在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中做到**以过程为导向**。

问题中心访谈的组成要素

由 Witzel 提出的访谈方法包括四个"组成要素":"质性访谈""传记方法""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Witzel 1985,第 235-241 页)。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质性访谈的设计。这一质性访谈包括四个组成部分:①一个在访谈前使用的简短问卷,②访谈提纲,③录音记录,④访后记录(即访谈报告)。访谈提纲虽说应该促进"由受访者自己所发展出来的叙述线索"(Witzel 1985,第 237 页)的展开。不过,最主要的是,"当谈话陷入停顿或者当所谈话题收效不大时",访谈提纲可被用作转变访谈方向的基础。访谈者应该根据访谈提纲来决定,"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有关话题,他应该何时通过提出导向性问题将其以问题为中心的认知需要引入访谈"(参见提示框 13.4)。

在以问题为中心的访谈中,Witzel 提到了四个核心的沟通策略,即:访谈开始、一般性探询、专门探询和临时性问题(第 245 页)。在对青年人职业选择的研

究中，Witzel 使用了如下策略作为访谈开始："请您简单地谈一谈，您是怎么想到要成为（一名汽车机械师）的呢？"（第 246 页）一般性探询旨在通过在访谈中进行追问获得补充性"资料"以及有关至今所谈内容的更多细节，比如："在那里具体发生了什么？"或"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呢？"（第 247 页）专门探询旨在深化访谈者对谈话内容的理解，其做法是：再现已谈到的内容（访谈者的概括总结、反馈及诠释），提出理解性问题，以及向受访者指出其叙述中的矛盾和不协调之处。在这里，"重要的是，访谈者可以表明他对所谈内容的兴趣并且能够维持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第 249 页）。

提示框 13.4　问题中心访谈的问题范例

1. 当您听到"健康的风险或危险"这一关键词时，您会自动地想到些什么？
2. 您认为自己面临着哪些健康上的风险？
3. 您有没有为保持身体健康做些什么？
4. 许多人说，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有毒物质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a) 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b) 您有没有感到自己的健康受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是哪些？
   (c) 是什么促使您去关心环境污染的健康危害呢？
   (……)
11. (a) 您如何获取有关"环境与健康"这一问题的信息？
    (b) 您对媒体中的有关信息有何看法？
    (c) 在您看来，相关的学术性报告有多可信？政客的可信度如何？

出处：Ruff（1990）

案例　有关胸腺性气喘疾病的主观理论

Ruff（1998）在一项研究中采用了问题中心访谈法。该研究访谈了 32 名患有胸腺性气喘病（一种由于环境污染而在儿童身上引发的严重咳嗽）的儿童的父母，分析了他们有关疾病的主观理论。[①] 访谈提纲（参见提示框 13.4）包括了以下一些"关键问题（……）：

- 第一次发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父母们当时是如何处理的？
- 父母们认为孩子患病的原因是什么？
- 父母们对于问题的看法对其日常生活及生活规划产生了哪些影响？
- 在父母们看来，是哪些环境污染危害了孩子的健康？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Ruff 1998，第 287 页）。

作为主要结论，研究者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父母在其主观疾病理论中认为在他们孩子的呼吸道疾病和空气污染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尽管空气污染在多数情况下仅仅被视为是众多可

① 本章之前介绍的方法是专门为主观理论的重构而发展出来的。而问题中心访谈也可以用来实现这一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介绍的两个案例都以主观理论为研究对象，只是一个巧合。

能性原因中的一个，并且这一因果关系假定具有很高的主观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大多数父母还是根据这一新的问题理解对孩子日常生活的组织以及部分生活规划作出了相应的调整。（Ruff 1998，第292-294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对于此方法之外的一般的方法讨论而言，Witzel有关在访谈中使用一份**简短问卷**的建议值得借鉴。使用这一简短问卷可以让研究者单独收集那些对访谈主题而言重要性较低的资料（例如人口统计学的资料）。这样做可以降低访谈问题的数量，特别是在访谈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尤为有益，因为它可以将紧缺的谈话时间用于更重要的话题。与Witzel提出的在访谈之前使用简短问卷的建议不同，笔者认为，人们也可以在访谈结束时使用它。这样做可以避免该简短问卷的问答结构影响到访谈中的对话。[①]

访后记录作为出自Witzel所提出的方法的第二个建议，也可以被其他的访谈形式所采用。在访后记录中，访谈者应该直接在访谈后记录下他有关以下方面的印象：交流、受访者个人、访谈者本人及其在访谈中的表现、外在的影响、实施访谈的空间等。这样做就可以将那些可能具有启发意义的背景信息记录下来了。这些信息对于之后对访谈中所作陈述的诠释可能会有帮助，并可以允许对不同的访谈情境进行比较。

为了更好地记录访谈中的陈述，Witzel建议对访谈进行录音。这一做法目前已得到提纲访谈法的普遍采用。Witzel所建议的、用来深化受访者回答的各种追问策略（一般性探询和专门探询）同样也可以被其他访谈形式所采用。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对主观见解的分析构成了问题中心访谈法的理论背景。采用此方法的研究建立在一种过程性模型的基础之上，目的旨在发展理论（参见第8章）。研究问题指向有关事件或社会化进程的知识。为了实现该方法的过程取向，对受访者的选择应该逐步进行（参见第11章）。对于分析资料的方法，此方法并没有作出特殊的规定。不过，它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编码性分析程序，特别是质性内容分析法（参见第23章）。

方法的局限性

在Witzel对访谈的设计中，他对将叙事和提问相结合的做法从实用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同样地，对于以下决定，即何时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资料收集方法

---

① 对于简短问卷的问题，受访者往往仅需作出简短的回答。而在访谈中，研究者则希望受访者做出详细的叙述。在访谈前使用简短问卷的问题是，这里形成的简问简答的结构可能会影响到访谈中的对话结构。——译者注

以及何时应该从一种资料类型转化到另一种资料类型，Witzel 也从实用角度进行了论证。在许多应用了问题中心访谈法的研究中，人们主要是借鉴了该方法特定的访谈程序及其设计访谈提纲的方式。而对于 Witzel 所提出的其他的方法组成部分（小组讨论、传记方法），人们则较少参考。

以上介绍的几种提纲访谈方法都在方法论方面得到了详细的阐述：首先介绍的是焦点访谈，因为它对整个提纲访谈法都有深刻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为提纲访谈的实施设定了目标。半标准化访谈包括不同的问题类型，并补充了有关如何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将访谈内容结构化的思想。问题中心访谈补充提出了记录访谈情景以及将次要信息移出访谈的建议。本书下面简单地介绍几个其他类型的提纲访谈，它们是针对质性研究的特定应用领域而被发展出来的。

专家访谈

Meuser/Nagel（2002）所讨论的专家访谈（das Experten-Interview）是提纲访谈法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传记访谈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受访者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作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参加研究的。他也不是作为一个个案，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特定的专家群体，也可参见第 11 章）的代表而被纳入研究的。这里应该说明的问题是，谁应被视为是专家呢？对这个问题，人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 人们对于谁是或者何谓“专家”这一问题的回答，视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人们可以将那些有资格和适合作为某一特定领域“内行”的人称为专家。（Deeke 1995，第 7-8 页）

根据这一定义，具有特定生涯经历的人是有关他本人的专家（Schütze 1983），慢性病患者是有关自己疾病的专家。当人们使用专家访谈法时，其调查对象通常来说是某一组织中处在特定的职能领域及具有特定的（专业性）经验知识的成员。为此，Bogner/Menz（2002，第 46 页）对专家和专家知识做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描述性定义：

> 对于他所在的特定的专业性或职业性活动领域，专家拥有技术性知识、过程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因此，专家知识不仅仅包括系统化的和可通过反思获得的专业知识或特殊知识，而且在很大一部分上也包括实践知识和行动知识。这些实践知识和行动知识包括不同的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行为准则、个人的决策规则、集体性取向和社会解释模式。专家的知识、他的行为取向、重要性等有可能——而且这是决定性的——在某一特定的组织或功能领域变得具有霸权性。这就是说，专家有可能贯彻实现（至少是在部分上）他的意向。当专家的知识对实践产生影响时，处在其行动领域中的其他行动者的行动条件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专家的知识给结构化了。

当研究者计划进行专家访谈时，以上所描述的专家在其领域的作用常常会造成一种时间上的压力。基于这一原因，尽管 Schütze 的叙事访谈（1983，参见第

14 章)最初是作为一种用来就某一行动过程(地方性决策过程)问题访谈专家(地方政治家)的方法而被提出来的,不过专家访谈通常来说还以提纲访谈的形式进行(Liebold/Trinczek 2002,第 33 页)。在使用专家访谈时,对受访者作为具有某一特定职能的"内行"身份的专注,限制了受访者所应"提供"的潜在重要信息的范围。这种限制要明显高于其他形式的访谈。

专家访谈的目的与形式

专家访谈可以被用于不同的目的。Bogner/Menz(2002,第 36-38 页)提出了一种专家访谈分类,包括三种不同的使用形式:①专家访谈可以被用于探索新的领域,为进入新的领域提供导向。研究者可以通过专家访谈"在主题上将研究领域加以结构化,获得研究假设"(第 37 页)。专家访谈还可以被用来发展正式的访谈提纲,研究者可以用该访谈提纲访谈其他的目标团体(例如,病人)。②系统化的专家访谈可以被用来为通过其他方法(例如,对病人的访谈)所获得的知识提供补充信息。③理论发展型专家访谈旨在通过重构不同专家的知识来发展一种有关所研究领域的理论或类型学——例如,在特定机构工作的人有关某一目标群体之需求的知识的内容和漏洞。在这里,Meuser/Nagel(2002,第 76 页)区分了运行知识和背景知识,并通过专家访谈来获得这两类知识。运行知识(Betriebswissen)是有关某一特定过程发展情况的信息:在医院中引进质量保证手段是如何进行的,在这里具体出现了哪些问题,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当一个人在某种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如流离失所)患了慢性疾病时,会发生些什么,他应该首先向谁求助,他会遇到哪些阻碍,典型的病人生涯是如何发展的?与以上有关过程的运行知识不同的是背景知识(Kontextwissen):此类事件出现的频率多高,有哪些机构对此负责,医疗保险的地位(有可能没有医疗保险)在此扮演了何种角色,等等?

专家访谈的实施

由于时间压力和在应用上的聚焦,访谈提纲在这里在排除收获不大的话题方面起着更大的调控作用。与这一特点相适应,Meuser/Nagel 探讨了专家访谈的一系列问题及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在这里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访谈者是否能够成功地将访谈及受访者限定于或固定在他所感兴趣的专业方面。Meuser/Nagel(2002,第 77-79 页)指出了以下几种专家访谈失败的情况:

- 在访谈过程中,专家导致了访谈的中止,因为与人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不同的是,他根本不是该问题领域的专家。
- 专家不谈论访谈的主题,而是谈论其工作领域的内部情况和矛盾纠葛,从而将访谈者变成当前纠纷的知情人。
- 专家常常在其作为专家的角色和作为个人的角色之间变换,以至于访谈者获得有关其个人的信息多于其专家知识。
- "修辞性访谈"(das rhetorische Interview)是一种介于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形式。

在这种访谈中，专家以演讲的形式阐述其知识，而不遵照访谈的问答结构。如果他的报告与访谈主题相符合，那么访谈还算是成功。如果专家偏离了访谈主题，这种互动形式便难以让受访者回到与访谈相关的主题之上。

在专家访谈中，访谈提纲具有一种双重功能：

> 在发展访谈提纲时所投入的工作可以避免让研究者显得是一个不合格的对话伙伴。(……)以访谈提纲为导向既可以避免访谈陷入与主题无关的话题，也可以让专家即兴地讲述他的事情以及他对事情的看法。(Meuser/Nagel 2002，第77页)

专家访谈的使用方式

与其他的方法一样，如果研究旨在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不同机构的代表者在某一问题领域所拥有的专家知识的内容及其变化形式，那么，专家访谈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要选出合适的受访者，完成足够多的访谈，并进行分析(参见 Meuser/Nagel 2002，第80-91页)。同样地，至少是在相同的频率上，专家访谈也被用作其他研究方法的补充，如在研究的准备阶段开发调查工具或者为在研究实地中行动提供导向(参见上述内容)，或者与其他的访谈同时开展，以补充完善通过其他访谈(如对患者的访谈)所获得的信息。最后，专家访谈也可以被用在主要的资料收集工作之后，例如让专家来验证通过对患者的访谈所获得的知识。在这些情况下，专家访谈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得到使用，而是被用作补充性的方法。不过，这两种使用方式都可以实现对有关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的多元结合(参见第29章)。

实施的问题

首先，要确认“真正的”专家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当研究者想要分析机构中的运行进程时。其次，让专家接受访谈往往也比较困难。在这里，包括在访谈中，都会出现时间压力的问题——专家访谈的规划和实施常常要比其他形式的质性访谈更为紧张。最后，专家访谈常常要求访谈者自己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以便可以理解访谈中谈到的有时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与进行恰当的追问。此外，保密性问题也会在此出现——访谈常常会涉及一些对某一企业而言棘手的话题，还有它与市场上其他对手的竞争。这有可能会导致受访者拒绝作出回答或者不愿意允许对访谈录音(参见第22章)，还有可能带来上级主管机构的复杂的审批过程。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在这一应用领域，提纲访谈的各种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调控问题(Steuerungsprobleme)在这里表现的更为严重，因为访谈者感兴趣的不是受访者这个人，而是他特定的能力。在专家访谈这里，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质性社会研究在方法上的问题被展现出来，具体表现如下：人们如何做到在有限的时间内，以特定的问题为焦点，通过在方法上得到控制的渠道来获得主观体验，而又不去

关注完整的个人或完整的生活史？在专家访谈这里，访谈者有必要在访谈中表明，他也熟悉访谈的主题。这是成功开展此类访谈一个普遍性的条件。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专家访谈的理论背景是就一个特定的方面重构主观见解（参见第6章）。专家访谈在选择受访者方面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理论性抽样在此只是选择之一，而Patton（2002）所建议的方案在有些时候要更为合适（参见第11章）。对专家访谈的分析主要是对专家知识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比较，人们在这里常常会使用编码性分析程序（参见第23章）的一些特定形式。

方法的局限性

鉴于专家访谈以特定的问题为焦点，因此它常常仅仅是作为一种补充性方法被人们所使用。时间压力和在此出现的其他技术上的问题，表明专家访谈作为一种单独使用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对于很多研究问题来说，仅仅聚焦于一个特定专家群体的知识也显得有些狭隘。

民族志访谈

在实地研究中，虽说参与式观察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不过，在应用参与式观察法时，访谈法也会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参见Becker/Geer 1979；Spradley 1980）。在这里，一个特殊的问题是，研究者如何才能将在实地中自然出现的谈话组织成访谈，让对话伙伴能够系统地将其有关研究主题的特定经验表达出来。与其他那些专门为访谈约好了时间和地点的访谈情境相比，民族志访谈（das ethnographische Interview）的空间和时间框架都更少地得到明确的界定。在这里，因为有定期的实地接触，访谈的机会常常会自动而出乎意料的出现。对于此类民族志访谈的实施，Spradley（1979，第58-59页）提出了以下明确的建议：

> 我们最好将民族志访谈想象为一系列亲切的闲谈，研究者在此只是慢慢地在谈话中引入新的元素，促使信息提供者作为信息提供者做出回答。如果研究者完全使用这些民族志方法要素或者过快地将它们引入谈话，就会将访谈变成正式地询问。和谐的关系将会消失，信息提供者可能会中止其合作。

根据Spradley的论述（1979，第59-60页），民族志访谈包含了以下有别于“亲切的闲谈”的构成要素：

- 一个明确的谈话目的（源自研究问题）。
- 民族志解释：访谈者会在此介绍其研究项目（为什么要进行访谈），或者解释其对发言的记录（为什么他要做记录）。作为补充的还有：访谈者用日常语言所进行的解释（目的在于用信息提供者的语言向其说明问题），有关访谈的解释（向信息提供者说明，为什么选择了这一特定的谈话形式，以便说服其参

与),对特定问题(问题类型)的解释,明确地介绍提问的方式。

- 民族志问题:即描述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表明,信息提供者是如何组织其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知识的)和对比性问题(通过这类问题可以获得有关以下内容的信息,即:信息提供者用来区分其世界中的物体和事件的意义维度)。

由于民族志访谈的开放性框架,创设并维持访谈情境这种普遍性的方法问题在这里表现的更为明显。以上那些 Spradley 所提到的设计和明确界定访谈情境的特征同样也适用于在其他情境中使用提纲访谈。虽然说,其中的一部分解释可以在正式的访谈之前进行。不过,对于一种可靠的工作同盟关系的建立,Spradley 所描述的那些明确的解释不管怎样都是有帮助的。对于所要进行的主要访谈而言,这一工作同盟可以保证受访者真正地参与访谈。

民族志访谈主要是和实地研究策略和观察策略结合使用的(参见第 17 章)。Heyl(2001)提供了一份新近的有关应用民族志访谈法的概述。以 Kvale(1996)的研究为依据,Heyl 在更大程度上将访谈当作是一种访谈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合作建构(Ko-Konstruktion)。Heyl 将有关民族志访谈的讨论与近来的有关访谈设计的研究(例如 Bourdieu 1996; Gubrium/Holstein 1995; Kvale 1996, Mishler 1986)结合了起来。不过,她并没有从中发展出一种特定的民族志访谈法。

提纲访谈法的实施:协调问题与引导

到现在为止,笔者已经介绍了作为质性研究方法支柱之一的提纲访谈法的不同形式。[①] 这些访谈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研究者会以访谈提纲的方式将或多或少的开放性的问题引入访谈,供受访者自由地对此作出回答。为了在使用前对调查工具进行检验,Ulrich(1999,第 436-437 页)提出了四个参考依据。研究者应该在设计访谈提纲时依据它们来批判地审视每一个问题(参见提示框 13.5)。

提纲访谈法的立足点是,在标准化的访谈或问卷中的那些限制性规定,如在什么时候以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不仅不能让研究者获得有关主观见解的了解,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不过,在提纲访谈法这里,研究者在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主观看法时,会遇到以下的协调问题(Vermittlungsprobleme),即在访谈提纲的目标要求和研究问题的目标以及受访者呈现主观理论的方式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因此,访谈者可以而且应该在访谈过程中决定,他应该问哪些问题,什么时候问以及按照何种顺序问。访谈者可以在访谈中当场决定,某个问题是否已被受访者顺带着做出了回答,因此可以不必再提该问题。同样地,访谈者在访谈中还面对着以下的问题,即他是否以及何时应该更详细地深入追问及支持受访者

---

① 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还有传记访谈(Fuchs 1984,第 179-181 页)。在这类访谈中,人们借助一个提纲收集传记资料。不过,因为大部分此类研究都采用叙事的方法,所以,对此类方法的介绍在下一章进行。

提示框 13.5　检查访谈问题的参考依据

1. 为何问了这个问题,或为何提供了这个叙事刺激?
   —理论意义
   —与研究问题相关度
2. 问题询问的是什么?
   —内容维度
3. 为什么这样表述问题(而不是以其他方式)?
   —可理解性
   —明确性
   —问题的有用性
4. 为什么这一问题(或一组问题,这一叙事刺激)处在这一特定的位置?
   —访谈提纲的粗略结构和精细结构
   —各种问题类型的分布
   —各个问题之间的关系

进行详细的阐述,当受访者的讲述偏离主题时,他是否以及何时应该将谈话引回到主题上来。因为访谈者在具体地组织实施访谈时具有这些决策余地,同时又要努力做到无论如何要谈到已经事先确定好的那些特定的话题,因此,人们在此使用"半标准化访谈"的概念。这些单个的决定都只能在具体的访谈情境中做出。这就要求访谈者对于具体的访谈进展和受访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此外,此类决定还要求访谈者对于已经说过的话及其对于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有很好的了解。为此,访谈者不可避免地要在访谈进展和访谈提纲之间进行持续性的调节。Hopf(1978)告诫研究者不要犯**提纲官僚主义**(Leidfadenbürokratie)的错误。这将会降低提纲访谈在开放性和获取情境信息方面的优越性。因为访谈者在这种情况下会过于死板地固着于访谈提纲,在不当的时刻打断受访者的叙述,转向下一个问题,而不是去深入地挖掘。Hopf(1978,第 101 页)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 访谈提纲对访谈者具有保护功能,可以帮助他克服开放性或不明确的谈话情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感。
- 访谈者担心自己没有忠于研究目标(例如,由于略去了一个问题)。
- 时间压力(由于受访者有限的时间)和研究者对信息的兴趣之间的两难困境。

因此,一项详细而周到的**访谈训练**(Interviewtraining)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训练中,访谈者可以通过角色游戏练习对访谈提纲的使用。这些模拟的访谈情境会被录下来(如果可能的话,可进行录像)。在此之后,所有参与研究的访谈者共同对其进行评估,评估所指向的内容有:访谈错误,对访谈提纲的使用,引入和转变话题的做法与问题,访谈者的非言语行为以及他对受访者的回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统一不同访谈者的干预行动及其对访谈的调控。通过这种方

式，访谈者可以共同地确认访谈的“技术性”问题并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为访谈的实施打好基础。

Hermanns(2000)针对正式访谈的准备和实施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他将访谈互动描述为一出戏剧。在这出戏剧中，访谈者为事件的展开——呈现受访者有关研究对象的看法和经验——搭建舞台。这出戏剧“创造了剧中的人物角色”——受访者的角色是就研究主题和其个人进行自我表现，而访谈者的角色则是积极的和宽容的听众，他让受访者恰当而充分地发言，并对他提供帮助和促进。在其富有启发的有关“引导访谈的导演说明”中，Hermanns(2000，第367-368页)给出了如下的提示：

1. 及时地向您的受访者说明整个框架结构(……)
2. 在访谈中创设良好的氛围(……)
3. 为您的受访者留足空间去展现自我(……)
4. 为这出“戏剧”创造独立发展的可能(……)
5. 不要在访谈中尝试去发现理论性概念，而是要去发现受访者的生活世界。

在技术性操作层面上，Hermanns强调了要自然而然地对待录音机的重要性。这样可以避免访谈者将自己对于录音的不确定性和障碍转移到受访者那里。

提纲访谈法的优点在于，前后一致地使用访谈提纲可以提高所收集资料的可比性，并通过问题赋予资料一定的结构。如果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获得有关某一主题的具体陈述，那么，提纲访谈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途径。不过，如果研究的中心是某一个案的发展历程或者是有关经验的背景，那么，研究者就要考虑一下，是否有关个案发展和经验的叙事法应该是首选的方法。

要　点

- 采用本章介绍的各种访谈形式可以从不同的途径实现类似的目标。受访者应该获得尽可能大的空间来呈现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应该给他们设定结构，以告诉他们应该在他们的回答中谈论什么主题。
- 这里介绍的访谈形式可以像介绍的那样被人们使用。不过，通常的情况是，它们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导向，供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在规划和设计访谈及访谈问题时参考。
- 准备追问式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当受访者的回答过于一般化时，或者当其回答偏离主题时，访谈者应该问什么？
- 访谈可以通过第二次会谈得到补充。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与受访者的沟通来检验其访谈陈述的正确性并将其加以结构化。

练习 13.1

1. 请您找出一项以访谈法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并试着指出，该研究使用了本章所介绍的哪一种方法或者是以哪一种方法为导向。
2. 请您观察一下在该项研究的访谈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并考虑一下，如何以本章中所介绍的某一种方法为参考对其加以完善。

3. 请您以本章所介绍一种访谈形式为准，为您自己的研究设计一个访谈提纲。

拓展阅读

焦点访谈

Merton, R. K./Kendall, P. L. (1979). Das fokussierte Interview. In: C. Hopf/E. Wingarten (Hrsg.).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S. 171-204 (zuerst 1945/1946).

Merton, R. K. (1987). The Focused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550-556.

Oerter, R., Oerter, R., Agostiani, H., Kim, H. O./Wibowo, S. (1996).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in East Asia: Etic and Em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 Psychology, 2:9-51.

半标准化访谈

Scheele, B./Groeben, N. (1988). Dialog-Konsens-Methoden zur Rekonstruktion Subjektiver Theorien. Tübingen: Francke.

问题中心访谈

Ruff, F. M. (1998). Gesundheitsgefährdungen durch Umweltbelastungen—Ein neues Deutungsmuster. In: U. Flick (Hrsg.). Wann fühlen wir uns gesund? Weinheim: Juventa, S. 285-300.

Witzel, A. (1985). Das problemzentrierte Interview. In: G. Jüttemann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der Psychologie. Weinheim: Beltz, S. 227-255.

专家访谈

Bogner, A., Littig, B./Menz, W. (Hrsg.)(2002). Das Experteninterview. Opladen: Leske & Budrich.

民族志访谈

Heyl, B. S. (2001). Ethnographic Interview.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L. Lofland (Hrsg.).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S. 369-383.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协调与引导

Hermanns, H. (2000). Interviewen als Tätigkeit.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60-369.

Hopf, C. (1978). Die Pseudo-Exploration. Überlegungen zur Technik qualitativer Interviews in der Sozialforsch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7: 97-115.

Hopf, C. (2000a). Qualitative Interviews—Ein Überblick.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49-360.

Kvale, S.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London: SAGE.

Kvale, S. (2007) Doing Interviews (Book 2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14 叙事法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能够

- 在质性研究中运用叙事法。
- 辨别作为叙事之基础的生活史与事件的不同。
- 认识到在访谈中运用不同叙事形式的优势与问题。

除了通过使用具有开放性的提纲访谈来进入个体的经验世界这一途径之外，研究者也可以将受访者的叙事/叙述[①](Erzählungen)用作相关资料的来源。人们采用叙事法的出发点是基于以下的根本性怀疑，即，即便是在访谈法得到了灵活运用的情况之下，主体的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采用问答模式的访谈法来获得。与提纲访谈相比，叙事提供了一个通向受访者经验世界的更加广泛的、结构化的途径。叙事在此具有如下特征：

> 首先描述的是初始时的情况（"一切是如何开始的"），然后从大量的经验中选出那些与叙事相关的事件，并将其呈现为前后连贯的事态发展（"事情是如何发展的"），最后是介绍发展结束时的情况（"结果如何"）。(Hermanns 1995，第 183 页)

由 Schütze(1977，1983)所提出的叙事访谈便是使用这一方法收集资料的一种典型形式。在这种方法引起人们关注的同时，它也提升了人们对整个质性研究方法的兴趣。在心理学领域，叙事作为一种知识的形态以及呈现经验的形态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研究（例如 Bruner 1990，1991；Flick 1996；Murray 2000；Sarbin 1986）。本章在下面介绍了两种使用叙述的方法。

---

① 提纲访谈法虽然有时也会将受访者的叙述作为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问题中心访谈法中）。不过，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比如说当叙事的收效不大时，叙事只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从属于访谈的提纲。Mishler(1986，第 235 页)在普遍的意义上对以下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当受访者在提纲访谈中开始叙事时，会发生什么？访谈者如何对待这些叙事，以及它们在访谈中是如何被压制，而不是被接纳的？

叙事访谈

叙事访谈(das narrative Interview)主要是在传记研究领域被人们所使用(相关概览可参见 Kohli/Robert; Krüger/Marotzki 1994;Küsters 2006)。该方法的发展背景是一项旨在分析地方性决策过程和权力结构的研究课题。Hermanns 对这一方法在收集资料方面的基本原则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 在叙事访谈中,信息提供者被请求即兴叙述他曾参与其中的有关某一问题领域的历史。(……)访谈者的任务是让受访者从头至尾地叙述所研究问题领域的历史,将其当作是由所有与此相关的事件所组成的一段前后连贯的历史。(Hermanns 1995, 第 183 页)

叙事访谈的组成要素

叙事访谈以一个与研究主题相符合的入口问题("叙述请求")开始。该问题应该引发受访者的主叙述。在入口问题之后是叙述性追问部分。在这一部分,之前没有被展开的叙述可以被补充完整。最后是"总结阶段,在这个阶段也可以向受访者提出问题。问题旨在询问他对所发生事情的理论解释以及他从该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并藉此结论将整个事情的'意义'协调一致"(Hermanns 1995, 第 184 页)。在这个阶段,受访者被视为是"他们自身的专家和理论家"(Schütze 1983,第 285 页)。

为了在运用叙事访谈时获得一个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叙述,研究者必须将入口问题表述地即宽泛又明确,将所要研究的经验领域(作为生命的一个阶段)设定为叙述的中心主题。研究的兴趣可以指向生活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叙述请求的问题相对而言较不明确,例如,"我想请您就从您的生活史开始叙述"(Riemann 1987,第 46 页)。研究的兴趣也可以指向受访者传记中的某一在时间和主题上特定的部分,例如,某一在职业上重新定位的阶段及其结果。提示框 14.1 给出了一个此类入口问题的范例。

提示框 14.1 叙事访谈入口问题的范例

"我想请您讲述一下您的生活史。您最好从出生开始谈起,到您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告诉我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事情是如何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的。您可以慢慢讲述,包括细节,因为所有那些对您来说重要的事情,我都有兴趣听。"

出处:Hermanns 1995, 第 182 页

研究者无论如何要检查一下,所使用的入口问题是否真的构成了一项叙述请求。对这一目标的实现,Hermanns 的例子提供了一些明确的提示,如所要叙述的过程包含不同阶段,明确提出叙述请求以及明确地要求受访者详细地叙述。

当受访者在这一入口问题提出后开始了其叙述,访谈者便不应该通过问题(如"您所说的是谁?"),指示("难道人们不可以用以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或评价(您的这个主意真好!)来妨碍其叙述。这对于保证资料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听众,访谈者应该通过信号(例如通过"嗯")表明,他能够置身于受访者所讲述的历史及其视角并试着去理解这些。这样做会给被访者一种支持和鼓励,使其继续其叙述直到讲完为止。

受访者会以一个"结尾句"来表示所叙述历史的结束,例如"情况就是这样的""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Riemann 1987,第 47 页),或者"对,大致情况就是如此。希望我所说的对您有所帮助"(Hermanns 1995,第 184 页)。在接下来的叙述性追问部分,对于那些至今为止尚没有展开的叙述内容或者不清楚的部分,访谈者会再度发出叙述请求(例如:"您在前面曾谈到您为何搬家到 X 地。我不太明白您在那之后的病情发展。您可以再更加详细地讲一下这部分内容吗?"在总结阶段,访谈者会越来越多地向受访者提出更加抽象的问题以及以描述和论证为目的的问题。Riemann 建议,访谈者在此可以首先问以"如何"开头的问题,在结束部分再问解释性的"为什么的问题",作为对前面叙述内容的补充。

判断所搜集信息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受访者的阐述是否主要为叙述。虽然说为了阐明理由或者目标,受访者的阐述中会少量地夹杂着一些对情景和例行常规的描述或者论证,但是主要的表述形式应该是对事情经过(最好是从头到尾)和发展过程的叙述。Hermanns(1995,第 184 页)运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其中的区别:

> 我对于核电站的态度没法叙述,不过,我倒是可以讲一下我是如何形成今天这种态度的。那大概是在 1972 年吧,我从 Wyhl① 的那个地方走过,看到了那些棚屋。我当时想:这些人在这里做的事情,的确很棒,不过,他们对于核能的担忧则有些疯狂。我当时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政治团体②的成员。

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主叙述(Haupterzählung)与其他陈述形式相比之所以能够提供有关事件或经验更加丰富的信息,是因为叙述者一旦进入叙事访谈的情境并且开始了叙述,他就置身于特定的强迫之中["叙述的三重强迫(dreifache Zugzwänge③des Erzählens)"]。这些强迫包括:收尾强迫(Gestaltschließungszwang)、浓缩化强迫(Kondensierungszwang)和细节化强迫(Detaillierungszwang)。收尾强迫是指叙述者一旦开始叙述就会把其叙述完。浓缩化强迫是指,只有那些对于理解事情进展必不可少的内容才会得到叙述。最起码是因为时间有限,为了便于听者理解和领会,叙述者会将叙述内容浓缩化。细节化强迫是指,为了便于听者理解,叙述者会一并叙述必要的背景信息和前后关

---

① Wyhl 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小镇。在 1970 年代,因为政府计划在该地区建立核电站而引起人们的反核运动示威。许多示威者在核电站周围露营,并最终成功地抵制了建立核电站的规划,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译者注

② 马列主义政治团体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它并不支持此类示威运动。——译者注

③ "Zugzwänge"原意指的是下棋时必走之棋。—— 译者注

联。因为有这些叙述强迫，叙述者就不能像是在其他谈话形式下那样对讲述内容加以调控，因此，那些“棘手的”话题和领域也会被叙述出来：

> 叙述者在对自身经验进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即兴叙述时，会被驱使着讲出那些他在一般的谈话或传统的访谈中出于负罪感、羞耻感或利益纠结等原因而倾向于隐瞒的事件和行为取向。(Schütze 1976，第 225 页)

为此，Schütze 发展出一种用来“诱发与主题相关的历史的叙述”的技术(Schütze 1976)。采用这一技术可以获得通过其他访谈形式所不能获得的资料，原因有三：第一，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本身具有了独立性。第二，“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能够表达出来的要远远多于他们所形成的有关自我及其生活的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对于信息提供者而言，他们可以以叙述的形式，而不是以理论的形式将这些知识表达出来。”(Hermann 1995，第 185 页)第三，人们认为，在叙述的内容和所叙述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类同关系：“在对经历的叙述性回顾中，叙述者一般来说会像自己作为行动者所经历的那样来叙述其生活史中的事件(不管是行动还是自然事件)。”(Schütze 1976，第 197 页)

案例　叙事访谈摘录

为了说明，以下摘录了一位精神病患者(E)所做的传记性主叙述的开始部分(Riemann 1987，第 66-67 页)。出于数据保密的原因，文中有关地名和地区的信息均以((……))这种一般性符号代替。斜体字表示着重强调。斜线表示一个词被另一个词所打断。访谈者(I)的肯定性语气词(如“嗯”“啊，是吗”)均被准确地放置于其出现的位置：

1　E　嗯，我出生于((前东德的一个地区))
2　I　嗯
3　E　更确切地说是(( ))，那是一个纯正的天主教的，纯正的/相当
4　　纯正的天主教地区，隶属于((地区，西部地区))。
5　I　啊，是吗
6　E　(城市名)
7　I　嗯
8　E　我的父亲，嗯……是一位上尉
9　I　嗯
10　E　并且……嗯，已经是地方法院的委员
11　　之后在战争中被打死了
12　I　嗯
13　E　就剩下我的母亲，我的哥哥/他比我大三岁/和我，
14　　嗯，她带着我们一起逃难。
15　I　嗯
16　E　关于这次行程，我具体来说想不起什么了，作为回忆，我只记得
17　　我曾经，嗯，坐在火车上，感到非常的/嗯
18　　非常的口渴或者整个就是很饿

19 I 嗯
20 E 之后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水壶走过来,给我们倒了一杯
21 嗯,咖啡,我有一种非常提神的感
22 I 嗯
23 E 觉。
24 不过,另外一段回忆也与那辆火车有关,这段回忆
25 或许可以为**非常**以后的事情提供线索,即当我
26 I 嗯
27 E 进入精神病院时,嗯。
28 因为,嗯——这段回忆像图画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再地浮现。
29 确切地说,我们在那辆火车上已经准备好睡觉了。
30 而我似乎是被抬了起来……嗯,准备好睡觉
31 I 嗯
32 E 我一定是在夜里掉了下来,但是并没有醒
33 过来。
34 I 嗯
35 E 我记/记得,一个,嗯,女的,不是
36 我的母亲,一个女人把我抱在怀里,对着我
37 微笑。
38 I 嗯
39 E 这些就是我最早的记忆。
40 I 嗯。

这段叙事还有17页的转录稿。访谈在访谈者和受访者第二次见面时得到了继续。详细的案例分析可以在Riemann(1987,第66-200页)的作品中找到。通过这个例子,人们可以看出,叙事访谈是怎样开始的,受访者的生活史在访谈中是怎样被展开的,访谈如何慢慢地接近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主题,同时又提供了许多乍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相关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可能到分析访谈时才会显现出来。

一方面,人们对于叙事访谈中叙述这一资料类型的期待是,它可以表明实际上的发展历程,"按照事情的原本面貌"将其呈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对所叙述的生活史的分析,人们应该获得一种有关生涯历程的一般性理论。Schütze(1983,第284页)将此称作"个人生涯的过程结构"。在某些领域,一些典型的生涯经历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被展现出来:

案例 工程师的职业传记

Hermanns(1984)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了约25位工程师,以期从他们的生活史中总结出成功的和危机性的职业发展历程的模式。案例分析表明,在职业开始时,存在着一个旨在获取专业能力的探

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应该确定下来在接下来这些年的职业工作的中心主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职业开端就会由此进入一个死胡同。Hermanns 通过分析总结出一系列典型的工程师专业化主题(第 166-167 页)。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就是获取实质性资本(如经验、知识),比如工程师成为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家。Hermanns 也指出了获取实质性资本的其他形式。工程师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是形成一条职业生涯路线(第 171 页),例如,长期地专注于某一工作主题,占据一个行动的平台。这些路线可以通过成就而得到促进,但是也有可能会"枯萎",比如是因为行动的平台不复存在了,可以确保该路线的专业能力失去了,与此相关的主题面临着意义危机,或者是因为一条新路线的崛起。如果不能获得一个行动平台,不能发展并保证一条职业生涯路线,没能获得能力和实质性资本,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够成功地完成任何一个可以从对职业传记的分析中所提炼出来的核心性的专业任务,那么,职业发展就会失败。

Hermanns 的这个例子说明了人们如何可以从对职业传记的案例分析中提炼出这些职业生涯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以及包含于其中的生涯历程的阶段可被用作参考,来解释完成职业生涯任务时经历的成功和失败。

实施的问题

实施叙事访谈的一个问题是它系统地背离了参与者双方的角色期待:一方面,它背离了人们对于"访谈"情境的期待,因为,在访谈(至少在主要部分)中,访谈者并没有提出传统意义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背离了人们对于"日常叙述"情境的期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单单受访者一方被赋予了很大的叙述空间。这些对情境期待的背离常常给参与者双方造成困扰,让他们在访谈情境中感到无法适从。此外,叙述虽然说是一种日常能力,但是人们对这一能力掌握程度却并不相同。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叙述的使用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最佳选择:

> 我们必须知道,并非每一个受访者都有能力以叙述的方式展现其生活史。内向的、腼腆的、寡言少语的或者过度内向的人,我们不仅会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遇到,而且在生活史访谈中也会遇到。(Fuchs 1984,第 249 页)

另外,Matthes(1984)指出,在陌生文化环境下运用这一方法也存在着问题。因为人们不能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叙述模式在其他非西方文化中也同样具有有效性。

鉴于以上谈到的问题,在这里进行访谈培训也是必要的。在培训中,首先要训练的能力是积极聆听,即如何在不干涉叙述的情况下传递感兴趣的信号,以及如何维系与受访者的关系。此类培训应该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以及需要获得其叙述的特定目标群体来量身定制。在这里,作为合适的训练方法,人们可以选用角色游戏或访谈演习,并将其摄录下来,然后研究者小组一起针对实施问题和角色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估。访谈者应该向受访者解说清楚访谈情境的独特性,这是成功实施叙事访谈的一个前提条件。为此目的,研究者应该特别重视招募受访者的这一阶段,并在此向他们详细地阐明访谈的目标与程序。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叙事访谈及其方法论让人们注意到质性访谈应该关注经验方式的结构和形态。通过对叙述这一形式所具有的优势——即它所包含的内容要多于陈述和所报道的“事实”——的强调,叙事访谈提供了一种按照事件内在逻辑再现其发展历程的模式。对于提纲访谈的两难困境,即如何在主体见解的自由展开和对所谈话题的引导和限制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叙事访谈也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它包括三个要素:

- 给受访者空间,让他——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叙述其历史。
- 以具体化、结构化和深化主题为目的的干涉行为被置于访谈的结尾部分。在这一部分,访谈者可以抓住已经谈到的话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访谈者将访谈加以结构化的行为被置于访谈的结尾部分,也可以被置于访谈的开始部分。
- 入口问题的目的,不仅在于诱发一个叙述,而且在于将叙述导向已经厘定好的问题领域以及传记中的某个时间段。

人们在讨论以下的问题,即访谈者应该怎样表现才能够让已经开始的叙述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让受访者可以尽可能不受干扰地一直叙述到结束。在这一讨论中,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入口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预先决定着紧随其后的叙述的结构。如果叙述的内容比较一般化,具有跳跃性或者与主题不大相关,那么,其原因往往是因为之前所发出的叙述请求不精确、不明确。因此,这一方法并非像人们常常错误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完全开放的访谈(例如 Lamnek 1989)。不过,与其他的方法相比,访谈者在何处进行结构化处理(Strukturierung)在这里有更加明确的定位——即将这一结构化处理限定于访谈的开始和结尾部分。在这样确立的框架下,受访者能够而且应该完全不受阻碍地表达他的观点。因此,叙事访谈提供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叙述潜力并将其用作社会研究的资料来源的方法。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运用叙事访谈所进行的研究的理论背景视所使用的解释程序而定,不过主要还是对主观见解和行为方式的分析。研究问题往往是以具体的、一般性的情境(生活状况如找工作的时期,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战后时期)为背景来分析个体的生涯历程。这一方法主要适合用来发展理论(参见第 8 章)。按照理论抽样的方案(参见第 11 章)来逐步地选取案例在此是最合适的抽样方法。对于叙事资料的解释,人们针对这一方法提出了一些专门的建议。这些建议既考虑到了叙事资料在形式上的特征,也考虑到了此类资料的结构(参见第 23 章)。分析的目的是发展传记历程的类型学(参见第 29 章)。

方法的局限性

与叙事访谈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下的这种看法，即通过叙事访谈可以获得**真实的**经验和事件。这种看法在 Schütze(1983，第 284 页)那里表露无遗，他将所叙述的经历和实际经历等同起来。

其他的问题还有，受访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会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对所叙述的内容进行建构，而且对往事的回忆会受到回忆时心境和处境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着叙事访谈兑现自身在资料有效性方面的有些要求(参见 Flick 1996)。此外，在运用这一方法之前，有必要批判地提出以下的问题，即使用这一方法对于自己的研究问题，尤其是对于受访者而言，是否合适？正如这一方法的产生背景所表明的那样，它所依赖的是叙述性强迫以及叙述中牵连(Verstrickungen)的影响和作用。Schütze 最初是用这种方法来访谈地方性政客的。与其他的访谈对象相比，这些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和能力去回避一些棘手的问题。对于其他的访谈对象而言，还需要特别检查一下，运用这种策略来探听生平细节的做法是否符合研究伦理。

一个在研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对叙事访谈的转录会产生大量的文本资料，而且，与提纲访谈相比，这些资料更加缺乏明显的结构性(比如通过主题领域划分访谈者的问题等)。这些大量的文本资料也带来了分析的问题和困难(参见 Südmersen 1983，以及本书第 25 章)，并且往往导致研究结果的内容很少，但案例分析的内容却很庞大(例如 Riemann 1987)。因此，在选择运用这种方法之前，研究者应该澄清的问题是，研究问题所关注的是否真的是特定的发展历程(如生活历程、患者病情发展历程、职业生涯历程)。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能够进行主题调控的提纲访谈是否是获取所需要资料和结果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由这种方法所引起的批判性讨论(Bude 1985；Gerhardt 1985)同时也阐明了叙述作为一种资料来源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可从访谈的内容得到解释："可被叙述的始终只是'有关……的历史'，而不是一种状态或者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日常惯例"(Hermann 1995，第 183 页)。鉴于叙述的这些局限性，在使用这一方法之前必须要检查一下，对于研究问题和潜在的受访者而言，叙事法是否是唯一适合的方法，以及应该与哪些其他类型的资料进行结合。

事件访谈

事件访谈(das episodische Interview)(Flick 1996；2000a，2007d，第 3 章)的出发点是以下观念，即主体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经验是以叙事性—事件性知识(narrativ-episodisches Wissen)以及语义性知识(semantisches Wissen)的形式而被存储和记忆的。第一种知识形式——即叙事性—事件性知识——的组织更加贴近经验本身并且与具体的情境和状况相联系。而第二种知识形式——即语义性

知识——所包含的则是从具体的情境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观念和相互关系。对叙事性—事件性知识而言,特定背景(Kontext)下的情境过程是用来组织知识的核心单位。而对语义性知识而言,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构成其核心的知识单位(参见图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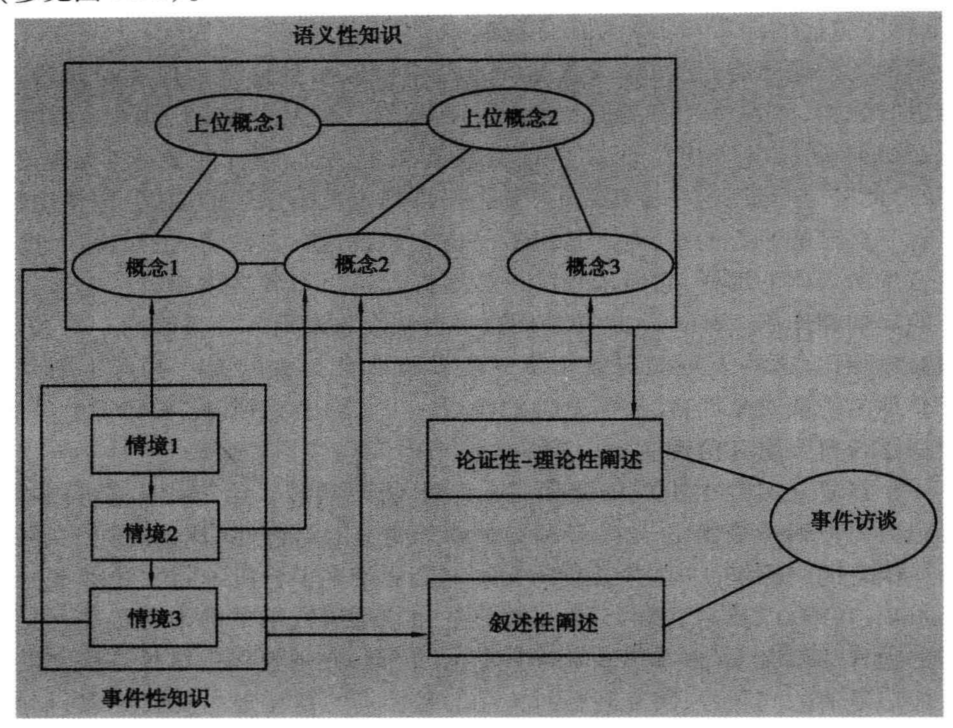


图14.1　事件访谈中的知识形式

为了获得有关某一领域的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知识,笔者设计了一种方法程序,它一方面通过使用叙述来收集和分析叙事性—事件性知识,另一方面则通过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问题来获取语义性知识。这里的重点是系统地将这两类资料所提供的知识形态联系起来。事件访谈便于以叙述的形式获得有关情境背景的阐述,这是因为与其他的表现形式相比,叙述一方面更加直接地贴近经验以及经验产生的背景。另一方面,与其他那些旨在获得严格意义上的抽象概念和回答的方法相比,叙述更有可能将受访者建构现实的过程展现出来。不过,事件访谈并不会刻意地、人为地将经验表现成一个"可叙述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事件形式和情境形式的经验知识为出发点的。在这里,研究者在访谈中的关注点集中在那些受访者经历过的、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情境和事件之上。无论是对相关情境之表现形式(描述或叙述)的选择,还是对情境的选择,受访者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己对主观重要性的考量来决定。事件访谈的目标是促使受访者以更普遍的、比较的形式展示其在特定领域的经验,同时也对与此相关的情境和事件进行叙述。因此,事件访谈将叙述和论证结合起来,叙述是以情境性及事件性的前后关联为取向的,而论证则是脱离了这些前后关联,以从这些关联中产生

概念性知识和规则性知识为取向。事件访谈会利用受访者的叙述能力，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叙述强迫，也不会让受访者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去完成叙述。

事件访谈的组成要素

这一访谈形式的核心要素是要定期地要求受访者叙述具体的情况[①]（例如“请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与电视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您能向我叙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吗？”）。同样，叙述的内容也可以是一连串的情况（“请您向我叙述一下您昨天一天的活动经过，科技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发挥了作用。”）。为了便于将访谈导向这些叙述所针对的主题领域，访谈者准备了一个访谈提纲。为了让受访者熟悉这种访谈形式，访谈者首先向受访者解说了事件访谈的基本原则（例如“在这个访谈中，我会不断地请您叙述您与科技接触的情况，包括您接触一般意义上的科技或特殊科技的特定的经验。”）。另外一方面是与所期待或所担心的发展变化相关的幻想（“您认为，计算机领域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哪些发展？请您想象一下那些可以看出这些发展的有关情况。”）。除了以上这些叙述请求之外，有关主观定义（“今天，您在看到‘电视’一词时会想到什么？”）和抽象关系（在您看来，谁应该对科技带来的变化负责？谁可以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的问题构成了第二大问题群。这类问题旨在获得语义性知识。

案例　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变迁

在一项比较研究中，Flick（1996）做了 27 个事件访谈，访谈的主题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科技变迁的感知和评价。为了分析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Flick 访谈了信息工程师、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教师这三个职业群体，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与科技打交道（作为科技开发者，作为专业的科技使用者，作为科技的日常使用者）。访谈涉及以下问题领域：受访者的科技传记（记忆中的与科技的第一次接触，与科技有关的最重要的经验）和日常的科技生活（在昨天一天的活动经过中，科技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发挥了作用；日常领域如职业、休闲、家政和科技）。

针对以下的叙述要求：“请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与科技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您能向我叙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一个受访者叙述了如下的情况：“（……）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或者说，我是一个女孩，但是我始终对技术很感兴趣，我不得不承认，或者，嗯，当然我也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得到玩具娃娃的礼物。然后在某个时候，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玩具火车，嗯，这个玩具火车，我把它的发条上紧，然后把它放到了我妹妹的脑袋后面，然后火车的小车轮就开始转了，把她的头发卷了进去，绷紧了。然后科技就到头了。之后，我妹妹不得不去理发店，玩具火车也不得不被拆解，这是最麻烦的，我妹妹头上没有了头发，所有的人都说：“哦！真糟糕！”而我则放声大哭，因为我的玩具火车被拆掉了。与科技的接触也就到此结束了。当然，这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清楚会发生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我胡作非为。见妹妹坐在那里，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把玩具火车放在她的头上”。也就是说，我完全不记得在此之前我已经玩了多长时间的玩具火车。应该不是很长时间，并且那是一个很棒的玩具火车。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的一段经历，一段不是很积极的经历。”

---

① 以下这些问题范例出自 Flick（1996）。

另外一个例子是下面所回想起的与科技第一次接触的情况："是的，挂在圣诞树上的电灯。我从那时起就知道这个了，当然，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在其他孩子的家里也曾经见过这些蜡烛。实际上，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是更加的浪漫，更加的美丽。不过，在当时，这自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果我旋转一个蜡烛时，全部灯光就都熄灭了。是的，如果我想要的话，而且在第一个圣诞节日那一天正是如此。那天是假日，父母睡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孩子们当然睡够了，很早就起来了，走出来到圣诞树前继续摆弄那些礼物，他们在圣诞前夜曾不得不中途罢手。我又可以将蜡烛扭开，所有的灯就又都亮了，这是那些蜡做的蜡烛所不能做到的。"

几个典型的科技产品（计算机、电视）在访谈中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它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变迁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在这里分别会谈到概念理解以及经验方式的问题。对于以下这个问题："在今天，看到计算机这个词，您会想到什么？"一位女信息工程师给出了如下的定义："计算机，当然我对此必须有一种精确的理解（……）计算机，就是说，嗯，必须要有一个处理器，必须有一个存储器，可以被简化为一种图灵机。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细节。就是说，一台计算机除了向左走、向右走和在带子上书写之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计算机的一种模式。更多地我也一下子想不起来什么。这意味着，对于我来说，计算机完全就是一台愚蠢的机器。"

对于受访者所感知到的科技变迁在不同领域（例如家庭生活、儿童的生活等）影响的分析跨越了不同的科技。在每一个领域，访谈者除了会提出叙述请求之外，也会提出一些概念性—论证性的问题作为补充（参见提示框 14.2）。

笔者为每个访谈都制作了情境记录（参见第 22 章）。这些访谈一方面表明了不同见解的共同之处，因此笔者能够在最后提出一个跨越所有案例的有关科技变迁的主观理论。同时，这些访谈也表明了不同群体在见解上存有差异，因此笔者将每个群体的主观理论的独特之处也记录下来。

提示框 14.2　事件访谈的问题范例

- "科技"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看到"科技"一词时，您会想到些什么？
- 请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与科技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您能向我叙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 请您向我叙述一下您昨天一天的活动经过，科技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发挥了作用。
- 请您看一看自己的家，科技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什么发生了改变？请您向我叙述一个典型的情况。
- 您生活的哪些领域与科技无关？您能向我描述一个与此相关的情况吗？
- 在您看来，您与他人的关系因为科技而改变了吗？您能向我叙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 在今天，看到"计算机"一词，您会想到什么？您会将哪些机器归为计算机？您是在哪种情景之下知道了什么是计算机？请您向我叙述一下这一情景。
- 在今天，看到"电视"一词，您会想到些什么？哪些设备是与此相关的？
- 电视在您现在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能向我叙述一个可以看出这一点的情况吗？
- 哪些因素决定着您是否看电视以及什么时候看电视？您能向我叙述一个可以看出这一点的情况吗？
- 请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与电视的接触是怎样的？您能向我叙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 电视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曾经扮演过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您能向我叙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 请您看一看今天（您的）孩子们的生活并与您还是孩子时候的生活做比较，科技在其中分别扮演着何种角色？您能够向我分别叙述一个可以证实您的看法的情况吗？

- 在您看来，人们什么时候可以说，某一项特定的科技已经过时了？请您给我叙述一个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情况！
- 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个领域会让您因为有科技的进入而感到担心？请您向我叙述一个相关的情况。

实施的问题

采用叙事法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有些人在叙述方面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困难——同样也适用于事件访谈。不过，因为事件访谈所要求进行的并不是一个广泛的叙述（如叙事访谈），而是多个限定好范围的短叙述，因此，以上问题在此有所缓和。访谈者应该认真地向受访者解释清楚叙述特定情况时需要注意的原则，以避免他们仅仅是提到了（获得特定经验的）情境，但是却没有对其进行叙述。与其他的访谈形式一样，在这里，访谈者对访谈原则的内化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在这里同样有必要借助具体的例子对访谈者进行周密而细致的访谈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对访谈提纲的使用，对叙述的刺激和促进以及如何在必要时进行深入追问。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事件访谈想要结合利用叙事访谈与提纲访谈的优点。它们均需借助于受访者的以下能力，即能够以叙述的形式呈现其经历以及情境。事件作为这些叙述的内容以及作为获得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经验的方法，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比对生活史的叙述更加具体的做法，另一方面，与叙事访谈所不同的是，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分析例行常规与日常现象。对于科技变迁这一主题而言，这些例行常规和日常现象与受访者与科技接触的独特历史一样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在事件访谈中，经验的范围并不会被缩减至可被叙述的那些部分。通过提出一系列与应被叙述的情境以及应被定义的概念有关的关键性问题，访谈者在事件访谈中有更多的可能性来对访谈进行调控。这样一来，叙事访谈的那种极端单方面的、人为的情境就被一种更加开放的对话取代了，在这一对话中，叙述只被用作其中的一种数据形式。通过将叙述和问答序列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实现了对作为资料收集基础的多种方法的多元结合（参见第 29 章）。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运用事件访谈所进行的研究的理论背景是经验陈述之中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发展这种方法是为了研究社会展示。因此，研究问题直到现在都主要聚焦于不同群体在经验方式和日常知识方面的差异（参见 Flick 1996）。对特定群体的比较是选择案例的目标（参见第 11 章）。这种方法的使用将对研究过程的线形理解与环形理解结合了起来。人们主要是用主题编码和理论编码的方法（参见第 23 章）来分析通过事件访谈所收集到的资料。

方法的局限性

除了在实施事件访谈方面的困难之外，事件访谈的运用领域主要局限于分析有关某些特定对象和主题的日常知识以及受访者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经历。同其他的访谈方法一样，事件访谈并不能揭示出具体情境中的行动和互动。不过，它可以通过参与者的视野来再现这些行动和互动，并且阐明不同群体在其体验方式方面的差异。

居于传记和事件之间的叙述

那些以主要获取受访者叙述为目的的访谈法，往往以一种或多或少大规模的、结构化的、整体的形式来收集资料——作为对生活史的叙述以及对特定经历发生时的具体情境的叙述。因此，与其他那些通过所提出的问题事先规定了具体主题和结构的访谈形式相比，这种访谈赋予受访者更多的空间来表达其见解。不过，采用叙述的访谈法也离不开访谈者对访谈情境的目标设定和结构化。作为资料类型，研究者应该选择哪一种形式的叙述——叙事访谈的传记式全面叙述或者事件访谈的有关特定情境的细节性片段叙述——只能视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而定。研究者在做出此种选择时的根据，不应该是从根本上认定一种特定的方法要比其他方法强，就像有人在叙事访谈的讨论中有时建议的那样。为了避免像这些纲领性建议那样将叙述变成一个神话，人们有两个备择性选择：第一，人们可以在事件访谈中再度引入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第二，在有关家庭史的共同叙事中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这一方法将会在下一章得到介绍。

要 点

- 人们可以在访谈中运用叙述，以获得有关事件和经验的更加全面和更具情境性的资料。
- 人们可以通过传记访谈中的生活史叙述或者与特定情境相关的叙述来实现这一目标。
- 人们可以在访谈中对叙述进行不同的设计和安排——可作为独立存在的访谈的主要部分，或者被嵌入不同的问题形式之中。
- 并非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叙述的内容，因此，研究者有时必须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经验，作为对叙述的补充或者替代。

练习 14.1

1. 您在什么时候会选择运用叙事访谈，您在什么时候更倾向于运用事件访谈，您在什么时候会选择使用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访谈？
2. 如果您的研究问题要求您使用叙事访谈，请您提出一个入口问题。
3. 请您针对您的研究问题开发一个事件访谈的提纲。

拓展阅读

叙事访谈

Hermanns, H. (1995). Narratives Interview.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München (2. Aufl.): PsychologieVerlagsUnion, S. 182-185.

Küsters, I. (2006). Narrative Interviews—Grundlagen und Anwendungen. Wiesbaden: VS-Verlag.

Rosenthal, G. (1995). Erlebte und erzählte Lebensgeschichte. Frankfurt: Campus.

Schütze, F. (1983).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narratives Interview. Neue Praxis, 3: 283-293.

事件访谈

Flick, U. (1996). Psychologie des technisierten Alltags—Soziale Konstruktion und Repräsentationn technischen Wandels in verschiedenen kulturellen Kontext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Flick, U. (2007d). Triangulation—Ein Einführung (2. Aufl. —Kap. 3). Wiesbaden: VS-Verlag.

居于传记与事件之间的叙述

Bruner, J.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1-32.

Bruner, J. (1991).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18:1-21.

15 小组讨论与焦点小组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熟悉以小组形式收集资料的不同方法。
- 认识到小组访谈、小组讨论与焦点小组之间的区别。
- 了解以小组形式收集资料的问题。

提纲访谈和采用叙述的访谈都是从对标准化访谈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对于标准化访谈的质疑部分是因为其人为性特征，因为受访者在标准化的访谈情境下脱离了所有的日常关系，而且这种情境下的互动也完全不同于日常情境下的互动。特别是当研究者要研究那些有关禁忌话题的看法与态度时，有关专家强烈建议应该利用团体在讨论此类话题中的动力机制（Dynamik），因为这要比简单的个体访谈更合适。他们所建议的方法被称作小组访谈（Gruppeninterview）、小组讨论（Gruppendiskussion）或焦点小组（Focus-Group）。与叙事访谈中的独白式叙述所不同的是，此类方法关注的是在共同的叙述中（比如家庭成员的共同叙述）所发生的建构社会现实的过程。通过这种对访谈情境的扩展，研究者一方面想要丰富所收集资料的情境性，另一方面想要创设一种——与访谈者和受访者/叙事者之间（常常仅仅一次性的）的会面相比——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互动情境。

小组访谈

自 Merton，Fiske/Kendall（1956）的研究开始，小组访谈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运用（相关概述请参见 Fontana/Frey 2000；Merton 1987）。Patton（2002，第 385 页）对小组访谈做了如下定义："焦点小组访谈是就某一特定主题对一小群人所进行的访谈。典型的小组包括 6～8 个人，他们参与访谈的时间为 1.5～2 个小

时。"根据访谈者对访谈或多或少的结构化处理和调控,这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方法程序。总地来说,访谈者在此应该是"灵活的,客观的,感情移入的,有说服力的,善于倾听者"(Fontana/Frey 2000,第652页)。在此,客观性主要指的是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协调。在Merton等人(1956)看来,访谈者的主要任务在于避免个别参与者或参与群体以其发言主导和支配访谈以及整个小组。此外,访谈者应该鼓励那些低调的成员参与到访谈中并发表意见,努力获得全小组的回答以尽可能全面地覆盖所谈主题。最后,访谈者在其行为上必须在对小组的(指导性)调控和(非指导性)主持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Patton(2002,第386页)将焦点小组访谈视为是一种高效的质性资料收集技术,它能在资料收集中做到一定的质量控制,这是因为"参与者倾向于互为对方发展一种保证体系,排除掉那些错误的或极端的观点(……)并且可以相当容易地判断出来,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对一致的共同的见解"。Patton也讨论了这种方法的一些弱点,如访谈可谈及的问题数量有限,以及在访谈过程中难以记笔记。基于这一原因,他建议采用两个访谈者合作的工作方式,一个负责记录参与者的发言,而另一个则负责主持小组访谈。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Patton强调了这样的事实:"焦点小组访谈——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种**访谈**。它不是用于解决问题的会议。它不是做决策的小组。尽管参与者之间常常出现直接的互动,它主要地也不是一个讨论。它是一个**访谈**。"(2002,第385-386页)

总之,小组访谈的主要优点在于:成本低且能收集到丰富的资料,能够激发回答问题者,支持其对事件的回忆,能够超越单一受访者的回答。

小组讨论

实施小组讨论不仅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因为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访谈一群人,从而不必在不同时间访谈不同的个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利用小组的内部动力和参与者之间的讨论。例如,Blumer指出:

> 当一小群个体被组合成一个讨论小组或信息提供者小组时,其价值要高于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数倍。通过共同讨论其生活并在意见相左时加以深究,这样一个小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的研究手段都更有助于揭开掩盖其生活领域的面纱。(1973,第123页)

同样的,在德语地区,人们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Pollock 1955)开始便已经将小组讨论当作一种访谈方法来讨论了。它被当作是除了开放式访谈之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其发展在部分上也同样是始于对标准化调查的批评。与之前刚刚介绍的小组访谈所不同的是,小组讨论强调对讨论的激发以及由此所发展出来的动力,并将此作为认知来源。这一方法得到了人们极大的重视,尽管在此期间这一方法主要是被用于应用研究领域如市场营销研究或评估研究(参见Flick 2006一书中的文章),但是,很少有一本实证社会研究的教科书会忽略这一方法(更多概述请参见Bohnsack 2000)。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人们使用

它的目的不同,而且对于什么是合适的小组,人们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研究者需要从中为自己的研究选择出“正确的”方案,即符合自己研究对象的方案。以下简单介绍一下现有文献中的一些不同的方案。

使用小组讨论的目的

研究者使用小组讨论是出于不同的目的。与单个的访谈相比,Pollock 之所以更加偏爱小组讨论,是因为“人们应该避免在脱离情境的情况下去研究人们的态度、观点和行为方式,因为它们很少显露于这种隔离的情况之下”(1955,第 34 页)。作者认为,小组讨论更加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表达和交换意见的方式,这一点不同于那些民意调查中的访谈,在那里,受访者在向访谈者表达意见时脱离了日常的交流关系和方式。小组讨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当出现不正确的、不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极端的观点时,小组成员会对其进行更正,这是保证见解和观点有效性的一个手段。在这里,小组被用作一种方法,以更加恰当地再现个人的观点。Krüger(1983)使用小组讨论的目的与此不同,他所要研究的是小组的观点,即小组成员在对某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Mangold(1973)使用小组讨论的目的又与 Krüger 不同,他所研究的是独立于情境的小组观点,这一观点虽然是在讨论中被表达出来的,但是在讨论之外也是实际存在的。使用小组讨论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分析人们在小组中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这里会事先给出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小组成员应该通过对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讨论找出最好的问题解决策略(Dreher/Dreher 1994)。因此,在小组讨论的使用方面,人们一方面可以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即将小组讨论用作媒介以更好地分析个体的观点,或者将小组讨论用作媒介来获得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共享的小组观点。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区分以下两种使用情况,即通过小组讨论来研究小组中的协商过程或问题解决过程,或者通过小组讨论来分析既有的小组意见,该意见只是在小组讨论中才会被表达出来。

小组形式

看一看小组讨论的发展历史以及有关的方法讨论就会发现,对于什么是小组这个问题,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不过,各种小组讨论的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将有关某一主题的小组讨论当作是资料的来源,而非是对个人的访谈。在这里,小组可以是**自然的小组**(即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小组),也可以是**人为的小组**(即出于研究目的按照特定的标准组合在一起的小组)。Nießen(1977,第 64 页)要求,研究者在小组讨论中要使用**现实的**小组(reale Gruppen),这种小组“与小组讨论的主题有关,但又独立于该讨论而于现实中实际存在着,其成员构成与小组讨论的成员构成一致”。Nießen 提出这一要求的根据是,“对讨论的主题而言,现实小组有共同的互动史,并在此已经发展出共同行动的形式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意义模式。”(第 66 页)

此外,人们还可以区分**同质小组**和**异质小组**。所谓同质小组,是指从研究问

题来看，小组成员在根本的维度上具有可比性，有着相似的背景。所谓异质小组，是指小组成员在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特征方面应该有所不同。异质小组应该增强小组讨论的动力，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尽可能不同的视角，另一方面则是想要通过不同视角的碰撞更好地打破小组成员在发表看法上的保留态度。

案例　学业中断——小组的组成

在一项有关学业中断(Studienabbruch)的原因以及学生对其主观体验的研究中，构成一个同质小组的学生来自同一个专业，中断学业时所学学期数相同，年龄相当。如果研究问题具体关注的是在学业中断的原因和体验方面的性别差异，那么，一个同质小组便仅仅由女性大学生组成，男性大学生则被放入另外一组。一个异质小组所包括的学生应该来自不同的专业(如心理学和信息科学)，处于不同的学期(如在基础阶段中断学业者和在即将完成学业前中断学业者)，有着不同的年龄和性别。人们对于这一异质小组的期待是，学生们的不同背景可以增强讨论的动力，揭示出所研究现象的更多的方面和视角。

不过，即便是在同质小组中，小组成员在某些维度方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些维度是在组成小组时被视为不太重要的那些维度(比如，在刚刚提到的例子中，当前的生活情况——独自生活或与自己的家庭一起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异质小组的成员之间差异太大，那么，就很难为共同的讨论找到结合点。比如，如果学业条件在不同的专业之间有太大的差异，那么，可供辍学学生共同讨论的具体话题就会很少，其讨论将仅仅是一种一般性陈述的交流。

以上这些思考应该可以说明，“同质”与“异质”的对立仅仅是相对的。通常来说，一个小组包括5～10名成员。不过，对于什么是最佳的小组规模，人们的意见又多有分歧。

这个例子说明了，研究者应该如何组成小组，以满足研究问题的要求。此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同质和异质的定义始终只是相对的——要视研究问题及其重要的维度而定。

主持人的角色

主持人在讨论中的角色和功能是另外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人们会完全依靠小组自身的动力，而不用通过主持人来进行调控，以避免他的干涉会对讨论的进展和内容产生(扭曲性)影响。不过，更为常见的做法，而且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也是更值得推荐的做法是通过一个主持人来对讨论加以调控。人们在此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形式(参见 Dreher/Dreher 1994，第 150-152 页)：①**形式上的领导**(formale Leitung)：主持人的作用仅限于制定一个发言人名单以及确定讨论的开始、进展和结束。②**主题上的调控**(thematische Steuerung)：主持人除了上述任务之外还负责引入新的问题以及对讨论进行引导，以深化或扩展特定的主题和内容领域。③**对互动动力的调控**(Steuerung der Dynamik der Interkation)：除了以上的内容之外，主持人的任务还包括推动讨论的展开，甚至为此使用刺激性/挑衅性问题，当讨论进展缓慢时让参与者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当有人支配讨论时有针对性地让那些在讨论中比较沉默的小组成员发言以起到平衡的作用。其他的可能性还有通过提供文本、图画等手段额外地激发讨

论或者设定应该加以讨论的主题。不过,通过这些干涉举措,主持人应该仅仅只是对小组的运作、动力以及讨论起到辅助的作用,同时应该为小组本身动力的发挥留足空间:"一般来说,主持人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少地干扰参与者的自主行动,给他们足够的自由空间,从而让讨论可以主要是通过小组成员之间交换论点得以继续进行下去。"(Dreher/Dreher 1994,第 151 页)

以上介绍了使用小组讨论的不同目的、有关小组形式以及构成的各种见解,还有主持人的作用。正如以下例子说明的那样,研究者应该针对具体的应用情况从中选择出一个合适的组合。

案例 工作情况与职员的未来

Krüger(1983)研究了"有关职业前景的限制性行动条件"。她进行了八组小组讨论,参加者是"处在最低等级层次的银行职员,即信贷机构特定专业部门中的专职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小组属于是现实小组,因为小组成员属于同一部门而且相互认识。这些小组同时也是同质小组,因为为了避免对讨论造成妨碍,部门领导没有参加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平均包括 7 名成员。Krüger 强调了主持人的非指示性风格,在这种风格之下,主持人"总是努力激发起叙述性—描述性发言,做法是提醒参与者注意那些(尚)没有被谈到的情境中的潜在问题。"研究者给出了讨论刺激(Diskussionsanreize),并同时作了过程记录,以便在之后的转录中可以辨认出发言者是谁。"对于小组讨论的实际操作,重要的是,将研究问题限定在一个界定好的经验领域(……)"。在对案例的处理方面,她的做法是:"每一个小组讨论的文本都被视为是一个案例,每一个案例要得到完整的分析。"

小组讨论的过程与组成要素

人们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公式来表示小组讨论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组的动力和其构成。在现实小组或自然的小组中,小组成员已经相互认识,并且可能对讨论的话题有所了解。而在人为的小组中,第一步要进行的工作是介绍小组成员,让他们相互认识。不过,通常来说,人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小组讨论的步骤:

- 在开始时,主持人需要解释说明(形式上的)工作流程,并提出对参加者的期待,即参与讨论,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特定的话题进行争论,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共同解决一个问题(如在 Dreher/Dreher 1994 的研究中)(例如,"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你们的学习经历,以及你们决定中止学业的原因")。
- 简短地介绍以使成员们相互认识,然后是热身阶段以为讨论做准备。主持人应当在此强调成员们的共同特征,以促成或增强成员们对小组的归属感(例如,"你们作为以前的心理学学生,一定都熟悉这些问题,即……")。
- 真正的讨论以一个"讨论刺激"开始。讨论刺激可以是几个刺激性/挑衅性论点、一部短片、朗读一段文字或者是提出一个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与焦点

访谈相似(参见第13章以及Merton 1987)。为了刺激工人们对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变化的讨论,Herkommer(1979,第263页)使用了提示框15.1中介绍的讨论刺激。

- 特别是在那些成员们事先互不认识的小组中,小组讨论会经历以下这些阶段:陌生阶段、定向阶段、适应阶段、熟悉阶段以及达成一致阶段和讨论枯竭阶段(参见Mangold 1973,第216页;Spöhring 1989,第223页)。

提示框15.1 小组讨论中一个讨论激励的范例

"联邦德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看出,比如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退休金与社会保险问题,更加艰难的工资谈判。这给工人们的职业和工作岗位带来了一系列困难。总地来说,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企业工作氛围恶化的情况。在日常生活和家庭中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对孩子们的职业培训。考虑到刚刚谈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想听一下你们对以下观点的意见,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过得比现在更好!'"

出处:Herkommer(1979,第263页)

实施的问题

小组讨论相对于个别访谈所具有的优点同时也是该方法在实施中遇到问题的主要来源:小组讨论的动力(Dynamik)受到各个小组的影响,这一方面让人难以明确地提出讨论的过程模式,并对主持人的任务和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这也让研究者仅能有限地做到在参加研究的不同小组中创设相对统一的收集资料的条件。虽然说,人们可以统一地以一个特定的说法、一个具体的刺激等来开启讨论。不过,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讨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则是很难预知的。因此,对那些旨在对小组进行调控的方法干预,人们只能做出大概的规划,大部分与资料收集有关的决定都只能是在情境之中做出。同样也需要在具体情境之中决定的还有:小组对某一话题的讨论何时算是已然穷尽。对于这一决定,这里不能给出明确的标准。因此,主持人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作出这一决定。

这里出现的问题部分上与提纲访谈的问题类似:访谈者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必须要在讨论进展和设定讨论的主题这两者之间进行协调。这一问题在小组讨论这里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研究者要在小组内部的发展动力和对小组的调控(以便将所有成员纳入讨论)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因此,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是,在情境和小组动力的影响下,个别成员会支配其他成员,而其他成员则是基本上不参与讨论。这两种情况的后果都是,个别成员及他们的观点无法供之后的分析所用(Mangold 1973)。

最后,尽管同时对几个人进行访谈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不过,因为小组讨论需要研究者投入很大的精力来进行组织——约定一个所有成员都能参加的时间,这令这一经济性优点有所削弱。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小组讨论可以表明,人们的意见是如何在社会交流中形成的,特别是它们是如何被改变的,如何得到认可以及如何被压制的。人们通过小组讨论的方法可以在情境之中收集口述资料。陈述以及意见表达都是在小组之中做出的,并且可能会得到小组成员的评论,成为一个或多或少的动态的讨论的主题。这种动力以及对个体观点的社会协商,在方法讨论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是将小组讨论当作一种方法讨论的一个结果。人们现在在方法讨论中之所以更加关注这种动力以及个体观点的社会协商,并将此视为现实之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得益于有关小组讨论这一方法的讨论。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应用该方法的理论背景常常是结构主义模型(参见第 6 章)。结构主义模型的出发点是,存在于意见形成中的动力以及无意识性会在小组中显现出来。因为由此所获得的资料缺少可比性,因而,早期运用这一方法来检验假设的尝试都失败了。近来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这一方法来发展理论。资料收集与资料解释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这里对研究过程的理解是环形的(参见第 8 章)。研究问题的焦点是小组之中的意见形成及其社会分布。对研究案例的获取以及抽样都受到以下问题的影响,即为了收集资料而由个体组合而成的小组本身是分析的单位。理论抽样(参见第 11 章)既可以聚焦于所要选取的小组的整体特征(例如:如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就中断学业的问题访谈了心理学学生小组和医学学生小组,那么,接下来是否更应该选择来自大学或高等专业学院的工程学专业的学生呢?),也可以聚焦于单个成员的特征。在对资料的解释方面,各个小组是解释开始的单位。作为解释资料的方法,可以采用顺序分析法(例如,客观注释学——参见第 25 章),该方法以小组及小组中的讨论进展为起点着手分析。在推广研究结果时会出现的问题是,如何总结和概括不同的小组讨论的结果。

方法的局限性

这一方法在资料解释方面常常会出现问题,其原因是:在不同的小组中有着不同的动力,因此难以保证小组之间的可比性,而且在这种小组动力下,要确认出各个小组成员的意见和观点比较困难。"作为最小的分析单位的(……)只能是整个讨论小组或分小组。"(Mangold 1973,第 222 页)为了至少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小组之间的可比性以及小组成员——作为整个样本中的个案——之间的可比性,人们很少会在小组讨论中放弃主持人的调控。

因为对小组讨论的实施、记录、转录与解释需要很多的工作投入,因此,主要是当研究问题是旨在揭示小组之中意见形成的社会动力时,使用这一方法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只是出于经济性的考虑才使用小组访谈来替代个别访谈的话,那么,这么做的意义就不太大了。通常来说,小组讨论会和其他的方法一起

被结合使用,如补充性的个别访谈或观察法。

焦点小组

“小组讨论”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主要是在德语地区得到人们的使用。近年来,这一方法以“焦点小组”(Focus-Group①)为名在英语地区得到了复兴(相关概述请参见 Barbour 2007; Bohnsack 2000; Loos/Schäffer 2001; Lunt/Livingstone 1996; Merton 1987)。焦点小组主要是被用于市场研究与媒介研究。在这里,人们所看重的也是资料收集中的互动性:

> 焦点小组的特点在于,它明确使用小组互动来生成资料和见解,而倘若没有小组中发生的互动,人们不太容易获得这些资料和见解。(Morgan 1988,第 12 页)

焦点小组可作为方法独立使用,也可与其他的方法——如调查、观察、单独访谈等——结合使用。Morgan(1988,第 11 页)认为,对于以下用途而言,焦点小组是有用的:

- 让人熟悉一个新的领域。
- 在信息提供者的见解的基础上生成假设。
- 评估不同的研究领域或人群。
- 发展访谈提纲及问卷。
- 获取参与者对早期研究结果的解释。

焦点小组的实施

从对相关文献的简单概览中,可以对焦点小组的实施提出下面一些建议。应该实施多少个焦点小组,取决于研究问题以及回答该问题所必需的、不同的调查群体的数量(Morgan 1988,第 42 页)。一般来说,研究者应该采用由陌生人组成的小组,而不是由朋友或相互熟识的人组成的小组。这是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有更多的事情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因而不会在讨论中明确提及,因此也就不会进入所收集的资料(Morgan 1988,第 48 页)。不过,Morgan 也建议,研究者可以从尽可能异质的小组开始,然后实施第二轮的焦点小组。在这第二轮中,小组成员可以更加同质一些(Morgan 1988,第 73 页)。不管怎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要以一个热身阶段(Anwärmphase)来开始焦点小组,就像提示框 15.2 中的案例所说的那样。

对于通过焦点小组所收集的资料的分析,人们建议采用以下的分析方法:概括讨论内容、系统编码或者内容分析法(参见第 23 章)(Morgan 1988,第 64 页)。

---

① “Focus-Group”也被人翻译为“焦点团体”。——译者注

提示框 15.2　开启焦点小组的案例

“在我们开始讨论前，首先互相认识一下是十分有帮助的。让我们开始做一下自我介绍。X，请从您这里开始，然后我们按座次轮流进行，请说出自己的名字，并谈谈所从事的工作。”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个与各位都有关的话题。在开始讨论前，我想向您提出几项请求。首先，您应当知道我们会对这次讨论录音。这么做是为了便于我在撰写报告时可以更好地引述本次讨论。如果您因为录音而感到不舒服，请您说出来，当然，您可以拒绝参加。请您尽量大声地、清楚地讲话。让我们争取做到每次只有一人发言。我会扮演交通警察的角色，并尽量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最后，请您说出您心中所想的。请不要担心我怎么想，或者您的邻座怎么想。我们来此是为了交流意见，并且在此获得乐趣。我们就以自我介绍开始吧。”

出处：Stewart/Shamdasani（1990，第 92-93 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根据 Lunt/Livingstone（1996）的分析，焦点小组可被视为以及用作对日常话语（Alltagsdiskurs）及交谈的模拟。此外，焦点小组也可作为一种准自然主义的方法被用于发展社会展示或者更加普遍性的社会知识。焦点小组的一般性优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首先，焦点小组可以生成讨论，并由此揭示出人们赋予了讨论话题哪些意义以及他们是如何就这些意义进行协商的。其次，焦点小组可以生成小组内或小组间的多样性和区别，并由此表明 Billig（1987）所说的日常争论的两难性本质（das lilemmatische Wesen）。（Lunt/Livingstone 1996，第 96 页）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焦点小组从互动主义的视角出发（参见第 6 章），旨在表明一个问题在小组的讨论中是如何被形成及改变的。在抽样方面，该方法往往注意让一项研究中的不同小组的成员之间具有差异性（参见第 11 章）。在许多情况下，对资料的分析更多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分析的工作更多地是将陈述组合在一起，而不是广泛地对其进行诠释。当前人们在试验着使用网上焦点小组（Online-Focus-Groups）（参见第 20 章）。

案例　应用焦点小组来反馈和验证研究结果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了在卫生事业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有关健康和年龄的观念（Flick et al. 2004；Walter et al. 2006）。在该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采用了事件访谈法（参见第 14 章）来收集有关这些观念的资料以及受访者有关预防和增进健康的想法和经验。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后，研究者又采用焦点小组的方法访谈了家庭医生（Hausarzt）和护士。这么做有三个目标：第一，研究者希望向参与者反馈其研究结果；第二，研究者希望获取他们对这些结果的评论；最后，研究者希望与参与者一起讨论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意义，让研究结果适合用来改进门诊护理和医疗服务中的日

常实践。改进的方向应该是让实践更多地以健康、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为导向。

为了避免小组中的讨论过于一般化和差异过大,研究者找出了一个具体的、起敏感化作用的话题作为这个广泛性讨论主题的开场白。受访者在访谈中谈到了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要做到更好地以预防疾病为取向会遇到什么障碍,研究者便以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结果作为开场白。具体来说,研究者向受访者介绍了有关专业人员和患者方面的支持和抵制的研究发现。首先,研究者概述了访谈中提到的障碍,然后参与者按其重要性对这些障碍进行了排序。接下来,研究者请参与讨论者就这些研究发现展开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参与者自己的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健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这个讨论渐趋平息时,研究者请参与者就如何克服之前提到的障碍提出建议,并就这些建议展开讨论。最后,研究者不仅获得了参与者对原来的访谈结果的评估,而且还从每个小组中获得了一系列评论和建议。这些评估、评论和建议再度得到了分析并且被纳入了最终的研究结果之中。

在这个例子中,焦点小组被用来实现一个特定的目的。焦点小组在这里并非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料收集方法而被使用的,而是被用来向参与者反馈研究结果并且与参与者一起通过交流来确认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在这里,参与这两个调查环节——事件访谈和焦点小组——的应该是相同的人。不过,并非所有的受访者都接受了研究者的邀请,前来参加焦点小组,再次为研究做出贡献。使用刺激的方法——在本案例中,是呈现挑选出来的研究发现——被证明有助于推动讨论的进行以及为讨论设定一定的结构。在对小组的分析中,每个小组都被当作是一个个案。不过,从中得出的与主题相关的见解和结果却具有可比性。

方法的局限性

这一方法的问题与小组讨论类似。它特有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记录资料,才能够判别单个发言人并且能够将同时发言的多个参与者的陈述区分开来。

共同叙事(Gemeinsames Erzählen)

Hildenbrand/Jahn(1988)在类似的方向上拓展了对叙述的应用。他们的出发点是在家庭研究中所做的观察,即,被调查的家庭共同叙事并由此重新组织和建构其现实。从这个观察出发,研究者开始系统地推动这样的共同叙事,并将共同叙事用作资料。在这里,研究者注重的是所有的家庭成员在资料收集时都在场,而且资料收集要在家庭的住处进行。

> 在谈话开始时,家庭成员被要求叙述其过去和现在的家庭生活。我们放弃使用明确的叙述刺激,因为(……)这会对话题的多样性造成不必要的限制。(Hildenbrand/Jahn 1988,第207页)

同样地,研究者也放弃了"方法上引导性的干涉",因为谈话是由家庭成员自己来组织的(Hildenbrand/Jahn 1988,第207页)。这么做是为了让研究情境接近家庭中的日常情境。然后,研究者"按照一个核对表和家庭成员一起将那些在谈

话过程中未被提到的家庭的社会资料补充完整”。然后,研究者制作详细的观察记录,内容包括谈话的情境(产生的历史、家庭生活条件、对房子及家具布置的描述)。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共同叙事是对单一叙述者的独白式叙述的一种扩展。研究者会对叙事的产生以及家庭为自己和听众建构现实的方式进行互动分析。这一方法产生于一种特定的研究领域,即家庭研究(Familienforschung)[①]。使用这一方法的原因也正是在于这一领域及这一研究对象的自然性的结构。将共同叙事的思想应用到家庭之外的其他团体形式,应该也是可能的。这里可以想到的可能性比如有:人们可以用这一方法来分析一个特定的机构,例如分析一个咨询服务机构,分析其历史、行动方式以及矛盾冲突。做法是让在一个团队中工作的成员共同叙述其机构的历史。在这里,不仅所描述的发展历程是分析的主题,而且参与者不同的看法和表述方式以及动力也是分析的内容。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该方法的理论背景是对现实的共同建构。使用该方法的目标是发展建立在这些建构基础之上的理论(参见第 8 章)。在抽样方面,该方法是从个案出发(在 Hildenbrand/Jahn 1988 那里是指一个家庭),然后逐步地纳入其他的个案(参见第 11 章)。在对资料的解释上,该方法采用的是顺序分析的方法(参见第 25 章),以便由案例比较出发获取更具普遍性的陈述(参见第 29 章)。

方法的局限性

采用共同叙事方法的研究项目同时也使用了其他若干种方法。因此,对该方法的单独使用尚需经过检验。该方法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案例便会产生大量的文本资料,这导致对它的解释也同样会产生大量的资料。因此,研究者所完成的大多是个案分析。最后,因为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放弃由研究者进行方法上的干预,所以,它阻碍了人们针对特定的研究问题有目的地使用这一方法,同时也阻碍了在收集资料中对方法进行调控。在这里,共同叙事不仅结合了叙事访谈和小组讨论的优点,而且还包括了它们的问题。

这里简要介绍的小组程序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收集资料并以此来代替对个体的访谈,不过,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时,研究者所看重的是将在不同的时间访问多个个体的工作简约为在同一时间访谈一个群体。在实现从所有的受访者那里获得回答这一目标上,小组动力(Gruppendynamik)既可能被视为是有益的,也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干扰因素。而在小组讨论这里,人们所看重的正是这种

---

① 在 Hirst/Manier(1996)对家庭的研究中以及在 Dixon/Gould(1996)和 Bruner/Feldman(1996)的著作中,研究者都对共同叙事和回忆表现出广泛的兴趣。这里介绍的方法为这一领域的质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

小组动力以及小组带来的额外的认知可能。在共同叙事这里，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建构现实的过程。该过程在调查的这一时刻发生于小组之中。因为该小组在研究情境之外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这一建构现实的过程可能也出现于该小组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怎样，通过小组程序所获得的口述资料要比通过单个访谈所获得的资料更为复杂。这一复杂性既可以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小组程序所获得的资料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多样。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要在共同的过程中确认参与者个体的观点相对而言更为困难。

要 点

- 与焦点小组和小组讨论相比，小组访谈更少得到人们的使用。
- 只有当研究问题提出这样的要求时，研究者才应该使用焦点小组和小组讨论来代替个别访谈。采用小组程序来代替个别访谈很少会带来节约时间的好处，这是因为采用小组的工作需要完成更多的细节上的组织工作，并且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分析小组讨论的转录文本。
- 当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动力有助于促进资料收集中所获得的知识时，小组讨论、焦点小组和共同叙事才是富有成效的方法。

练习 15.1

1. 请您从文献中找出一项采用了小组讨论或焦点小组的研究。请您思考一下，该项研究所使用的是什么形式的小组。
2. 此外，请您试着去发现，研究者是如何实施以及主持小组讨论的。
3. 请您想出一个最适合采用小组讨论或焦点小组来进行研究的问题。

拓展阅读

小组访谈

Fontana, A./Frey, J. H. (2000). The Interview: From Structured Questions to Negotiated Text. In: N. Denzin/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p. 645-672.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3rd ed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小组讨论

Bohnsack, R. (2000). Gruppendiskussio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69-384.

Loos, P./Schäffer, B. (2001). Das Gruppendiskussionsverfahr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焦点小组

Barbour, R. (2007). Doing Focus Groups (Book 4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Lunt, P./Livingstone, S. (1996). Rethinking the Focus Group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 79-98.

共同叙事

Bruner, J./Feldman, C. (1996). Group Narrative as a Cultural Context of Autobiography. In: D. Rubin (ed.). Remembering Our Past: Studie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91-317.

Hildenbrand, B./Jahn, W. (1988). Gemeinsames Erzählen und Prozesse der Wirklichkeitskonstruktion in familiengeschichtlichen Gespräche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7: 203-217.

Hildenbrand, B./Peter, C. (2002). Familiengeschichtliche Gespräche zur Rekonstruktion der Entwicklungsdynamik von Krankenheiten. In: Schaeffer, D./Müller-Mundt, G. (Hrsg.). Qualitative Gesundheits-und Pflegeforschung. Bern: Huber, S. 247-268.

口述资料:方法概览 16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能够

- 比较不同的收集口述资料的方法,以决定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其中的哪一种方法。
- 根据应用中的(初步的)经验,批判性地评价选择这一方法的决定。
- 结合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计划的其他步骤理解所选择的方法。

收集口述资料的方法是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一方面,研究者在此通过使用不同的策略让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对象以及受访者、叙述者或参与讨论者的观点保持开放性。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备选方法则包含着一些特殊的策略可以将资料收集加以结构化。这些策略的目的旨在让那些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话题成为访谈的内容,或者旨在将对这些话题的探讨向着更深入更全面的方向引导。最后,访谈中尚没有被谈及的研究问题的方面也需要被引入谈话。不同的方法都在开放性和结构化这两个目标之间摆动。在具体的应用中,它们会更多地以这一个目标或者以另一个目标为导向。叙事访谈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更多地是以开放性为取向,为受访者的叙述留出空间,并将访谈者的引导性干预局限于访谈开始部分的叙述要求和结尾部分的追问。在提纲访谈这里,访谈者在主题上加以调控从根本上来说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且访谈可以被更加直接地聚焦于特定的主题。因此,对于各自的具体的研究问题而言,视所选择的目标(开放性或结构化)的不同,总会有某些特定的方法或多或少地更适合被使用。以下部分简单介绍了在收集口述资料的不同方法之间做出这种选择的四个依据。

第一参照点:基于标准的方法比较

对提纲访谈法、叙事法和小组访谈法的不同形式进行比较是做出方法选择

表 16.1　用来收集口述资料的方法之比较

	提纲访谈法					叙事法		小组访谈法		
方法标准	焦点访谈	半标准化访谈	问题中心访谈	专家访谈	民族志访谈	叙事访谈	事件访谈	焦点小组	小组讨论	共同叙事
对受访者主观见解的开放性，通过：	• 通过非结构性的问题来避免施加影响	• 开放式问题	• 以研究对象和过程为导向 • 为叙述留出空间	• 开放性有限，因为研究兴趣在于受访者的专家身份，而非其个人	• 描述性的问题	• 一旦开始叙述，就不再对其施加影响	• 叙述重要的经历 • 话题选择由受访者做出	• 顾及到小组的相互关系	• 非指示性讨论主持 • 宽松的讨论氛围	• 放弃提供叙述刺激和进行方法上的干预
对研究主题的结构化（如深化），通过：	• 给出刺激 • 结构化的问题 • 聚焦于感受	• 以假设为导向的问题 • 对立性问题	• 以访谈提纲作为转换或中止无用的陈述的基础	• 以访谈提纲作为结构化的工具	• 结构性问题 • 对质性问题（Konfrontationsfragen）	• 叙述要求 • 在访谈结尾部分有叙述性追问部分 • 总结部分	• 将叙述与论证结合起来 • 给定应被叙述的具体的情境	• 使用提纲来加以调控	• 小组内部发展出来的动力 • 通过访谈提纲来加以调控	• 共同叙述的内在动力 • 用于收集社会统计资料的核对单 • 观察记录
对于访谈法一般发展的贡献	• 提出设计访谈的四个标准 • 将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作为第二种资料来源	• 使用结构置放技术将内容加以结构化 • 建议将隐含性知识明确化	• 简短问卷 • 访后记录	• 对调控的强调：访谈仅限于专家身份	• 强调创设访谈情境的问题	• 将对访谈的结构化置于访谈的开始和结尾部分 • 对叙述作为研究工具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 将叙述与论证作为资料类型系统地结合起来 • 有针对性的叙述要求	• 模拟话语和社会展示被生成的不同样态	• 通过利用小组动力来代替个别访谈	• 将叙述和互动分析结合起来 • 强调叙述中的建构
应用领域	• 对主观意义的分析	• 主观理论的重构	• 用于研究具有社会意义或与个人传记有关的问题	• 用于研究机构中的专家知识	• 在开放场域中的实地研究	• 传记历程	• 日常生活中的变迁，例行常规及情境	• 市场营销，媒体研究，评估	• 观念研究与态度研究	• 家庭研究
实施的问题	• 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标准	• 大量的方法上的预先规定 • 资料解释的问题	• 在叙述模式和问答模式之间的非系统性转换	• 受访者方面的角色困惑 • 专家造成的阻碍	• 在“友好的闲谈”与正式访谈之间进行协调	• 极端的单方面的访谈情境 • 叙述者的问题 • 叙述强迫的问题	• 对访谈原则的说明 • 访谈提纲的使用	• 对小组及其参与者的抽样	• 在沉默者与健谈者之间进行协调 • 几乎不能规划讨论进展	• 放弃为叙述确定主题上的焦点
方法的局限性	• 认为了解研究对象客观特征的想法是靠不住的 • 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得到使用	• 事先给定一个结构 • 必须调整方法以便适合研究对象和受访者	• 以问题为导向 • 对“部分要素”的非系统性结合	• 资料解释仅限于专家知识	• 主要是和观察或实地研究结合使用才有意义	• 假定了经验和叙述之间的等同 • 将研究问题裁减至可被叙述的内容	• 研究内容局限于日常知识	• 对资料的记录 • 辨别各个同时发言的受访者	• 在组织上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 • 可比较性方面的问题	• 放弃进行调控 • 不能作为单一方法独立使用 • 案例分析的规模
参考文献	Merton/Kendall 1979	Scheele/Groeben 1988	Ruff 1998，Witzel 1985	Bogner，Littig/Menz 2002	Heyl 2001，Spradley 1979	Küsters 2006，Schütze 1983，Hermanns 1995	Flick 1996，2004	Barbour 2007，Lunt/Livingstone 1996	Bohnsack 2000，Loos/Schäffer 2001	Hildenbrand/Jahn 1988

决定的第一参照点。表16.1给出了用于此类比较的几个标准：第一，各个方法为保证对受访者的主观见解保持开放性所采取的措施；第二，各个方法为了保证在处理访谈的主题时能够获得充分的结构性和深度而采取的措施；第三，各个方法对于访谈法的一般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四，各个方法得以发展起来以及主要被人所使用的应用领域；第五，各个方法在实施中的问题；第六，之前各章已经介绍过的各个方法的局限性。这样一来，用来收集口述资料的各种方法都可以在这一领域中得到定位。

第二参照点：方法的选择及对其应用的检验

以收集和分析口述资料为目标的各种方法都建议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研究问题和目标群体来选择所使用的方法，并以所收集到的资料来检验自己对方法的选择。对于一个研究问题而言，并非所有的方法都是合适的：对传记经历的研究用采用叙述的访谈法要比用采用问答模式的提纲访谈法更为合适。小组讨论的动力对于研究意见形成的过程是有帮助的，但是却会妨碍对个体经验的分析。在做出选择或放弃某一具体方法的决定时，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内容是第一参考依据。有些人善于叙述，而有些人则不善于叙述。对于某些特定的目标群体而言，重构他们的主观理论是一个令人非常陌生的做法，而其他一些人则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地投入这一情境。因此，(潜在的)受访者是做出方法选择以及判断其合适性的第二参考依据。

不过，受访者在参与特定的访谈情境方面的这些差别并不只是个体的差别。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旨在达到的陈述的水平时，就可以系统地看待方法、主体和主题的关系了。这里的标准就是方法选择和方法运用对于研究主题与对象的适合性(Gegenstandsangemessenheit)。研究者不应该是在资料收集工作结束之时，即在完成了所有的访谈或讨论之时，方才提出与此相关的问题，而是应该在完成了一两个测试性访谈(或讨论)之后便思考这些问题。在检验所选择的方法是否合适时，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所选择的方法就其自身而言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应用。比如，一个叙事访谈是否真的是以一个叙述要求开始的吗？再比如，在提纲访谈中，研究者是否是在受访者获得了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去足够详细地回答之前的问题之后，方才转换话题及引入新的问题？

对最初几次访谈的分析可能会表明，与其他方法相比，有些受访者对于某些方法会有更大的困难，或者是有些受访者会比其他受访者遇到更大的困难。访谈者自己也可能会在使用一种方法上比在使用其他方法上遇到更多的问题。因为使用这一方法在某些方面对访谈者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比如，当受访者的谈话脱离主题时，访谈者需要决定应该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将谈话引回到访谈提纲上来。再比如，访谈者应该如何在叙事访谈中做到必不可少的积极聆听。因此，研究者需要检验的问题还有，访谈者和方法是否相匹配。如果在这一层面上出

现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以下两种解决方案：对访谈者进行认真的访谈训练（对于这一点，请参见第13章中有关焦点访谈和提纲访谈的相关论述和第14章中有关叙事访谈和事件访谈的相关论述），以减少此类问题。如果这种解决方案还不够的话，就可以考虑选择其他的方法了。做出此类决定的一个基础是对访谈情境中互动进展情况的分析，看看受访者获得了多大的陈述空间以及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角色的定义有多么清楚。最后，在做出选择某一方法的决定以及评价这一选择时，还应该考虑到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分析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研究结果所追求的是何种水平上的推广度。

表16.2中的核查单指出了决定选择某一资料收集方法以及检验其合适性的参考依据。

表16.2 访谈方法的核查单

什么是好的访谈？——好的访谈[①]取决于哪些因素？ 选择一种访谈类型及评价其运用的核查单	
1. 研究问题	• 这种访谈类型及其应用能够涵盖研究问题的基本方面吗？
2. 访谈类型	• 对访谈类型的应用必须符合方法的要求和目标：不能在访谈类型之间来回跳跃（“刺激色拉”），除非是这种跳跃有研究问题方面的理由或理论依据。
3. 访谈者	• 访谈者能够驾驭这种访谈类型吗？ • 访谈者自己的担心和不确定感在访谈情境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受访者	• 这种访谈类型适合于所研究的目标人群吗？如何才能照顾到受访者的担心、不确定感和期待呢？
5. 给予受访者的空间	• 受访者能在问题框架内展现自己的观点吗？ • 受访者能够超出问题框架展现自己的观点吗？
6. 互动进展	• 访谈者正确地实施了这种类型的访谈吗？ • 访谈者给予了受访者足够的空间吗？ • 访谈者有没有完成自己的角色呢？（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 • 对受访者而言，他的角色、访谈者的角色以及情境得到了清楚的定义吗？ • 受访者有没有完成自己的角色呢？（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呢？）
→	尽可能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访谈之间对违背之处进行分析，以检验访谈的正确性。
7. 资料分析的目标	• 资料分析旨在获得有限的、清楚的答案，还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式和相互关系呢？
8. 推广度方面的追求	• 应该是在哪一种层面上得出结论呢？ —个案的层面（例如，被采访的个体以及他的传记，一个机构及其影响等）？ —群体的层面（例如，某一职业群体，某一类型的机构等）？ —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① 为了让表述一目了然，这里仅仅使用了“访谈”这一术语。如果人们用“小组讨论”来替换“访谈”，可以提出相同的问题并做出回答。

第三参照点: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方法以及方法论讨论有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对于所研究的对象而言,某些方法是“理想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在方法上)正确的选择。在这些讨论中,人们恰恰忽视了质性研究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即,方法的选择和评价应该根据其相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来进行(参见第 2 章)。在这里,纯粹的方法探索性的研究(rein methodenexplorative Studien)是一个例外。此类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有关特定方法的实施、可实施性和问题的认识。在这类研究中,研究对象对于回答这类问题仅仅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因此,在这里,对特定方法的选择被视为是不重要的。除了这类研究之外,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研究对象、研究问题、被研究的主体和所追求的结论的推广度水平是人们在质性研究中判断某一具体方法是否合适的参考依据。

第四参照点: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匹配性

最后,应该将所选择的方法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看看它与整个研究过程是否匹配。这里的目的是要查明,收集资料的方法是否与解释资料的方法相匹配。如果是要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一项内容分析,并在此仅仅采用从某些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范畴以及使用对原始文本的诠释的话(参见第 23 章),那么,在此采用叙事访谈法,以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为有关事件的发展经历及其内在结构的陈述留足空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同样地,如果访谈者在访谈中是严格地按照访谈提纲的主题进行谈话的话,那么,采用注释学方法(参见第 25 章)来分析陈述结构的发展顺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类似地,研究者也需要检查收集资料的方法与抽样的方法(参见第 11 章)、自己研究的理论背景(参见第 6 章)以及对整个研究过程的理解(例如,发展理论或是检验假设;见第 8 章)是否匹配。本书在介绍各种方法时都用专门的段落来分析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匹配性,这部分内容可以作为研究者做出以上判断的参考依据。它们概括指出了内在于每种方法之中的对于研究过程及其组成部分的理解。接下来需要检查的便是,自己的研究设计以及自己对各个研究步骤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与内在于该方法之中的原本的设计和理解相符合。

要 点

- 所有用来收集口述资料的方法都各有优缺点。
- 所有的方法都为参加研究的受访者提供空间,让他们陈述自己的经历等。
- 同时,每种方法都以特定的方式来将所研究的内容加以结构化。

- 在选择使用一个具体的方法来回答自己的研究问题之前以及在此过程之中，需要认真地检查这种方法是否适合。

练习 16.1

1. 请您从文献中选择出一项采用了访谈或小组讨论的研究。请您思考一下，这项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群体。
2. 请您检查一下您自己的研究。您选择运用某一特定方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拓展阅读

Barbour, R. (2007). Doing Focus Groups (Book 4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lick, U. (2000a). Episodic Interviewing. In: M. Bauer/G. Gaskell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 A Handbook. London: SAGE, pp. 75-92.

Hermanns, H. (1995). Narratives Interview.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München (2. Aufl.):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182-185.

Hermanns, H. (2000). Interviewen als Tätigkeit.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60-369.

Kvale, S. (2007). Doing Interviews (Book 2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Loos, P./Schäffer, B. (2001). Das Gruppendiskussionsverfahr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第五部分　观察法和媒介资料

本书在前面几章中介绍的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主要是在语言这一个层面上生成资料。对于这些方法而言,参加研究者所说的话之外的其他信息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不过,在质性研究的历史上以及在当前的发展中还有一系列的方法旨在突破这一局限。第五部分将介绍这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所获得的资料超出了所说话语的范围。参与式观察法和非参与式观察法在质性研究领域传统已久,在民族志领域又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并且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整个质性研究。第 17 章介绍了观察法和民族志。通过照片、电影或录像所获得的第二手观察——近来引起了人们更多地关注。如果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口述资料领域出现了一种“叙事转向”(narrativer turn),那么,我们现在又可以发现一些其他的转向,如“图像转向”(iconic turn)和表现转向(performative wende)。这些转向要求扩展资料的收集,以便可以研究由这些转向而带来的新的研究问题。电影和照片是随处可见的,图片也在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地,电影、照片和录像等媒介既成为生成资料的方式也成为质性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第 18 章介绍了这些视觉资料。质性研究也可以使用媒介化的间接性资料。使用文档在质性研究领域也已经有长久的传统。这些文档可以被视为是个人经验的痕迹(如日记)或者是机构互动与实践的记录(如案卷)。

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不仅在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在潜在的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电子邮件、因特网、万维网、聊天室、新闻组(newsgroup)、博客等已经成为了人们所熟悉的沟通途径(至少对许多人而言是这样的)。因此,人们对于以下情况并不感到惊奇,即网络不仅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成为一种研究工具,被用来与被研究者联系以及开展网络访谈和网络民族志。第 20 章分析了这些新的研究手段的前景和问题以及此类研究应该如何实现。第五部分的最后一章——第 21 章——总结和比较了收集观察资料和媒介资料的不同方法。

观察法和民族志 17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可用于您自己的研究的不同类型的观察法。
- 了解参与式观察的特殊问题。
- 知道民族志是观察法传统的新发展 。

观察法在质性研究历史以及方法讨论中曾居于中心的位置，在美国尤其如此。在现有的文献中，人们可以发现有关观察法以及观察者角色的不同的理解。在有些研究中，观察者并非是所观察场域中的一部分，例如 Goffman（1972）的研究。而在其他一些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越来越多地成为所观察场域的成员来获取信息。近年来，民族志接替了参与式观察的位置。

总地来说，这些方法强调研究者只有通过观察才能了解人们的行为方式，通过访谈和叙事所获得的资料只是对这些行为方式的描述，而不是这些行为方式本身。人们对观察法的要求往往是要通过它来查明某事**实际上**是如何运行或发展的。与此相对，访谈所呈现的内容既包括某事是怎样的，也包括它应该是怎样的，是这两者的一种混合，因而尚须研究者加以澄清。

非参与式观察

除了访谈中所用到的听和说的能力之外，观察能力是另外一个在质性研究中作为方法得到系统化和应用的日常能力。观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感知——视觉、听觉、感觉、嗅觉（Adler/Adler 1998）。根据 Friedrichs（1973，第 272-273 页）的分析，人们通常来说可以按照五个维度对观察法进行分类。这五种分类是：

- 隐蔽式观察 *vs.* 公开式观察：被观察者在多大程度上获悉了研究者对他们的观察活动？

- 非参与式观察 *vs.* 参与式观察：观察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被观察场域的一部分？
- 系统性观察 *vs.* 非系统性观察：观察所使用的是一种或多或少标准化的观察模式呢，还是说观察对于事情进展本身保持开放性呢？
- 自然情境中的观察 *vs.* 人为情境下的观察：观察是在所关注的自然领域里进行呢，还是说为了更好地进行观察，将互动"转移至"一个特定的空间（比如实验室）呢？
- 自我观察 *vs.* 观察他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观察的对象都是其他人。为了让对被观察内容的解释具有更扎实的基础，人们对于研究者反思性的自我观察给予多大的重视呢？

这种一般的分类方法也适用于质性研究中的观察，只不过人们在这里完全是在自然的情境中收集资料。本章接下来首先介绍非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非参与式观察放弃了在研究实地中进行干预。人们对于非参与式观察的期望被表述如下："纯粹的观察者追随着事件的自然进展。人们的行为和互动就像研究者并不在场时那样照常进行，不会被干扰所打断。"（Adler/Adler 1998，第 81 页）

人们在此可以将 Gold（1958）所提出的观察者角色的类型学作为区分非参与式观察与参与式观察之间差异的出发点。Gold 区分了以下四种类型：

- 完全的参与者
- 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
- 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
- 完全的观察者

完全的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对其造成影响。人们有时候借助以下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即以录像取代实地观察。或者是努力将被观察者的注意力从研究者身上移开，以便于让被观察者尽快地完全忘记观察的存在。在这里，研究者也会使用隐蔽式观察，其特点是被观察者并不知道自己被观察。不过，这种做法在研究伦理上是有争议的，尤其在研究场域一目了然并且不难做到通知被观察者以及征求其同意的情况下。隐蔽式观察通常被用于开放的场所（例如，在火车站或广场，以及人来人往的咖啡馆），在这些地方研究者不方便征求被观察者的许可。

观察的阶段

Adler/Adler（1998），Denzin（1989b）和 Spradley（1980）等学者区分了以下的观察阶段：

- 选择场景：即在何时何地观察那些研究者所感兴趣的过程和人物。
- 确定观察中必须要记录下来的内容。
- 训练观察者以便于让其观察的焦点变得一致。

- 描述性观察，为观察场域提供最初的、一般性的表述。
- 聚焦性观察，观察的焦点逐渐集中于那些对研究问题重要的方面。
- 选择性观察，仅选择核心的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察。
- 观察结束，当观察达到理论上的饱和时（Glaser/Strauss 1967/1998），也就是说，当进一步的观察不再提供新的知识时，即可结束观察。

实施的问题

对于非参与式观察而言，一个核心的困难在于为观察者设定一个实用性的角色，让他可以呆在观察场域或其边缘，同时又能够对场域进行观察（参见第10章有关参与者角色的相关论述）。所观察的场域越是公开，越是复杂，观察者也就越容易扮演一个不会引起人注意且不会影响到观察场域的角色。而所观察场域越是简单明了，研究者要想呆在观察场域却又不成为其成员，也就愈加困难。针对这个问题，Niemann 在一项观察青少年在"休闲场所"中的休闲行为的研究中，描述了一种解决办法："观察是隐蔽进行的，以避免影响青少年在特定场所中的行为。"（Niemann 1989，第73页）。

案例 青少年的休闲行为

研究者"同时在两个测试时间"分别在两个迪斯科舞厅、溜冰场、购物中心、露天游泳池、室内游泳池、足球俱乐部及音乐厅等地点对处在不同情境中的青少年进行了观察。研究者采用随机的方法来选择情境（Niemann 1989，第76页），并将与这些情境相符合的特定的"发展任务"（如实现融入一个同辈群体的目标）登记在记录表中。作为准备，观察者参加了一项观察训练。在训练中，观察者分别单独观察某一情境，然后分析所做观察之间的一致性。这一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观察的一致性。为了让观察记录更加统一，观察者使用了一个观察指南。

> 对情境观察的记录原则上在观察结束后进行，大多数情况是以在便条、啤酒杯垫或香烟盒上所做的随手记录为基础。虽然说这样做存在着记录扭曲和不准确的危险，不过，却有助于实现将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最小化的目标。对于观察的说服力具有决定意义的做法首先是要避免——至少是要减少——资料收集中的反应性。（Niemann 1989，第79页）

避免反应性（Reaktivität），即避免观察活动对观察对象造成影响，决定着这里的资料收集工作。除了观察之外，研究者还对各个青少年进行了访谈。

Merkens（1989，第15页）对"非参与式实地观察"的策略作出了如下描述：

> 观察者在这里尽可能地努力让自己隐形，以避免干扰到观察场域中的人。他对所观察对象的解释乃是基于他自己的视野；（……）观察者为自己建构意义，并且认为，这些意义就像他所感知的那样引导着行动者的行动。

非参与式观察虽然避免了资料收集工作的影响，不过，因为在对资料进行解释时必须从外部的视角来观察所研究的场域，因而不得不在解释数据方面容忍这一视角的根本性窄化。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为了提高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资料的效力，人们建议将观察法和其他的资料来源进行多元结合以及结合使用不同的观察者。在这里，性别差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当研究者要在公共场所进行观察时，因为女性与男性相比面临着一些特定的危险，所以，她们进入观察场域以及在此间活动的可能性都受到更多的限制。不过，在另一方面，女性对于此类限制与危险的感知要比男性更为敏感，这也使得其与男性观察者相比，能够观察和注意到一些不同的事物。这个问题反映出"实地工作中的性别特征"（参见 Lofland，这里转引自 Adler/Adler 1998，第 95 页）。因此，人们建议在观察研究中使用混合性别的研究者团队。观察法所提供的另一启发是，研究者在进入实地时、在观察的过程中以及在回顾观察过程时，进行准确地自我观察，以便可以将隐含性的印象、看似不重要的事情和感知纳入对过程和结果的反思中。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观察法的理论基础是从外部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现实的生成。其目标是（至少通常是）就特定现象的出现和分布情况来检验相关的理论观念（参见第 8 章）。研究问题是旨在对特定生活世界的状态进行描述（例如，居住在柏林的青少年）。对情境和人的抽样系统地按照代表性和随机性的标准进行（参见第 11 章）。对资料的分析是以对特定行动出现频率的计数为基础的，并为此应用分类的方法程序（参见第 23 章）。

方法的局限性

总地来说，非参与式观察法是以一种从外部视角来对场域进行观察的方法。因此，这一方法主要适用于对公共场所的观察，在这里，参与者的数量是不能被限制的。此外，这种方法试着去观察事情的自然进展。不过，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这一目标要求，还是有疑问的，因为观察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对被观察对象产生影响。有时候人们会以不影响所观察的场域为理由来进行隐蔽式观察，不过，这种做法在研究伦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此外，由于研究者放弃了与观察场域的互动，完全放弃了去了解所观察场域和人们的内部视角，因此，在分析资料和检验诠释时会遇到很多问题。这种方法策略更多地受到定量研究以及标准化研究方法观的影响。

参与式观察

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的更为普遍的是参与式观察（Teilnehmende Beobachtung）（参见 Lüders 2000a）。Denzin（1989b，第 157-158 页）对参与式观察做出了如下定

义:“参与式观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同时结合了文档分析、访谈受访者与信息提供者、直接参与和观察以及进行自我省察的实地策略。”参与式观察的主要特征在于研究者完全进入观察场域,以内部成员的视角进行观察,并且研究者的参与也会影响到所观察的对象。Jorgensen(1989,第13-14页)指出的参与式观察的以下七个特征可以说明它与刚才介绍的非参与式观察及其目标的区别:

1. 特别重视从处在特殊情境与场景中的局内人或参与者的视角来考察人们的意义与互动。
2. 以探定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场景作为探究和方法的基础。
3. 一种强调对人类存在进行诠释与理解的理论和理论发展的形式。
4. 研究的逻辑和过程是开放的、灵活的、机会主义的,并且要求以在人类存在的具体场景中所收集到的事实为基础,不断地重新定义问题所在。
5. 一种深度的、质性的、个案研究的方法与设计。
6. 观察者扮演一种或多种参与者的角色,包括与观察场域中的本地人建立并维持关系。
7. 结合使用直接观察与其他收集信息的方法。

当资料收集仅仅依靠与被观察者的沟通时,开放性是必不可少的。参与式观察法常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相关概述请参见 Girtler 1995)。

观察的阶段

参与式观察从两个方面来看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过程。一方面,研究者应该逐渐成为一名参与者,进入观察场域并与其成员接触(参见以下论述)。另一方面,观察也应该经过一个逐渐具体化的过程,逐渐聚焦于对研究问题而言重要的那些方面。Spradley (1980,第34页)区分了参与式观察的三个阶段:

1. “描述性观察”(deskriptive Beobachtung)有助于在初始阶段为研究者在研究场域中提供一个导向,它提供的是一般的、非特定的描述。描述性观察被用来尽可能全面地把握观察场域的复杂性,并在此发展出更加具体的研究问题和“观察方向”。
2. “聚焦性观察”(fokussierte Beobachtung)逐渐地将观察焦点集中于那些对研究问题而言十分重要的过程和问题之上。
3. “选择性观察”(selektive Beobachtung)被用在资料收集的末尾阶段,旨在为第二阶段所发现的各种类型的行为方式或过程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和例子。

在这里,观察者有时会使用具有不同结构化水平的观察表和观察方案。不过,更为常见的做法是,观察者制作尽可能详细的对观察情境的纪录(参见第22章),以获得对观察场域的“深度描述”(Geertz 1983b)。至于观察者应该首先选用实地纪录呢,还是应该首先选用结构化的观察表(这种观察表会对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录下来的行为和情境特征作出具体的规定),一方面取决于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取决于在研究过程的哪个阶段进行观察。观察表所规定的观察内容越

是详细，在观察中所顾及到的内容也就越广泛，不过，同时出现以下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即，那些规定之外的内容既没有被感知到，也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描述性观察应该尽可能放弃使用过于结构化的观察表，以避免观察者的注意力及其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受到过多的限制。不过，对于选择性观察而言，结构化的观察表则是有益的，它有助于切实地、全面地理解在之前的观察阶段中所发现的重要的问题向度。不过，在每个阶段中，观察者都会遇到观察视角有限的问题，因为观察者不能同时抓住（并记录）某一观察情境的所有方面。Bergmann（1985，第 308 页）就此指出："对于一个现实社会事件中的那些杂乱的细节而言，我们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回忆能力和复述能力。因此，参与观察者常常别无选择，而只能以典型化的、概要的及再现的方式去记录他们所观察的那些社会事件。"

观察者在此再度面临着选择使用公开式观察（被观察者知道其正在被观察）或隐蔽式观察的问题，而这与其说是一个方法问题，倒不如说是一种研究伦理上的问题。

案例　白衣男孩

Becker 等人（1961）对以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即，一所国立高校的医学院"除了传授专业知识之外，还会对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的假设是，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所形成的有关医学和医疗实践的观念已经与他们刚开始其学业时有所不同。（……）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了哪些价值取向"（Becker/Geer 1979，第 141 页）。为此目的，我们在课堂、实习地点、宿舍以及医院的各个部门进行了为期一至两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有些时候观察会持续整整一天。研究者还检验了观察所发现的取向在多大程度上为整个群体所共享，即这些取向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整个被调查的群体，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仅仅适用于个别成员。

实施的问题

如何界定或选择那些所要研究的现象真会"显现"于其间的社会情境，构成了方法实施中的一个问题。根据 Spradley（1980，第 78 页）的分析，为了达到观察的目的，人们通常可以按照以下九个维度来描述社会情境：

1. 空间：一个或多个自然的地点。
2. 行为者：参与的人。
3. 活动：人们所实施的一系列相关的行为。
4. 客体：存在着的自然事物。
5. 行动：人们所实施的各个行动。
6. 事件：人们所实施的一系列相关的活动。
7. 时间：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8. 目标：人们要努力去实现的事情。
9. 感受：感受到和表达出来的情感。

比如说,如果研究者没有可能在一个机构中进行全天的观察,那么,他就面临着选择的问题。研究者如何找出那些所要研究的行为者及行为可能会出现于其间的情境?在另一方面,研究者如何从日常事件的范围内选出尽可能彼此不同的情境,以便于提高实际所要观察的内容的变化幅度?

实施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如何进入观察场域或所要研究的亚文化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有时需要依靠**关键人物**(Schlüsselpersonen)的帮助,他们可以将研究者引入观察场域,帮助他建立联系。不过,要找到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常常是比较困难的。此外,研究者也不可以过于依赖关键人物,而是应当注意反思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关键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以下的事实,即关键人物可能只是帮助研究者进入了所要观察场域中的一个特定的部分。最后,如果关键人物自己在所要观察的场域中是边缘者的话,他甚至还可能会令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或接近其中的特定人员变得更为困难。[①]

入境随俗

相对于其他的质性研究方法而言,参与式观察更加强调尽可能地"获得内部视角"来观察研究场域,同时也更加强调"将陌生人的身份系统化"(Flick 1995b,第154-155页)。唯有这种陌生人的身份才可以帮助研究者从研究场域中的那些司空见惯的日常惯例中发现独特之处。"入境随俗"(Going native)是指研究者失去了这种批判性的外部视角并且毫不置疑地接受了研究场域中人们所共享的观点。不过,人们并不只是将"入境随俗"的过程当作是观察者的一个错误来加以讨论,而是同时也将这一过程用作一种工具,通过它来反思研究者自己熟悉研究场域的过程,并由此获得对研究场域的深入洞察;假如研究者与观察场域始终保持距离的话,是无法作到这些的。尽管如此,研究的目标在这里并不局限于只是想要熟悉研究场域的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做到这一点对于一项成功的参与已然足够,但是对于系统性的观察还是不够的。研究者若想让自己对研究场域中关联性的理解超越日常理解的水平,就必须保持一种"专业的陌生人"的距离(参见 Agar 1980)。因此,Koepping(1987,第28页)针对参与式观察强调指出:研究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必须具备 Simmel 针对陌生人提出的那些特征:他必须能够辩证地将两种功能融合于一身,一方面完全投入,另一方面保持距离"。研究者在这里所要实现的目的,正是"在观察中参与这一概念所表述的内容,其任务正在于从他人的角度去理解。通过参与,研究者在方法上证实了他的理论

---

① 研究者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的关键人物愿意扮演这一角色。Friedrichs/Lüdtke(1973,第38页)指出了那些成为参与式观察中的关键人物的个体的社会地位特征。大多数关键人物在所在群体或场域中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如边缘者、新人、失意者、需要关爱的人及下级职员)。虽然说,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关键人物帮助研究者进入观察场域的唯一动机在于获取社会认可。但是研究者应该考虑到关键人物的动机及其角色对于自己进入研究场域和进行观察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者的反思内容不仅包括**通过**关键人物所进行的观察,而且还包括对关键人物**本身**的观察。

假设。此外,他还将研究的主体,即他人,当作是对话伙伴,而非研究客体”(Koepping 1987,第 28 页)。

案例　在特护病房的参与式观察

在实施参与式观察之前,Sprenger(1989,第 35-36 页)首先参加了一个“特护医疗的基础课程”的学习,以熟悉这一领域中的专业术语(如疾病症状、治疗方案等)。研究者在资料收集时使用了观察提纲。这些观察提纲是分别针对各种不同的、有待分析的场景(例如,医生的巡房、病人家属的探望等)而专门设计的。在收集资料期间,研究者每个星期都会和一个“专业的咨询团体”(医生、护士)进行交流。这种“对观察角度的系统变化”——“以医生为中心、以护士为中心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察(……)以及以场景为导向的观察(如医生巡房、清洗、安放导管等)”(第 36 页)——有助于拓展研究者用来观察所研究场域的视角。在这里,研究者在选择合适的观察地点和“正确的”观察时间时也会遇到一些特定的问题,正如一份对以下“场景”的纪录所表明的那样:“病房里的人们相当忙碌,总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处理。我被护士 I 的匆忙的活动成功地给侵占住了(没有时间坐在‘护士桌’那里)。轮班时间结束后,我在离开病房时方才意识到,我今天是一个准实习生。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我进入病房的时间。我在事后觉得,在轮班的中间‘闯进’病房不是十分有成效的。参加换班,在轮班开始时就在现场无论是对于我们而言还是对于护士及护理人员而言都有助于互相适应对方。今天,我根本没有找到时间,在安静的状态下安排自己的行动。而且我也没有经过一个将自己置身于或融入情境的阶段。而假如有这么一个阶段的话,我可能会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我就这样意外地陷入了由琐碎的不得不完成的事情所构成的齿轮之中,而且我还没有来得及摆脱这种状况,我的工作时间就已经结束了。”(第 46 页)

在这个场景之中,有两方面的内容富有启发意义。对于观察时机或者观察片段起始点的选择在根本上决定着可以观察到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观察。此外,这个案例表明,尤其是在非常忙乱的情境之下,观察者被事件所“淹没”导致她在功能上被用作“准实习生”来处理事务。这种“对行动过程的参与”有可能会对观察造成妨碍。为此,Sprenger 提出了补救的建议:

>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被观察场域中的事件所淹没的问题都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这个问题可以有效地得到控制。除了在观察记录中已经提到的选择最佳的观察起始点之外,设定观察目标以及在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被穷尽时有意识地离开观察场域,均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控制策略。当然,这要求研究者知道自身的能力界限。(1989,第 47 页)

这一案例表明,对观察的调控和规划以及对自身条件的反思既可以减小上述研究者被观察场域“吞没”的危险,也可以减小前面谈到的“入境随俗”以及不经反思地接受场域内部观点的危险。

在 Gold(1958)提出的观察者角色类型中,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这一角色最适合参与式观察法。随着观察者逐渐地深入研究场域,他常常会经历到文化上的冲击(参见 Denzin 1989b,第 164-165 页)。这种现象在对陌生文化的民族志实地研究中尤为明显。不过,在观察亚文化时,以及在观察陌生群体或极端的情境(如以上介绍的特护病房)时,这种文化冲击的现象也会出现:那些以往熟悉的不言而喻的事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其常态性,观察者所面对的价值观和

不言而喻的事情都变得陌生,在刚开始时,这一切在观察者看来显得有些难以理解。不过,他又不得不去接受这一切,以便能够理解它们及其意义。特别是在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在观察场域中的活动没有被仅仅认为是一种干扰,而是同时也被视为是一种额外的认知来源:

> 幸运的是,如果人们能够合理地分析由观察者的存在及其活动所带来的所谓的"干扰",那么它们将成为科学的行为研究的基石,而不是 ——像人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最好赶快掩饰掉的糟糕的事情。(Devereux 1967,第 29 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总地来说,参与式观察表明了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要逐渐深入地参与研究场域的活动,只有这样方能获得理解;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距离,只有这样理解才是科学的和可检验的。此外,参与式观察法最为贴近质性研究作为过程的观念,因为它与往往仅是一次性的访谈有所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更长时间地呆在研究场域中与被研究的人和情境进行接触。与访谈法相比,参与式观察法更易使用类似于理论抽样的策略(参见第 11 章):如果研究者发现,出于完善资料和发展理论的目的还需要去研究一个特定维度、一个特定的群体以及一些具体的行为方式,等等,那么他就可以在下一个观察阶段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这些方面。而对于访谈法而言,研究者约受访者进行第二次访谈是比较不常见的做法,如果他要这么做,需要为此做出详尽的解释。此外,参与式观察最便于研究者前后一贯地与观察场域及研究对象进行互动。同时,通过与其他方法的结合使用,参与式观察法的方法程序可以很好地针对研究对象进行调适。因此说,方法上的灵活性和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是参与式观察法的两大优势。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参与式观察的理论背景首先是当前版本的符号互动主义(参见第 6 章)。因为研究的目的旨在发展有关研究对象的理论(参见第 8 章),所以,如何进入研究场域的问题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问题(参见第 10 章)。研究问题(参见第 9 章)关注的是对研究场域及研究场域中的行为方式的描述。通常来说,参与式观察应用的是逐步抽样的策略(参见第 11 章)。在诠释资料时,既会使用编码策略,也会进行顺序分析(参见第 23 和 24 章)。

方法的局限性

参与式观察的问题之一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在情境中被观察到。个人传记性发展历程显然是难以被观察的,广泛而全面的知识过程(Wissensprozesse)也是难以被观察的。那些很少出现的行为方式或事件虽然对于研究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研究者要想观察到它们,只能依靠运气或者(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非常细心地选取观察情境。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研究者经常会额外地再对参与者进行访谈,通过访谈来再现其传记历程或知识储备。这些传记历程和知识

储备均是当前所观察到的行为方式的背景。因此,在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的认知只有一小部分是基于对活动的观察。大部分的认知则是基于参与者对特定关联性及事实情况的口头陈述。为了能够利用参与式观察法相对于访谈法的优势,并且判断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种优势,Becker/Geer(1979,第162页)提出了表17.1所呈现的格式来对资料进行归类。

表17.1 观察的可靠性(资料来源:Becker/Geer 1979,第162页)

		自发的	受观察者引导的	总 计
陈 述	仅对观察者的陈述			
	与其他群体成员的日常沟通			
行 动	个人的行动			
	群体的行动			
合 计				

Becker/Geer所关注的问题是,研究者所观察到的行为方式或态度有多大的可能普遍适用于整个被研究的群体,抑或仅仅只是适用于个别的成员或情境。他们认为,通过分析在群体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而得出的态度,最有可能是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态度。否则的话,这些行为会相应地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更正或批评。与仅对观察者一个人所做的陈述相比,在群体之中所做的陈述更有可能反映出群体成员所共享的态度。与受观察者引导(如有针对性地提问)而做出的行为和陈述相比,自发的行为和陈述显得更为可靠一些。在这里,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如果没有研究者的观察和参与,那么,所观察到的行为和被观察者在这里的陈述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自发出现。

参与式观察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于上面提到的、由灵活性和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这两个关键词所概括的这一方法的优势。参与式观察很难超越作为一般性研究策略的水平而成为一种标准化和正式化的方法,而且将此当作方法上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也没有太大的意义(Lüders 2000a)。与此相应地,相关的方法讨论在近些年中陷入了停滞状态。那些在教科书中将参与式观察法正式化的尝试主要是以1970年代早期的讨论为基础,或者是出自有关观察法的工作坊的报告(如Aster et al. 1989)。

民族志

在当前的方法讨论中,参与式观察法逐渐地退居幕后,民族志(Ethnographie)作为一种更普遍的研究策略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它将观察和参与同其他的方法结合起来:

民族志研究者在较长的时间里或公开或隐蔽地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他观察着发生的事

情,倾听着人们所说的话,并提出问题;事实上,他努力收集一切可收集到的资料,以便于阐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Hammersley/Atkinson 1995,第1页)

从德语国家的研究文献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民族志方法和研究的兴趣正在增长。人们对民族志这一研究策略作出了如下描述:

> "民族志"这个概念让我们联想到一种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文化主义(Kulturalismus)。**在理论上**,民族志旨在突出强调一个由经历过的和实践性的社会性(Sozialität)所组成的现象领域。这一现象领域中的"个体"(情境、场景、社会生活圈,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介于**传记研究**中的个人(及其所体验的社会性)和**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国家的)人口这两者之间。**在方法上**,民族志通过运用陌生和熟悉之间的主导性差异确立了一种方法,其特征正在于它与未知的那种进攻性关系(jenes offensive Verhältnis zum Nichtwissen)。我们也将此称作发现未知的启发学。(Amann/Hirschauer 1997,第11页)

民族志研究的特点

与在观察场域——或者更普遍地说——在研究场域中贯彻一种普遍的研究态度相比,具体地提出和定义方法论原则和方法步骤是次要的。Atkinson/Hammersley(1998,第110-111页)指出了民族志研究的各种本质性特点(参见提示框17.1)。

提示框17.1 民族志研究的特点

- 极为强调探明特定社会现象的特质,而不是去验证有关这一现象的假设。
- 倾向于运用"非结构化的"资料。所谓"非结构化的"资料是指,这些资料在收集资料的期间尚没有被研究者按照一组固定的分析范畴加以编码。
- 详尽地研究少量的案例,有时只是研究一个案例。
- 对资料的分析包括对人类行为的意义与功能的明确诠释,其结果主要表现为口头上的描述与解释,量化方法与统计分析在此至多扮演一种次要的角色。

出处: Atkinson/Hammersley(1998,第110-111页)

在民族志研究中,资料的收集自始至终地服从于研究问题和具体场域之中的事实情况的要求(Amann/Hirschauer 1997,第19-21页)。方法在这里服从于实践的要求(有关这一情境中的方法多样性请参见Hitzler/Honer 1995)。在Lüders(1995,第320-321页)看来,在民族志这里,"第一,(……)研究过程中的风险和不能规划的、情境化的、偶然的和个别性的因素构成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第二,研究者在各个情境之中的富有艺术性的行动变得十分重要。(……)第三,民族志正在发展成一种包括所有可以想到的且符合伦理的资料收集手段的研究策略。"民族志放弃了像其他研究方法那样就被研究内容的重要性提出预先规定,也因此放弃了为研究者的行动提供明确导向,而是让研究者以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态度在所研究的生活世界中找到路径。有关民族志的方法讨论较少关注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如何呈现和介绍从研究场域中获得的

认知(参见第30章)。不过,在研究场域中应用的方法策略主要还是在广泛参与事件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如果研究者认为访谈和文档分析可以带来额外的认识,那么,它们也会被融入这种参与式的研究设计之中。在他们有关民族志的概述中,Atkinson et al. (2001,第2页)指出:

> 当前的民族志研究具有碎片化和多样化的特征。就用于民族志工作的方法、视角和理论论证来看,无疑存在着一种狂欢节式的过剩现象。人们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研究、分析和呈现结果的方法。

与参与式观察在开始时的情况类似,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是从人类学被引入到其他学科中的不同研究领域的,如社会学或教育学。民族志在开始时被用来研究人们所不熟悉的地处偏远的文化。而当前的民族志研究则开始研究"家门口"的现象,旨在揭示那些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现象中的独特之处。例如,Hitzler和Honer在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民族志研究中研究了家庭修理工、国会议员和健美运动员的不同的"小世界"(参见Hitzler/Honer 1995;Honer 2000;Hitzler/Eberle 2000)。Hitzler/Honer(1995,第384页)指出了其研究的如下特点:"这一研究在方法上的重点在于文档分析以及观察式参与(beobachtende Teilnahme)。作为补充,我们也采用了提纲访谈,以达到生成叙述的目标。"在方法方面,当前的民族志研究的特点在于广泛地参与研究场域、灵活的研究策略、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及将重点置于撰写和展现在研究场域中获得的经验(Lüders 2000a)。Smith(2002)提出了一种被称作是"制度性民族志"的方法。在她的研究中,她首先感兴趣的并非是日常实践,而是日常实践是如何在作为个体日常行为背景的规则和普遍的联系中得以制度化的。她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它与女性主义理论和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她分析了母亲与其子女的活动。

案例 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健康行为

在一项有关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的研究中(参见Flick/Rohnsch 2006a,b),研究者选取了年龄在14~20岁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他们在外流浪的时间长短以及他们参与流浪青少年团体的程度将其划分为两组。无家可归状态的持续化程度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志。研究者在一个大城市的不同地点对这些青少年进行了观察。当研究者在参与式观察中发现一个青少年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属于是某一个团体的成员时,就会请求他接受采访,谈谈他有关健康问题以及与医疗体制中的机构打交道的体验。在访谈中,研究者也问及他们自己对健康的理解。研究者请受访者讲述他们是如何变成无家可归者的。在这一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以更加全面地获得有关参与者生活情况的景象。

这一案例表明了研究者如何使用民族志这种开放性的策略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健康观念及健康行为)。这里使用的不同方法分别用来分析研究对象的不同层面,在这一案例中即(通过访谈来获得)知识和(通过观察来认识)行为。

实施的问题

研究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现象的哪些方面变得特别重要,需要

得到特别的关注。同时,研究方法也会自动地为研究者在研究场域中的行动提供导向。在民族志研究中,这两个功能都被置于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态度之后,研究者在这里需要带着这种普遍性的态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入所要研究的生活世界。在民族志研究中,以实用的方式使用各种类型的方法(和资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有些人(如 Kelle 2001)批评的那样,这种在当前的民族志研究中被视为是必要的方法上的灵活性意味着,研究者要想恰当地从事民族志研究,就必须要熟悉多种不同的方法或者甚至必须是使用这些方法的专家。而这对于刚刚进入实证研究领域的新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过高要求。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自 1980 年代以来,民族志得到了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和以下的两种情形有关:第一,人们在这一领域就如何呈现所观察到的内容的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Clifford/Marcus 1986;Berg/Fuchs 1993),这一讨论也影响到了质性研究的其他领域(参见第 30 章)。第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新近的有关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比如 Denzin/Lincoln 2000a/2005a 或 Lincoln/Guba 1985 和 Hammersley 1990,1992)在总体上受到了民族志研究策略的深刻影响。民族志的概念(和方法)有时也被用作整个质性研究的标志(例如 Denzin 1997)。民族志对人们将质性研究转变为一种后现代研究态度的尝试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这种研究态度与或多或少法则化地运用特定的方法是不同的。此外,发展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也已经重新发现了民族志研究(参见 Jessor, Colby/Shweder 1996),并在这一领域唤起了人们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新的兴趣。①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民族志以描述社会现实及其生成(参见第 6 章)的理论为出发点。研究目的在于发展理论(参见第 8 章)。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于对案例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参见第 9 章)。无论是以实证的方法还是从理论上来探索所研究的场域,进入研究场域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进入问题并不只是一个需要在技术上加以解决的问题(参见第 10 章)。在抽样策略上,民族志研究通常采用理论性抽样(参见第 11 章)或者依其为基础的抽样程序。对资料的诠释主要是采用顺序分析的方法(参见第 23、25 章)。近年来,人们发展出一些类似"网络民族志"(Virtuelle Ethnographie)的方法(参见第 20 章),将民族志方法用于分析网络空间中的互动。

方法的局限性

在有关民族志的讨论中,收集资料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次要的。

---

① 不过,人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还存在一些不同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民族志的立场。例如,Shweders(1996)在他提出的"真正的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案中批评了后现代民族志的"唯我论和表面性",主张以"测心术"(mind reading)的方案取而代之,该方案以对人们所使用的概念的分析为切入点。

人们关注更多的问题主要是参与研究场域的策略，对资料的诠释，以及对结果的呈现（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第30章）。人们虽然可以从积极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将其理解为民族志研究相对于研究对象的灵活性。不过，这里也潜藏着方法任意性的危险。正是那些具体使用的方法才将民族志变成了一种在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态度的框架指导下多元结合（Triangulation）（参见第29章）运用多种不同方法的策略。

要　点

-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将观察与不同的参与研究场域的形式结合起来。
- 在每一种结合方式中，方法上的严格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非参与式观察的特点是与研究场域保持距离以及恪守方法标准。
- 民族志代表着由各种结合方式所构成的波谱中的另一端，其特点是广泛地参与研究场域以及奉行方法上的实用主义，方法应该适应研究场域，而且，所有能够增加认知的方法都可以被使用。
-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参与式观察。不过，参与式观察仍是每一项民族志研究所用的核心方法。如何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方式实施民族志研究，以及如何避免一切形式的“入境随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所有以观察和参与为基础的研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练习 17.1

1. 请您从文献中找出一项民族志研究的例子并指出该研究使用了哪些方法。作者是如何组织他们对研究场域的参与的，以及他们在与研究场域的接触中是如何处理“接近”与“保持距离”这些问题的。
2. 请您前往大学中的一些公共场所（如图书馆或自主餐厅）并在那里开展一项参与式观察，观察的目的是为了查明这些场所中的人们（如大学生）相互之间融合与划分界限的机制和实践。是否可以在这里辨认出不同的群体？他们是如何相互接触，如何保持距离的，等等？请您将您的观察以实地记录的形式写下来（参见第22章）。在完成观察之后，请您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一下您在观察场域看到的内容以及哪些事情让您感到困惑。

拓展阅读

非参与式观察

Adler, P. A./Adler, P. (1998). Observation Techniques. In: N. Denzin/Y. S.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p. 79-110.

参与式观察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a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rgensen, D. L. (198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Rinehart & Winston.

民族志

Atkinson, P., Coffey, A., Delamont, S., Lofland, J., Lofland, L. (eds.) (2001).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Atkinson, P./Hammersley, M. (1998). Ethnograph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N. Denzin/ Y. S. Lincoln (eds.).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p. 110-136.

Hirschauer, S./Amann, K. (Hrsg.)(1997). Die Befremdung der eigenen Kultur. Zur ethnographischen Herausforderung soziologischer Empirie. Frankfurt: Suhrkamp.

Lüders, C. (2000a). Beobachten im Feld und Ethnograph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84-402.

18 视觉资料:照片、电影和录像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认识到使用视觉资料的潜力及局限。
- 知道如何将现有的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使用,以及您自己或者参与您研究的人如何制作资料照片。
- 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反思和影响社会现实建构的媒介的重要性。
- 判断将录像用作资料来源和生成资料的手段的潜力及其优势和局限。

照片作为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

二手观察——即出于研究的目的而使用视觉媒介——近来作为讨论话题和研究方法正处在上升之势。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将照片、电影和录像当作独立的资料形式和资料来源来加以使用(参见 Banks 2007; Becker 1986; Billmann-Mahecha 1990; Ehrenspeck/Schäffer 2003; Haper 2000a,b; Marotzki/Niesyto 2006)。[①]尤其是对照片的使用在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中已有长久的传统。人们在这里经常会提到 Bateson/Mead(1942)有关"巴厘人性格"的经典研究(有关这一研究的概述请参见 Wolff 1995)。

案例 Bateson/Mead 关于"巴厘人性格"的研究

在一项关于一个巴厘山村的研究中,Bateson 和 Mead 共收集了 25 000 张照片、2 000米长的电影胶带、油画、雕塑和儿童绘画。照片和影片作为资料和认知工具得到了研究者高度的重视:"比如说,研究者将冲洗好的影片放映给山村的居民观看,同时将他们对电影的反应拍摄下来。"(Wolff 1995,第 135 页)照片和影片在这里并没有被仅仅看成是现实的影像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展现

---

① 本章在这里暂不涉及如何使用录像机来记录谈话或访谈的问题(这部分内容请参见第 22 章)。

形式,其中包含着特定的理论假设。在这里,Bateson 和 Mead“也很清楚地知道,照片和电影——与雕塑和绘画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是现实的图像(Spiegelbilder der Wirklichkeit),而只是现实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分析,它们也是盲目的”(Wolff 1995,第 135 页)。在对研究结果的展示中,照片及在所谓的图像板(Bildertafeln)中对照片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图像板指的是一组组的照片和对照片的(文字)分析(有关图像板的例子可以参见 Wolff 1995,第 139 页)。研究者按照被认为是对巴厘岛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范畴对照片进行了分类(如“空间导向和水平”“学习”“身体融合和非融合”“儿童发展的阶段”)。“图片被一组一组地摆放在一起,有时它们可以让人们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个对象,而有时它们是按顺序进行排列的,可以表明一个社会事件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的。”(Harper 1998,第 132 页)

在这项研究中,视觉资料作为对所分析的文化与行为方式的补充记录被研究者使用,它们与文本形式的内容展现和诠释形成相互对照,拓宽了人们观察研究对象的视角。人们在这里已然考虑到视觉资料是在特定的理论背景之下生成的,同时,人们也是透过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感受和诠释它们的。

照相机作为收集资料的工具

近来,以照片和电影为中心的视觉社会学(visuelle Soziologie)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主题(例如 Denzin 1989b,第 210-233 页;Harper 2000b)。视觉社会学是由 Becker(1986)提出来的。在此期间,教育学也对图片和“图片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Marotzki/Stoetzer 2006)。在此之前,Mead(1963)概括总结了在社会研究中使用照相机的核心目的:它们既能详细地记录事实又能更加广泛和全面地展现生活风格与生活状况。它们能以图片形式传输和展现人工制品,就此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们能捕捉到那些对人的肉眼来说过快或过于复杂的事实或进程。照相机还可以进行非反应性的观察记录。最后,它们与观察相比较少具有筛选性。照片也可供他人用来进行再分析(参见 Wuggenig 1990)。

按照 Barthes(1981)的分析,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被分为四种类型(参见 Wuggening 1990):研究者(作为“展示者”)可以向被研究者(作为“观众”)展示照片,并就所展示材料向他提问(类型一)。“操作员”(照相者)可以请被研究对象当他的模特(类型二)。研究者(作为“观众”)可以请被研究对象(作为“展示者”)展示其有关某个特定主题或时期的照片(类型三)。最后,研究者(作为“观众”)可以观察被研究对象(作为“操作员”)的拍照,并分析他拍摄了哪些内容(类型四)。

一般来说,这里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信息记录于胶片,以及如何从胶片中获取信息”(Hall 1986,这里转引自 Denzin 1989b,第 210 页)。一种方法比如说是通过家庭相册中的照片来分析家庭历史或在这些相片中历年来记录下来的主题/人物(Subjekte)。同样地,在家庭研究或机构研究中,分析家庭或机构成员在照片中的自我展示以及他们悬挂在房间墙壁上的图画都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该社会场域内部的结构。

总地来说,人们在这一领域就不同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过讨论,主要围绕着以

下几个主题(参见 Denzin 1989b,第 213-214 页):

- 作为资料以及相关关系记录的照片受到理论上的先期假设的影响,这些假设决定着什么内容会被拍摄以及什么时候会被拍摄,还有哪些片断会被选择出来加以分析。
- 在对世界的感知与记录方面,照相机是不受人收买的(unbestechlich):它们不会遗忘,不知疲倦,不会犯错。不过,照片同样也是将其所展现的世界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形态。
- 照片讲述的是真相:然而,照片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拍摄者和观看者对其所做的诠释与归因(Zuschreibungen)的影响呢?
- 照片(和影片)打开了通向主体的符号世界及其观点的门。
- 照片只有是在正确的时刻被拍摄下来时(当感兴趣的行为正在发生时,当相关的人物进入照相机的拍摄视野时),它们作为资料才具有表现力。
- 不只是参与的观察者,还有摄影的观察者都必须在研究实地中找到并接受某种角色和身份。

在当前的数字化照片的时代,人们可以使用计算机对数字照片进行修改。因此,Denzin 以上提到的照片的真相含量和照相机不受人收买的特性显得更加不正确了。

Mietzner/Pilarczyk(2003)概括介绍了照片分析(Fotographieanalyse)的方法。在他们的介绍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以下问题寄予很多的关注,即照片的选择以及每幅照片的生成(时间、拍摄者,等等)。Marotzki/Stoetzer(2006,第 17-29 页)介绍了一个四阶段的图片诠释模型(ein vierstufiges Modell der Bildauslegung):首先,描述被展示的**对象**(Objekte);其次,描述**对象的次序**;再次,描述对象的**编导**(Inszenierung);最后,从教育理论的角度分析其**自我指涉和世界指涉**(Selbst-und Weltreferenzen)。

在访谈中使用照片

Dabbs(1982)介绍了另外一种运用照片这种媒介的方式。研究者向被研究者提供了一台照相机,并让他们自己去拍照或者是请别人为他们拍照,照片要能“说明他们是谁”(Dabbs 1982,第 55 页)。这种做法可以被扩展为一种照片式日记,人们在其中记录下自己日常生活的经历。在这里,并非是由研究者,而是由被研究者来选择什么可被拍摄下来。研究者可以根据被研究者选择和拍摄的内容来推断他们对其日常生活的看法。这一方法尤其适合用来比较处在同一研究场域之中的个体的不同观点,他们的观点体现在他们所拍摄的照片以及这些照片突出强调的特征。

Wuggening(1990,第 115-118 页)运用了一种类似的方法来研究生活空间中的意义。研究者请参加研究的人用照相机来记录他们的生活方式,用 12 张照片展现对与他们类似的人们而言比较典型的房间布置。为此目的,研究者向参加研究的人提供了一个说明性的指南(见提示框 18.1)。

提示框 18.1　照片访谈的指南

您最喜欢自己卧室和公寓(房子)中的哪些东西？您最不喜欢自己卧室和公寓(房子)中的哪些东西？请您首先在自己的房间中拍摄三处你最喜欢的主题(Motive),再拍摄三处您最不喜欢的主题。然后,请您到公寓里的其他房间,重复以上的工作。您选择哪一个房间都没有关系。你总共可拍摄12张照片。

出处:Wuggening(1990,第116页)

在“照片启发式访谈”(Foto-Elicitation-Interview)(Harper 2000a,第725页;Harper 2000b,第414-416页)中,来自受访者生活的照片被用来促发他们的叙述或回答——先从照片谈起,然后由此过渡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方法程序可以被视为是焦点访谈(参见第13章)的具体化。如果说图片资料在这里更多地是被用来支持访谈的开展,那么,下面案例中的照片则构成了独立的资料。

案例　分析军人照片

Haupert(1994)用客观注释学的方法(参见第24章)分析了军人照片,目的是再现军人的传记经历。在这里,研究者并没有按照研究目的自己拍摄照片,而是利用已有的照片,分析它们与照片拍摄时期的一般的相关性,再现个体的人生经历。在这一研究中,照片作为独立的文档具有独特的地位,对照片的分析可以和其他类型的资料(传记访谈)相互结合。照片分析在这里被明确地理解为一种文本分析的形式,并按照这一理解得到了分析(Haupert 1994,第285-286页)。这就意味着,照片在这里得到了分析,“虽然照片的文法(Grammatik)暂时尚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讲出意义恰当和文法正确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能够以模型的形式反映出照片的情境和背景框架,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符合程序的做法将社会研究意义上的照片的文本质量最终揭示出来。”(Haupert 1994,第286页)

正如Morris(1975)所指出的那样,照片具有高度的图像性,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回忆或者促发和鼓励他们去“讲述复杂的过程或情境”(Collier 1957,第59页)。

实施的问题

Denzin(1989b,第214-215页)引用了Gold所提出的观察者角色类型(参见第17章)来描述负责照相的观察者在寻找合适的角色时遇到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媒介的影响。如果摄影师在拍照时花费过大的精力来人为地布景(安排好的照片)或者被拍摄对象出于拍照的目的而自己摆好姿势(自我表现性照片),那么,这样拍摄的照片的表现力便有所减弱。如果摄影的研究者可以成功地融入研究场域,将自己及其照相机所引起的注意降到最低的程度,那么,这样拍摄的照片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所研究的日常生活的信息。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影响照片表现的可能性。Denzin指出,剪辑与修饰或者

拍摄人为的富有艺术性的照片的做法，都可能导致那些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细节被忽视。此外，不同形式的审查（Zensur）（包括官方机构、被拍摄的对象或摄影师方面的审查）也可能会限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的照片的生成及其可信度（Denzin 1989b，第 220 页）。Becker 以摄影师对图像的最终控制为题讨论了这一问题："对胶带、冲洗方式和相纸的选择，对镜头和相机的选择，对曝光度和取景的选择，对拍摄时机和与拍摄对象的关系的选择——所有这些因素都处在摄影师的控制之下，这些因素决定了最终的作品。（……）摄影师对图像所施加的第二种影响在于他有关所观察内容的理论和对所研究内容的理解。"（Becker 1986，第 241-242 页）此外，Becker 还提出了下述问题，即："照片说的是真相吗？"，并试着指出回答这个问题的路径，即：讨论和分析抽样的问题及由拍摄行为引发的反应性问题。另外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取景的问题（图片中有什么，什么看的清晰，什么被省略？）以及摄影师个人的审美情趣对照片内容的影响问题。

总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所研究现实的样本（即包含在照片中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现实的展现，照片这种媒介物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对所研究现实的建构。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使用照片进行研究的理论背景是客观注释学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模型（参见第 6 章）。研究问题聚焦于描述照片中所包含的现实的方方面面（参见第 9 章）。对材料的选择是逐步进行的（参见第 11 章）。对资料的诠释采用的是顺序分析的方法（参见第 25 章）。大多数情况下，对视觉材料的分析会和其他的方法和资料进行多元结合（参见第 29 章）。

方法的局限性

此类开展图像注释学的努力（例如，Englisch 1991；Müller-Doohm 1993）旨在将实证社会研究的资料扩展至视觉领域。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是将熟悉的诠释口述资料的程序用来诠释视觉资料。在这里，这些视觉资料被当做文本来处理：照片讲述的是一个故事，视觉资料在得到分析之前通过转录、内容说明或描述的方式被转换为文本的形式，以便于将文本分析程序应用于对图像资料的分析。专门以及直接用来分析图像的方法程序尚有待发展。

电影分析作为研究工具

电视和电影中的图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与此相应地，以下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电影和电视可以向我们提供哪些有关社会现实建构的信息。Denzin（1989b）分析了好莱坞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包括：有关社会经验（如酗酒、腐败等）的社会反思，有关历史上关键时刻（例如，越南战争）的社

会反思,有关特定机构(如医院)的社会反思,社会价值观念(如婚姻和家庭)和关系,日常领域或情感。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意义层面上来诠释这些电影及其中展现的行为方式。Denzin 区分了"现实主义解读方式"和"颠覆性的解读方式"(2000b, 第 424 页)。现实主义解读方式(realistische Lesarten)将电影理解为对某一现象的真实描述,其意义可以通过对图像的内容及其形式上的特征进行细节性的分析而被(完全地)揭示出来。诠释在这里服务于证实电影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这一观点。与此不同的是,颠覆性的解读方式(subversive Lesarten)考虑到了作者对现实的看法会影响到电影,诠释者对现实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对电影的诠释。因此,人们放弃认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和全面的对电影资料的分析,而是认为可以对这些资料进行不同的诠释。人们可以分析和比较不同的诠释者所做的诠释,考察其中所包含着的对现实的建构(参见第 7 章)。

实施电影分析的步骤

Denzin(参见 2000b,第 427 页)提出了电影分析的四个步骤:

1. 将电影当做一个整体来观看,并将值得注意的印象、问题和意义模式记录下来。
2. 提出通过电影分析需要解答的研究问题。为此,要将电影的关键场景记录下来。
3. 对单个的场景和片段进行"结构化的微观分析"(strukturierte Mikroanalysen),分析应该生成详尽的描述以及指出在所分析的电影片段中存在哪些表现方式(如对冲突的表现方式)上的模式。
4. 这种对模式的寻找被应用于整部电影,以回答研究问题。对比分析采用现实主义解读方式和颠覆式解读方式对电影的诠释,撰写最终的诠释。

这一分析程序已被用来分析不同的电影(参见 Alznauer, Lang/Flick 2000)。

案例　好莱坞电影中的酗酒

Denzin(1989c)以电影《温柔的怜悯》(Tender Mercies)为例,分析了好莱坞电影如何表现和处理"酗酒"问题与"酗酒者家庭"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文化表现是如何形塑体验过的感受的"(第 37 页)。为此,Denzin 首先从影评和电影词典中找出了对该部电影的"现实主义诠释",并分析了其中的"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意义"(1989c,第 40 页)。这一研究的背景假设是,在对电影和社会问题(如酗酒)的诠释中,通常包含着一种"父权式的扭曲"(patriarchalische Verzerrung),因为它们通常是从男性的立场被提出来的(1989c,第 38 页)。Denzin 将他自己对电影及这一问题的"颠覆式解读方式"与以上的解读方式进行了对比,他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在这里,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从男主角和他的酒瘾转向了他生活中的女性以及男主角的酗酒问题给这些女性和他的家庭造成的影响(1989c,第 46 页)。从这一视角的变化当中,研究者引导出对由酗酒问题所触及的文化价值观(如家庭、两性关系和在社会中对情绪的控制)的分析(Denzin 1989c,第 49 页)。最后,研究者将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出来的解读与不同观众对电影的诠释进行了对比,依此来检验自己所做的解读。同时,研究者也分析了观众的诠释与他们对所提及问题的主观体验之间的相互关系(Den-

zin 1989c,第 40 页)。

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诠释和分析电影,视角决定着诠释的焦点及其结论。Denzin 想要说明的是,这个结论不仅对于电影评论者的分析而言是正确的(对他们来说这些可能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的分析同样也是正确的。至于 Denzin 所采用的女性主义视角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恰当的见解这个问题,Denzin 既不能也不愿意作出回答,因为 Denzin 自己强调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诠释。

实施的问题

使用电影作为分析资料同样面临着抽样的问题(哪些影片、哪些场景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诠释的问题(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材料中的哪些内容?)。此外,研究者还会遇到以下的问题,即如何整理资料以便为诠释做好准备:是直接对视觉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和诠释呢,还是应当首先将对话及其背景转录下来,将视觉资料转化为文本呢(参见 Denzin 1989b,第 220-221 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通过将电影和照片用作质性研究的资料,研究者可以超越不同方法的局限性:与访谈相比,它们的优势正在于可以将事件和实践的非言语性的部分记录下来。而在访谈这里,人们最多可能只是在情境记录报告中提到这些非言语性部分。相对于传统的观察法而言,视觉资料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被重复观看:被观察的情况在观察结束之后就永远消失了,而电影资料却可以得到不受限制的重复观看和分析。这样便可以超越观察法在感知和记录方面的局限性(Bergmann 1985)。最后,Petermann(1995)介绍了科学性的纪录片以及在此类影片中电影表现和现实二者之间的关系。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使用影视资料的理论背景是 Denzin 提出的诠释性互动论(der interpretative Interaktionismus)(参见第 6 章)。研究问题关注的是对影片所包含的现实部分的描述(参见第 9 章)。为此,在取样方面会逐步地选取一些具体例子(参见第 11 章)。对资料的诠释经常采用顺序分析的程序(参见第 25 章)。

方法的局限性

电影也只是建构出现实的一个特定的版本。这一现实的特定版本一方面受到所选择的内容片段和角度或者所选择的拍摄时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电影资料的观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电影分析很少被人们当做独立的研究策略来使用,而是作为以收集口述资料为目的的那些方法的补充或作为这些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没有发展出直接用来分析视觉资料的分析程序。电影被视为是视觉文本(Denzin 1989b,第 228 页),通

过转录或者复述电影中的故事这种方式，电影被转换成文本，并最终以文本的形式得到分析。

在质性研究中使用录像

另一种使用视觉资料的方法是对一个特定的生活世界的某些方面或片断进行录像，它超越了对单个的照片或一系列静止照片的使用。用录像将特殊的经历和事件（如假日或家庭庆祝）记录下来，已经成为一种我们熟悉的日常技术。人们在许多需要定期监控的公共场所如地铁站和体育场都安装了录像装置。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质性研究中使用录像（参见 Banks 2007；Knoblauuch，Schnettler，Raab/Soeffner 2006a）。其中一种使用方式便是用录像机取代录音机将访谈或谈话中的互动拍摄下来（参见第 22 章）。录像自身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料类型。Knoblauch（2004，第 126 页）列举了录像研究中使用的不同的资料类型：

- 以科学的方式拍摄下来的自然的社会情境。
- 以科学的方式拍摄下来的实验情境。
- 访谈。
- 由社会行为者拍摄下来的自然的社会情境（监控、自拍）。
- 由社会行为者拍摄下来的人工设置的情境（录像日记）。
- 由社会行为者拍摄下来并经过处理的情境（婚礼录像）。
- 由社会行为者拍摄下来并经过专业处理的情境（婚礼录像、纪录片、自我展示）。

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些资料类型，是因为录像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录像资料，而且同时也关注所分析的资料本身是如何被生成的：什么内容被录了下来？哪些内容被从录像带中选择出来或者是被裁剪出去？哪些材料被选择出来用于分析某一专题？还有哪类材料是出于研究目的而被生成？

通过对以上这些资料类型的使用，Knoblauch（2004）发展出一种录像互动分析（Video-Interaktionsanalyse）的方法。他指出，这一方法具有以下三个特征：①条理性（Methodizität）是指诠释不仅关注“行动的内容，而且还有行动的方式”（Knoblauch 2004，第 132 页）。②行动的次序及有序性（Ordnung bzw. Geordnetheit der Handlungen）所关注的是生成和诠释所表现出的行为的正确方式。③自反性及表现性（Reflexivität bzw. Performativität）指的是，演员不只是在进行表演，而且还会对他们在表演中所做的事情进行反思。

Heath/Hindmarsh（2002）表示，对人们在自然情境下的活动的录像是他们研究的核心资料。不过，研究者为了制作录像还必须要完成一些传统的实地研究工作，比如说熟悉当地的情况。例如，如果研究者想要拍摄医生与患者的互动，那么，对于研究者而言，在拍摄前进行一些实地观察和谈话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判断和决定，录像机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最好的拍摄角度在哪

里，哪些互动的背景应该被包括进来，等等。

Knoblauch et al. (2006b)指出了质性录像分析所面临的四个核心问题：①在这里生成的资料具有复杂性，它们包含着多个层次的信息。这造成了在拍摄和分析时不可避免的筛选性，并且带来了什么构成分析单位的问题。②使用录像这种媒介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技术设备的发展和进步，对所拍摄事件的影响，使用设备的复杂性，购置设备的成本，等等）。③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澄清，这首先关系到如何转录视觉资料的问题（参见第22章）。④录像的法律后果：谁有权录像，他可以录什么，谁有权为了研究的目的来分析录像资料？在地铁站和十字路口等地点所进行的持续性录像监控的合法性并非是毫无争议的。使用这些录像资料来进行研究（参见 Heath/Luff 2006）会引发一系列研究伦理上的问题（比如，如何征求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参见第4章）。

此外，如何分析录像资料的问题尚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尽管人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的尝试。例如，有些研究者将 Soeffner(2000)提出的社会科学注释学等方法进一步发展成一种"录像—注释学"（Video-Hermeneutik）（Raab/Tänzler 2006）。还有人将 Bohnsack（1999）提出的文档方法（dokumentarische Methode）应用于录像资料的分析（Wagner-Willi 2006）。

质性录像分析既与录像资料的制作和分析有关，也可被用来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分析录像资料的方式（Heath/Luff 2006）：监控人员如何记录和评价监控录像中的信息并将其作为实施干预的基础？

案例　使用录像来研究处于日常情境中的儿童

在一项有关儿童自我中心主义和视角变化的研究中，Billman-Mahecha（1990）使用录像的方法在日常情境中收集资料。为了熟悉受访家庭，研究者在开始时对参加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参与式观察。之后，研究者返回到这些家庭中，将家庭在下午的活动以及儿童游戏的一些较长的情景录制下来。接下来研究者从录像材料中选出了一些合适的片段转录成文字，并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诠释。在此之后，研究者向儿童的母亲或者父母双方展示这些录像片段，并分别对他们进行以主题为中心的访谈。研究者对这些访谈同样进行了转录与分析。研究者在每一个案例的层面上都对这两种视角（研究者对录像片段的诠释和研究者对儿童父母访谈的诠释）进行了多元结合。随后，研究者在这两个层面（录像资料和访谈资料）上对录像片段进行了分析，以便由此对儿童在不同的录像片段和访谈陈述中的行为方式进行分类。

实施的问题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掩饰录像设备的存在，以避免录像机及拍摄装置主导社会情境。另外一个问题是录像机及拍摄焦点的筛选性问题：人们要么可以选择狭窄的拍摄焦点，这样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画面和细节，但却不能录下太多情境背景；要么人们可以选择广角全景式拍摄，将整个社会情境录下来，但是这样就无法捕捉参与者面部表情等细节。至于研究者在此应当如何选择或者如

何协调这两种做法，应该视研究问题而定。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录像的局限性。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决定录像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最后，从技术角度来看，研究者可以利用监控录像的资料开展研究。这些监控录像可以让研究者充分地了解在他感兴趣的地点所发生的活动。但是从研究伦理的角度来看，对于大量可供研究者使用的监控录像资料而言，不管是说它们被用于具体的研究，还是就这样被拍摄了下来，都没有征求到那些被拍摄者的同意。因此，在研究中使用此类资料是有问题的。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录像分析在不同的维度上拓展了其他研究方法的可能性：与录音相比，录像能够录下互动中的非语言部分。与访谈相比，录像能够录下活动产生以及进展，而不是像访谈那样只是从回顾的角度提供相关活动的陈述。作为对观察的补充，录像与参与式观察者在实地中所做的笔记相比能够捕捉到更多的方面和细节。通过录像，研究者可以重复观察转瞬即逝的情境。此外，其他方法的筛选性（Selektivität）可以通过录像分析得到降低。不过，因为录像在某一特定时刻记录与拍摄下来的内容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录像这种方法同时也生成了新形式的筛选性。这样一来，录像分析这一方法就再度证实了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具有筛选性和局限性这一普遍性问题。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正如“电视录像摄制”（Videographie）这一术语所表明的那样，录像分析常常是研究特定生活世界的民族志方法的一部分，例如“工作场所研究”（Workplace studies）（Knoblauch/Heath 2006）。与此类研究相关的理论兴趣旨在分析这种情境下的互动（作为互动主义的一个形式，参见第 6 章），以及理解社会现实在这些情境下以及在录像中和通过录像这种方式得到建构的方式。在抽样方面，会逐步地选取一些具体的例子（参见第 11 章）。通常来说，研究者会将录像分析与其他的方法和资料类型结合使用（多元结合——参见第 29 章）。研究者往往以常人方法论和会话分析为背景来诠释录像材料（参见第 6 章和第 24 章）。

方法的局限性

正如上述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录像分析很少作为独立的方法被人们所使用。研究者最好是将它与其他的方法如传统的实地研究、额外的访谈和不使用录像机的观察结合使用。虽然摄像机的技术发展一直在不断地进步，但尚没有做到让录像机（及其他技术）从研究者进行录制、记录、分析的情境中完全消失，即不再被人看到的地步。

照片、电影和录像已成为研究的对象。与此相应地，人们可以借助于对视觉资料的分析来回答特定的研究问题。同时，它们也已成为制作资料的媒介——比如用录像将社会情境或场景拍摄下来。研究者可以将作为资料和媒介的照

片、电影和录像纳入更广泛的研究策略之中,如与访谈相结合或者置于民族志研究的框架之中。由此来看,视觉资料的收集方法补充了口述资料的收集方法,让人们可以利用媒介资料开展更广泛的研究。

要 点

- 视觉方法和资料提供了在质性研究中记录社会情境与实践之视觉内容的新途径。
- 视觉资料可以是已有的资料,也可以是专为研究目的而生成的资料。
- 人们尚需要发展出合适的方法来分析通过本章介绍的各种方法所获得的视觉资料。

练习 18.1

1. 请您从文献中找出一项使用录像、照片或影片作为资料的研究。请您思考一下这些资料是如何生成的,研究者是将其当做独立的资料使用呢,还是与其他形式的资料一起结合使用,以及研究者是如何分析这些资料的。
2. 当您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时,请您思考一下您如何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视觉资料。视觉资料与您的研究问题的哪些部分有关,与哪些部分无关。

拓展阅读

照片分析

Becker, H. S. (1986). Doing Things Together: Selected Papers. Evans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arper, D. (2000b). Fotographien al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a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02-416.

电影分析

Denzin, N. K. (2000b). Reading Film.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16-429.

Ehrenspeck, Y./Schäffer, B. (Hrsg.)(2003). Film- und Fotoanalyse i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Ein Handbuch. Opladen: Leske&Budrich.

录像分析

Heath, C./Hindmarsh, J. (2002). Analysing Interaction: Video, Ethnography and Situated Conduct. In: T. May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London: SAGE, pp. 99-120.

Knoblauch, H., Schnettler, B., Raab, J./Soeffner, H-G (eds.)(2006a).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Frankfurt etc.: Peter Lang.

文档的使用 19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认识到在质性研究中使用文档的重要性。
- 理解有必要在文献产生和使用的场域情境中对其进行分析。
- 知道文档不仅仅是对过程与经历的一种简单呈现，同时也是建构有关这些过程的特定版本的交流媒介。

我们作为个人的生活以及作为某个社会的成员的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在持续不断地以档案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几乎所有的机构性行为（从出生到死亡）都会生成文档。出生证书和死亡证书以及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机构性档案都会生成资料。这些资料可以是为了机构的目的而在一般的层面上以统计数字的形式被生成的（今年结婚的人有多少？）。这些资料也可以是在个体的层面上被生成的（某个人是否已经结婚？在没有解除之前的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她现在能否结婚？等等）。同时，大多数人在其一生当中都会生成大量的文档，从日记到照片（婚礼照片或度假时的照片）再到信件（自己写的信和收到的别人写的信），不一而足。传记也属于此类与个人相关的文档。传记可以是一个人自己写的自传或者别人出于特定缘由撰写的关于这个人的传记。尽管所有这些文档都不是专为研究的目的而特意生成的，但是，这些文档和其中包含的信息却可以被用于研究的目的。这就是文档分析（Dokumentenanalyse）的领域。人们可以用定量的方式来分析文档——根据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特定地区的结婚统计资料来分析人们结婚的平均年龄或者对比分析移民结婚的比例与非移民结婚的比例。人们也可以用定性的方式分析文档——一个人的生活史是如何在不同机构的有关这个人的官方档案中被建构的？研究者既可以将文档分析法当做其他方法（如访谈法或民族志）的补充策略来使用，也可以将其当做独立的方法使用。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所依靠的便仅仅是在这些资料中记录下来的那部分现实。因为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照片的运用，所以，在这一章中笔者把重点放在

书面(文本)文档上。虽然文档分析使用的方法与访谈分析使用的方法是同样的方法,但是,文档分析却不仅仅是对特定文本的分析。

什么是文档

下面的定义说明了人们对“文档”的一般理解:

> 文本是**标准化的人工制品**,其典型的特点是以特定的格式呈现:如档案记录、案例报告、合同、草案、死亡证明、评论、日记、统计数据、年度报告、证书、裁判书、信件或者专家鉴定。(Wolff 2000a,第509页)

Prior(2003,第2页)给出了一个更具动态性的、更多以应用为导向的文档定义:

> 如果我们想要抓住文档的本质,我们就不能把这些文档当作稳定的、静止的和事先定义好的人工制品来思考,而是应该从行动的场域、框架和网络方面来思考它们。事实上,物品能否获得“文档”的地位,恰恰取决于这些物品融入行动场域的方式。人们只能从文档与这些场域的关系来定义文档。

当人们决定进行文献分析时,应该考虑到以下的区分:研究者可以分析专为研究目的而制作的文档,例如,请一群人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中写日记,然后分析和比较他们所写的日记。或者,研究者也可以在研究中使用已经存在的文档,例如,一群人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所写的日记。在非反应性研究的传统下,Webb 等人(1966)和 Lee(2000)区分了两类文档:一种是连续性的文档,通常是用于记录行政程序。另一种是事件式和私人性文档,它们不是持续性的,而只是出于特定的缘由才被生成。文档通常来说是以文本的形式(打印的形式)而供人使用,不过,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或者完全以电子文档的形式而存在(例如,在数据库中)。

Scott(1990,第14页)根据两个维度区分了12种文档类型。这两个维度是:作者(谁生成了这个文档?)以及查阅文档的方式。根据作者这一维度可以区分出个人文档和官方文档。而官方文档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私有文档和国家文档。我可以持有一份有关我出生的个人文档(例如,直接在出生之后拍摄的一张照片)。此外,我还有一份出生证明,这是一份私有文档和官方文档。我可以在户口登记时说我出生于柏林。这个户口登记就是一份官方文档,由国家出具、管理和使用。不同的文档也可以按照人们查阅它们的方式进行分类。Scott 在此区分了四种类型。第一,查阅文档的可能被排除。例如,家庭医生那里的患者病历通常来说不会提供给第三者观看。第二,查阅文档的方式受到限制。例如,法院卷宗往往仅对特定的职业群体开放,比如负责当前诉讼程序的律师。第三,查阅文档的方式是“档案馆公开查阅”。每个人都可以查阅相关的档案。但是,只能在特定的档案馆,特定的部门查阅,而不能将档案带走去别的地方阅读。第四,查阅文档的方式是“公开发表”。文档被公开发表,每个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到。作者和查阅文档的方式这两个维度可以在它们的每个下属形式下相互结合,由

此就可形成12种文档类型(详情请参见 Scott 1990,第14-18页)。

将文档用作资料:不只是文本分析

Scott 的分类对于研究者整理自己研究中所用到的文档以及评价其质量都是有帮助的。正如作为分类基础的这两个维度所表明的那样,文献并不是对事实或者现实的一种简单的反映。准确地说,文档总是由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出于某一特定的(实际的)目的而生成的,并且具有特定的使用方式(这也包括谁可以查阅这些文档)。当研究者决定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文档时,应该将这些文档当作是沟通的工具。研究者应该在这里提出以下的问题:谁制作了这个文档?是为谁制作的?制作文档的目的何在?个人或机构在制作、保管及保存文档方面有什么目的?因此,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将文档视为是可以"轻易"用于自己的研究和特定研究问题的资料。如果研究者出于研究的目的要使用文档,也应该始终将对文档的使用本身作为研究的主题加以探讨:文档的特点是什么?制作和使用文档的特殊的条件有哪些?等等。

选择文档

Scott 提出了四条标准来判断和评价文档的质量。研究者可以运用这四条标准来决定是否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某个特定的文档(或者某一系列文档)(Scott 1990,第6页):

1. 真实性:证据并非伪造且来源可靠吗?
2. 可靠性:证据没有错误和扭曲吗?
3. 代表性:证据是其同类事物的典型代表吗?如果不是,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不具有代表性吗?
4. 含义:证据清楚而明白吗?

第一条标准(**真实性**)与文档是原始文档或第二手文档这个问题有关,例如,文档是某一事故的原始报道呢,还是某个没有亲眼目睹事故的人对原始报道所作的一个总结呢?在这份总结中,哪些内容被略去或被误解了?第三手文档是帮助人们找到其他文献的信息来源,例如图书馆目录会列出一些特定的文献,人们可以将这些文献用作原始文档。人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检验文档的真实性:看看文档是否有内在的矛盾,将它与其他的文档进行比较,看看文档中有没有错误或者考证一下该文档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可靠性**与以下问题有关:文档的准确性,生成文档者的可信性以及文档是否没有错误。**代表性**在这里的意思是指,文档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典型性:该文档是一份典型的档案吗,是否包含着此类档案通常来说都会包含着的信息?不过,如果研究者知道某一特定

文档不具有典型性，也仍然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分析一下它对于自己研究的问题有何启示。文档的**含义**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文档对于作者的(计划之中的)含义；文档对于那些与文档有关的读者的含义；文档对于那个构成文档内容的人的社会含义。例如，记录员记下审判记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该审判是一个在形式上正确开展的审判。对于法官而言，审判记录构成了他做出判决的基础。对于被告而言，审判记录及其内容可能意味着他有了前科，这会给他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比如当他申请工作或申请贷款时，等等。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份审判记录表明，犯罪和罪责是如何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被建构和记录的。

构建一个文档集

如果研究者已经决定好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某一种特定形式的文档，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就是构建一个文档集(Korpus)。这一步涉及抽样问题：为了再现一个特定的事件，研究者应该从某一类型的所有文档中抽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呢，还是应该有目的地选取文档(见第11章)？这里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文档的互文性/交叉性(Intertextuality)：事实上，文档总是和其他的文档(有关同一个人，有关其以前生活事件的文档)相互关联，并且与有关类似事件的文档相互关联。例如，对于如何撰写诊断报告存在着特定的标准与惯例，这些标准和惯例都是建立在有关这种疾病和其他病例的普遍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应地，在记录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上，所有的文档都与其他的文档有关。当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这些资料时，应该考虑到这种关联性。

案例　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

Thomas/Znaniecki(1918—1920)的研究是最早使用文档分析的研究之一。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分析既有的文档对移民经历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是将移民作为一个宏观社会问题来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既有的文档被称作是“偶然性记录”(undesigned records)。它们不是专为研究目的而生成的，而是在美国的波兰社区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分析的主要资料是家书和写给组织机构(如报社、移民局、教会、福利机构、法院)以及从组织机构收到的信件。研究者在分析这些文档时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文档中反映出的态度和社会价值观，特别是随着他们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增加，这些态度和价值观的变迁以及波兰社区的成员之间团结性的消退。为此目的，研究者辨别出书信中的几个核心主题如社会混乱、家庭互动的模式、个体化，等等。研究者在分析文档时关注的问题是，以上这些主题被谈及的频率以及波兰社区中的社会行为者对于社会情境的定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除了分析文档和信件之外，研究者仅仅使用了另外一种资料类型，即，他们请一个被研究者将自己的生活史写了下来。

对于文档分析法以及后来的传记研究而言，这项研究被视为质性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的(先驱性)研究(有关这一研究的概括介绍可以参见 Fischer-Rosenthal 1995)。

使用文档的实际问题

在 Wolff(2000a)看来,人们不应认为,与访谈中比较主观的见解相比,文档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文档反映的也只是现实的一个特定的版本,它是基于特定的目的而被建构的。因此,使用文档来验证访谈陈述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恰当地说,文档是一种将信息加以情境化的途径。研究者不应将文档当作"信息容器"来使用,而是应当将其当作是"在方法上设计好的交流工具"(Wolff 2000a,第511 页)来理解和分析,它在生成事件的版本中发挥作用。此外,人们不能够将文档的任何一部分视为是任意的,而是应当按照常人方法论的准则认为"**在各方面都有次序**"(order at all points)(Wolff 2000a,第 512 页)。这也包括文档的设计方式。在一种特定形式的文档(如法律文档)中所使用的版面设计和标准陈述以及惯例性表述都是文档这种交流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当在分析中被忽视。这些组成部分在比较来自不同领域的文档时会提供富有启发性的信息——例如比较分析有关同一对象或事件的两份档案,一个来自司法系统,另一个来自健康系统。

在文档分析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与其他的研究方法一样,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研究者不能够将全部可供使用的文档或者必要的文档都纳入分析,而是不得不对文档进行选择。有些时候,人们可能无法获得和拿到所需要的文档或者文档已然丢失。有些时候,一些"守门人"(Gatekeeper)会拒绝向研究者提供所需的文档,或者相关的当事人会阻止研究者取得与他们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那些文档。例如,原东德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在两德统一之后可以供研究者查阅了。不过,一些公共人物(例如西德的前政客)可能会阻止研究者或记者取得那些与这些公共人物有关的档案,因为这些资料的发表可能会破坏对这些人的记忆或者引起公众的抗议。

其他一些实际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对文档内容的理解方面,例如手写的字迹难以辨认,一些缩写和引文让人难以弄明白或者是因为文档本身受到了损坏。

当研究者决定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某种类型的文档时,应该提出并回答以下的问题:是谁生成的这个文档? 出于何种目的? 机构中的档案应该将该机构的例行工作记录下来,同时也会记录下一些必要的信息,以便证明这些例行工作是如何得到具体实施的。当需要解释问题和为错误和失误而辩护时,这种档案就尤为重要了。与此相应地,文档在实践中可以多次被人使用和援引,也可以被用于其他的目的。Garfinkel(1967)研究了精神病医院中有关患者的档案和报告,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档案的重要部分都是缺失的。他找出并研究了为"糟糕的医院档案"提出的"好的"组织上的原因(这也是他研究的标题)。在这些原因当中,时间只是其中之一:当时间紧迫时,记录人们所做的事情与人们实际所做的事情相比,常常是次要的。出于这一原因,有些重要的信息在记录中被忘记或忽

略了。造成这种糟糕记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记录机构实践时保留一定的模糊性可以防止其他人控制这些实践，例如，缩减某种例行工作所用的时间。因此，当研究者在研究中对文档进行分析时也应该分析以下的问题：

> 哪些内容在生成文档时被略去了？是谁略去的？为什么？哪些社会条件可能影响到了档案的生成？

案例　有关职业培训的文档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项有关专业人员健康观念的研究（Flick et al. 2004）。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包括访谈、焦点小组和文档分析。文档分析的对象是来自受访者完成其学业的那个时代的课程和培养计划。我们将这些以往的课程和培养计划与当前的课程和培养计划以及受访者在访谈中的陈述进行了比较。我们所分析的文档内容包括培训目标和培训内容，考试题目和对实践部分的描述，分析围绕着以下的主题进行并分别考察了这些主题在文档中的重要性：健康的角色、健康促进、预防，以及衰老。分析文档的目的在于为受访者在多个访谈中所表述的以下观点提供背景信息，即，上述主题均非培训的内容，而是在他们成为医生或护士之后在实际工作中才变得重要的。对文档的分析还表明，这些主题在之后的课程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在此项研究中，我们也分析了针对医生和护士的继续教育课程，这些课程是选修课程，而不是必修课程。

文档分析的结果可以帮助人们在规划培训、进修和继续教育课程时照顾到以上这些主题。在培训课程的规划和实际进行的培训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人们不能轻易地将课程（文档）等同于培训（实践）。而且，将这些主题纳入课程也并不意味着，各个学生就一定会学到这些内容。比如说他们很可能错过了相关的课程。

这个例子表明，在课程的规划（在文档的层面上）、教学实践和对教学内容的接收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对诸如课程或培养计划等文档的分析可以提供有价值的附加信息，研究者可以将这些信息与受访者在访谈中陈述的经验相结合。不过，如果研究者将文档分析当作独立的方法来使用的话，往往会发现该方法的局限性。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书面形式的文档。正如 Prior（2003）说明的那样，所有可能的东西都可以被看作是有关某些实践和活动的文档并作为文档得到研究者的分析。例如研究者可以将精神病医院的建筑设计和平面图当作文档来分析人们在特定时期对待精神疾病的方式。照片和电影（见第 18 章）或者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档类型的因特网（见第 20 章）均属文档分析的范畴。

实施的问题

在分析文档时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是谁生成了这些文档？出于何种目的？这些文档在日常生活中被谁所使用？如何以恰当的方式选出单个的文档？研究者在此不应只是考虑文档的内容，而且应该同时考虑文档的背景、使用以及功能。文档是建构出有关事件或过程的一个特定版本的工具，或者更广泛地来看，文档可以从生活史或者一个审理过程中提炼出一个有必要得到咨询的案例。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文档分析常常被视为是一种利用非反应性方法和资料的途径。这些资料是在所研究的场域中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被生成的，并且早在研究之前就已存在。这种方法和资料可以让人们以一种新的、未经过滤的视角来观察场域及场域中的过程。因此，文档可以让研究者不依附于所研究场域中的人（在访谈中表明）的观点。不过，对文档的反思性分析表明，文档作为非反应性方法和资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文档的生成中，参与者的积极作为也会产生影响。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文档分析（例如 Wolff 2000a 或 Prior 2003）的理论背景是常人方法论（参见第 6 章）。文档在这里更多地是被理解为交流的工具，而非“信息容器”。视研究问题的不同，研究者在此会使用不同的编码与分类方法（参见第 23 章）或者会话分析的方法（参见第 24 章）。在抽样方面使用的是目的性抽样或理论抽样（参见第 11 章）。

方法的局限性

作为独立的方法来使用，文档分析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用于研究经历和过程的特定的，有时也具有局限性的途径。不过，文档完全可以作为对访谈和观察的补充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文档的明确内容、隐含意义、文档的功能和使用情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诠释文档时考虑到这一关系。

要 点

- 文档对于理解机构情境中的社会现实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 文档应该被视为是交流的工具，文档的生成是基于特定的实用的目的。因此，文档并非是“非反应性”的，即“未受人影响的”资料。
- 在考虑到文档生成和使用的情境的情况下，文档是对其他类型资料的有益的补充。

练习 19.1

1. 请您找出一份日报和一份城市杂志或者画报并阅读其中的交友版。请您从所选择的两类出版物中选择出多个个人交友广告并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请您试着查明，这些广告分别是由何人所写，其目的何在？在这两类报刊的个人广告之间是否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
2. 对于有关诸如个性化问题的分析而言，这类文档分析的局限性表现在哪里？或者更普遍地说：社会关系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如何超越这些局限？

拓展阅读

Prior, L. (2003). Using Documents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Scott, J. (1990). A Matter of Record-Documentary Sourc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Polity.

Wolff, S. (2000a). Dokumenten-und Akten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02-514.

质性网络研究 20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理解如何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网络。
- 了解使用网络辅助自己研究的益处。
- 明白如何将质性方法用于对网络的研究。
- 知道如何将有些质性方法转换为以网络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受到了21世纪初的数字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影响。电脑被用于质性数据的分析（参见第26章），录音机、小型磁盘、MP3和录像机被用来记录访谈和小组讨论（参见第22章）。网络（Internet）可被用来查找文献（参见第5章），也可被用来发表研究结果（参见第30章）。

除了研究之外，网络已进入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熟悉网络，或者至少知道能用网络做什么。因为受到广泛的媒体宣传的影响，许多人都在自己的家里安装了网络。在此期间，网络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融入了职业活动和日常工作，并且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最后，使用电子邮件这种交流方式的人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都在不断地增加。鉴于人们对网络的广泛使用，网络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质性研究的对象和工具。本章简单介绍了将网络用于质性研究的几种方式，阐述了在这一领域使用网络的优点和可能性，并指出了基于网络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网络作为研究对象

正如之前比较模糊和一般化的介绍所表明的那样，人们仍有必要去研究究竟谁在使用网络以及谁没有使用网络。同样需要得到研究的问题还有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有何不同，不同的群体在使用网络方面有何区别，比如可以按照年

龄、社会阶层和环境、教育水平和性别来分析。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传统的媒体研究和受众研究来回答。研究者可以询问潜在的或事实上的使用者在使用网络方面的经验和实践。研究者可以在此使用标准化访谈或开放式访谈以及焦点小组等方法。同样地，研究者也可以深入网吧或计算机中心通过（参与式）观察来分析人们是如何使用电脑和网络的。会话分析（参见第 24 章）可以表明人们是如何集体使用网络的——例如，研究者可以分析学校电脑班的孩子们在显示屏前的谈话。在 Mitra/Cohen（1999）看来，分析网络使用者使用网络的频率和经验是网络分析的第一种途径，分析网络使用者在网络中交流的文本内容是网络分析的第二种途径。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应用质性方法。在这里，网络只是研究的对象，是参与研究者谈论或者使用的对象，而并非是研究本身的一部分，比如说作为研究所用的方法工具。Marotzki（2003，第151-152页）描述了网络研究的三种"基本的研究焦点"：①在离线（offline）的情况下研究网络使用者在生活世界中是如何使用网络的（比如通过访谈的方法）。②在在线—离线（online-offline）的情况下分析网络是如何改变社会、机构或者个人的生活领域的（同样通过访谈的方法）。③在在线的情况下通过互动分析来研究人们在网络和虚拟社区中的交流。研究者由此进入质性网络研究（qualitative Online-Forschung）的领域。

质性网络研究的前提条件

开展质性网络研究的前提条件首先是研究者自己要有相当丰富的使用电脑和软件的经验。其次，研究者要在某种程度上喜欢用网络工作的方式并且熟悉各种网络交流的形式（电子邮件、聊天室、论坛、邮件发送列表，等等）。Mann/Stewart（2000）概括介绍了网络研究的技术方面。除了以上的条件之外，研究者还需要弄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是否一定要通过质性网络研究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如果研究的问题是网络讨论群体有关某一疾病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者就需要分析这些群体的交流或者访谈这些群体的成员。而联络这些成员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网络。最后，将来参加网络研究的人自己应当有上网的可能并且应该可以通过网络联系到。例如，如果研究者想要研究人们为什么不（再）使用网络，那么，研究者就必须找到其他可以和这些人建立联系的方式。

将质性研究及其方法移至网络

大部分基于网络的研究都是定量的——网络调查、网上问卷或者网络实验（参见 Hewson，Yule，Laurent/Vogel 2003）。但是质性网络研究的比重也在增长（参见 Mann/Stewart 2000）。在这里，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被转用于网络研究。

除了不同形式的网络访谈(Online-Interview)、网络焦点小组(Online-Focus-Groups)和网络民族志(virtuelle Ethnographie)(Hine 2000)之外,人们还开展了对网上互动及其痕迹的研究(参见 Bergmann/Meier 2000; Denzin 1999)。有些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被转用于网络研究,而另外一些质性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必须要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才可以转用于网络研究。接下来本章便介绍一下在网络中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和问题,这里的介绍以前面各章对相关方法的介绍为基础和背景(例如,第 13 章和第 14 章对访谈的介绍)。另外还会补充一些有关网络研究的研究设计(参见第 12 章)和研究伦理(参见第 4 章)的一般性思考。

网络访谈

采用访谈的质性研究具有以下优点:面对面的交流、个人关系(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和能够顾及非言语的交流。这样所收集到的资料的质量建立在自发的对话或者由研究者引发的个人叙述的基础之上。质性访谈的缺点是转录(作为分析访谈的前提)的成本高。为了能够实施访谈,要么受访者需要来找研究者,要么研究者必须去找受访者。如果研究者研究的是自己所在城市的本地样本,那么这应该不是问题。不过,如果研究者住在乡下或者是受访者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就会给研究的组织和资助带来困难。这样可能带来的一个危险是对样本的缩减——不是去访谈那些相关的重要的人,而是访谈方便找到的人。对有些人而言,一想到要自发地回答一两个小时的问题,就感到不舒服,因此这些人可能会拒绝接受访谈。这些实际的、技术上的或者系统性的问题都是采取以下策略的原因,即,当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络或电子邮件联系上研究的目标群体时,可以对他们进行网上访谈。

网络访谈可以同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和受访者同时在线,比如说他们在聊天室相互联系,直接交流问题和回答。这种方式最为接近面对面的访谈。网络访谈也可以非同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和受访者并不一定需要同时在线。研究者可以先将问题发送给受访者,后者过一段时间再把答案发给前者。这种形式的网络访谈通常来说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

电子邮件访谈

对网络访谈的组织会与对面对面访谈的组织有所不同。在提纲访谈中,研究者通常来说会在和受访者会面时向其逐一提出预先设计好的问题。假如人们在网络访谈中也这样做的话,即,将问题一次性地发给受访者回答,那么这种做法就更多地接近问卷调查而非提纲访谈了。因此,在通过网络收集资料时,互动要更多一些,先发给受访者一到两个问题让其回答,然后再给受访者发接下来的(一到两个)问题或者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根据受访者之前的回答提出进一步的问题。

电子邮件访谈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为了找到能够接受电子邮件访谈的受访者,研究者首先可以找那些已经知道或者已经在网上(例如在他们的网页上)找到其电子邮件地址的人。此外,研究者也可以用滚雪球的方法(Schneeballverfahren),从第一批受访者那里取得更多的潜在受访者的邮件地址。研究者也可以在网上论坛或聊天室“发帖子”宣传自己的研究项目,让有兴趣参加的人通过电子邮件与自己联系。不过,在这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到的人,研究者仅知道其邮件地址或者是他们参加讨论小组或聊天室所用的“网名”,而对他们的其他信息可能一无所知。因此,研究者只能依靠他们自己提供的有关其性别、年龄和住址的信息。这不仅会带来有关这些人口统计信息可靠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如何将受访者在之后访谈中的陈述情境化(Kontextualisierung)的问题:“如果研究者采访了几乎两个小时之后才发现受访者不是他所认为的性别,那该怎么办?”(Markham 2004,第 360 页)。

如果研究者需要按照年龄这个范畴来比较不同的受访者的陈述,那么,所有的受访者就必须要给出有关其年龄的真实可靠的信息。当然,即使是在传统的访谈中,所给出的相关信息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过,因为研究者会和受访者见面和谈话,所以,可以由此更加可靠地判断所给出信息的可信度。以上提到的研究者在网络研究中与受访者取得联系的方式以及他们所保持的匿名性也会给抽样带来问题。研究者在这里不仅更加难以验证样本的代表性,而且也难以应用目的性抽样和理论抽样的策略(参见第 11 章)。

在研究者找到参加研究的人之后,还要提前为他们准备好一份说明(Instruktion),以便让他们知道研究者期待他们做什么。在传统的访谈那里,研究者可以在招募受访者或者在访谈开始时向受访者说明和解释这些信息。但是在网络访谈这里,这份说明只能以书面的形式出现,而且必须要清楚和具体,以便让参与者毫无疑问地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不过,这份说明不能过长,以免造成困惑,令受访者失去兴趣或者导致他们忽视这份说明。

与传统的访谈一样,研究者在实施网络访谈时也有必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受访者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即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并非是同步的,回复需要过段时间(隔几天)才能收到。

面对面的交流(和访谈)与网络沟通相比,可能是更具自发性(spontan)。但是后者却更有可能让参与者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回答。

Mann/Stewart(2000,第 129 页)以 Baym(1995)的分析为基础指出以下五个因素会影响到以电脑为媒介的访谈中的互动:

1. 活动/访谈的目的是什么?这会影响到潜在的参与者参加研究的意愿。
2. 研究的时间结构是怎样的?使用的是同步的还是非同步的方法?是否安排了一系列的互动?
3. 所使用软件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有哪些?这会对互动产生影响。

4. 采访者和受访者的特点;使用新技术的经验及对新技术的态度;有关研究主题的知识、写作技能、洞察力,等等。所计划的是一对一的互动还是一位研究人员与一组参与者的互动? 研究者和参与者在此之前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互动? 研究要找的群体的结构是怎样的(等级结构、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等等)?
5. 研究的外部环境是怎样的——研究所涉及的是国际的/国内的文化团体和(或)意义团体? 他们在研究之外的沟通实践对研究有何影响?

如果研究者在寄出问题之后有较长时间(例如几天之后)仍没有得到回复,应该再发一个提醒信息。Bampton/Cowton(2002)认为,回复内容长度的减少、质量的降低,以及回复时间越来越长是参与者兴趣降低的标志,意味着访谈行将结束。

实施的问题

对于网络访谈的参与者而言,其匿名性程度明显高于传统访谈的参与者。这可以对参与者形成保护,避免他们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中被辨认出来。不过,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令他们难以将参与者的陈述、参与者本人以及研究结果置于(现实世界)的背景之中来分析。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网络访谈表明,质性研究是如何在网络中得到使用的。对于那些难以企及的受访者而言,网络访谈有助于赢得那些通常来说难以企及的受访者——比如说他们住得比较远或者他们不愿意与陌生人谈论敏感话题。网络研究的匿名性也可以是一个优点。网络访谈获得的资料已然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资料,这样就省去了费时的转录工作。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很多访谈形式都可以在调整后被用于网络研究。抽样方式是目的性抽样(参见第 11 章)。抽样方式在此必须要经过调整,如果研究者不能获得有关参与者的充分的信息,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人们可以用编码和分类的程序(参见第 23 章)来分析网络访谈。若用注释学的方法来分析此类资料则必须首先经过相应的调整。

方法的局限性

网络访谈是对现实世界之中的访谈的一种模拟(Simulation)。在这里,书面交流的反思性(Reflexivität)取代了传统访谈形式所具有的口头交流的自发性。网络访谈难以传递和包含日常交流中的非言语性和辅助语言学的因素(paralinguistische Anteile)。最后,网络访谈法的使用也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人,这些人愿意进行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或者总地来说愿意使用相应的科技和交流方式。

网络焦点小组

如果把焦点小组(参见第15章)的方法移用于网络研究,那么人们就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形式:同步的(实时进行地)焦点小组和非同步的(非实时进行的)焦点小组。前者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同时在线并且在一个网上聊天室或者借助一种特殊的会议软件进行。为此,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在其电脑上安装这种软件或者由研究者负责提供和安装。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之外,有些人会不愿意(仅仅)为了参与一项调查而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一个软件。非同步的焦点小组不需要所有参与者都同时在线(这样就避免了协调的问题)。与在电子邮件访谈那里一样,非同步焦点小组的参加者可以在对其他参加者的发言(或者研究者的问题或刺激)作出回应之前,思考一段时间。每个参加者的发言都被发送到会议主页上去,被存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每个人都可以打开这个文件夹。当参加研究者位于不同的时区或者当他们因为打字或回答问题的速度不同而导致在小组中发言的机会不同时,这种形式的焦点小组的优点就显现出来了。

使用网络焦点小组方法面临的实际问题

要想实施网络焦点小组,就必须要为参与者提供简单的参与途径。Mann/Stewart(2000, 第103-105页)详细描述了一种可以用来建立同步的网络焦点小组的软件("会议软件")以及另一种替代性的方法,即设计一个供小组成员访问和进入的网页。在布置传统的焦点小组的会场时,人们会强调做到自然和中性。如果想要将这些原则移用于网络上的空间布置,那么,就必须要让参与者可以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工作地点参与小组讨论,而不是非要去一个特定的地点不可。在实施时,研究者在开始时首先要致一个欢迎词,然后要解释清楚讨论的进展方式和对参与者的期待,告诉参与者需要遵守哪些交流的规则(比如"……请您对所有的参与者有礼貌……")等。就像在每一个焦点小组都要做的那样,研究者要创设一个宽容的、自由的和随意的氛围。

对参与者的招募可以像在网络访谈(见前面的叙述)那里一样,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聊天室和论坛。在这里,研究者同样也不能确定参与者是否符合要求以及他们的自我介绍是否属实。这种招募方式会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当研究者想要建立一个由特定年龄段的姑娘构成的同质小组(参见第15章)时。"如果网络焦点小组的参与不能将聊天室或会议所呈现的文字维度与数码相机所呈现的视觉维度和/或声音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研究者就不能肯定焦点小组成员确实真是(比如说)由青少年女性组成的。"(Mann/Stewart 2000, 第112页)在传统的焦点小组那里,参与者的数量要有所控制,因为参与者太多会使得小组的讨论变得太快和太肤浅。而在非同步的网络焦点小组这里,这个问题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解决。因此,人们在这里不一定要限制参与者的人数。

和传统的焦点小组相比,个别参与者在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小组动力(Gruppendynamik)等问题可以更加容易地在网络小组(尤其是非同步的网络小组)这里得到解决。腼腆的参与者如果对讨论的程序或主题感到不肯定,就有可能就会犹豫着不在讨论中发言;不过,和传统的焦点小组相比,研究者在网络焦点小组这里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干涉和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通过使用笔名、用户名或绰号,网络小组成员的匿名性要高于一般的焦点小组,这令他们更容易在讨论中展开话题。最后,对于网络焦点小组而言重要的是,研究者要选择出一个对该小组和参与者很重要的主题来吸引他们的参与。换句话说:在这里(同样)比较重要的是要找到那些对研究主题感兴趣的小组。这样才可以让讨论富有成果,获得令人感兴趣的资料。

实施的问题

网络焦点小组可以说是将网络交流用于研究目的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和传统的焦点小组相比,参与者在这里的匿名性更高,这可以保护他们,避免人们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在研究结果中辨认出他们的身份。不过,这种匿名性再度给研究者带来了以下的问题,即,难以将参与者及其陈述与(现实世界中的)背景联系起来。而这又带来了抽样的问题,比如说当研究者想要建立某种特定的(同质)小组时。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在网络焦点小组这里,研究者更容易解决沉默寡言者的问题(参见第 15 章)。研究者在这里引发的小组互动是以匿名的方式进行的,参与者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其他人或研究者辨认出来。与现实世界中的小组相比,这种匿名性会让网络焦点小组的参与者更多地敞开心扉。此外,资料在这里也更加容易被记录下来,因为这里不存在因为不理解而在转录过程中遗漏讨论发言的问题。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如果研究者能够掌握参与者的足够信息,那么就可以把很多种形式的小组讨论和焦点小组经过调整之后应用于网络研究。抽样方式在这里选择的是目的性抽样(参见第 11 章)。对资料的分析采用编码和归类的方法(参见第 23 章)或者会话分析的方法(参见第 24 章)要比采用注释学方法更加适合。

方法的局限性

参与者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受到的外部影响可能会妨碍到网络焦点小组。这些外部影响可能会导致参与者中断参与或者令其受到干扰,对所收集到的资料及其质量产生消极影响。而这些对于研究人员来说都是难以控制的。一个或多个参与者在网络连接方面遇到的技术上的问题也会对讨论造成干扰并损害到所收集资料的质量。最后,该方法的应用也是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人群,即那些能够

和愿意使用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方式并且有上网可能的人。

网络民族志:在网络中的互动和交流

在人们将收集口头资料的质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网络研究时,网络是被人们当作一种**工具**(Werkzeug)来使用的。人们通过网络这种工具来将那些传统研究方式通常说来不能或者难以接触到的人纳入研究,或者以一种特殊的、与传统的访谈和小组讨论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不过,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地点**(Ort)或者一种**存在方式**(Seinsform)(关于这三种不同的视角请参见 Markham 2004)。从后两种视角来看,网络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环境或者文化来分析,人们可以在网络中发展出特定的交流形式或者(在有些情况下)特殊的身份认同。人们将民族志方法应用于网络研究,用来分析网络中的交流方式和自我展示方式。"如果人们想要理解参与者的自我体验和他们赋予自己参与网络的意义,就必须要和参与者一起度过一段时间,观察他们在网络上做些什么,听他们如何描述他们所做的事情。"(Kendall 1999, 第 62 页)Kendall 在她的研究中对一个多用户小组(Multi-User-Gruppe)中的交流进行了观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Kendall 成为该小组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是民族志研究者为了研究作为观察者参与现实世界中的交流和文化一样。网络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不同,这里的活动不是发生在现实的环境中,而是发生在技术环境中。正如很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例子可以参见 Flick 1996),技术并不是某种既定的和可被毫无疑问地接受的东西。对技术的使用和技术的影响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使用者(及非使用者)观念和想象的影响。与此相应地,网络民族志研究应该以提示框 20.1 中的问题入手。

提示框 20.1　网络民族志的研究问题

- 网络使用者是如何理解网络的可能性的?使用网络对他们有何种意义?他们如何看待网络作为交流媒介的可能性的?他们认为谁是他们的交流对象?
- 网络对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织有何种影响?这有别于人们"真实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的组织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网络使用者是如何协调二者的?
- 网络对于真实性和权威性意味着什么?身份认同是如何被展示和体验的,真实性得到如何的评价?
- "网络"被认为是与"真实"截然不同和相互分离的吗?在线和离线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分界限?

出处:Hine 2000, 第 8 页

这些问题涉及行为者对于网络环境的理解,涉及网络团体或者网络中的社会群体的建立,涉及网络中的身份认同以及网络和真实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人们使用的是以下对网络团体(Virtuelle Gemeinschaften)的定义(参见 Kardorff

2006）：

> 网络团体是在网络中形成的社会汇集群体，其形成的条件是，当足够多的人在足够长的时间带着充分的人类的感情（mit ausreichend menschlichen Gefühlen）来推动公共讨论，从而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个人关系的网络。（Rheingold 1993，第5页）

这样，民族志就完成了第二次转变（Transformation）。第一次转变指的是由对陌生文化的研究转向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参看 Zinnecker 2000），第二次转变指的是从真实世界的民族志转向网络世界的网络民族志（Marotzki 2003）。

使用网络民族志的实际问题

传统的民族志（参见第17章）的一些核心部分可以毫无问题地被直接转用于网络民族志。不过，也有些其他的部分必须要先经过调整。这一点可以从Hine（2000，第63-65页）提出的网络民族志的十条原则看出：为了获得民族志知识，民族志研究者要持续性地呆在研究实地和深入地参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在网络民族志这里同样也是必需的。但是，在所谓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互动地点、场域和活动场所等概念都受到了质疑。在这里，对场域的界定不能事先就确定下来，而是需要在研究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此外，研究者必须要考虑到网络和"真实生活"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网络既是一种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品。通过媒介的交流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若要观察一个网络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人们也没有必要必须处在同一个地点或者同一时间。研究者可以先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回到电脑前查阅电子邮件或者小组讨论的内容，并且他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电脑上来查阅。网络民族志从来都不是整体性的，而始终是局部性的。在这里，人们不可能来分析"事先已经存在的、可独立分开的、可以描述出来的信息提供者、活动场所和文化"。相反，我们所发现的知识"更多地是建立在具有策略重要性的理念的基础之上，而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忠实再现"（Hine 2000，第65页）。与此相应地，网络民族志在"无形体存在"的意义上（im Sinne des Körperlos-Seins）具有虚拟性，带有"不完全"真实的意味。

网络民族志分析的是参与者在网络中交流的内容和他们沟通所用的文本方式。Hine分析了有关一个审判程序的那些网页以及这些网页表现诉讼、案件和与此相关的冲突的方式。

案例 网络民族志

Hine（2000）在她的研究中分析了一个曾引起激烈讨论的审判——Louise Woodward的案子。Louise是一位英国的保姆，因为由她在波士顿负责照管的一个儿童的死亡而被起诉。研究者想要查明的是，这个案件在网络中是如何被建构的。为此目的，她分析了报道过这个案子的那些网页。她通过电子邮件对那些网页信息的作者进行了访谈，询问他们的目的和经验。她还分析新闻组（Newsgroup）中的讨论，这些新闻组中均要有十个或更多的与这起案件有关的"发言帖"。她使用网页www.dejanews.com来寻找这样的新闻组。这个网页将所有的新闻组的发言都储存了下来，人们可

以用关键词进行查询。她将查询范围限制在1998年的某一个月。她在那些深入讨论过这个案件的新闻组发布了一条信息。但是,与对网络信息作者的访谈不同的是,人们对此的回应比较少,正如在类似的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那样(Hine 2000,第79页)。Hine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网页,并在和未来的参与者联系的时候或者在发布有关自己研究的信息时,提到这个网页。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让潜在的参与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她和她的研究。然而,在总结她的研究结果时她不得不表示:"由我的经验、我的材料和我就该主题写的文章所构成的民族志肯定是不完全的(……)。特别是就所选择的特定的网络使用方式而言,这个民族志是局部性的。我在还没有做出详细分析其中何种网络应用方式这一特定决定的情况下,便开始着手研究'网络'。"(Hine 2000年,第80页)尽管如此,她的研究结果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在网上是如何对待这起诉讼的。她对网络民族志的反思在她的研究之外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些反思表明了将民族志(或更广泛地说:质性研究)用于网络研究的局限,就像Bryman的批评意见所说的那样:"诸如此类的研究清楚地邀请我们去思考网络作为研究领域的特质,同时也邀请我们去思考我们研究方法的特质及其适应能力。"(Bryman 2004,第473页)

Marotzki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民族志来研究网上社区的不同结构特征:网上社区的规则、社会形象结构、交流结构、信息结构、展示结构和参与结构(2003,第155-161页)。Kardorff(2006)把这些问题转移到对网上关系网(virtuelle Netzwerke)的分析并将此视为是一种新的社会化形式。

Bergmann/Meier(2000)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他们以会话分析为背景研究了网络中互动的形式要素。会话分析所关注的更多地是有关某一主题的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工具和互动性工具(例如谈话者的变换、修改、谈话结束语的引入——参见第24章)。与此相应地,Bergmann/Meier想要确认网络交流产生和留下的痕迹,以便理解网络中的这种交流是如何实际产生的。为此,他们使用了电子进程资料(elektronische Prozessdaten),即"所有在以电脑为基础的交流过程中和工作活动中产生的资料,无论它们是自动生成的还是基于使用者的设置而生成的"(Bergmann/Meier 2000,第43页)。这些资料并不是轻易便可得到的。它们是在对事情进展所做的详细的和持续性的记录的基础上被重构出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研究者还需要在电脑荧屏前等着做记录,例如当一个人发送邮件时。记录的内容包括写邮件时发表的评论或者辅助语言的成分(如微笑,等等)。同样的,记录下使用以电脑为基础的交流的时间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人们可以在此使用专门的软件(例如Lotus Screen-Cam),将电脑屏幕中发生的事情以及电脑屏幕前的互动都记录下来。

实施的问题

网络民族志必须要考虑到使用者——个人或者团体——是如何建构网络本身的。Hine(2000,第78-79页)的例子表明,研究者要想收到人们对新闻组中发布的信息的回复有时是很困难的。Bryman(2004,第474页)将此视为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对研究者利用这一网络空间持有怀疑的态度。因

此,Hine 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网页的分析,而非是对互动的分析。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民族志研究的一些根本性的要素都受到了来自网络民族志的挑战——例如以下的措辞"在那里""成为一个团体或文化的日常生活一部分",等等。这些挑战让人们去重新思考民族志的方法,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于对网络群体而非是现实世界中的群体的分析。继有关写作、展示、作者身份和权威的争论之后(参见第 30 章),网络民族志将一种新的视角引入学术界有关民族志的一般讨论之中。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网络民族志是在人们有关民族志(参见第 17 章)以及写作和文本在质性研究中的角色(第 7 章和第 30 章)的普遍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抽样的方式是目的性抽样。对所收集到的材料的分析方法的选择,就像在其他形式的民族志那里一样,具有灵活的特点。

方法的局限性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网络交流并不仅仅是在网络中的交流。为了做出对网络世界的全面的民族志研究,研究者必须将其与真实世界的活动联系起来——无论是电脑前的真实世界还是电脑之外的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世界。要找到从网上团体通向参与者的真实生活的道路是困难的。因此,网络民族志与其他形式的民族志相比,更加具有局部性和有限性。

网络文档的分析

最后要介绍的是将文档分析用于网络研究的方法。网络上充满了个人的、机构的主页以及可以从这些主页下载的文件,还有网络杂志和广告,等等。如果研究的问题是对这种文档的分析,那么,人们很容易找到无穷多的网页和文档,而且它们之间常常相互链接或者是与其他的网页和文档相互链接。

网络文档的特性

万维网及其中的网页可以被当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档来理解和分析。根据 Mitra/Cohen(1999)的分析,网络中的文档具有一些特定的特性,首先就是网络中文档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ät),其标志是通过(电子)链接将一个文本(或网页)与其他文本联结起来。这种链接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定义和文本界限,把大量的单个的网页(或文本)与其他(有时是)无尽的文本链接起来。这种对文本的明

确链接(explizite Verknüpfung)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对文本的隐含性链接(implizite Verknüpfung)的补充。如果使用搜索引擎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种隐含性的链接。准确地说,网络中的文本应该被理解为超文本(Hypertext),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与其他的文本相互链接,而且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不稳定和变化不定的特点。网页在不断地更新,改变,消失,又再度出现。因此,人们在引用网页时一定要标出访问的时间。网络中的文本还具有非线性的特定。传统的文本有一种线性的结构——有开头、结尾,经常在内容上还有一定的时间结构(比如在叙述中)。对文本的阅读也遵循着这种线性结构:通常来说,人们写书是让人按照从开头到结尾的顺序来阅读的——尽管读者也可以通过在目录中查询感兴趣的题目来有选择地阅读文章内容。这种线性结构在网页中是不存在的。尽管它们也有自己的结构——主页和下级页。但是使用者不一定要遵循作者或者网页设计者所设计的结构。Mitra/Cohen(1999)认为,在网络文本这里,作者和读者(作为写作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的定义。绝大多数的网页都不仅仅使用文本这一种媒介。准确地说,它们是由图片、声音、文本和弹出目录构成的多媒体产品,并且是全球性的:尽管大部分网页是用英文表述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使用其他语言的网页。

网络文档分析的实际问题

如果把网页当作文档和文本来分析,那么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参见 Reichertz, 2004)。首先,什么是原本要分析的文本——是单个的主页、孤立的网页,还是将一个网页与其他网页的关联包括在内的网页全体?如果分析是按照顺序性的思路来进行的话(参见第 24、25 章),那么这个文本就必须要有一个开始,一个或多或少的线性结构,还有一个结尾。但是网页的开始在哪里呢?或者,让我们再进一步地想想:人们应该按照哪些标准来为自己的研究选出一个网页呢,又应该按照哪些标准来决定应该从哪个网页开始分析呢?一种可能的分析顺序是,人们从主页开始,然后再分析下级目录。不过,与书面文本不同的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顺序。使用者可以自己决定他接下来要分析哪一个下级网页。

理论抽样可以为研究者对于网页的选择提供一种导向(参见第 11 章)。理论抽样在这里的意思是,研究者可以从一个对研究问题重要的网页开始分析,然后再根据对这一网页分析的结果(获得的认识或尚未解决的问题)来决定下一步应该分析哪一个网页。网上的搜索引擎(例如 Google)可以帮助研究者找到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网页。搜索的成功取决于正确的搜索关键词。因为所有的搜索引擎都具有筛选性,所以应该使用多个搜索引擎。因为网页总在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所以人们不能指望这次找到的网页以后还可以找到。与此相应地,研究者应该把那些对当前的研究课题而言最重要的网页保存到自己电脑中,并适时地检查保存的网页是否有更新或者改变。视研究问题的需要,研究者可以使用分析视觉资料(参见第 18 章)或者文本(参见第 23 章至第 25 章)的方法,或者使用更加精密的 QDA 软件(参见第 26 章)。

实施的问题

对网页的分析与质性研究中常见的对文档的分析不同，因为它们在不断地改变或者消失，人们很难界定它们的边界。网页的结构也不同于文本的结构，它们包括了不同的资料形式（图片、声音、文本和链接，等等）。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网页是交流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个体与组织自我展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挑战着质性研究和方法的潜力。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视具体的研究问题的需要，质性研究的分析工具可以经过调整以适用于对网络文档的分析。抽样的方式主要是目的性抽样和理论抽样（参见第 11 页）。从网页入手可以研究现实的社会建构及特定主题的社会建构等问题（参见第 7 章）。

方法的局限性

网络文档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表面（Oberfläche），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展示”的形式（Goffman 1959）。它包含着技术上的障碍，让人们难以追溯这里所展示的内容。要想通过分析网页得出有关网页所有者或者设计者（不论是个人或者机构）的结论，可能会被证明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必要对网络文档分析和其他的方法一起进行多元结合（参见第 29 章），这些其他的方法应该让研究者接触到真实世界中的人或者机构。

质性网络研究的前景与局限

将质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网络研究对于很多方法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它们必须为此在抽样方式和分析方法等方面作出调整。乍看起来，在研究中使用网络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加容易了。研究者可以和远距离的受访者联系，而不需要经过麻烦的和高花费的旅行；可以节省转录的时间和费用；可以联系对研究话题感兴趣的已经存在的群体；可以更容易地保证参与者的匿名性；可以在自己的书桌旁通过电脑获得所有可能的文档。不过，通过电子邮件的交流明显有别于面对面的问答。很多通过网络可以联系到的许多人不一定都会愿意参与研究。参与者的匿名性也带来真实性和情境化的问题。网页在不断地改变或消失，等等。鉴于这些技术上的问题，研究者一定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研究主题，看看是否一定要通过使用网络才能回答自己的研究问题。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之外，在质性网络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参看第 4 章）。Mann/Stewart（2000，第 3 章）

详细论述了一个用于网络研究的伦理框架。该伦理框架包括了如下一些内容：对资料的收集必须是基于一个合法的目的。要细心地保护所收集到的资料，避免它们遭到任何形式的滥用、遗失、被人破译、被侵权使用等风险。参与者应该知道有关他们的哪些数据得到存储和使用，并且他们自己也要能够查看和使用这些资料。无论是访谈还是民族志研究都需要争取到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当然，如果目标群体不能得到准确的界定，研究者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笔名与他们进行联系的话，那么，要取得他们的知情同意可能会比较困难。研究者应该在整个研究当中，特别是在发表物中使用资料时，保证参与者的匿名性。参与者应该知道，他们在聊天室的谈话在什么时间被研究者记录下来。这也意味着，偷偷地阅读和复制聊天室中的交流是不合法的。针对使用网络的不同领域，还存在着一系列的“网络礼仪”，研究者应该了解并在工作中遵守这些行为准则（相关细节请参见 Mann/Stewart 2000）。

如果人们考虑到了这些伦理问题，如果这些技术上问题能够得到恰当的解决并且研究者有充分的理由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网络这个实证途径的话，那么，网络研究就是一种富有意义的研究方式。对网络作为文化和文化产品的科研兴趣将会带来方法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质性网络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将来会变得更加重要。

要　点

- 质性网络研究是一个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的领域，有些成熟的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在经过调整之后被应用于网络研究。
- 质性网络研究与现实世界的研究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如节省了转录所需的时间），但是也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如参与者的可接触性和对参与者的辨认）。
- 这一领域中的纲领性文献常常比它们在具体研究项目中的应用实例更具有说服力。
- 要在这一领域遵守质性研究一般的伦理标准相对来说更为困难。此外，研究者在这里还要注意一系列额外的伦理问题。

练习 20.1

1. 请您在网络中找出一个质性网络研究的例子，然后结合本章讨论的问题对它进行分析。
2. 请您从第 13 章和第 14 章介绍的各种方法中选出一个，并思考一下，如何将这一方法应用于网络研究，会出现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

网络访谈和焦点小组

Bampton, R./Cowton, C. J. (2002, May). The E-Interview.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ch, 3 (2), *www. qualitative-research. net/fqs/fqs-eng. htm* (访问日期: 2005. 12. 02)

Mann, C./Stewart, F.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London: Sage.

网络民族志

Bergmann, J. /Meier, C. (2000). Elektronische Prozeßdaten und ihre 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29-437.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Marotzki, W. (2003). Online-Ethnographie—Wege und Ergebnisse zur Forschung im Kulturraum Internet. In: B. Bachmair, P. Diepold/C. de Witt (Hrsg.). Jahrbuch Medienpädagogik 3. Opladen: Leske &Budrich, S. 149-166.

网络文档的分析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Mitra, A./Cohen, E. (1999). Analyzing the Web: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In: S. Jones (Hrsg.). Doing Internet Research—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S. 179-202.

Reichertz, J. (2004). Abschied vom Glauben an die Allmacht der Rationalität? oder: Der Unternehmensberater als Charismatiker. Lässt sich die hermeneutische Wissenssoziologie für die Interpretation einer Homepage nutzen? ZBBS, 1, 7-28.

21 观察法和媒介资料:方法概览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能够

- 比较收集观察和媒介资料的不同方法。
- 根据使用所选择的方法的(初步)经验来批判地检验自己的方法选择。
- 结合研究过程以及其他的研究步骤来理解自己所选择的方法。

使用媒介资料的策略在质性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视觉资料在质性研究中再度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观察法和民族志代表着质性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同时,网络也成了质性研究的对象和资源。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来使用观察法和媒介资料,用它们取代或者补充口述资料。首先,研究者希望超越仅仅使用有关行动的口头陈述和报告作为分析资料的层面,以便可以在行动自然发生的情况下分析行动本身。第二,有几种形式的观察可以不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场域进行任何干涉便可以完成。最后,通过参与进行观察、通过介入和干涉研究场域进行观察以及观察在场域中的影响被用作获取认知的途径。

通过不同形式的观察,研究者旨在理解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方式、活动和事件。研究者可以作为参与者从内部进行观察,也可以作为纯粹的观察者从外部进行观察。在观察时,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入手来再现所研究的个案(Fall),例如:发生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事件,某个人的活动,不同人之间具体的互动。

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到观察活动本身和观察者的参与以及电影和照相机等媒介都会对所研究的事件产生影响,并且会影响到这些事件面向观察者的展现。因此,观察活动参与了对所研究的现实的建构,而这个现实在观察之前已然是社会建构过程的结果。不过,观察方法也提供了一种按照互动的进展记录这种建构过程的途径。观察程序最终会生成一些作为实证资料的文本,如观察记录,对拍摄下来的互动的转录稿(Transkripte),对电影中的事件的描述,以及对照片的

内容描述。

其他一些形式的文档是了解日常生活和机构中的例行公事(Routinen)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具体方法是分析它们在档案中留下的痕迹。最后,网络已经持续地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并且带来了新的开展研究的途径,比如网络访谈、网络焦点小组和网络民族志。本章在以下部分是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观察”这个概念的,因为对文档、照片、录像或者网络沟通的分析也可以分别被视为是一种观察互动及其他过程的特殊形式。

第一参照点:基于标准的方法比较

我们可以对不同的观察法和收集媒介资料的方法进行对比。对比使用的标准在之前对口述资料收集方法的比较(见第16章)中已经使用过了。作为比较的第一个标准,人们在这里同样需要提出以下的问题,即,各种方法分别采用哪些措施来保证研究对于被观察对象的视角具有开放性。因为观察通常来说关注的都是互动和行为,因此,要了解参与者的主观视角往往需要通过额外的访谈。第二个比较的标准是各种方法在观察的过程通过哪些措施来保证对于行动和互动过程保持开放性。除了以上这两项保证开放性的措施之外,各种观察方法还含有一些针对以下问题的特定要求,即,应该如何进行结构化的资料收集,才可以收集到或更深入地了解到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事件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收集视觉资料的方法对整个观察法的发展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此外,这些方法分别有各自的应用领域,它们或者主要被应用于这些领域,或者是专为这些领域而发展起来的。最后,这里分析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实施问题和根本局限(参见表21.1)。这些方法被分入了三个范畴:观察法和(传统的)民族志(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使用视觉资料的方法(照片分析、电影分析和录像分析)和使用媒介资料的方法(文档分析、网络研究)。这一比较涵盖了使用这些资料类型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便于人们在这一框架中对方法进行定位。

表 21.1　观察法和媒介资料收集方法的比较

方法标准	观察法和民族志			视觉资料			媒介资料	
	非参与式观察	参与式观察	民族志	照片分析	电影分析	录像分析	文档分析	质性网络研究
对被观察者主观见解的开放性，通过：	• 与访谈结合使用	• 与访谈结合使用 •（通过）参与去理解和体会	• 将观察和访谈结合起来	• 被研究对象作为摄影者	• 对一个主要人物的观点集中进行颠覆性诠释	• 请被研究对象来拍摄录像	• 考虑到文档的产生背景（谁制做的，出于什么目的？）	• 受访者和参加者有更多的可能来控制他们在研究情境中透露的内容
对行动和互动过程的开放性，通过：	• 不影响所观察的场域	• 尽管参与，但是保持距离 • 在开始时进行尽可能开放地观察	• 参与被观察的生活世界	• 一系列照片中的记录	• 分析影片中的故事和发展历程	• 对背景的广泛的记录	• 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制成的、有关过程的文档	• 允许建立一种没有时间压力的访谈交流环境
对研究主题的结构化（如深化），通过：	• 逐渐地聚焦 • 选择性观察	• 将关键人物纳入研究 • 逐渐地聚焦	• 使用多元的方法	• 画面和视角 • 在关键性的时刻拍摄	• 对“现实主义”和“颠覆性”诠释的对比	• 将摄像机的焦点对准特定的方面	• 对文档的选择 • 照顾到文档的结构	• 对已经说过的内容的概括了解越多，研究者就有更好的追问的机会
对使用媒介资料的方法的一般发展的贡献	• 避免对研究场域的干预 • 表明了实地研究的性别特征 • 自我观察和反思	• 表明了参与和保持距离之间的冲突	• 强调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 提高对描述和展示等问题的敏感性	• 充实和补充了其他的方法（观察、访谈）	• 将视觉资料固定保存下来 • 对非言语交流内容的记录和详细分析	• 超越了其他方法的局限性	• 使用原本并非为研究目的而生成的资料	• 可以让遥远的参与者参与研究 • 将现代的交流形式用于研究
应用领域	• 开放的场域 • 公共场所	• 有特定范围限制的领域 • 机构	• 日常的生活世界	• 陌生文化 • 传记经历	• 社会问题 • 文化价值	• 工作场所研究 • 在机构情境中的互动	• 分析机构之中的或日常生活中的过程	• 分析焦点小组或民族志中的网络交流
实施的问题	• 征求公共场所中的被观察者的同意	• 入境随俗 • 进入研究场域的困难 • 观察者被场域中的刺激淹没	• 以一种非特定的研究态度代替使用具体的方法	• 媒介及其应用的筛选性	• 从图像层面或文本层面进行诠释	• 如何限制技术装置存在对拍摄对象的影响	• 如何选择文档和如何考虑文档的产生背景	• 参与者的身份难以查明 • 仅限于互联网用户
方法的局限性	• 隐蔽观察作为一个伦理问题	• 观察资料中研究对象所说和所做之间的关系	• 对方法问题的兴趣有限	• 照片分析作为文本分析？	• 没有专门针对电影资料的分析方法	• 摄像机的选择性	• 文档的功能和目标只能被间接地探明	• 仅能触及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网络交流）
参考文献	Adler/Adler(1998)	Spradley(1980)；Lüders(2000a)	Lüders(2000a)	Harper(2000a)	Denzin(2000b)；Ehrenspeck/Schaeffer (2003)	Heath/Hindmarsh (2002)；Knoblauch et al. (2006a)	Prior(2003)；Scott(1990)；Wolff(2000a)	Bergmann/Meier(2000)；Mann/Stewart(2000)

第二参照点：方法的选择及对其应用的检验

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研究问题、所观察的场域和研究所关注的人群）选择出合适的方法来搜集媒介资料，并且根据收集的资料来检验自己的选择决定。并非每一个方法对所有的问题都是合适的选择。过去的事件最好是用该事件发生时留下的视觉材料来分析。为此，可以选择照片分析。如果研究者想要研究人们在某一社会中如何对待文化价值和一般的（即跨越各种情况的）社会问题，那么，可以使用电影分析或电视分析的方法。如果研究者想要了解人们在具体的互动情境中是如何对待这些价值和社会问题的，那么，他可以使用观察法对相关的场域和人进行观察。不过，观察在这里仅能让人们了解到在情境之中展现出来的行动。社会背景和个人传记性背景只能间接地从这些行动中得到重构。如果情景、场域和参与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限定，那么研究者就可以进行参与式观察，通过参与所研究的场域来利用由此而获得的额外的认知可能性。当所研究的场域不能得到合适的限定并因此令研究者的参与变得不可能的话，或者当所观察的行为因为具有危险性或不合法而令研究者的参与变得不可能的话，非参与式观察便成为有意义的选择了。文档中或者网络上留下的痕迹可让人们认识到社会进程和社会变化的一个特定部分。

除了研究问题之外，研究中所要观察的人是研究者在选择收集资料方法时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参照点。非参与式观察会让有些人感到不安和困扰，但是这些人却比较能够接受研究者暂时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其他一些人则将研究者在特定领域中的参与和观察视为是干扰。此外，有些研究者感到很难在观察时参与到所研究的场域中去，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感到很难做到在观察中不参与。对于参与研究的人来说，如果研究者能够解释清楚情况和观察者的做法，以及检验一下所选择的方法对于具体应用目的的适用性的话，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对于观察者而言，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可以让他们接受观察训练。在观察培训中，观察者所观察到的情况会得到分析和评估，看看那些重要的方面是否被观察到了，如果没有的话，原因在哪里。观察者与实地的接触也应该额外得到分析，看看他们在实地中的导向方面和在停留期间遇到了哪些问题。如果这种观察培训不能解决观察者在实地中遇到的困难，那么就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改变方法或是更换观察者。

在完成最初几次观察之后，研究者应该围绕以下的问题对这些观察做出分析，即对所选择的方法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方法的要求和目标？例如：对观察提纲的使用是否正如这一方法所要求的那样准确和灵活？研究者在参与式观察中有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研究者的参与在范围和深度上是否符合研究的目标？在选择一种方法和对此决定进行评价时，研究者还应该考虑到自己通过研究想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研究的结论应该达到何种层次的推广度？只有在考

虑到以上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才能够明确地说明，什么是好的观察[①]（见表21.2）。

表21.2 观察程序的核查单

什么是好的观察——它取决于哪些因素？ 选择观察形式和评价其应用的核查单	
1. 研究问题	观察方法及其应用能够抓住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吗？
2. 观察形式	对方法的运用应该符合方法的要求和目标：不要在不同的观察形式之间进行跳跃，除非是有研究问题上的需要和/或理论上的理由。
3. 观察者	观察者有能力使用这个方法吗？观察者自己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会在情境中起到什么作用？
4. 被观察者	观察形式适合于被观察的目标群体吗？如何照顾到（潜在的）研究参与者的担忧、不确定性和期待？
5. 场域	观察形式适合于所研究的场域吗？如何兼顾场域的可进入性、伦理上的正确性和可行性等因素？
6. 赋予被观察者的空间	如何在观察中考虑到被观察者的视角及其差异性？参与者有没有可能超越观察方法框架的限制而将自己的视角展现出来呢？（例如：所使用的观察提纲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记录未预料到的事情？）
7. 观察过程	观察者有没有成功地实现这种观察形式？他有没有给参与者和场域留出足够的空间？观察者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为什么没有？）对被观察者来说，他的角色、观察者的角色以及情况有没有得到清楚的定义？被观察者有没有扮演好他们的角色？（为什么没有？）
→	尽可能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实地接触之间对违背之处进行分析，以验证观察的正确性。
8. 分析的目标	是得到清楚界定的行为方式，还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式、背景等？
9. 推广度方面的追求	应该在哪一种层面上提出研究的结论呢？ —个案的层面（例如：所观察的个体和他的行动或一个机构及其中的相互关系）？ —群体的层面（有关一个职业群体、一种类型的机构）？ —普遍有效的结论？

通过运用表21.2中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的合适性。在完成最初几次实地接触之后，研究者必须要进行一次此类合适性检查，并且在接下来的观察过程中重复进行这种检查。

① 观察在这里同时代表着其他那些适用媒介资料的方法。

第三参照点: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对于媒介资料的收集而言,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王者之道”。研究者应该让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来决定他应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或是电影分析。因为非参与式观察仅仅能够提供有关具体情境中的行动和活动的信息,所以,为了能够了解被观察者的主观见解和他们的生活世界,研究者在观察时参与所观察的事件并且同时与观察场域中的人进行交谈往往是更加合适的方法。通过在民族志研究中结合使用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在观察领域出现的方法相对于研究对象适合性的问题。质性网络研究要求发展新的方法,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尚处于起步的阶段。

第四参照点: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匹配性

第四个参照点是将观察法和媒介资料收集方法置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来考量。研究者需要检验收集资料的方法与分析资料的方法是否相互匹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为了保证对于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在资料收集中所做的努力是否与分析资料的方法相匹配。例如,如果研究者只是想按照少数几个从现存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范畴(参见第23章)来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在收集资料方面所做的以下努力就显得意义不大了,如:尽可能广泛和灵活地进行观察,尽可能让观察免受方法限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所收集的资料仅仅是实地记录的话,那么,要想采用顺序分析程序如客观注释学(参见第25章)来进行分析也被证明是难以操作的(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Lüders 2000a)。对于这类资料的分析,采用居于以上提到的两个极端的分析程序之间的分析方法,如理论编码(参见第23章),更为合适。类似地,研究者还应该检验观察的形式和设计与选取场域和情境的抽样方式以及自己研究的理论背景是否相互匹配。

前面的各章在介绍每一种方法时都对该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定位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可以为研究者进行上述的检验提供参考。研究者可以将自己对当前研究及其设计的理解与在这些分析中阐明的对研究过程及其组成部分的理解进行比较。

由此可见,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对这种选择决定的评价都需要考虑到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和方法与整个研究过程的匹配性。

要 点

- 收集观察和媒介资料的各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优点和缺点。
- 所有的方法都为参与者展现他们的经验和观点提供了空间。
- 同时,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以特定方式对研究内容进行结构化。
- 在采用某一具体的方法之前,以及在应用这一方法期间,研究者都应该再检验一下,这一方法对于回答研究问题而言是否合适。

练习 21.1

1. 请您从发表的文献中找出一项采用媒介资料收集方法的研究,并且思考一下,这里所用的方法是否适合研究的问题和参与者?
2. 请您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您使用这种方法来收集媒介资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拓展阅读

Bergmann, J./Meier, C. (2000). Elektronische Prozeßdaten und ihre 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29-437.

Denzin, N.K. (2000b). Reading Film—Filme und Videos al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Erfahrungsmaterial.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16-429.

Harper, D. (2000b). Fotografien al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a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02-416.

Heath, C./Hindmarsh, J. (2002). Analysing Interaction: Video, Ethnography and Situated Conduct. In: T. May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London: SAGE, S. 99-120.

Mann, C./Stewart, F.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London: SAGE.

Prior, L. (2003). Using Documents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第六部分　从文本到理论

在前面各章中，本书主要介绍了质性研究中生成资料的方法。接下来，本书重点介绍一下分析资料的方法。这里的介绍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研究者需要将观察的内容、受访者所说的话或所叙述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供分析所用。第22章“资料的记录”介绍了如何运用在观察中所做的实地记录和对访谈和互动所做的转录（Transkription），并且就如何反思研究过程中的这些（并非仅仅是）技术性的步骤提出了建议。第23章介绍了对资料进行编码及分类的各种技术。这些技术所采用的共同策略在质性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在对资料进行分析中，辨别和确认重要的段落和文本部分，并按照在这里发展出来的范畴和类型对这些段落和文本部分进行命名和分类。接下来的第24章与第25章介绍了另外一种分析策略以及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这种分析策略旨在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理解文本和资料，即：分析它们内在的结构（或顺序性次序），并且在诠释文本和资料时将这一内在的结构（或顺序性次序）考虑在内。会话分析与话语分析旨在表明，谈论的主题和内容是如何通过人们谈论它们的方式得到建构的，或者是如何通过话语生成的方式（如媒体展现及受众者的反应等沟通形式）得到建构的（第24章）。叙事分析和注释学分析旨在根据主题意义在展示中被展开的方式和层次来理解文本（第25章）。近年来，用计算机软件来分析质性资料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运用。第26章分析了使用这种软件程序以及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电脑的潜力和局限性。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27章）对资料分析的不同方法和技术进行了概括总结。

资料的记录 22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对观察进行记录的不同方式。
- 熟悉转录的可能性和问题。
- 认识到不同的记录方式对所记录内容的影响。
- 理解资料记录这一步骤在研究进程中的重要性。

前面各章已经介绍了在质性研究中有针对性地收集或生成资料的核心方法。在对通过这些方法所获得的资料进行诠释之前，研究者必须对这些资料进行记录和加工处理。以访谈资料为例，加工处理的关键步骤在这里就是将访谈中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并随后加以转录。对观察而言，加工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是将观察到的行为和互动记录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将资料生成的过程记录在情境记录报告、研究日记或实地记录中来对陈述和行为方式进行情境性补充和充实，应该是资料收集工作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步骤，所研究的内容就被转化成了文本，而这一文本则构成之后实际分析的基础。本章在下面介绍一下记录所收集资料的各种备选方法。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比如进行诠释和推广化），这些记录的结果将取代所研究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内容成为分析的基础。记录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将资料记录下来、对资料进行加工处理（转录）、在生成的文本中或通过生成的文本建构一个“新”现实。总地来说，记录过程是在研究过程中建构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录资料的新方法及其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完善的（声音的以及视听的）摄录手段对质性研究的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它的创新和发展。取得这一进步的一个前

提条件便是相关的摄录设备(录音机、MP3、小型磁盘与录像机)在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这样一来,对于受访者以及那些自己的日常生活被观察和记录的人来说,摄录设备变得不再陌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往那种不寻常的特征。正是因为这些摄录设备的存在,有些分析方法才有可能得到使用,如会话分析或客观注释学(参见第24章和第25章)(更多信息请参见 Bergmann 1985)。

对自然情境的录音和录像

使用摄录设备进行记录让人们对资料的记录不再依附于观察者(研究者以及被研究对象)的视角。人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对事件的自然主义式的记录,甚至可以实现一种“自然的设计”(Nothdurft 1987):访谈、日常谈话或者咨询谈话被录音机或摄像机记录下来。研究者希望,在自己向研究对象解释清楚这种记录的目的和意义,并且争取到他们基本的许可之后,被研究者会很快忘记正在运行的摄录设备,从而让会话像是在“自然的”情况下一般发生——即使是在涉及棘手的问题时也是如此。

摄录设备的存在与影响

如果研究者能够将摄录设备的显性存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上提到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为了尽可能地接近自然情境,研究者应该将摄录设备的使用局限于收集那些对研究问题及理论框架来说必不可少的资料:如果使用录像与使用录音相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记录下更多的内容时,研究者应该首先选择相对而言更加不显眼的录音设备。无论如何,研究者在记录时都应将记录限定于对研究问题而言绝对必须的内容——这里所指的既包括记录资料(谈话)的数量,也包括记录资料的全面性。

例如,在咨询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请求咨询师同意他用录音机将咨询师与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在那些经常使用这种录音记录(比如说出于监督的目的)的机构中,研究者的录音记录可能对所录制的内容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干扰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排除以下的可能,即:摄录会影响到参与者的谈话。特别是当研究者出于技术上的原因需要待在研究现场时,这种影响会加大。因为录像需要作出更加复杂的安排,并且允许研究者更加广泛地洞察所研究的日常生活,因此,录像可能会遭遇到被研究者更多的怀疑和保留态度。这就让摄录工作融入所研究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对记录之自然性的质疑

人们可以在质性研究领域找到一些有关这些新的记录技术的反思。这些新的记录方式已经取代了访谈者或观察者以往主要使用的做笔记的记录方式。在 Hopf(1985,第93-94页)看来,虽然这些新的记录方式与以往那些“不可避免地更具筛选性的记忆式记录”相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来对诠释进行主体间检验(……),将访谈者和观察者在诠释中的影响考虑在内(……),并且带来了理

论上的灵活性”。但是，这种新赢得的灵活性会带来一种“新型的质性资料囤积”，因为研究者有可能会“推迟做出有关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的决定”。

此外，这些新的记录方式也与一些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如：研究伦理方面的问题、摄录形式导致所研究情境发生改变的问题①，以及被研究者匿名性降低的问题（参见 Bergold/Flick 1987，第 13-15 页）。Hopf 针对这些记录质性资料的新方式所表达出的矛盾心理表明，我们不应该将此看作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应该在“质性技术影响评估”的意义上对此加以详细地分析，在此也要考虑到那些被这些新的记录方式所排挤掉的方法。

实地记录（Feldnotizen）

质性研究中传统的记录工具是研究者所做的笔记（Emerson et al. 1995；Lofland/Lofland 1984；Sanjek 1990）。访谈中所做的笔记应该包括受访者的回答要点以及有关访谈进展的信息。正如提示框 22.1 中所描述的典型的记录技术及其问题和解决方法所表明的那样，参与式观察者要不断地中断他的参与，以便将重要的观察记录下来。

提示框 22.1　实地记录的实践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研究实地停留有限的时间，或许是两到三个小时。当我们能以合适的方式离开现场时，我们就会马上直奔打字机或者口述录音机。如果我们不可能离开的话，我们一旦有间歇就会马上做些简要的有助于记忆的笔记，并在此后尽快地进行全面地记录。对实地笔记的记录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如何对所看到和听到的事件以及访谈者的印象或诠释加以区分的问题。作为专业人员，我们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里存在的记忆方面的陷阱以及容易将事实与猜想相混淆的问题。因此，我们努力做出清楚地区分，或者是明白无误地将它们叙述出来，或者是发展一套记号体系来保证做到这种区分。如果口述资料是在引号之中，那就表示，这里是完全准确地复述；撇号中的口述资料表示这里正确复述的肯定性较低一些或者只是自由的复述；而没有任何记号的口述材料则表示这里并非是原话的引言，而是恰当的复述。最后，访谈者的印象或结论可以通过使用单括号或双括号将其与实际观察区分开来。尽管这一记号体系被大量使用，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强迫自己一直都使用它。

出处：Strauss et al.（1964，第 28-29 页）

---

① 在 Bergmann（1985，第 317 页）看来，“对一个社会事件的视听录制绝不纯粹是描述再现，尽管它乍一看来似乎如此。准确地说，在它的时间操控性结构之中（in ihrer zeitmanipulativen Struktur）基本上包含着一种建构性的内容”。因此，一个谈话一旦被拍摄下来之后，就摆脱了其一次性的时间进展，可以反复地得到倾听。然后，人们可以以超越当时参与者日常感知的方式将谈话分割成特定的部分（例如，参与者的非言语信号）并加以分析。不过，这不仅能够带来新的认知，而且还会建构出该事件的一个新的版本。从某一时刻开始，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感知不再由其原始的、自然的进展来决定，而是由人们对它人为地、细节化地展现来决定。

Lofland/Lofland(1984)提出了一条基本的规则，即：这种记录应该尽可能地马上进行。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要退出实地。而这种做法可能会给研究者与研究实地中的互动伙伴的关系带来一定的人为性影响。特别是在行动研究中，即当研究者不只是对实地中的事件进行观察，并且想要亲身参与其中时，保持这种用于研究的自由空间往往会十分困难。另外的一种做法是在结束每次实地接触之后再将印象记录下来。Lofland/Lofland(1984，第 64 页)建议观察者要以“修道院式的严格”(klösterliche Strenge)遵守在实地接触之后马上进行记录的戒律，并且要做到花多少时间观察就花同样多的时间进行仔细地记录。在记录中，研究者需要注意做到的是，他即使是在之后(或许是很久之后)也仍然能够区分出来，哪些是观察的内容以及哪些是观察者诠释性或总结性的概括浓缩(参见第 28 章中有关记录的程序性、可靠性的内容)。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的增加，研究者会形成记笔记的个人风格。

总地来看，最迟是在实地记录这里便已经开始了在文本中生成现实(Herstellung der Wirklichkeit im Text)。这里的现实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者有选择性的感知与展示的影响。筛选性不仅涉及在笔记中被忽略的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也涉及被记入笔记的内容。正是通过记录，研究者才令事件摆脱了其日常进展的转瞬即逝性，将它变成一个研究者、诠释者与读者可以一再分析的事件。为了降低或至少是缓解记录的这种筛选性，可以让被研究对象同时写下日记或日常记录作为对研究者所做记录的补充。这样一来，被研究者的主观见解就进入了所收集的资料，供研究者分析所用。研究者在分析资料时可以将自己的笔记与这些由被研究者生成的资料进行对比。另外一种降低或缓解研究者记录的筛选性问题的办法是以图片资料或者草图、地图及其他的视觉资料进行补充。还有一种可能是使用电子笔记本、录音笔或其他的设备来做记录。

相应地，Spradley(1980，第 69-72 页)提出了四种以实地记录的方式来做记录的形式：

- 以关键词、句子、谈话中的引言等形式进行浓缩式的描述。
- 对访谈及实地接触中的印象进行详细的记录。
- 实地研究日记，它就像日记一般包含着“在实地工作中出现的经验、想法、担心、错误、困惑、重大突破和问题”(Spradley 1980，第 71 页)。
- 有关分析与诠释的记录，对它们的记录须在实地接触后随即开始，并一直延续到研究结束。

研究日记

特别是当有多个研究者参与研究时，就有必要将正在进行的研究过程记录下来，并对此进行反思，以便提高研究者实证研究程序和所做记录的焦点的可比性。让所有的参与者不断撰写研究日记是做记录的一种方法。研究者应该在研

究日记中记录下接近实地的过程，与研究实地或受访者接触的经验和问题以及使用特定研究方法的经验和问题。此外，研究日记还应该包括从各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诠释、评估、推广和展示研究结果中重要的、不重要的或者丢失的内容。将对这些内容的记录与其中包含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可以使研究过程更具有主体间性和明确性。此外，它们还可作为“备忘录”(Memos)被用于发展扎根理论(Strauss 1991)。Strauss 就建议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进程中书写备忘录，这些备忘录应该直接进入理论形成的过程。以这种形式进行记录并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也不只是会带来新的认知，而且同时有助于对研究过程进行反思。

这里已经介绍了几种将研究者感兴趣的事件和进程、陈述和进展“捕捉”下来的方法。就记录活动对所研究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干涉性影响而言，研究者应该在做决定时遵循以下的**节约性原则**(Sparsamkeitsregel)：只记录那些对于回答研究问题而言所必须的内容。研究者应该尽量避免过多地将“技术装备”带入收集资料的情境之中，除非是研究者的理论兴趣要求他必须要这样做。限制记录设备的显性存在以及尽可能全面地向研究参与者解释清楚进行这种形式的记录的目的和意义，可以提高研究者真正看到自然情境下的日常行为的可能性。如果对于研究问题而言使用“老式的”记录形式(如对回答和观察的记录)就已经足够的话，那么，本书建议采用这种记录形式就可以了。不过，研究者在这里应该尽快以及尽量全面地进行记录，特别是对于有关研究实地的印象和在这里出现的问题而言更需如此。

记录表

在进行访谈时，使用记录表(Dokumentationsbögen)将收集资料时的环境和情况记录下来被证明是一种有意义的做法(参见 Witzel 1985；Flick 1996)。记录表应该包含的信息一方面是由研究的设计决定的，例如，是否有若干访谈者参与或访谈是否是在不同的地点进行，而这些因素被认为会对访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的问题决定着应该在记录表中具体记下哪些信息。提示框 22.2 中的例子来自于一项对日常生活中科技变迁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有多个访谈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对不同职业背景的人进行了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的工作情况以及科技对于他们的童年和自己家庭中的子女教育的影响和科技的一般性影响。因此，这里的记录表应该包括与此相关的明确的情境信息。

提示框 22.2　记录表的范例

有关访谈与受访者的信息

访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谈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谈持续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谈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访者的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访者的性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访者的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访者的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何时起从事现有职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领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长地（农村/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性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访谈进展中的特殊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转　录

如果资料是通过技术设备被记录下来的，那么，在对其进行诠释之前必须要将其转录为文字。在转录时可以采用精确程度不同的转录体系（作为概论可参见 Kowall/O'Connell 2000）。人们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确立下来单一的标准。在语言分析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在对发言和停顿的区分中和在对它的呈现中争取达到最大限度的精确性。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着转录程序合适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精确测量的理念有可能悄然渗透到诠释性社会科学领域。此外，提出转录规则有可能会将人们引向一种依赖规则的拜物教（Fetischismus），从其与研究问题和研究成果的关系来看，这种拜物教是不合理的。因为语言学或会话分析研究的焦点在于语言的组织，所以，对于此类研究来说，有必要在转录中达到很高的精确性。而对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问题而言，因为语言交流只是用来研究特定内容的媒介，因此，过度夸大的精确性标准仅仅是在少数情况之下才是合理的。在这里，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来确定转录的内容和精确性标准，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就行了（Strauss 1991）。这是因为：第一，过于精确的资料转录往往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如果投入到资料诠释工作中会更有价值。第二，转录的精确性过高会导致转录稿变得难以令人一目了然，这有时不仅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转录内容的信息与含义，而且还会造成障碍。

因此，Bruce（1992，第 145 页，这里引自 O'Connell/Kowall 1995，第 96 页）指出：

> 以下几个一般性的准则可以作为评估口语资料转录体系的出发点：可操作性（对于转录者而言）、可读性、可学习性，以及可诠释性（对诠释者和电脑而言）。人们有理由认为，一个转

录体系应该易写、易读、易学及易搜寻。

除了有关转录陈述、发言者的变换、停顿、句子中断的明确规则之外，对照着原始记录再度对转录稿进行检查以及对资料进行匿名化处理（人名、地名及时间）都属于是转录程序的核心组成部分。会话分析（参见第24章）中的转录常常被当作是社会科学中转录的模范。Drew（1995，第78页）提供了一份“转录惯用记号表”，研究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问题并且在考虑到以上提到的一般性准则的前提下使用这一转录惯用记号表（提示框22.3）。

提示框22.3 转录惯例

[	重叠的发言：准确地标示出在哪个地方上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还在发言时便开始发言，或者是在哪个地方上两个人同时开始发言，从而造成了重叠的发言。
(0.2)	停顿：既指发言者在发言中的停顿，也指发言者变换中间的停顿，以秒为单位标出。
“Aw:::”：	拉长的声音：用冒号表示被拉长的声音，声音拉得越长，冒号就越多。
词语：	下划线表示重音或强调。
“Fische-”：	连字符表示一个单词/声音被中断。
“.hhhh”：	表示可听得见的吸气声（“h”的数量与吸气的长度成比例）。
WORT：	大写字母表示音量提高。
(Worte……)：	括号表示转录者对括号中的转录内容不肯定，包括自己的“最佳猜测”。

出处：Drew 1995，第78页，有修改

提示框22.4中列出了另外一种转录访谈的形式。在转录时应该标明行号并在页边留足做笔记的空间。

提示框22.4 转录规则

版面设置

文字处理	WORD 97
字体	Times New Roman 12
边距	左2，右5
行号	5，10，15等，每页重新计数
行间距	1.5
行对齐	向左对齐
页码标示	置顶，右侧
段落格式	缩进1厘米
页眉	访谈编号
访谈者：	I：访谈者（Interviewerin）
受访者：	IP：受访者（Interviewpartner）

转录

正字法	经过整理的，如果需要的话，可用方言

标点符号用法	传统的用法
停顿	短暂停顿用“ * ”表示； 超过 1 秒钟的停顿用“ * 停顿时间 * ”表示
不理解的话	((不理解的话))
不确定的转录	(abc)
大声	用评注标明
小声	用评注标明
强调	用评注标明
单词中断	Abc-
句子中断	Abc-
含糊不清的发音	./.
元音长读	./.
辅音长读	
同时发言	#abc#
乐谱(Partitur)	./.
辅助语言表达	用评注标明
评论	用评注标明
谈话的辅助表达	./.
口头援引	传统的用法
缩略语	传统的用法
数字	写出，年份用数字表示
匿名化处理	在名字后加“°”
其他	./.

如果将这些转录规则用于对访谈的转录，就会产生诸如提示框 22.5 中的转录稿。

提示框 22.5 转录文本范例

1 I：好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健康对您而言是什么？((电话铃响))您想
要先接电话吗？
IP：不。
I：不？好吧。
5 IP：我认为，健康是相对的。尽管年老并且有残疾，他仍然感到自己健康，这样的人也可以是健康的。要是在以前呢，即在我到社区工作之前，我可能总是会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家庭里，一切都正确，超级的准确，可以说是绝对的干净，他就是健康的”。但是当我开始在社区工作后，我改变了认识，当时是 1981 年，在此之前我在(某医院的名称)的特护病房当护士，所以说，我是带着完全不同的观念来这里工作
10 的。因此，首先还必须要学习如何应对这一切……

I = 访谈者； IP = 受访者

在质性网络研究中(参见第20章),访谈或焦点小组中的回答、陈述或叙述是以书面的或电子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这里省去了转录这一步骤。对于视觉资料(参见第18章)而言,除了要将信息内容记录下来之外,还要考虑到以图像的方式对社会情境及其背景所做的更加复杂的展示和记录。

现实作为文本——文本作为新的现实

通过对资料和补充笔记的记录以及对记录的转录,研究者将研究所关注的现实转化为文本,由此产生了有关研究实地的故事(Van Maanen 1988)。对过程和陈述的书面表达至少会形成一种有关该事件的特定版本。每一种形式的记录都会对记录内容进行特定的组织。对社会现实的转录受到技术条件和局限性的影响,并会在文本的层面上生成特定的结构,让人们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到转录的内容。记录让一个事件摆脱其转瞬即逝的性质(Bergmann 1985)。研究者个性化的记录风格使得研究实地成为一个经由人们所展现出来的研究实地;通过选择转录的精确性的程度,事件的形态被分解为大量的特定的细节。对于接下来的诠释过程而言,这意味着:

> 这样一来,现实便以实体化的形式,作为文本,或者——用技术上的术语来说——作为记录稿呈现给科学家。脱离文本,科学便失去了其有效性,因为只有当事件被记录下来或者留下痕迹并且经过诠释之后,研究者才能提出科学的陈述。(Garz/Kraimer 1994,第8页)

这种以文本形式对现实的记录一方面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理解研究实地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该过程的结果,以文本形式对现实的记录也可以被视为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在文本中对现实的建构在做实地记录和转录时便已经开始了。这样生成的新的现实是研究者在接下来的诠释中唯一可以使用的现实(版本)。视各种诠释方法的不同,研究者相应地会对文本进行或多或少仔细的处理。在这种处理中,研究者应该考虑到这里发生的建构。

对事件或多或少全面的记录,对原始背景的记录以及转录都会以特定方式对资料进行组织。只有通过尽可能地从内部来分析对事件的描述或者该事件的进展,才有可能实现理解的认识论原则。对资料的记录需要足够的准确,以便于可以发掘出其中的结构。同时,对资料的记录必需要让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通常来说,对资料进行组织时要实现的目标是将事件及其结构和独特性记录下来。这样,研究者才可以重构事件的情态,分析以及分解事件的结构(按照什么规则运行、作为其基础的意义、构成事件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文本以特定的方式建构了所研究的现实,并使其成为诠释程序中的实证资料。

要　点

- 在研究过程中，对资料的记录并非仅仅是一个技术性步骤。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供诠释所用的资料的质量。
- 现代化的记录科技改变了记录的可能性，同时也改变了质性研究资料的特征。
- 在资料分析中，转录是重要的一步，不过，不应该让转录对精确性的过多(有时是没有必要的)关注支配研究过程。
- 实地记录和研究日记同样可以提供有关研究过程的有价值的信息。

练习 22.1

1. 请您用录音机将人们的交流记录下来，然后对录音进行转录，转录一到两页就可以了。请您对比录音和转录后的文本。
2. 请您前往一处公共场所并观察那里发生的事情。在观察了 10 分钟之后，请您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将您所观察到的内容记录下来。请您思考一下在这个小练习中出现的问题。

拓展阅读

实地记录

Emerson, R., Fretz, R./Shaw, L.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anjek, R. (Hrsg.)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转录

Dittmar, N. (2002). Transkribieren—Ein Leitfaden für Forscher und Laien (2. Aufl.). Wiesbaden: VS-Verlag.

Kowall, S./O'Connell, D. C. (2000). Zur Transkription von Gespräch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37-447.

编码和归类 23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对实证资料进行编码的不同方法。
- 能够使用开放式编码、轴向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程序来分析自己的资料。
- 能够辨别主题编码的不同。
- 理解质性内容分析的技巧以及总体分析的准备步骤。
- 能够大体上了解编码和归类方法的可能和局限。

诠释资料是质性研究的核心，其重要性视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客观注释学（参见第25章）以及会话分析（参见 Bergmann 1985；本书第24章）这里，诠释资料有时是唯一的实证性程序，因为资料收集仅是简单地限于对自然情景的记录。而在其他一些研究方法那里，诠释资料则属于次要的步骤，用在或多或少精心设计的资料收集技术之后，例如质性内容分析或有些分析叙事资料的方法。在 Strauss（1991）所提出的方法中，诠释资料是实证工作程序的核心。不过，实证工作程序在这里也包括明确的资料收集方法，如访谈或观察。在他提出的方法中，对文本的诠释服务于发展理论，同时也是决定另外尚需收集哪些资料的基础。因此，研究者在这里放弃了线形的收集资料和诠释资料的过程，以一种相互交织的程序取而代之。对文本的诠释可能会追求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第一，揭示、发掘或将文本中的陈述加以情景化。这往往会导致文本资料的增加，关于原始文本中短短的段落可以撰写出多页的诠释。第二种策略则旨在通过总结和归类等手段对原始文本进行缩减。这两种诠释策略既被人们单独使用，也被人结合起来先后使用。总地来说，人们可以在此区分两种不同的分析文本的基本策略：第一，以归类和（或）发展理论为目的对资料进行编码；第二，以重构案例的结构为目的、或多或少严格实施的顺序分析。后一种策略在第24章和第25章进行介绍。

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theoretisches Kodieren)是一种分析资料的程序,用来分析以发展扎根理论为目的而收集的资料。这一程序由 Glaser/Strauss(1967/1998)提出,并经由 Glaser(1978),Strauss(1991)以及 Strauss/Corbin(1990/1996 及 1998)等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本书在不同地方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一程序中,人们不应孤立地看待对资料的诠释,将其与对资料的收集和抽样相隔离。对资料的诠释是做出以下决定的立足点,即:接下来应该将哪些资料或案例纳入分析,应该如何或者说以何种方法来收集它们。就诠释过程而言,人们还可以在此区分出分析文本的不同"程序",即:"开放式编码"(offenes Kodieren),"轴向式编码"(axiales Kodieren)和"选择式编码"(selektives Kodieren)。人们不应该将这些程序(错误地)理解为是彼此之间明确隔离开的工作程序或者是在时间上明确隔开的工作过程的阶段。确切地说,作为分析文本资料的不同程序,研究者可以结合使用它们并根据需要交替使用。不过,诠释过程要以开放式编码开始,而在整个分析过程的最后阶段则主要采用选择式编码。编码在这里被理解为是"拆解资料,将其概念化并以新方式进行重组的操作方式(……)。编码是从资料中发展出理论的核心过程"(Strauss/Corbin 1990/1996,第 39 页)。

根据以上这种理解,编码(Kodierung)包括不断地对现象、案例和概念等进行比较以及针对文本提出问题。编码的过程应该从资料出发,通过抽象的过程实现对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将概念和代码(Kodes)分配给实证材料,这些概念和代码最初应该尽可能地贴近文本,之后再不断变得更加抽象。在这一程序中,归类(Kategorisierung)指的是将这些概念总结归入上级概念,找出概念与上级概念以及范畴和上级范畴之间的关系。对理论的发展包括提出范畴和作为概念网络的理论以及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关系既可以是(等级性的)上级范畴和下级范畴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处于同一等级层次上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过程中,研究者的印象、联想、问题和想法等都被记录下来,它们或者是被记录在编码笔记(Kodenotizen)中,作为对所找出的代码的补充和说明,或者,更广泛地说,被记录在备忘录中。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旨在用概念来标示资料和现象。为此目的,研究者首先要拆解资料("分割",参见 Böhm et al. 1992):陈述被分解为意义单位(单个的词或者短的单词序列),配以相应的注解和(更主要的是)"概念"(代码)。以下取自于 Flick/Niewiarra(1994,第 23 页)的范例对此进行了说明,它涉及对健康的主观定

义以及这里给出的最初的编码(参见提示框23.1)。①

提示框23.1 关于分割和开放式编码的范例

那么-我[1]/个人[2]/对健康[3]/的联想[4]/是:人体组织[5]/完全能正常运作[6]/,包括所有[7]/蕴含在其中的[8]/有机体[9]/的生物化学过程[10]/,所有的循环[11]/,当然还有[12]/我个人[13]/以及一般人[14]/的精神状态[15]/……

1/开场白,开始

2/强调与自己的联系,与他人划清界限,这是当地典型的套话吗?他不需要事先寻找

3/参见4,抓住了研究的问题

4/建立联系

5/保持距离的,普遍的,与开场白(宣称是个人想法)相互矛盾,教科书,谈及人类,但将其视为机械

编码:机械化的人类观

6/技术的,熟练的,技术性教材表达,机械模型,标准化,标准思考,标准化要求(谁不能完全正常运转,就是病了)

编码:能正常运转,规范性要求

7/完全的,全部包括在内的,最大化的,不做区分,平衡状态

8/监禁,封闭的系统,存在着在外的东西,被动的,外部控制的,被包含在内者的内在动力

9/参见6

10/教科书范畴

11/全面的,机械模型,自我调节的封闭体系,按规则运行,混乱的对立面

编码:机械性的—肉体的健康观念

12/补充,和之前所讲内容对立的新观点,健康概念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区别的内容

编码:多维性

13/谈及个人,但立刻又保持距离,非常客观地讲述涉及自身的事情,避免太接近采访者和自己

编码:在个人层面与普遍层面之间摇摆

14/普遍意义上的,抽象的人类形象,规范性,更容易看出独特性

编码:距离

15/机械性的,带有消极意味,不良状况,静态的(“他的状态究竟怎样?”)

出处:Flick/Niewiarra 1994

这种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用来分析访谈或者观察记录的全部文本,而应被用于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或者十分不清楚的文本段落。通常来说可以从文本开头开始分析。这一程序有助于研究者获得对文本更加深刻的理解。Charmaz建议逐行进行开放式编码,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将自己的动机、恐惧或未解决的个人问题投射到被研究者和收集到的资料中”(2003,第94页)。Charmaz针对这一程序提供的一个具体范例,请见提示框23.2。

① 斜线把访谈段落分割为不同的片段,右上角的数字是对各个片段的编号,在其后面给出了对各个片断所作的笔记,其中部分笔记导向了代码的提出,也有部分笔记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由于不大适合而被忽略。

提示框 23.2 逐行编码的范例

编码	**文本**
……症状的转移,不稳定的日子	如果您得了狼疮(Lupus),我是说,某一天是我的肝脏,另一天是我的关节,在第三天是我的脑袋,
诠释他人传递的自我形象	而且如果不停抱怨各种病痛的话,人们会觉得你是一个自己怀疑自己患病的患者……
避免公开	就像是人们什么也不想说,因为人们开始去想,您知道的
向他人隐瞒	"天哪,别靠近她,她只会抱怨。"
将症状视为是相互联系的	我想,这就是我不说的原因,因为我认为,我的一切都在某种方式上跟狼疮有关。
预料到别人难以置信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有狼疮,
检查他人看法	就算是知道的,也不会相信,我现在的十种不同的病痛都是源于同一种疾病。
避免被人打下标记	而且我也不希望,有人会说,
估计公开后可能的损失和风险	您知道的,他们不想跟我接触,因为我会抱怨。

出处:Charmaz 2003,第 96 页(有所更改)

在这里有时会产生数百个编码代码(Strauss/Corbin 1990/1996,第 47 页)。在下一步,研究者会围绕着在资料中发现的对研究问题特别重要的现象对这些代码进行分组和归类。通过这种方式所产生的范畴(Kategorien)再次得到编码,不过,这里使用的编码要比第一步中的编码更加抽象。在这里,这些给出的编码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恰当地反映出该范畴的内容,特别是要能够帮助研究者回忆起该范畴的内容。用来对编码进行命名的概念有不同的来源,既可以是引自(社会科学的)文献(建构的编码),也可以直接采用受访者的陈述(内在的编码)。研究者应该优先使用后者,因为它们更贴近研究材料。通过这种方式找出的范畴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此,研究者需要指出属于该范畴的特性及其维度,也就是说,将这些特征定位于一个特征连续体之上。这有助于在内容上更详细地对该范畴进行定义。

> 让我们来看一下"颜色"这一范畴。它的特性包括:深浅程度、强度、色调,等等。每一个特性都可以被维度化,也就是说,每个特性都会沿着某一个连续体而变化。比如颜色的强度可以由低到高而变化,色调可以从暗到亮而变化,等等。(Strauss/Corbin 1990/1996,第 51 页)

人们可以以不同的详细程度来使用开放式编码。人们可以对一个文本进行逐行、逐句或逐段的编码,也可以将一个编码用于整个文本(一个记录或者一个案例)。选取哪一种方法取决于研究问题、材料、编码者的个人风格以及在研究过程所处的阶段。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了编码的目的:拆解和理解文本,提出和发展范畴,并逐渐地将这些范畴纳入一定的秩序。Stauss/Corbin(1990/1996,第 54-55 页)对开放式编码作出了如下的概括总结:

概念是构成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开放式编码指的是扎根理论中的一种分析过程,研究者通过这一过程来确认和发展概念及其特征和维度。实现这一目标所用的基本的分析程序是:针对资料提出问题,比较每个事件、突发情况和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研究者将相似的事件和突发情况进行命名并对其归类以形成范畴。

开放式编码的结果应是一份编码代码和范畴的清单,并附有编码笔记和大量的备忘录。编码笔记用来解释和定义编码代码和范畴的内涵,备忘录则包含着材料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和对有待发展的理论而言重要的想法。

无论是对于开放式编码而言,还是对于其他的分析策略来说,研究者都应该定期地对文本一再提出下列问题(W 类问题)(Strauss/Corbin 1990/1996, 第 57 页;Böhm 2000, 第 477-478 页):

- **什么**(Was):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谈及了什么现象?
- **谁**(Wer):哪些人和行为者参与了? 他们在此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们如何进行互动?
- **怎样**(Wie):现象的哪些方面被提及(或者没有被提及)?
- **什么时候**(Wann),**多久**(Wie lange),**哪里**(Wo):时间、经过和地点。
- **多少**(Wie viel),**多强**(Wie stark):强度方面。
- **为什么**(Warum):哪些原因被提及或者说可以被推断出来?
- **目的何在**(Wozu):有什么意图和目的?
- **通过什么**(Womit):为了达到目的所使用方法、战略和策略。

通过提出这些问题,文本得到了分析。研究者可以针对个别段落,也可以针对整个案例提出这些问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可用来进一步说明范畴的维度和内涵的方法还有:在某一维度的极端情况之间进行比较("突变策略",Flip-Flop-Technik;Strauss/Corbin 1990/1996, 第 64-66 页),与其他情境中的现象进行对比以及不断质疑那些看来是自然而言的事情("摇摆红旗策略";参见 Strauss/Corbin 1990/1996, 第 70-71 页)。

轴向式编码

编码程序的下一步骤是对在开放式编码中形成的范畴加以精炼(verfeinern)和区分。在这里,要从已有的范畴中选择出一些最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范畴。研究者将这些主轴范畴(Achsenkategorien)与尽可能多的、与它们"相符"的文本段落联系起来,使之变得更加丰富。前面提到的问题和比较在精炼范畴时再度发挥作用。最后要提出这些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主要是阐明或者确立范畴和下级范畴之间的关系。为了便于表述这些关系,Strauss/Corbin(1990/1996,第 78 页)提出了一个"编码模式"(Kodierparadigma),如图 23.1 所示。

这个非常简单同时又非常具有普遍性的模型有助于表明现象、其原因和结果以及其情境以及参与者在此使用的策略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中所包括的概念可能对某一个范畴来说是现象,而对另外的范畴来说则是情境或者影响条件,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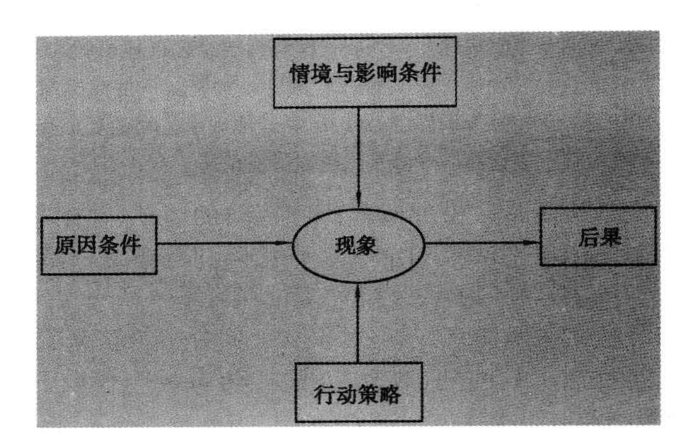


图 23.1　编码模式

其他的范畴来说又可能是后果。这个编码模式仅仅是指出了现象和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旨在帮助发现和确立现象之间、概念之间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秩序。另外,作为补充,研究者在这里也可以运用上述针对文本提出的问题和比较策略。研究者要不断地对照着文本和资料来验证这样提出的关系和被视为重要的范畴。在这里,研究者会越来越多地在归纳思维(从文本中提出概念、范畴和关系)和演绎思维(对照文本验证这些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关系,尤其是要对照着另外一些段落或案例,即那些并非是从它们中提出这些概念、范畴和关系的段落或案例)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变换。与此相应地,轴向式编码可被概括如下:

> 轴向式编码是将下级范畴与主范畴联系起来的过程。这是一个由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所构成的复杂过程,包括多个步骤。和开放式编码一样,完成这些步骤也是通过进行比较和提问的方式。不过,在轴向式编码这里,对这些程序的使用是更加聚焦的,旨在按照编码模式提出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关系。(Strauss/Corbin 1990/1996,第 93 页)

在轴向式编码这里,研究者先从既有的编码及与此相关的编码笔记中选出对研究问题而言特别重要的范畴。然后,研究者再从文本中找出与这些范畴相符合的尽可能多的、不同的文本段落作为证明,以便于凭借着上面提到的问题对主轴范畴进行加工和完善。之后,研究者通过运用上述编码模式的要素找出不同的主轴范畴之间的关系(目的—手段—关系、原因—后果—关系、时间或空间关系),并整理出中期结果(参见 Böhm et al. 1992,44-45 页)。

编码家族

作为对实证资料进行编码的一种工具,Glaser(1978)提出了一份基础编码清单,并将这些基础编码概括总结入编码家族(Kodierfamilien)(参见表 23.1)之中。这些编码家族既可以用来定义编码代码,同时也可以用作在某一资料记录中寻找新编码代码的参考。

表 23.1 编码家族，根据 Glaser（1978，第 75-82 页）和 Böhm（2000，第 481 页）

编码家族	概　念	范　例
C—家族	原因（causes），后果（consequences），关系（correlations），条件（conditions）	体验到病痛的条件
过程—家族	时期，阶段，进展，经过，顺序，生涯经历	慢性疼痛患者的生涯经历
程度—家族	规模，程度，强度，极限值，水平，临界值	体验病痛的程度
类型—家族	类型，种类，类别，原型，分类	疼痛的种类（刺人的、迟钝的、搏动的疼痛等）
策略—家族	策略，战略，技术，机制，管理	应对疼痛的策略
互动—家族	互动，相互作用，对称，仪式	疼痛体验和应对疼痛的努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认同性—家族	认同性，自我，自我概念，认同性改变，他人形象	疼痛患者的他人形象和自我形象
质性飞跃—家族	界限，临界点，质性飞跃	疼痛患者的疼痛变成慢性的开端
文化—家族	准则，价值，社会共享的态度	疼痛患者有关承受痛楚的价值体系，“感觉规则”
共识—家族	协议，协调一致，情境定义，一样，一致，均一性	遵守医生的指示，服从

选择式编码

作为第三个步骤，选择式编码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度水平之上继续进行轴向式编码。这一步骤的目的在于找出核心范畴（Kernkategorie），其他那些已经提出的范畴可以围绕着核心范畴得以归并和融合。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提出或者撰写出案例的故事（Geschichte des Falls）。Strauss/Corbin 在此所指的案例是整个研究的对象或者研究的核心现象，而并非是某个人或某个访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表述只能包括短短的几句话，因为它要提供的是有关该故事的一个简短的描述性概述。在故事的路线被总结出来之后，分析就会超越这一描述性的层面。研究者会用一个概念来表示故事的核心现象，并将该核心现象与其他的范畴联系起来。无论如何，作为结果应该得出一个核心范畴和一个核心现象。诠释者必须在同样突出的现象之间做出选择，并对此加以权衡，以便于最后得出一个核心范畴及其相关的下级范畴。核心范畴会在特性和维度方面再度得到发展，并通过使用编码模式与（尽可能所有的）其他的范畴联系起来。这里的分析和理论发展的目的旨在发现资料之中的模式以及保障这些模式正确的条件。按照编码模式对资料的归类令（通过这种方式所发展起来的）理论具有明确

性，允许人们做出如下的陈述："在这些条件之下（罗列这些条件）会发生什么，而在其他条件下又会发生什么。"（Strauss/Corbin 1990/1996，第 107 页）

最后会提出理论并且结合资料再度对它进行检验。诠释过程以及对更多资料的纳入会在达到理论饱和时终止，即当进一步的编码和对范畴的丰富和充实不再能够提供新的认知时。同时，这一程序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让研究者带着其他的研究问题来分析相同的原始文本和在开放式编码中得出的编码，以便于发展出有关另一个问题的扎根理论。

案例　与临死之人的互动——意识情境

在第 8 章和第 11 章中提到的关于如何与医院里的临死之人进行互动的研究中（Glaser/Strauss 1965a/1974），研究者发展和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Strauss 1995，第 70 页）。该研究的问题是：与临死之人的互动方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知道患者将要死亡的事实如何影响到与他的互动。具体研究的内容是：临死之人与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医护人员与病人家属之间以及家属与病人之间有哪些互动形式？人们在与临死之人的互动中会使用哪些策略？医院作为社会组织在这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分析最终得出的核心概念叫做"意识情境"（Awareness contexts），指的是每个互动者所知道的有关病人特定病情的信息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他人对他所掌握的相关信息的了解。这一意识情境会随着病人病情的变化以及某个或所有参与者对新信息的掌握而发生改变。研究者在此发现了以下的意识情境类型：封闭意识（病人对自己死之将至一无所知）；怀疑意识（病人对此产生了怀疑）；对相互伪装的意识（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人道破）；开放式意识（病人了解自己病况并且和其他人公开地谈论它）。总地来说，对意识情境的分析包括对意识情境的描述，每个情境中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先决条件（如社会关系），由此产生的互动（包括参与者的策略和反策略），在从一种情境类型过渡到另一种情境类型时互动方式的改变，每个参与者用来促成意识情境改变的措施，以及每种互动形式对于参与者、医院以及接下来的互动的影响。通过比较与这一类型相符的、相互伪装的其他情境以及参与者的不同意识程度，这里的分析可以被发展成为一个有关意识情境的理论。这样的例子比如有"对车辆的买卖"或者"马戏团里小丑的表演"（第 254 页）。通过整合其他此类的领域和扎根理论，研究者可以在此发展出一个有关意识的正式理论。

Charmaz（2003）提出了发展扎根理论的另一种方法。首先进行逐行编码（参见提示框 23.2），然后对由此得出的几个编码进行深入地探测和分析。在提示框 23.2 的例子中，这样的编码就是那两个黑体呈现的编码（"**避免公开**"以及"**估计公开后可能的损失和风险**"）。Charmaz 将第二个步骤称为聚焦编码（fokussiertes Kodieren）。

案例　学习活下去

Juliet Corbin 和 Anselm Strauss 进一步发展了扎根理论的方法，并从 1980 年代起将其运用到护理研究和医学社会学领域的许多研究之中。Corbin/Strauss（2004）在他们的一项研究中用这种方法研究了以下的问题：患者如何体验其慢性疾病，以及他们的家属如何应对这种疾病并成功继续自己的生活。这份研究的实证基础是一系列对患者夫妇的访谈。实施访谈的目的在于确认患者夫妇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便于可以回答以下的问题,即:如何帮助慢性病患者更有效地应对其疾病?早期的扎根理论(如 Glaser/Strauss 1967/1998)并不主张发展有关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或理论理解。与此不同的是,这两位作者在这一研究中全面介绍了他们所使用的理论工具。这些理论工具建立在他们之前研究的基础之上。此项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进展曲线(Verlaufskurve)。它反映的是病情的发展进程以及人们尝试控制或组织这一发展进程的努力。Corbin/Strauss(2004,第 62-64 页)区别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是:严重、正常化、稳定、不稳定、病情恶化以及濒临死亡。作者在其理论框架中分析了家庭的生活安排由于家庭成员的慢性疾病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对当事人与疾病做斗争的生涯历程给予特别的关注。作者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使用了这一理论框架,以便于更详细地分析不同的进程曲线阶段。

这份研究不仅仅是有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对慢性疾病这一研究领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研究之一。而且,它在发展和区分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框架方面也非常成功,超出了此前已存在的克服、适应和压力等概念。作者从他们的实证研究中发展出一个非常精致的概念(进展曲线)来分析被研究者的体验。为此,他们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分析了进展曲线的不同阶段(Corbin/Strauss 2004,第 197 页):可以区分哪些类型的克服工作?这些工作是如何被"完成的"?核心的工作过程和互动发展是如何参与到该工作的完成之中的?哪些传记过程伴随着并影响到这些工作任务?

总地来看,对于如何将 Glaser、Strauss 和 Corbin 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策略应用于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很重要的问题的分析而言,这项研究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典范。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理论编码旨在广泛地解析文本。通过结合使用开放式编码以及逐渐增加的聚焦分析,理论编码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本的内容和含义,而不只是对文本进行意译和概括(这也是下面将要介绍的质性内容分析的主要方法)。对文本的诠释在这里得到了方法上的落实,变得具有可操作性。通过可供使用的多种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在表述方法规则方面的灵活性,理论编码赋予了研究者一定的操作空间。与其他诠释文本的方法所不同的是,它在诠释过程中脱离了纯文本的层次,而去发展范畴、关系和理论。最后,理论编码结合使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来处理文本和范畴,并且对演绎方法的使用逐渐增多(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这里所介绍的诠释文本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其目的旨在发展理论(参见第 8 章)。作为其理论背景,符号互动主义对这一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见第 6 章)。对资料的选取采用的是理论抽样的方式(参见第 11 章)。对资料收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问题、现有理论的发展现状及其中需要弥补的不足。除了这一原则要求之外,该方法并没有确定下来应该采用何种方法来收集资料。推广化的目的在于逐步地发展出扎根理论,并最终提出正式理论。其中,扎根理论应该与资料直接相关,而正式理论的有效性则应该超出其得以形成的原始情境,为此,研究者需要通过纳入其他的情境以及在这些情境中发展出

来的扎根理论来检验这一正式理论。

方法的局限性

特别是对于经验较少的研究者或新手来说，这种编码方法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方法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在这里很模糊，要传授这种方法比较困难。这一方法的优点和长处往往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才会显现出来。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编码和比较的潜在可能是无限的。开放式编码可被用于文本的所有部分，这里所得出的、通常来说大量的范畴全部都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在文本段落和案例之间可以进行无止境的比较，在理论抽样中也可以无止境地纳入新的案例。这一编码方式几乎没有给出如何选择文本段落和案例或者何时终止编码（和取样）的依据和原则。理论饱和原则（Kriterium der theoretischen Sättigung）将此类取样和中止的决定留给了研究者，他要根据至今为止所发展的理论来做出决定。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常常会形成大量的编码以及潜在的比较。研究者可以采取以下的实用办法来解决这种潜在的无限性问题，即不时地停下来总结一下已有的发现，并制作一个优先选项清单：哪些编码必须要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哪些编码不那么具有启发意义？哪些编码对于研究问题而言可以被忽略？接下来的工作便可以按照这个清单来开展。另外，以团队的形式按照该方法来诠释文本，由团体成员共同讨论研究发现并进行相互验证，这不仅仅有助于加强作出以上决定的基础，而且总地来看也被证明是十分有益的。

主题编码

主题编码（thematisches Kodieren）最初是在借鉴 Strauss（1991）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比较研究。在这种比较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而先验组成的团体小组。研究的主题是有关某一现象或过程的看法的社会分布（soziale Verteilung）。作为该研究基础的假设是：在不同的社会世界和群体中可以发现不同的看法。为了检验这一假设并且同时发展出有关群体特有的看法和体验的理论，有必要在根本的地方上修改 Strauss 的方法，以便于提高实证材料的可比较性：取样的着眼点是群体，根据群体的看法对分析是否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来决定，因此，这里的群体是预先确定好的（参见第 11 章），而不是（像在 Strauss 那里）由诠释文本的情况所决定的。此外，在选择具体案例时，理论抽样是在每个群体内部进行的。与此相应地，收集资料所用的方法要具有如下特征：既能够通过事先确定好主题来保证可比较性，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可以让人们对这些主题有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收集资料方法比如说可以是事件访谈，它首先确定好问题领域，然后让受访者在这个领域中具体叙述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情形（参见第 14 章），也可以是提纲访谈（参见第 13 章）。

主题编码的程序

从分析的可比较性来看，主题编码在诠释材料时分为多个步骤。第一步分析的是所选择的案例，研究者通过一系列个案分析对其进行诠释。首先要对每一个案例做出一个简要描述，这一描述在接下来的诠释过程中会不断地得到检验，并在需要时得到修正。该简要描述包括：一句对访谈而言比较典型的陈述（该访谈的主题句），针对研究问题对受访者的简要介绍（例如年龄、职业、子女人数，如果这些与研究主题有关的话），以及在访谈中针对研究主题谈到的中心话题。这一简要描述对于接下来的分析而言首先是具有启发意义。在完成案例分析之后，它（有可能已经过修改）就会成为结果的一部分。提示框 23.3 中的范例来自于一项对不同职业群体有关科技变迁的日常知识的比较研究（Flick 1996）。

提示框 23.3　范例——对一个案例的简要描述

“对我来说，科技有其令人平静的一面。”

受访者是一位法国女信息工程师，43 岁，有一个 15 岁的儿子。她在不同的科研机构中已经工作了近二十年。现在她就职于一家大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计算机中心，负责程序开发、员工培训和咨询。对她来说，科技意味着安全和清晰。怀疑科技会给她在职业上的自我理解带来问题，掌握科技对她的自我理解来说十分重要。她很多时候将休闲、自然、感情和家庭与科技和工作并列在一起来谈论，并不断地谈到科技，尤其是电视所带来的文化上的收益。

出处：Flick 1996

与 Strauss（1991）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深入分析是对单个案例的分析，在本例中即是对单个访谈的分析。这里想要实现的是以下的目标：要将每一个人有关研究主题的讨论的意义关联保留下来，因此要对所有纳入研究的案例进行个案分析。在分析中，针对个案发展出一个范畴体系（Kategoriensystem）。在对范畴体系的进一步分析中（按照 Strauss 的方法）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然后再进行选择式编码。选择式编码在此并非旨在发展适用于所有案例的、有关研究对象的核心范畴，而是要首先找出个别案例的主题领域和范畴。在完成最初一些案例分析之后，研究者将在这些个案分析中发展出来的范畴和主题领域进行交叉检验，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个主题结构并将其用作分析其他案例的基础，以提高案例分析的可比较性。作为范例，提示框 23.4 列出了一个主题结构的片段，它出自之前引用过的有关日常生活中科技变迁的研究。

提示框 23.4　主题编码中案例分析所用的主题结构之范例

1. 首次与科技的接触

2. 对科技的定义

3. 电脑

3.1 定义

3.2 首次与电脑的接触
3.3 对电脑的专业研究
3.4 电脑带来的沟通方式的改变
……
4. 电视
4.1 定义
4.2 首次与电视的接触
4.3 现实意义
……
5. 科技变迁带来的变化
5.1 日常生活
5.2 家用设备
出处:Flick 1996

这一主题结构是从最初的案例中发展出来的,并在接下来的案例中不断得到检验,如果出现了新的或者与之矛盾的情况则要对它作出相应的修正。所有被纳入分析的案例都是按照这一主题结构来分析的。为了对主题领域进行精细分析,需要细致地诠释各个文本段落(例如对情况的叙述)。在这里,可以以Strauss(1991,第57-58页)提出的编码模式为出发点,提出下列关键问题:

- **条件**:为什么? 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 背景是什么? 过程怎样?
- **行动者的互动**:谁采取了行动? 发生了什么事?
- **策略和手段**:采用了什么处理方式? 例如,回避,适应,……
- **结果**:改变了什么? 后果,效果?

这一分析步骤的结果是以案例为单位展示对研究对象的分析结果,同时指出该案例的一些独特的主导性话题(如科技的陌生性),这些主导性话题会同时出现在受访者对多个不同领域(如工作、休闲、家庭)的看法之中。

这样发展出来的主题结构同时也被用于对案例和群体进行比较,找出群体内部案例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区别。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分析和检验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所研究问题的看法。举例来说,如果研究者在案例分析中发现,对人们有关科技变迁的看法而言,他们对科技的主观定义被证明是一个核心的主题领域。那么,接下来可以对所有案例中有关科技的主观定义以及所属的编码进行比较。

案例　对科技的主观定义及其编码

接下来用两个有关对科技的主观定义的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针对主题领域使用这一程序所得出的结果。一位来自西德的女信息工程师对相应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回答:"科技对我来说就是机器,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领域,作为辅助工具帮助人们以某种方式将生活组织得更加舒适或更加不舒适。我对科技有何联想? 嗯,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则是负面的,这要取决于我对机器的体验。

科技跟自然不一样，自然和科技是对立的。”这段话表明，她一方面明确地将科技与机器等同起来，认为科技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她是从功能方面来理解科技的，并更多地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评价科技，并在最后明确地将科技与自然对立起来。这一对科技的主观定义被编码为“科技作为辅助工具”。

一位法国女教师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如下的回答：“对我而言，科技不是一种真实地存在于我生活中的东西。因为，说到科技，我就会把它理解为一些科学的东西……嗯，如果我再进一步思考一下，我就会对自己说，或许这里指的是对机器的使用，要让机器正常运行需要或者说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步骤。”这种对科技的主观定义被编码为“科技作为陌生的科学”。在参加研究的其他一些法国教师那里，同样也可以发现这种“科技的陌生性”的观点。

对科技定义的编码包含了两种陈述形式：狭义的定义（例如“科技作为……”），以及确定对不同的科技和机器进行分类的维度（例如：“专业的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在完成对其他案例中有关科技的主观定义的编码之后，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的观点（参见表 23.2）：

表 23.2 对科技的主观定义的主题编码

	信息工程师	社会科学工作者	教 师
西 德	• 科技作为辅助工具 • 职业性科技 *vs.* 日常科技	• 科技作为实现目的的必要工具 • 大小作为分类的维度	• 科技作为便利手段 • 科技作为陌生的、冷酷的世界
东 德	• 科技作为辅助工具及其易损性 • 功能原则作为分类的维度	• 科技作为陌生的辅助工具 • 复杂性作为分类的维度	• 对科技的描述性定义 • 日常性 *vs.* 职业性作为分类的维度
法 国	• 科技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和对科学的应用	• 科技是科学的应用 • 日常性 *vs.* 职业性作为分类的维度	• 科技作为陌生的科学 • 科技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 • 日常性 *vs.* 职业性作为分类的维度
不同职业团体的特有的话题	• 科技是职业性辅助工具 • 科技与科学的对立 • 功能原则作为分类的维度	• 应用 • 科技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 • 分类的维度：复杂性和大小	• 科技的陌生性 • 分类的维度：日常性 *vs.* 职业性

在这里，每一个群体内部那些相似的编码被总结起来，各个（职业）群体所独有的一些主题也被总结出来。通过在已经发展出来的结构的基础上不断地对案例进行比较，就可以将受访者对各个相关主题的思考内容勾勒出来。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主题编码的方法修改和调整了 Strauss（1991）的方法，主要用来研究社会不同群体对特定事物或过程的不同看法，并且从与此相关的理论概念出发来发展理论。通过主题编码，研究者辨认和分析群体特定的共同点和区别。与 Strauss

的方法不同的是,主题编码在第一步进行案例分析,然后再在第二步进行跨案例的(群体)比较。通过发展出一个扎根于材料的主题结构并将其应用于案例分析和案例比较,可以提高诠释的可比较性。同时,对于案例和社会群体中的一些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特有的内容,主题编码保持敏感度和开放性。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主题编码的理论背景是社会世界的差异,正如社会展示理论(参见第 6 章)或者更广泛的建构主义理论(参见第 7 章)所认为的那样。主题编码所分析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群体对特定事物或过程的不同看法(参见第 9 章)。对案例的选取一方面以特定的群体为单位进行(参见第 11 章),另一方面,在群体内部选择案例时也会使用理论抽样的一些做法。收集资料所使用的方法一方面有预先给定的结构,另一方面又在内容上保持开放性(例如事件访谈;参见第 14 章)。推广化建立在案例比较和群体比较的基础之上,并以发展理论为目的(参见第29 章)。

方法的局限性

主题编码主要适用于一种特定类型的研究,这类研究旨在以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不同群体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因此,对于某一有待于发展的理论而言,这一方法与 Strauss(1991)的方法相比,在范围上受到更多的限制。文本分析在这里包括:依据从材料中发展出来的范畴来对陈述和叙述进行编码。主题编码旨在找出群体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这些群体是事先确定好的,而且判断共同点和区别的标准主要是特定范畴在所研究的群体中的分布情况。第一步进行的案例分析相对而言更有可能对文本做出深入的分析。如果这一中间步骤前后一致地得到认真的实施,那么,这种分析程序相对来说会变得十分费时。

质性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分析文本资料最经典的方式之一,无论这些文本资料是来自于媒体作品还是访谈资料。内容分析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范畴的运用,这些范畴常常是从理论模型中推导出来的:在这里,范畴被直接应用于资料,尽管这些范畴会不断地根据材料得到检验并在必要时得到修改,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是从材料之中发展出来的。与其他分析方法相比,内容分析的目的主要在于压缩和简化资料。Mayring(1983;参见 2000)发展了一个质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的程序,包含一个文本分析的流程模型(Ablaufmodell)和不同的分析技术。

质性内容分析的流程

Mayring 认为,质性内容分析的第一步是将材料确定下来,选取访谈或访谈

中与研究问题相关的那些部分。第二步是分析收集材料时的情况（例如，资料是如何得到的？哪些人参与了？访谈时谁在场？要分析的文档是从哪里来的？）。在第三步，正式描述材料的特征（材料是如何获得的——录音或记录稿？材料得到了怎样的加工处理——转录对文本的影响？等等）。第四步是就选择出来的文本确定分析的方向，即：研究者究竟想从文本中诠释出来什么（Mayring 1983，第45页）？在下一步，这一问题会在理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区分。Mayring认为，在这里重要的是“分析的问题必须要事先得到明确的定义，并在理论上与到目前为止的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而且该问题通常来说还需要细分为子问题”（Mayring 1983，第47页）。接下来要确定分析技术，即明确应该具体采用Mayring所提出的三项分析技术（见下面的介绍）中的哪一个。在此之后，要将分析单位确定下来。Mayring（1983，第48页）在此区分了下列分析单位：（1）“编码单位”（Kodiereinheit），它负责确定“什么是可以得到分析的最小的材料组成部分，什么是可以被归入某一范畴的最小的文本部分”；（2）“情境单位”（Kontexteinheit），它负责确定什么是可以被归入某一范畴的最大的文本组成部分；（3）“分析单位”（Auswertungseinheit），它负责确定哪些文本部分“先后得到分析”。接下来的步骤是实施真正的分析。最后是针对研究问题来诠释分析的结果，提出和回答有效性的问题（参见图23.2）。

质性内容分析的技术

具体的方法程序在本质上包括三项技术：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解释说明性内容分析和结构化内容分析。

在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Die zusammenfassende Inhaltsanalyse）中要对材料进行改写（paraphrasieren），删掉不太重要的或者意义重复的段落（第一次缩减），对类似的段落进行概括总结（第二次缩减）。这样就将以下两种处理方式结合起来，即：以删除的方式对资料的缩减和通过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度层面上进行概括总结而做到的推广化。

Mayring对此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遵守的规则（参见提示框23.5；对于其他的分析步骤，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规则）。

提示框23.5 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的诠释规则

Z1 改写

Z1.1 删掉所有没有重要内容或者内容较少的文本段落以及润色性的、重复的、说明性的措辞！

Z1.2 改写包括重要内容的文本段落，将它们置于统一的语言层次之上！

Z1.3 用简单的语法形式改写这些内容！

Z2 抽象概括

Z2.1 在一个定义好的抽象层面上概括改写的主题内容，使新的内容将旧的内容包括在内！

Z2.2 用同样方法概括谓语！

Z2.3 将那些超过该抽象水平的改写内容保留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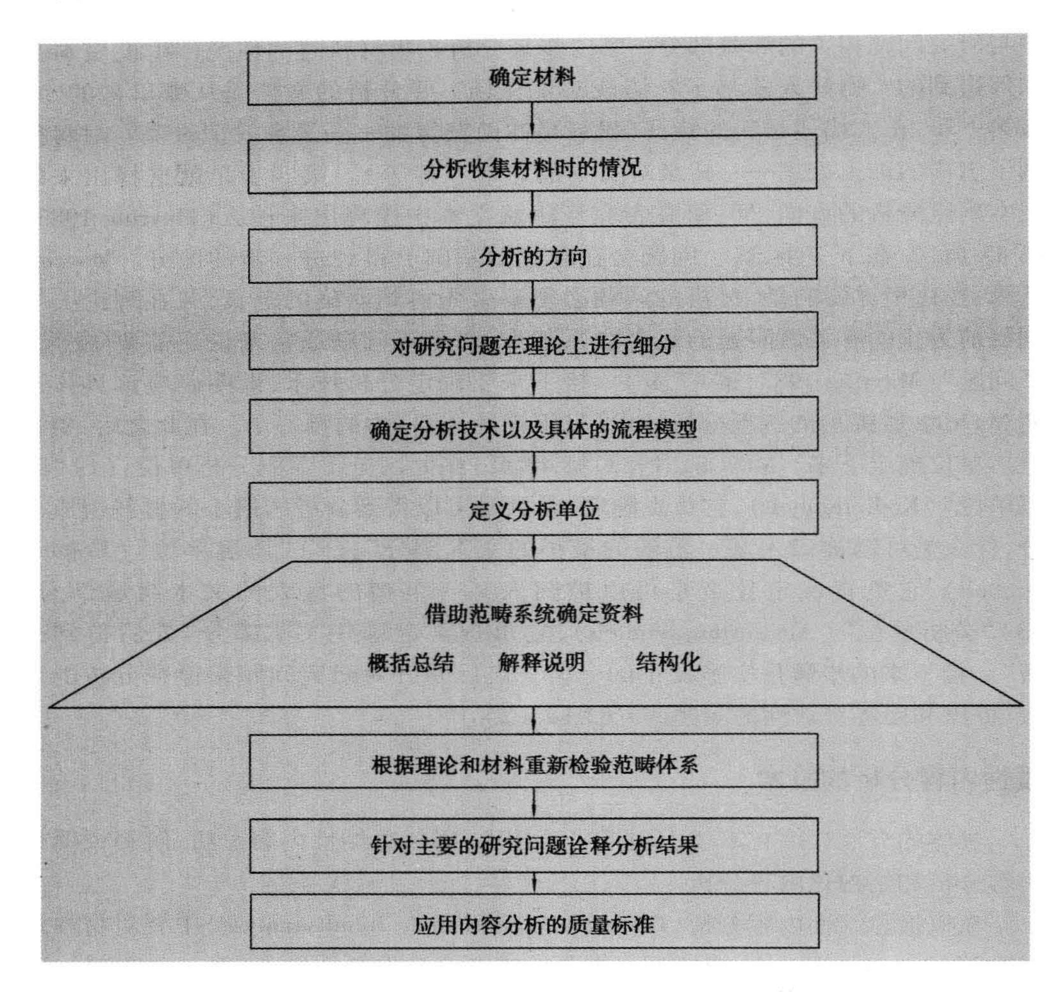


图 23.2　内容分析流程的一般模型(出自 Mayring 1983,第 49 页)

Z2.4 在有疑虑的情况下,可以求助于理论假设!

Z3 第一次缩减

Z3.1 删除那些分析单位里意义相同的改写内容!

Z3.2 删除那些在新的抽象水平下不再具有研究价值的内容!

Z3.3 保留那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写内容(筛选)!

Z3.4 在有疑虑的情况下,可以求助于理论假设!

Z4 第二次缩减

Z4.1 概括总结有关同一个(类似的)主题的改写内容和有关某一改写内容的相近的陈述(归拢)!

Z4.2 概括总结那些包括有关某一主题的多个陈述的改写内容(建构/整合)!

Z4.3 概括总结有关同一个(类似的)主题的改写内容和有关某一改写内容的不同的陈述(建构/整合)!

Z4.4 在有疑虑的情况下,可以求助于理论假设!

出处: Mayring 1983,第 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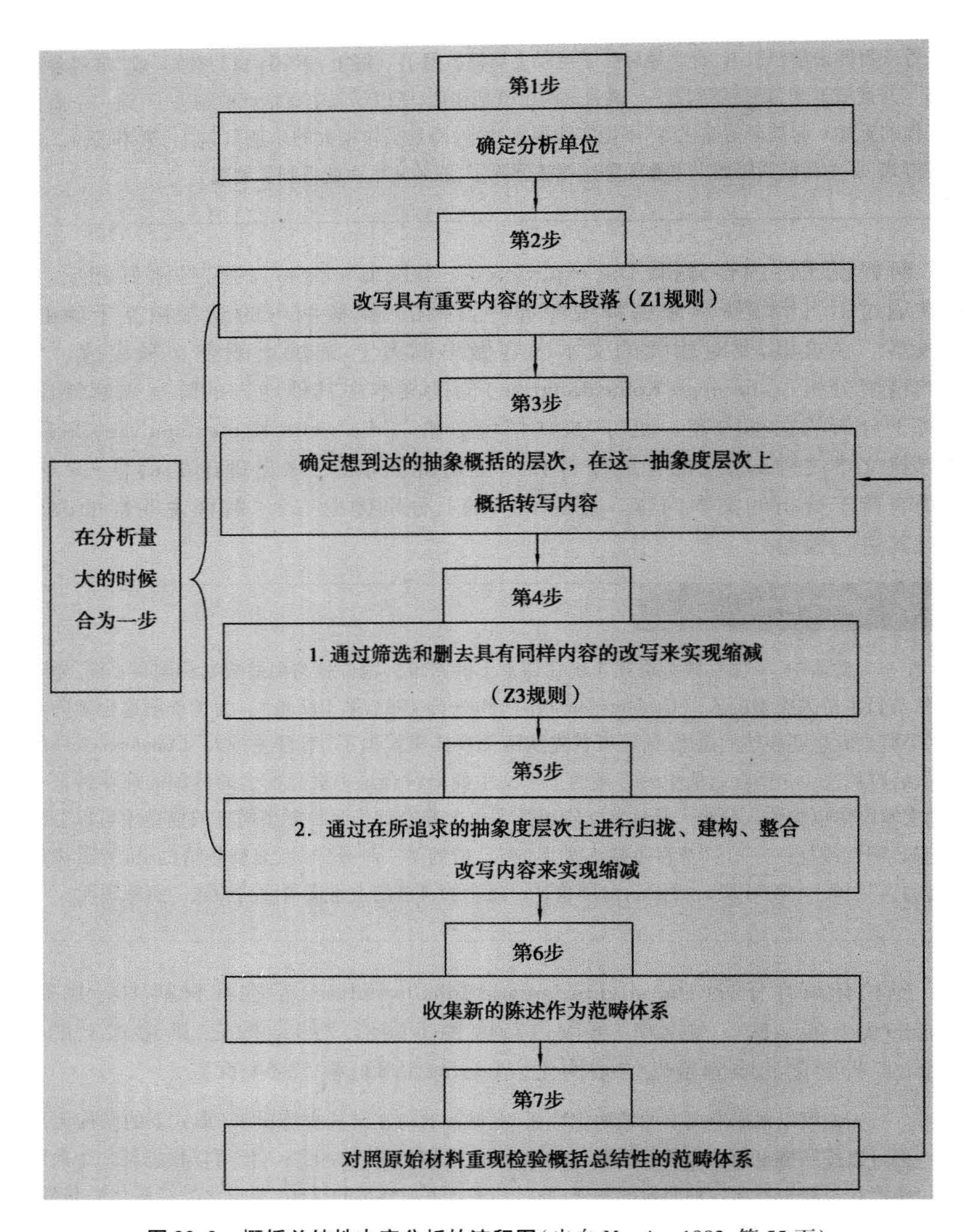


图 23.3　**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的流程图**(出自 Mayring 1983,第 55 页)

图 23.3 中的流程模型说明了对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的实施情况。

范例　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

在对一位失业教师的访谈中,有以下陈述“(……)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恰恰相反,我当时非常-非常渴望着终于可以在那里教书了”(Mayring 1983,第 104 页)。这段陈述被改写成了“相反的,曾迫切地渴望进入实践”,并被概括为“更期待去实践”(Mayring 1983,第 59 页)。另外一段陈述“所以,我一

直在等待着能去学校教书,直到最后终于可以去那里教书了”(同上,第104页)被改写成“等待着终能教书”,并被概括为“期待着实践”。因为这两个概括相似,所以第二个概括就被删去了,第一个概括又和其他的陈述一起被概括简化为“不把实践视为冲击,而是当作很大的乐趣”(同上,第59页)。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在概括层面上重叠的陈述就被删除了,原始文本由此得到了缩减。

解释说明性内容分析(Die explizierende Inhaltsanalyse)的目的刚好相反。它旨在通过引入情境资料来解释说明那些含糊的、模棱两可的或者相互矛盾的文本段落。在这里,要对相关的文本内容做出词典上-语法上的定义和表述。“狭义的情境分析”(die enge Kontextanalyse)借助文本中其他地方的陈述来解释说明有待于分析的文本内容。而“广义的情境分析”(die weite Kontextanalyse)则是通过寻找文本之外的信息(有关作者和产生情况的信息,来自理论的信息)来解释说明有待于分析的文本内容。在这一基础上分别提出一个“解释说明性的改写”并对其进行检验。

范例 解释说明性内容分析

在一次访谈中,一位女教师讲述了她在课堂上的困难。她说她与那些成功的同事不同,她不是那种“节目主持人类型的人”(Conférencier-Typ)(Mayring 1983,第109页)。为了查明这位老师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想要表达的意思,研究者首先从两部字典里找出了“节目主持人”(Conférencier)的定义,然后再从这一句话在访谈中的直接的上下文中找出符合这一概念描述的教师的那些特征。其他的文本段落也被纳入分析。从这些文本段落中包含着的对于此种类型同事的描述中可以总结出“解释说明性改写(……):‘节目主持人类型的人’指的是一种外向的、充满热情的、机智活泼的和自信的人”(同上,第74页)。然后,对照着这一概念的直接的上下文再度检验这一解释说明。

结构化内容分析(Die strukturierende Inhaltsanalyse)旨在在材料中寻找类型或者形式上的结构。在这里,可以进行四种不同形式的结构化,即形式上的、内容上的、典型化的或测量性的结构化(Mayring 1983,第53-54页):

> 人们可以根据形式上的结构化特征,将材料的内在结构提炼出来(形式上的结构化);人们可以按照特定的内容领域萃取和概括材料(内容上的结构化);人们可以根据某一个典型化维度在材料中找出各种明显的特征,并对其进行更加详尽的描述(典型化的结构化);最后,人们还可以分维度以数量等级的形式来评估材料(测量性结构化)。

范例 结构化内容分析

此项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实践冲击’有没有影响个人的自信?”(Mayring 1983,第88页)。因此,“自信”(Selbstvertrauen,简写为SV)这个概念得到了简单的分级,形成了四个范畴(Kategorien):“K1:高度自信;K2:中度自信;K3:低度自信;K4:无法推断”(同上,第90页)。每一个范畴的特征都得到了定义,例如,对于K2的定义是:“对于自己能否达到要求,只是部分地肯定或者不确定”(同上,第91页)。此外,还从访谈中找出了能够十分恰当地刻画这一范畴特征的标准范例,例如为K2找出了以下的范例:“我还算是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但是常常像是走钢丝一般”(同上,第91

页)。另外,作为对以上举措的补充,还制定了编码的规则。然后研究者开始按照这些规则在文本中寻找那些与自信心有关的陈述,看看它们分别符合哪一级范畴特征。最后,还要对这种归类进行评估,其目的比如说可以是分析一下不同范畴特征出现的频率。不过,对这种形式的内容分析来说,下面的说法是正确的:"对于研究结果的整理来说,这里并不能给出普遍适用的规则。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同上,第87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质性内容分析因为对其方法程序做出了程式化的介绍,并且可以像上面介绍的那样缩减材料,因此,与其他的分析方法相比,它更加清楚、明确和便于操作。针对这一方法所提出的诸多规则也给人以更加清楚和明确的印象。质性内容分析特别适合用于旨在对内容进行缩减和归类的、对大量文本材料的分析和处理。对分析程序的程式化也带来了一种统一的范畴模式,它被应用于所有的案例,便于对不同的案例进行比较。与那些更加强调归纳和/或以案例为单位的诠释程序相比,以上所述的特点是质性内容分析法的优势所在。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这种方法并没有固定的理论背景。通常来说,它被用来分析用提纲访谈法(参见第13章)收集的主观见解(参见第6章和第9章)。对资料的选取往往按照之前界定好的标准进行,但也可能采取逐步选取的方式(参见第11章)。

方法的局限性

运用质性内容分析法的规则,常常至少和在其他分析方法那里一样,被证明是非常费事的。尤其是对该程序的程式化处理以及对各个分析步骤的明确说明的方式都表明,这一分析程序受到了标准化方法理念的影响。因为这一方法使用外来的、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范畴来进行快速的归类,所以,它有时候不但无助于分析文本和探明其深度,反而会妨碍对文本内容的观察。像其他大部分分析方法那样对文本的诠释在这里主要是由解释说明性内容分析来完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对改写的使用方式。在这里,改写并不是被用来对原始文本做出解释,而是取代了原始的文本,尤其是在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这里表现得更为突出。

总体分析

Legewie(1994)所提出的总体分析法(Globalauswertung)可被视为是对其他分析方法(特别是理论编码或者质性内容分析)的一种实用性的补充。总体分析的目的旨在概括了解所要分析的文本,获得有关其全部主题的概览。

总体分析的步骤

作为准备步骤,Böhm, Legewie/Muhr(1992)提出了以下的建议:澄清研究者

自己的知识背景,明确要向文本提出的问题。在阅读文本时,要在文本的页边记下关键词,并对大段的文本段落进行粗略的分段。下一步要将这一分段加以细化,将核心的概念或陈述标示出来,找出有关各个文本生成时的交流情况的提示,并记下阅读时的想法。接下来,研究者制作一个内容列表,这个列表一方面包括之前写下来的分段的关键词以及相对应的行号。另一方面,要在这一内容列表中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整理出的主题(同时也标出相应的行号),并将在不同分析步骤中记录下来的有关文本的想法收集到一个目录之中。总体分析的最后一步是总结文本并对文本进行评估,看看该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纳入正式的诠释。作为做出这一判断的基础,研究者需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参与者的意图,“有关所告知的事件是否真实和完整的提示,所说内容相对于沟通情境的恰当性,说话者意图是否真诚,等等”,以及“有关下述情况的提示:基于沟通情境的漏洞和扭曲(……),故意的欺骗行为”(Böhm et al. 1992,第 23 页)。作为对以上分析步骤的补充,研究者还可记录下有关整个文本的关键词,并为下一步的资料分析工作或为选择和纳入更多的文本、案例和信息(理论取样)提出建议。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在真正的文本诠释之前,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文本有助于让研究者获得对文本的总体了解,做出以下的判断,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某一访谈进行详尽的分析是否值得?是否更应该分析另外一个访谈?如果将这一方法与其他类似实用的分析方法(如质性内容分析)结合使用,便可以获得对资料的概览。在进行理论编码时,这种方法有助于为之后的分析步骤,特别是轴向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分析步骤,找出下一步分析所用的文本并对其做出归类。

方法的局限性

总体分析的方法可以补充,但是却不能取代归类的方法。对于顺序式的文本分析方法如客观注释学和会话分析(参见第 24 章和第 25 章)而言,总体分析的方法基本上是不适用的。

本章介绍的分析方法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用编码的方式分析文本材料。范畴通常是从文本中发展出来的,或者是取自文献资料。在这里,内在于文本的、固有的结构并非是做出诠释的(核心)参照点。或早或晚,这些方法都会过渡到从文本中找出对于特定范畴的证据,并将这些证据归入特定的范畴。在这里,文本脱离了原有的结构,并被重新加以结构化。在这里,不同的方法对个案分析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在主题编码这里,研究者首先进行案例分析,然后再跨案例地对材料作出分析。其他分析法则是将整个文本材料作为参照点,发展和应用一个超越个案的范畴体系。

要　点

- 编码可以从文本出发，以便于从文本中发展出一套范畴体系（理论编码或者主题编码），编码也可以从一套编码体系出发，按照这一体系对文本进行归类。
- 通常来说，人们会结合使用以上两种策略。理论编码也会采用来自文献的范畴或者来自已经分析过的文本的范畴，来对当前的文本进行编码。
- 对于这些分析程序来说，总体分析作为准备步骤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并非是独立的分析方法。
- 在对材料进行编码时，研究者对于文本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敏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编码结合了对部分文本段落的精细分析和对其他文本段落的相对粗略的归类和总结。

练习 23.1

1. 请您从访谈中节选出一个段落（也可以使用练习 22.1 中的例子），并对它进行开放式编码。您在此既可以从访谈的开头部分开始编码，也可以选取其中您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段落开始。请您为这个段落提出一个概念（对编码进行命名）。
2. 请您接下来将 Strauss/Corbin 针对文本分析所建议提出的问题应用于这段文本。
3. 请您最后将分割法（参考提示框 23.1）运用到您节选出的段落上。

练习 23.2

1. 请您对上一练习中的同一文本段落（或者其他的文本）进行主题编码。请您为该文本提出一个主题句（Motto）。请您对该文本的内容进行简要概括。
2. 请您使用本章介绍的编码范式分析这一文本段落。

练习 23.3

1. 请您选取一个文本，并对它进行质性内容分析。请您首先找出并改写那些近似的陈述，以便于删除相同的改写内容（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
2. 请您找出文本中不明确的概念或陈述，使用解释说明性内容分析来澄清它们。

拓展阅读

理论编码

Böhm, A. (2000). Theoretisches Codier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75-485.

Glaser, B. G./Strauss, A. L. (1965a/1974).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dt. 1974: Interaktion mit Sterbenden—Beobachtungen für Ärzte, Schwestern, Seelsorger und Angehörig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laser, B. G./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dt. 1998: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Bern: Huber).

Strauss, A. L./Corbin, J. (1990/1996).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dt. 1996: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 Weinheim: Beltz,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trübing, J. (2004). Grounded Theory. Zur sozialtheoretischen und epistemologischen Fundierung des Verfahrens der empirisch begründeten Theoriebildung. Wiesbaden: VS-Verlag.

主题编码

Flick, U. (1996). Psychologie des technisierten Alltags—Soziale Konstruktion und Repräsentation technischen Wandels in verschiedenen kulturellen Kontext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Flick, U., Walter, U., Fischer, C., Neuber, A./Schwartz, F. W. (2004). Gesundheit als Leitidee? —Gesundheitsvorstellungen von Ärtzten und Pflegekräften. Bern: Huber.

质性内容分析

Mayring, P. (1983). 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 Grundlagen und Techniken (8. Aufl. 2003). Weinheim, Basel: Beltz.

Mayring, P. (2000). 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68-475.

总体分析

Legewie, H. (1994). Globalauswertung. In: A. Böhm, T. Muhr/A. Mengel (Hrsg.). Texte verstehen: Konzepte, Methode, Werkzeuge.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S. 100-114.

会话分析、话语分析、体裁分析 24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能够

- 理解会话分析的原则。
- 了解这种方法的发展近况。
- 熟悉话语分析的不同方法。
- 认识体裁分析。

人们应该在其上下文语境之中来理解和分析陈述（Aussagen），这一点在质性研究领域或多或少是没有争议的。出于这个原因，研究者会在访谈中提出开放式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研究者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至少在开始时会进行开放式编码。在上一章中介绍的分析程序均是在分析的过程中逐渐地脱离文本原来的形态，将文本中的陈述进行重新排列，将其置于范畴和发展出的理论之中。另外一些分析程序的做法则与此相反，它们更加重视文本原来的形态，因此"以顺序分析的原则为导向。（……）顺序分析（Sequenzanalyse）将下述思想转化为一种方法，即：社会次序是在互动之中实现自身再生产的"（Bergmann 1985，第313页）。对这些分析程序来说，下述假设具有指导意义：次序（Ordnung）是一步一步被生成的（会话分析），意义是在行为完成中积累起来的（客观注释学，参见第25章），叙述的形态决定着叙述的内容能否以可信的形式被展现出来（叙事分析，参见第25章）。在每一种分析程序中，理解的方法论原则都是特定形式的对情境的敏感性（Kontextsensitivität）。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所关心的是在形式方面对日常情境进行分析，而不是在内容方面

对文本进行诠释。文本在这里指的是明确针对研究目的而生成的文本，比如访谈。会话分析被视为是常人方法论研究的主流，Bergmann（2000b，第525页）对这一方法作出了如下说明：

> 会话分析（Konversationsanalyse，KA）指的是一种用来分析社会互动的研究方法，它通过严格的实证手段来分析社会互动，将其当作是一个持续不断地生成和保证有意义的社会次序的过程。会话分析认为，在各种形式的语言与非语言交流以及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中，行动者都会做的事情包括：分析其行动的情况和情境，诠释互动伙伴的发言，保证让自己的表现符合互动的情境、可以被人理解并且有效，让自己的行为与别人的行为相互协调。会话分析方法的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具有决定性的原则和机制，行动者正是通过这样的原则和机制在完成行动的情境中以及在和互动伙伴的相互协调中生成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有意义的结构和次序以及构成这一事件的活动的有意义的结构和次序。在方法上，会话分析采用尽可能不会遗漏信息的记录方式（如录音或录像及其文本转录）来记录真实的、未经人修饰的社会事件，并通过比较性系统分析从中拆解和抽离出社会互动的单个的结构原则以及参与互动者使用这些原则的实践。

因此，会话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对谈话内容的分析，而是对形式上的程序的分析，正是通过这些形式上的程序，谈话的内容得到了传达，特定的情境得到了生成。会话分析方法的开端是 Sacks 等人（1974）有关如何组织谈话中发言人轮换的研究，以及 Schegloff/Sacks（1974）有关在谈话中引入结束语的研究。会话分析有三个主要假设：第一，互动是有序进行的，不能将互动中的任何事情视为是偶然的。第二，互动的"情境"（Kontext）不仅影响到互动，而且也是在互动中并且是经由互动而得到生成和延续的。第三，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决定，哪些内容在社会互动中是重要的并且因此对诠释而言也是重要的。这种决定是不能预先做出的。

Drew（1995，第70-72页）提出了一系列用于会话分析的方法规则（见提示框24.1）。

提示框 24.1　会话分析的方法规则

1. 应当将谈话中出现的依次发言看做是对谈话进行顺序性组织的结果以及以下必要性要求的结果，即让当下的发言恰当而连贯地与前一个发言衔接。
2. 通过指出可以观察到的某个参与者方面出现错误的重要性，（……）我们想要将分析的焦点集中于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口语行为的分析之上。
3. 通过对谈话中依次发言的"设计"，我们想要关注两个不同的现象：(1) 对某一行动的选择，而对依次发言的设计便是想要表达出这一行动；(2) 语言建构的细节，正是通过这种语言建构，谈话中依次发言的活动得到完成。
4. 会话分析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找出那些将互动中的语言行为加以结构化的顺序性组织方式或模式。
5. 只有通过收集那些包含着所研究现象的案例，（……）才能说明顺序性模式或组织方式的重复出现及其系统性基础。

6. 所提供的资料片段要能够让读者可以评论或质疑研究者所做的分析。

出处：Drew 1995，第 70-72 页

会话分析的研究对象最初仅限于狭义上的日常会话（即没有特定角色分配的会话，如电话、闲谈、家庭谈话等）。在此期间，会话分析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分析带有特定的角色分工和不对称角色的谈话，如咨询谈话（参见 Wolff 1986）、医生—病人之间的谈话或者是法庭审判。这些谈话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均是发生在特定的机构情境之下。在此期间，会话分析的分析对象被扩展到书面语言文本、大众传媒或评估报告，也就是说宽泛意义上的文本（Bergmann 2000，第 537 页；Wolff 2000a，以及本书第 19 章）。

会话分析的程序

Ten Have（1999，第 48 页）为采用会话分析方法研究项目提出了以下四个分析步骤：

1. 获取或制作发生在自然情境之下的互动的记录。
2. 全部或局部地转录录音或录像带。
3. 分析挑选出来的部分。
4. 报告研究成果。

会话分析的程序如下：首先，在转录稿中找出某一特定的陈述或者是一系列陈述，作为相应的谈话类型之次序的可能要素。其次，将包括此类要素的案例汇集起来。再次，具体说明这类要素如何被用作工具，用来在互动中生成次序，以及这类要素解决了哪些互动的组织中出现的问题。最后是分析那些用于解决这类组织问题的一般方法（参见 Bergmann 2000b）。因此，会话分析常见的出发点是对以下问题的分析，如：如何开启特定的谈话？哪些语言实践被用来有序地结束这些谈话？

案例 社会精神病学的咨询

以咨询谈话（参见 Flick 1989）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每个谈话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谈话的开始都是通过"授权的发令员"（autorisierte Starter）（Wolff 1986，第 71 页）而得到组织的。这种"授权的发令员"的"任务在于向所有参与会话的人清楚地指出，在当下这种特定类型的会话活动中，日常会话的组织原则（如能够谈论'任意'的话题）必须受到特定的限制"。在被研究的谈话中，这类"开场白"可以被表述的相当开放（如，"什么原因让您来找我们？"，"说说看，有什么事情？"或是"您有什么愿望？"）。在其他例子中，"授权的发令员"会指明咨询谈话的（预先设定好的）主题或者促成咨询谈话得以产生方面的特点。这类开场白宣告了真正的咨询关系的开始，并将咨询谈话与其他的谈话形式区分开来。有些时候，谈话者会根据特定的情况将这种开场白与对促成咨询谈话产生的方式的必要说明结合起来（例如"因此，B 先生，您的哥哥之前给我打了电话"）。对咨询过程中结束第一次谈话的方式的分析表明，这里一方面必须要做到及时地结束谈话，同时还要确保将咨询关系继续下

去(例如“我们……在T街还有两个社区中心,……刚刚开始,因此,S先生,我们必须现在把今天的事情收收尾,结束谈话。”)。在这个例句中,谈话者通过指出其他的辅助服务预告了咨询谈话将要结束,由此既保证了继续保持与当事人的联系,同时,也结束了“今天”的咨询谈话。

会话分析式诠释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其严格的顺序性分析程序(streng sequenzielle Vorgehensweise),即在解释特定的事件时坚决不参考后来的陈述或互动(参见 Bergmann 1985,第313-314页)。在这里,事件的次序正是要在对它的顺序性理解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在谈话中一步一步所确立下来的次序应该由按照这一顺序所进行的分析来阐明。会话分析式诠释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情境的强调。这表示,在谈话中生成意义或次序的努力只是本地的实践,对这种本地实践的分析必须要考虑它们在互动中所处的情境,并且还要进一步考虑到该互动所处的情境(比如机构性背景)。在这里,分析应该从具体的案例、案例所嵌入其中的情境和案例的进展出发,并由此获得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

Ten Have(1990,第104页)在参考 Schegloff 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用来分析谈话中的修正(Reparaturen in Gesprächen)的三个步骤。“相接对话”(Adjacency pairs)指的是在谈话中的发言往往会引起一个特定的回应,例如:有人提问之后,另一人要跟着回答;有人用一声“您好”开始了电话交谈之后,电话另一端的人则必须以问候回应。“修正”(repair)指的是,当谈话中间出现理解上的问题时,人们启动修补机制的方式。按照 Ten Have 的建议,研究者应该按照以下步骤来进行:

1. 从发言者变换(Sprecherwechsel)的角度仔细地分析一段谈话:变换的建构、停顿、重叠发言等。将每一个显眼的现象都记录下来,特别是在发言者正常变换的进展中出现的所有“干扰”。
2. 在当前分析的谈话段落中寻找对话序列,特别是“相接对话”及接下来所说的话。
3. 将每一个修正现象都记录下来,如修正的发起者、实际的修正等。(Ten Have 1999,第104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会话分析与通过使用这种方法所获得实证结果能够揭示出日常谈话和特定话语形式的社会性生成。它们可以将这些会话中所使用的语言方法记录下来。此外,它们表明,对自然情境的分析可以提供哪些解释的可能性,以及通过理解社会互动的结构逻辑所进行的严格的顺序性分析可以提供哪些启发。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会话分析的理论背景是常人方法论(参见第6章)。其研究问题聚焦于社会成员建构社会现实所用的形式上的程序(参见第9章)。选取实证资料的方式是汇集有关所研究过程的例子(参见第11章)。为了能够尽可能准确地将日常的

互动过程（以技术手段）记录下来，会话分析没有对收集资料的方法做出明确的规定（参见第22章）。

方法的局限性

在会话分析中，分析的着眼点是互动组织的形式实践。主观意义或参与者的目的对于分析而言并不重要。为了分析"谈话机器"（Bergmann 1981）的运转而忽视谈话的内容是许多会话分析研究的主要做法。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不同学者的批评（如 Coulter 1983；Harré 1995）。另一个受批评的方面是会话分析研究常迷失于形式细节之中，将越来越细小的单位和序列从作为整体的互动语境中剥离出来（参见 Heritage 1985，第8页；Flick 1989，第180-181页）。尤其是在制作转录稿时的极端准确性更加强了这一受到批评的问题。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Diskursanalyse）是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参见 Keller et al. 2001，2003），会话分析便是其中的一个背景。由 Edwards/Potter（1992），Harré（1995）和 Potter/Wetherell（1995）所发展的话语心理学所关注的是，"为了完成沟通和互动，参与者有关事件（回忆、描述、阐述）的会话版本是如何在谈话中得到建构的"（Edwards/Potter 1992，第16页）。虽然话语分析被认为是会话分析的起点，但是，话语分析的实证焦点更多地集中于"谈话的内容、重要的主题以及对谈话的社会组织，而非语言组织"（Edwards/Potter 1992，第28页）。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将记忆和认知等心理现象当作是社会的，尤其是话语现象来进行分析。话语分析尤其重视人们在报告或展示中所建构的有关事件的不同版本，并分析人们在这些建构中所使用的"诠释性曲目"（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话语分析不仅被用来分析日常对话，也被用来分析其他资料形态如访谈（例如 Potter/Wetherell 1995 有关种族主义的研究）或媒体报道（例如 Potter/Wetherell 1995 有关海湾战争报道中所建构的不同版本的研究）。

Willig（2003）将话语分析的研究过程划分为多个步骤：选出在自然情境下出现的文本和谈话之后，首先要描述一下这些文本和谈话，然后再仔细地阅读转录稿。下一步是对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资料进行编码。之后是对资料进行分析。Potter/Wetherell（1987，第167页）指出，研究者可以在此提出以下的主导性问题：我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阅读该段落？文本的哪些特征引向了这种阅读方式？分析聚焦于文本中的语境、变化性、建构以及在文本中所使用的诠释性曲目。Willig 认为，最后的步骤是撰写有关所进行的话语分析及其结果的报告。撰写应当成为分析的一部分，它将研究者带回到实证材料。

案例　新西兰的种族偏见

Potter/Wetherell(1995)研究了新西兰种族偏见的社会建构。他们使用的例子是当地占多数地位的白人对待毛利人(土著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为此,他们访谈了 80 多位白人多数派民族的代表(中等收入阶层的就业者,如医生、农场主、企业主、教师,等等),同时也分析了有关议会辩论的报告和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资料。作为研究结果,研究者指出了不同的诠释性曲目,如"文化作为遗产",其核心思想是:毛利人的文化由传统、仪式和价值观所构成,这些传统、仪式和价值观是从先辈那里代代相传而来的。文化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古老的遗产,就像著名的艺术品或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必须要得到保存和维护,防止其受到"现代世界"的严酷环境的破坏。下面给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肯定完全地赞成毛利文化(Maoritanga),这是新西兰特有的东西,我非常赞同保护和保存(……),正如我不喜欢看到有物种灭绝一样,我也不喜欢看到(……)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或其他任何东西就这样消失。"(Potter/Wetherell 1995,第 190-191 页)。与这一诠释性曲目相对应的诠释性曲目是"文化作为治疗"。在这里,"毛利人文化被理解为是少数民族的,特别是其年轻成员的一种心理上的需求,他们已经疏远了自己的文化,因而需要再度发现自己的'根',以再度变成'完整的人'。"(同上,第 191 页)

人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话语分析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参见 Keller et al. 2001,2003)。Parker 在 Michel Foucault(例如 1976)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被人称作是"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tsche Diskursanalyse)(例如 Willig 2003)。与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相比,批判性话语分析更多地关注批判、意识形态和权力等议题。Parker 指出了研究过程中的以下几个分析步骤:(1)如果之前没有完成这一工作的话,研究者应当将所要分析的文本转化为书面文字。(2)应该对文本展开自由的联想,以便于形成意义的细微差别,这样有助于辨认出文化的网络;研究者要将这些联想书面记录下来。(3)研究者应当系统地将文本中或选出的文本段落中正在谈论的对象区分出来,做法可以是将相应的句子的主语标示出来。(4)研究者应该与文本保持距离,做法是:要将文本本身,而非是文本"所指的"对象作为研究客体。(5)详细开列和说明文本中的"主语"——人物、人物形象、角色等。(6)研究者应该重构文本中提到的"主语"被认为应该具有的权利和责任。(7)最后,研究者要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关系模式。这些语言上的模式即为"话语",它们可在意识形态、权力、机构的关系中得到定位(参见 Parker 2000,第 392-393 页)。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与会话分析相比,话语分析研究的对象更加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普遍性议题(参见 Silverman 1993)。话语分析并不局限于从形式上分析语言表述和过程,而是将语言分析的方法程序和对知识过程和建构过程的分析结合了起来。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话语分析的理论背景是社会建构主义(参见第 6 章和第 7 章)。研究问题聚

焦于如何根据有关特定对象或过程的话语来研究社会现实的生成(参见第9章)。实证材料既包括媒体报道,也包括访谈(参见第11章)。研究者在有关某一主题的访谈或文本的转录稿的基础上进行诠释(参见第22章)。

方法的局限性

在现有的大部分文献中,有关如何进行话语分析的方法建议仍然有些不够明确。在另一方面,理论性研究和实证结果则占有主导地位①。

体裁分析

体裁分析(Gattungsanalyse)是第二种由会话分析发展而来的方法,由Luckmann及其同事提出(参见Knoblauch/Luckmann 2000)。体裁分析旨在将会话分析的方法扩展至对更大的材料单位和谈话形式的分析。这些更大的材料单位和谈话形式被理解为体裁。“那些在社会上固化下来的交流程序被称作交流性体裁”(Knoblauch/Luckmann 2000,第538页)。交流模式与体裁被视为是交流的制度,供互动者在相互交流时使用。这样的例子有闲聊(Bergmann 1987)、电子的交流形式(参见Bergmann/Meier 2000)或者大众媒介等交流方式。体裁分析在方法上分为多个步骤:首先,记录在自然情境中发生的交流事件,并对其进行转录。其次,对资料进行注释学诠释和顺序分析(参见第25章)。随后对资料进行会话分析,以表明这些资料在语言运用的层面上是如何得到组织的。在这两个分析步骤的基础上,研究者发展出结构模型并根据更多的案例来检验结构模型的恰当性。下一步是分析作为情态化/语气化的结果而形成的结构变体(讽刺、轻蔑语,等等)。这类交流体裁的例子有讽刺、闲聊等。资料分析首先聚焦于交流体裁内部结构的文本要素,如:

- 韵律:语调、音量、语速、停顿、节奏、重读、音质。
- 语言种类:标准语言、专业语言、方言、社会方言。
- 语域:正式的、非正式的、私密的。
- 风格与修辞格:头韵、隐喻、格律,等等。
- “小型”和“微型语式”:套话、习语、老生常谈、谚语、绝对的陈述、历史性的传统客套话、题词、谜语。
- 中心思想、传统主题、结构特征(Knoblauch/Luckmann 2000,第542页)。

最后是分析这类交流体裁的外部结构和使用它们在交流上获得的节约性。

---

① 参见Schegloff(1997)和Wetherell(1998)之间有关会话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区别的讨论以及Potter(2001,第325-326页)结合一个例子所提出的分析步骤。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与会话分析相比，体裁分析研究的是更大的交流模式。不过，体裁分析遵循着与会话分析类似的原则。与话语分析不同的是，体裁分析既分析形式上的模式或交流，也分析交流的内容。与此相应地，体裁分析沿用了会话分析在方法上的严格性，同时又更加强调以内容为导向。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体裁分析的理论背景是社会建构主义（参见第6章和第7章）。研究问题聚焦于如何根据人们所使用的、就特定对象或物体进行交流的模式及其功能来研究社会现实的生成（参见第9章）。诠释是在访谈的转录稿或已经存在的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参见第22章）。

方法的局限性

对交流体裁的定义没有像对质性研究的其他分析单元的定义那样清晰。体裁分析的方法与其他的质性研究分析方法相比更加广泛和严格，因为它们融合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如注释学分析方法和会话分析方法），因此令分析变得相当复杂和费时。

要　点

- 会话分析最初是专为从形式的角度来分析日常互动而设计的。后来，会话分析被研究者用作分析其他材料的起点。
- 就所能分析的资料而言，话语分析的焦点比会话分析更为宽泛。不过，话语分析同样旨在表明有关某一特定主题的交流是如何（作为话语）得到组织的。
- 体裁分析将以上这种研究态度进一步扩展至对人们在交流中所使用的、更加广泛的交流工具的分析。体裁分析的目的是研究人们对这些工具的使用。

练习 24.1

1. 请您从自己的研究资料或文献中选出一份对互动的转录稿。请您分析一下，这一互动是如何被开启的——如何开始，谁说了什么，使用了何种论证方式。
2. 请您接下来观察一下发言者变换在这一转录稿中是以何种方式得到组织的：第二位发言者是如何从第一位发言人那儿接话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如何停止谈话的，等等。
3. 最后，请您在转录稿中找出有序的对话，如提问—回答，问候—回问，等等。

练习 24.2

1. 请您从自己收集的资料或文献中节选出一段文本，将本章在上面列出的话语分析的主导性问题应用于对该文本的分析。
2. 请您在这个文本中寻找诠释性曲目。

拓展阅读

会话分析

Bergmann, J. (2000b). Konversations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24-538.

C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Band Ⅰ & Ⅱ. Hrsg. von G. Jefferson mit einer Einführung von E. A. Schegloff. Oxford: Blackwell.

Ten Have, P. (1999). 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 London: SAGE.

话语分析

Keller, R., Hirseland, A., Schneider, W./Viehöver, A. (Hrsg.)(2001). Handbuch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Diskursanalyse. Band I: Theorien und Method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Parker, I. (2000). Die diskursanalytische Method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46-556.

Potter, J./Wetherell, M. (1995). Soziale Repräsentation, Diskursanalyse und Rassismus. In: U. Flick (Hrsg.). Psychologie des Sozialen. Repräsentationen in Wissen und Sprache. Reinbek: Rowohlt, S. 177-200.

Rapley, T. (2007). Doing Conversation, Discourse and Document Analysis (Book 7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SAGE.

体裁分析

Knoblauch, H./Luckmann, T. (2000). Gattungs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38-546.

Luckmann, TH. (1995). Interaction Planning and Intersubjective Adjustment of Perspectives by Communicative Genres. In: E. N. Goody (ed.).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action: Express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ocial Bias in Human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5-189.

25 叙事分析与注释学分析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可以判断叙事方法是如何被用来分析生活史以及其他形式的传记资料的。
- 理解顺序分析的原则是叙事分析和注释学分析的指导原则。
- 知道客观注释学是什么。
- 认识到社会科学注释学和注释性知识社会学是客观注释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备选方法。

在上一章介绍的各种方法中，顺序性（Sequenzialität）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谈话在形式上的组织（如开始或结束）。本章所要介绍的分析程序强调的是按顺序解析意义和含义。

叙事分析

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en）认为资料中存在着一种特定形式的顺序性。人们首先要对每一个有待于诠释的发言进行分析，看看它是不是叙事（Erzählung）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才会对它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以叙事访谈的形式再现生涯经历并由此收集叙事资料。另一方面，为了分析对现实的叙事性建构（Bruner 1991），并且不需要在此明确地使用旨在唤起叙事的收集方法，生活本身被视为是叙事（Bruner 1987）。

分析叙事访谈以重构相关事件

在 Schütze（1983）提出的对叙事访谈进行分析的方法中，第一个“分析步骤——即形式上的文本分析——是首先将所有的非叙事性的文本部分清除，然后按照其形式上的段落对‘清理后’的叙事文本进行分段”（第 286 页）。第二个分析步骤是对内容进行结构上的描述，其任务是依据那些形式上的“框架性衔接

要素”（如“然后”或者停顿）来确定叙事的不同部分（即“生活历程在特定时间内的过程结构”）。第三个分析步骤是分析性抽象。分析性抽象脱开了生活阶段的那些单个的细节，以提炼出“生涯经历的整个构型，即存在于各个生活阶段之中的那些主导经验性过程结构——包括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结构——在生活历程上的次序”（Schütze 1983，第 286 页）。只有在完成了对该过程模式的再现之后，才会将其他的、非叙事性访谈部分纳入分析。最后，研究者将通过以上途径取得的事件分析进行对比分析。在这里，分析的目的倒不是说要再现讲述者对其生活的主观诠释，而更多地是要再现“事实性的过程进展之间的关联”①（同上，第 284 页）。

Haupert（1991）描述了另外一种分析方法。为了为真正的精细分析做好准备，他首先制作了一个叙事者的简要生平。在该生平介绍中，他按时间顺序对生活史上“被视为重要的事件”做了说明。在此之后，他按照 Schütze 的方法对访谈进行了顺序分析并提出了各个顺序（Sequenzen）的标题。在接下来的分析步骤中，他确认了“顺序主题”并且将能够说明该顺序主题的引言进行了归类。最后，研究者借助访谈中的核心陈述对传记的核心（Biographiekern）进行了表述。对文本陈述的转写以及将采访的情境背景和生活环境（Milieu）等信息明确表达出来有助于抽象化处理。在将整个事件历程浓缩为核心历程之后，它们被归入有关进程的分析性类型以及已经发展出来的有关生活世界的生活环境的类型。这种分析方法也是从叙事的过程来再现生涯的过程，因此，它采用的也是顺序分析的方法。

这些基于生涯叙事对生平之实际进程的再现有一个认识的出发点，即“类同性假定”（Homologieannahme）。按照 Bude（1985，第 332 页）的分析，该类同性假定包括以下假设：“这些自传性即兴叙述被（……）视为是对过往经历的照相般忠实的重述。”这一假设不仅受到了 Bude 的质疑，同时也受到了其他人的质疑（相关概述请参见 Flick 1996）。在另一方面，在这些叙事之中所包含着的建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分析作为生活建构的叙事资料

有鉴于此，Bude（1984）提出了“重构生活建构”（Rekonstruktion von Lebenskonstruktionen）的观点。这样一来，他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待叙事和叙事之中所包含的资料的方式，并由此提出了另外一种资料分析的方法。他注意到，叙事与其他的表述形式一样，都包含着对所叙述内容的主观建构和社会建构——如叙事访谈包含着生活建构（参见 Flick 1996）。与此相应，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如 Bruner（1987）将生活史看作是社会建构。在具体的表述形式上，生活史会采用各自文化所提供的典范性叙事和典范性生活史。分析叙事资料的目的便是将参与在此间的建构过程揭示出来，而非是对实际进程的重构。Rosenthal/Fischer-Rosenthal

---

① 在第 14 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个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即 Hermanns（1984）的研究。

(2000,第461页)概括总结了分析叙事资料的程序(见提示框25.1)。

提示框25.1 分析叙事资料的程序

1. 分析传记性资料(事件资料)。
2. 文本分析和主题性单元分析(对访谈文本段落的顺序分析——自我展示)。
3. 重构事件史(经历过的生活)。
4. 对单个文本部分的精细分析。
5. 对比分析叙述的生活史和经历过的生活史。
6. 形成类型。

出处:Rosenthal/Rosenthal 2000,第461页

Denzin(1989a,第46页)对这类诠释的程序做出如下描述:

> (1)确定互动性文本;(2)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单位进行呈现;(3)将文本划分为经历的不同关键单位;(4)对每个部分进行语言分析和诠释分析;(5)系列地展现和诠释文本对于参与者的意义;(6)提出一个对整个文本的工作性诠释;(7)在接下来的文本段落中检验这些诠释假设;(8)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9)展现在文本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诠释。

Hildenbrand/Jahn(1988,第208页)提出了以下的顺序分析程序,用来分析有关家庭和家庭中发生的建构现实进程的叙事(参见第15章):从叙事当中重构家庭的社会资料(出生、结婚、教育历程、职业生活历程等),对比各种供选可能和实际做出的选择,并由此出发对家庭的社会资料进行诠释。通过这一分析,可以发现一种选择的模式。从该选择模式中可以提出有关被调查家庭的案例结构假设(Fallstrukturhypothese)。在接下来的诠释过程中可以系统地验证该假设。特别是要对叙述的开场白以及这其中包含着的"当事人的自我展示"进行顺序性诠释。在此之后可以选择其他的案例。此后,可以对通过分析得出的案例结构进行对比并提出普遍化的结论。作为这一分析程序基础的是我们在下面要详细介绍的客观注释学。

案例 重构案例的节选

Gabriele Rosenthal 和 Wolfram Fischer-Rosenthal 提出了提示框25.1中列出的分析叙事资料的模型,这些叙事资料是通过叙事访谈(参见第14章)获得的。他们在一系列研究当中运用了这一分析程序。这些研究多数都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传记性叙事。Rosenthal/Fischer-Rosenthal(2000,第461-467页)展现了一项对一个叙事访谈片断的详细分析。该片断的内容涉及生活史的一个特定的阶段。被访谈对象以"生涯性开场评估"开始其叙述:"没有任何事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和意料的不同。"紧随其后,被访谈对象做出了如下叙述:"15**岁时认识了初恋的男人**,18**岁订婚**,20**岁结婚**,21**岁时儿子出生(笑),当时已是**1942**年了,战争已经开始**。"研究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以上这段话中的自我展示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的焦点集中于这里所叙述的事件对于受访者的生涯意义。然后,研究者提出了以下问题,即为什么受访者选择了这个主题("初恋")作为其生活史的开场白。为了更详尽地理解这一切,研究者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都提出了假设,一个是在

所经历的生活史层面上，另一个是在所叙述的生活史层面上。他们运用了以下有关方面的更多的信息，即所经历的生活和这样的生活通常来说在那个历史时期应该如何进展。偏离这种常态性生活历程的生活可以作为"未经历过的生活"得到分析。在一个相关主题的领域分析（Feldanalyse）中，研究者通过多个主题复合体（Themenkomplexe），即通过按照讲述次序浓缩主题性领域再现了受访者的自我展示。研究者在这里的观点是，自我展示不能或者仅仅是偶尔受到意向性的调控。因此，经历的生活史会显现在与没有被研究者打断的开场叙述相对应的文本表述之中。为了为这一分析做好准备，叙事文本被分成了不同的部分，也就是说，按照访谈中讲述者的变化，文本类型和主题变换（参见第464页）等范畴，将叙事文本划分成更小的单位。研究者在此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如：为什么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引入了一些主题？哪些主题被提到，哪些没有被提到？为什么某些主题得到了详细的叙述，而其他主题没有得到详细的叙述？各个主题分别符合哪一个专题领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及对以上提到的假设的检验，研究者对事件进行了广泛的诠释。通过与来自同一项研究的其他事件或者来自其他领域的其他事件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一诠释。这个例子表明，研究者是如何切入叙事资料的（该切入点关涉到叙事资料中的生活史），并且在此顾及到了所叙述的生活和所经历的生活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这里所介绍的针对叙事资料的分析程序有些共同之处，即它们在对陈述发言的诠释中都是从"叙事"这一形态出发并且是在叙述过程的情境之中来分析这些陈述发言的。此外，它们都包括对资料进行形式上的分析——文本的哪些段落是叙事性段落，可以确认哪些其他的文本种类？这些分析程序之间的区别在于，叙事对于分析所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Schütze 将访谈中的叙述视为是对所叙述事件的真实再现，即认为所叙述的事件真的像叙述的那样发生过。其他学者在理解和分析叙事时将其当作是有关事件的主观建构和社会建构的一种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形式。叙事作为有关事件的建构形式在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知识中都可发现，因此这种建构的模式特别适合用于研究的目的。为了对表述与经验之中的建构进行分析，在诠释中将形式分析和顺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是叙事分析的特征。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以对主观意义（参见第6章）的分析为取向是叙事分析的理论背景。为此目的，叙事访谈被用作收集资料的方法（参见第14章）。研究问题指向对传记历程的分析（参见第9章）。对案例的选择通常来说是逐步进行的（参见第11章）。提出普遍性的结论是为了发展理论（参见第18章）。为此目的，研究者会对比分析所做的案例分析（参见第29章）。

方法的局限性

特别是按照 Schütze 的方法所做的分析，夸大了叙事作为资料的现实性内涵。展示对于被展示内容的影响被低估，而从叙事中推导出实际生活经历的可

能性则被高估。仅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研究者才将叙事分析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弥补叙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叙事分析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分析对于个别案例的依附性。因为对个案的分析对事件和精力的过高要求,致使研究很少超越对少数几个案例的重构和比较。至今为止,人们尚没能通过这种方法获得有关传记经历的普遍理论。不过,在个别领域,人们已经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类型学(例如 Hermanns 1984)。

客观注释学

客观注释学(objektive Hermeneutik)原本是 Oevermann 等人(1979)为了分析自然情境下的互动(如家庭谈话)而设计出来的。在此期间,该方法也被用来分析其他各种类型的材料,包括艺术作品和图片(Müller-Doohm 1993)。Schneider(1988)对此方法进行了调整,使其适合用于诠释访谈。对客观注释学的对象领域的普遍化扩展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即现在世界被理解为文本,正如一本汇集了理论和方法论文章的论文集的标题——"世界作为文本"(Welt als Text)(Garz 1994)——所表明的那样。客观注释学原则上区分某一陈述或行为对于参与者的主观意义及其客观意义。用来标示客观意义的是以下概念,即行为的"潜在的意义结构"(latente Sinnstruktur)。对于这一潜在意义结构的探究要通过一个多层次的科学的诠释程序来实现。因为客观注释学以此类结构为取向,所以人们同时也使用"结构注释学"(strukturale Hermeneutik)的概念(如 Schneider 1985)。

客观注释学的方法程序

分析"严格地按照顺序"进行,也就是说,分析所遵循的是事件在时间上实际的进展顺序。分析应该由不同诠释者组成的团队来完成,他们对同一个文本进行分析。诠释者团队首先要确定,哪一个案例需要得到分析,以及他们应该将该案例置于哪一个层面:是作为某个具体的人的陈述或行为呢,还是作为某一机构中的某种特定角色的扮演者的陈述或行为,或者是作为某一类人中的一个成员的陈述或行为(Schneider 1985,第 78 页)。在确定下来以上内容之后,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顺序性粗略分析**(sequenzielle Grobanalyse),其目的是要分析某个陈述的外在情境,以考虑到外在情境的影响。在这里,分析的内容首先是以下的考虑,即所要调查研究的行为及互动是对哪种具体的行为问题的解决。研究者要在此发展出在之后的分析中有待于验证的第一批案例结构假设以及整个案例的大体结构。明确外在的情境以及对案例的互动性嵌入有助于回答以下的问题,即相关资料是如何形成的:

> 互动性嵌入(Interaktionseinbettung)这个关键词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要确定一个记录下来的行为顺序的外在情境的各个不同的层面,并且要考虑到它们对于具体的互动实践本身可能产生的后果和限制,包括作为一个互动过程的、制作记录的条件。(Schneider 1985,第 81 页)

客观注释学的核心分析步骤是**顺序性精细分析**(Sequenzielle Feinanalyse),它包括在以下九个层面上对互动的诠释(Oevermann et al. 1979,第394-402页,参见提示框25.2)。

提示框25.2 顺序性精细分析的层面

0. 阐明直接存在于某一个互动行为之前的情境。
1. 按照相伴的口头表述的原话改写互动行为的意义。
2. 阐明互动主体的意图。
3. 阐明互动行为的客观动机及其客观后果。
4. 阐明互动行为在分配互动角色中的作用。
5. 指出互动行为的语言特征。
6. 就连续的沟通形态(Kommunikationsfiguren)阐明诠释行为(Interpretationsakt)。
7. 阐明一般的相互关系。
8. 借助于其他案例的互动顺序独立检验在此前的层面上所提出的普遍性假设。

出处:Oeverman et al. 1979,第394-402页

这一程序的本质性特征是,通过思想试验建构各种可能的情境并对其逐步地加以排除来重构某一陈述的客观情境。对陈述和行为的主观意义的分析在这里居于次要的地位。研究的兴趣集中于互动的结构(参见Reichertz 1988,2000)。在第四个层面上的分析活动以会话分析框架下的解释为导向。而第五个层面上的分析则聚焦在文本在形式上和语言上的(句法的、语义的或语用学的)特征。第六至第八层面致力于逐步提高所发现结构的普遍性——人们在文本内部检验沟通形态是否可被证明是连续的形态。这些形态和结构将作为假设在其他的资料中逐步得到检验并且可能会被证伪。

按照Schneider(1985)的分析,从互动记录中提炼出普遍性的结构可以表现为顺序性精细分析的如下流程:首先,第一个互动行为的客观意义得到了重构(即没有去考虑具体的情境条件)。为此,"研究者团队讲述尽可能不同的、多样的情境故事,它们都一致地符合某一陈述"(Oevermann 1983,第236页)。在第二步,人们将第一步所发现的"普遍的结构特征与所分析的陈述实际上所处的具体的情境条件进行了比较"(Oevermann,第237页)。一个行为的意义可以在该行为可能处于其间的可能情境和该行为实际上所处的具体的情境之间的比较中得到重构。在第三步,诠释者通过思想试验分析第一个陈述对接下来的互动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可能性选择可以被用来作为"确定实际发生的下一个陈述的一种反衬"(同上,第274页)。通过逐步地排除这些有关互动进展的备选可能,案例的结构逐步地显现出来,并且最终通过在其他案例那里得到验证而被普遍化。

案例 当事人与咨询师的互动

Sahle(1987)运用客观注释学的方法程序分析了社会工作者和他们的当事人的互动,并额外地访谈了参与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该研究呈现了四个案例分析。在每一个案例中,研究者详细地诠释了开场白片断,以从中找出互动的"结构公式",然后研究者用按照随机原则从其他文本中选择出来的段落来检验这一结构公式。Sahle从分析中推导出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自我理解的假设并通过访谈来检验这些假设。Sahle在一个简单的比较中将案例分析联系在一起,并在最后和参与研究的社会工作者一起讨论她的研究发现。

新近的发展

Reichertz(2000,第517页)概要叙述了在采用客观注释学的研究中出现的三种文本诠释的变体形式:

1. 在八个不同的层面对文本进行**精细分析**,在这里,有关外在情境的知识和互动类型的实用性事先被明确阐明,并在分析当中得到关注(……)。
2. 一步一步地对每一个互动进行**顺序分析**,并且不事先阐明一个陈述的内在或外在情境(……):这是一个具有最高要求的客观注释学的变体形式,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以整个方法的方法论假定为取向。
3. 在着手诠释待诠释的文本之前,先对所有参与互动者的**客观社会资料进行详细的诠释**(……)。这一变体形式在应用注释性解释的理论基础方面表现得极为灵活,更多地是在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应用它们。

客观注释学最初是为分析日常谈话互动而设计的。这些互动被记录下来并被转录为文字供诠释所用。顺序分析想要从行为的进展过程中重构社会意义的层次。如果这些行为按照其过程被记录下来并在之后被转录为文字,那么,研究者就可以从开始到结束(至少是记录的开始和结束)逐步地分析这一过程。因此,顺序分析总是以互动的开场片断开始。在用这一方法来分析访谈时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即人们在讲述事件和过程时并不总是按照其先后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比如说,访谈对象在谈论他生活的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时,会在谈论过程中提到在此之间发生的事件。即便是在叙事访谈中,对事件和经历的叙述也不总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在提纲访谈中更是如此。在使用顺序分析的方法来诠释访谈时,首先需要从受访者的讲述中重构出"所研究行动体系的历史先后顺序"(Schneider 1988,第234页)。为此,研究者首先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访谈中所陈述的那些事件。顺序分析遵循的便是这一顺序,而非是访谈在时间上的进展顺序:"顺序分析的开端并不是第一个访谈的谈话开始部分,而是受访者谈到的在时间上最早发生的那些行为事件,它们是该案例史在时间上最早的'资料'。"(Schneider 1988,第234页)

其他一些新近的发展旨在从客观注释学中推导出一种图像注释学(Bild-Hermeneutik)(Müller-Doohm 1993)。从对Oevermann之越来越狭窄的结构概念

的批判开始(参见 Reichertz 1988),Lüders 做出了进一步的尝试,即将对主观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区分纳入到对解释模式分析的发展之中。不过,这一解释模式分析对主观见解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Wernet(2000)提供了一个有关客观注释学之分析技术的系统的概括介绍。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在客观注释学这里,一方面,顺序分析的方法得到了最前后一致的应用,并被提升为一种包括不同的方法步骤的程序。另一方面,客观注释学同样是前后一致地表明了,主观看法只是理解社会现象的一种渠道,意义同样也会在社会的层面上得以产生和延续(有关这一点在其他情境中的论述请参见 Silvermann 2001)。最后,客观注释学最前后一致地体现了社会科学作为文本科学的思想(Gross 1981)。另外一点是,客观注释学对以下要求的强调,即要求以研究者团队的形式来对文本进行诠释,以扩展有关文本的阅读方式和视角的变化幅度,以及在团体中确认所提出的诠释的有效性。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客观注释学的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模型(参见第 6 章)。客观注释学的研究问题旨在对行为或物体的社会意义做出解释(参见第 9 章)。取样的决定通常来说是逐步(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地)做出的。尽管说客观注释学也被用来诠释访谈以及在少数情况下也被用来诠释来自观察研究的实地记录,但是客观注释学常常放弃资料收集方法,而只是记录日常的互动。对研究结果的推广化常常是以案例研究开始,有时会通过案例对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参见第 29 章)。

方法的局限性

客观注释学这一方法的问题是,它通常来说局限于对个案的分析,这也是因为使用这一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它常常不经过中间的分析步骤就直接从个案分析跳跃到提出普遍性结论。客观注释学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将其方法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很难通过教学手段进行传授,因此阻碍了这一方法得到人们更加广泛的应用(有关这一方法的危机请参见 Schneider 1994;有关对诠释学诠释的要求请参见 Bude 1994)。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方法还是得到了相当多的应用。

社会科学注释学与注释性知识社会学

这两类研究方法借鉴了客观注释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对于注释学和研究对象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客观的”这一概念在这里不再得到使用,人们将重点更多地置于知识的社会建构之上。此外,相对于访谈资料而言,人们在这里更加偏

爱非标准化资料——如互动记录。研究者应该尽可能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进入研究实地,收集非结构化的资料。对资料的诠释分三步进行:首先,研究者运用Strauss(1991,参见第23章)所提出的开放式编码的方法,将分析聚焦于资料的顺序性结构(一行接一行,有时一个字接一个字地分析)。在第二步,研究者找出那些具有更强聚合性的意义单位和概念,它们可以将那些子单位连接起来。在第三步,研究者生成新的资料(记录),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对已做出的诠释进行验证、修改和补充(详细信息请参见 Reichertz 2000;Soeffner 2000)。

这里所介绍的顺序性分析程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以文本的时间性、逻辑性结构为取向,并将此作为诠释的出发点。因此,与第23章介绍的归类性分析程序相比,它们更加贴近文本。不同的方法程序在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表现出区别:会话分析首要关注的是互动的形式特征。在叙事分析这里,对叙述性和论证性访谈段落在形式上的区分有助于判断哪些段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研究者在诠释上的关注,以及这些段落所包含内容的可信度有多高(参见第24章)。在客观注释学分析这里,对文本在形式上进行分析被置于诠释工作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层面之上。有时候这些分析程序会从文本段落中推导出假设,并通过其他的文本段落来验证这些假设。

要　点

- 叙事方法和注释学方法都注意到所要分析的文本的结构。
- 分析依据文本的结构按顺序开展,并且是在这一结构的情境之中来分析陈述的。
- 传记性文本在所叙述的事件的先后顺序的情境中得到分析,因此,可以将生活史的内在结构与所叙述的生涯历程的外部结构结合起来。
- 社会科学注释学将注释学分析与扎根理论领域的开放式编码结合起来。

练习 25.1

1. 请您以自己的访谈资料为例,找出其中包含着的传记信息。请您指出在这里提到的资料并重构一个案例史(就其谈到的片断而言)。
2. 请您分析一下,受访者在访谈的不同部分,尤其是在访谈开始之初,是如何展示自己的。
3. 请您将顺序性精细分析的层面(参见提示框25.2)应用于对访谈开场白的分析。

拓展阅读

叙事分析

Bruner, J.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1-32.

Rosenthal, G./Fischer-Rosenthal, W. (2000). Analyse narrativ-biographischer Interview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56-468.

Schütze, F. (1983).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narratives Interview. Neue Praxis, 3: 283-293.

客观注释学

Hitzler, R./Honer, A. (Hrsg.)(1997).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Opladen: Leske & Budrich.

Reichertz, J. (2000). Objektive Hermeneutik und hermeneutische Wissenssoziolog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14-524.

Wernet, A. (2000).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pretationspraxis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Opladen: Leske & Budrich.

社会科学注释学与注释性知识社会学

Reichertz, J. (2000). Objektive Hermeneutik und hermeneutische Wissenssoziolog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14-524.

Soeffner, H.-G. (2000).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14-524.

26 质性研究中电脑的使用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能够判断电脑如何可以让质性研究变得更加简单。
- 认识到电脑在其主要应用领域（即对资料分析提供支持）的作用。
- 理解软件不能独立进行分析，也不能取代对分析方法的使用，它们仅仅是提供了一些能够使分析变得更加方便的工具。
- 知道如何为自己的研究去寻找软件并从中选出适合自己研究的软件。

新科技：期望、恐惧和幻想

质性研究正经历着技术上的变迁，并深受这一变迁的影响。从前面介绍的新的记录技术以及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资料形式（参见第22章），我们便已经可以看出科技对质性研究的影响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对资料的分析方面也出现了广泛的技术变迁，这与电脑被引入质性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不仅仅是个人电脑和文字处理软件在普遍的意义上改变了社会科学工作的方式（参见Flick 1996）。而且，人们还可以发现，在质性研究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特有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些专门针对质性研究而做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加强的话，那么很可能会给质性研究实践带来重大的改变。现在，人们可以找到许多专为质性资料分析而设计的电脑软件程序。因此，这些软件程序在说英语的地区有时也被称为质性资料分析软件（Qualitative Daten Analyse Software，简称QDA）或者电脑辅助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件（Computer Assistierte Qualitative Daten Analyse Software，简称CAQDAS）。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电脑被引入质性研究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些人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使用电脑可以带来好处，而有些人则对此持有保留意见，担心使用电脑会改变或者扭曲质性研究的实践。这其中的有些期望是合理的，有些担心

也是有根据的,但是大部分的期望与担忧都只不过是幻想而已。针对这两种态度,这里必须要(再次)强调指出,这种质性研究软件与统计分析软件(如 SPSS)有根本的区别:QDA 软件不能自动地或独立地完成质性分析,而 SPSS 则可以自动进行统计计算或者因素分析。准确地说,QDA 更像文字处理软件,它不能自行撰写文本,但是可以使对文本的撰写更加方便。不过,在这里,人们也对以下问题有长期的争论,即:自从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以来,写作活动本身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相似地,QDA 软件可以为质性研究提供辅助,但是并不会使质性研究自动化,更不会独自去完成质性研究,尽管 QDA 的使用会对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当作者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时,写作的人仍是作者自己,同样地,研究人员使用 QDA 软件进行编码时,编码的并非是软件,而是研究者自己。虽然这些应用软件可以提供很多的可能,但是人们始终要考虑到的是,这些软件程序并不能发展理论,正如文字处理软件不能撰写文章一样。这两类软件程序都只是对相应的活动提供辅助,简化和加快特定的工作步骤,或者带来其他的展示可能。

人们在近些年发表了一些有关这一不断发展中的市场的概括介绍,有些是从软件开发者和应用者的角度进行介绍(如 Richards/Richards 1998),有些则是从质性研究使用者的角度进行介绍(如 Gibbs 2007;Kelle 2000a,b; Seale 2000; Weitzman 2000; Weitzman/Miles 1995)。Fielding/Lee(1998)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自己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该研究使用了由这种软件的应用者组成的焦点小组。因为在软件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断地改善现有的软件程序,带来软件版本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在这些概括介绍被发表时或者在它们被发表之后不久,这些概括介绍的内容就已经部分地老化了。

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电脑的方式

虽然大部分软件和电脑在质性研究中都是被用于对资料的分析,不过,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的其他步骤,电脑也可以得到应用。概括来说,电脑和软件在质性研究中可以有以下的使用方式:

1. 在研究实地做笔记。
2. 撰写或者转录实地笔记。
3. 编辑:对实地笔记进行校正、扩充或者修改。
4. 编码:用关键词或者标记为文本段落命名,以便于日后查找使用。
5. 将文本保存到有组织的数据库中。
6. 搜索与读取:找出文中关键段落,以便用于进一步的研究。
7. 资料链接:将相关段落相互连接起来,形成范畴、信息簇或信息网络。
8. 写作备忘录:记录下对有关资料方面的反思性评论,作为深入分析的基础。
9. 内容分析:计算字词出现的频率、分析字词或者句子的顺序和位置。
10. 展示资料:将选出的资料或者缩减后的资料纳入一种浓缩的、有组织的格式

中,如矩阵(Matrix)或者网络体系,以便进一步的研究。

11. 得出结论并加以验证:帮助研究人员诠释显示出来的资料并且对结果进行检验和确认。
12. 建立理论:发展系统的、概念上相互关联的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检验假设。
13. 准备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Miles/Huberman 1994,第44页;Weitzman 2000,第806页)

这里所罗列的应用方式还可以得到其他应用方式的补充,例如对访谈的转录,研究日记的写作,通过电脑联网、电子邮件和因特网与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写作有关自己研究或其方法的文章,等等。所列这些工作中的一大部分都可以借助常见的文本处理程序来完成,其方便程度或复杂程度或多或少地有所不同(例如上面列表中的1,2,3,8,14等项,要完成4,6,9项工作则需要有高级的软件程序和使用技巧;参见Weitzman/Miles 1995,第5页)。这样我们就勾画出了电脑在质性研究中的第一种应用方式:简单地直接利用文字处理软件或者创造性地用这些软件来实现其他的功能。不过,正如Seale(2000,第162-163页)指出的那样,使用这类文字处理软件要比使用专门为此而设计的软件更加耗费时间。一些较高级的QDA软件能够管理、存储和展示音频资料和视频资料,如图片、电影、记录下来的文本资料和录像资料,并且能够将其纳入分析过程。它们明显地超过了一般的文本处理软件的功能。

对于使用软件来分析质性资料的期待和希望

在文献中,有些期待被称作是"现实的希望"(Weitzman 2000,第806页):第一个这样的期待就是在管理、处理、展示资料方面以及在资料和与此相关的信息单位(如编码和备忘录)中进行查询方面的**速度**提升和**时间**的节省。不过,如果人们考虑到选择软件、安装以及学习使用软件(甚至是电脑)所消耗的时间,那么,真正的时间节省要从长期效果来看和在较大规模的研究课题和数据处理中才会显现出来,而不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和在较小规模的数据处理中。

第二个期待就是使用电脑会提高质性研究的质量,或者至少能够令对这一质量的记录和展现变得更为简单。使用电脑可以提高分析程序的一致性(Weitzman 2000,第807页)或者前后连贯性(Seale 2000,第156页)。Kelle/Laurie(1995)认为,使用电脑可以提升质性研究的效度。最后,使用电脑可以提高研究过程的透明度、改善研究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因为电脑可以让人们更容易理解范畴是如何被发展出来并与特定的文本段落联系起来的。此外,Weitzman还提到电脑可以将研究资料(从原始的实地记录到最后研究成果的展示、文本、表格)存放在一个地方,即电脑硬盘中,从而可以做到对研究的加固。Seale(2000)认为,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电脑便于研究者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做出取样的决定(即理论取样,参见第11章)。

人们对于使用电脑的一个主要的期待就是它会令对资料的管理变得更加简单。Kelle(2000,第490页)列出了一系列QDA软件所支持的资料管理技术:

1. 能够在文本资料中插入电子链接("超链接")。
2. 能够存储和管理理论性评论和备忘录。
3. 能够构建和以图表的方式展示编码范畴的**网络**。
4. 可以对分配给各个文档的变量进行定义,并通过对变量的定义来查找文本段落。
5. 可以查找彼此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正式关系的文本段落。
6. 能够针对定量的内容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的QDA软件(文字处理软件或标准的数据库系统除外)都具有上面所列的前两项功能,其余的功能则只有高级的质性研究软件才具有。

更高级一些的QDA软件可以用图表的形式或者其他的形式呈现资料以及资料的结构和结果,以这些形式所呈现的内容可以被研究者在文字处理中直接使用,以便进行研究报告的撰写。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每一项技术都是针对专门的目的而被发展出来的,但是,没有一项技术可以避免人们将其用于其他的目的。例如有些人把NUDIST程序(见下面)当作个人图书的文献管理程序来使用,有些人则使用ATLAS/ti来完成其工作中的项目规划。

上面列举了很多的期待和希望。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套软件可以满足所有这些期待和希望,至少是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满足所有的期待和希望。正如文字处理软件在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问题一样,因为不同的分析软件之间存在着兼容性的问题以及相互输出资料的问题,所以,当人们选择了一种软件之后,就很难转换到其他的软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套标准,可以让某一软件中的资料和编码转移到另一个软件。因此,应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出选择某一软件的决定。最后,想要使用电脑软件者应该明白:"现在还没有**唯一**最好的软件。"(Weityman 2000,第803页)

用于分析质性资料的软件程序类型

现有的软件程序可以分为如下几类(Richards/Richards 1998; Seale 2000; Weitzman 2000; Weitzman/Miles 1995):

- 文字处理软件:不仅可以用于撰写文本,而且也可以在有限范围内管理文本,搜寻单词或者词组。
- 文本搜索软件:可搜索词组,完成对词组的总结、列表等操作。
- 文本管理软件:用于文本段落的管理、搜索、分类与整理等操作。
- 编码与搜索软件(Code-and-Retrieve-Programs):将文本拆分为段落,然后赋予其编码,这样就可以对具有相应编码的所有的文字段落进行搜索或列表。该

软件支持对文本和编码的标识、整理、分类和归类,可以联合呈现和管理两者(文本和编码)。

- 以编码为基础构建理论的软件:这类软件不仅支持文本层面的分析步骤和操作(如将一个或多个文本段落归入某一编码),而且也支持在概念层面上的分析步骤和操作(如编码之间的关系、上级范畴与下级范畴、范畴网络),并且每次都以相应的文本段落为基础。这类软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研究者对理论的构建。有些软件会包含高级的图表编辑功能,并且可以整合影像资料。
- 构建概念网络的软件:最后一类软件程序可以支持概念网络的构建(begriffliche Netzwerk-Bildung)。这类软件提供多种不同的可能性来发展与展示概念网络、范畴网络以及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展现各网络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用于分析质性资料的软件:选择的依据

如果一般的文字处理软件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他们可以转而寻找一些专门的应用软件,或者自己开发所需的软件。当前可以找到的许多软件就是这样产生的——出于某项具体研究课题中的特定的需求和必要性。有些软件的功能在开发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除了可以用于原初的目的之外,还可以被用于分析其他的研究问题和其他类型的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现今已经发展出大约25种软件,专门用来分析质性资料。这种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对于现有的各种软件不能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软件都有一定的局限,其根源分别在于它们各自的开发背景和目的以及软件程序中的侧重点所在。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可以查明某一软件与其他的软件相比所具有的优缺点:第一,可以提出用来分析软件的指导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应用于各个软件;第二,研究人员或者研究者团队在决定选用某种特定的软件之前,应该提出和回答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三,有关软件使用者经验的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Fielding/Lee 1998; Weitzman 2000)。

用来分析软件的指导性问题

在首次对当时存在的电脑分析软件进行总结分析时,研究者使用了提示框26.1中所列问题作为分析质性研究电脑软件的指导性问题(参见Flick 1991,第800页)。

提示框26.1 分析和比较质性研究软件的指导性问题

- 与资料相关的问题:该软件是为哪种类型的资料而设计的?除了这类资料之外,该软件还可以被用来分析哪种类型的资料?它比较不适合被用来分析哪种类型的资料?
- 与活动相关的问题:人们可以用该软件完成哪些分析活动和程序?哪些不可以?
- 与过程相关的问题:从现在的经验来看,该软件如何影响到人们对资料的分析以及研究者或者诠

释者所扮演的角色？该软件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在诠释的过程中，哪些工作因为使用该软件而变得更加的困难和费事？

- 技术性问题：使用该软件需要具备哪些硬件（电脑类型、内存大小、硬盘、显卡、显示器，等等）及软件（操作系统、其他必要的软件，等等）方面的前提？能否和其他软件（SPSS、文字处理软件、资料库，等等）联网？
- 与能力相关的问题：要想使用该软件，使用者必须具备哪些特殊的能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能力（编程的知识，或者是特定的编程语言）？

虽然在此期间人们已经发展出更多和更好的软件供人所使用，但是在选定某一软件程序之前仍然可以提出以上的这些问题。Weitzman（2000）以及 Weitzman/Miles（1995）的研究可以在此为人们提供导向：他们一方面为人们选择或放弃使用电脑来进行质性分析以及选择或放弃特定软件程序提供了选择的依据；另一方面，他们也按照特定的标准对 24 个软件程序进行了测试和比较。

选用软件之前需要提出的关键问题

Weitzman（2000）以及 Weitzman/Miles（1995，第 7-8 页）建议，人们在作出选用某种软件或使用电脑的决定之前应该就软件的使用提出一系列关键问题。他们所提出的这些关键问题在下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

- 研究者属于哪种类型的电脑使用者？这里可以列出四种水平的电脑使用者（从新手到电脑黑客）。对于新手（第 1 水平层次）来说，电脑还是陌生的事物。他需要花时间来学习和掌握电脑的各种功能以及如何一般性地使用软件。对于这类电脑使用者来说，复杂性更高一些的 QDA 软件很可能超出了其使用能力的水平。在使用软件分析文本之前，他们首先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掌握该软件的使用。处在第 2 水平层次的电脑使用者已经有了一些使用软件和硬件的经验，并且知道如何学习和尝试新的软件。处在第 3 水平层次上的电脑使用者自己有兴趣去探索电脑软件的特性和潜能。处在第 4 水平层次上的电脑使用者是黑客，他们被认为是电脑专家和电脑痴迷者的合成体。除此之外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应该使用或者已经在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电脑和操作系统（Windows，Unix，还是 Apple）？最后还要考虑到研究者自己在质性研究方面的经验：质性研究的新手通常来说与使用电脑的新手类似，对于他们来说，使用高级的软件及其功能以及做出选择某一软件的决定都是过高的要求。
- 选择使用某软件是为了完成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还是为了在今后数年中连续使用？这里涉及三个问题：首先，学习使用软件以及完成其他预备工作所需花费的时间与使用软件所能节约的时间以及所带来的其他可能相比，二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当仅有少量的资料需要分析的时候；第二，选择软件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当前研究的情况（例如资料类型、研究问题等）做出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同时也考虑到了将其用于未来的、可能更加复

杂的研究？第三，当前的研究课题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通常来说，研究课题在此时已经接近尾声，选择使用电脑的动机是为了加快资料分析的最后几个步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以下的情况，即：购置电脑、软件、分析程序包以及将资料输入软件所需花费的时间，超过了使用电脑所能帮助节省的时间，因此，使用电脑不但不会节省时间，反而会延迟研究课题的完成，让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 这里涉及的是什么类型的资料和研究课题（一个或多个资料来源，个案研究还是比较研究；结构化的资料还是开放性的资料；格式统一的数据录入还是格式不同的数据录入；资料库的规模）？所使用的资料仅仅是文本，还是也包括录像或图片、语音资料、动画图像、电子邮件和网络痕迹（参见 Bergmann/Meier 2000）？并非所有的软件都能处理这些形式的资料。每个案例都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呢，还是说只有一种资料类型？所要完成的是一项案例研究呢，还是说要同时或先后分析不同的案例？所使用的资料的格式（如转录的准确度）在研究课题中从始至终都是固定的呢，还是会在研究进程中有所改变（如提高转录的精确度）？资料是结构化的资料呢（例如通过在每个访谈都使用相同的访谈提纲），还是自由格式的资料（例如受访者在没有外在主题框定的情况下对自己生平的叙述）？最后还要考虑资料规模的大小以及所选用的软件在处理大规模资料方面的局限性。
- 计划进行哪种类型的分析（探索性的还是验证性的，事先确定好的编码还是有待发展的编码，多重编码还是单一编码，单轮的分析还是逐步分析，分析的精细度，对资料上下文情境的兴趣，对于资料的展示有何期待——只是质性分析呢，还是也包括定量分析）？采用事先确定好的范畴体系呢，还是要在分析的过程中发展出范畴体系？有些软件是专为验证假设而开发的（参见 Kelle 1995 中的文章），而另一些软件则更多地是为了发展理论。将资料保持在其上下文语境中或者同时（在显示屏上）呈现某一陈述的上下文语境有多重要？软件有必要具有将多个编码分配给同一个文本部分的功能吗？多个研究者是同时还是先后对同一文本进行分析和编码呢？
- 在分析资料过程中，资料的可接近性（Nähe zu den Daten）有多重要：被诠释的文本是否始终都可获取（在屏幕上），还是说只是范畴可以随时获取？
- 成本方面的限制：是否可以购买所需的软件和配套的电脑？
- 分析要达到怎样的精确度？例如，会话分析者非常细致地分析资料中的某一非常短的片段（例如谈话中的一段发言）。Ten Have（1999）指出了如何将电脑用于此类分析的多种途径。

这里肯定还要再补充一个问题，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掌握电脑和软件。如果人们在研究课题马上需要结题之时仍无助地面对着大堆的资料，而且不太精通电脑的话，那么，使用分析软件也无法（至少无法在短期内）“拯救”他。

范例：ATLAS/ti，NUDIST/NVivo 和 MAXQDA

ATLAS/ti

ATLAS/ti 是由 Thomas Muhr 在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的一个项目中开发出来的（参见 Böhm，Mengel/Muhr 1994）。该软件的基础是 Strauss（1991，参见第 23 章）提出的扎根理论和理论编码。当前版本（5.2 版）所要求的技术配套是：IBM 兼容的 PC 机（486，建议奔腾：233）、16 MB（最好是 32 MB）内存，VGR 显卡（640 × 480）、16 位颜色（最好是 1 024 ×768，真彩）、DOS 3.0 或以上、带有 11 MB（最好是15 MB）可用空间的硬盘、虚拟内存 15 MB（最好是 50 MB）、光盘驱动器。操作系统应为 Windows 98SE、Windows ME、Windows NT 4.0 SP6、Windows 2000 SP3，Windows XP、Windows 2003、W 2000 或者 XP。该软件最新的版本不仅可被用来处理文本资料，也可用来处理带有 Excel 表格和幻灯片等物件的富文本格式的资料（Rich Text Format-Dateien）以及 Word 文档、图片、版画、声音等。

大多数的作者都把 ATLAS/ti 归入用于构建概念网络的软件这一类别，以及（更主要的）"以编码为基础构建理论的软件"这一类别（Weitzman 2000，第 809 页）。该软件可让使用者在文本层面和概念层面完成分析操作（参见上面的介绍）。通过统合原始文本（例如需要得到诠释的访谈资料）和属于该原始文本的诠释和编码，这一软件可以在显示屏上形成一个"注释学单位"（hermeneutische Einheit）。该软件可以将原始文本和它所获得的所有编码以及评论呈现在显示屏的不同窗口中。该软件有很多功能，在显示屏上以符号的形式显示出来（如搜索、复制、剪切、分配编码、联网功能，等等）。

该软件除了能够搜索文本中的字词串和对编码进行归类之外还可以将编码和范畴以概念网络的形式加以呈现，这也是很有益的一个功能。范畴和上级范畴与其所指向的文本段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被保留了下来，可以直接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研究者可以在显示器上对编码进行列表或打印。该软件还设置了与 SPSS 及其他的软件相连接的界面。此外，多位研究者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来分析同一个文本。ATLAS/ti 软件的开发者为使用者提供比较好的支持服务，还提供一份不断更新的使用者的电子名单。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该软件的信息以及与其他使用者取得联系，请访问作者的网站：http://www.atlasti.com。

NUDIST/NVivo

该软件是由 Richards/Richards（1998）最初为 MAC 程序而设计的软件，后来才扩展至私人电脑（PC）的版本。之前的版本（N6）被现在更新的 NVivo7 所取代，而且仅供私人电脑使用。该软件适用的操作系统是 Microsoft Windows 95/98 或者 NT 3.51 或者 4.0，Windows 2000 或 XP，在此期间也包括了 Vista。当前版本（NVivo 7）所要求的电脑技术规格是：1.6 GHz Pentium Ⅲ兼容处理器或者更快，

至少512 MB 内存,1 GB 的硬盘存储空间。该软件早期的版本被 Weitzman(2000, 第809页)归入"以编码为基础构建理论的软件"这一类别。最新版本的软件都具有完全的指令语言,可实现编码和搜索的自动化,还可以对最初分开完成的两个或多个研究项目的分析资料进行合并。

该软件有一些典型的特征,如"系统闭合"(System-Schließung)(也就是说,可以将备忘录或搜索结果加入原始的资料之中)和以等级性树状结构在显示屏上呈现编码("列表")。相关信息和技术支持请访问 http://www. qsrinternational. com。

MAXQDA

该软件是在 Udo Kuckartz 研发的 winMAX 软件(1989 年面世)基础上的改进版。用该软件可以撰写 Rich Text Format 格式的文本或者通过"拖放"(drag and drop)从网络引进文本。使用该软件可以生成高达 10 个层级的编码体系和范畴体系。该软件可以将编码矩阵和编码之间的关系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经过编码的文本段落可以按照其重要性得到评价,并可以在分析中对其相应地进行筛选。文本可以与其边框上的评注一起被打印出来。变量的列表可以被输出至统计分析软件。对于处理器的软硬件要求是:Pentium Ⅲ或者更高级,最低700 MHz 操作系统:Windows 98/ME 或者 Windows 2000、Windows XP,至少 128 MB 主要内存,1 024 ×768 或者更高的显示器。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见:www. maxqda. de。

这里介绍的三个软件(有关其早期版本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Weitzman/Miles [1995])只是全部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软件程序及其不同版本的几个例子。有关电脑辅助的质性分析领域的最新发展以及其他软件的信息(开发者的链接或对最新文献的提示),请访问英国 Surrey 大学 CAQDAS 项目的网页:http://www. soc. surrey. ac. uk/caqdas。此外,Ohlbrecht(2000)提供了有关不同软件程序的概览及其购买信息。

在质性研究中使用软件的方式

Kelle(2000a,第295-296页)在一篇关于在质性研究中使用电脑的概述中提出了两种可能的使用策略。第一种使用策略主要遵循的是扎根理论的发展及其工作方式(Strauss 1991;参见第23章),在这里,编码是从实证资料中(即文本中)发展出来的:

- 第1步,将文本资料格式化。
- 第2步,使用开放式编码来对资料进行编码。
- 第3步,撰写备忘录并将其与文本段落相连接。
- 第4步,对获得相同编码的文本段落进行比较分析。
- 第5步,融合编码并将备忘录和编码链接起来。

- 第 6 步,发展核心范畴。(Kelle 2000,第 295 页)

第二种使用策略在更高的程度上得到了形式化(formalisiert),因为这里在开始时便发展出一个编码模式以及一个数字化的资料矩阵(Datenmatrix)。在这里,使用电脑主要是为了能够将质性分析与之后某个分析步骤中更加量化的分析相连接。

- 第 1 步,将文本资料格式化。
- 第 2 步,定义编码模式。
- 第 3 步,使用该编码模式对资料进行编码。
- 第 4 步,在编码过程中将备忘录和编码(不是和文本段落)链接起来。
- 第 5 步,对获得相同编码的文本段落进行比较分析。
- 第 6 步,从这一比较中发展出次级范畴(Unterkategorien)。
- 第 7 步,使用上一步发展的次级范畴对资料进行重新编码。
- 第 8 步,生成一个数字化的资料矩阵,在这里,各行代表文本资料,各列代表相应范畴(编码)以及范畴和次级范畴的数值。
- 第 9 步,用 SPSS 分析这一资料矩阵。(Kelle 2000,第 296 页)

对于研究者自己使用软件的方式而言,以上两种使用策略仅作为参考性的建议。每一位 QDA 软件的使用者都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以及资料类型和研究课题中的资源等因素确定自己的使用策略。

案例 赞比亚青年中有关艾滋病的社会展示

Joffe/Bettega(2003)在分析对赞比亚青年有关艾滋病的访谈中使用了 ATLAS/ti 软件。他们之前与赞比亚的青年进行了 60 次提纲访谈,访谈对象是年龄在 15 岁到 20 岁之间的青年。访谈的主题和结果都涉及人们对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想法:(1)艾滋病病毒/艾滋病(HIV/AIDS)的源头,(2)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传播,(3)自己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风险。Joffe 和 Bettega 用 ATLAS/ti 软件建立了一个主题网络图(参见图 26.1),用来展示参与者有关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起源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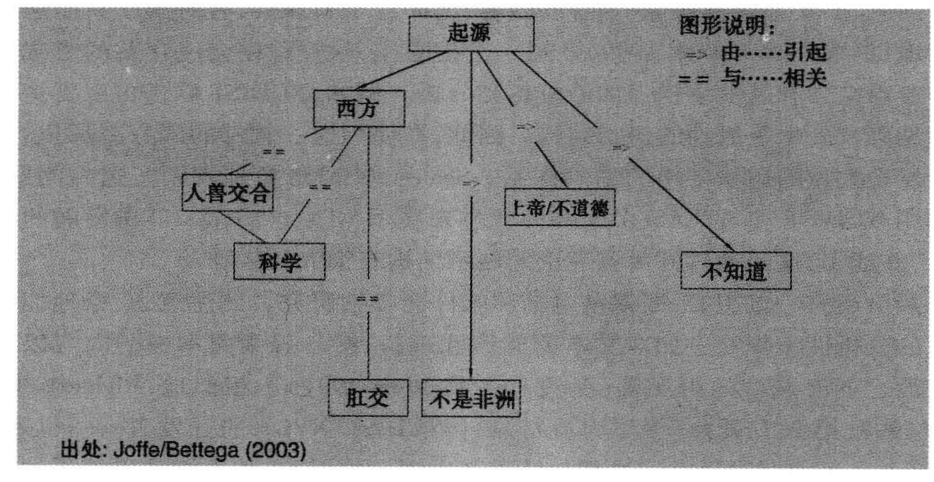


图 26.1 以用 ATLAS/ti 制作的主题网络的形式展现艾滋病的起源

软件对质性研究的影响:举例说明

有关软件对质性研究影响的讨论从软件开发的初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一讨论受到了人们不同顾虑和担心的影响:首先,有一部分主导性软件是在某种特殊方法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如按照扎根理论来进行编码),难以应用于其他的方法。如果这种软件不适合用来在更高的程度上进行顺序性诠释,那么使用这种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者就会忽略这种软件。使用这种软件会不会改变分析文本资料的方式呢?或者说,使用这种软件会不会在普遍的意义上造成方法的统一,导向一种质性研究的"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正如 Coffey 等人(1996)所担心那样? Fielding/Lee(1998)在他们的一项有关在质性研究中使用软件的实证调查中发现,尽管他们所调查的研究项目都使用了 CAQDAS 软件,但是其中有三分之二的项目并没有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及其编码方式。这一事实驳斥了这样的一种论点,即:使用这种软件会导致分析方式的统一,让某些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来看,对电脑的使用与对 Strauss(1991)的方法的使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些研究者想象的那样紧密。Ten Have(1999)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可以将软件应用于会话分析。

另一个问题就是电脑软件对于各种不同的诠释方法的适用性。与编码和分类的方法相比,在顺序性分析这里,不同软件程序所提供的功能显得更加不重要了。这里仍然需要提出的一个批判性的问题是,随着人们在诠释文本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程序,对它们的使用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特定的与这些软件"不兼容"的文本处理方式不再得到人们的使用?如今人们使用录音机做记录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那些不能被录像/录音的内容,比如参与式观察,有时候就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参见 Bohnsack 1999)。另一个担心是,软件程序会以含蓄的方式将自己的逻辑结构和展示结构强加给资料和分析。例如,NUDIST 软件可以支持研究者为编码发展出等级性的树状结构。因此,在使用这一软件的研究者那里,人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树状结构的编码体系。Seale(2000)形象地阐明了这一问题,他分别用 NUDIST 和 ATLAS/ti 这两种软件来展示 Glaser/Strauss 早先发展的扎根理论,并证实,这两种软件对该理论的展示结构有很大的区别。

最后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电脑和软件会吸纳研究者的注意力,令他们忽视真正的分析性工作——如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潜心思索文本中的内容以及在其表面之下潜藏着的内涵等(参见 Lee/Fielding 1991)。相似地,Richards/Richards(1998,第 211 页)——作为流行软件 NUDIST/NVivo 的开发者——也表示:"电脑方法可能会对研究的过程与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从人们难以接受的对分析的限制到带来意想不到的可能。"不过,这种影响效果最终还是取决于研究者

自己及其在研究中使用电脑和软件的方式，以及他如何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

分析软件之所以尚没有得到更加广泛地使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软件相对而言还属于是新事物，其中有些软件才刚刚摆脱开发阶段进入现有的阶段，有的软件在这个阶段才刚刚具有可操作性、可靠性和便于使用者使用等特性，而有些软件则刚刚走出开发阶段就已经完全老化了，比如那些早期的计算机辅助的内容分析软件（用于大型计算机）。另一方面（尽管所有更加现代的软件也都是在私人电脑、其他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中运行的），这些软件始终还是与电脑捆绑在一起。这就带来了入口的问题（并非每个质性研究者都喜欢电脑）和可进入性的问题（除了软件之外，研究者还要学习、掌握和使用操作系统以及设备本身）。可进入性问题（Zugänglichkeitg）也可以理解为空间方面的可进入性问题，研究人员毕竟要在电脑上进行分析，而且在此时间内电脑是可供使用的。

电脑将会（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在质性研究领域得到推广。质性研究将会因此发生怎样的改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人们应该将软件和电脑看成是辅助质性研究的实用工具。软件和电脑的使用者应该批判地反思它们对于研究本身的影响。同样，人们既不应赋予它们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也不应将其妖魔化。

使用电脑或许可以带来对工作程序进行记录的新的可能，并由此提高研究过程的透明度。这样一来，使用电脑便可以为改善质性诠释的有效性论证做出贡献。对于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应该密切地关注。不过，到目前为止，私人电脑和质性资料分析软件的使用尚没有给质性研究带来一场普遍性的技术革命。

对整个方法讨论的贡献

使用软件令对分析技术（如理论编码）的应用变得更加明确和透明。使用软件可以让人们明白研究者如何从一篇待分析的文本中发展出范畴这一工作路径。研究者的工作路径可以通过使用软件得到更好的记录和交流，包括工作团队中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与研究报告读者的交流。有些作者认为，这种形式的透明度提高了质性分析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这些软件提供了管理编码和文本以及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新的形式，还支持新的展示形式，并可以在分析中链接文本/口述资料和非文本/视觉资料。

置于研究过程之中来考察

这类软件最适合与扎根理论的分析程序（参见第 8 章）结合使用，在这里，理论编码被用来从材料中发展出范畴。不过，在对这些软件的应用中，不同资料的可使用性局限正在不断地被超越。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料分析也和 QDA 软件的使用兼容，但是这种软件始终还是最适合被用来进行编码和归类。

方法的局限性

使用 QDA 软件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软件只是一种辅助研究者进行分析和诠

释的工具,它应该建立在真正意义上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人们可以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发表物的作者在谈到他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时,仅仅(只是)表示,他们使用了比如说 ATLAS/ti 软件。如果这是他们对其所使用的资料诠释程序的唯一说明,那么难免会让人产生以下的印象,即:这些作者误解了这类软件的角色,他们没有将这类软件看成是一种工具,而是错误地将其看成是方法。另外一个局限性在于这些软件和质性研究中的有些方法不兼容。

要　点

- 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及早便作出了使用软件的决定,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来为软件的使用做好准备,那么软件便可以对文本的分析提供帮助。
- 现在可供使用的软件程序正处在高速发展中,而且发展的方向是它们在功能和特性方面变得更加相似(这与其他领域的技术发展是类似的)。
- 这些软件并不能独自完成分析。它们对诠释资料方式的影响以及对整个质性研究的影响比人们所担心的要小。尽管如此,人们仍要反思对它们的使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软件的使用要服从于分析的原本风格,而不能让软件的功能和局限来决定原本的分析。
- 这些软件本身并不是分析方法,它们只是被用来支持对某种质性资料分析方法的应用。

练习 26.1

1. 请您利用本章中所给出的某一个链接去下载一个(或多个)本章所介绍的软件的演示版本。请您试用一下这一软件,了解一下人们可用该软件做些什么以及该软件如何支持资料分析。
2. 请您思考一下如何将该软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以将您的分析变得更加透明。
3. 如何通过使用该软件来节省时间或者简化您的工作?
4. 请您从文献中找出一项没有使用这些软件的研究。使用软件可以如何改善这项研究,软件对分析的影响是什么?

拓展阅读

Fielding, N./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Gibbs, G. (2007).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Book 6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Sage.

Kelle, U. (2000b). Computergestützte Analyse qualitativer Da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85-502.

Kuckartz, U. (2005). Einführung in die computergestützte Analyse qualitativer Daten. Wiesbaden: VS-Verlag.

Weitzman, E. A. (2000).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803-820.

有关软件发展及其使用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http://www.soc.surrey.ac.uk/caqdas.

文本诠释：方法概览 27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能够

- 通过比较获得有关质性资料分析方法的了解。
- 通过比较认识到各种质性资料分析方法的优缺点。
- 结合研究过程和研究计划的其他阶段理解和评价自己选择的资料分析方法。

文本在质性研究中或早或晚都会成为诠释工作的基础，也是从整个实证资料中得出结论的基础。工作的切入点在这里是理解文本，即理解访谈、叙事、转录为文字的观察或者其他的文档。通常来说，这里所做的是对相关案例的理解和体会。不过，对个案的重构在不同的分析方法那里所获得的关注度有所不同：内容分析往往是以范畴为单位，而不是以案例为单位；Strauss 的方法也不以案例分析及其结束作为准则；会话分析的焦点在于研究特定的社会语言现象并致力于直接收集所研究现象的例子，而不是去分析整个的案例。

与以上分析程序不同的是，在主题编码、叙事访谈分析和客观注释学这里，案例分析（Fallanalysen）是第一个分析步骤，在第二个分析步骤才会对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总体分析旨在对案例做出粗略的分析，为之后的以案例为单位的分析或跨案例的比较分析做好准备。不同诠释方法对于案例的理解可以被定位在“彻底的个体独特性”（konsequente Idiographik）和“［普遍适用的］准法则”（Quasi-Nomothetik）（参见 Flick 1989，第 15-16 页）这两种取向之间。第一种取向将案例当作案例，或多或少地直接从个案（一个谈话片断、一个传记或主观理论）中推断其中所表达出来的一般的结构或规律性。客观注释学和其他与此相近的旨在重构案例的方法是这种取向特别合适的例子（参见 Hildenbrand 1999）。在第二种取向中，不同的例子被汇集在一起，在这里，单个的陈述——因此说是“准法则”——被从其上下文的语境（案例、过程）和结构中剥离出来，以便于找出其中所包含着的普遍性的结构。

前面各章中详细介绍的文本诠释方法对于各自的研究问题而言或多或少都是适合的。研究者在作出选择某一具体方法的决定时，可以以下面介绍的四个参照点作为参考。

表 27.1 文本诠释的方法

	编码和归类				会话分析与话语分析		叙事分析与注释学分析		电脑/软件
方法标准	理论编码	主题编码	质性内容分析	总体分析	会话分析	话语分析	叙事分析	客观注释学	CAQDAS 软件，如 ATLAS/ti
对相应的文本的开放性，通过：	• 开放式编码	• 案例分析的原则 • 简短的案例特征描述	• 解释说明性内容分析	• 以案例为单位对文本的分析	• 顺序性分析态度	• 重构参与者的理解	• 顺序性案例分析	• 顺序性案例分析	• 允许对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
对研究主题的结构化（例如深化），通过：	• 轴向式编码 • 选择式编码 • W-问题 • 持续比较	• 为案例分析发展一个主题结构 • 看法的核心和社会分布	• 概括总结性内容分析 • 结构性内容分析	• 一目了然性便于查找额外的证据	• 对案例集的比较分析	• 融合其他形式的文本	• 判断文本的形式质量（叙述 *vs.* 论证）	• 诠释者小组 • 考虑到上下文语境 • 根据文本对假设进行证伪	• 可以对范畴进行特定的结构化（树状式或等级式）
对诠释方法一般发展的贡献	• 归纳和演绎的结合 • 开放性和结构化的结合	• 在个案分析之后针对研究主题进行小组对比分析	• 严格按照规则缩减资料量的分析程序	• 为研究者在编码和诠释中选择文本提供额外的建议	• 对自然互动的形式分析揭示了谈话进行的方式	• 将话语分析再度导向关注内容和社会科学主题	• 提供了诠释叙事的具体模式	• 超越了主观的视角 • 发展了一种文本诠释的方法论	• 让编码变得更加透明以及可以对编码进行记录
应用领域	• 在所有可能的内容领域发展理论	• 群体比较	• 用来分析不同内容领域的大量资料	• 为其他的分析程序做准备	• 对日常对话和机构性谈话进行形式上的分析	• 对日常谈话和其他的论述进行内容上的分析	• 传记研究	• 所有形式的文本和图像	• 所有形式的文本和图像
实施中的问题	• 对于何时结束编码没有确定明确的标准	• 因为有案例分析这一中间步骤，因而耗时费力	• 对程式化规则的应用常常比较困难	• 对文本的快速概览不能替代或妨碍精细分析	• 分析局限于谈话中的形式次序和最小的谈话序列	• 几乎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方法论	• 分析扎根于案例，难以得出推广性结论	• 从个案转至普遍性陈述	• 与注释学方法的兼容性有限
方法的局限性	• 方法规则的灵活性，主要是通过实践经验来掌握	• 局限于采用事先定义好的比较群体的研究	• 在很大程度上以定量研究的方法论为导向	• 与顺序性分析的兼容性值得质疑	• 将分析焦点局限于与社会科学相关的内容	• 对话语的概念没有具体的界定	• 对叙事与现实的等同理解（如 Schütze）	• 结构的概念 • 是艺术而非方法	• 不是方法，只是工具 • 不足以用来理解分析
参考文献	Böhm 2000，Strauss 1991，Strauss/Corbin 1990/1996	Flick 1996	Mayring 1983，2000	Legewie 1994	Bergmann 2000b，Rapley 2007	Keller et al. 2001，Potter/Wetherell 1995	Rosenthal/Fischer-Rosenthal 2000，Schütze 1983	Oevermann et al. 1979，Reichertz 2000，Wernet 2000	Gibbs 2007，www.soc.surrey.ac.uk/caqdas

第一参照点:基于标准的方法比较

我们可以在此对比分析一下用于文本诠释的各种不同的编码和顺序性分析方法(参见表 27.1)。第一个比较标准是各个方法用来保证对文本保持开放性的措施,这些措施用来保证研究者在分析中对每个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保持足够的开放性。第二个比较标准是各个方法在处理文本中用来保证获得足够水平的结构化和深度的措施以及用于提高这一水平的措施。其他的比较标准还有:各个方法对于文本诠释方法一般发展的贡献,各个方法得到发展和使用的主要应用领域,各个方法在实施中的问题,最后还有已经表明的各个方法的局限性。在这个由各种备择性文本诠释方法所构成的场域中,每个方法都会得到相应的定位。

第二参照点:方法的选择及对其应用的检验

与收集资料的方法一样,对于文本诠释而言,也没有一种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适的。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研究的问题和目的以及所收集的资料来从各种备选的诠释方法中做出选择,而且要用有待诠释的资料来检验自己的选择。对于诠释方法选择及应用的评估应该尽早地在诠释过程中实施——如果进行案例分析的话,最晚要在完成第一个案例分析之后便要开始。需要评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分析方法本身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应用,如严格的顺序性原则有没有得到遵守,内容分析的规则有没有得到落实?在评估时,还要考虑到诠释者在诠释方法所要求具备的诠释态度方面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如果在这个层面出现问题的话,诠释者小组需共同对这些问题以及对文本的处理进行反思。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应该考虑改换分析方法。用来评价一种诠释方法是否合适的另外一个参照点是想要在哪个层面上做出结论:如果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代表性而需要在许多访谈的基础上分析大量的文本,那么,采用客观注释学的方法可能会令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甚至会完全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里,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显得更加合适一些。不过,如果研究者要进行深度的案例分析,那么,质性内容分析法便不再是值得推荐的方法了。

表 27.2 中的核查单为诠释方法的选择及其适合性的检验提供了参考。

表 27.2　用于评价诠释方法的核查单

什么是好的诠释——好的诠释取决于哪些因素? 用于选择诠释方法及评价其应用的核查单	
1. 研究问题	诠释方法及其应用能够抓住研究问题的主要方面吗?
2. 诠释方法	必须要根据方法的要求和目标来应用诠释方法:不能在不同的诠释形式之间来回跳跃,除非这样做有研究问题和/或理论方面的根据。
3. 诠释者	诠释者有能力应用这种诠释形式吗?诠释者自己的担心和不确定性有何影响?
4. 文本	诠释形式对于文本来说合适吗?如何考虑到文本的结构、清晰性和多层次性?
5. 资料的收集形式	诠释的形式与所收集的资料以及收集资料的方法相匹配吗?
6. 给予案例的空间	在诠释的框架中,有没有为理解案例及其独特性创造空间?案例的特殊性在与诠释框架相违背的情况下还能够显现出来吗?
7. 诠释过程	诠释者有没有成功应用这一诠释形式?他有没有给资料留足空间?他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没有?)有没有清楚地定义如何处理文本?(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没有?)
→	尽可能地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案例之间对违背之处进行分析,以验证诠释的正确性!
8. 分析的目的	对频率分布做出明确的陈述,或是找出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式、背景,等等?发展理论,或是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观点分布?
9. 推广性要求	应该在哪一种层面上提出研究的结论呢? 一个案的层面(例如,所访谈的个体及其传记、一个机构及其运作方式,等等)? 一群体的层面(有关一个职业群体、一种类型的机构)? 一普遍有效的结论?

第三参照点:方法对于研究对象的适合性

对资料的诠释往往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分析步骤,它决定着研究者会从实证资料(不管实证资料是如何收集的)中得出什么样的陈述和结论。在这里,以下的观点同样也是正确的,即:没有哪个分析方法对于任何情况都是合适的,尽管也有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客观注释学的方法是针对特定的问题领域(从社会化理论的视角分析家庭中的互动,参见 Oevermann et al. 1979)而发展出来的,之后,其应用领域不断得到了扩展,既包括所分析资料(访谈、图片、艺术品、电视节目,等等)的扩展,也包括所分析对象和主题的扩展(参见 Garz 1994 中的文章)。同样的,由 Glaser/Strauss(1967/1998)所提出的方法在 Strauss/Corbin(1990/1996)这本更新的著作中也得到了扩展,逐渐提出了普遍适用性的要求。这一点可以从其具有一般性的编码模式(参见第 23 章)看出。面对这种对特定

方法的可适用范围的扩展，研究者应该在两重意义上更多地考虑到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对象适合性的标准：研究者不仅需要知道，该诠释方法对于哪些对象是适合的，而且还要弄明白，它对哪些对象是不适合的，以便于有根据地选用具体的方法。

第四参照点：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匹配性

最后需要检查的是所选择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匹配性，即它与研究过程的其他方面是否兼容与匹配。研究者需要在此澄清，诠释资料的程序是否与收集资料的策略相匹配。如果研究者在实施访谈时对于陈述中的叙事给予了很多的关注，那么，采用内容分析法（使用事先确定好的少数范畴）来分析这样收集到的资料就有些不合适了。同样地，用客观注释学的方法来对实地笔记进行顺序性诠释，也被证明是不大可行且效果不大理想。

同样需要检查的还有，诠释资料的方法与选择资料的方法（参见第 11 章）是否相符，自己研究的理论背景与所选择的诠释方法的理论背景（参见第 6 章和第 7 章）是否相符，对研究过程的两种理解方式（参见第 8 章）是否协调。如果研究过程已被设计为传统意义上的线形的话，那么，在诠释之初便已基本上确定好了，应该收集何种资料，以及如何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对诠释方法的选择与评价应该考虑到与此相符的要求。如果所设计的研究过程更加偏向环形的话，那么，所选择的诠释方法将会决定在其他的步骤采取什么程序。在这里，诠释资料的方式和进展情况决定着对资料的收集（取样及方法）（参见第 8 章）。这表明，研究者在评价和选择各种备选方法时，尤其要考虑到整个的研究过程。在每一节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中都论及该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的定位，这些论述可以为研究者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提供参考。除此之外，研究者在这里还要考虑到具体的实证研究的问题和目的，以此作为参考。

要　点

- 没有哪一个分析方法是用于质性分析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这令它们分别或多或少地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帮助。
- 研究者应该仔细地考虑，哪一种分析方法对自己的资料和研究问题而言是最适合的。
- 因为每一种方法都会让其应用者以特定的方式处理资料，所以，这里介绍的每一种方法都会生成一种特定的结构。
- 在选用特定的分析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研究问题之前以及在应用这一方法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检验所选择方法的适合性。

练习 27.1

1. 请您从文献中选出一项以分析文本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请您思考一下，这里所选择的方法对于

研究对象及研究所用的文本而言是否适合。

2. 请您结合自己的研究思考一下,您选择这一分析方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拓展阅读

Flick, U., Kardorff, E. v./Steinke, I. (Hrsg.) (2000).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Gibbs, G. (2007).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Book 6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Sage.

Hitzler, R./Honer, A. (Hrsg.) (1997).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Opladen: Leske & Budrich.

Rapley, T. (2007). Doing Conversation, Discourse and Document Analysis (Book 7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Sage.

Strauss, A. L. (1991).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Datenanalyse und Theoriebildung in der empirischen soziologischen Forschung. München: Fink.

第七部分　有效性论证、写作和发展前景

质性研究的评价问题至今尚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每当人们要质疑整个质性研究时，总免不了会提到这个问题。在本书的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将主要分析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评价质性研究？第二，如何向读者展示研究结果以及获得该研究结果的途径？质性研究越是想要确立自己的地位，得到人们的尊重，并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定量研究或者（更广泛地讲）与自然科学研究为声望、合法性和项目资助而竞争，第一个问题也就愈加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可以在此参考有关评价标准的讨论，并且思考，哪些标准可以被用于质性研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不同的有关质性研究评价标准的建议。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对这些标准的批评意见。第 28 章概括总结了相关的标准及有关这些标准的讨论。第二，我们也可以试着用标准之外的范畴来评价质性研究的质量。为此，人们需要借助多元方法结合或分析性归纳等策略来提高质性研究及其结果的可信度。在这里，重要的策略是要回答有关方法指示的问题和应用质量管理来保证和发展质性研究的质量。一般来说，人们在这里更多地是将整个研究过程作为质量保证的切入点，而不是说将特定的标准应用于其中单一的步骤。第 29 章介绍了这样一些以过程为取向的质性研究质量保证的策略。第 30 章分析的问题是如何撰写质性研究及其研究结果。这个问题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什么是撰写自己的质性研究的最好方式？人们也可以从更根本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研究者的撰写行为如何抓住或覆盖研究行动、实地中的现实以及被研究者的视角。这样一来，撰写问题就变成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并由此将质性研究置于由艺术与方法二者构成的张力区间。第 31 章探讨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有关质性研究发展现状和前景的问题。

质性研究的质量标准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认识到将定量研究的传统标准运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及问题。
- 了解有关重新表述传统标准的建议。
- 理解质性研究者们提出的其他备择性质量标准。
- 认识到与在质性研究中使用标准相关的一般性问题。

对于应该如何评价质性研究的问题，至今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每当人们想要质疑整个质性研究方向时，总是会提到这个尚未得到解决的质性研究评价问题。

选择式可信度证明

一种常见的批评认为，质性研究只是通过穿插来自采访或观察记录的"解说性"引言来将自己的诠释和研究结果变得透明和令读者可以理解。特别是当研究者将此用作"证明自己陈述的唯一的方式"时，"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可信度是不够的"（Bühler-Niederberger 1985，第475页）。Girtler(1984，第146页)说明了这其中的原委(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确实非常形象和直观)：

> 当我准备出版我的研究成果时，(……)我最终所要展示的是典型性的东西。为了说明和证明这些典型性的东西及典型的规则，我就要从我的观察记录和访谈中引述相应的段落，【因为】我是从这些典型的规则中来"理解"我所研究的社会行为的，也是通过它们来"解释"社会行为的。我所引述的段落，自然都是在我看来谈到了相应的日常世界的典型性东西的那些段落。

这种做法也被人称作"选择式可信度证明"(selektive Plausibilisierung)(Flick 1989)。不过，通过这种做法并不能充分解决可理解性的问题(Problem der Nach-

vollziehbarkeit)：因为这样做的话，人们便不知道研究者是如何处理那些"在他看来"不能形象说明典型性的东西或与此偏离甚至是相矛盾的案例和段落的。

这里所谈的问题的各个方面可以集中在质性研究的有效性论证(Geltungsbegründung)这个标题之下。在这一标题之下，总地来说有以下几个主题领域：

- 可依据哪些标准对质性研究的过程与结果进行恰当的评价？
- 是否存在其他更加合适的方式来探讨质性研究质量的问题(参见第29章)？
- 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的对研究结果的普遍推广？如何可以保证获得这种推广度(参见第29章)？
- 在有关这些主题的讨论中，如何撰写质性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的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见第30章)。

就评价质性研究的过程与结果的标准而言，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直接将传统的标准如效度和信度应用于质性研究，或为此目的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做出重新表述(reformulieren)。第二，发展新的、"与方法相适合的质量标准"(Flick 1987)，这些标准要符合质性研究的特点，要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背景中来发展，要考虑到研究过程的特点。第三种可能性所关注的问题是：考虑到Denzin/Lincoln所查明的质性研究的展示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00b，第17页)，人们怎么还可以提出科学陈述有效性的问题呢？这第三种可能性肯定是既无助于质性研究进一步巩固其地位，也无助于让人们重视质性研究的结果。第四种可能性是，超越标准之外去寻求问题的答案(参见第29章)。对传统标准的使用以信度与效度这两个标准为重点，偶尔也会提到客观性这一标准。

信　度

为了明确"信度"(Reliabilität)作为质性研究的评价标准的意义，Kirk/Miller(1986)探讨了三种形式：第一，空想性信度(quixotic reliability)，用来确定某种单一的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连续地获得不变的测量及结果。他们拒绝了这种确定信度的形式，因为它被视为无关紧要和具有误导性。特别是在实地研究中，像定型观念一般不断重复出现的陈述或观察恰恰表明，这里所提供的是刻意传达的有关事件的看法，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第二，历时性信度(diachronic reliability)，指的是在不同时间获得的测量结果及观察的稳定性。这一信度的问题在于其前提条件，即：要想实现这一信度，所研究的现象本身便不能处于变化之中。而质性研究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研究这种不变的客体。第三，共时性信度(synchronic reliability)，指的是在同一时间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所获得发现的稳定性和一致性。Kirk/Miller认为，当这第三个标准**没有**被达到时，它是最富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会提出后续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使用不同的方法或者不同的研究者而造成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分析视角吗？

程序信度(Prozedurale Reliabilität)

只有在某种有关研究对象及方法使用的特定理论背景之下,信度才获得其作为质性研究评价标准的意义(Kirk/Miller 1986,第 50 页)。不过,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提高资料和诠释的信度。Kirk/Miller 是针对民族志研究来讨论这些信度标准的。在这里,录音(像)和记录的质量是确定所收集资料的信度及对其诠释的信度的核心性基础。这里的切入点主要是研究者将其观察记录下来而形成的实地笔记。为了提高这种资料的信度,有人建议对记录进行或多或少的标准化,特别是在有多名观察者收集资料的情况下。在第 22 章中已经介绍过的、用于记录过程的四种实地记录形式(参见 Spradley 1979)便是实现这种标准化/结构化的一种方式。为提高记录的信度,Kirk/Miller(1986,第 57 页)提出了一些用于记录的规范。Silverman(1993,第 147 页)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规范(参见表 28.1)。

表 28.1　实地记录的规范化(出自 Kirk/Miller 1986 以及 Silverman 1993,略有改动)

符　号	规　范	应　用
< < > >	双引号	原话引用
< >	单引号	释义
( )	括号	上下文情境资料或研究者的诠释
〈 〉	尖括号	被研究者(自己的)概念
/ /	斜线	研究者的概念
——	实线	段落的开头或结尾

发展记录规则的指导思想是,对记录的规范化可以提高用来观察资料的不同视角的可比性。特别是在实地记录中对被观察者的概念和观察者的概念的区分令其他的诠释者有可能对资料进行再度诠释和检验。转录规则与这种规范化的记录有着相似的功能,它们旨在阐明用于转录对话的程序。

对于访谈资料而言,要提高其信度可以通过对不同的访谈者进行访谈训练以及在完成测试性访谈或第一次访谈后对访谈提纲或开场问题进行检验(Silverman 1993,第 148 页;参见第 16 章)。对于观察而言,要提高其信度既要在观察者进入实地之前对他们进行培训,也要定期对观察活动进行评估。对于资料诠释而言,要提高诠释的信度可以通过完成相应的培训以及进行有关诠释程序和编码方式的反思性交流。通过分析一段叙述的开场白片断得出一个有关该案例结构的假设,然后再根据之后的片断对该假设进行证伪(Hildenbrand/Jahn 1988),是提高诠释信度的另一种方式。在 Strauss(1991)的扎根理论研究中,有一种与此相似的做法是:通过开放式编码发展出范畴,然后再用其他的文本段落来检验这些范畴。这些例子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尝试通过具体地用同一文本的其他段落或其他文本来测试已经做出的诠释来检验其信度。

总的看来,有关质性研究信度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在双重意义上做到明确化(Explikation):一方面,应该明确说明资料的产生,让人可以区分和检验,什么是受访者的陈述,什么是研究者的诠释。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培训和检查明确说明研究者在实地或访谈中的做法以及处理文本的做法,以便于提高不同访谈者或观察者在其做法上的可比性。最后,应该通过对研究过程的反思性记录来提高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信度。这样一来,信度这一标准就得到了重新的表述,它侧重于检查资料和程序的可信性,并且这种可信性分别是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为基础的。其他那些对信度的理解方式,如任意重复的资料收集会得到相同的资料和结果,则在此被摒弃。对于这种形式的信度而言,对资料的怀疑要比对其可靠性的信任更为合适(Kirk/Miller 1986, 第 42 页)

效 度

在有关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效度(Validität)受到了比信度更多的关注(如 Kval 1989, 1995, 2007; Wolcott, 1990a; Hammersley 1990, 1992; Seale 1999; Steinke 1999)。效度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以下的问题,既:"研究者是否看到了他(……)自认为看到的东西。"(Kirk/Miller 1986,第 21 页)原则上来说,这里可能会出现三种错误:以为发现了某种关系或原则等,而这种关系或原则在那里其实是不正确的(错误类型一);否认了某种关系或原则等,而这种关系或原则在那里其实是正确的(错误类型二);提出了错误的问题(错误类型三)(参见 Kirk/Miller 1986,第 29-31 页)。

检验质性研究效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确定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研究者所研究的相互关系(Zusammenhängen)与研究者提供的有关这些相互关系的描述版本(Version)。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相互关系并不是实证研究对象的话,它们会显现为什么样子? 还有,研究者所给出的版本是否能在研究对象(比如研究实地中和受访者传记中的关联)那里找到依据? 这里想要说明的并不是以下的观点,即认为现实是独立于社会建构(如感知、诠释和展示)而存在的,而是以下的问题,即研究者的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被研究者的建构中找到实证依据。Hammersley(1992, 第 50-52 页)在这一背景下指出了"敏锐的现实主义"(subtle realism)的立场。这一立场有以下三个假设:①知识的有效性无法得到肯定的确认。可以从说服力和可信度方面对假设进行评价。②现象是独立于我们有关现象的假设而存在的。我们有关现象的假设能够或多或少恰当地反映它们。③现实是透过看待现象的(不同)视角而获得的。研究的目的在于展示现实,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

如果人们从这一立场出发的话,那么,质性研究的效度问题就会变为以下的问题,即研究者的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被研究者的建构中找到依据(见 Schütz 1971),以及这种依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其他人理解和领会(参见第 7

章)。因而,资料的产生是确定效度的一个出发点,另外一个出发点是对现象的描述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

分析访谈的情境

确定访谈效度的一种方式是从形式上检查研究者是否在访谈过程中成功地做到了确保访谈可以实现所追求的可靠性程度。对于使用叙事访谈的传记研究而言,可以通过回答以下的问题来确定访谈的效度,即这里的表述(Darstellung)是否属于叙事(Erzählung)。有关表述内容的效度问题在这里是通过以下的方式得到解答的,即人们将没有受到阻碍的叙事(主要是指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干预)视为是有效的叙事。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例如 Bude 1985;Flick 1996;Gerhardt 1985),因为这里仅仅涉及整个问题的一个有限的侧面。

Legewie(1987,第 141 页)提出了专门用于检验访谈中的传记性自我描述之效度的更加详细的建议。他认为,发言者在访谈中所做陈述的有效性应该得到进一步的细分(并且得到相应的有区分的检验):"(a)所说的内容是正确的(……);(b)所说的内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是恰当的(……);(c)所说的内容在自我展示方面是诚实的。"检验传记式陈述之效度的一种方法是带着以下的问题来分析访谈的情境,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非策略性沟通的前提条件"以及是否"以或多或少明确的(……)'工作联盟'的形式议定了访谈的目的和特点(……)"(1987,第 145-149 页)。在这里,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受访者是否会因为访谈的情境而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一个有关自己体验的特殊版本,即一个与自己的【真实】看法不一致(或仅在有限程度上一致)的受到歪曲的版本。对访谈情境进行分析时要关注有关这类歪曲的线索。这样做可以为研究者做出以下判断提供依据,即在由访谈整理而来的文本中,哪些部分是系统性的歪曲或假象,研究者在诠释文本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准确程度来考虑到这些歪曲和假象。通过让受访者参与进来,研究者可以让这种检验性思考获得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沟通式效度验证

另外一种确定效度的方法是让行为者——被研究者或被研究者群体——参与到后续的研究过程之中。在这里,一种做法是,在完成访谈和对访谈的转录之后,研究者在和被研究者第二次会面时进行沟通式效度验证(kommunikative Validierung)(详细的建议请参见:Scheele/Groeben 1998,以及本书第 13 章)[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两个方面获得可信度的提高:第一,可以由此取得受访者对其陈述内容的认可。第二,受访者会自己从研究者正在寻找的复杂关联方面(如主观信任理论作为一种对于咨询而言重要的日常知识的形态,参见 Flick 1989 或本

---

① 有段时间,研究者曾在诠释文本的背景下讨论过沟通式效度验证的问题(如 Heinze 1987)。特别是因为让受访者面对研究者的诠释会出现伦理上的问题(参见 Köckeis-Stangl 1982),所以,沟通式效度验证的思想慢慢失去了意义。

书第13章中的案例)提出自己陈述的结构。

对于更为广泛地应用这种策略,尚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1)如何设计沟通式效度验证的方法程序,从而让它可以真的既适于被研究的问题,又适于被研究者的见解?(2)除了让受访者证实自己的陈述以外,如何可以广泛地解决有效性论证这一问题?在这里,一种解决方法是对重构(Rekonstruktion)进行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效度验证(有关这种方法的概览请参见Flick 1987)。

重新表述效度概念

Mishler(1997)在重新表述效度概念方面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从效度验证的过程入手(而不是从效度的状态入手),将效度验证定义为"对知识的社会建构"(第417页),我们通过它来"宣称并评价所报道的观察、诠释和推广性结论的'可信性'"(第419页)。最后,"将效度验证理解为用来确立可信性的社会性话语,绕开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些规约,如信度、证伪和客观性"。作为这种社会性话语以及建构可信性的实证基础,Mishler探讨了对来自叙事研究的例子的使用。

Lather(1993)借鉴了不同的后现代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不过,她并没有完全摒弃科学知识合法化及其效度验证的问题,而是从后现代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推导出了革新性的效度概念,并将这些概念纳入以下四个框架之中:

- 她从Baudrillard的理论推导出"讽刺性效度"(ironic validity)的想法。作为其背景的是以下的假定:模拟物(作为没有原件的复制品)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作为真实物体之复制品的表现(representations)(第677页)。这给效度概念带来了以下的影响:"在与效度相关的主流实践中,科学性声明的修辞性特征(der rhetorische Charakter)被方法论上的肯定性所掩盖。讽刺性效度的策略与这种主流实践相反,它重视的是形式,并且承认,这些形式是修辞性的、没有基础的、后认识的(post-epistemic),并且缺少认识论上的支持。"(第677页)
- 她从Lyotard(1986)的理论推导出"不合逻辑的/新实用主义效度"(paralogic/neo-pragmatic validity)的想法。根据这种效度想法,科学性知识并不旨在谋求与现实的一致,而是旨在发现差异以及保持这一张力之中的矛盾。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决定着知识的效度。
- 她从Deleuze/Guattari(1976)以及Derrida(1976)的研究中推导出"根茎式效度"(rhizomatic validity)的想法。
- 她所建议的第四个框架是:感官的效度(sensual validity)/情境性效度(situated validity)。这里提出了有关知识的性别特征的问题以及评价科学性知识的问题。

这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回答以下的问题,即质性资料和研究结果

以及生成它们的质性研究是否具有最低程度的可信性，尚属未知①。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借鉴当前的理论潮流，指出了在建构主义科研观的框架下重新表述效度概念的途径。

程序效度(Prozedurale Validität)

Wolcott(1990a，第127-128页)针对民族志研究的过程提出了九点要求，达到这些要求有助于保证效度：

(1)研究者在实地中应该自己少发言，尽量多倾听；(2)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准确地做记录；(3)研究者应该尽早开始写作；(4)研究者做记录和写作的形式应该让读者能够自己阅读记录和报告，也就是说，研究者应该提供足够多的资料让读者可以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及理解研究者得出的结论；(5)研究报告应当尽可能完整；(6)研究报告应该尽可能坦率；(7)研究者应该请研究实地中的人或请自己的同事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及其表述提供回馈；(8)研究者的表述应该做到能够平衡不同的观点；(9)研究者的写作应当准确。

这些用来在研究过程之中确保效度的举措可以被概括描述为一种在研究实地中敏觉行动的尝试以及将研究中的效度问题转移至撰写研究报告的领域(参见本书第30章)。最后，Altheide/Johnson (1998，第291-292页)提出了"效度作为反思性解释"的概念，它将研究者、研究对象和寻找意义的过程联系起来，在研究过程之中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同关系之中寻找效度：

1. 被观察的事物(如行为方式、仪式、意义)与实施观察所处的更大的文化、历史及组织情境之间的关系(物质)。
2. 观察者、被观察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观察者)。
3. 视角(或看法)的问题，是采用观察者的视角还是采用实地成员的视角来对民族志资料进行诠释(诠释)。
4. 读者在最终成果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
5. 作者在进行描述和/或诠释时所使用的表述、修辞或创作上的风格问题。

由此来看，Altheide/Johnson是从整个研究过程及参与要素的视角来分析效度问题的。不过，他们的建议只是停留在程序的层面之上，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和依据来判断各个研究或其组成部分。总地来说，使用或重新表述效度和效度验证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从形式上分析在访谈情境中生成资料的方式并不能提供有关这些访谈内容的信息，也不能说明它们是否在接下来的研究进展中得到了恰当的处理。沟通式效度验证(或成员检查)的方法所面临的问题是，当主体的视野被系统地超越时，比如当研究者想要在诠释时深入社会无意识或

---

① 像Lather所提出的这些概念的问题在于，她虽然带着极大的热情借鉴和参考了后现代的问题和概念，但是，她一来主要使用的是来自第二手资料的引言，二来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文字表皮的层次。Denzin/Lincoln(2002a及2005a)所主编的著作中收集的那些关于有效性论证的文章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作者所抛出的问题要多于解决与效度确认相关的问题的方案。

心理无意识层面时或者当研究者正是想要从各种主观视角的区别中来推导出诠释时，就很难再使用受访者的赞同作为评价标准了①。上文介绍的对效度概念的重新表述总地来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他们那种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程序并不一定能够为研究实践提供有效性验证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过，人们仍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趋势，即：由效度（Validität）转向效度验证（Validierung），由对单个的研究步骤或组成部分的评价转向保证研究过程的透明度（参见本书第29章）。

客观性

客观性（Objektivität）是用来评价实证研究的第三个传统的标准。不过，人们在有关质性研究评价的讨论中很少会提到这个标准。Maddill，Jordan/Shirley（2000）的文章是个例外。在这篇文章中，三位作者针对三种认知理论立场（现实主义、情境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探讨了客观性问题和信度问题。他们指出，客观性作为标准，只适用于现实主义框架下的研究。在这里，三位作者将质性分析的客观性理解为以下的问题，即：两位不同的研究者在分析现有的质性资料时是否会得出相同的结果。因此，质性分析的客观性指的就是"通过多元结合两个独立的研究者的分析结果所获得的意义的一致性"（Maddill，Jordan/Shirley 2000，第17页）。如果多位研究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就可以说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可信的。这里在确定客观性时所使用的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两个独立进行分析的研究者的分析结果进行多元结合。三位作者在此强调指出，研究者应该公开他的认识理论立场，以便于让人能够恰当地评价这一研究及其结果。总地来看，这篇文章只是尝试着将客观性当作质性研究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讨论，但是对于这一标准的使用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建议。

对于将传统的评价标准应用于质性研究的做法，人们提出了质疑，因为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这两种研究方向"对现实的理解""过于不同"（Lüders/Reichertz 1986，第97页）。在这个问题上，Glaser/Strauss（1965b/1979，第92页）持有类似的保留性看法。他们

> 对以下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即将定量研究所用的标准用作判断建立在质性研究基础之上的实质性理论是否可信的标准。他们建议，评价的标准应该建立在质性方法的一般要素（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和展示资料的方法以及人们阅读质性分析的方式）的基础之上。

基于以上怀疑，研究者在过去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来发展"与方法相适合的标准"（methodenangemessene Kriterien）（Flick 1987），并以此来代替效度和信度等标准。这些标准既包括一些长期以来便得到人们讨论的策略，如多元结合法和

---

① 这里仅给出以下的提示，即研究正是想要获得那些通过日常反思不能直接获得的系统性知识（详见 Flick 1987，第255页）。

分析性归纳(参见第29章),也包括新发展出来的一些标准。

备择性标准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同的尝试来发展用于评价质性研究的备择性标准(alternative Kriterien)。

可信任度、可相信度、可靠性

Lincoln/Guba(1985)建议采用可信任度(Vertrauenswürdigkeit)、可相信度(Glaubwürdigkeit)、可转移性(Übertragbarkeit)、可靠性(Zuverlässigkeit)和可证实性(Bestätigbarkeit)作为质性研究的标准,其中,可信任度是最核心的标准。为提升质性研究、资料和结果的可相信度,两位研究者提出了如下五种策略:

- 采取行动提高获得可令人相信的认识的可能性,比如通过在研究实地中"延长参与"和"持久的观察"以及多元结合不同的方法、研究者和资料种类。
- 同事汇报(Peer debriefing):定期与未参加该研究的同事会谈,以便于查明自己的盲点,检验工作假设和结果。
- 按照分析性归纳的方式分析偏离正常情况的案例。
- 诠释的依据及其检验的合适性。
- "成员检查"(Member-Checks):与所研究场域的成员一起对资料和诠释进行沟通式效度验证。

程序可靠性:审计

对可靠性(dependability)的检验可以通过"审计"(auditing)程序来进行。审计程序遵循的是财政领域查账的程序。为此目的,需要简要地概括出一个"审计索引"(auditing trail),它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参见Schwandt/Halpern 1988):

- 原始资料及其收集和记录。
- 对资料的缩减和得出综合结论:通过概括总结、理论笔记、备忘录、摘要、对案例的简介,等等。
- 对资料的重构与得出综合结论:所依据的是已经发展出来并得到使用的范畴(主题、定义、关系)结构、研究发现(诠释和结论)以及通过融合概念和与现有的研究文献建立联系而完成的研究报告。
- 过程记录,即方法论方面的笔记与决定,包括与保证认知的可信任度和可相信度有关的内容。
- 有关目的和安排的资料,如研究规划、个人笔记及参与者的期待。
- 有关发展研究工具的信息,包括试验版本与初期计划(参见Lincoln/Guba 1985,第320-327页和第382-384页)。

这一方法在质量管理的框架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参见第 29 章)。

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介绍了一系列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确保和检验程序理性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将研究过程的进展和实施公开并对它们作出评价。从已经获得的认识的角度来看,这一检验过程所应回答的问题在 Huberman/Miles(1998,第 202 页)看来可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被概括为:

- 这些认识是否可在资料中找到依据(取样的方式是否恰当,对资料的权衡是否正确)?
- 推论是否合乎逻辑(对分析策略的运用是否正确?是否考虑了其他可能的解释)?
- 范畴结构是否恰当?
- 研究方面的决定以及方法上的改变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取样决定是否考虑到研究的假设)?
- 研究者造成的研究结果失真的程度有多大(过早结束、实地记录中的有些资料未被考虑到、没有寻找偏离常规的案例、深深的同情感)?
- 使用了哪些用来提高可相信度的策略(第二读者、向采访对象提供信息回馈、同事的检查、在实地中停留适当的时间)?

在这里,对研究的评价虽然是以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为出发点,不过,在这样做时研究者尽力做到将以结果为导向的视角和以过程为导向的程序结合起来。

用于评价理论发展的标准

当发展扎根理论成为质性研究的一般目标时,以上提到的对以结果为导向的观察和以过程为导向的程序的结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Corbin/Strauss(1990,第 16 页)提出了四个参照点用以评价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以及发展它们的方法。根据他们的建议,研究者应该批判地检验以下四个方面:(1)资料的效度、信度和可相信度;(2)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和价值;(3)生成、发展或检验理论的研究过程的合适性;(4)研究结果的实证基础。对于研究过程本身的评价,他们提出了 7 项标准:

1. 最初的取样是如何做出的?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做出的(选择性抽样)?
2. 出现了哪些核心范畴?
3. 有哪些事件、变故、行动等提供了有关这些核心范畴的线索?
4. 理论抽样是在哪些范畴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表述是如何引导对资料的收集的?在完成理论抽样之后,这些范畴被证明具有多大的代表性?
5. 哪些假设涉及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些假设是在什么基础上得到表述以及检验的?
6. 是否有例子表明,研究假设经受不住当前所观察到的内容的考验?如何解释

这些矛盾？它们会对假设产生何种影响？

7. 如何以及为何选定了这一核心范畴？该选择是突然做出的，还是逐步完成的，是困难的，还是容易的？最终的分析决定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的？对于被研究现象和(……)重要性的解释力(Erklärungskraft)在此扮演了何种角色？

理论发展中的有效性论证在这里最终转化为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即：Strauss 的扎根理论方法——如理论抽样以及不同形式的编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应用，这种应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的方法设想。由此来看，检验研究结果和程序的努力还是保留在他们自己的体系框架之内。在这里，下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研究结论和理论是否扎根于实证资料和关联性之中——这到底是不是扎根理论(理论发展)。为了检验这一目标是否实现，Corbin/Strauss 提出了以下标准用来回答有关研究结论和理论的实证基础的问题：

1. 有没有生成概念？
2. 这些概念有没有被系统地联系起来？
3. 是否存在许多概念上的连接？范畴是否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些范畴是否具有概念上的浓密度？
4. 该理论中是否包含较大的变化幅度？
5. 解释当中是否包括影响所研究现象的其他条件？
6. 是否考虑到了“过程”？
7. 理论认识是否重要，有多重要？(Corbin/Strauss 1990，第 17-18 页)

在这里，评价的基准点同样也是两位作者提出的程序以及该程序是否得到遵守。Strauss 的方法论由此得到更强的形式化。对它的检验也越来越多地变成形式上的检验，如概念有没有得到正确地使用？Corbin/Strauss 自己看出了这种危险，因此，他们把第七条有关重要性的标准列了进来。他们强调，在形式上正确使用扎根理论的程序尚不能保证进行“好的研究”。不过，从潜在读者的角度来看研究结论所具有的原创性、研究问题以及研究结果对于所研究的领域甚至其他领域重要性等标准在这里的评价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①]

不过，Hammersley(1992，第 64 页)所提出的评价标准包括了这些方面，他从用来评估通过实证性实地研究所发展的理论的不同方法中概括总结出以下的标准(请参见提示框 28.1)。

提示框 28.1 用于评价质性研究理论发展的标准

1. 提出一种普遍性/正式理论的程度。
2. 理论发展的程度。
3. 论断的新颖性。
4. 论断与实证观察的一致性以及报告是否包括从实证观察中提取的具有代表性的范例。

---

① 这里所质疑的并不是 Strauss 的研究方案，而是 Corbin/Strauss(1990)所提出的用于检验研究的方法。

5. 所作解释对于读者和/或研究对象而言所具有的可信度。
6. 研究结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转用于其他情境。
7. 解释的反思性：评价研究者以及所用研究策略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效果以及/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向读者提供了有关研究过程的信息。

出处：Hammersley 1992，第 64 页

以上提到的标准是专门用来评价质性研究及其程序、方法和结果的，他们都是以作为质性研究标志的理论发展为切入点的。在这里，发展理论的方式、理论发展的程度、结果、该理论对于其他领域的可适用性以及与被研究的情境的切合性，成为评估整个研究的依据。

传统的标准和备择性标准——对老问题的新回答？

这里介绍的质性研究的有效性论证的方法旨在将作为认知原则的理解（Verstehen）加以方法化。在这里，人们提出了用来评价所使用的方法程序的合适性的标准。核心的问题是，各个案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实地）是否得到恰当的重构，对于各个案例的独特性给予了多大的开放性，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监控措施用来检验这种开放性。人们认为，研究实地以及研究过程中的现实是一种社会建构。不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哪一方的建构在认知过程中以及在撰写研究结果时最终得到了伸张和贯彻——是研究者的建构还是那些研究实地的被研究者的建构？因此，有效性论证的落脚点便是，研究者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实地中的建构为基础的，实地中的建构是如何被记录和翻译成作为实证资料的文本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研究者是如何通过案例分析发展出理论的或者发现普遍性模式的。

因此，有效性论证的问题便成为一个将研究作为过程来分析的问题。在分析完所介绍的不同方法策略之后，人们难免有以下的印象，即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一个是使用传统的质量标准，另一个是发展新的、特殊的标准——在当前的讨论中继续得到人们的沿袭，至今尚没有哪一种策略对有效性论证的问题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Miles/Huberman（1994，第 278 页）以下对新标准和老标准的等同或结合，虽然是一种对这一领域的讨论做出整理的有趣做法，但是，这一做法也同时表明，各种重新表述质性研究标准的尝试至今尚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突破，由各方面所指出的传统标准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新的备择性标准（参见第 29 章）：

- 客观性/可证实性
- 信度/可靠性 /可审计性
- 内部效度/可相信度/真实性
- 外部效度/可转用性/适当性
- 使用/应用/行动导向性

质量评价作为对质性研究的挑战

尽管如此,人们目前在以下三种情境中仍然会提出有关质性研究质量评价的问题:首先,那些想要检验和保证自己研究程序和结果的研究者会自己提出这一问题;其次,研究的接受方——想要评价研究内容的出版物的读者或是委托方——也会提出这一问题;最后,在对质性研究的审核评估中——如对质性研究申请的评估以及越来越常见的通过同行评审对期刊论文投稿的审核,这个问题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最后一种情境而言,用来评价研究文稿(文章、申请等)的指南的数量越来越多:Seale(1999,第 189-192 页)给出了一份英国社会学学会医学社会学(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dical Sociology)的标准目录,包括了 20 个领域的问题,如研究问题、抽样、资料收集、分析、展示和伦理。这份目录中所包括的指导性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应用这一目录时,人们要想对问题做出回答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有可能是隐含性的)标准,比如第 19 个领域("研究结果可信吗,合适吗?")的问题"研究结果是否与研究问题有关?"(第 192 页)。

另外一份目录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行为与社会科学办公室(NIH 2001)针对公共卫生领域而提出的。这份目录特别重视设计方面的问题,包括资料收集和分析以及对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除了对研究申请的重要部分的解说以及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之外,该目录还补充提供了一份核查单(Checklist),它包括不同的条目,比如"对收集资料的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解释"(第 16 页)。这份目录旨在对已经引入的用来评价定量研究申请的目录做出调整和修正,使其适合质性申请的特点。

Elliot,Fischer/Rennie(1999)针对临床心理学领域提出了一份用于评价质性研究发表物的指南目录。这一目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同时适用于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第二部分内容则是专门为质性研究量身制作的。在第一部分中,作者介绍了方法选择的合适性和对方法进行充分说明的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的内容是:以充分的例子佐证陈述,研究结论的前后一致性以及进行"可靠性检查"(credibility checks,如成员检查或者同事汇报、多元结合法等)(Elliot,Fischer/Rennie 1999,第 229 页)。正如 Reicher(2000)对这一指南的强烈的批评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这一指南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表述,但是人们对此还是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德国科研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曾举办一次圆桌会议,旨在帮助发展用于评价教育学领域的质性研究(申请)的标准。正如这一会议出版物的作者(Helsper,Herwartz-Emden/Terhart 2001)所说明的那样,人们在这里基本上只是对讨论要点进行了首次检视,即: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估可以以及应该从研究过程中的哪些部分入手。

质量标准，还是质量保证策略？

这些目录和讨论首先表明了一点，那就是：即便是质性研究在内部不能回答质量问题，它仍然要面对外部向它提出的这类问题。如果要制定质量标准的话，这些标准应该是要适用于每一种形式的质性研究呢，还是说我们需要为每一种方法都提出特定的标准？人们是否能够提出包含边界值的标准，从而可以据此区分出好的研究与差的研究？研究必须要有多大的真实度？若是真实度不够怎么办？在定量研究中，信度标准包含着这样的边界值，可以据此区分出信度充分和信度不充分的研究以及好的研究和差的研究。在这里，对于质性研究重要的是另外一种区分。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标准呢，还是说，我们更加需要的是质量保证的策略？质性研究的“真正的”质量有可能是无法（轻易地）用标准来衡量的？如何评价一项探索性的研究真正获得了哪些新的知识？如何评价方法对于所研究的场域和研究问题是否合适？如何评价进入实地的方法以及在发展和应用方法中的原创性？如何评价在收集和分析实证材料中的创造性？Yardley（2000）在这里讨论了“质性研究的两难困境”（Dilemmata qualitativer Forschung）的问题。最后，与制定质量标准相比，思考有效性论证的策略（第 29 章中将要讨论的内容）或许是更有前途的做法。

要　点

- 标准化研究的传统标准往往不能照顾到质性研究及其资料的特点。
- 虽然人们已就替代性评价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但没有哪个建议可以解决如何恰当评价质性研究质量的问题。
-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所提出的标准应该适用于整个质性研究呢，还是仅仅适用于其中特定的方法？
- 标准可以指向研究的形式方面（方法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应用？），也可以指向研究所获得的认知的质量（获得了什么新的认识？）
- 质量保证是质性研究所面临的、人们从外部（研究资助者、质性研究及其结果的读者）对它提出的挑战。

练习 28. 1

1. 请您选取几篇报道质性研究结果的文章，并查明作者是如何确定其研究质量的，他们在此使用了哪些标准。
2. 请您针对自己的研究回答以下问题：我为什么选取了这些案例，为什么要用这些例子和段落来说明我的结论？
3. 请您接着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有效的？对什么有效？

拓展阅读

信度

Hammersley, M. (1990). Read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Critical Guide.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效度

Kirk, J./Miller, M. L.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ilverman, D. (1993/2001).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Method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备择性标准

Lincoln, Y. S./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London: Sage.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评估理论发展

Corbin, J./Strauss, A. (1990).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 3-21.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一般性概览

Flick, U. (2007c). Managing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ook 8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London: Sage.

Steinke, I. (1999). Kriter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Weinheim: Juventa.

29 质性研究的质量——标准之外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到在标准之外探讨质性研究质量问题的策略。
- 理解有关回答方法指示问题的潜力和问题。
- 熟悉多元结合和分析性归纳的策略以及它们对于回答质量问题的贡献。
- 知道质性研究中推广化的问题与途径。
- 认识到研究中过程评价与质量管理的潜力。

本章将介绍几个在提出和应用质量标准之外（见第 28 章）可以改善与保证质性研究质量的方法。本章的指导思想是，质性研究的质量不能仅仅被化约为提出普遍适用的标准、规范和边界值并用它们来区分方法应用的好与差。其实，质性研究方法在理论背景、方法策略以及目标方面的差异也不允许提出这种普遍适用的标准（参见 Yardley 2000）。相反地，质性研究的质量问题应该被置于研究规划——从研究设计与方法的指示到质量管理——和过程评价的层面来加以讨论（本章内容）。在后面两章中，还会结合写作的问题（第 30 章）和教学的问题以及态度和技术（或艺术和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第 31 章）来讨论质性研究的质量问题。与此相应地，本章将焦点置于以下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质性研究，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什么形式的质性研究，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做到质量管理，从而可以完成好的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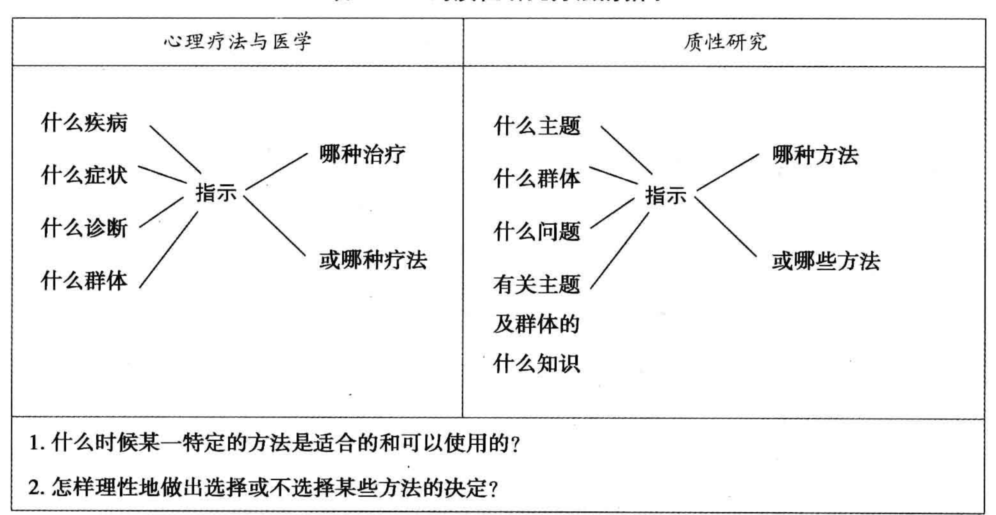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性研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我们决定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是习惯吗？是研究的传统吗？是研究者在这种方法上的经验吗？或者是研究问题让研究者做出选择或放弃使用某种方法

的决定吗?[①]

将医学和治疗学中指示的思想转用于质性研究

不仅是在质性研究领域,而且在整个实证研究领域,方法论方面的教科书几乎都不能为以下的决定提供帮助,即什么时候应该为某一项研究选择某种特定的方法。大多数教科书在介绍各种方法或研究设计的特点和问题时,都是分开单独进行介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教科书都没有对这些不同的备择性方法进行比较,也没有为何时应该为某一研究问题选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而不是其他的方法)提供依据。因此,对于质性研究来说,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指示(Indikation)的问题。在医学或者心理治疗中,人们会检验某种特定的治疗方式对于特定问题和患者群体的适合性(对治疗的指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某一特定的治疗方式对于某一具体情况中的具体问题是否适合(指示)。如果人们将这种检验转用于质性研究,那么,相关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什么研究主题、研究问题、研究群体或研究场域是适合的?什么时候选择定量研究方法或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结合是合适的(见表29.1)?

表29.1　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指示



选择合适方法的依据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就需要找到相关的依据。下面的核查单(见表29.2)提供了有助于做出以下决定的指导性问题,即应该为某项具体的研究选择何种研究设计和/或研究方法。

---

① 这段导引语出自该书作者自己撰写的英文版。德文原版中并没有这段话。不过,因为这个导言简洁易懂,对理解下面的内容也很有帮助,所以,在征得原作者同意后,将其添加在中译本中。——译者注

表 29.2　选择质性研究方法的核查单

1. 我对自己研究主题的了解有多少,我已掌握的知识有多具体?
2. 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性知识或者实证知识的发展程度如何?
3. 我是不是更多地想要探索性地了解自己研究的主题和领域呢?
4. 我的研究的理论背景是什么,哪种方法适合这种理论背景呢?
5. 在研究中,我特别想要了解的是什么? 是某些人(或者群体)个体的经验呢,还是社会过程的生成? 或者说我更想了解的是作为我研究主题之基础的结构?
6. 我是从一开始就从明确聚焦的研究问题出发呢,还是先以未经聚焦的问题切入,从而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展出越来越明确聚焦的问题呢?
7. 我想要研究的是什么? 是个人经验、互动、情境、更大的实体如组织机构,还是话语?
8. 我更感兴趣的是个案呢(例如个人的疾病体验或者某个特定的组织机构),还是对不同案例的比较?
9. 从事此项研究,有哪些资源(时间、资金、人力、能力,等等)可供使用?
10. 所研究的场域及其中的人们的特征是什么? 可以要求他们什么,不能要求他们什么?
11. 我的研究所追求的推广度是怎样的?

表中的第 1、2 个问题可以通过对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到回答。如果发现现有的相关知识比较少,有必要探索这一研究领域和主题的话,那么,研究者就应该为自己的研究选择开放性的方法,从而可以让研究者以非常开放的方式了解研究主题、被研究者的视角或者社会过程(例如民族志方法或者叙事法要比提纲访谈法更加合适)。

为了选出与自己的研究相适合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参考使用之前各章分别针对以下范畴对各种方法所做的分析:"对于研究对象(领域)的开放性"(参见表 12.1),"对受访者主观见解的开放性"(参见表 16.1),"对被观察者主观见解的开放性"和"对行动和互动过程的开放性"(参见表 21.1),以及"对相应的文本的开放性"(参见表 27.1)。表 29.2 中的第 2、5、7 个问题涉及的内容是,理论和方法在相应的研究中相匹配的方式。

表 29.2 中的第 6 个问题涉及的内容是本书在之前各章针对"对研究主题的结构化(……)"所做的分析(参见表 12.1、表 16.1、表 21.1 及表 27.1)。在这些地方,本书分别介绍了每一种方法所提供或支持的是什么形式的结构化。表 29.2 中的第 7 个问题和第 8 个问题涉及在方法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即是选择以案例为导向的或对案例敏感的方法呢(如叙事访谈或客观注释学),还是选择旨在直接进行案例比较的方法(如提纲访谈或编码及归类的方法)。第 9 个问题也隐含着这种对方法的选择,因为对案例敏感的方法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特别是时间和人力)。

本书在前面的各章中已经介绍了质性研究过程的主要步骤以及各种可供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这些章,尤其是那些进行总结概览的各章(参见第 12、16、21 和 27 章)为回答表 29.2 中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依据,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对方法进行评价和定位。研究者不仅需要在这些信息的背景下来选择某一特定的方法,而且还需要就其后果、对资料的影响和所获得的认知来反思研究过程中所做

出的方法选择。

用于反思研究步骤与方法的经验规则与关键问题

人们不能宣称某一种特定的质性方法是人们应该使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形式的(自我)约束不符合质性研究方法当前的发展状态。不过,对于质性研究而言,确乎存在着一系列其他形式的必要的约束:研究应该在方法上得到设计,应该建立在原则和反思的基础之上。那些将自己理解为固定的、定义明确的范式的方法不但不一定能够打开新的和合适的认知渠道,反而会阻碍通向研究主题的道路。人们应该以知识为基础做出对理论和方法的选择并对此进行反思。表 29.3 提供了一些经验规则,可以用来帮助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做出各种选择。同时它也提供了几个关键问题,帮助研究者反思以下的问题,即人们为什么做出了这个选择,人们在当前的研究中使用的是何种方法,以及是如何使用的?

表 29.3　用于反思研究步骤与方法的经验规则与关键问题

1. 请您认真思考和决定,究竟应该选用质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
   ——为什么选择质性研究?
   ——选择这种或那种方法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您所规划的(质性)研究,您有哪些期待?

2. 请您反思您自己认知兴趣的理论背景。
   ——您的研究设计对于所研究的内容有何影响?
   ——您自己接近所研究内容的方法有多开放或者有多封闭?

3. 请您认真规划和设计您的研究,但是同时也要留足余地,以重新思考各个步骤并根据研究的进展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您的研究能够利用的资源有哪些?
   ——考虑到可利用的资源,您的研究目标的可实现性有多大?
   ——必要的和合适的捷径是什么?

4. 请您认真规划抽样。
   ——您研究的案例是什么?
   ——它们代表什么?

5. 请您思考一下,您在实地中想要和谁联系,您想要让谁了解您的研究。请您反思一下自己与研究实地中的成员建立关系的方式。
   ——从您进入研究实地的方式或者被拒绝进入研究实地的方式,您可以了解到哪些有关研究场域和研究主题的信息?

6. 请您思考一下,您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
   ——是出于习惯选择了一个自己偏爱的方法吗(即那种您或您的同事一直使用的方法)?
   ——若是使用其他的方法会怎样?
   ——您选择的方法对于您所收集到的资料和您的认知有什么影响?

7. 请您认真规划一下,如何记录您的资料以及您在研究中的经验。
   ——您做的实地记录要有多准确?
   ——您需要哪些信息来系统地进行记录?
   ——您所选择的记录形式对于您的研究以及参加研究的人有什么影响?
   ——记录对于您收集与分析资料的方法有什么影响?

续表

8. 请您思考一下，您分析资料的目标是什么。 ——您是出于习惯选择了一个个人偏好的分析方法（即那种您或您的同事一直使用的方法）吗？ ——若是使用其他的方法会怎样？ ——您使用的分析方法对于您收集到的资料和您的认知有什么影响？
9. 请您思考一下，您想要如何写作您在实地中的经验以及您的研究发现。 ——您写作的目标群体是谁？ ——您想要说服目标群体相信您研究中的哪些重要内容？ ——您的写作形式对于您的研究及研究结果有什么影响？
10. 请您认真规划，您想要如何保证研究的质量？ ——您的研究应该满足哪些质量标准？ ——如何满足这些质量标准？ ——这些标准对于您的研究、参加您研究的人以及您与他们或实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11. 请您认真考虑您是否想要在研究中使用电脑和软件。 ——您想要使用哪些电脑或软件？ ——您对此的期望与目标是什么？ ——您为什么要使用电脑与软件？ ——使用电脑和软件对于参加您研究的人以及您与他们或实地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这些规则和问题旨在帮助研究者对他们的方法选择进行论证和反思并且评价这些选择的影响。它们应该帮助研究者避免固执地使用某些方法，当这些方法在具体的情况下并非是合适的方法时。它们还应该让研究者避免陷入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或者质性研究内部不同的方法或范式之间的不必要的论战。

对质性研究方法和程序的指示问题进行分析是做出方法选择决定的一种途径。做出这些选择决定的依据是以下的思想，即研究方法和程序对于研究主题、研究问题、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所针对的群体的适合性。弄清楚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指示是保证和提高质性研究质量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以过程为导向的质量管理。在这里，人们需要采用研究评价的新途径。

多元结合

多元结合（Triangulation，也译三角测量法）这一概念指的是在研究某一现象时结合使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群体、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设置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

Denzin（1989b，第 237-241 页）区分了以下四种类型的多元结合：第一种类型是“研究资料的多元结合”（Data Triangulation），指的是使用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这有别于使用不同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作为“研究资料的多元结合的子类型”，他按照时间、空间和人群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

地点和不同的人群那里收集资料。因此，他提出的这种方法接近于 Glaser/Strauss（1967/1998）所提出的"理论抽样"的策略。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研究者在这里都是进行有目的的、系统性抽样，并且都会将不同的人、研究群体、时间和地点情境考虑进来。

第二种类型的多元结合被 Denzin 称作"研究者的多元结合"（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在这里，研究者安排不同的观察者或访谈者参与研究，以便于发现研究者本人所造成的扭曲或者将其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不过，这里所指的并不是简单的工作分工或者是将一些被误认为是日常性的工作转交给助理来完成。这里所指的其实是系统地比较不同的研究人员对于研究主题及其所得出的结论的影响。

在 Denzin 的分类中，第三种类型的多元结合是"研究理论的多元结合"（Theory Triangulation）。这里的出发点是"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假设来分析资料，在这里，（……）不同的理论视角被并列的放在一起，以检验它们的有用性和解释力"（1978，第 297 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巩固和扩展认知的可能。

第四种类型的多元结合被 Denzin 称作"研究方法的多元结合"（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它又可进一步被分为两个子类型：方法内（Within-Method）的多元结合和方法间（Between-Method）的多元结合。作为前者的例子，这里提到了在同一个调查问卷中采用不同的量表来测量同一项内容，而结合使用调查问卷和提纲访谈则是第二种子类型的例子。

多元结合最初是作为效度检验的策略被提出的，它被用来检验通过各种不同方法所获得的测量结果①。不过，在这一策略被提出之后，它的使用目的越来越多地转向丰富和完善研究者的认识以及超越单一方法（始终有限的）认知可能。因此，Denzin（1989b，第 236 页）在后来也强调指出，"对方法、研究者、理论和资料的多元结合仍是建构理论的最理智的策略"。

另外一种对这种方法策略的扩展源自于对不同的理论视角的系统性的多元结合（Flick 2007d），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分别和不同的质性方法联系在一起——比如通过访谈重构主观理论（例如有关咨询中信任的主观理论），然后再通过对咨询谈话进行会话分析来研究对主观理论的运用。在这里，人们将以主体的视角为导向与社会现实生成的视角结合了起来（参见第 6 章）。

多元结合可以被用作对通过质性方法所获得的认知进行有效性论证的方法。不过，有效性论证在这里并不是要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而是旨在系统地扩展和完善认知的可能。因此，多元结合并不是对研究结果和程序进行效度检验的策略，而是效度检验的一种替代性方法（参见 Denzin/Lincoln 2000b；Flick 1992，2000b，2007d），旨在提高分析的广度、深度和方法程序的逻辑性。

---

① 1959 年，美国心理学家 D. Campbell 和 D. Fiske 在《用多元特质—多元方法矩阵来做趋同性和区别性效度检验》一文里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多元结合法（三角测量法）作为效度检测方法的思想。——译者注

分析性归纳

分析性归纳(Analytische Induktion)以明确地分析特定的案例为目的。Bühler-Niederberger(1985,第476页)对这一分析策略的理解是:“分析性归纳是一种系统诠释事件的方法,它既涵盖生成假设的过程,也涵盖检验假设的过程。分析性归纳使用的重要工具是分析例外情况,分析与研究假设相背离的案例。”在发展出临时的理论(模式、模型,等等)之后,这一分析程序便开始寻找并分析那些偏离假设的案例(或者甚至是群体)。在这里,分析性归纳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分析或整合偏离假设的案例来巩固所获得的理论和认知。分析性归纳的程序包括提示框29.1中所列出的步骤:

提示框29.1 分析性归纳的步骤

1. 对有待解释的现象给出大致的定义。
2. 提出对此现象的解释假设。
3. 依据此假设对某一案例进行分析,以检验此假设是否符合案例中的事实情况。
4. 如果这个假设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就需要重新表述假设或者重新定义有待解释的现象,以便于将这个案例排除在外。
5. 在研究了少量的案例之后便可以获得实际的肯定性。不过,研究者或其他研究者对每一个偏离性案例的发现都是对解释的否定,都要求对它重新进行表述。
6. 研究者要不断地分析案例,重新定义现象,重新表述假设,直到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关系为止;不过,每一个偏离案例的出现都要求研究者作出重新定义或重新表述。

出处:Bühler-Niederberger(1985,第478页)

Lincoln/Guba(1985)谈到了这一分析程序,将其称作“对反面案例的分析”(analysis of negative cases)。分析性归纳可以和案例分析的推广化问题(见下面)相联系,不过,分析性归纳作为分析的检验程序有其独到的价值。分析性归纳和案例分析的推广化都可以被视为是除了使用质量标准之外的用来提高质性研究质量的策略。

质性研究的推广化

对通过分析所得出的概念与关系的推广化(Verallgemeinerung)——即对其有效性范围的分析——是质性研究有效性论证的另一种策略。同时,如果想要知道为了确定或扩大有效性范围需要进行哪些思考以及采取哪些步骤,这也是评价的出发点。人们在普遍化(Generalisierung)这一关键词之下讨论了这一问

题。这里要考虑的内容是对案例的分析以及经由这些案例分析得出普遍性结论的方式。在质性研究中,普遍化的问题在于这里的结论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情境或特定的案例而提出的,是建立在对这些情境或案例中的条件、关联性和过程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质性研究(往往)正是基于这种与情境的关联才获得一种特定的说服力。然而,当人们将研究结论普遍化时,即为了查明研究中发现的关联性在多大程度上在特定的情境之外也是有效的,人们恰恰要放弃这种与情境的关联性。Lincoln/Guba(1985)以"唯一可以普遍化的是:没有普遍化"为标题讨论了这个问题,突出强调了这里的两难困境。不过,他们还是指出了几个将研究结论推广到某一情境之外的标准和途径,如:研究结论可以从一种情境转移至另一种情境的可能性(transferability)以及作为不同情境可比性程度的适合性(fittingness)。

与此相应地,人们针对以下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即如何完成从个案到理论的分析,才能让研究结论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推广性。第一步是要澄清研究想要达到以及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可推广性。这样研究者才能从中推导出合适的可推广性要求。第二步是认真地将不同的案例和情境纳入分析,这些案例和情境要包含该研究想要以实证方式分析的关联性。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往往与所选择的抽样方式密切相关,比如理论抽样提供了一种可以尽可能广泛地设计和安排条件变化(Kleining 1982)的策略,让研究者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第三步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比较。在这里,人们可以再度使用用来发展扎根理论的程序。

持续比较的方法

除了"理论抽样"的方法之外,Glaser(1969)还针对发展理论的过程提出了"持续比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它是一种分析文本的程序,基本上包括四个阶段:"(1)比较符合各个范畴的事件,(2)融合这些范畴及其内容,(3)确定理论的界限,(4)撰写理论。"(1969,第220页)Glaser认为,整个过程的系统循环是这种方法的核心特征:"虽然这种方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每一个阶段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转入下一个阶段,但是,先前的阶段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始终处在运作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发展而进入下一个阶段,直到分析结束为止。"(Glaser 1969,第220页)

当诠释者持续不断地将他们的编码与已经完成的编码和归类进行比较时,这一程序就变成了**持续**比较的方法。已经经过编码的资料并不是说在完成归类之后就算是"完事"了,而是会继续不断地被纳入比较的过程。

案例对比与理想类型构建

在案例对比(Fallkontrastierung)这一策略中,持续比较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系统化。在这里,做出最深入发展的是Gerhardt(1986b)以Max Weber(1904)为基础提出的理想类型构建(Idealtypenbildung)。这种策略包括以下几个

步骤：在完成案例重构和案例对比之后，可以构建类型；接下来是寻找“纯粹的”案例；通过与作为理性类型的过程进行比较，可将对个案的理解系统化；在完成其他的类型构建之后，这一分析过程经过对结构的理解而结束，对结构的理解指的是对那种超越于个案的关联性的理解。分析使用的主要策略是最小化比较（der minimale Vergleich），即对尽可能相似的案例进行比较，以及最大化比较（der maximale Vergleich），即对尽可能不同的案例进行比较，分别比较它们的区别和共同点。对于实证资料中所包含的主题范围而言，比较会变得越来越具体。最大化比较会对这一主题范围的结尾部分给予特别的关注，而最小化比较则会对主题范围的中心给予特别的关注。

类似地，Rosenthal（1993）针对对叙事访谈的比较分析建议对个案进行最小化对比和最大化对比。为了从访谈中构建出类型，Haupert（1991）沿着“重构性标准”对案例进行了整理，将那些具有最大相似性的传记总结到同一群组中，这样形成的群组“接下来被称为实证类型”（第240页）。研究者为每一种类型都找出一些该类型特有的日常情境，并跨个案地对它们进行分析。

质性研究的推广化在于逐步地将研究发现从案例研究及其背景中脱离出来而转化为更加普遍和抽象的关系，比如形成一种类型学（相关详细介绍请参见Kelle/Kluge 1999）。这些类型的说服力可以根据以下的问题来确定，即研究者在对主题的分析中在多大程度上多元结合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不同的研究者），以及研究者是如何处理偏离性案例的。这里还需要考虑到，具体的研究所追求的是何种程度的可推广性。这样一来，是否达到了所追求的可推广性层次这个问题，便成为评价质性研究结果以及相关过程的另一个标准。

过程评价与质量管理

从研究过程的角度来确定和保证质性研究的质量，是不同于之前有关确定和保证质性研究质量的各种努力的一种备选策略。质性研究的特点恰恰是在于它的动态性过程（参见第8章）以及它从程序方面对信度的确定和对理论发展的评价（参见第28章）。因此，质性研究的有效性论证要从研究过程的角度来确定和（更确切地说）确立。

过程评价

质性研究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嵌入研究过程之中的。在质性研究领域，孤立地提出和回答有关抽样或者特定方法选择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所做的选择是否合适，只能根据各自的研究问题、所追求的结果及其可推广性、所使用的方法来判断。诸如样本的代表性等抽象标准在这里不能提供多大的帮助。回答此类问题的一个核心依据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协调一致性，即所选择的取样方法

是否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具体的研究程序相匹配。在具体的情况下优化质性研究的措施必须要从质性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Flick 1995b)入手。相应地,人们可以发现在对质性方法及其应用的评价方面出现了一种侧重点的转移,即:从纯粹的应用评价(Anwendungsevaluation)转向了过程评价(Prozessevaluation)。

柏林“公共卫生”研究联合团体首先采用了这种过程评价。该研究联合团体包括23个项目小组,他们分别采用质性和/或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各种不同的与公共卫生有关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措施的联网问题,病人在医院之外组织日常生活的问题,公民参与和公共卫生有关的规划的问题以及组织预防措施的问题。项目小组使用的研究方法比如有:叙事访谈、提纲访谈、参与式观察、会话分析以及理论编码。笔者在此项目中负责一项跨部门的课题,被称为“卫生学中的质性方法”,旨在对项目小组提供方法论方面的支持和对质性方法的应用进行过程评价。基于一种对质性研究的过程式理解,我们建立了一个持续性的项目,包括项目咨询、学术讨论会和工作坊。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依据质性研究过程的阶段(提出和限定研究问题、抽样、收集和诠释资料、巩固和推广研究结果)对联合团体的不同的子课题提供咨询并对其进行评估。这样一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人们就有关研究问题操作化和方法应用等方法上的问题进行跨项目讨论提供一个框架。这种侧重点转移——即从孤立地评价方法的应用评价转向兼顾研究过程和研究主题特征的过程评价——的指导思想是,不能从其自身来评价质性方法的应用,而是要根据它与研究过程的其他部分以及研究主题的协调一致性来进行评价。

随着这种程序的应用,质性研究有效性论证的重点便转移至研究过程的层面。这种转移的目标也是想要获得另一种对质性研究质量的理解并且将它与具体的研究项目联系起来。

质量管理

有关质量管理(Qualitätsmanagement)这一主题的一般讨论可以推动质性研究评价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讨论主要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展开的(Kamiske/Brauer 1995)。它肯定是不能不受任何限制地被应用于质性研究领域。不过,人们可以利用那里讨论的一些概念和策略,来推动有关质性研究质量的讨论,令它适合于研究的主题。审计这一概念(参见第28章;Lincoln/Guba 1985)在两个领域中都得到了讨论,它已经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最初的连接点:“审计被理解为是对某一活动及其结果进行系统而独立的检查,由此来评价和记录特定的要求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得到恰当的应用。”(Kamiske/Brauer 1995,第5页)

尤其是“程序审计”(Verfahrensaudit)对质性研究而言很有价值。程序审核旨在保证:“既定的要求得到了遵守,并且对相应的应用是恰当合理的。(……)这里优先要做到的始终都是不断地确定出现错误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现错误而已。”(Kamiske/Brauer 1995,第8页)这种对质量的保证并不是抽象地——比如针对特定的方法本身——进行的,而是一方面要考虑到客户取向

(Kamiske/Brauer 1995,第 95-96 页),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员工取向(同上,第 110-111 页)。

在第一种取向——客户取向——这里出现的问题是,质性研究的客户到底是谁。质量管理区分内部客户与外部客户。其中外部客户指的是产品的消费者,而内部客户则是指在广泛意义上参与生产的人(比如其他部门的员工)。在质性研究领域,人们可以相应地做出如下的客户区分:外部客户是指那些没有参与研究,但研究结果是为他们而生产出来的人(如委托人、鉴定专家等);而内部客户则是指那些针对他们或通过他们而获得研究结果的人或机构(受访者、被研究的机构等)。"成员检查"或者沟通式效度验证等方法(参见第 28 章)以明确的方式考虑到了上述取向。质性研究过程与程序的设计为被研究者充分表达其见解提供了空间,因此也以隐含的方式考虑到了上述取向。在进行检验时可以明确地分析这两种取向:研究所选择的进展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回答了研究的问题(外部客户取向)并且为被研究者的视角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内部客户取向)?

员工取向需要考虑到的是,"质量是通过使用合适的技术而产生的,但是也是在相应的态度的基础上而产生的(Kamiske/Brauer 1995,第 110 页)。将这一取向转用于质性研究时,它所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决定质性研究质量的不只是方法的使用,而且还有开展研究的态度。在这里,另外一个出发点是"将(质量)责任转交给员工,用自我检查代替外部控制"(同上,第 111 页)。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要在质性研究过程中实现质量,就需要参与研究者来共同地生成和检验质量。首先,研究者要共同确定,在这里的情境下,质量应该被理解为什么以及这里对质量的理解是什么。这样一来,质量管理就包括以下的"活动(……),确定质量政策、目标与责任以及通过质量规划、质量引导、对质量保证/质量管理的说明和质量改进等手段来实现这些质量政策、目标和责任"(ISO 9001,1994,引自 Kamiske/Brauer 1995,第 149 页)。

质量管理的这些主导思想被概括在提示框 29.2 中。要达到这里的要求,就需要尽可能清楚地定义目标,记录下工作程序和问题以及定期地共同反思工作程序和问题。

提示框 29.2 质性研究过程中质量管理的原则

- 尽可能清楚地确定研究课题想要实现的目标和想要达到的标准。所有的研究者和工作人员要共同参与这一工作。
- 确定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与标准以及如何实现所追求的质量;因此,就运用特定方法的方式及其实施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通过共同的访谈训练及其分析)是在研究过程中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
- 明确地确定在研究过程中确保质量的责任分工。
- 确保在研究过程中判断和保证质量的透明度。

共同的过程评价(经过与上面谈到的咨询、训练与培训相结合)可以成为在质性研究中落实质量管理的一种策略。其他的策略将会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进一

步推动人们有关如何恰当地实现和评价质性研究的讨论。在对质量管理的讨论中需要考虑的地方是,要以与具体研究主题相符合的方式确定什么是质量以及如何在研究过程中确立和保证质量,并且要知道质量只能通过对方法与相应态度的结合才能得到保证。

要 点

- 质性研究的质量往往并不是全部可以通过使用标准来检验的。
- 一个关键但却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对指示的说明:某一特定的研究项目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为什么使用质性研究,等等?
- 与使用标准相比,多元结合以及分析性归纳等策略有时能够更好地洞察质性研究的质量。
- 质性研究的推广化意味着提出以下两个问题:我的研究结果可以被推广至哪些社会单位?我的研究结果的局限是什么?
- 过程评价与质量管理把质量问题扩展至对整个研究过程的检验。

练习 29.1

1. 请您以自己的研究为例,确定您的研究结果可以被推广至哪些情境。
2. 请您思考一下,哪些形式的多元结合可以扩展您的研究结果,您可以由此取得哪些额外的认识。
3. (在您的研究中)是否存在偏离性的案例,即哪些您的研究结果不适用于它们的案例?您是如何处理这些案例的?
4. 请您将质量管理的原则(提示框 29.2)应用于自己的研究。

拓展阅读

多元结合

Denzin, N. K. (1989b).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3. Aufl.).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Flick, U. (2007d). Triangulation—eine Einführung (2. Aufl.). Wiesbaden: VS-Verlag.

推广化

Glaser, B. G. (1969).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G. J. McCall/J. L. Simmons (eds.).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Kelle, U./Kluge, S. (1999). Vom Einzelfall zum Typus. Fallvergleich und Fallkonstrastierung i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Leske&Budrich.

指示、过程评价和质量管理

Flick, U. (2007c). Managing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ook 8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London: SAGE.

30 质性研究的写作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了解呈现质性研究的不同方式。
- 熟悉呈现媒介资料的方式。
- 理解与撰写他人及自己的研究经验相关的问题。
- 认识到这些讨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 知道这些问题对于整个质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什么。

自 1980 年以来，有关如何呈现研究结果与过程的问题引起了质性研究——特别是民族志研究——的关注。在社会科学中，文本不只是记录资料的工具和诠释资料的基础，也就是说，不只是认知的工具，而同时也是并且首先是传播和沟通认知和知识的工具。写作有时甚至被视为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 从事社会科学主要意味着生产文本。(……)研究经验必须要被转换为文本，并以文本为基础得到人们的理解。不管参与研究的人是否获得以及所获得的具体的经验是什么，一个研究过程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算是有了“结果”，即当这些结果被写入研究报告时，并且其结果不多不少正是报告中所呈现的结果。社会科学现象的可观察性和实际客观性是在文本中，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被建立的。(Wolff 1987，第 333 页)

在这里，写作在质性研究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变得重要：在呈现一项研究课题的结果时；作为评价获得研究结果的过程以及研究结果本身的出发点；最后，作为反思和思考整个研究状况的出发点。

写作的实用功能：呈现研究结果

人们可以将呈现研究结果的不同方式定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在其中的一个极端，研究的目的旨在按照 Strauss(1991)的模型从资料与诠释中发展出理论。

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来自实地的故事”（Van Maanen 1988），旨在形象地说明研究者所遇到的情境。

理论作为呈现形式

本书在第 28 章中已经介绍过用于评价 Strauss（1987）式理论的标准。Strauss/Corbin（1990/1996，第 197 页）认为，对这类理论的呈现要达到以下的要求：

> （1）有一个清楚的、分析性的故事；（2）在一种概念层面上写作，且描述在这里仅居于次要地位；（3）清楚地说明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必须也要将相应的概念化层面说清楚；（4）说明变化及其相关的条件、后果等，包括更广泛的背景。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两位作者建议，研究者在第一步应该勾勒出该理论的一般性逻辑构思。在这个理论构思中，研究者应当发展出该故事的分析逻辑，并确定好理论的轮廓。第二步是清楚地概括总结该理论的核心构思。在第三步，两位作者建议研究者对这一核心构思的“结构”进行视觉性呈现（同上，第 199-200 页）。因此，他们在呈现中将重心置于对所发展的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路线的说明之上。以概念网络和发展曲线等形式所进行的视觉性呈现是一种以简洁的方式呈现理论的方式。为了避免陷入（永不可能完成的）完美草稿之陷阱，Strauss/Corbin 建议研究者应该在合适的时间放手让事情开始进行，接受在理论与呈现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未完成性（同上，第 203-204 页）。最后，他们建议研究者要考虑到草稿的潜在读者，并针对目标读者做文本表述。Lofland（1974）对以理论形式呈现研究结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提出了以下用于撰写及评价研究报告的标准：

> （1）通过一般性的概念框架来组织报告；（2）所使用的一般性框架是新颖的；（3）该框架是在报告中并且是通过报告而得到深化或发展的；（4）该框架包含丰富的事件，即被丰富地记录在质性资料之中；（5）该框架与实证材料交织在一起。（Lofland 1974，第 102 页）

来自实地的故事

Van Maanen（1988）主要区分了民族志研究中呈现研究结果和过程的三种形式，它们也可以被转用于其他形式的质性研究。

现实主义的故事（realist tales）有以下四个常规惯例：第一，作者不在文本中出现——观察是作为事实而得到报告的或者是通过使用陈述或访谈的引言而得到记录的。诠释也不是作为主观性诠释而被提出的。第二，呈现的重点在于所研究内容的典型形式。为此，会呈现和分析大量的细节。第三，在呈现中非常重视参与者（实地成员或受访者）的观点：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经历有何体验？对受访者而言，健康意味着什么？第四，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力求给人一种“诠释全能”（interpretive omnipotence）的印象（1988，第 51 页）。诠释不会停留在主观见解的层面之上，而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和深入的诠释超越这一层面。作者要证明，他

能够提供有依据的诠释,并且能够将行为主体的陈述上升到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层面,比如通过使用来自社会科学文献的用于表达相关关系的"疏远经验性概念"(experience-distant concepts)(Geertz)。这种呈现形式的一个例子是研究者在完成客观注释学分析之后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参见第25章),在这里,要在行为主体之外寻找其行动的真正原因,即从经过分析而得出的结构之中寻找其行动的真正原因。

自白式故事(confessional tales)的特征是个性化的作者身份和权威。在这里,作者会指出他自己在他所观察的内容中、在他所做诠释中以及在他所使用的表述中扮演的角色。作者的观点与在实地中出现的问题、错误和疏忽(Van Maanen 1988,第79页)同样都是要呈现的内容。尽管如此,作者仍会力求表明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扎根于所研究的议题之中的。呈现中的自然性可以强化以下的印象,即:在这里,"一个实地工作者和一种文化相遇,尽管起初曾有些争执和误解,但在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同上,第79页)。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对所研究主题的描述和对研究者在此所获得的经验的描述的混合体。这种呈现形式的一个例子是Lau/Wolff(1983)将他们走进实地的过程描述为一种学习过程以及这里的失败(Kroner/Wolff 1986)。

印象主义的故事(impressionist tales)是以戏剧性回忆的形式来写作的:

> 对事件的复述大致依照其发生的顺序,并且包括所有那些与所回忆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琐碎的事情。这里的想法是,将读者带入一个不熟悉的故事世界,让他们尽可能地像实地工作者所看到、听到和感到的那样去看、去听和去感受。这些故事力求让读者在想象上置身于实地情境之中。(Van Maanen 1988,第103页)

在研究报告中,知识是以断片形式逐步被呈现出来的。叙事常常被选为呈现的形式。这里的目的是保持读者的紧张感,并传达一致性和可信性的印象。印象主义的报告永远不会彻底完成。其意义会在与读者的接触中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同上,第120页)。这种呈现形式的一个例子是Geertz(1973)对巴厘岛斗鸡的描述。

其他的形式还有**批判的故事**(critical stories)和**正式的故事**(formal stories)。前者旨在引起读者对社会上不良状况的关注,后者旨在呈现理论性相关关系。

这些报告形式在呈现研究结果和过程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有时,这些报告形式会相互补充,例如,研究首先提供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然后在第二个发表物中以自白式故事或印象主义的故事的形式描述实地接触。另一方面,正如Van Maanen以自己的写作风格为例所证明的那样,写作民族志研究报告的惯例已经发生了改变:总地来说,当前发表的现实主义的故事变少了,而印象主义的故事或自白式故事则变多了。这种变化是双重性的:人们不仅是更多地撰写印象主义的故事或自白式故事,而且这些作品也更多地得到了出版。从现实主义的故事向自白式故事的转向已经出现,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完美理论或有关这种理论的完美报告是不存在的。因此,研究者应该考虑到局部失败的维度

和自己认知的局限性，将其视为是值得在自己的研究结果中呈现的内容[①]。

写作能力与学习写作

考虑到结果的呈现——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故事——人们在未来的关注点（必）将会更多地集中于质性研究的写作和写作能力问题。当研究结果不能简单地被化约为数字、统计分布或表格，而是要写成有关文本的文本[②]时（尤其是在质性研究领域更是如此），Becker（1993，1994）有关写作作为社会科学学者（无）能力的思考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他是基于自己开设写作课程的经验而产生这些思考的。他发现，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自己的立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担心。在他看来，这是造成社会科学文本说服力有限的一个原因："我们的表达之所以含糊，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我们表达的更清楚的话，就会被其他同事发现其中明显的错误，受到他们的嘲笑。我们宁可说一些无害的但是安全的话，也不能说些面对批评可能无法辩护的大胆的意见。"（1993，第 74 页）

在 Becker 看来，有关对社会科学认知有效性论证的思考，如系统地整合偏离性案例以及对比分析截然不同的案例（参见前面一章），可以让研究者以更加肯定的方式对待认识和结果，允许研究者更清楚和更具体地写作和表达："因担心而产生的限制令每一个陈述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么做忽视了哲学和方法论传统，按照这种哲学和方法论传统，以一种普遍有效的形式对研究结果所做的普遍化同时也包括提出一些消极的例子。这些消极的例子可以被用来加强这种普遍化。"（Becker 1993，第 76 页）

在每一种形式的科学知识生产中，呈现（Darstellung）的角色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一事实在 Becker 看来应该让研究者在写作时做到将潜在的读者当作核心的要素考虑进来，因为研究发现和结果从来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而存在的，而是至少会受到潜在读者的影响。研究者在撰写社会科学文本时可以积极地利用这一点，这是 Becker 提出的又一个建议（不仅仅是针对他的写作课程的参加者）：

> 要想让文本变得更加清楚和更加容易理解，就需要分析该文本潜在的读者。谁应该更好地理解该文本？究竟是谁要阅读该文本？读者必须要知道什么才不会误解所说的内容或是觉得所说的内容模糊不清和容易被人误解？如果读者是和作者在同一个项目中紧密合作的同事，那么，他会选择一种写作方式。如果读者是在相同专业领域工作的不认识的同事，作者会选择另一种写作方式。如果读者是在其他领域和学科工作的学术人员，作者使用的写作方式又会有所不同。如果作者是"理解力强的外行"，作者使用的写作方式会再度有所不同。（Becker 1993，第 82 页）

---

① Bude（1989）的建议，即使用"散文作为呈现社会科学认知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在此指明了方向，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这一判断也适用于同一作者在其他地方（Bude 1993）展开的有关社会学叙事的益处和特点的讨论。

② "有关文本的文本"（Texte über Texten）在这里指的就是文本资料（如文档、访谈记录或观察记录等）写成的文字报告。——译者注

如果向文本科学(Textwissenschaft)发展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如何呈现研究结果和过程的问题将会对质性社会研究的方法讨论产生更大的影响。研究者通过文本(包括社会科学的文本)想要并且也确实绘制了一种特定版本的世界(Goodman 1984),并且想要说服其他的学者及一般的(潜在)读者相信这一版本。要做这样的说服,不仅需要依靠呈现的方式,而且也要依靠所呈现的内容。不过,社会科学文本的功能与效果首先取决于对以下经验的考虑:"我们将科学写作当作是一种旨在说服的修辞学形式来谈论,此外我们还谈论哪些形式的说服被学术界认为是合适的,以及哪些是不合适的。"(Becker 1993,第79页)与此相应地,不仅写作的技术近来吸引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而且那些在生成文本和对文本进行实证加工中发生的文本建构和诠释过程,还有针对文本与建构、版本与诠释、认知和结果而提出的有效性论证的问题,更成为了质性研究讨论的焦点。①

媒介资料:呈现的新的必要性和形式

在质性研究的历史上,书面文字——以及印刷文字——一直是用于发表研究成果和获得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在有些情况下,质性研究产生的资料数量太多,致使其内容既不能以期刊文章的形式得到发表,有时甚至也不能用书本的形式得到发表。但是,为了能够说清楚具体的研究程序往往又必须要提供这么多的材料。特别是使用本书第五部分所介绍的媒介资料更会给研究结果的呈现带来新的挑战。为了在出版物中使用媒介文档(图片、照片、电影、网络文档),Bergmann(2006,第496页)提出了若干种对它们进行"资料转换"(Datentransformation)的做法:

- 以文字形式进行"描述"(在从图片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中,研究者的诠释在其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且资料被高度缩减)有助于在出版物中呈现视觉信息。
- "转录与标记法":图像——如同口述的文本一样——被研究者按照特定的规则转录成书面文字(参见第22章),研究者在出版物中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
- "图片插入":图片或画图被当作典型代表融入出版的文字之中。
- "系列图片":正如第18章中所提到的Bateson/Mead(1942)的研究一样,一系列的图片被纳入文本中或作为文本的补充,以表明过程。
- 民族志电影可以作为文字描述的替代方式被用来呈现所研究的过程及从中得出的结果。

如果不适合使用文本这种发表形式,而且也不想选择一种全新的发表形式

① 人们不仅在阅读民族志研究的出版物时会获得这一印象,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在阅读Denzin/Lincoln(2000a)主编出版的手册时,也会产生这种印象。该手册深刻地受到了当前有关后现代时期民族志写作和文化写作的讨论的影响。

（如电影）的话，那么，研究者可以考虑使用新媒介作为图书和期刊的替代形式。在网上发表不仅可以加快发表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超越印刷品在版面和费用方面存在的局限。网上发表物可以包纳更多的资料，比如更长的访谈段落节选（以文字的形式或者以语音的形式），也可以包纳照片和录像。作为研究中的实证材料，如果这些照片和录像是以节选的形式或者黑白的形式出现在图书中的话，它们的表现力会大打折扣。使用 CD 或 DVD 作为发表质性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形式，可以传达内容更加丰富的资料和分析。人们既可以将它们当作独立的媒介使用，也可以使用它们作为传统媒介（如图书）的补充。不过，这种新的发表形式也带来了如何保证参与者匿名性的新问题——因为这种发表物呈现了来自实证资料的更多的文本（和背景），或者提供了包含许多内容和背景的系列图片（参见第 4 章）。与这一领域的其他所有的科技进步一样，我们应该权衡这些新发展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写作的合法化功能

社会科学知识的可沟通性在根本上依赖于呈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形式。这一点曾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不过，近来这一认识从不同的方面进入了方法讨论的中心，正如 Bude 所指出的那样：

> 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知识始终都是被呈现的科学知识。因此，在科学的行为逻辑中，除了“研究的逻辑”之外，还要考虑到“呈现的逻辑”。在科学知识的构建中，研究者构建经验的方式与这些经验得到呈现的方式紧密相关。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才刚刚开始思考和着手研究。（Bude 1989，第 527 页）

这一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的背景是：人们在历史学领域对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考（参见 Koselleck 1990；Ginzburg 1990），以及 Clifford Geertz（1988/1990）有关“人类学者作为作者”的角色的思考，即：作为作者，人类学者所提供的并非是对所研究文化的客观描述，而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描述，这一描述明显受到作者自己写作风格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因，Clifford Geertz 分析了人类学领域四位经典的研究者（Malinowski，Evans-Pritchard，Lévi-Strauss，Benedict）的经典作品，并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在 Geertz 的思考中，人们在现代人类学领域所展开的有关“民族志展示危机”（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n）的讨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①]在这一讨论中，人们抓住了有关展示的传统的理解方式所具有的问题（第 7 章曾谈到过这些问题），并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展示他者的问题之上（在此指的是呈现其他文化的问题）：“向文本的转向揭示出科学认知过程中一个至今被人所忽视的维度。通过把认知当作文本生产和对话语和行为实践的书面化转录来进行讨论，人们对民族志展示实践

---

① Berg/Fuchs（1993）和 Clifford/Marcus（1986）的著作对这一讨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进行讨论的可能性条件就被创造出来了。”(Fuchs/Berg 1993,第 64 页)

在对陌生的和偏远的文化进行民族志研究时,研究者旨在向那些并没有亲身体验过这些文化的读者说明这些文化。这与向读者介绍出自他们自己文化背景中的日常生活、传记和机构环境不同,展示的问题在这里要更加突出一些:“民族志研究始终要和以下这种关系失调的问题进行斗争,即:一方面,认知的过程是建立在有限的个人经验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却要求他们的作品(即文本)要提供有关整个文化的权威性知识。”(Fuchs/Berg 1993,第 73 页)

当社会科学开始批判地审视科学文本的生成条件及其对于文本中所描述、所解释或所叙述的内容的影响时①,它同时也开启了什么是呈现知识的合适形式的讨论。这样一来,写作不仅仅被视为是研究进程的一部分②,而且也被视为是一种研究方法(Richardson 2000)。正如其他的方法一样,它也随着历史和科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于质性研究领域的科学写作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并且对这里一些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了质疑。研究过程中的写作在这里得到了人们特别的重视,因为第 28 章介绍的那些用来评价质性研究的“备择性标准”总地来说着眼于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表现。在可信任度与可信度取代特定方法的信度和研究资料及结果的效度而成为核心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例如,Lincoln/Guba 1985),有效性论证问题就被转移到了写作和报告的层面:“研究报告对方法程序进行介绍并对此进行反思,讲述进入研究实地的途径以及在研究实地中的活动,包括对不同资料的记录、对观察和谈话的转录、对资料的分析以及得出理论性结论,等等。因此,研究报告是回答有关研究质量问题的唯一的基础。”(Lüder 1995,第 325 页)

如果人们主要是根据对它们的呈现以及报告或文章的风格质量来评价科学研究的结果及过程的话,那么,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文本都被置于对质性研究有效性的分析的中心位置。作为对第 7 章中相关讨论(参见图 7.2)的补充,文本成为评价将经验转译成建构和诠释的核心要素。所呈现内容的可信度可以根据满足前面章节中介绍的有效性论证的标准的程度来确定,如:沟通式效度验证、对访谈情境的分析、坚定地贯彻实施理论抽样、对访谈和视角的多元结合、通过持续比较、案例对比以及分析偏离性案例来推广研究结果的方法措施(参见图 30.1)。

在以文本为基础的有效性论证的基础上,Reichertz(1992)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指出,这种形式的可信度论证不只是要在文本中完成,而且也要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中来实现:

---

① René König(1984,第 23 页)在此前便已经在一般的意义上指出了社会科学应该要这么做的理由:“有关‘异国’或‘远国’的想象对于民族志研究者的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研究本国现实的社会学工作者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因为以下的观念在今天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显而易见的了,即:社会学工作者作为特定社会的成员已经掌握了有关该社会现实的实质性的‘先期知识’(Vorwissen),这些先期知识经过相应的加工之后便可以发展成科学性的知识。”

② 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 Becker(1993,1994),Wolcott(1990b)和 Richardson(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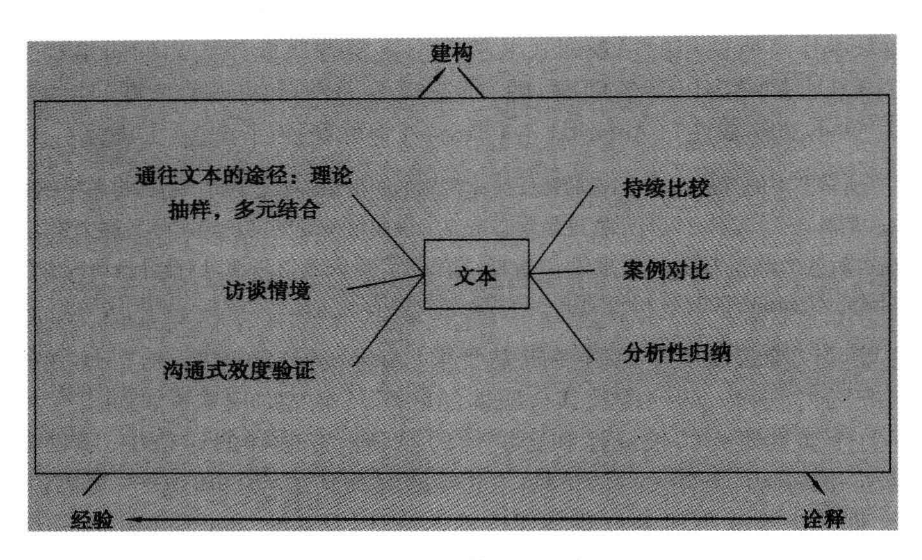


图 30.1　以文本为基础的有效性论证

不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文本中表达出来的态度,即民族志研究者对于自己的诠释和他的同事的诠释所持的态度,对于根据个案的需要把这些诠释联系起来的态度。对于读者而言重要的不是书面文字所宣称的诠释的方式,而是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诠释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也需要借助符号学的手段才能表现出来,而符号学的手段也是可以用于欺骗目的的。"(Reichertz 1992,第 346 页)

写作的反思功能

由此来看,研究不仅包括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而且还包括研究者与其潜在读者之间的互动,研究者最终也是为这些读者而写作的。这种关系——还有为这一目的而生成的文本及与此相关的写作——受到多重意义上的决定性影响——"情境的……修辞的……机构的……体裁的……政治的……历史的"(Clifford 1986,第 6 页)。

更广泛地来看,经过这种思考,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成科学文本的条件与在文本中只是以概括的形式记录下来的研究者与研究主题之间关系相比,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人们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生产也进行了类似的反思(参见 Knorr-Cetina 1981)。如果说,在这里是由社会科学来研究"别人"——具体来说是在实验室工作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及其"认知生产"的实践——的话(就像社会科学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那么,有关民族志写作以及更普遍地说有关质性研究写作的讨论则是引向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自我反思。人们在这里越来越多地质疑质性研究者的角色和其自我理解:"质性研究者不是居于文本之外和之上的客观的、权威的、政治中立的观察者。"(Bruner 1993,第 1 页)

如果说作者所使用的呈现形式从根本上决定着呈现什么和如何呈现，那么，人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以下的问题，即：所呈现的内容可以要求具有何种有效性。人们以“文本的权威性”（Autorität des Textes）为标题探讨了这一问题：

> 所谓文本的权威性，我们指的是任何一个文本所提出的自己是准确、真实和完整的要求。也就是说，一个文本有没有忠实地呈现它按理来说应该呈现的情境和个体？这个文本是否有权宣称，这个报告是献给广大世界的报告，它既符合研究者的兴趣，也符合被研究者的兴趣？（Lincoln/Denzin 2000，第 1052 页）

这里可以接着提出有关质性研究要求（Anspruch）的问题，恰当地分析和呈现所研究的情境和人的问题及其合法性的问题。对文本权威性的质疑很快便会导致对整个质性研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质疑。在这样的讨论中，质性研究最初的动机——即生产有关生活情境与主观见解及其情境的知识——面临着以下的危险，即迷失在无穷尽的自我参照性话语论述（Diskurs der Selbstreferenzialität）之中。[1]

社会科学消解于写作风格之中？

质性研究经过辛苦努力才刚刚在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却已经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即迷失在有关写作的角色和问题的无尽争论之中。人们或许有必要分析一下已经确立了其学术地位的民族志研究者的写作风格（如 Geertz 1988/1990 对 Levi-Strauss 等人的分析；Wolff 1992 对 Geertz 的分析），以便于将民族志的写作方式与其他体裁的写作方式相区分。Lüders（2000a，第 398 页）就这种争论提出以下的批评性看法：“不过，除了一点反思上的收获之外，这些争论很少带来在研究实践方面可以使用或有所帮助的结果。”尽管如此，质性研究还是不应该放弃以下的追求，即：从事科学研究，指出与其他表现体裁的界限，确定区分好的、成功的研究与不太成功的或失败的研究的分界线。为了促进有关研究中写作的讨论，人们既不能放弃有关质量标准的讨论——更确切地说是有关什么是好的、值得信任的文本的讨论——，也不应降低对研究实践的重视程度。

要 点

- 传统的对质性研究及其结果的文字性呈现得到了新的媒体和媒介资料的补充。
- 有关质性研究写作的讨论超越了以何种形式呈现研究结果的问题。
- 展示、合法性及权威性等根本性的问题让这一讨论成为了质性研究的核心争论。
- 这种根本性讨论的危险是，它有可能会妨碍人们开展研究以及发现（和呈现）有意思的认知，反而陷入了无穷尽的反思性循环之中。

---

① Lincoln/Denzin 也看到了类似的危险：“后结构主义者们所做的无止尽的自我参照式批评可以生产出堆积如山的文本，但是这些文本与人类具体的经验少有关联。”（Lincoln/Denzin 2000，第 1050 页）

- 尽管如此,为呈现在研究和实地中所获得的经验而选择的写作方式,决定着哪些片段会被传达给感兴趣的读者,以及以何种方式得到传达。

练习 30.1

1. 请您从质性研究文献中选取一个例子。在阅读完这个例子之后,请您自己问自己:作者们有没有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如何进入实地和接触实地成员的,他们是如何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等等。
2. 请您再次分析一下这里所作的展示并且思考一下,在作者们所呈现的版本中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中获悉被研究者的见解和立场,这是否必要或有用。
3. 请您以自己的研究报告为例。您在这里选择了何种呈现方式?本文有关质性研究写作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与您的报告有关?

拓展阅读

Becker, H. S. (1994[1986]). Die Kunst des professionellen Schreibens. Ein Leitfaden für die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Campus.

Berg, E./Fuchs, M. (Hrsg.)(1993).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n. Frankfurt: Suhrkamp.

Bergmann, J. (2006). Mediale Repräsentationn i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In: R. Ayaß/J. Bergmann (Hrsg.). Qualitative Methoden in der Medienforschung. Reinbek: Rowohlt, S. 489-506.

Clifford, J./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tt, E. (2000). Darstellung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78-588.

31 质性研究——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目标：在您阅读完本章之后，您应该

- 概括了解质性研究的发展现状。
- 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
- 获得质性研究学习与教学方面的启发。
- 认识到质性研究尽管在方法上取得了进步，但仍在艺术与方法之间摆动。

在前面的章节中，本书带着您走过了质性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首先分析的是质性研究的历史和共同特征，在之后的章节中，本书又以问题为导向重点介绍了至今为止可供人们使用的各种质性研究方法。多年以来便可观察到的“质性社会研究”领域的扩展分化有可能让人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失去了概览——人们对于各种方法和程序不能一目了然；人们看不出这里尽管有这些分化发展，但却仍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领域；人们也不知道这些发展能够、将要或应该将质性研究引向何方。这种分化已经让许多质性研究者满足于自己的（或自己偏爱的）方法，不再去了解这种方法以外的发展。为了抵制这些趋势，本章在这里总结一下质性研究的主要发展路线与趋势，并在最后针对质性研究的教与学提供了一些建议。

21 世纪初的质性研究——发展现状

质性研究的发展是在不同领域展开的，每个领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特定的对现实的理解和自己的方法程序。这里要举的一个例子是常人方法论。作为一个理论纲领，常人方法论首先引发了会话分析的发展，然后又进一步分化发展出了新的方法，例如体裁分析和话语分析（参见第 24 章）。人们可以在质性研究领域发现一系列这种领域，它们分别在其内部分化发展，与质性研究其他领域

的讨论和研究没有太多的联系。其他的例子还有：客观注释学（参见第25章）、以叙事访谈为基础的传记研究（参见第14章和第25章）和民族志（参见第17章）。另外，德语地区和英美地区的讨论有着不同的发展和侧重点，它们分别研究各自的主题，使用各自的方法，互相之间交流不多。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强了质性研究的分化和多样性。

质性研究的研究视角

尽管不同的质性研究取向在理论假设、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方法聚焦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人们仍可以总结出三条主线（Hauptlinien）：第一条主线在符号互动主义和现象学的传统中找到了其理论基础，它们重点研究的是主观意义和个体的意义赋予（Sinnzuschreibungen）。第二条主线在理论上扎根于常人方法论和建构主义，主要关注日常生活的例行惯例（Routinen）和社会现实的生成。第三条主线的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的理论，以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和机制以及潜在的社会构型为出发点（参见第6章）。

这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以Lüders/Reichertz（1986）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第一类研究关注的是“主体的看法”，而与之相对的第二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现有的（日常生活中的、机构性的，或更一般地说：社会的）情境、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例如常人方法论的语言分析——参见第24章）。第三类研究的特点是从心理分析或客观注释学的角度（主要是以注释学的方式）重构“生成行动和意义的深层结构”（参见第25章）。

各种收集和诠释资料的方法可以被分别归入这三种研究视角：采用第一种视角的研究往往使用提纲访谈或叙事访谈，并选择与这些方法相配的编码程序和内容分析法来分析资料。采用第二种视角的研究往往通过小组讨论、民族志方法、（参与式）观察和对互动进行视听记录等方式来收集资料，然后用话语分析

表31.1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		
	获取主观看法的途径	描述社会情境的生成过程	对深层结构的注释学分析
理论观点	• 符号互动主义 • 现象学	• 常人方法论 • 建构主义	• 精神分析 • 生成性结构主义
收集资料的方法	• 提纲访谈 • 叙事访谈	• 小组讨论 • 民族志 • 参与式观察 • 记录互动 • 收集文档	• 记录互动 • 照片 • 电影
诠释资料的方法	• 理论编码 • 质性内容分析 • 叙事分析 • 注释学方法	• 会话分析 • 话语分析 • 体裁分析 • 文档分析	• 客观注释学 • 深层注释学 • 注释性知识社会学

或会话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这些资料。采用第三种视角的研究主要通过对互动的记录以及使用视听资料(图片或电影)来收集资料,然后再以不同的注释学分析方法来分析这些资料(参见表31.1)。

最重要的流派

总地来看,质性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中以及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流派,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一般的方法讨论。

扎根理论

以 Glaser/Strauss(1967—1998)为代表的研究传统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扎根理论一直以来都深受质性研究者的重视。这一流派一方面提出了将理论发展当作质性研究目的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发展了理论抽样(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中根据实证分析的情况在研究过程中选择案例和材料——参见第 11 章)等方法以及不同的编码程序(开放式编码、轴向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参见第 23 章)。大部分的实证性质性研究都会借鉴使用 Strauss 等人提出的方法程序的这个或那个组成部分。扎根理论可以被视为是质性研究的第一流派——在国际上和德语区均可以这么说。这一流派也对德国的传记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Hildenbrand(例如他发表于 1999 年的研究)将其与客观注释学联系了起来。

常人方法论、会话分析、话语分析和体裁分析

第二个流派的出发点是同样源自美国的由 Harold Garfinkel 提出的常人方法论。它的重点在于对日常实践的实证分析,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日常实践在机构内外确立互动的秩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话分析(参见 Sacks 1992)曾是在实证层面落实这一纲领的主导方法。会话分析把谈话当作一个过程和一种互动形式来研究——人们使用哪些方法在实践中将谈话组织成一种有规则进行的过程,特定的互动形式——如饭桌上的谈话、闲谈、咨询和鉴定是以什么方式得到组织的。在此期间,会话分析已经发展成为常人方法论的一个独立的领域。由 Garfinkel 等常人方法论者设计的第二个研究领域——即“工作研究”(Bergmann 2000a)——在德语区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不过,在德语区,将会话分析的问题和分析原则扩展至体裁分析中的更大的分析单位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参见 Knoblauch/Luckmann 2000)。最后,常人方法论和会话分析曾为人们提出话语分析(至少是这一异质性研究领域的绝大部分)提供了支持(参见 Keller et al. 2001)。在收集资料方面,所有这一领域的研究都致力于收集自然性的资料(比如记录日常对话),而放弃使用明确的重构性的资料收集方法(例如访谈)(参见第 24 章)。

民族志

自 1990 年代初期以来,民族志研究不仅在国际上,而且也在德语区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它取代了以前采用参与式观察法的研究。民族志研究较少通过有关事件的事后报道（例如通过访谈）来理解社会事件，而更多地是通过参与事件、从内部按照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理解社会事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花更多的时间留在研究实地（而不是一次性的访谈或观察）以及灵活使用不同的方法（包括或多或少结构化的访谈或者文档分析）。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对所观察到的事件进行写作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点。这种关注在普遍的意义上强调了事件和对事件的呈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见下面的分析）。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一种趋势，即用“民族志”这个称谓来代替“质性研究”（包括其各个方面）这个概念（比如 Denzin 1997）。在德语区，民族志研究与生活世界分析（Lebensweltanalyse）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一些特殊世界，例如精英学校、与喝午后咖啡联系在一起的旅行（Kaffeefahrt）、宗教场面等（见 Hirschauer/Amann 1997 和本书第 17 章）。

文化研究

另外一个在德语区得到人们讨论的流派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在传媒学和社会学领域（Winter 2000）。人们对此的讨论非常热烈，定期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大量出版物也延续着这一讨论。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流派在方法论和方法原则方面尚没有确定下来什么。它更多地是通过以下内容来定义自身的，即：以“文化”为研究客体，依据文化实践（如媒体）来分析文化，以（弱势的）亚文化以及具体情境中现有的权力关系为导向。

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或者被人称作性别研究的这一研究方向为质性研究问题和方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Gildemeister 2000）。这些研究重点分析性别的构建和区分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例如，变性现象可以是实证研究的一个出发点，通过对它的分析来表明“典型的”性别观念的社会建构（参见第 6 章）。

客观注释学和注释性知识社会学

Oevermann 提出的客观注释学在德语区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德语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客观注释学为人们分析案例（见 Kraimer 2000）以及作为这些案例之基础的结构提供了一套精致的分析工具，并由此为一个特色突出的学派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客观注释学的出发点是世界及有待分析的材料的文本表达性（textuelle Verfasstheit）。客观注释学分析的理论框架往往是由 Oevermann 的专业化理论、社会化理论和结构主义观点所决定的。案例的结构是在一个多层次的诠释过程中被分析出来的，证伪和外展（Abduktion）在这里被用作推论程序和检验程序。在此期间，客观注释学被人与其他的研究方向结合了起来，例如在设计注释性知识社会学时与 Soeffner（2000）提出的社会科学注释学（Reichertz 2000）的结合，以及与 Luhmann 的建构主义系统理论的结合（参见第 25 章）。

叙事分析和传记研究

在德语区，传记研究在根本上受到所使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该方法之扩展的决定性影响。这里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 Schütze 发展出来的叙事访谈以及那些通过叙事获取传记过程和生活史经验的方法。这些方法在社会学的不同分支领域得到了人们的使用，在过去几年中，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方法。人们通过叙事及对叙事的分析来研究更大的主题——例如人们如何应对失业、移民经验、患病过程以及与大屠杀相关的家庭经历。人们在此使用叙事分析的方法来诠释资料（Rosenthal/Fischer-Rosenthal 2000）。近年来，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发展，如叙事情境经过扩展转向了群体叙事（Hildenbrand/Walter 1988），还有对一个家庭中几代人的叙事进行分析（参见第 7、14、15 和 25 章）。

现象学和生活世界分析

由 Husserl、Schütz 和 Luckmann 等人发展出来的有关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的方法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在自然的情境下共同建构意义以及理解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在这里，人们认为主观诠释在对意义的理解和生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十分重视以下的问题，即被研究的行为者有哪些主观诠释，这些主观诠释有什么特点。为此目的，人们研究"小型的社会生活世界"，并分析这些生活世界的成员是如何建立起他们所共享的意义系统的（参见 Hitzler/Eberle 2000；Honer 2000）。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不同的问题，如健身中心、自己动手做工的场景（Heimwerkerszenen）、专家知识和电子摇滚乐场景（Technoszenen）。

提示框 31.1　质性研究的流派

- 扎根理论
- 常人方法论、会话分析、话语分析和体裁分析
- 民族志
- 文化研究
- 性别研究
- 客观注释学和注释性知识社会学
- 叙事分析和传记研究
- 现象学和生活世界分析

方法发展与趋势

作为补充，本章在这里列出一些不同的方法发展趋势（这里不追求做出全面

的总结），这些趋势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质性研究。

视觉资料和电子资料

除了通过访谈、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所收集到的传统的资料之外，视觉数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录像分析和电影研究在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不仅是在传媒学领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使用视觉资料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恰当地编辑整理这类资料，如何将原本为了分析文本而发展和使用的方法应用于这类资料。以下的问题仍有待于人们去解释：人们通过因特网和电子交流方式（如电子邮件）可以获得什么形式的资料，人们要想分析这里面所包括的建构过程和交流过程需要收集哪些资料（参见第 20 章，第 30 章以及 Banks 2007 或 Bergmann/Meier 2000）。

质性网络研究

质性研究的各种传统方法已经经过调整被用于那些将网络当作工具、资源和研究对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电子邮件访谈、网络焦点小组和网络民族志的重要性将会上升，尽管这些方法在实际问题之外还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伦理方面的问题（参见第 20 章）。

电脑的使用

发展电脑程序来支持质性研究代表着一种发展前景。人们对待这一发展前景的态度不同：有人乐观地接受，有人深表怀疑（如 Knoblauch 2000），还有许多质性研究者至今仍然忽视这一发展。在使用电脑方面，得到最广泛发展的领域是文本诠释这一领域。人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发展出许多便于用户使用的、具有不同功能的程序（ATLAS/ti，NUD * IST；MAXQDA），而且开始进行商业销售。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是：这些程序是否最终会成为通向相同的使用方式和可使用性的不同途径？这些程序是否会对人们处理质性资料的方式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技术上的投入与减轻例行工作和处理方式的效果相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电脑程序为研究者对数据材料的处理和管理提供支持（例如将范畴分配给与它们相符的文本段落，通过范畴找出它们所指的各个文本段落）。语言识别软件的发展正在取得进步，这一发展是否会在某个时候实现电脑辅助的访谈转录，以及这一发展是否是一种值得追求的进步，均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与德语区的文献和研究实践相比，人们在英语区的讨论中，对于电脑软件的使用明显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参见第 26 章）。

杂　交

在上面讨论过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流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走向方法杂交（Hybridisierung）的发展趋势。比如民族志、文化研究以及扎根理论研究均不局限于使用某些特定的方法。确切地说，在研究实地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从研究

实用性的角度被选择出来的，并且可以与多种不同的方法结合使用。杂交的概念指的是研究者放弃将自己限定于某种特定的方法之中，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用方法（比如 Knoblauch 2000）。

多元结合

多元结合这个概念在方法讨论的不同领域中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这一概念所指的对不同质性方法的结合或者对质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Kelle/Erzberger 2000）在复杂的研究领域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方法的魅力在于，单一方法视角的局限性可以通过系统方式得到克服（详见 Flick 2007d 和第 29 章）。

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对这个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特别是在诠释学或现象学研究中）认为质性研究几乎完全不需要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两种研究传统和方法不可兼容。而另一些人则在研究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模式和策略（参见 Kelle/Erzberger 2000 和第 3 章）。最后，在这一方法论讨论之外，人们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出于实际原因的考虑而结合使用两种研究方向有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设计这种多元结合，才能同时兼顾这两种研究方向及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点，同时又不冒失地将其中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

质性研究的写作

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如何恰当地表述质性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的问题一度成为主导性的话题，尤其是在美国。在德国，特别是 Berg/Fuchs（1993）主编出版的著作让人们了解到这一讨论。许多作者（Reichertz, Wolff, Bude）都对这一讨论作出了贡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得到像在美国一样的关注。除了讨论写作报告的不同策略之外，这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研究者如何令他们的表述合乎所研究的生活世界和在这里存在的主观视角？呈现的方式对于所呈现内容的组织——研究本身的设计——有何影响？呈现的方式对研究质量的评价及其可评价性产生什么影响？在这里，侧重点是不同的：在民族志研究中，有关所研究内容的写作与资料的收集和诠释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其他领域，写作更多地是被视为一种工具——我如何才能将我的研究过程和得出研究结果的根据表述得清晰和有说服力？总地来看，人们讨论写作的兴趣又有所下降。不过，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这一讨论将会在一个新的焦点之下再度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即：当人们想要在政策咨询或者评估领域简明扼要地说明通过质性研究所获得的认识，以便于能够引起机构代表和政治家的关注并说服他们时（参见第 30 章）。

质量标准和质性研究的质量

什么是合适的质量标准的问题至今仍然受到一定的关注。现在学界已经有一

系列专著在以不同的视角讨论这个话题(Seale 1999;Steinke 1999; Flick 2007c)。不过,根本性的二选一式的抉择仍然主导着人们的讨论:应该将效度、信度和客观性这些传统标准同样地应用于质性研究呢——该怎么做——还是应该发展出新的适合质性研究方法的标准?这些新的标准都有哪些?如何使用它们来确定质性研究的质量?总体来说,人们对使用标准的做法仍有根本性的怀疑,特别是在美国。回答什么是评价质性研究质量的合适标准的问题既是一个质性研究内部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质性研究方法在教学、科研资金申请和社会科学政策影响等领域所具有的市场能力和赢得认可能力的问题(参见第28章和第29章)。

处在流派形成与实用主义之间的质性研究

在质性研究中,方法论的纯粹主义和研究实用主义构成了另外一对矛盾。进一步地细化纯粹的方法学说,如诠释学方法,会增加时间、人力及其他资源的投入。这带来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应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委托性研究课题或者以政策咨询为目的的课题,让研究者可以用这种方法处理足够多的案例,从而让研究结果具有说服力(参见 Gaskell/Bauer 2000)。这一问题引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质性资料的收集、转录和分析方面(Lüders 2000b),以及在质性研究设计方面(见第12章)可以采用哪些具有实用性但在方法上又是可接受的简化策略。

处在澄清和美化之间的质性研究

如果仔细阅读 Denzin/Lincoln(2000 和 2005)新出版的《质性研究手册》(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的话,人们难免会在不同的地方获得以下的印象,即:这里的讨论更多地走向美化质性研究的方向,而不是说旨在进一步说明和澄清质性研究的方法程序。例如 Denzin/Lincoln(2000,第1052页)结合人们长期以来讨论的各种危机(展示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实践危机)认为质性研究的未来在于一种"神圣的认识论"(sacred epistemology)。这种趋势对质性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奠定,对研究实践以及质性研究对外的展示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于观察。这些讨论至今在德语区目前的研究文献中尚没有产生多少反响。

国际化

由于人们很少努力用英文发表那些在德语区的讨论和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程序,因此,德语区的质性研究在英语区的讨论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德语区质性研究的国际化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努力:一方面,在德语区的讨论中,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当前的英语——或法语(例如 Kaufmann 1999)——文献中的讨论;另一方面,应该更多地在英文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德语国家本土发展的方法(参见 Knoblauch, Flick/Maeder 2005)。

指　示

质性研究另外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指示问题(Indikationsfrage)。这类似于回答在医学和心理治疗领域如何检查某种治疗方法对特定问题和人群的合适性这一问题。如果将指示问题转用于质性研究,那相关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时候适合采用什么质性方法——适合什么研究主题、问题、研究群体和领域等?根据指示,什么时候更适合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或者两者的结合?这些问题引出了依据什么标准来回答这些问题的问题。找出这类标准有助于现实地评估各种质性研究方法和整个质性研究的可用性和能力(参见第29章)。这可以避免人们倒退至质性研究内部不同阵营之间以及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根本性的论战(参见第3章)。

提示框31.2　趋势与发展

- 视觉资料和电子资料
- 质性网络研究
- 电脑的使用
- 杂交
- 多元结合
- 与定量研究结合
- 质性研究的写作
- 质量标准和质性研究的质量
- 处在流派形成和实用主义之间的质性研究
- 处在澄清和美化之间的质性研究
- 国际化
- 指示

质性研究的学与教

鉴于以上的发展和趋势,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概述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汇集在质性研究这个标题之下的各种备择性方案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因此,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概述就面临着一个危险,即对原本就不统一而且也不会变统一的客体作出统一的表述。有些人所追求的规范化和法则化可能实现不了促成一体化的目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促成这样一个统一体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在这里,更有意义的做法是理清各种备择性方案在理论、方法和一般目标方面的区别。

第二,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概述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将重点放在方法上不但

不能让人们认识到质性研究并不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使用方法，反而会妨碍人们认识到这一点。这里需要说明的不仅是，在质性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方法作为技术和艺术的张力，而且还需要说明的是，质性研究包含着一种特定的研究态度。这一态度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坚持研究对象优先于研究方法，以研究过程为导向，在选择方法以及实施方法时保证其与整个研究过程的协调性，以及研究者在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应持有的态度。除了好奇心、开放性以及对待方法的灵活性外，这一态度还包括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方法的合适性、研究者自己的感知和盲点进行高度的反思。这带来两个影响。

质性研究的魅力常常在于它能发展出原创性的或令人惊奇的问题、用新颖的方法进入不同寻常的研究场域、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方法、得出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以及通过在实证基础上获得新的概念或者关联性来丰富理论性知识储备。优秀的个人研究风格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参见 Wolff(2000c)介绍 Clifford Geertz 的文章，Bergmann(2000c)介绍 Harold Garfinkel 和 Harvey Sacks 的文章，或者 Hildenbrand(2000)介绍 Anselm Strauss 的文章，还有那些对经典的质性研究的描述文章，例如 Fischer-Rosenthal(1995)对 Thomas/Znaniecki(1918—1920)的研究的描述，或者 Wolff(1995)对 Bateson/Mead(1942)的研究的介绍。作为同一枚硬币的背面，正因为这种优秀的实证研究的质量不能用可以区分良莠的标准和边界值来表述，因此，要传授这种能力仍然是质性研究教学和培训的一项困难的任务。

对于质性研究教学法而言，这里提出的要求是，既要传授特定的技术(如何表述叙事访谈中的导入问题？什么是轴向式编码？)，同时也要传授必要的研究态度。人们无法通过有关质性研究历史和方法的讲授课让学生获得好奇心和灵活性。恰当运用质性方法的能力通常来说源自研究者在该研究实地中的经验、问题、失败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在所有的研究那里一样，人们在这里应该将纯粹的方法层面与应用层面区分开来。具体的研究实地中的阻力和必要性常常令研究者不能以最理想的方式应用特定的访谈技术。不过，这些问题在质性方法这里变得更加突出，因为大多数方法在运用时的回旋余地和对灵活性的要求都很大，以至于许多决定只能在具体的运用情境中才能做出。在运用成功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在提纲访谈中正好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到受访者的主观视角。在运用失败的情况下，它会令研究者在使用时遇到导向的困难，结果就可能出现 Hopf(1978)所告诫的“提纲官僚主义”。

如果能前后一致地成功运用的话，叙事访谈就能够让受访者不受干扰地阐述其生活史，访谈者也可以因此得到按时间顺序而展开的叙事和陈述。如果运用失败的话，访谈情况就会变成一幅漫画，Kreissl/Wolfersdorff-Ehlert(1985，第103页)将其描述为“自相矛盾的关切”(paradoxes Anliegen)：“我不想从你那儿要任何东西，请向我讲述一下你的历史。”在运用成功的情况下，理论编码和客观注释学等方法程序能够让研究者发现一个问题或者案例的结构。在运用失败的情况下，这些方法程序会将研究者置于一种被 Südmersen(1983)称为“帮帮忙，我

要窒息在文本中了”的情境。

人们不能只是以理论的方式传授对质性研究的理解。除此之外，在教学中，学习者必须要在使用方法中和在与活生生的对方的接触中获得实践经验。对访谈和诠释程序的传授和学习必须要与实际应用和共同分析应用的经验和问题相结合。

出发点在这里一方面可以详细地讨论研究实例，并结合着分析可以体现它们所用方法特征的研究风格。另一方面，通过对现有的资料进行共同分析，既可以学习分析资料的方法，也可以了解具体的资料和实例在生成方面的特点。不过，让学习者认识质性研究特点的理想方式是，在研讨课情景下让学习者发展出自己的研究工具（比如访谈提纲），实施自己的资料收集（比如访谈），然后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最好是以小组的形式）。教学研究型项目可以让学习者在较长时间内专注于一个问题并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具体开展研究。这种教学研究型项目无疑提供了一种最适合的框架，让学习者去积累实际经验。只有这种实际经验才能让人理解质性方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相关例子请参见 Flick/Bauer 2000）。

质性研究的怀疑者和反对者始终认为质性研究无法正常工作。除了这一根本性的确信之外，人们很少谈到质性研究的失败。阅读在此期间出版的各种有关质性研究的概论和手册时，人们有时会产生这种印象，即质性方法建立在经过验证的知识的基础之上，只要正确运用这一知识就行了。实际上，恰恰是分析质性研究策略的失败（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有 Borman et al. 1986；或者有关进入研究实地方面的失败的例子，如 Lau/Wolff 1983；Kroner/Wolff 1986；Wolff 2000b）才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这些策略是如何在与具体的场域、机构或人群接触中运行的。

质性研究的未来：是艺术，还是方法？

硬币的另一面是过分强调艺术在质性研究中的分量。不同的方法都明确宣称它们是艺术（例如客观注释学）。在其他一些方法那里，人们有时候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即发展出方法的那些人对这些方法的应用是评估这些方法潜力的最好标准。从他们所能提供的有关过程和程序的理解和见解来看，其他人对理论和方法的陈述和应用要远远落后于发展出这些理论和方法的人。另外，Denzin/Lincoln（2000a）出版的手册在许多地方都让人产生质性研究是一门艺术的印象：其中有一整个部分使用的标题是“诠释、评估和展示的艺术与实践”，这里对如何设计和实施诠释或评估只提供了很少的具体性建议。此外，Denzin/Lincoln（2000b）在引言中对质性研究现状的描述也让人产生以下的印象，即鉴于已经讨论过的展示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方法及其运用的问题已经明显地退居幕后，并被当作过时的问题归入了已经成为过去的“现代主义阶段”。这可能与他们整个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以民族志为导向有关。在 Hammersley/Atkinson（1983）和

Lüders(2000a)看来,在民族志研究领域,各种方法已经受到一种实用主义—多元主义态度的整合或者消失在这一态度之后。正是在这一领域,质性研究写作及与之相关的危机和问题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既不能推动方法的发展,也不能促进已开发出来的方法的运用,而且也未必会带来更多和更好的研究。至于 Denzin/Lincoln(2000,第 1052 页)的期望,即质性研究的未来在于“神圣的认识论”,最终是否会引领人们走出艺术和方法之间的张力,或者是否会将人们带回到另外一种以往时代的张力(科学或宗教),还有待于观察。

或许我们把质性研究理解为艺术和方法的结合更为恰当。人们所期待的进步更有可能源自对方法发展的结合和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和问题上成功地并反思性地应用这些方法。Clifford Geertz(1996,第 23-24 页)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关于“碎片中的世界”的思考中清楚地表明,对这种形式的研究的需求正在继续增加:

> 那些稳定的分类和人们所熟悉的划分的瓦解令政治世界变得如此的多面和深不可测。同样的瓦解也令人们对文化的诠释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如何看待事物,如何对此做出反应,如何想象、评价和处理事物,越来越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文化分析在今天是一项比以前更加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以前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认为知道,什么和什么协调以及什么和什么不协调(……)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可以处理特殊性、个性、古怪性、不连贯性、反差和奇特性,对 Charles Taylor 所说的“深度多样性”(deep diversity)——一种归属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多元性——做出回应。我们缺乏能够从这种多元性中获得联合感的途径。这种联合感既不是广泛的也不是清一色相同的,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仍然是真实性的(……)。我们除了以损失普遍适用性、肯定性或者智力上平衡为代价去研究具体的案例之外,没有别的选择。(Geertz 1996,第 23-24 页)

要　点

- 质性研究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分化发展,不仅出现了更多的方法,而且也形成了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流派。
- 我们可以指出质性研究在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将会让质性研究领域发生持续性的改变。
- 质性研究最好是通过实际的研究经验来进行教和学。
- 总地来看,质性研究在不同的地方仍处于艺术和方法的岔路口。

练习 31.1

1. 请您找出有关质性研究的一份德文杂志和一份国际期刊(例如 zbbs 和 Qualitative Research),查阅它们最近两年出版的期刊,并且比较一下,看看能否在概述文章中发现相似的或者不同的趋势。
2. 哪些质性研究的趋势和发展是您所认识到和预计会出现的,但是在本章中(尚且)没有被提到?

拓展阅读

Flick, U./Bauer, M. (2000). Qualitative Forschung lehr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600-615.

Knoblauch, H., Flick, U./Maeder, Ch. (Hrsg.)(2005).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Europa: Eine Bestandsaufnahme.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6, (3)-September 2005 (http://www. Qual-, itative-research. net/fqs/fqs-d/inhalt3-05-d. htm).

Lincoln, Y. S./Benzin, N. K. (2005). Epilogue: The Eigth and Ninth Moments—Qualitative Research in/an the Fractured Future, In: N. Denzin/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titative Research (3.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hli: Sage, S. 1115-1126.

Lüders, C. (2000b). Herausforderung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84-401.

参考文献

Adler, P. A. & Adler, P.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Adler, P. A. & Adler, P. (1998).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79-110.

Agar, M. H. (1980),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Agger, B.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131.

Allmark, P. (2002). The Ethics of Research with Children, *Nurse Researcher*, 10: 7-9.

Altheide, D. L. & Johnson, J. M. (1998).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293-312.

Alznauer, B., Lang, G. & Flick, U. (2000). Das Bild der Pflege im Fernsehen-Ergebnisse einer qualitativen Filmanalyse der Krankenhausserie《Für alle Fälle Stefanie》. *psychomed*, 12: 184-189.

Amann, K. & Hirschauer, S. (1997). Die Befremdung der eigenen Kultur. Ein Programm. In: S. Hirschauer & K. Amann (Hrsg.). Die Befremdung der eigenen Kultur. Zur ethnographischen Herausforderung soziologischer Empirie. Frankfurt: Suhrkamp, S. 7-52.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 (Hrsg.) (1973). Alltagswissen, Interakt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Bd. 1-2). Reinbek: Rowohlt.

Aster, R., Merkens, H. & Repp, M. (Hrsg.) (1989).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Werkstattberichte und methodologische Reflexionen. Frankfurt: Campus.

Atkinson, P., Coffey, A., Delamont, S., Lofland, J. & Lofland L. (Hrsg.) (2001).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Atkinson, P. & Hammersley, M. (1998). Ethnograph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10-136.

Atteslander, P. (1996). Auf dem Wege zur lokalen Kultur. Einführende Gedanken. In: W. F. Whyte. Die Street Corner Society. Die Sozialstruktur eines Italienerviertels. Berlin, N. Y.: de Gruyter. S. IX-XIV.

Bampton, R. & Cowton, C. J. (2002, May). The E-Interview.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3 (2), www. qualitative-research. net/fqs/fqs-eng. htm (Zugriff: 22. 02. 2005).

Banks, M. (2007). Using Visual Data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ook 5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Barbour, R. (2007). Doing Focus Groups (Book 4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Barthes, R. (1981).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arton, A. H. & Lazarsfeld, P. F. (1979). Einige Funktionen von qualitativer Analyse in der Sozialforschung. In: C. Hopf & E. Weingarten (Hrsg.).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S. 41-89.

Bateson, G. & Mead, M.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Bd. 2).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Bauer, M. & Gaskell, G. (2000). Towards Public Accountability: beyond Sampl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M. Bauer & G. Gaskell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a Handbook. London: Sage, S. 336-350.

Baum, F. (1995). Researching Public Health: Behind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ical Debat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0: 459-468.

Baym, N. K. (1995).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S. Jones (Hrsg.) Cybersociety-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London: Sage, S. 138-163.

Beck, U.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Beck, U. & Bonß, W. (Hrsg.) (1989). Weder Sozialtechnologie noch Aufklärung? Analysen zur Verwendun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Wissens. Frankfurt: Suhrkamp.

Becker, H. S. (1986). Doing Things Together. Selected Paper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cket, H. S. (1993). Schreiben und Denken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Ein Erlebnisbericht. *Leviathan*, 21: 69-88.

Becker, H. S. (1994). Die Kunst des professionellen Schreibens. Ein Leitfaden für die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Campus.

Becker, H. S. (1996). The Epistem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R. Jessor, A. Colby & R. A. Shweder (Hrsg.).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 53-72.

Becker, H. & Geer, B. S. (1979).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die Analyse qualitativer Forschungsergebnisse. In: C. Hopf & E. Weingarten (Hrsg.).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S. 139-165.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Schmidt, R. & Bilden, Helga (1995). Impulse für die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aus der Frauen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23-30.

Berg, E. & Fuchs, M. (Hrsg.) (1993).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Frankfurt: Suhrkamp.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9). Die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 der Wirklichkeit. Eine Theorie der Wissenssoziologie. Frankfurt a. M.: Fischer.

Bergmann, J. R. (1980). Interaktion und Exploration-Eine konversationsanalytische Studie zur sozialen Organisation der Eröffnungsphase von psychiatrischen Aufnahmegesprächen. Konstanz: Dissertation.

Bergmann, J. R. (1981). Ethnomethodologische Konversationsanalyse. In: P. Schröder & H. Steger (Hrsg.). Dialogforschung. Jahrbuch 1980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Sprache. Düsseldorf: Schwann, S. 9-51.

Bergmann, J. R. (1985). Flüchtigkeit und methodische Fixierung sozialer Wirklichkeit. Aufzeichnungen als Daten der interpretativen Soziologie. In: W. Bonß & H. Hartmann (Hrsg.).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Zur Realitä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Göttingen: Schwartz, S. 299-320.

Bergmann, J. R. (1987). Klatsch. Zur Sozialform der diskreten Indiskretion. New York, Berlin: de Gruyter.

Bergmann, J. R. (2000a). Ethnomethodolog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18-136.

Bergmann, J. R. (2000b). Konversations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24-538.

Bergmann, J. R. (2000c). Harold Garfinkel und Harvey Sack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1-63.

Bergmann, J. R. (2006). Mediale Repräsentation i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In: R. Ayaß & J. Bergmann (Hrsg.). Qualitative Methoden in der Medienforschung. Reinbek: Rowohlt, S. 489-506.

Bergmann, J. R. & Meier, C. (2000). Elektronische Prozeßdaten und ihre 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29-437.

Bergold, J. B. & Flick, U. (Hrsg.) (1987). Ein-Sichten. Zugänge zur Sicht des Subjekts mittel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Tübingen: DGVT-Verlag.

Billig, M. (1987). Arguing and Thinking: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llmann-Mahecha, E. (1990). Egozentrismus und Perspektivenwechsel. Göttingen: Hogrefe.

Blumer, H. (1938). Social Psychology. In: E. Schmidt (Hrsg.).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S. 144-198.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lumer, H. (1973). Der methodologische Standort des Symbolischen Interaktionismus. In: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 (Hrsg.). Alltagswissen, Interakt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Reinbek: Rowohlt, S. 80-146.

Bogner, A., Littig, B. & Menz, W. (Hrsg.) (2002). Das Experteninterview-Theorie, Methode, Anwendung. Opladen: Leske & Budrich.

Bogner, A. & Menz, W. (2002). Das theoriegenerierende Experteninterview-Erkenntnisinteresse, Wissensform, Interaktion. In: A. Bogner, B. Littig & W. Menz (Hrsg.) (2002). Das Experteninterview-Theorie, Methode, Anwendung.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 33-70.

Böhm, A. (2000). Theoretisches Codier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75-485.

Böhm, A., Legewie, H. & Muhr, T. (1992). Kursus Textinterpretation: Grounded Theory. Berlin: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icht aus dem IfP Atlas 92-3, Ms.

Böhm, A., Muhr, T. & Mengel A. (Hrsg.) (1994). Texte verstehen: Konzepte, Methoden, Werkzeuge.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Bohnsack, R. (1999). Rekonstruk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ung in Methodologe und Praxi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3. Aufl.). Opladen: Leske & Budrich.

Bohnsack, R. (2000). Gruppendiskussio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69-384.

Bonß, W. (1982). Die Einübung des Tatsachenblicks. Zur Struktur und Veränderung 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Suhrkamp.

Bonß, W. (1995). Soziolog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36-39.

Bonß, W. & Hartmann, H. (1985). Konstruierte Gesellschaft, rationale Deutung-Zum Wirklichkeitscharakter soziologischer Diskurse. In: W. Bonß & H. Hartmann (Hrsg.).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Zur Realitä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Göttingen: Schwartz, S. 9-48.

Borman, K. M., LeCompte, M. & Goetz, J. P. (1986).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d why it doesn't work.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0: 42-57.

Bourdieu, P. (1996). Understanding.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3 (2): 17-37.

Bruce, G. (1992). Comments. In: J. Svartvik (Hrsg.). Directions in Corpus 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Nobel Symposium 82, Stockholm, August 4-8, 1991. Berlin: de Gruyter, S. 145-147.

Bruner, E. M. (1993). Introduction: The Ethnographic Self and the Personal Self. In: P. Benson (Hrsg.).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 1-26.

Bruner, J.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1-32.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J. (1991).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18: 1-21.

Bruner, J. & Feldman, C. (1996). Group Narrative as a Cultural Context of Autobiography. In: D. Rubin (Hrsg.). Remembering our Past-Studie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291-317.

Bryman, A. (1988).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Unwin Hyman.

Bryman, A. (1992).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ir integration. In J. Brannen (Hrsg.). Mixing Method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ldershot: Avebury. S. 57-80.

Bryman, A. (2004).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2. Auf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de, H. (1984). Rekonstruktion von Lebenskonstruktionen-eine Antwort auf die Frage, was die Biographieforschung bringt. In: M. Kohli & G. Robert (Hrsg.).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Neuere Beiträge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Stuttgart: Metzler, S. 7-28.

Bude, H. (1985). Der Sozialforscher als Narrationsanimateur.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 einer erzähltheoretischen Fundierung der interpretativen Sozialforschu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7: 327-336.

Bude, H. (1989). Der Essay als Form der Darstellun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s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1: 526-539.

Bude, H. (1993). Die soziologische Erzählung. In: T. Jung & S. Müller-Doohm (Hrsg.). 《Wirklichkeit》 im Deutungsprozeß. Verstehen und Methoden in den Kultur-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Suhrkamp, S. 409-429.

Bude, H. (1994). Das Latente und das Manifeste. Aporien einer 《Hermeneutik des Verdachts》. In: D. Garz (Hrsg.). Die Welt als Text. Frankfurt: Suhrkamp, S. 114-124.

Bude, H. (1995a). Die Rekonstruktion kultureller Sinnsystem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101-113.

Bude, H. (1995b). Verallgemeinerung und Darstellung. Workshop des Projektes QIb im Berliner Forschungsverbund Public Health (Mimeo).

Bude, H. (2000). Qualitative Generations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87-194.

Bühl, W. (Hrsg.) (1972). Verstehende Soziologie.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anstalt.

Bühler-Niederberger, D. (1985). Analytische Induktion als Verfahren qualitativer Methodologi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4: 475-485.

Charmaz, K. (2003). Grounded Theory. In: J. A. Smith (Hrsg.). Qualitative Psychology-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S. 81-110.

Cicourel, A. V.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dt.: Methode und Messung in der Sozi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Cicourel, A. V. (1981). Not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Micro-and Macrolevels of Analysis. In: K. Knorr-Cetina & A. V. Cicourel (Hrsg.).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s an Integration 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Paul, S. 51-80.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Hrsg.).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 1-26.

Clifford, J. & Marcus, G. E. (Hrsg.)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ffey, A., Holbrook, B. & Atkinson, P. (1996).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echnologies a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I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socresonline/I/I/4html).

Collier, J. (1957). Photography in Anthropology. A Report on Two Experi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9: 843-859.

Corbin, J. & Strauss, A. (1990).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 3-21.

Corbin, J. & Strauss, A. (2004). Weiterleben Lernen. Verlauf und Bewältigung chronischer Krankheit. Bern: Huber.

Coulter, J. (1983). Rethinking Cognitive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Creswell, J. W. (2003). Research Design-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D'Andrade, R. G. (1987). A Folk Model of the Mind. In: D. Holland & N. Quinn (Hrsg.).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112-149.

Dabbs, J. M. (1982). Making Things Visible. In: J. Van Maanen, J. M. Dabbs & R. Faulkner (Hrsg.). Variet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31-64.

Deeke, A. (1995). Experteninterviews-ein methodologisches und forschungspraktisches Problem. Einleitende Bemerkungen und Fragen zum Workshop. In: C. Brinkmann, A. Deeke & B. Völkel (Hrsg.). Experteninterviews in der Arbeitsmarktforschung. Diskussionsbeiträge zu methodischen Fragen und praktischen Erfahrungen. Beiträge zu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 191. Nürnberg: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S. 7-22.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76). Rhizome: Introductio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dt. Berlin: Merve 1977).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2. Aufl.). Chicago: Aldine.

Denzin, N. K. (1988). Interpretive Biograph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Denzin, N. K. (1989a).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Denzin, N. K. (1989b). The Research Act (3. Aufl.).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Denzin, N. K. (1989c). Reading Tender Mercies: Two Interpretat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0: 1-19.

Denzin, N. K. (Hrsg.). (1993).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Bd. 15). Greenwich: JAI Press.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Denzin, N. K. (1999). Cybertalk and the Method of Instances. In: S. Jones (Hrsg.). Doing Internet Research-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S. 107-126.

Denzin, N. K. (2000a).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897-922.

Denzin, N. K. (2000b). Reading Film-Filme und Videos al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Erfahrungsmaterial.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16-429.

Denzin, N. K. (2000c). Symbolischer Interaktionismu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36-150.

Denzin, N. & Lincoln, Y. S. (Hrsg.) (2000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Denzin, N. & Lincoln, Y. S. (2000b).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29.

Denzin, N. & Lincoln, Y. S. (Hrsg.) (2005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Denzin, N. & Lincoln, Y. S. (2005b).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Research (3.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32.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1). Research Governance Framework für Health und Social Care.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Derrida, J. (1976). 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 Frankfurt: Suhrkamp (Original: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Devereux, G. (1967). Angst und Methode in den Verhaltenswissenschaften. München: Hanser.

Dittmar, N. (2002). Transkription-Ein Leitfaden für Forscher und Laien (2. Aufl.). Wiesbaden: VS-Verlag.

Dixon, R. A. & Gould, O. N. (1996). Adults Telling and Retelling Stories collaboratively. In: P. B. Baltes & U. Staudinger (Hrsg.). Interactive Minds-Lifespan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221-241.

Dörner, D. (1983). Empirische Psychologie und Alltagsrelevanz. In: G. Jüttemann (Hrsg.). Psychologie in der Veränderung. Weinheim: Beltz, S. 13-29.

Douglas, J. D. (1976). Investigative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Dreher, M. & Dreher, E. (1994). Gruppendiskussion. In: G. L. Huber & H. Mandl (Hrsg.). Verbale Daten (2. Aufl.). Weinheim: Beltz, S. 141-164.

Drew, P. (1995). Conversation Analysis. In: J. A. Smith, R. Harré & L. v. Langenhove (Hrsg.).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64-79.

Edwards, D. & Potter, J. (1992). Discursive Psycholog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Ehrenspeck, Y. & Schäffer, B. (Hrsg.) (2003). Film- und Fotoanalyse i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Ein Hemdbuch. Opladen: Leske & Budrich.

Elliot, R., Fischer, C. T. & Rennie, D. L. (1999). Evolving Guidelines for Pub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ies in Psychology and Related Field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8: 215-229.

Emerson, R., Fretz, R. & Shaw, L.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Engel, U. & Wuggenig, U. (1995). Statistische Auswertungsverfahren nominalskalierter Da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237-242.

Englisch, F. (1991). Bildanalyse in struktural-hermeneutischer Einstellung-Methodische Überlegungen und Analysebeispiele. In: D. Garz & K. Kraimer (Hrsg.). Qualitativ-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133-176.

Erdheim, M. (1984). Die 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 von Unbewußtheit. Frankfurt: Suhrkamp.

《Ethik-Kodex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und des Berufsverbandes Deutscher Soziologen.》*DGS-Informationen*, 1/93:13-19.

Faltermaier, T. (1994). Gesundheitsbewußtsein und Gesundheitshandeln. Über den Umgang mit Gesundheit im Alltag. Weinheim: Beltz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Fielding, N. G. & Fielding, J. L. (1986). Linking Data. Beverly Hills: Sage.

Fielding, N. G. & Lee, R. M. (Hrsg.) (1991).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ielding, N. & 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ischer-Rosenthal, W. (1995). William I. Thomas & Florian Znaniecki:《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115-118.

Fleck, L. (1935).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Frankfurt: Suhrkamp.

Flick, U. (1987). Methodenangemessene Gütekriterien in der qualitativ-interpretativen Forschung. In: J. B. Bergold & U. Flick (Hrsg.). Ein-Sichten. Zugänge zur Sicht des Subjekts mittel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Tübingen: DGVT-Verlag, S. 246-263.

Flick, U. (1989). Vertrauen, Verwalten, Einweisen. Subjektive Vertrauenstheorien in sozialpsychiatrischer Beratung. Opl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Flick, U. (1991). Vom Ersticken in Texten zum Absturz ins Programm? -Verwendung von Computern in der Qualitativen Forschung. In: W. Glatzer (Hrsg.).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25. Dt. Soziologentag, Beiträge der Sektions- und Ad-hoc-Grupp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800-803.

Flick, U. (1992). Triangulation Revisited-Strategy of or Alternative to Validation of Qualitative Data.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2: 175-197.

Flick, U. (Hrsg.) (1995a). Psychologie des Sozialen. Repräsentationen in Wissen und Sprache. Reinbek: Rowohlt.

Flick, U. (1995b). Stationen des qualitativen Forschungsprozesse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148-175.

Flick, U. (1996). Psychologie des technisierten Alltag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Flick, U. (Hrsg.) (1998). Wann fühlen wir uns gesund? -Subjektive Vorstellungen von 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Weinheim: Juventa.

Flick, U. (2000a). Episodic Interviewing. In: M. Bauer & G. Gaskell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a Handbook. London: Sage, S. 75-92.

Flick, U. (2000b). Qualitative Inquiries into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5: 309-318.

Flick, U. (2000c). Triangulation in der qualitativen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09-319.

Flick, U. (2000d). Design und Prozes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52-265.

Flick, U. (2000e). Konstruktivismu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50-164.

Flick, U. (Hrsg.) (2006). Qualitative Evaluationsforschung-Konzepte, Methoden, Anwendungen. Reinbek: Rowohlt.

Flick, U. (Hrsg.) (2007a).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8 Bänd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lick, U. (2007b).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Book 1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lick, U. (2007c). Managing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ook 8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Flick, U. (2007d). Triangulation-Eine Einführung (2. Aufl.). Wiesbaden: VS-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Flick, U. & Bauer, M. (2000). Qualitative Forschung lehr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600-615.

Flick, U., Hoose, B. & Sitta, P. (1998). 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gleich Saúde & Doenca? Gesundheitsvorstellungen bei Frauen in Deutschland und Portugal. In: Flick, U. (Hrsg). Wann fühlen wir uns gesund? -Subjektive Vorstellungen von 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Weinheim: Juventa, S. 141-159.

Flick, U., Kardorff, E. v., Keupp, H., Rosenstiel, L. v. & Wolff, S. (Hrsg.) (1995).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Flick, U., Kardorff, E. v. & Steinke, I. (Hrsg.) (2000).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Flick, U. & Niewiarra, S. (1994). Alltag, Lebensweisen und Gesundheit. Berlin: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Bericht 94-5 aus dem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e, Ms.

Flick U. & Röhnsch G. (2006a). 《Ich vertrau' der anderen Person eigentlich...》-Armut und Obdachlosigkeit als Kontexte sexuellen Risiko-und Schutzverhaltens von Jugendlichen. *Zeitschrift für die Soziologie der Erziehung und Sozialisation*, 26 (2): 171-187.

Flick U. & Röhnsch G. (2006b). 《... wenn man sich nich' helfen lassen will ...》-Hilfesuchverhalten obdachloser Jugendliche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pädagogik*, 4 (4): 338-359.

Flick, U., Walter, U., Fischer, C., Neuber, A. & Schwartz, F. W. (2004). Gesundheit als Leitidee? —Gesundheitsvorstellungen von Ärzten und Pflegekräften. Bern: Huber.

Fontana, A. & Frey, J. H. (2000). The Interview: From Structured Questions to Negotiated Text.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645-672.

Foucault, M. (1976).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Freud, S. (1912). Ratschläge für den Arzt bei der psychoanalytischen Behandlung. Gesammelte Werke (Bd. 8). Frankfurt: Fischer, S. 376-387.

Friedrichs, J. (1973). Methoden 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Reinbek: Rowohlt. Friedrichs, J. & Lüdtke, H. (1973).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Weinheim: Beltz.

Fuchs, W. (1984). Biographische Forschung. Eine Einführung in Praxis und Method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Fuchs, M. & Berg, E. (1993). Phänomenologie der Differenz, Reflexionsstufen ethnographischer Repräsentation. In: E. Berg & M. Fuchs (Hrsg.).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Frankfurt: Suhrkamp, S. 11-108.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Garfinkel, H. (1986). E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 of Wor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arfinkel, H. & Sacks, H. (1970). On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In: J. McKinney & E. Tiryyakian (Hrsg.).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Appleton.

Garz, D. (Hrsg.) (1994). Die Welt als Text. Frankfurt: Suhrkamp.

Garz, D. & Kraimer, K. (1994). Die Welt als Text. Zum Projekt einer hermeneutisch-rekonstruktiven Sozialwissenschaft. In: D. Garz (Hrsg.). Die Welt als Text. Frankfurt: Suhrkamp, S. 7-21.

Gaskell G. & Bauer, M. (2000). Towards Public Accountability: Beyond Sampl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M. Bauer & G. Gaskell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A Handboo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336-350.

Gebauer, G. & Wulf, C. (1992). Mimesis: Kultur, Kunst, Gesellschaft. Reinbek: Rowohlt.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3a).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3b). Dichte Beschreibung. Beiträge zum Verstehen kultureller Systeme. Frankfurt: Suhrkamp.

Geertz, C. (1983c). 《Deep Play》—Bemerkungen zum

balinesischen Hahnenkampf. In: Dichte Beschreibung-Beiträge zum Verstehen kultureller Systeme. Frankfurt: Suhrkamp, S. 202-260.

Geertz, C. (1988).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t. Die künstlichen Wilden-Der Anthropologe als Schriftsteller. München: Hanser 1990).

Geertz, C. (1996). Welt in Stücken-Kultur und Politik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Wien: Passagen Verlag.

Gerdes, K. (Hrsg.) (1979). Explorative Sozialforschung. Einführende Beiträge aus《Natural Sociology》und Feldforschung in den USA. Stuttgart: Enke.

Gergen, 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266-275.

Gergen, K. J. (1994). 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 Sounding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rgen, K. J. (1999).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hli: Sage.

Gerhardt, U. (1985). Erzähldaten und Hypothesenkonstruktion. Überlegungen zum Gültigkeitsproblem in der biographischen Sozialforschu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7: 230-256.

Gerhardt, U. (1986a). Patientenkarrieren. Eine medizinsoziologische Studie. Frankfurt: Suhrkamp.

Gerhardt, U. (1986b). Verstehende Strukturanalyse. Die Konstruktion von Idealtypen bei der Auswertung qualitativer Forschungsmaterialien. In: H. G. Soeffner (Hrsg.).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e Typik. Frankfurt: Campus, S. 31-83.

Gibbs, G. (2007).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Book 6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Gildemeister, R. (2000). Geschlechterforschung (Gender Studie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13-224.

Ginzburg, C. (1990). Veranschaulichung und Zitat-Wahrheit in der Geschichte. In: F. Braudel, Z. D. Natalie, L. Febvre, C. Ginzburg, J. LeGoff, R. Koselleck & A. Momigiliano. Der Historiker als Menschenfresser. Über den Beruf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 Berlin: Wagenbach.

Girtler, R. (1984). Methode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Wien: Böhlau.

Girtler, R. (1995). Forschung in Subkultur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385-390.

Glaser, B. G. (1969).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G. J. McCall & J. L. Simmons (Hrsg.).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eading: Addison-Wesley.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Glaser, B. G.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 Mill Valley, Calif.: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5a/1974).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dt. Interaktion mit Sterbenden. Göttingen: Vandenhoek & Rupprecht 1974).

Glaser, B. & Strauss, A. (1965b/1979). Die Entdeckung gegenstandsbegründeter Theorie: Eine Grundstrategie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C. Hopf & E. Weingarten (Hrsg.).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S. 91-112.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1998).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dt.: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Bern: Huber 1998).

Glasersfeld, E. v. (1992). Aspekte des Konstruktivismus: Vico, Berkeley, Piaget. In: G. Rusch & S. J. Schmidt (Hrsg.). Konstruktivismus: Geschichte und Anwendung. Frankfurt a. M.: Suhrkamp. S. 20-33.

Glasersfeld, E. v. (1996). Radikaler Konstruktivismus: Ideen, Ergebnisse, Problem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Goffman, E. (1972). Asyle. Über die soziale Situation psychiatrischer Patienten und anderer Insass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Gold, R. L. (1958). Roles in Sociological Field Observations. *Social Forces*, 36:217-23.

Goodman, N. (1984). Weisen der Welterzeugung. Frankfurt: Suhrkamp.

Grathoff, R. (1978). Alltag und Lebenswelt als Gegenstand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Sozialtheorie. In: K. Hammerich & M. Klein (Hrs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20: Materialien zur Soziologie des Alltags: 67-85.

Groeben, N., Wahl, D., Schlee, J. & Scheele, B. (1988). Das Forschungsprogramm Subjektive Theorien. Tübingen: Francke.

Gross, P. (1981). Ist die Sozialwissenschaft eine Textwissenschaft? In: P. Winkler (Hrsg.). Methoden der Analyse von Face-to-Face-Situationen. Stuttgart: Metzler, S. 143-168.

Guba, E. G. (Hrsg.) (1990). The Paradigm Dialog. Newbury Park: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8).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heories and Issu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95-220.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hli: Sage.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Hrsg.) (2001).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hli: Sage.

Habermas, J. (1967).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Mohr.

Habermas, J. (1985).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Suhrkarmp.

Hall, E. T. (1986). Foreword. In: J. Collier Jr. & M. Collier, 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S. xii-xvii.

Hammersley, M. (1990). Read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A Critical Guide. London: Longman.

Hammersley, M.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Hammersley, M. (1995).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1983). Ethnography-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Tavistock.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1995). Ethnography-Principles in Practice (2. Auf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Harper, D. (1998).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Image: Visual Methods at the Crossroad.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30-149.

Harper, D. (2000a). Reimagining Visual Methods: Galileo to Neuromancer.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717-732.

Harper, D. (2000b). Fotografien al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a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02-416.

Harré, R. (1995). Zur Epistemologie sozialer Repräsentationen. In: U. Flick (Hrsg.). Psychologie des Sozialen. Repräsentationen in Wissen und Sprache. Reinbek: Rowohlt, S. 165-174.

Hart, C. (1998). Doing a Literature Review. London: Sage.

Hart, C. (2001). Doing a Literature Search. London: Sage.

Haupert, B. (1991). Vom narrativen Interview zur biographischen Typenbildung. In: D. Garz & K. Kraimer (Hrsg.). Qualitativ-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213-254.

Haupert, B. (1994). Objektiv-hermeneutische Fotoanalyse am Beispiel von Soldatenfotos aus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D. Garz (Hrsg.). Die Welt als Text. Frankfurt: Suhrkamp, S. 281-314.

Heath, C. & Hindmarsh, J. (2002). Analysing Interaction: Video, Ethnography and Situated Conduct. In: T. May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London: Sage, S. 99-120.

Heath, C. & Luff, P. (2006). Video Analysis and Organisational Practice. In: H. Knoblauch, B. Schnettler, J. Raab & H.-G. Soeffner (Hrsg.).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Frankfurt etc.: Peter Lang, S. 35-50.

Heinze, T. (1987).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Helsper, W., Herwarz-Emden, L. & Terhart, E. (2001). Qualität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 47: 251-269.

Heritage, J. (1985).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Sociolinguistics*, 15: 1-17.

Herkommer, S. (1979). Gesellschaftsbewußtsein und Gewerkschaften. Hamburg: VSA.

Hermanns, H. (1984). Ingenieurleben-Der Berufsverlauf von Ingenieuren in biographischer Perspektive. In: M. Kohli & G. Robert (Hrsg.).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Neuere Beiträge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Stuttgart: Metzler, S. 164-191.

Hermanns, H. (1995). Narratives Interview.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182-185.

Hermanns, H. (2000). Interviewen als Tätigkeit.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60-369.

Herzlich, C. (1998). Soziale Repräsentationn von 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und ihre Dynamik im sozialen Feld. In: U. Flick (Hrsg.). Wann fühlen wir uns gesund? —Subjektive Vorstellungen von 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Weinheim: Juventa, S. 171-180.

Hewson, C., Yule, P., Laurent, D. & Vogel, C. (2003). Internet Research Methods—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London: Sage.

Heyl, B. S. (2001). Ethnographic Interviewing.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 & L. Lofland (Hrsg.).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S. 369-383.

Hildenbrand, B. (1983). Alltag und Krankheit-Ethnographie einer Familie. Stuttgart: Klett-Cotta.

Hildenbrand, B. (1987). Wer soll bemerken, daß Bern-

hard krank wird? —Familiale Wirklichkeitskonstruktionsprozesse bei der Erstmanifestation einer schizophrenen Psychose. In: J. B. Bergold & U. Flick (Hrsg.). Ein-Sichten. Zugänge zur Sicht des Subjekts mittel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Tübingen: DGVT-Verlag, S. 151-162.

Hildenbrand, B. (1995). Fallrekonstruktive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256-260.

Hildenbrand, B. (1999). Fallrekonstruktive Familienforschung-Anleitungen für die Praxis. Opladen: Leske & Budrich.

Hildenbrand, B. (2000). Anselm Straus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2-42.

Hildenbrand, B. & Jahn, W. (1988). 《Gemeinsames Erzählen》 und Prozesse der Wirklichkeitskonstruktion in familiengeschichtlichen Gespräche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7: 203-217.

Hildenbrand, B. & Peter, C. (2002). Familiengeschichtliche Gespräche zur Rekonstruktion der Entwicklungsdynamik von Krankheiten. In: Schaeffer, D. & Müller-Mundt, G. (Hrsg.). Qualitative Gesundheits- und Pflegeforschung. Bern: Huber, S. 247-268.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Hirschauer, S. & Amann, K. (Hrsg.) (1997). Die Befremdung der eigenen Kultur. Zur ethnographischen Herausforderung soziologischer Empirie. Frankfurt: Suhrkamp.

Hirst, W. & Manier, D. (1996). Remembering as Communication: A Family Recounts its Past. In: D. Rubin (Hrsg.). Remembering our Past—Studie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271-290.

Hitzler, R. (1988). Sinnwelten-Ein Beitrag zum Verstehen von Kultur.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Hitzler, R. & Eberle, T. S. (2000). Phänomenologische Lebenswelt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09-118.

Hitzler, R. & Honer, A. (1995). Qualitative Verfahren zur Lebenswelt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382-384.

Hitzler, R. & Honer, A. (Hrsg.) (1997).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Opladen: Leske & Budrich.

Hoffmann-Riem, C. (1980). Die Sozialforschung einer interpretativen Soziologie. Der Datengewin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2: 339-372.

Hollingshead, A. B. & Redlich, F. (1958).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Wiley.

Holzkamp, K. (1986). Die Verkennung von Handlungsbegründungen als empirische Zusammenhangsannahmen in sozialpsychologischen Theorien: Methodologische Fehlorientierungen infolge von Begriffsverwirr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alpsychologie*, 17: 216-239.

Honer, A. (2000). Lebensweltanalyse in der Ethnograph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94-204.

Hopf, C. (1978). Die Pseudo-Exploration. Überlegungen zur Technik qualitativer Interviews in der Sozialforsch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7: 97-115.

Hopf, C. (1982). Norm und Interpretatio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1: 309-327.

Hopf, C. (1985). Nichtstandardisierte Erhebungsverfahren in der Sozialforschung Überlegungen zum Forschungsstand. In: M. Kaase & M. Küchler (Hrsg.). Herausforderungen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Mannheim: ZUMA, S. 86-108.

Hopf, C. (2000a). Qualitative Interviews-ein Überblick.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49-360.

Hopf, C. (2000b). Forschungsethik und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89-600.

Hopf, C. & Weingarten, E. (Hrsg.) (1979).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Hradil, S. (Hrsg.) (1992). Zwischen Bewußtsein und Sei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Huberman, A. M. & Miles, M. B. (1998).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Methods.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vhi: Sage, S. 179-211.

Humphreys, L. (1973). Toilettengeschäfte. In: J. Friedrichs (Hrsg.).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abweichenden Verhaltens. Stuttgart: Enke, S. 254-287.

Iser, W. (1991). Das Fiktive und das Imaginäre. Frankfurt: Suhrkamp.

Jacob, E. (1987). Qualitative Research Traditions: A Review.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7: 1-50.

Jessor, R., Colby, A. & Shweder, R. A. (Hrsg.) (1996).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Jick, T. (1983). Mix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riangulation in Action. In: J. v. Maanen (Hrsg.).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35-148.

Joas, H. (1988). Symbolischer Interaktionismus. Von der Philosophie des Pragmatismus zu einer soziologischen Forschungstraditio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0, 417-446.

Jodelet, D. (1998). Soziale Repräsentationen psychischer Krankheit in einem ländlichen Milieu in Frankreich: Entstehung, Struktur, Funktionen. In: U. Flick (Hrsg.). Wann fühlen wir uns gesund? Weinheim, München: Juventa, S. 205-227.

Joffe H. & Bettega N. (2003).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AIDS among Zamb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8 (5): 616-631.

Jorgensen, D. L. (198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Jüttemann, G. (Hrsg.) (1985).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der Psychologie. Weinheim: Beltz.

Kamiske, G. F. & Brauer, J. P. (1995). Qualitätsmanagement von A bis Z—Erläuterungen moderner Begriffe des Qualitätsmanagements (2. Aufl.). München: Hanser.

Kardorff, E. v. (2006). Virtuelle Netzwerke-eine neue Form der Vergesellschaftung? In: B. Hollstein & F. Straus (Hrsg.). Qualitative Netzwerkanalyse. Konzepte, Methoden, Anwendungen.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 63-97.

Kaufmann, J.-C. (1999). Das verstehende Interview-Theorie und Praxis. Konstanz: UVK.

Kelle, H. (2001). Ethnographische Methoden und Probleme der Triangulation-Am Beispiel der Peer Culture Forschung bei Kinder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der Erziehung und Sozialisation*, 21: 192-208.

Kelle, U. (Hrsg.) (1995).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Kelle, U. (2000a). Computer Assisted Analysis: Coding and Indexing. In: M. Bauer & G. Gaskell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282-298.

Kelle, U. (2000b). Computerunterstützte Analyse qualitativer Da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85-502.

Kelle, U. & Erzberger, C. (2000). 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Methoden—kein Gegensatz.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99-309.

Kelle, U. & Erzberger, C. (2003). Making Inferences in Mixed Methods: The Rules of Integration. In: A. Tashakkori & Ch. Teddlie (Hrsg.).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 &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S. 457-488.

Kelle, U. & Kluge, S. (1999). Vom Einzelfall zum Typus. Fallvergleich und Fallkontrastierung in der qualitativen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Leske & Budrich.

Kelle, U. & Laurie, H. (1995). Computer Us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ssues of Validity. In: U. Kelle (Hrsg.).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9-28.

Keller, R., Hirseland, A., Schneider, W. & Viehöver, A. (Hrsg.) (2001). Handbuch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iskursanalyse (Bd. 1): Theorien und Method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Keller, R., Hirseland, A., Schneider, W. & Viehöver, A. (Hrsg.) (2003). Handbuch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iskursanalyse (Bd. 2): Forschungspraxis. Opladen: Leske & Budrich.

Kendall, L. (1999). Recontextualising Cybersp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Research. In S. Jones (Hrsg.). Doing Internet Research—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S. 57-74.

Kirk, J. L. & Miller, M.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Kitzinger, C. (2004). Feminist Approaches. In: C. Seale, G. Gobo, J. Gubrium & D. Silverman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 S. 125-140.

Kleining, G. (1982). Umriß zu einer Methodologie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4: 224-253.

Kluge, S. (2001). Strategien zur Integration qualitativer und quantitativer Erhebungs-und Auswertungsverfahren. Ein methodischer und methodologischer Bericht aus dem Sonderforschungsbereich 186 《Statuspassagen und Risikolagen im Lebensverlauf》. In: S. Kluge & U. Kelle (Hrsg.). Methodeninnovation in der Lebenslaufforschung. Integration qualitativer und quantitativer Verfahren in der Lebenslauf-und Biographieforschung. Weinheim, München: Juventa, S. 37-88.

Kluge, S. & Kelle, U. (Hrsg.) (2001). Methodeninnovation in der Lebenslaufforschung. Integration qualitativer und quantitativer Verfahren in der Lebenslauf-und Biographieforschung. Weinheim, München: Juventa.

Knoblauch, H. (2000). Zukunft und Perspektiv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623-632.

Knoblauch, H. (2004). Video-Interaktionsanalyse. *Sozialer Sinn*, 1: 123-139.

Knoblauch, H., Flick, U. & Maeder, Ch. (Hrsg.) (2005).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Europa: Eine Bes-

tandsaufnahme. *Forum Qualtiative Sozialforschung*, 6, (3)—September 2005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fqs-d/inhalt3-05-d.htm).

Knoblauch, H. & Heath, C. (2006). Die Workplace Studies. In: W. Rammert & C. Schubert (Hrsg.). Technografie. Zur Mikrosoziologie der Technik.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S. 141-162.

Knoblauch, H. & Luckmann, T. (2000). Gattungs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38-546.

Knoblauch, H., Schnettler, B., Raab, J. & Soeffner, H.-G. (Hrsg.) (2006a).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Frankfurt etc.: Peter Lang.

Knoblauch, H., Schnettler, B. & Raab, J. (2006b).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Interpretive Audiovisual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In: H. Knoblauch, B. Schnettler, J. Raab, & H.-G. Soeffner (Hrsg.).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Frankfurt etc.: Peter Lang, S. 9-27.

Knorr-Cetina, K. (1984).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Frankfurt: Suhrkamp.

Knorr-Cetina, K. (1989). Spielarten des Konstruktivismus. *Soziale Welt*, 20:69-79.

Knorr-Cetina, K. & Mulkay, M. (Hrsg.) (1983).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Köckeis-Stangl, E. (1982). Methoden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 In: K. Hurrelmann & D. Ulich (Hrsg.). Handbuch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 Weinheim: Beltz, S. 321-370.

Koepping, K. P. (1987). Authentizität als Selbstfindung durch den anderen. Ethnologie zwischen Engagement und Reflexion, zwischen Leben und Wissenschaft. In: H. P. Duerr (Hrsg.). Authentizität und Betrug in der Ethn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S. 7-37.

Kohli, M. (1978). 《Offenes》 und 《geschlossenes》 Interview. Neue Argumente zu einer alten Kontroverse. *Soziale Welt*, 9: 1-25.

Kohli, M. & Robert, G. (Hrsg.) (1984).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Neuere Beiträge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Stuttgart: Metzler.

König, R. (1984). Soziologie und Ethnologi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26: Ethnologie als Sozialwissenschaft: 17-35.

Koselleck, R. (1990). Darstellung, Ereignis und Struktur. In: F. Braudel, Z. D. Natalie, L. Febvre, C. Ginzburg, J. LeGoff, R. Koselleck & A. Momigiliano, Der Historiker als Menschenfresser. Über den Beruf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 Berlin: Wagenbach.

Kowal, S. & O'Connell, D. C. (2000). Zur Transkription von Gespräch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37-447.

Kraimer, K. (Hrsg.) (2000). Die Fallrekonstruktion. Frankfurt: Suhrkamp.

Kreissl, R. & Wolfersdorff-Ehlert, C. (1985). Selbstbetroffenheit mit summa cum laude? Mythos und Alltag qualitativer Methoden in der Sozialforschung. In: W. Bonß & H. Hartmann (Hrsg.).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Zur Realitä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Göttingen: Schwartz, S. 91-110.

Kroner, W. & Wolff, S. (1986). Der praktische Umgang mit Wissenschaft-Reflexionen zu einem mißglückten Einstieg in das Forschungsfeld. In: H. Lüdtke (Hrsg.). Freizeitforschung.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 127-154.

Krüger, H. (1983). Gruppendiskussionen. Überlegungen zur Rekonstruktion sozialer Wirklichkeit aus der Sicht der Betroffenen. *Soziale Welt*, 34: 90-109.

Krüger, H. H. & Marotzki, W. (Hrsg.) (1994).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phieforschung. Opladen: Leske & Budrich.

Küchler, M. (1980).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Modetrend oder Neuanfa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2: 373-386.

Kuckartz, U. (1995). Case-oriented Quantification. In: U. Kelle (Hrsg.).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58-166.

Kuckartz, U. (2005). Einführung in die computergestützte Analyse qualitativer Daten. Wiesbaden: VS-Verlag.

Kunstforum 114, Imitation und Mimesis, Juli/August 1991.

Küsters, I. (2006). Narrative Interviews-Grundlagen und Anwendungen. Wiesbaden: VS-Verlag.

Kvale, S. (Hrsg.) (1989).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und: Studentlitteratur.

Kvale, S. (1995). Validierung: Von der Beobachtung zu Kommunikation und Handel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427-432.

Kvale, S. (1996). Interviews—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Kvale, S. (2007). Doing Interviews (Book 2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Lamnek, S. (1988).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Bd. 1): Methodologie.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Lamnek, S. (1989).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Bd. 2): Methoden und Techniken.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4. Aufl. 2005).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5: 673-693.

Latour, B. &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Lau, T. & Wolff, S. (1983). Der Einstieg in das Untersuchungsfeld als soziologischer Lernprozeß.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5: 417-437.

Lee, R. M. (2000). Unobstrusive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Lee, R. M. & Fielding, N. (1991). Computing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Options, Problems and Potenzial. In: N. Fielding & R. M. Lee (Hrsg.).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14.

Legewie, H. (1987). Interpretation und Validierung biographischer Interviews. In: G. Jüttemann & H. Thomae (Hrsg.). Biographie und Psychologie. Berlin: Springer, S. 138-150.

Legewie, H. (1994). Globalauswertung. In: A. Böhm, T. Muhr & A. Mengel (Hrsg.). Texte verstehen: Konzepte, Methoden, Werkzeuge.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S. 100-114.

Liebold, R. & Trinczek, R. (2002). Experteninterview. In: S. Kühl & P. Strodtholz (Hrsg.). Methoden der Organisations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3-71.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2000). The Seventh Moment.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047-1065.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2005). Epilogue: The Eigth and Ninth Moments-Qualitative Research in/and the Fractured Future.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115-1126.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Livingston, E. (1986). The Ethno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fland, J. H. (1974). Styles of Reporting 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st*, 9: 101-111.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2. Aufl.). Belmont: Wadsworth.

Loos, P. & Schäffer, B. (2001). Das Gruppendiskussionsverfahr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Luckmann, Th. (1995). Interaction Planning and Intersubjective Adjustment of Perspectives by Communicative Genres. In: E. N. Goody (Hrsg.).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action. Express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ocial Bias in Human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175-189.

Lüders, C. (1991). Deutungsmusteranalyse-Annäherungen an ein risikoreiches Konzept. In: D. Garz & K. Kraimer (Hrsg.). Qualitativ-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377-408.

Lüders, C. (1995). Von der teilnehmenden Beobachtung zur ethnographischen Beschreibung. In: König, E. & Zedler, P. (Hrsg.). Bilanz qualitativer Forschung (Bd. 2): Methoden.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 Verlag, S. 311-342.

Lüders, C. (2000a). Beobachten im Feld und Ethnograph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84-402.

Lüders, C. (2000b). Herausforderung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632-643.

Lüders, C. & Reichertz, J. (1986). Wissenschaftliche Praxis ist, wenn alles funktioniert und keiner weiß warum. Bemerkungen zur Entwicklung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rundschau*, 12: 90-102.

Lunt, P. & Livingstone, S. (1996). Rethinking the Focus Group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 79-98.

Lyotard, F. (1986). Das Postmoderne Wissen: ein Bericht. Wien: Passagen.

Madill, A., Jordan, A. & Shirley, C. (2000). Objectivity and Reliability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Realist, Contextualist, and Radical Constructionist Epistemolog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1: 1-20.

Maijalla, H., Astedt-Kurki, P. & Paavilainen, E. (2002). Interaction as an Ethically Sensitive Subject of Research. Nurse Researcher, 10:20-37.

Malinowski, B. (1916).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48.

Mangold, W. (1973). Gruppendiskussionen. In: R. König (Hrsg.). Handbuch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Enke, S. 228-259.

Mann, C. & Stewart, F.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Markham, A. M. (2004). The Internet as Research Context Research. In: C. Seale, G. Gobo, J. Gubrium & D. Silverman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 S. 358-374.

Marotzki, W. (2003). Online-Ethnographie—Wege und Ergebnisse zur Forschung im Kulturraum Internet. In: B. Bachmair, P. Diepold & C. de Witt (Hrsg.). Jahrbuch Medienpädagogik 3.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 149-166.

Marotzki, W. & Niesyto, H. (Hrsg.) (2006). Bildinterpretation und Bildverstehen. Methodische Ansätze a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Kunst-und medienpädagogischer Perspektive. Wiesbaden: VS Verlag.

Marotzki, W. & Stoetzer, K. (2006). Die Geschichten hinter den Bildern. Annäherungen an eine Methode und Methodologie der Bildinterpretation in biographie- und bildungstheoretischer Absicht. In: W. Marotzki & H. Niesyto (Hrsg.). Bildinterpretation und Bildverstehen. Methodische Ansätze a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kunst-und medienpädagogischer Perspektive. Wiesbaden: VS Verlag. S. 15-44.

Marshall, C. & Rossman, G. B. (2006).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4. Aufl.).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hli: Sage.

Matt, E. (2000). Darstellung qualitativer Forsch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78-588.

Matthes, J. (1984). Über die Arbeit mit lebensgeschichtlichen Erzählungen in einer nicht-westlichen Kultur. In: M. Kohli & G. Robert (Hrsg.). 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Neuere Beiträge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Stuttgart: Metzler, S. 284-295.

Matthes, J. (1985). Die Soziologen und ihre Wirklichkeit-Anmerkungen zum Wirklichkeitsverhältnis der Soziologie. In: W. Bonß& H. Hartmann (Hrsg.). Entzauberte Wissenschaft-Zur Realität und Geltung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Göttingen: Schwartz, S. 49-64.

Mauthner, M., Birch, M. Jessop, J. & Miller, T. (Hrsg.) (2002). 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hli: Sage.

Maxwell, J. A.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An Interactive Approach (2. Aufl.).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hli: Sage.

Maynard, M. (1998). Feminists'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Feminisms: Epistem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Method. In: T. May & M. Williams (Hrsg.). Knowing the Social Worl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S. 120-137.

Mayring, P. (1983). 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 Grundlagen und Techniken. Weinheim, Basel: Beltz (8. Aufl. 2003).

Mayring, P. (2000). 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68-475.

Mckinlay, J. B. (1993).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through Planned Sociopolitical Change: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 Polic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8: 109-117.

McKinlay, J. B. (1995). Towards Appropriate Levels, Research Methods and Healthy Public Policies. In: I. Guggenmoos-Holzmann, K. Bloomfield, H. Brenner & U. Flick (Hrsg.). Quality of Life and Health: Concept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Berlin: Basil Blackwell, S. 161-182.

Mead, M. (1963). Anthropology and the Camera. In: W. D. Morgan (Hrsg.). The Encyclopedia of Photography, Bd. I. New York: Knopf, S. 163-184.

Merkens, H. (1989). Einleitung. In: R. Aster, H. Merkens & M. Repp (Hrsg.).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Werkstattberichte und methodologische Reflexionen. Frankfurt: Campus, S. 9-18.

Merkens, H. (2000). Auswahlverfahren, Sampling, Fallkonstruktio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86-299.

Merton, R. K. (1987). The Focused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550-556.

Merton, R. K., Fiske, M. & Kendall, P. L. (1956). The Focused Interview. Glencoe, Ill.: Free Press.

Merton, R. K. & Kendall, P. L. (1979). Das fokussierte Interview. In: Hopf, C. & Weingarten, E. (Hrsg.).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S. 171-204 (zuerst 1945/46).

Meuser, M. & Nagel, U. (2002). ExpertInneninterviews-vielfach erprobt, wenig bedacht. Ein Beitrag zur qualitativen Methodendiskussion. In: A. Bogner, B. Littig & W. Menz (Hrsg.). Das Experteninterview.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 71-95.

Middleton, D. & Edwards, D. (Hrsg.) (1990).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Mies, M. (1983).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Feminist Research. In: G. Bowles & R. Duelli Klein (Hrsg.).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S. 120-130.

Mietzner, U. & Pilarczyk, U. (2003). Methoden der Fotografieanalyse. In: Y. Ehrenspeck & B. Schäffer (Hrsg.). Film-und Fotoanalyse i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 19-36.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2. Aufl.). Newbury Park: Sage.

Mishler, E. G. (1986).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Narratives. In: T. R. Sarbin (Hrsg.). Narra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Praeger, S. 233-255.

Mishler, E. G. (1990). Validation in Inquiry-Guided

Research: The Role of Exemplars in Narrative Stud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0: 415-442.

Mitra, A. & Cohen, E. (1999). Analyzing the Web: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In: S. Jones (Hrsg.). Doing Internet Research—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S. 179-202.

Morgan, D. L. (1988). Focus Group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Morris, C. (1975). Zeichen, Wert, Ästhetik. Frankfurt: Suhrkamp.

Morse, J. M. (1998). Design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56-85.

Moscovici, S. (1973). Foreword. In: C. Herzlich: Health and Illnes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Mühlefeld, C., Windolf, R., Lampert, N. & Krüger, K. (1981). Auswertungsprobleme offener Interviews. *Soziale Welt*, 32: 325-352.

Müller-Doohm, S. (1993). Visuelles Verstehen. Konzepte Kultursoziologischer Bildhermeneutik. In: T. Jung & S. Müller-Doohm (Hrsg.). 《Wirklichkeit》 im Deutungsprozeß. Frankfurt: Suhrkamp, S. 438-456.

Murphy, E. & Dingwall, R. (2001). The Ethics of Ethnography.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 & L. Lofland (Hrsg.).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S. 339-351.

Murray, M. (2000). Levels of Narrative Analysis in Health Psychology.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5: 337-349.

Niemann, M. (1989). Felduntersuchungen an Freizeitorten Berliner Jugendlicher. In: R. Aster, H. Merkens & M. Repp (Hrsg.).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Werkstattberichte und methodologische Reflexionen. Frankfurt: Campus, S. 71-83.

Nießen, M. (1977). Gruppendiskussion. Interpretative Methodologie, Methodenbegründung, Anwendung. München: Fink.

NIH-Office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d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rsg.) (2001). Qualitative Methods in Health Research—Opportunites and Considerations In Application and Review.

Northway, R. (2002). Commentary. *Nurse Researcher*, 10:4-7.

Nothdurft, W. (1987). Gesprächsanalyse subjektiver Konfliktorganisationen-Ein natürliches Design' zur Rekonstruktion individuellen Konfliktverständnisses. In: J. B. Bergold & U. Flick (Hrsg.). Ein-Sichten. Zugänge zur Sicht des Subjekts mittel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Tübingen: DGVT-Verlag, S. 98-114.

Oakley, A. (1999). People's Ways of Knowing: Gender and Methodology. In: S. Hood, B. Mayall & S. Oliver (Hrsg.). Critical Issues in Social Research: Power and Prejudi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S. 154-170.

O'Connell, D. & Kowal, S. (1995). Basic Principles of Transcription. In: J. A. Smith, R. Harré & L. v. Langenhove (Hrsg.).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93-104.

Oerter, R. (1995). Persons'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m. In: J. Valsiner (Hrsg.). Comparative-Cultural and Constructivist-Perspectives (Bd. III). Child Development within Culturally Structured Environments. Norwood: Ablex, S. 210-242.

Oerter, R., Oerter, R., Agostiani, H., Kim, H.-O. & Wibowo, S. (1996).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in East Asia: Ethic & Em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 Psychology*, 2: 9-51.

Oevermann, U. (1983). Zur Sache. Die Bedeutung von Adornos methodologischem Selbstverständnis für die Begründung einer materialen soziologischen Strukturanalyse. In: L. v. Friedeburg & J. Habermas (Hrsg.). Adorno-Konferenz 1983. Frankfurt: Suhrkamp, S. 234-292.

Oevermann, U., Allert, T., Konau, E. & Krambeck, J. (1979). 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H. G. Soeffner (Hrsg.). 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 und Text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Metzler, S. 352-433.

Ohlbrecht, H. (2000). Serviceteil.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653-672.

Parker, I. (2000). Die diskursanalytische Method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46-556.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3. Aufl.). London: Sage.

Petermann, W. (1995). Fotografie-und Film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228-231.

Piaget, J. (1937). La construction du réel chezl'enfant. Neuchâtel: Delachaux & Niestlé.

Pollock, F. (1955). Gruppenexperiment-ein Studienbericht.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Potter, J. (2001). Diskursive Psychologie und Diskursanalyse. In: R. Keller, A. Hirseland, W. Schneider & A. Viehöver (Hrsg.). Handbuch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iskursanalyse (Bd. 1): Theorien und

Method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 313-335.

Potter, J. &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otter, J. & Wetherell, M. (1995). Soziale Repräsentation, Diskursanalyse und Rassismus. In: U. Flick (Hrsg.). Psychologie des Sozialen. Repräsentationen in Wissen und Sprache. Reinbek: Rowohlt, S. 177-200.

Prior, L. (2003). Using Documents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Raab, J. & Tänzler, D. (2006). Video-Hermeneutics. In: H. Knoblauch, B. Schnettler, J. Raab, & H.-G. Soeffner (Hrsg.).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Frankfurt etc.: Peter Lang, S. 85-97.

Ragin, C. C. (1994). 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hli: Pine Forge Press.

Ragin, C. C. & Becker, H. S. (Hrsg.)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pley, T. (2007). Doing Conversation, Discourse and Document Analysis (book 7 of The S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it-hrsg. Von U. Flic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Reicher, S. (2000). Against Methodolatry: Some Comments on Elliot, Fischer, and Renni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9, 11-26.

Reichertz, J. (1988). Verstehende Soziologie ohne Subjekt.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0: 207-221.

Reichertz, J. (1989). Hermeneutische Auslegung von Feldprotokollen? -Verdrießliches über ein beliebtes Forschungsmittel. In: R. Aster, H. Merkens & M. Repp (Hrsg.).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Werkstattberichte und methodologische Reflexionen. Frankfurt: campus, S. 84-102.

Reichertz, J. (1992). Beschreiben oder Zeigen-Über das Verfassen ethnographischer Berichte. *Soziale Welt*, 43: 331-350.

Reichertz, J. (2000). Objektive Hermeneutik und hermeneutische Wissenssoziologi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14-524.

Reichertz, J. (2004). Abschied vom Glauben an die Allmacht der Rationalität? oder: Der Unternehmensberater als Charismatiker. Lässt sich die hermeneutische Wissenssoziologie für die Interpretation einer Homepage nutzen? *ZBBS*, 1: 7-28.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Richards, T. J. & Richards, L. (1998).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211-245.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Richardson, L. (2000).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923-948.

Ricœur, P. (1981). Mimesis and Representation. *Annals of Scholarship*, 2: 15-32.

Ricœur, P. (1988). Zeit und Erzählung (Bd. 1). München: Fink.

Riemann, G. (1987). Das Fremdwerden der eigenen Biographie. Narrative Interviews mit psychiatrischen Patienten. München: Fink.

Rogers, C. R. (1944). The Nondirective Method as a Technique for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279-293.

Roller, E., Mathes, R. & Eckert, T. (1995). Hermeneutic-Classificatory Content Analysis. In: U. Kelle (Hrsg.).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hli: Sage, S. 167-176.

Rosenthal, G. (1995). Erlebte und erzählte Lebensgeschichte. Frankfurt: Campus.

Rosenthal, G. & Fischer-Rosenthal, W. (2000). Analyse narrativ-biographischer Interview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456-468.

Ruff, F. M. (1990). Ökologische Krise und Umweltbewußtsein-zur psychischen Verarbeitung von Umweltbelastungen.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Ruff, F. M. (1998). Gesundheitsgefährdungen durch Umweltbelastungen-Ein neues Deutungsmuster. In: U. Flick (Hrsg.). Wann fühlen wir uns gesund? Weinheim: Juventa, S. 285-300.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Bd. 1, 2, hrsg. von G. Jefferson). Oxford: Blackwell.

Sacks, H., Schegloff, E. &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4: 696-735.

Sahle, R. (1987). Gabe, Almosen, Hilf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anjek, R. (Hrsg.) (1990).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arbin, T. R. (Hrsg.)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aeger.

Schatzman, L. & Strauss, A. L. (1973). Field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Scheele, B. & Groeben, N. (1988). Dialog-Konsens-Methoden zur Rekonstruktion subjektiver Theorien. Tübingen: Francke.

Schegloff, E. (1997). Whose Text? Whose Context? *Discourse & Society*, 8: 165-187.

Schegloff, E. & Sacks, H. (1974). Opening up Closings. In: Turner, R. (Hrsg.). Ethnomethod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S. 233-264.

Schneider, G. (1985). Strukturkonzept und Interpretationspraxis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In: G. Jüttemann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der Psychologie. Weinheim: Beltz, S. 71-91.

Schneider, G. (1988). Hermeneutische Strukturanalyse von qualitativen Interview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0: 223-244.

Schneider, G. (1994).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und 《strukturale》 Systemtheorie. Zu den Grenzen und Entwicklungsmöglichkeiten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In: D. Garz (Hrsg.). Die Welt als Text. Frankfurt: Suhrkamp, S. 153-194.

Schönberger. Ch. & Kardorff, E. v. (2004). Mit dem kranken Partner leben. Opladen: Leske & Budrich.

Schütz, A. (1971-1972).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2). Den Haag: Nijhoff.

Schütze, F. (1976). Zur Hervorlockung und Analyse von Erzählungen thematisch relevanter Geschichten im Rahmen soziologischer Feldforschung. In: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 (Hrsg.). Kommunikative Sozialforschung. München: Fink, S. 159-260.

Schütze, F. (1977). Die Technik des narrativen Interviews in Interaktionsfeldstudien, dargestellt an einem Projekt zur Erforschung von kommunalen Machtstrukturen. Ms. der Universität Bielefeld, Fakultät für Soziologie.

Schütze, F. (1983).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narratives Interview. *Neue Praxis*, 3: 283-293.

Schwandt, T. A. & Halpern, E. S. (1988). Linking Auditing and Metaevaluation. Enhancing Quality in Applied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cott, J. (1990). A Matter of Record—Documentary Sourc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Polity.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Delhi: Sage.

Seale, C. (2000). Using Computers to Analyse Qualitative Data. In: D. Silverman,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a Practical Handboo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54-174.

Seipel, C. & Rieker, P. (2003). Integrative Sozialforschung. Weinheim: Juventa.

Shweder, R. A. (1996). True Ethnography: The Lore, the Law, and the Lure. In: R. Jessor, A. Colby & R. A. Shweder (Hrsg.). 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 15-32.

Silverman, D. (1985).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Sociology. Aldershot: Gower.

Silverman, D. (1993/2001).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Method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keggs, B. (2001).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 & L. Lofland (Hrsg.).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S. 426-442.

Smith, D. (2000).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T. May (Hrs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c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17-52.

Soeffner, H. -G. (2000).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164-175.

Spöhring, W. (1989).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Stuttgart: Teubner.

Spradley, J. P. (1979).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pradley, J. P. (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Rinehart & Winston.

Sprenger, A. (1989).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in prekären Handlungssituationen. Das Beispiel Intensivstation. In: R. Aster, H. Merkens & M. Repp (Hrsg.).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Werkstattberichte und methodologische Reflexionen. Frankfurt: Campus, S. 35-56.

Stegmüller, W. (1973). Probleme und Resultate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 (Bd. 2.2): Theoriestrukturen und Theoriedynamik. Berlin: Springer.

Steinert, H. (Hrsg.) (1973). Symbolische Interaktion. Arbeiten zu einer reflexiven Soziologie. Stuttgart: Klett.

Steinke, I. (1999). Kriter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Ansätze zur Bewertung qualitativ-empirischer Sozialforschung. Weinheim, München: Juventa.

Stewart, D. M. & Shamdasani, P. N. (1990). Focus Groups—Theory and Practice.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 L. (1991)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Datenanalyse und Theoriebildung in der empirischen soziologischen Forschung. München: Fink.

Strauss, A. L. (1995). Im Gespräch (mit Heiner Legewie und Barbara Schervier-Legewie). *Journal für Psychologie*, 3: 64-75.

Strauss, A. 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

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dt.: Grundlagen qualitativer Sozialforschung. Weinheim: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1996; 2nd. ed. 1998).

Strauss, A. L., Schatzman, L., Bucher, R., Ehrlich, D. & Sabshin, M. (1964). Psychiatric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Streeck, J. (1995). Sprachanalyse als empirische Geisteswissenschaft. Von der «philosophy of mind» zur «kognitiven Linguistik».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90-100.

Strübing, J. (2004). Grounded Theory. Zur sozialtheoretischen und epistemologischen Fundierung des Verfahrens der empirisch begründeten Theoriebildung. Wiesbaden: VS-Verlag.

Stryker, S. (1976). Die Theorie des Symbolischen Interaktionismus. In: M. Auwärter, E. Kirsch, & K. Schröter (Hrsg.). Seminar: Kommunikation, Interaktion, Identität. Frankfurt: Suhrkamp, S. 257-274.

Südmersen, I. (1983). Hilfe, ich ersticke in Texten! —Eine Anleitung zur Aufarbeitung narrativer Interviews. *Neue Praxis*, 13: 294-306.

Tashakkori, A. & Teddlie, Ch. (Hrsg.) (2003a).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h. (2003b). Major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Use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h. Teddlie (Hrsg.).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S. 3-50.

Ten Have, P. (1999). Doing Conversa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Thomas, W. I. & Znaniecki, F. (1918-1920).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Bd. 1-2). New York: Knopf.

Thomson, R., Plumridge, L. & Holland, J. (Hrsg.) (2003). Special Issue-《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Theory & Practice*, 6 (3).

Toulmin, S. (1994). Kosmopolis. Die unerkannten Aufgaben der Moderne. Frankfurt: suhrkamp.

Ullrich, C. G. (1999). Deutungsmusteranalyse und diskursives Interview.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8: 429-447.

Ussher, J. (1999). Feminist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In: M. Murray & K. Chamberlain (Hrsg.). Qualitative Health Psychology-Theories and Methods. London. Sage, S. 98-110.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gner-Willi, M. (2006).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Video-Data. Documentary Interpretation of Interaction in Schools. In: H. Knoblauch, B. Schnettler, J. Raab & H.-G. Soeffner (Hrsg.). Video Analysis: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Frankfurt etc.: Peter Lang, S. 143-154.

Wahl, K., Gravenhorst, L. & Honig, S. M. (1982). Wissenschaftlichkeit und Interessen. Zur Herstellung subjektivitätsorientierte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Suhrkamp.

Walter, U., Flick, U., Fischer, C., Neuber, A. & Schwartz, F. W. (2006). Alt und gesund? —Altersbilder und Präventionskonzepte in der ärztlichen und pflegerischen Praxis, Wiesbaden: VS-Verlag.

Webb, E. J., Campbell, D. T., Schwartz, R. D. & Sechrest, L. (1966). Unobstrusive Measures: Nonreac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Rand McNally.

Weber, M. (1904). Die《Objektivitä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In: J. Winkelmann (Hrsg.) (1988).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S. 146-214.

Weber, M. (1919).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J. Winkelmann (Hrsg.) (1988).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S. 582-613.

Weingarten, E., Sack, F. & Schenkein, J. (Hrsg.) (1976). Ethnomethodologie. Beiträge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Alltagshandelns. Frankfurt: Suhrkamp.

Weitzman, E. A. (2000).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S. Lincoln (Hrsg.).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Aufl.).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S. 803-820.

Weitzman, E. & Miles, M. B. (1995). Computer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ftware Sourcebook.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Wernet, A. (2000).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pretationspraxis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Opladen: Leske & Budrich.

West, C. & Zimmerman, D. H. (1991). Doing Gender. In: J. Lorber & S. A. Farrell (Hrs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S. 13-37.

Wetherell, M. (1998). Positioning and 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Dialogue. *Discourse & Society*, 9: 387-412.

Whyte, W. F. (1955/1996). Street Corner Society. Enlarg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t. Die Street Corner Society. Die Sozialstruktur eines Italienerviertels. Berlin, N. Y.: de Gruyter 1996).

Wiedemann, P. M. (1995). Gegenstandsnahe Theoriebildung.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440-445.

Wilkinson, S. (1999). Focus Groups-A Feminist Method.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3: 221-244.

Williamson, G. & Prosser, S. (2002). Illustrating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Action Research. *Nurse Researcher*, 10: 38-49.

Willig, C. (2003). Introdu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Adventures in Theory and Method. Buckingham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T. P. (1982). Quantitative《oder》qualitative Methoden in der Sozialforschu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4: 469-486.

Winograd, T. & Flores, F. (1986). 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Winter, R. (2000). Cultural Studies.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204-213

Witzel, A. (1985). Das problemzentrierte Interview. In: G. Jüttemann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 in der Psychologie. Weinheim: Beltz, S. 227-255.

Wolcott, H. F. (1990a). On Seeking-and Rejecting-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W. Eisner & A. Peshkin (Hrsg.).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 121-152.

Wolcott, H. F. (1990b).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Wolff, S. (1986). Das Gespräch als Handlungsinstrument. Konversationsanalytische Aspekte sozialer Arbeit.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8: 55-84.

Wolff, S. (1987). Rapport und Report. Über einige Probleme bei der Erstellung plausibler ethnographischer Texte. In: W. v. d. Ohe (Hrsg.). Kulturanthropologie. Beiträge zum Neubeginn einer Disziplin. Berlin: Reimer, S. 333-364.

Wolff, S. (1992). Die Anatomie der Dichten Beschreibung-Clifford Geertz als Autor. In: J. Matthes (Hrsg.). Zwischen den Kulturen? Sozialwissenschaften vor dem Problem des Kulturvergleichs.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8. Göttingen: Schwartz, S. 339-361.

Wolff, S. (1993). Der Einstieg in das Untersuchungsfeld. Workshop des Projektes Q1b im Berliner Forschungsverbund Public Health (Mimeo).

Wolff, S. (1995). Gregory Bateson, Margaret Mead: 《Balinese Character》(1942). -Qualitative Forschung als disziplinierte Subjektivität.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H. Keupp, L. v. Rosenstiel & S. Wolff (Hrsg.). Handbuch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2. Aufl.). München: Psychologie Verlags Union, S. 135-141.

Wolff, S. (2000a). Dokumenten-und Aktenanalyse.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502-514.

Wolff, S. (2000b). Wege ins Feld und ihre Varianten.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334-349.

Wolff, S. (2000c). Clifford Geertz. In: U. Flick, E. v. Kardorff & I. Steinke (Hrsg.). Qualitative Forschung-ein Handbuch. Reinbek: Rowohlt, S. 84-96.

Wolff, S., Knauth, B. & Leichtl, G. (1988). Kontaktbereich Beratung-Eine konversation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zur Verwendungsforschung. Projektbericht, Hildesheim: Ms.

Wuggenig, U. (1990). Die Photobefragung als projektives Verfahren. *Angewandte Sozialforschung*, 16: 109-131.

Wundt, W. (1900-1920). Völkerpsychologie. Leipzig: Engelmann.

Yardley, L. (2000).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sychology and Health*, 15: 215-228.

Zinnecker, J. (2000). Pädagogische Ethnographie.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3, (3): 381-400.

Znaniecki, F. (1934).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德汉术语对照表[1]

Abweichender Fall 偏离性案例
Achsenkategorien 主轴范畴
Akteur 行为者
Aktives Zuhören 积极聆听
Alltag 日常[生活]
Alltagsgespräch 日常会话
Alltagshandlung 日常行为
Alltagsrelevanz 日常重要性
Alltagssituationen 日常情境
Alltagstheorien 日常理论
Alltagsroutinen 日常惯例
Alltagswissen 日常知识
Analytische Induktion 分析性归纳
Anonymität 匿名性
Arbeitsbündnis 工作联盟
ATLAS/ti
Auditing 审计
Aufbereitung von Texten 文本的整理
Aufzeichnung der Daten 记录资料
Auswahl 抽样
Auswahlentscheidungen 抽样决定
Auswahlstrategie 抽样策略
Autobiographische Stegreif-Erzählungen 自传式即兴叙述
Axiales Kodieren 轴向式编码

Basisdesigns qualitativer Forschung 质性研究的基本设计
Begriffsnetz 概念网络
Beobachterrollen 观察者角色
Beobachtungsleitfaden 观察提纲
Beobachtungsprotokoll 观察记录
Beobachtungstraining 观察训练
Beschreibende Beobachtung 描述性观察
Bildhermeneutik 图像注释学
Biographieforschung 传记研究
Biographische Erzählung 传记叙事
Biographisches Interview 传记访谈

CAQDAS
Chatroom 聊天室
Chicagoer Schule 芝加哥学派

Datenanalyse 资料分析
Datenerhebung 资料收集
Datensorten 资料种类
Deutungsmuster 诠释模式
Dichte Beschreibung 深度描述
Diskursanalyse 话语分析
Dokumentenanalyse 文档分析

Eingangsfrage 入口问题
Einzelfallanalysen 个案分析
E-Mail-Interviews 电子邮件访谈
Episodisches Interview 事件访谈
Erkenntnisinteressen 认知兴趣
Eröffnungssequenz 开场白片断
Erzählaufforderung 叙述请求
Erzählzwänge 叙述强迫
Ethik-Kodex 伦理准则
Ethik-Kommission 伦理委员会
Ethische Frage 伦理问题
Ethische Standards 伦理标准
Ethnographie 民族志
Ethnomethodologie 常人方法论
Evidenzbasierung 以证据为基础
Experteninterview 专家访谈
Expertenwissen 专家知识

① 为了照顾到概念翻译中产生的差异和中文的阅读习惯对原索引的顺序和内容有所调整。——译者注

Extremfälle 极端案例

Fallanalyse 案例分析
Fallauswahl 案例选择
Fallgeschichte 案例史
Fallkontrastierung 案例对比
Fallrekonstruktion 案例重构
Fallstruktur 案例结构
Fallstudie 案例研究
Fallvergleich 案例比较
Falsifikation 证伪
Feldforschung 实地研究
Feldkontakt 实地接触
Feldnotitzen 实地记录
Filmanalyse 电影分析
Focus-Groups 焦点小组
Fokussierte Beobachtung 聚焦性观察
Fokussiertes Interview 焦点访谈
Forschungsdesign 研究设计
Forschungsethik 研究伦理
Forschungshaltung 研究态度
Forschungsperspektiven 研究视角
Forschungsprozess 研究过程
Forschungstagebuch 研究日记
Frage-Antwort-Schema 问答模式
Fragebogen 问卷
Frageformen 问题形式
Frauenforschung 女性研究
Fremdheit und Vertrautheit 陌生与熟悉

Gattungsanalyse 体裁分析
Geltungsbegründung 有效性论证
Gemeinsames Erzählen 共同叙事
Gender studies 性别研究
Generalisierung 推广化
Glaubwürdigkeit 可信度
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 均衡悬浮的关注
Globalauswertung 总体分析
Going native 入境随俗
Grounded Theory 扎根理论
Gruppendynamik 小组动力
Gruppendiskussion 小组讨论
Gruppengröße 小组规模
Gruppeninterview 小组访谈
Gruppenmeinung 小组意见
Gültigkeit 有效性
Gütekriterien 质量标准

Halbstandardisiertes Interview 半标准化访谈
Haupterzählung 主叙述
Hermeneutik 注释学
Hermeneutische Wissenssoziologie 注释性知识社会学
Herstellung sozialer Wirklichkeit 社会现实的生成
Heterogene Gruppen 异质小组
Homogene Gruppen 同质小组
Hybridisierung 杂交

Idealtypenbildung 理想类型构建
Implizites Wissen 隐含性知识
Indikationsfrage 指示问题
Induktion 归纳
Informierte Einwilligung 知情同意
Inhaltsanalyse 内容分析
Interaktion 互动
Interaktionsanalyse 互动分析
Interpretation von Daten 诠释资料
Interpretationsverfahren 诠释程序
Interpretativer Interaktionismus 诠释性互动主义
Interpretatives Repertoire 诠释性曲目
Intertextualität 互文性
Interview 访谈
Interviewsituation 访谈情境
Interviewtraining 访谈训练

Kategoriensystem 范畴体系
Kategorisierung 归类
Kernkategorie 核心范畴
Kodenotiz 编码笔记
Kodieren 编码
Kodierparadigma 编码模式
Kommunkative Validierung 沟通式效度验证
Konstanter Vergleich 持续比较

Konstruktion 建构
Konstruktion von Wissen 知识的建构
Konstruktion von Wirklichkeit 建构现实
Konstruktivismus 建构主义
Kontextualisierung 情境化
Konversationsanalyse 会话分析
Krise der Legitimation 合法化危机
Krise der Repräsentation 展示危机
Kriterie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质性研究的标准
Kulturelle Bedeutung 文化意义
Kunstlehre 艺术学

Längsschnittstudie 纵向研究
Latente Sinnstruktur 潜在的意义结构
Lebensgeschichte 生活史
Lebenswelt 生活世界
Lebensweltanalyse 生活世界分析
Leitfaden 提纲
Leitfadenbürokratie 提纲官僚主义
Leitfaden-Interview 提纲访谈(法)
Logik der Forschung 研究的逻辑

MAXQDA
Mediale Daten 媒介资料
Member Check 成员检查
Memo 备忘录
Mimesis 拟态

Nachvollziehbarkeit 可理解性
Narrative Analyse 叙事分析
Narratives Interview 叙事访谈
Non-direktive Gesprächsführung 非指导性谈话
NUDIST

Objektive Bedeutung 客观意义
Objektive Hermeneutik 客观注释学
Objektivität 客观性
Offenes Interview 开放式访谈
Offenes Kodieren 开放式编码
Offenheit 开放性
Online-Focus-Groups 网络焦点小组
Online-Interviews 网络访谈
Operationalisierung 操作化

Paradigma 范式
Paraphrase 改写
Perspektive 视角
Perspektive der Beteiligten 参与者的视角
Phänomenologie 现象学
Positivismus 实证主义
Postmoderne 后现代主义
Pragmatismus 实用主义
Prinzip der Offenheit 开放性原则
Probeinterview 测试性访谈
Problemzentriertes Interview 问题中心访谈
Prozessevaluation 过程评价
Prozessnotizen 过程记录
Prozessorientierung 以过程为导向
Prozessstruktur 过程结构
Psychoanalyse 精神分析

Qualitätsmanagement 质量管理
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 质性内容分析
Qualitative Online-Forschung 质性网络研究
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Forschung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

Reale Gruppen 现实小组
Reflexivität 反思性
Rekonstruktion 重构
Reliabilität 信度
Repräsentativität 代表性

Sample 样本
Samplestruktur 样本结构
Sampling 抽样
Scheitern qualitativer Forschung 质性研究的失败
Schreiben 写作
Schrittweise Auswahl 逐步抽样
Selektive Beobachtung 选择性观察
Selektives Kodieren 选择式编码
Sensibilisierendes Konzept 敏觉化方案
Sequentialität 顺序性
Sequenzanalyse 顺序分析

Sicht des Subjekts 主体的看法
Sinnzuschreibung 意义赋予
Soziale Konstruktion 社会建构
Sozialer Konstruktivismus 社会建构主义
Soziale Repräsentation 社会展示
Soziale Verteilung 社会分布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Hermeneutik 社会科学注释学
Standardisierung 标准化
Stegreif-Erzählungen 即兴叙述
Strenge Sequentialität 严格的顺序性
Struktur 结构
Strukturalismus 结构主义
Strukturierung 结构化
Struktur-Lege-Technik 结构置放技术
Subjekt 主体
Subjektive Bedeutung 主观意义
Subjektive Konstruktion 主观建构
Subjektive Sichtweise 主观见解
Subjektiver Sinn 主观意义
Subjektive Theorie 主观理论
Subjektivität 主观性
Subkultur 亚文化
Symbolischer Interaktionismus 符号互动主义

Tagebuch 日记
Täuschung 欺骗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参与式观察
Teilnehmerrollen 参加者的角色
Text 文本
Textinterpretation 文本诠释
Textverarbeitungsprogramm 文本处理程序
Thematisches Kodieren 主题编码
Theoretisches Kodieren 理论编码
Theoretisches Modell 理论模型
Theoretischer Rahmen 理论框架
Theoretisches Sampling 理论抽样
Theorie 理论
Theorieentwicklung 理论发展
Tonbandaufzeichnung 录音记录
Transkript 转录稿
Transkription 转录
Transkriptionsregeln 转录规则
Transparenz 透明度
Triangulation 多元结合
Triangulation von Daten 资料的多元结合
Triangulation von Methoden 方法的多元结合
Triangulation von Perspektiven 视角的多元结合
Typenbildung 类型构建
Typologie 类型学

Übertragbarkeit 可转移性
Umfrage 调查

Validierung 效度验证
Validität 效度
Variable 变量
Verallgemeinerung 推广化
Verdeckte Beobachtung 隐蔽式观察
Vergleich 比较
Verschriftung 书面化
Version der Wirklichkeit 现实的版本
Verstehen 理解
Vertrauenswürdigkeit 可信任度
Verwendung von Literatur 文献的使用
Video 录像
Videoanalyse 录像分析
Virtuelle Ethnographie 网络民族志
Visuelle Daten 视觉资料
Vorverständnis 预先理解

Welterzeugung 世界生成
Wissen 知识

Zitate 引言
Zugang 进入
Zugang zu Institutionen 进入机构
Zugang zum Feld 进入实地
Zugzwänge des Erzählens 叙述的强迫
Zusammenfassung 概括
Zuverlässigkeit 可靠性